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 列·姆列钦 著　王尊贤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 列·姆列钦 著 王尊贤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 列·姆列钦 著　王尊贤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勃列日涅夫时代

姆列钦著;王尊贤译

简介

勃列日涅夫既不是改革家，也不是革命者，毋宁说是一个具有保守思想倾向的大国统治者。有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领导人，他把国家引向衰亡；另一些人则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都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他并不暴虐，信奉一条原则：你活，也要让别人活；第三类人认为，他比后来那些葬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继承者要好得多。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数年，苏联开始崩溃。究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导致了这种崩溃，还是继承者们滥用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

序
作者的话
第一卷 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1章 秘密谋划
第2章 为什么要扳倒赫鲁晓夫
第3章 谁发挥首要作用
第4章 层层渗透
第5章 猎物警觉
第6章 最后的三天
第7章新领袖为什么是他
第二卷 登顶之路
第1章 家世
第2章 小地的英雄们
第3章 将军荣归故里
第4章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主宰
第5章 老广场上的新人
第6章 赫鲁晓夫的提携
第7章 在最高领导集团里站稳脚跟
第8章 国家的第二把手
第三卷 稳固局面 蚕食对手 重新洗牌
第1章 一朝天子一朝臣
第2章 中央主席团内的地域性斗争
第3章 暗战——乌克兰二把手职位出缺
第4章 削弱强势的共青团首领谢列平
第5章 初试锋芒——任用萧洛科夫
第6章 撤换克格勃主席
第7章 莫斯科领导人换马
第8章 罢黜谢列平
第9章 基辅大换血
第10章 甩掉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利扬斯基
第11章 大局已定
第12章 二号人物波德戈尔内离开主席团
第四卷 意识形态战线最重要
第1章 意识形态圣火的守护人
第2章 套中人
第3章 路高升的思想总警监
第4章 成为坐在总书记右首的人
第5章 平衡之道——书记处主持人的“二人转”
第6章 清算古拉格群岛的伊万·杰尼索维奇
第7章 逆向的寓言——不是把未来而是把过去说成最好
第8章 石化的意识形态部门

第9章 一个诗人的遭遇
第10章 “布拉格之春”的前后
第11章 对斯大林无休无止的争论
第12章 难当的宣传鼓动部长
第五卷 缓和与紧张
第1章 国防部长换将
第2章 紧张的边境
第3章 不等边三角形——外交部长在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之间
第4章 与尼克松的“蜜月”
第5章 谈判中愿意寻求妥协
第6章 新任的国防部长是文职
第7章 听军方的还是听外交部的
第8章 “胡桃三驾马车”的强硬立场
第六卷 亲信们
第1章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第2章 顾问·助手·笔杆子
第3章 办公厅主任契尔年科
第4章 安德罗波夫和他的副手
第七卷 官场现形记
第1章 政治局委员的日常生活
第2章 面面俱到的官员福利系统
第3章 总书记身边小圈子的日常运转
第4章 掌握住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们
第5章 苹果通心烂
第八卷 失败的柯西金改革
第1章 从合作社指导员到政府首脑
第2章 柯西金的日常生活与家人
第3章 试图让经济增速的局部改革
第4章 越来越多的反对者
第5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6章 坐困愁城
第九卷 病夫治国
第1章 在阿富汗的混乱局面
第2章 飞黄腾达的总书记家人
第3章 要命的药片
第4章 仍然是主宰者
第5章 残灯摇曳
第6章 为总书记代笔的回忆录
第7章 倒计时
第8章 谁第一个到来，谁就是继承人
第9章 结尾的话

第10章 勃列日涅夫大事年表

序

作者的话

我清楚地记得，初次听人谈起勃列日涅夫和见到他的照片的情形。1964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我们都生活在对赫鲁晓夫所许诺的共产主义的期盼之中。我们的女班主任毕业于摩尔达维亚师范学校，她根据国民教育科的要求，做了更为确切的说明：

“你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就到来，别以为某个清晨广播里会宣布说，共产主义已经从今天开始。共产主义可是一步一步地实现的。”

然而谁都不怀疑共产主义将迅即到来——直至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让赫鲁晓夫退职为止。正是那个时候，我才见识了勃列日涅夫——他的照片引人注目地刊登在所有报纸的头条版面。照片刊登的是两张——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但我记得，大人们议论的只是勃列日涅夫。他们都明白，正是他会成为国家领导人。于是我便喜欢上了他。

我也同样清楚地记得他去世的日子。1982年11月10日，我在旷日持久的出差之后，从南方飞返寒冷的莫斯科。在家里取出背包中的物品时我打开收音机，当即明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有的广播和电视频道都在播放哀伤的古典音乐。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好感业已荡然无存了。举国上下全都腻烦了他……

18载的勃列日涅夫年代——这正是我的青少年时期，日渐长大成人和对人生倍感关注的岁月。撰写本书之时，我仿佛再次重温了全部这段时光。

诚然，也常常令人伤感。正值撰写他的传记之际，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并非无足轻重并曾向我讲述了许多事情的人们，接二连三地相继辞世。我也安葬了自己的继父，我非常爱他，并在本书中有所提及，别的不说，单是在增进对勃列日涅夫政权机制的理解这一点上，我也应当对他深怀感激。

不过更加令人感到痛惜的是，那真是一个坐失良机、徒劳无功的年代！勃列日涅夫接手一个渴求复兴、期望进步的国度，而遗留下的国情却是灰心失望，腐败堕落到公然弄虚作假，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不过我这是过早地提及了后话……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掌国家大权之时，谁也不曾料到他会领导苏联长达18年之久，直至他寿终正寝。

第一卷 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1章 秘密谋划

以何种借口将赫鲁晓夫请来莫斯科，才能让他什么也猜测不到？

大家一再斟酌，应该如何与赫鲁晓夫进行谈话，谁人以何种顺序依次发言，具体都讲些什么。

决议中列出四个人的姓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这表明了究竟谁是掌控事件之人。

背着国家领导人本人决定其命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于1964年10月12日举行。在莫斯科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没从各地召来各民族共和国中的主席团委员。

也没有赫鲁晓夫本人——他与自己在政府中的第一副手米高扬正在皮聪达休养。赫鲁晓夫挑选了那些比自己年轻的人组建领导班子，但在私交方面他感到最为称心如意的人还是米高扬。这不仅仅因为他俩是同龄人，而且斯大林在世时的多年工作关系也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会议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统管党的各项事务。他率领官方代表团前往柏林向东德人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5周年，刚刚回国。

据目击者称，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异常激动。而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齐集的大厅内，令人感到一种神经紧张、提心吊胆的气氛。这次会议可谓非同寻常：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撤销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就这一危险话题所进行的无休无止的秘密谈判，业已持续数月之久。但10月12日他们开会则十分正式。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马林像往常一样，用小卡片记录大家发言的要点。也许，正是马林的到场最能表明赫鲁晓夫气数已尽。马林主持公共事务部10年，公认是赫鲁晓夫特别信任的助手。“就像斯大林在世时的波斯克列贝舍夫

一样。”马林常常自豪地自我评价。

主席团会议上都讨论了些什么呢？

以何种借口将赫鲁晓夫请来莫斯科，才能让他什么也猜测不到并接受针对他的措施？这是第一。第二，大家一再斟酌，应该如何与赫鲁晓夫进行谈话，谁人以何种顺序依次发言，具体都讲些什么？

讲话的主要是勃列日涅夫和党的领导层中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谢列平。当时谢列平尚不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但他在权力等级中的排位之高、策划推翻赫鲁晓夫一事过程中的作用之大，都足以令人们格外专注地聆听他的发言。

几乎立即便作出了决定：应当让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发言，这会成为一个重要信号——基辅对赫鲁晓夫持批判态度。须知正是乌克兰党组织被视为赫鲁晓夫主要的依靠力量。基辅领导人之中，许多都是他亲自任命的。而且谢列斯特也被目为赫鲁晓夫的人。他连外貌都让人想到赫鲁晓夫——身材矮小敦实，脸面粗糙肥胖，头颅整个谢顶……

将赫鲁晓夫召至莫斯科的借口是：在涉及他的改组农业的报告方面积累了许多问题。

立马便产生了一个问题：由谁往皮聪达打电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考验，与赫鲁晓夫谈话颇为令人胆寒。他对主席团委员们从不客气，可以随便地张口骂娘。

勃列日涅夫出访柏林期间，主持党务的一直是波德戈尔内，这是一个性格坚毅、爱好虚荣的人。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差事，因为他刚刚向赫鲁晓夫详细汇报过日常工作，后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何头天他闭口不提所发生的问题？千万别让其产生什么怀疑……

于是大家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来打电话。还能有谁呢？正是他在履行老大哥的职责。晚上9点左右，使用城际高频通信线路接通了皮聪达的国家别墅，赫鲁晓夫拿起了听筒。

据谢列斯特称，当时勃列日涅夫惴惴不安，他脸色发白，嘴唇青紫，说话的声音颤抖。赫鲁晓夫听罢他的话，不满地说道：

“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离了我，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吗？好吧，我考虑一下。米高扬在这里，我要同他商量商量。过一会儿再给我来电话。”

这一时刻，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是在神经紧张中度过的。赫鲁晓夫十年之间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和竞争者。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小时之后，勃列日涅夫重新给赫鲁晓夫去电话。

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

“好吧，明天上午11点，我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飞回莫斯科。”

主席团委员们结束讨论，就议事日程预先拟好决议：

1.

鉴于有关预定于本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和新的五年计划制订工作方面所出现的原则性疑点，苏共中央接到了种种质询，兹确认在赫鲁晓夫同志参与下，于最近期间举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已刻不容缓至为必要。

委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等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进行电话联系，向其传达这一决定，以便于1964年10月13日举行中央主席团会议。

2.

由于各地对已下发至各级党组织的赫鲁晓夫同志1964年7月18日《关于转向集约化道路的农业领导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许多疑点，而且其中一些方针含混不清，特从各党组织收回上述报告。

3.

考虑到所出现问题的性质的重要意义和即将对其所进行的讨论，现认为宜将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至莫斯科，以便就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问题的结果向全会提出报告。

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问题，应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场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对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报告，人们的态度一向毕恭毕敬，现在却被宣布为“含混不清”。其实主席团委员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三个月之前的7月11日，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一个新想法：彻底改组对农业的管理——对每一种产品单独建立专门的管理机关。一个总局管粮食，另一个总局管肉类，第三个则管毛皮。

与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认为经济问题可以用组织和干部的手段进行解决：有了问题，那就建立一个解决它的机关。

但是另一件事却难倒了主席团委员们。赫鲁晓夫已经撤销了农村的区委会，将乡镇中党的机关降为发挥次要作用的管理生产的党委。在新的农业领导系统中，根本没有党的机关的地位。专职的党委书记对此会做何反应呢？

中央主席团收回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向地方上党的机关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复为主宰一切之人。

关于召集中央委员们前来莫斯科一事，自然不曾向赫鲁晓夫谈及，否则他会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1957年夏“老革命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企图将赫鲁晓夫撤职之时，他即曾下令召集中央委员开会。这些人飞抵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又派人让他们了解事情原委，讲明力量分布情形和应当支持何人。赫鲁晓夫平日常常得意地讲述他赢得这场争斗的经过。如今别人也利用了他的经验……

决议中列出四个人的姓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这表明了究竟谁是掌控事件之人。勃列日涅夫名列第一，自然是他担当了主角。

这一决议截断了主席团委员们的退路。现在他们之中谁也无法在赫鲁晓夫面前反悔并声称他们背着他在主席团会上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们必须一干到底。

第2章 为什么要扳倒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精力异常充沛。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又是个活泼好动、性情直爽之人。他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

在他10年执政生涯临近终结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得罪了党的机关、军队、克格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随意申斥、呼来喝去。

多年过后，我有机会详细询问该事件的一些参与者。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是：为何他们要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与此同时，却又是个活泼好动、性情直爽之人。在人们的记忆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一个恣意妄为的捣乱分子，有时显得荒诞不经，有时俨如十足的古董，因而并未得到历史应有的评价。他曾坦言：

“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倒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土豆却没有了。”赫鲁晓夫曾下令食堂免费供应面包。他一心想让国家摆脱贫困，但总是寄望于一些乌托邦式的想法，冀图一举解决各种问题。

1959年12月4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就苏共纲领草案发表讲话。他阐释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具体设想：

“这就意味着让所有的儿童都进入寄宿学校，让所有的孩子从出生到受完教育都由国家加以保证，让所有的老人从某一年龄开始在各方面都得到保障……我想，再干上一两个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所有的人都有饭吃，谁想吃多少都行。我们将会有面包和肉——再来两个五年计划（这是最大限度）就请随便吃吧。不过一个人只能吃那么一些，多了也吃不下。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食堂，在那里你可以随便交点钱，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却无法做到这点呢？……”

赫鲁晓夫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而且在他十年执政生涯临近终结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

由于严重干旱，1963年庄稼歉收。许多城市不得不实行购物卡制度。首次从国外采购粮食——940万吨谷物，约为当年收获量的10%。

商店里已见不到面粉、饼干、甜饼、肉类的踪影，买牛奶排起了长队。

1961年的货币改革和物价上涨毁坏了赫鲁晓夫的声誉。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居然得罪党的机关（打破习以为常的管理体系）、军队（裁减军官队伍）、克格勃（对肃反工作人员表现出十足的不敬，拒绝赋予他们特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

最高权力集团之所以不喜欢赫鲁晓夫，有着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高官显宦们渴望安宁与舒适，而赫鲁晓夫却持续不断地推行干部制度的彻底改革。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随意申斥、呼来喝去。对待中央主席团的同事，遣词用语上也毫不客气：傻瓜、无赖、懒蛋、死苍蝇、可怜虫、臭狗屎……

比如，在1963年12月2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便大肆斥责自己的助手们。赫鲁晓夫在谈到农业领域的劳动报酬时，猛力抨击他在政府中的副手波利扬斯基：

“波利扬斯基同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一分歧会形成某种路线。您大胆地揽上了一个任务，为您并不懂得的问题进行辩解。这也正是您的斗胆之处。不过这既不能使我、也不能使其他人受到鼓舞。我很难指靠您解决这些问题。您只是随口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话。”

“是您问我，我才回答的：为国家提供的粮食，集体农庄的产品比国营农场的便宜。”波利扬斯基进行反驳。

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扭头对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说：

“谢列平同志，您去开一张介绍信，顺手塞给这位主席团委员。我动身之前，就在中央统计局开了介绍信。”

然后重又对波利扬斯基说：“您歪曲事实。您说得不对。”

“请不要说塞给，”波利扬斯基气恼地顶撞道，“我也是有身份的人。究竟该怎样和您谈话呢？如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气氛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也许，您对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显然就是这样，我不否认。我怀着极大的不信任，我不可能信任您。这也可能是主观看法，让主席团去判定吧。请坐到我的位置上来，我坐到您那里。”

“不必激动，”波利扬斯基坚定不移，他可不是胆小鬼，“财政部也好，国家计委也好，都用数字表明，集体农庄的产品更便宜。”

赫鲁晓夫面向全体主席团委员说道："同志们，我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波利扬斯基不够客观。我们俩曾经十分尖锐地谈论过养老金的问题。结果是您对还是我对？"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带着准备完美的提议来开会呢？"波利扬斯基抗辩，"除中央委员会各位书记之外，还有五位主席团委员都签署认可了这一提议。为什么您总是认为那仅仅是波利扬斯基一个同志提出来的呢？"

"因为那是您起草的。"

"您仅仅根据这一事实便形成这种印象是不足为凭的。"波利扬斯基不客气地回答。

"岂止一个事实。"赫鲁晓夫语带威胁地说道，"也许，这是年龄的问题，我衰老了，爱激动，容易起反应。看来，在我没死之前，还会做出反应，我对自己无可奈何。似乎不关我什么事了，我已年届七旬，好吧，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我还是共产党员，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党的事业斗争……"

稍后，赫鲁晓夫又补上一句："看来，该是我退休的时候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性子急躁。"

随即他又突然猛烈抨击自己的另一名副手柯西金：

"柯西金不在这里，但这里散发着柯西金的气息。条条线索都通向柯西金，他有许多陈旧的观点……"

按赫鲁晓夫意图，1961年10月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要求不断更新党的领导机关。区委每次选举必须更新一半人员，州委更新1/3，苏共中央委员会则更新1/4。这就是官员们忌恨赫鲁晓夫、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原因，后者允许他们稳居自身的职位15年之久。赫鲁晓夫身边的人都不赞成他的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寻求与西方的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削减军工生产。

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寿辰当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来到他位于列宁山上的府第，向他表示祝贺。斯大林在世时，政治局委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则建议大家迁入紧邻莫斯科大学巍峨大厦的崭新宅邸。

接受庆贺的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心情舒畅。来宾饮用过一杯白兰地，短暂交谈一番，便匆匆离去，托词是不可让赫鲁晓夫"累着

了”。虽然赫鲁晓夫明明乐意继续热闹热闹，勃列日涅夫却不断催促大家起身，波德戈尔内也随声附和。

让赫鲁晓夫退职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谢列斯特后来撰文说，有些主席团委员表现得极度神经紧张，甚至惶恐得发抖：万一赫鲁晓夫猜到了什么可怎么办？

第3章 谁发挥首要作用

谁是这次密谋的推动者？一种说法，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另一种说法，是“共青团之鹰”谢列平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多年以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发表谈话称，发挥关键作用的应是勃列日涅夫。

历史学家早就试图查明，谁是这次密谋的推动者，尽管许多人连“政治密谋”这个字眼都不喜欢。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另一种说法，则应是谢列平和他的朋友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当公开议论往事已经成为可能的时候，无论勃列日涅夫还是波德戈尔内，都已经无法说出自己的意见了。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则曾发表谈话称，发挥关键作用的应是勃列日涅夫，虽然按照他们的说法，他的表现前后不一，甚而有些胆怯。某些历史学家觉得，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说法并不可信。这些人认为，先前的共青团员更为坚定和顽强，正是他们组织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因为他们对于在最高权力集团中形成空缺极为关心。他们急于充当主角……

究竟反赫鲁晓夫倾向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战友们如何下定决心商谈，这次政治密谋如何在组织上发展成熟，这些方面的真相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悉。

但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表明，积极反对赫鲁晓夫的有两个集团。

第一个集团是主席团委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这些人都受够了赫鲁晓夫的恶气。他让他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们早就感到厌烦。

第二个集团则是那些团结在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周围的共青团出身的人。没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反对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本上不能成功。而唯谢列平马首是瞻的乃是整整一代经过共青团历练的党内年轻干部。

然而在最高权力集团中，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都不可能找人谈话：无论就年龄或职级而言，他们都不可能出面。谢米恰斯内当时仅仅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与各共和国、各州的领导人进行谈话的，基本上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

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中将第一个获准接触勃列日涅夫个人档案材料，他注意到，自1964年中期起勃列日涅夫停止作日记或笔记，而此事他已进行20年之久。他照旧记录赫鲁晓夫的指示，却不记载与何人会面以及谈了些什么。

勃列日涅夫明白，他正在参与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阴谋，所以不想留下蛛丝马迹。赫鲁晓夫退职之后，他又恢复了关于一天中所作所为的简短笔记……

当时的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请求他支持让赫鲁晓夫退休的提议。随后中央委员会书记杰米契夫也让格里申去见他，说许多同志都准备提出解除赫鲁晓夫所担任的各种职务的问题。格里申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已经同他谈过话了。杰米契夫很满意："我很高兴我们站到了一起。"

杰米契夫也将叶戈雷切夫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此人已接替他出任首都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杰米契夫将其领到窗户旁边——离开电话机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说道：

"你知道，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

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主席沃罗诺夫也说过，正是勃列日涅夫"招募"了他。勃列日涅夫邀请他去扎维多沃打猎，返回时还让他乘坐其"海鸥"轿车。这辆宽敞的政府用车中的第三个人，则是负责联络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罗波夫。

在车上，勃列日涅夫摇起隔离乘客和司机的玻璃，讲述了准备追究赫鲁晓夫责任的想法。据沃罗诺夫说，勃列日涅夫拿着一份党的高层领导人名单，姓名上打着记号，标明同谁已经谈妥，同谁还需要进行商谈。

第4章 层层渗透

波德戈尔内并不那么信得过勃列日涅夫。这次政治密谋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后关头都有可能向赫鲁晓夫和盘托出，从而毁掉其余的人。

当年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讲述过推翻赫鲁晓夫的准备情况。

1964年7月，他正在克里米亚第5号国家别墅“洽伊尔”中疗养。卫队预告说，勃列日涅夫要来看望他。谢列斯特感到奇怪：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并不亲密。他所期待的是波德戈尔内，此人也正在附近的“穆霍拉特卡”别墅疗养，他们两人关系友好。波德戈尔内调职莫斯科之前为乌克兰的领导人，正是他提拔了谢列斯特。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之后，依然对谢列斯特常加照护。

勃列日涅夫来了。他们在长椅上落座。谢列斯特的小孙子跑了过来，他和爷爷一样，名叫彼得。

“你叫什么名字呀？”勃列日涅夫亲切地问他。

小男孩回答之后，转而好奇地问：

“那你叫什么？”

“我叫廖尼亚叔叔。”

别佳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噢，我知道了。你是电影放映室的廖尼亚叔叔。”

勃列日涅夫略显尴尬，但事情很快便弄明白了：勃列日涅夫长得很像那个与他同名的电影放映员，此人常来国家别墅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一家放电影。自此之后，勃列日涅夫与谢列斯特交谈时必定会请求说：“彼特罗，别忘了向孙子转达放映室廖尼亚叔叔的问候。”

勃列日涅夫和谢列斯特洗过澡，在凉亭里坐下。勃列日涅夫开始询问乌克兰的情况。他好像顺便似地提了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对你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待我很温和，一如大领导人对待年轻人那样，”谢列斯特措词严谨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斥责人，他也不曾耍粗暴态度。”

“这是当面，背地里说的可能就是另一套了。他说话总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嘟囔着说。

谢列斯特不知所措，心想，勃列日涅夫了解赫鲁晓夫对他的真正态度。为了以防万一，便说道：“赫鲁晓夫处在这样高的地位，他没有必要当面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而且总的说来，他的责任和负担都很重，即便讲了什么不客气的话，我们也应当加以谅解。不过他生性不是个记仇的人，相反，倒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你对他了解太少了，”勃列日涅夫不满地回应，“你局限于外地，什么也看不着、感觉不到。”

谢列斯特恼了：“谁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

“确实是这样，不过看待所发生的事情时，目光应当开阔一些。党内、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源于你们中央主席团委员。我们发现，你们全都附和赫鲁晓夫，带头向他鼓掌。可我们很难同赫鲁晓夫一道工作。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坦率地谈谈这方面的事。彼特罗，谁都不应当知道我俩的这次谈话哦。”

午饭时间到了，勃列日涅夫并不推辞喝上两杯。放松下来之后，他朗诵起诗来，还数次含蓄地对谢列斯特的妻子说：“彼特罗不明白我的话。”

午餐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出门来到外面时，天已经黑了。酒后的谈话变得较为坦率。

“彼特罗，你应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勃列日涅夫说。

谢列斯特并不急于做出最终答复：“我不明白，究竟需要在什么事情上支持谁？你解释一下吧。”

“赫鲁晓夫极不尊重我们，常说粗话，给我们起绰号、扣帽子，遇事擅自作出决定。不久前还宣布，我们的领导层已经老迈，必须年轻化。他打算把我们大家统统赶走。”勃列日涅夫回答。

勃列日涅夫所言不虚。谢列斯特即曾亲自听到赫鲁晓夫讲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老头子成堆……”

“你多少岁了？”勃列日涅夫问。

“满55了。”

“这么说，按照赫鲁晓夫的看法，你也是老头子了。”

“赫鲁晓夫为干部年轻化操心，这很好，是应当一代代传承。”谢列斯特继续做戏。

“你把我的话理解错了，”勃列日涅夫说，“必须明白，实际上他是想赶走富有经验的干部，好让自己决定一切事情……”他皱了皱眉头又补充说道：“很遗憾，你不肯理解我。对我们的谈话可得严守秘密。”

谢列斯特憋不住说：“如果您信不过我，那就没有必要到我这儿来，至于保密之类的话，请您再也不要向我提起了。”

勃列日涅夫突然意识到了不妥：“彼特罗，你要正确理解我的话。提起这一切我很难过，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赫鲁晓夫一直欺侮我们，没有活路了。”他顿时热泪盈眶，“没有你，没有乌克兰共产党这样大的组织，我们就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你们大家应该开个会，坦诚地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谈谈他的缺点。”谢列斯特劝告说，“我觉得，他是会理解的。”

“你这样说是因为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勃列日涅夫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去做，他准会将我们统统赶走。”

他们回到别墅里，又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

勃列日涅夫拥抱了谢列斯特，热烈亲吻一番，意味深长地说：“彼特罗，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

勃列日涅夫离去了，谢列斯特则几乎直至天明都在堤岸上来回踱步，反复斟酌他该怎么办，究竟站在哪一方。他自己也有点害怕难以预料的赫鲁晓夫，同样对不断折腾的第一书记感到厌倦。

赫鲁晓夫高高兴兴地来到基辅，在共和国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大骂当地领导人：“乌克兰认输了，形势引起了不安……工作干得不好……我已经批评了乌克兰领导人，但在用餐时间你提出批评，他们满不在乎，而现在你当众批评的时候，我才看见他们畏缩了……最近数年一到夏天，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全都唯恐错过在黑海泡澡的最佳季节。好在如今你们得到了克里米亚，因而有了地方可去。同志们，谁同我一道在乌克兰工作过，他就知道，我在乌克兰干了整整13年，在这13年中我仅仅休过一次假……”

谢列斯特和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当着他们下属的面，只有被迫不冷不热地笑着对赫鲁晓夫鼓掌。

早晨谢列斯特往穆霍拉特卡给波德戈尔内打电话，告诉他说头一天

勃列日涅夫来过。波德戈尔内很感兴趣："你这会儿在干什么？"

"在重温昨天的谈话。"

"如果可以，到我这儿来吧，咱们一块儿重温。"

谢列斯特向波德戈尔内详尽地转述了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波德戈尔内仔细听他讲完后说道："所有这些我全都知道。"

原来，勃列日涅夫已经去过波德戈尔内那里，并且转述了那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谢列斯特感到奇怪："那你干吗还要让我重说一遍？"

波德戈尔内坦白地承认："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了。"

波德戈尔内并不那么信得过勃列日涅夫。这次政治密谋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后关头都有可能向赫鲁晓夫和盘托出，从而毁掉其余的人。

谢列斯特打探，为何去找他的是勃列日涅夫，而非波德戈尔内。

"就应该这样，"波德戈尔内神秘地回答说，"过些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列斯特自己也能猜得到。勃列日涅夫信不过波德戈尔内，不想从其口中知道谢列斯特站在谁一边，而是要亲自加以证实。

波德戈尔内说，情况很严重。

"我明白，"谢列斯特点了点头，"勃列日涅夫在和我谈话时甚至哭了。"

"真的？"波德戈尔内讥嘲地重问了一遍。

"的的确确。"谢列斯特肯定地说。

"你不要太相信这一招，"波德戈尔内指出，"记住一句谚语：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他们从二楼的阳台上看见了勃列日涅夫。

"不过你别表现出知道他已经来过我这里的样子。"波德戈尔内提醒谢列斯特。

勃列日涅夫重又提起与赫鲁晓夫很难共事的话题，历数其种种错误。将农业变成了他垄断的领地；在国民经济中进行无休无止的改组；把党的组织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蔑视意识形态问题，声称那都是闲扯，需要做的应当是具体的工作……

谢列斯特再次表示大家应该开个会，向赫鲁晓夫讲出自己的意见。

“我可告诉你，”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谁若是第一个提到这事，谁就会被赶出领导班子。”

谢列斯特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勃列日涅夫，随后又望了望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加入了这场演出。

“咱们就别再玩捉迷藏了。我知道你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彼特罗，你要正确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应当出席中央全会，没有乌克兰和乌克兰所选出的中央委员的意见，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尽人皆知，乌克兰党举足轻重，也是赫鲁晓夫的主要靠山。因此你应当着手开诚布公但又小心谨慎地同你那里所有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班子的同志谈谈，这些人在乌克兰不少——一共36个。或许，也应该同信得过的积极分子进行谈话。”

“为了正义的事业，谈谈是可以的，”谢列斯特回答说，“尽管这很冒险。不过有三个人我不能信任，就是谢宁、科尔涅伊丘克和伊瓦先科。他们准会以私人方式立即把一切都转告赫鲁晓夫。”

奥莉加·伊瓦先科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分管国防工业部门），对赫鲁晓夫极富好感。

谢宁自1953年起即担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赫鲁晓夫和谢宁小时候在工厂里的同一个班上学，从那时起就很要好。

科尔涅伊丘克是著名的戏剧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院士，并未担任官职，但从斯大林时代以来一直是苏共中央委员。

8月12日，谢列斯特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汇报共和国的工作。

8月14日，勃列日涅夫来电话，要他详细转述与赫鲁晓夫的谈话。

8月21日，波德戈尔内飞抵基辅。现在已经是谢列斯特开始不安了，事情具有了旷日持久的性质，但如果拖延下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

“必须更加坚决地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可能被出卖。”波德戈尔内说。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谢列斯特问。

“我回到莫斯科后，要大力敦促廖尼亚。他胆怯了。”波德戈尔内回答说。

9月中旬，勃列日涅夫率领代表团前往保加利亚，在基辅停留了数小时。谢列斯特在机场迎接代表团，将勃列日涅夫单独领进中央委员会大厦，开始劝导他：

“事情牵连的人太多了，拖延不决会引发许多祸患的。”

勃列日涅夫信心十足地回答道：“你不必担心。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但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还不知道。还要进行商量。”

9月26日，星期六，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由赫鲁晓夫主持。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出席会议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准备搞掉赫鲁晓夫。

“不过，无论实施所构想之事的日期抑或具体方式，暂时谁都不确切了解，”谢列斯特回忆说，“甚至组织者们自己也仍然处于一种心情沮丧、缺乏信心和模棱两可的状态。”

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依然对赫鲁晓夫表示十足的忠诚和崇敬。会后少部分国家领导人会聚在中央主席团房间内。赫鲁晓夫问：“嗯，同志们，你们对所采取的措施和我的讲话有何意见？”

主席团委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说，各方面都好极了。赫鲁晓夫吩咐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筹备中央全会例会，说他即将去休假。

数日之后波德戈尔内从境外归来时，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在基辅“迫降”。他与谢列斯特彻夜长谈，谢列斯特详细讲述了他已经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哪些人谈过话。与许多人都当即取得相互理解，但有一个人张皇失措，谈话无果而终。

波德戈尔内警告说：“你要小心些。”

他们依然畏惧赫鲁晓夫。

“只要他一句话，”谢列斯特回忆道，“我们许多人便会遭到‘无害化处理’，被孤立起来，甚至被干掉，因为现在所进行的政治密谋就其实质和方式而言都是反对政府首脑，这种事情的结局如何尽人皆知……”

波德戈尔内将莫斯科的事情进展情况告诉了谢列斯特，有些主席团委员动摇不定。不得不恐吓某些人，使他们至少保持沉默……

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力劝谢列斯特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琴科谈谈，此人曾多年与赫鲁晓夫共事，30年代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大镇压时期即将被逮捕，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为之辩解，救了他一命。

谢列斯特冒险摊牌。科罗琴科想了想后做出决断：

“我很早就认识赫鲁晓夫了。他是个优秀组织者，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在目前这个职位上他显然太刚愎自用了——认为自己就是领袖。他做了许多政治方面的错事。看来，让他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对他，对党都要好一些，而且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应当分开。年届70很难管理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何况尼基塔已是一副老年人的脾气。”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我该如何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转达呢？”谢列斯特问。

“你就说，我和你们站在一起，而且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在任何场合发言。”

又有一个赫鲁晓夫的忠实战士，本来在很多方面都应该感谢赫鲁晓夫，却轻易地便叛卖了他。

第5章 猎物警觉

不过阴谋分子们也并非事事顺利。波德戈尔内告诉谢列斯特，赫鲁晓夫临动身休假之前，他俩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赫鲁晓夫将波德戈尔内请进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道：

“波德戈尔内同志，这是真的吗？有一伙人想要搞掉我，而您与这个团伙有关。”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哪来的消息呀？”波德戈尔内佯装不胜惊讶。而他自己心里却在琢磨：这可能是谁透露给他的呢？首先想到了勃列日涅夫。这家伙一度吓坏了。

不过赫鲁晓夫说，阴谋之事是克格勃工作人员加柳科夫透露给他儿子谢尔盖的。此人是伊格纳托夫当年的卫队长。伊格纳托夫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调任无权无势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对赫鲁晓夫怀有怨气，确实积极参与了这场政治密谋的准备工作。他跑遍全国，说服老朋友们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甚至还向波德戈尔内出示了克格勃工作人员交付谢尔盖的那封信件，并且询问道：“您了解有关此事的什么情况吗？”

波德戈尔内眼皮也不眨地说他一无所知，建议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明全部事实。他确信，谢米恰斯内能摆脱困境。但赫鲁晓夫决定不找克格勃，而是私下请米高扬召见伊格纳托夫，与之谈谈。

密谋者们通过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得以向伊格纳托夫提醒大家所面临的威胁，吩咐他与米高扬谈话时否认一切……而为人谨慎的米高扬在完成第一书记的嘱托时，似乎也并未表现出平日的利落。他保持对赫鲁晓夫的忠诚，但也不想与其对手们闹别扭。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扎米亚京告诉我，被撤职前不久，赫鲁晓夫突然出现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午宴上，并出乎人意料地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讲话。

位置当然很快就找到了。赫鲁晓夫向波德戈尔内打了个手势：“继续进行吧。”

然而在宴会末尾，礼节性讲话已经发表过后，赫鲁晓夫却说：

“真是有意思。我刚刚休假回来，而大家都要我相信，我健康欠佳，需要去进行治疗。医生们说，这些人也说。那好吧，我去。可等我回来的时候，这整个‘中央堵塞’还得我来打通。”这时他指了指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他们以为，没有我，他们一切都能解决……”

看来，赫鲁晓夫终归感觉到了些什么，他天生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否则就不会在一场场的政治搏斗中硕果仅存。

很可能，正是这点才足以解释他突然给朱可夫打电话一事。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巧妙地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这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不愿意让一位大名鼎鼎、果敢坚毅、骄矜自大的元帅待在自己身边。七年来他们从未交谈过。朱可夫被勒令退休，常年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可是突然之间赫鲁晓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息事宁人地说：“你受诬陷了。我们应当见见面。”

赫鲁晓夫的助手记载：已计划在皮聪达休假之后与元帅会面。当乌云渐浓之时，赫鲁晓夫感到他正在失去支持，便决定依靠这位民族英雄。从现象看来，他想让朱可夫元帅重返政坛，确切地说，是想吁请其助自己一臂之力。假如朱可夫在1964年仍是国防部长，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军队的协助。

赫鲁晓夫放话要解散主席团，只会让他的对手们团结起来。过于自信使赫鲁晓夫尚未来得及收拾掉对手之前，人家已经抢先一步迫使他退职了……

9月29日，波德戈尔内往切尔卡瑟给谢列斯特打电话，让他火速飞赴克里米亚迎接前去疗养的赫鲁晓夫，还要求事后详细转告谈话的内容，并让他在赫鲁晓夫身边安插一个可靠之人，留心其情绪变化。

10月1日，谢列斯特在辛菲罗波尔迎接到赫鲁晓夫。后者半开玩笑地问道：

“您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这是在休息，而你应当工作呀。”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迎接您正是我的职责，您可是踏上了我们共和国的地面啊。也许，您这里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赫鲁晓夫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辆汽车，随后又邀请他共进午餐。

谢列斯特觉得，赫鲁晓夫似乎有话要说。

他大骂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人员，称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为“套

中人”，称勃列日涅夫为饶舌者。他埋怨波德戈尔内说，本来将其当作优秀的高素质干部调到莫斯科，却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

“我们的主席团是一帮老头子，”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爱说不爱做。眼看我已经年逾古稀，不再像往日那般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应当考虑合适的接班人问题了。必须将年纪轻、素质好、40至45岁的人推上领导岗位。我们可不是长生不老之人，再过两三年，我们许多人都得退休了。”

这并非赫鲁晓夫与谢列斯特的第一次坦率交谈。此次事件之前数月，1964年3月间，赫鲁晓夫让谢列斯特随同自己出访匈牙利。几乎每天傍晚他们都在专供苏联领导人使用的官邸散步。赫鲁晓夫屡次非议党的领导层中的同事，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和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

谢列斯特只是倾听，一言不发。据他观察，赫鲁晓夫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克格勃九局（最高权力机关卫队）的一名工作人员。有一瞬间这名保卫人员太靠近赫鲁晓夫了，他便勃然大怒：

“您想干什么？您干吗要偷听和跟踪我？干你自己的事情去！”

谢列斯特试图说服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可是在执勤啊。”

赫鲁晓夫仍然怒不可遏地回答说：“如果他在执勤，那就让他执行自己的勤务好了，而不要偷听。我可了解他们。”

赫鲁晓夫感到，危险来自克格勃，而他所怀疑的并不是那些人。他认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及其前任谢列平都是忠诚于他的人。他亲手将这些年轻人提拔到高位，但关于他们的心思和计划，他却全然想错了……

此日赫鲁晓夫动身进山——猎取欧洲盘羊。赫鲁晓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枪手。但10月3日，他觉得克里米亚天气恶化了，他要转移到皮聪达去。更重要的是，米高扬也在那里休养。

赫鲁晓夫离开之后，谢列斯特用高频电话与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通话。勃列日涅夫意味深长地向谢列斯特转达了波利扬斯基和乌斯季诺夫的问候，后者不久前刚刚就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入伙”了。

勃列日涅夫告知，他试图让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共襄此举，但那一位吓坏了，避而不谈。

谢列斯特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数次交谈。马利诺夫斯基称，军队不会参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亦即不会保卫赫鲁晓夫。10月10日则保证说，他将与大家一道反对赫鲁晓夫。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得以高升甚至保全性命，全都多亏了赫鲁晓夫。1942年，斯大林得到马利诺夫斯基方面军出了岔子的情报，打算将这位将军交付肃反工作人员。但赫鲁晓夫立即为其担保，照管了马利诺夫斯基整整一年，终于救了这位未来部长一命。

元帅又是如何报答恩人的呢？已经是赫鲁晓夫退休之后，11月7日的节日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高声为反对美国祝酒。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朝他走过来，祝贺他的反帝祝酒干得好。周恩来看看领导人更替之后莫斯科的情况如何。

马利诺夫斯基可能喝得有点多了，对周恩来说道：

“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上一杯。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傻瓜尼基塔赶下了台，请你们对毛泽东也如法炮制。这样，我们的形势必定一片大好。”

怫然而怒的周恩来退出了招待会，爆发了一场风波。不过马利诺夫斯基这句话首先很好地说明了他自己的为人。赫鲁晓夫无望获得他所救助之人的最起码的感激之情……

第6章 最后的三天

10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命令军事反间谍机关管理局，首先是莫斯科军区特别处的人员：部队的调动情况即便无关紧要的都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撤换赫鲁晓夫的三天期间，克格勃的某些部队的人员，首先是第九局训练有素的军官们，一律奉命处于全面战斗准备的战时状态……

谢列斯特往皮聪达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后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毫无察觉，心情很好。谢列斯特与第一书记的助手——舒伊斯基和舍甫琴科（他主管农业，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聊了聊，确信他们也没有不安的征兆。

谢列斯特给勃列日涅夫去电话，他感觉勃列日涅夫讲话时有点缺乏信心。于是他与波德戈尔内通话，波德戈尔内安慰他说："一切进展正常，并没有退却。"

撤换赫鲁晓夫的准备工作进入决定性阶段。

10月12日的早上，谢列斯特飞往莫斯科。他不作任何解释地指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索博利，要其将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在乌克兰工作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到基辅，找个借口不许他们离开。在其他各共和国、各州里，也都采取了同样的准备措施。

波利扬斯基给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去电话，提醒他说：

"预料有重要事变。如果认为需要，我们可以邀请你出席主席团会议。如果不来，你会知道结果的，等着电话吧。"

如若赫鲁晓夫坚决不肯让步，他们打算利用库纳耶夫。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飞返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在政府机场伏努科沃二场，迎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只有一个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问题不仅仅在于谢米恰斯内必须撤换掉赫鲁晓夫的卫队，而且要严加监视，不能让容易冲动的赫鲁晓夫采取什么突如其来的行动。并非任何人都能下定决心在那个时刻单独直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总归还是全国第一号人物，人们都畏惧他。

根据另外一些说法，勃列日涅夫的神经一度经受不住，他放声大哭，吓得反复念叨：“尼基塔会杀死我们大家的。”

而眼下的谢米恰斯内却不怕赫鲁晓夫。别的不说，单是谢米恰斯内的坚毅、果敢和威严便无人能及。

布鲁斯尼岑中将当年是克格勃政府通信局副局长。他回忆说，那次事变发生的前一天，谢米恰斯内曾召见过他，当时赫鲁晓夫还在皮聪达休养。

谢米恰斯内语气威严地说，他需要了解，什么人、为什么给赫鲁晓夫去电话。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布鲁斯尼岑坚定地回答说，“这种事不单是我，即便是您也无权了解。”

谢米恰斯内当即拨通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列昂尼德·伊里奇，政府通信局局长说，这种事不能做。”

听罢勃列日涅夫的回话，谢米恰斯内向这位政府通信局副局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什么事可以做呢？”

“具体需要做什么？”布鲁斯尼岑想弄清楚。

“需要知道，都是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这个可以。专用交换机里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信息。”

“好，每小时您向我报告一次，都是谁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电话。”

通往皮聪达国家别墅的政府专用国际高频通信线路经过第比利斯。它业已被切断，借口是设备损坏。于是，与赫鲁晓夫的电话联系便须通过莫斯科的专用交换机，这样就能立即向克格勃主席报告赫鲁晓夫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

赫鲁晓夫走下旋梯后问谢米恰斯内：

“其余的人都在哪里？”

“在克里姆林宫。”

“他们吃过午饭了吗？”

“好像还没有，都在等你。”

赫鲁晓夫从机场迅即前往克里姆林宫，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下午三点，主席团会议开始。赫鲁晓夫进门打招呼问道：

“喂，出了什么事情？”

他坐在主席的座椅，又问了一遍：

“谁来发言呀？问题的实质何在？”

与赫鲁晓夫自皮聪达同机返回的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以及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也应召参加10月13日的会议。

他们之中，站在赫鲁晓夫一方的只有米高扬（连那也是有条件的），其余的人全都猛烈抨击赫鲁晓夫。他平生还从来不曾听到过诸如此类的指责。

率先发言的是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全然不曾料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勃列日涅夫声称，主席团里并不存在集体领导，而是充满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他对同志极不尊重，结果经常做出一些考虑不周的决定。将州委分割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是个错误，人民对此并不支持。

赫鲁晓夫反驳说：

勃列日涅夫在这里所说的一切让我感到难过，我可能并没有察觉。但是这方面的事情，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曾向我提起过。如果真是那样，便说明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凡人。此外，你们大家在各方面都一直支持我，总是说一切都做得很正确。我也把你们看作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反对派。至于这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州委的划分，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主席团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大家共同讨论过的。我忠于党和人民。我和大家一样，为什么从前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这些缺点呢？难道这诚实吗？至于对待某些同志态度粗鲁的问题，我现在表示歉意。你们都知道，我对党是忠诚的。

赫鲁晓夫还在表示愿意“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搞好工作。正如事前所商定的那样，谢列斯特发言。在他讲话期间，赫鲁晓夫不时插话。有好

几次谢列斯特对他的回答都相当尖刻，往日的毕恭毕敬已荡然无存，最后还很不礼貌地打断第一书记的话：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听您讲过多少回了，您也听我们讲一回吧。”

党的高层领导成员都依次发了言，进行对话时嗓门都提得很高。主席团委员们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他却加以抗拒。要想避免中央全会上引发争论，他的退休申请便必不可少。如果赫鲁晓夫坚持自己有理，从理论上说来他仍然有权在全会上发言。

自然，这样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中央委员们只要看出哪一方占优势，便会投票赞成将其免职。不过，也可能有赫鲁晓夫的两三个老朋友站出来为他辩护。现在的要点在于，一定要避免在全会上发生辩论，做到一致赞成赫鲁晓夫退休，从而表明这是全党的意志。

中央主席团会议晚上很晚了才结束，决定第二天继续再开。

赫鲁晓夫动身返回列宁山（麻雀山）家中。他仍然是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已经被截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操办此事的是谢米恰斯内。赫鲁晓夫无论与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卡洛维发利疗养地治病的妻子，还是与基辅的女儿尤莉亚，均无法通电话。

谢米恰斯内也撤换了第一书记的个人卫队。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上校毫不犹豫地服从谢米恰斯内。

赫鲁晓夫受不了同事们的压力。他年事太高，而且很累，痛苦不堪地过了一个通宵之后，10月14日早上他出现在主席团会议时已经彻底垮掉了。

波利扬斯基首先发言，他简直是冲着赫鲁晓夫发火。随后讲话的是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只有米高扬提议为赫鲁晓夫保留适当的职务，在普通工作中利用其经验。结果米高扬为这一建议遭到责难。

勃列日涅夫再次发言。会后他将此次讲话的全文交给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

“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勃列日涅夫说，“是了解我对您的态度的。当年在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曾经诚实、勇敢和满怀信心地为您、为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其实那时我正患心肌梗塞，但即使重病在身，我仍然获得了为您而进行斗争的力量。今天我却不能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想按照党的要求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沾染上诸如爱好发号施令、自欺自慰、坚信个人一贯正确等

坏毛病，如果您稍稍具备一点谦逊精神，您也不会容许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您让广播、电影、电视为自己个人服务。您喜欢向所有的人、就所有的问题发布指示，然而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一切错误的基础正在于此……”

在勃列日涅夫所发表的所有的讲话中，这一篇也许是最好的，尽管那是他亲自写的，并非笔杆子们代劳。这篇讲话好就好在通情达理。然而，勃列日涅夫自己在占据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之后，又是多么迅速地忘记了他指责前任的那些话啊！

询问中中央委员会的各位书记——伊利切夫（分管意识形态）、鲁达科夫（分管工业）、季托夫（分管党的干部）、杰米契夫（分管国民经济）、安德罗波夫（分管社会主义国家事务）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他们是否同意关于召开中央全会并建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各项职务的提议。大家都表示同意。

这之后让赫鲁晓夫发言。他情绪沮丧。

“我为主席团如此成熟感到高兴，”赫鲁晓夫说道，“此刻所做的一切，是我们党的一次胜利。我这就退出，不准备同你们斗争——我的思想体系和基本原则与你们完全相同。我明白，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政治性演讲——天鹅绝唱。我不准备在全会上发言，但想向全会提出一个请求。”

他遭到了拒绝。赫鲁晓夫顿时眼泪汪汪：

“你们写一份关于我离职、退休的申请吧，我签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信赖你们。请告诉我，我应该住在哪里。如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

有人高声说道：“何必这样做呢？没有必要。”

“如果你们工作搞得很好，”赫鲁晓夫说，“我只会感到高兴，我会留心报纸上的报道的。为了我们曾经一道工作，为了你们的批评，谢谢了。”

格里申和伊利切夫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草拟了申请：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鉴于年已老迈并考虑到自身的健康状况，谨请苏共中央满足我关于解除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

务的请求。

由于上述原因，我已无法履行所赋予我的职责。

我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承诺，愿将自己的余生和余力贡献给造福于党和苏联人民、造福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

赫鲁晓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即通过了中央主席团决议：

应予确认，由于赫鲁晓夫同志所犯错误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不正确行为，中央主席团内最近一个时期形成了极不正常的局面，阻碍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极为重要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摆脱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未经应有的集体讨论便决定极其重要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表现出缺乏耐心和粗鲁的态度，蔑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的过程中犯下一系列的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在业已养成作为工作人员的不良个人品质、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同志不可能纠正他所犯的错误和与党的要求不相称的工作方法。

同时也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递交的申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如下：

1.出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原因，兹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3.认为有必要于1964年10月14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委托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致全会开幕词。

委托米·阿·苏斯洛夫同志代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作报告。

决定全会上仅限于两个讲话，不进行辩论，尤其不能让赫鲁晓夫发

言。再过若干时候召开另一次全会，届时将讨论所积累的组织问题。

大家提议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建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是赫鲁晓夫政府中两名第一副主席之一。

会议期间，心事重重的谢列平向谢列斯特出示所截获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伊瓦先科的一张便条。便条上说：

“主席团开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同意需要讲明缺点，但不应当采取极端手段。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活动频繁，这样做，倒颇符合其利益。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热衷权力。谢列斯特出言放肆，他们串通一气。可以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撤职。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一个领路人。大家都心向着他……”

便条也给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看了。主席团委员们警觉起来。会不会突然出现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同盟者呢？他们决定补充采取预防措施，亦即在中央全会上不让任何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离职的人发表意见。谢列斯特走出会议大厅，给自己的第二书记索博利挂电话，吩咐对伊瓦先科进行监视。

主席团会议之后，将前来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分组集中，传达关于赫鲁晓夫退休之事，让他们对全会作好准备。

谢列斯特讲述过他完成自己那部分任务的情形。下午4点，在乌克兰驻苏联部长会议常设代表处，召集所有从基辅乘飞机前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人。谢列斯特向他们通报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谢宁要求澄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自己递交的申请，还是强迫他这样做的？”

谢列斯特不得不解释清楚。后来他自己承认，他讲得不够令人信服。

伊瓦先科想要知道：为什么不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留一项职务？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谢列斯特回答说，赫鲁晓夫申请之后会去度过他理应享有的休息时光。至于兄弟共产党的反应，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党的总路线依然不变。

对赫鲁晓夫保持忠诚的伊瓦先科和谢宁很快便被打发退休。谢宁的家庭发生了悲剧，基辅的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儿子米哈伊尔是建筑师，似乎与杰出的电影导演谢尔盖·约瑟福维奇·帕拉贾诺夫关系非同寻常。这

位导演以其背离传统的艺术方针闻名于世，结果遭人下毒，还想将他投入监狱。米哈伊尔被克格勃传讯，回家后写下绝命书，躺进浴缸，割开了自己的静脉。这桩自杀案成为逮捕帕拉贾诺夫的借口，他受到审讯，并被判处五年监禁……

赫鲁晓夫给女儿拉达家里打电话说：

“今天要举行全会，解除我的职务。你要预先告诉阿廖沙。”拉达嫁给了《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10月14日上午，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乘飞机抵达莫斯科。此刻谁也不会在意他。

福努科沃机场上依旧挂着赫鲁晓夫的肖像，国家领导人迎接古巴贵宾。事前接到邀请的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也来到机场，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兼《消息报》主编。然而昨天还在讨好阿朱别伊的官员们，一个个都佯装没有发现他的模样。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只有米高扬与他握了握手。

当天，《消息报》的晚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出版，次日清晨，该报与其他各报一样，刊登了有关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国家新领导人的肖像。头一天夜间，各报编辑部的值班人员特别仔细地查阅报纸的各个栏目，逐一删去赫鲁晓夫的名字。

中央全会于下午六时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厅里的座位并未加以指定，但大家都知道谁应当坐在哪里。

主席团中勃列日涅夫首先落座，事情很清楚：他将成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低着头坐在主席团里。

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会开幕。他说，10月12日中央主席团委员就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谈到主席团内的不正常状况，于是决定在赫鲁晓夫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

“所有的发言人，”勃列日涅夫说，“全都意见一致：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缺少健康的环境，环境已经变得不正常，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道路。中央主席团全体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仓促决定各种方针、采取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行动，结果产生巨大的混乱，造成严重的失误，却以无休无止的变革和改组进行掩盖。中央主席团认为现有的状况不能容忍，一致肯定必须毫不延迟地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这一问题交由全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番讲话并不包含在逐席散发的全会速记记录之内。如果采信经过校正的速记记录，则是勃列日涅夫几乎当即便让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讲话，宣读事先拟好的对赫鲁晓夫一事的谴责性结论。

为什么委托苏斯洛夫作报告呢？波德戈尔内拒绝出头，勃列日涅夫也不急于登上讲坛。苏斯洛夫作为党的官方思想家便成为合适的人选，尽管他是最后才被吸收参与这次密谋的。

当初与他谈起打倒赫鲁晓夫之事时，尽管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赫鲁晓夫对他的蔑视态度，却仍然采取了谨慎的观望立场。苏斯洛夫就秉性而言是个书呆子，他在党的历史上寻找先例，却无法找到，他忧心忡忡地思量：

“这会不会引发党的分裂甚或一场内战呢？”

然而，在估计力量对比状况之后，他很快认清了形势。

“在将赫鲁晓夫革职的过程中，苏斯洛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对我说，“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他。”

苏斯洛夫和叶戈雷切夫曾一道赴巴黎参加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的葬礼，多列士于1964年7月11日逝世。叶戈雷切夫被要求在出访期间仔细摸摸苏斯洛夫的底细：他如何对待将赫鲁晓夫革职之事？

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大楼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他们俩一道出门散步。叶戈雷切夫利用这一机会（没有外人耳目），试探着与苏斯洛夫聊了起来：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最近赫鲁晓夫声称，应当解散科学院。这算什么呢，是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吗？可是，也未免太缺乏理智了！赫鲁晓夫这样说了，大家却默不作声。就是说，可以得出结论：大家的意见都是这样？”

此时飘起了蒙蒙细雨。“叶戈雷切夫同志，下雨了，我们回去吧。”苏斯洛夫提出。

谨小慎微的苏斯洛夫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不敢冒险谈论难以捉摸的话题。

迫使赫鲁晓夫退休的十月全会结束之后，苏斯洛夫望着满座中央委员的大厅问道：“叶戈雷切夫同志在吗？”他的视力不好。

叶戈雷切夫应声回答：“我在这儿哪！”

苏斯洛夫满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您还记得我们在巴黎的谈话吗？"

看得出来，已经对中央委员们做好了工作：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讲话时，在需要的地方他们都高喊"说得对！"就在前不久，他们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随声附和的。

苏斯洛夫谈到赫鲁晓夫的自大狂、他的恣意妄为和对同事们的傲慢态度，声称第一书记的出行常有装潢门面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出行无不引来大量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广播和电视也纷纷转播。在这些综合报道中，连赫鲁晓夫的每一个喷嚏、每一个姿态都统统加以记录。无疑，这些综合报道已经让我们所有的人大倒胃口……"

过不了多长时间，苏斯洛夫便着手监管报纸和电视，要它们尽可能冠冕堂皇地阐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历史性访问。"

苏斯洛夫历数赫鲁晓夫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错误，将经常不断的改组和变革、解决国际问题时的"仓促和轻率"归罪于他。苏斯洛夫宣读报告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结尾时狡诈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承认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请求允许他不在全会上发言"。

中央委员们谁也没有要求发言，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各种高级职务。有人还提议将其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但这需要秘密表决。对此该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呢？只消来一次众口一词的表决，即可让组织者称心如意，而他也就会销声匿迹了。不过，在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赫鲁晓夫仍是中央委员，于是他动身回家。

同时还通过决议，"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苏斯洛夫所宣读的报告，历史学家们认为尚属"温和"。因为还有一个由波利扬斯基准备的内容尖刻的文本。此人近年来所吃的赫鲁晓夫的苦头比谁都多，郁结了满腔的怨愤。他曾指望作主要发言，但老同志们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波利扬斯基年轻倨傲，干吗要强化他的地位？

他那篇长达70页的报告定稿只印了四份。一份他返还中央委员会总务处，请求作为十月全会的附录材料。其余三份交由中央委员会总务处第一科（为主席团会议准备材料）处理，文件都是在那里按规定程序销毁。

勃列日涅夫亲自确定赫鲁晓夫的退休生活水平。他手书的一张不太通顺的便条保存了下来：

1.退休金5000（按新兑换率500卢布）。

2.克里姆林宫食堂。

3.第4总局门诊部。

4.别墅——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伊斯特拉）。

5.市内住宅收回。

6.轿车。

关于汽车，他告诉助手：“不是新的。”给赫鲁晓夫分配了一处小别墅，要求他不要进城。

赫鲁晓夫以家中人口众多为由，要求为他保留100卢布的病人营养食堂补助金（部长待遇），然而却只给了他保留了70卢布——中级官员待遇。

赫鲁晓夫于1964年退休后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镇的这所别墅里住了七年。

多年之后，《莫斯科晚报》发表对赫鲁晓夫私人女厨师的专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被撤职的那个日子：

“1964年10月14日，在赫鲁晓夫卫队工作的我的丈夫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去上班，可是马上又回来了：‘出事了！我刚到，我们大家就被塞进一辆大轿车，挨家挨户地送了回来！’我大吃一惊，赶快去官邸！我一到，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说：‘您的主人被撤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亲切地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吧，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可怎么工作呢？尼娜·彼得罗夫娜又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休养……”

赫鲁晓夫回到列宁山上的官邸。女儿拉达、儿子谢尔盖正等着他。主宰邻近官邸的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也来了。赫鲁晓夫下了汽车，一言不发，径直去了楼上自己的房间。同时抵达的米高扬用教训的口吻对年轻人们说：“赫鲁晓夫忘记了，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争权夺利这类事情。”

全国各地纷纷清除赫鲁晓夫的肖像。他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仿佛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位苏维埃国家领导人。

赫鲁晓夫失去职务之后，主持中央全会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

据速记记录记载，大厅里当即传来一阵喊声：“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们党的第一书记！”

大家纷纷鼓掌。

波德戈尔内换到了主席座位上，以便主持表决：

“已经有人提议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没有其他的提议了吗？没有。让我们进行表决。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中央委员们举手。”提议被一致通过。

大厅里再次响起掌声。只有中央委员会委员才有表决权，但是波德戈尔内决定显示全党领导层完全是同心同德。

“同志们，让我们与中央候补委员和检查委员会委员们一道表决，”他提议说。“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勃列日涅夫当选。”

再次鼓掌。全体起立。

勃列日涅夫不仅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而且当选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局主席（一年之后，赫鲁晓夫所组建的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撤销）。

勃列日涅夫回到主席的座位。他讲了几句在这种场合应该讲的话，速记记录中加以润饰，使其臻于完美：

同志们，我感谢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检查委员会委员，感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明白今天所赋予我的工作的整个分量和责任，我将努力供献出全部力量、经验和知识，力求（当然是在你们的支持之下）不致辜负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和荣誉。

于是他再次听到了掌声，自此之后，这样的掌声即将开始伴随着他每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出头露面。

第7章新领袖为什么是他

现有的候选人员中，勃列日涅夫有着丰富的经历：前线战士，几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从事过宇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作……

就个人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也比其他人更适合领袖的角色。最能博得人们好感的，既不是时常阴沉着脸的柯西金，不是生着两片薄嘴唇、一张宗教裁判所法官面孔的苏斯洛夫，也不是略嫌粗鲁的波德戈尔内，而是仪表堂堂，举止得体的勃列日涅夫。

改革年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1964年10月，除去勃列日涅夫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候选人吗？

在当时的领导层中，可以找到更为年轻富有文化教养和生气勃勃的政治家，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选举仅仅局限于中央主席团成员。其余的人所拥有的党内级别较低，不会被视为候选人。

1964年10月名列主席团的人有（赫鲁晓夫除外）：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科兹洛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

科兹洛夫身患重病，无法工作；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不被视作候选人是由于年事已高；什维尔尼克甚至比赫鲁晓夫年纪更大；而波利扬斯基又太年轻；基里连科从未得到足以担当一流角色的评价。

那么当时是谁可能被推举为第一书记呢？

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柯西金？

波德戈尔内那时候与勃列日涅夫旗鼓相当：两人都是拥有广泛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不在时他们轮流主持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

格里申和谢列斯特后来证实，在决定谁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曾提议波德戈尔内为候选人，但后者拒绝了：

“不，廖尼亚，你承担起这个工作吧。”

如若这个场面确实出现过，那也只具有礼仪性质。勃列日涅夫表现了党员的谦虚精神，他明知波德戈尔内本人会加以拒绝。波德戈尔内背后有全国最大的党组织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层。他显然热衷于权力，期

盼充当主要角色。但他在中央工作的经验略为欠缺，1964年之时仍然被视作外省的、乌克兰的党务工作干部，所以显然不及早已在首都身居要职的勃列日涅夫。

有别于波德戈尔内的是，苏斯洛夫在全国党的机关中大名鼎鼎，当时人们对他已经怀着敬意，甚至有些畏惧。但他从战后时期开始一直在意识形态系统工作，而人们不会选择“思想家”当第一书记。通常以为，头号人物需要拥有领导过工业或农业的经验。

柯西金当然具备这样的经验。但另外一点对他却有妨碍——他一生中仅仅干过几个月党务工作，那是在1938年，这位年轻厂长调任列宁格勒州委工业交通局局长。同样是1938年，柯西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市执委会主席，第二年调往莫斯科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从那时起他便在政府中工作。在外省和各共和国，人们难得见到他。

构成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各州州委第一书记们认为，党的领袖应当是像他们那样的职业党务工作干部。许多人都对柯西金抱有好感，但他们充其量愿意看见他坐上政府首脑的交椅。

当然，假若这些候选人中有谁能获得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支持，所有这些公认的理由都可以置诸脑后。然而这样团结一致的群体在主席团中并不存在。

现有的全体人员中，唯独勃列日涅夫最有可能担当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角。他有着丰富的经历：前线战士，几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从事过宇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作……

就个人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也比其他人更适合领袖的角色。最能博得人们好感的，既不是时常阴沉着脸的柯西金，不是生着两片薄嘴唇、一张宗教裁判所法官面孔的苏斯洛夫，也不是略嫌粗鲁的波德戈尔内，而是漂漂亮亮、面带笑容、亲切友善的勃列日涅夫。他仪表堂堂，善于作秀，举止得体，懂得应当如何与特定的人说话，能立即成为一大群人的中心，给人以极为良好的印象。

因而1964年10月大家都满心欢喜地投了勃列日涅夫的赞成票。

对于他的当选，国人也表示赞许。苏联人收到报纸后，都不无欢欣地仔细端详那张依然年轻而且招人喜欢的脸。而旧日的党的领导者，则尽是一伙很难赢得好感的人，鲜有例外。

十月全会次日，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和各边疆区委、州委第一书记会议。责成他们在各地召集积极分子，宣讲莫斯科干部变动的

原因。

10月14日后，大众传媒主要工具的领导人已经遭到撤换，他们被列入“赫鲁晓夫新闻集团”。

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向全体人员介绍了新首长梅夏采夫。

《真理报》总编辑帕维尔·萨秋科夫也被撤换。赫鲁晓夫被废黜次日，《消息报》的新总编辑斯捷潘科夫到任，以取代被撤职的阿朱别伊。

在莫斯科，一批新人获得了上级任命的职位。这都是勃列日涅夫熟悉、与他一道工作过、他信得过的人。他的干部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很难说是比赫鲁晓夫更有才干、更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赫鲁晓夫只能以百无一用的角色度过余生，并且受到肃反人员的步步跟踪。而勃列日涅夫直至寿终正寝始终是一国之主。假如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的医生们掌握长生不老的秘密，那么，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时至今日仍在统治我们。

第二卷 登顶之路

第1章 家世

勃列日涅夫于1906年12月19日（旧历12月6日）出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卡面斯科耶镇。

20世纪初，镇上的居民约有25000人。大部分成年人都在南俄冶金公司第聂伯罗斯克工厂做工，这个工厂是俄罗斯南方最大的企业。勃列日涅夫的父亲伊利亚也在工厂干活，先当杂工，后来做轧钢工助手。勃列日涅夫全家都与这个工厂有关。

伊利亚出身于库尔斯克州斯特雷勒茨基县的勃列日涅夫村。他进城后结婚成家，和妻子纳塔利亚曾育有一女，但是夭折了。1906年列昂尼德降生，1909年又生了女儿维拉，最后出生的是二儿子雅科夫，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祖父。全家人住在从工厂的工长家租来的一间房里。

一家之长伊利亚于1935年去世，活了不到60岁。母亲纳塔利娅比丈夫小8岁。她一直活到儿子成为一国之主的时候，于1966年迁来莫斯科，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地生活在儿子家里，直至1975年逝世。

勃列日涅夫年仅9岁便进入卡缅斯科耶男子古典中学，革命后该校被改造为第一劳动学校。他上学的时间并不长，15岁即进工厂当锅炉工，后来又做钳工。

“工厂的日常生活，工人的思想和期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以决定性的方式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当时所养成的品性保持了整整一生。”——这是随笔《怀念工厂的汽笛声》中的几句话，该文已成为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写成的自传名著。

勃列日涅夫怀着敬佩之情回忆父亲，他的父亲沉着冷静，要求十分严格，但从不惩罚孩子。他很看重父亲的通情达理和为人正派。他曾经讲过，内战年间犹太族轧钢工切尔尼亚克来找父亲。这人有四个孩子，而一伙时不时侵扰的匪徒正朝镇上袭来，这家人害怕遭到屠杀。

“要是有什么情况，你就把孩子们送到我这儿来吧。”老勃列日涅夫说。

四个犹太男孩躲藏在他家里。勃列日涅夫的一些性格特点和生活信念，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民族偏见。他与出身于不同共和国的人友好相处，不会根据种族特征对人们区别对待。

那家工厂倒闭之后，工人小镇的居民开始四处流散。在镇里已经无

以谋生。

勃列日涅夫全家搬回父亲的故乡库尔斯克州。1923年勃列日涅夫考入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和土壤改良中等技术学校。在这个学校，他被吸收加入共青团。课外还在榨油厂打工，卸载木材和粮食。

中专里所学的都是严肃的科目——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土壤学、农业统计学。勃列日涅夫顺利地逐年升级。但他对学习却并无太大兴趣，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

“他极少出于愉悦和内心的需要进行阅读，”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仅仅局限于阅读报纸和《星火》、《鳄鱼》、《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通俗杂志。要想说服勃列日涅夫去读一本有趣的富有现实意义的书或什么文艺作品，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我与他共同工作的21年中，我没有一次看见他主动拿起过一卷《列宁文集》阅读其中某篇文章，更不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了……”

即便是臧否人物极为谨慎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的知识称不上高深。他不喜欢谈论涉及思想政治的理论性话题，这并非偶然。他在世的最后数年中几乎什么也不读……

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近郊的疗养院休养时，我向他介绍一本讲述达·芬奇生平的书，甚至把书都带来了，他答应要看。然而两星期过后他却退还给我，说：‘这本书我没有看。而且总的说来，我已经不习惯看书了。’”

1927年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年轻的勃列日涅夫在库尔斯克省格赖沃龙县做了不长时间的土地规划员，这时他接到前往乌拉尔的任命，先是去米哈伊洛夫工厂，随后又到比谢尔季区。

1928年在奔赴遥远的边疆地区之前，勃列日涅夫与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杰尼索娃结婚。垂暮之年她已是孑然一身时，才向作家瓦西里耶娃和卡尔波夫讲述了自己的罗曼史。

杰尼索娃比勃列日涅夫小一岁，于1907年12月11日出生在别尔哥罗德。她的父亲杰尼索夫在铁路上当火车司机。母亲安娜则抚育五个孩子——四个姐妹、一个兄弟。维多利亚九年级毕业后考入库尔斯克医疗中专。她与勃列日涅夫是在宿舍的舞会上结识的。维多利亚上一年级，勃列日涅夫上三年级。勃列日涅夫邀请她的女友，但那个姑娘拒绝了，维多利亚则表示同意。女友拒绝未来的国家元首，是因为他不会跳舞，维多利亚教会了他……三年后他们结婚，相依相伴度过整整一生。

关注民族问题的人从维多利亚的外貌发现闪米特人的特征，因而认为她是犹太人，甚至有人向她问起过此事。她总是回答，她不是犹太人。她解释说，取名维多利亚是因为，她家附近住着许多波兰人，这个名字在他们之中很流行。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把妻子叫作“维佳”。

维多利亚获得了助产士证书，但实际上并未做过工作，而是照顾丈夫、操持家务，后来则照管孩子。他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租了一个房间，安下了家。他们的女儿加琳娜就在这里出生，稍后则是儿子尤里出世。他们买了一匹马，可以坐雪橇出行。勃列日涅夫爱上了打猎，这成为他终生的主要娱乐活动。

成年时期他总是一再说：

“应当吃野生动物肉，其中富含微量元素。”

维多利亚为丈夫营造了一个可靠而惬意的后方。家中舒适宜人，她做得一手出色的饭菜，后来还教会给勃列日涅夫分配来的厨师们把饭菜做得合乎他的口味。

维多利亚也很关心丈夫的衣着，亲自替他挑选西装和领带。在一众官员装束完全相同的单调乏味的环境中，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十分雅致。他喜欢鲜明的色调，有时候不系领带，穿着非正式的短外套和高领绒线衣，便出现在人们面前。

根据种种传言判断，勃列日涅夫在女人面前颇获成功，不过在外边寻欢作乐并没有拆散家庭。他对妻子已经习惯，家庭事务常与她商量。他关心她就像她关心他一样。

维多利亚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替丈夫出主意，只是忙于收拾房屋和打理家务。她成为国家第一夫人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照样献身于丈夫、家庭、孩子、孙子和需要帮助的众多亲戚。为此，勃列日涅夫很感激妻子。她的官方义务不多，偶尔才需要与丈夫一道出席国宴。在每年一度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招待会上，维多利亚都是女主人。应邀参加这个招待会的只有妇女——女大使和最大的苏联妇女官员，也有文化活动家。还举行舞会，由于没有男人，妇女们就彼此配对……

1929年，勃列日涅夫被选入比谢尔季区（乌拉尔州斯维尔德洛夫专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分工主管土地局，后来又被任命为比谢尔季区执委会副主席。

当时正是全面合作化时期，富裕、成功、能干的农户被称为富农，剥夺其土地、全部财产，并强制迁出故里，贵重物品、金钱和粮食被强行夺走。斯大林依靠出口那些没收来的粮食，为发展重工业提供资金。

勃列日涅夫的主要任务是，将那些从富农手中夺得的土地分配给贫农。这段岁月让他后来自信地声称：他了解农业和农村问题。

“在划分耕地和草场的过程中，”以他的名义写成的《故乡情》中谈到，“我们一贯贯彻阶级原则，力求将富农限定、压缩在最坏的地块，帮助贫农。”

1929年10月9日在苏共比谢尔季区委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作为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的专家职员”被接受为联共（布）候补党员。他必须经过两年的候补期。在同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被派往祖耶夫卡村苏维埃主持党内学习，开展总结检查运动，建立保险种子储备。

40余年之后根据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的指示，州委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找出那次会议的记录，寄给了勃列日涅夫。

10月28日，勃列日涅夫在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土地规划的过程。以区委副书记为首的州委委员们对他的工作予以赞扬。

12月初，勃列日涅夫在区党委全会上发言：

“最好的土地我们都分给了居民中贫农和中农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我们应当向穷人提供一切可能的东西，使这些土地能够播种。应当特别注意将贷款发给已经组织起来的贫农群体。我认为，这一工作缺少计划是集体化工作的一个缺点。首长们的离去，并没有让农村中合作化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12月4日区委会议批准勃列日涅夫去休例假。休假后他将获得新的任命。

1930年2月13日在乌拉尔州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会上，批准勃列日涅夫任斯维尔德洛夫区土地管理局土地规划处处长。2月20日他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但他生性并不适合干这份令他感到乏味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明白，他所受的教育尚不足以在职务上步步高升。

1930年9月，他和一个朋友去莫斯科投考加里宁农业机械制造学院。两人均被录取。维多利亚将女儿留给母亲，来到首都的丈夫身边。然而拖家带口在莫斯科生活，既无住处也无以为生。勃列日涅夫放弃了学院，于1931年全家人回到卡缅斯科耶父母身边。勃列日涅夫受雇于捷尔任斯基工厂当钳工，并考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阿尔谢尼切夫冶金学院夜校部“这个学院并不怎么样，”这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助手戈利科夫的说法。

此外，勃列日涅夫所选择的是夜校部，而且并不像干社会工作那样努力学习。1931年（25岁时）他被吸收入联共（布）。勃列日涅夫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符合他性格和先天秉赋的道路：党小组长、工会委员会主席、学院党委书记。

他还在上学，而1933年3月20日这位年轻、积极的共产党员已被任命为卡缅斯克冶金工人预科夜校的校长，这所学校逐步被改造为中等技术学校。

1976年正值全国准备庆祝总书记70寿辰之际，《共青团生活》杂志一名记者出差至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他在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工人预科学校的《人事命令册》，到处都是勃列日涅夫工整的笔迹。用乌克兰语写成的中技校长勃列日涅夫的命令传递了一种时代气息：

1933年5月19日："查第5班女学生O·E·赫连，本系已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并褫夺选举权的富农之女，应视为异己分子，着即开除其学籍。"

1933年6月19日："第9班学生米哈伊尔·阿列克谢系富农之子，在进入工人预科时隐瞒其社会出身，着即开除其学籍。"

1935年，印数颇大的捷尔任斯基工厂厂报《捷尔任斯基厂旗帜》发表一篇短文《他的名字叫布尔什维克》，写的正是勃列日涅夫：

"我无法想象，这个人哪来如此多的精力和工作本领。上一个月之前担任冶金工人预科学校校长，负担巨大而沉重。他还在我们学院上学。他也是优秀的党小组长……但他却比全年级所有的人都更为出色地作了毕业设计答辩！……因为他是以坚固的金属锻造出来的。"

学院毕业，勃列日涅夫获得了专业资格——热动力工程师。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捷尔任斯基工厂条件下高炉煤气的静电清除法》。

1963年12月23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宣称，我国不需要普遍施行中等教育；上学8年即已是足够，下一步可以让青年们掌握一门职业技能。这是他由于缺少文化而产生的种种奇思怪想之一。其实世界已进入科技革命时代，国家经济急需高文化素养的干部。

然而勃列日涅夫却支持赫鲁晓夫：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从政治观点出发加以解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让人们投身劳动这一问题的想法，在本计划中具有特别的价值。我想以自己家人为例证实这一点，以我自己、我的弟弟和妹妹的例子表明这一点。我的父亲曾期望我们受到高等教育。他本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在车间里干了45年活。临到他退休的时候，我们已经成年，便告诉他，他退休之后我们会帮助他的。对此，他回答我们说：如果你们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对我的最大报偿。我们兄弟姐妹三人都不脱产地受过高等教育。我中学毕业后就已经有了工龄。有五年没有上任何学校，因为是在父亲身边从事农业劳动。后来到了莫斯科，再后来又离开了莫斯科进了工厂。”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以受到教育。”赫鲁晓夫满意地插话。

“这之后我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勃列日涅夫说道。

“这样的人屈指可数。”米高扬说，他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同，认为不应当阻碍青年获得高等教育。

“指头可不够数。”赫鲁晓夫打岔说。

“后来又去上学，”勃列日涅夫继续讲述，“随后进工厂干了五年钳工，再后来从学院毕业。弟弟也是一开始在工厂干活，然后才从学院毕业，现在担任车间主任。妹妹同样是学院毕业，如今在实验室从事化学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捷尔任斯基工厂动力车间当班长的时间不长，因为1935年10月6日即应征参加工农红军。当时他已经29岁了。

勃列日涅夫被分配到外贝加尔军区。他本应以普通士兵身份服役，但设法让人家送他到赤塔坦克学校（当时名叫外贝加尔装甲学院）当学员。也许是他已经受过工程教育这点起了作用。在哪个生产迅猛发展和开发装甲技术的年代，部队对每一个具有技术素养的应征入伍者都很欢迎。坦克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远东军区第14机械化军坦克连政治指导员。上司注意到了这个学员的政治工作天赋。外贝加尔军区报纸《在战斗岗位上》1936年10月6日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报道：

“坦克学校的全体毕业生都是优秀的射手，业务高度熟练、政治符合要求的工农红军战士……他们都是谁呢？

这位是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共产党员，工人的儿子，本人也是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的工人，学习优异，一开始便成了为战斗和政治素养的优秀指标而斗争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以自身的榜样带动其他同志。作为实习生和排长，他做到了让该排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第二次射击任务。参军一年间获得过五次表扬和奖金。在他的领导下，营房宿舍和列宁角都搞得极为出色。”

40年之后的1978年春天，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说服勃列日涅夫，以国防委员会主席身份做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巡视。

当高贵的客人们来到外贝加尔军区部队司令部所在地赤塔时，那里为勃列日涅夫准备了一份礼物。他被接到1930年代他服役的那个团里。他参观战斗荣誉陈列馆后，在光荣簿上题词：

亲爱的士兵和军官们！

这个地方对我而言难忘而珍贵。我1935—1936年期间在这里的坦克连开始服役。

谢谢你们保持了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战士们的传统。但愿你们无愧于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神圣地进行战斗并捍卫了苏维埃祖国边界的人。祝你们出色地履行军人的职责。

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的过去颇动感情，十分喜欢陈列馆内的展品。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不久便调往莫斯科就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勃列日涅夫在军区仅仅服役一年。1936年10月，连指导员勃列日涅夫退入预备役。11月，这位复员指导员被任命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中等技术学校校长。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的时间并不长，这个有着工人经历、经过部队锻炼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为着更远大前程。1937年5月，他被批准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主管建设和城市经济。

在故乡的市执委会他也仅只工作了一年。1938年5月他被调往州中心。

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苏维埃商业局局长。勃列日涅夫从未做过商业工作，但他对人热情周到，富有同情心，周围的人对此评价颇高。于是他沿着功名利禄的阶梯快速上升。在局长的位子上尚未坐满一年，他便再次得到提拔。

1939年2月7日，勃列日涅夫当选为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委主管宣传的书记。这已经是真正的高级职务了。按照中央委员会规定的职务等级制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属于二类（一类为基辅和哈尔科夫），机关编制超过150人。但勃列日涅夫从来不喜欢意识形态工作。他太不爱读书了，以致连最必不可少的那套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也未能掌握，而且他很不乐意埋头阅读文件。

多年之后，这位总书记回忆起自己在那个意识形态岗位的工作时，

曾鄙夷地对小圈子里的人说："我厌恶这种破玩意儿，不喜欢无休无止地讲空话，结果好不容易才脱了身……"

在勃列日涅夫讲这话时，他旁边就坐着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未来的院士雅科夫列夫。勃列日涅夫转过头朝着那个人说道："那算什么事儿呀。"他以教训的口吻补上一句，嘲讽地微微一笑。

上文提到的科罗琴科已经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了。但一向偏袒他的赫鲁晓夫很快又让科罗琴科当上共和国政府首脑，至于这个州的领导者，赫鲁晓夫则提拔另一个自己人——扎季翁琴科，此人早在莫斯科鲍曼区时便在赫鲁晓夫身边工作。

在动作麻利、活泼好动的扎季翁琴科的关怀下，勃列日涅夫经历了党务领导工作的磨练。他很幸运，意识形态书记他并没有做多久。格鲁舍沃伊支持勃列日涅夫，他们曾在冶金学院一起上学。格鲁舍沃伊开始党务生涯更早，很快便成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39年1月，他当选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取代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命的科尔尼耶茨。

格鲁舍沃伊让勃列日涅夫跟着自己走。

1940年，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州委内增设了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一职，原因是许多企业都转产军品。第一书记不了解当地干部，便听取格鲁舍沃伊的意见。格鲁舍沃伊建议将此事托付于勃列日涅夫。来州里了解干部情况的赫鲁晓夫也赞成勃列日涅夫做候选人。1940年9月26日，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主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年仅34岁。他以全部精力着手工作，意欲大显一番身手。然而战争爆发了。

第2章 小地的英雄们

1941年6月，勃列日涅夫刚刚将母亲接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该市便被德军占领。他打发家人疏散，自己则参了军。乌克兰多数党务工作人员都由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安排。勃列日涅夫作为州委书记，立即获得一枚菱形章别到胸前，亦即被授予旅政委的职衔。红军的政治人员还保留着专门的官衔。

1941年底，在莫斯科分管干部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给赫鲁晓夫送来一份将要由上级任命的乌克兰工作人员名单，准备将这些人调出军队，转而从事未被德军占领的一些州的党务工作。名单中列出了许多人，他们将逐步在莫斯科担任高级职务——从军委总政治部部长叶皮舍夫到内务部长萧洛科夫，还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两名书记，都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事，可是并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他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军队任职。在职务升迁方面他可能稍微落后于那些在后方为官的人，但是前线战士的美誉在他攀登权力巅峰的过程中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从1941年6月28日至1942年9月16日，勃列日涅夫担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方面军的司令员为雅切列维琴科，骑兵第一军出身。可是大本营发现，雅切列维琴科无力指挥一个方面军，便将他降职。

1941年12月18日，远富才能的马利诺夫斯基将军被任命为南方方面军司令员。他巧妙地指挥了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战争初期，任何一场胜仗都备受重视，都颁发勋章进行表彰。勃列日涅夫也名列获奖名单。“由于在南方方面军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过程中完美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他被授予红旗勋章。

获奖证书中称：

“身为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担任此职期间，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投入了全部精力……勃列日涅夫同志常常深入战斗部队，动员广大红军战士、政工人员和指挥员歼灭法西斯匪徒。勃列日涅夫同志是富有战斗精神的无畏的政治工作人员。”

哈尔科夫近郊失利之后，南方方面军节节后退，未能守住新切尔卡斯克。未经大本营允许，便放弃罗斯托夫。斯大林大发雷霆。结果南方方面军与北高加索方面军合并，由布琼尼指挥，马利诺夫斯基则担任其副手。然而撤退仍在继续。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签署了著名的第227号命令，当时仅仅将其向全体军人宣读，却未予以公布。直至1988年，此项命令始终是一个秘密，尽管经历过战争的人很少有谁没有提起过

它。第227号命令禁止部队未经指挥员准许便擅自后退。战斗部队或个别红军战士落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之时，应当自杀而不是退却。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讲人、团政治委员西尼亚夫斯基，在1942年8月曾对执行第227号命令的情况做过检查。他向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报告称，政治部工作人员叶梅利亚诺夫、勃列日涅夫、雷巴宁、巴西洛夫“未能保证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在情绪和行动方面（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相应好转……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在相应程度上也沾染了漫不经心、盲目乐观、不拘礼节、互相包庇、聚众作乐等毛病”。

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总政治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团政委维尔霍鲁博夫关于勃列日涅夫工作的回报。这位团政委似乎相当确切地了解勃列日涅夫的工作作风：

“勃列日涅夫同志总是逃避辅助性的工作。他的军事知识十分贫乏。解决许多问题时他都像个工农业领导人，而不像政工人员。对人不能一视同仁，总想培植一些他所偏爱的人。”

1942年9月1日，大本营将北高加索方面军改组为黑海部队集群，它所面临的任务是掩护图阿普谢和新罗西斯克。布琼尼元帅被召回莫斯科。部队集群由雅列维琴科中将统率。勃列日涅夫重又成为他的下属。10月8日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该部队集群的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比原有职位重要性要低的职位。

科洛宁少将是黑海部队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他被调往第18集团军，也将勃列日涅夫一块儿带走。1943年4月1日，勃列日涅夫被批准为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新职位又一次低于原职。因此战争的头两年中勃列日涅夫在官场走的是下坡路。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则从事部队中的政治机关、宣传、报刊等方面的工作，主管接收党员事宜和整理人事档案。换言之，勃列日涅夫与军事业务只有间接关系。

勃列日涅夫来到第18集团军时，小地的战斗已经展开。战争历史上英勇无畏的这一页牢牢地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假如所形成的遭遇有所不同，那就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斯大林的战友卡冈诺维奇被视作小地英雄了……

战争初期，斯大林对铁路应付工业疏散的工作感到不满，竟至不肯宽恕自己最忠实的助手。1942年3月25日，国家国防委员会通过一项措词尖锐的决议《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其中指出，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不能胜任战时条件下的工作”。他被解除人民委员职务。1942年夏，斯大林为卡冈诺维奇任命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刚刚组建的北

高加索（后来的外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正是卡冈诺维奇组织了在新罗西斯克附近登陆小地的战斗，“作为老干部，我亲自动手挑选登陆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垂暮之年的卡冈诺维奇曾不无得意地回忆往事。

北高加索方面军的主力应当解放克拉斯诺达尔。2月初，黑海舰队和亚速海-黑海区舰队奉命在德军后方展开诱敌转移的战役。指挥这一战役的是黑海舰队司令员、海军中将奥克加布里斯基。

在采梅斯湾西岸的梅斯哈科地区（新罗西斯克西南方），1943年2月4日夜间，在库尼科夫少校的指挥下，一支登陆部队投入战斗。250名海军陆战队员径直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奋力登陆，伤亡巨大。但战士们牢牢扼守所占领的登陆场不放，巩固阵地。于此同时，主要的战役却被延迟了，登陆部队继续顽强地固守那个名叫“小地”、具有重要意义的登陆场，往那里调集了两个步兵旅、一个海军陆战旅、一个登陆团、一个歼击反坦克团。那里所有的部队联合成为一个登陆集群，由第18集团军副司令员格列奇金少将指挥。登陆场上的战斗持续了225天。小地坚持到了9月，此时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打响，苏军解放了新罗西斯克。

《红星报》总编辑奥滕贝格将军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前往第18集团军的指挥所。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些人一再追问退休将军奥滕贝格，要他描写勃列日涅夫在小地建立功勋。固执的将军总是回答说：“我在那里没有看见过他。”

“在某种意义上，”奥滕贝格写道，“小地对于勃列日涅夫而言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借口，他将其大谈特谈，写书、颁奖，一再拔高，为的是哪怕在很小的程度上找个口实，以证明他这位‘统帅’的冉冉上升的过程。”

勃列日涅夫曾两次到过小地。一次是陪同一批莫斯科的党务工作者，另一次是去颁布党证和奖品。两次的行程都充满了危险。

德国和意大利的鱼雷艇在沿岸一带活动，截断18集团军部队的供应。它们趁黑夜出海，黎明到来之前返回自己的基地，白天可能会被鱼雷击毁。

曾被苏联授予英雄称号的军事记者博列津科记述过，小围网渔船“里察号”从格连吉克驶往登陆场时触雷。爆炸将勃列日涅夫抛入海中，但他在失去知觉的状况下被救上了船。勃列日涅夫很走运，整个战争期间一次也不曾负伤。

就在此时，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1942年11月，斯大林接见外高加索方面军各集团军司令员，与卡冈诺维奇单独谈话，于是后者明白，他已经被宽恕。

领袖邀请卡冈诺维奇与全体政治局委员共进午餐，赞许地指出：

“卡冈诺维奇同志能深入介入军事，很好。”又回头对卡冈诺维奇说：“看来，前线的环境和工作都对你产生了吸引力，可是您要知道，我们不可能也不打算让您长久地待在那里——我们这里需要您。”

数月之后，斯大林重新任命卡冈诺维奇为交通人民委员。

在前线时，勃列日涅夫曾被作为英武的旅政治委员向卡冈诺维奇介绍过。

自此之后勃列日涅夫从不放过让卡冈诺维奇记起自己的机会，不断向他写信：

亲爱的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谨向您致以前线的敬礼！

昨天以米京同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宣讲队来到我们方面军。这于我们大有帮助。我陪同米京同志于昨日深夜抵达“小地”。这就是您在二月间部署数个旅从敌人手中夺得的那片土地。人们长时间谈论着那场战事，当然也温馨地回忆起您和您参与登陆准备工作的情形。

如今关于“小地”传唱着大量歌曲，创作了不少小说，写下了许多诗歌。现在同志们给您写信，我也将自己的情意融入他们的话语之中，而且私自利用了米京同志来此的这一机会。

我写这一番话时正在“小地”。我现在担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我对这一工作感到心满意足，乐在其中。我没有忘记您的种种指示和与您共同工作中所得到的锻炼。身体很好……

米京同志已经详细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请他向您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并将我们对他所说的话转达给您。

此致敬礼

尊敬您的

列·勃列日涅夫

1943年9月10日，新罗西斯克战役打响，此役是由重新组建的北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协同进行的。方面军由彼得罗夫中将指挥，登陆

战则由黑海舰队司令员弗拉季米尔斯基海军中将实施。

一开始，军舰和空军猛烈炮击、轰炸了采梅斯湾海岸上的德军工事。随后登陆兵登陆。9月16日新罗西斯克解放。胜利之后勃列日涅夫获得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944年5月1日，他与方面军的其他许多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一样，再获“保卫高加索”奖章的表彰。

1943年11月20日，第18集团军脱离北高加索方面军建制，转入大本营预备队，调往梅利托波尔近郊。12月，该集团军又编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建制，调往基辅屯兵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能归他领导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正是赫鲁晓夫在收罗和支持乌克兰干部。

从高加索调来的第18集团军给养匮乏，既缺乏食物，也缺乏过冬的服装。

“部队中的伙食很糟糕”，勃列日涅夫向上级报告。“没有肉、油、鱼罐头和其他罐头，面包供应常常中断，冬装不足影响严重，许多战士和军官还穿着夏服和不适宜穿用的鞋子。这使得我们的情况更加严重。”

尽管如此，第18集团军仍被投入12月24日开始的一场进攻战。

下面一项勃列日涅夫在进攻前给他的下属（政工人员）的指示，证实了集团军艰难困苦的处境：

要时常注意爱惜战士的体力和健康。确保不间断地向士兵供应热粥和开水，这一条应成为不容破坏的规矩。

应当实行最严格的监督，保证国家下发给官兵的一切物品都能如数落实到他们手中。在这方面漠不关心、不肯尽职的人，应严厉地追究其责任。

对卫生机构的工作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各军团政治部应分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从战场撤退伤员并给予他们及时的医疗救助。

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写成的回忆录《小地》，讲述了12月间的战斗情形，当时德军突围，勃列日涅夫带领政治部的军官们发起反冲击，自己还端着机枪躺入战壕：“这场夜战特别令人记忆深刻……德国人以大喊大叫和不间断的获利激励自己，挺直着身子冲向战壕。而我们的机枪却哑了火。一个士兵将死去的机枪手推到一旁，我不失宝贵时机，一头扑向机枪。

当时整个世界对我而言已缩小为狭窄的一长条地面，法西斯匪徒正

沿着它飞奔而来。已记不得这一切持续了多久，只有一个念头支配着整个身心：挡住他们！”

除去勃列日涅夫本人，谁也不曾提到过这一功绩，也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存世，但对总书记的话谁都没有感到怀疑。尽管战斗胜利之后，政治机关曾将所有的功绩记录在案，报告上级。在日托米尔州克罗斯特舍夫区斯塔维谢村已树立起一座纪念碑，碑上题写着：

“1943年12月11日夜间，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列·伊·勃列日涅夫在此以机枪火力击退敌人冲锋。”

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胜利结束。第18集团军司令员谢列利泽荣获“波格丹·

赫梅利尼茨基”一级勋章。1944年2月21日，中将溘然长逝。

多年之后，勃列日涅夫与他分享自己的荣誉。与勃列日涅夫一起的英雄越多，他在小地的功勋便越高……1971年5月13日，列谢利泽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命令安排在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第比利斯之行前夕发布。

5月14日，在纪念苏维埃格鲁吉亚和共和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赋予前司令员以特殊地位：

“我曾有幸与天才的苏联将领之一——第18集团军司令员列谢利泽中将一同战斗。在我的记忆中，康斯坦丁·列谢利泽乃是格鲁吉亚人民最优秀的民族特性的化身。他热爱生活，英勇无畏，对敌人严厉，对朋友慷慨，是一个正直不阿之人，守信然诺之人，头脑敏锐、感情炽烈之人。”

列谢利泽之后，1944年2月6日至11月7日，第18集团军由已获得中将称号的茹拉夫廖夫指挥。勃列日涅夫对待茹拉夫廖夫，不像对列谢利泽那样怀有亲切的感情。

1944年5月29日，勃列日涅夫再次被授予红旗勋章，因此他获得的勋章上有个“2”字。

苏军抵近喀尔巴阡山脉之际，大本营下令组建乌克兰第四方面军。1944年8月，第18集团军归入该方面军建制。第18集团军参与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指挥方面军的是叶廖缅科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梅赫利斯中将，参谋长则是桑达洛夫。

11月7日再次更换司令员。该集团军由加斯季洛维奇少将接手。

勃列日涅夫向老朋友们诉苦，说他的职务迄未晋升，集团军的许多政治部主任都已获得将军头衔，而他却遭到压制。

早在战前的1940年7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即下令在武装力量中实行新的军衔，由一个政府委员会授予。该委员会对每位指挥员的个人情况进行审核，为高级政工人员保留了专门的职衔。只是在1942年10月依例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之时，才授予政工人员以陆、海军的普通军衔。旅、师、军、集团军的政委都获得了将军衔。不过，并非所有的政委都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将军肩章。

南方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在1942年12月授衔时仅获上校军衔。直至1944年11月2日，勃列日涅夫才终于被授予少将军衔。

格里戈连科少将在赫鲁晓夫年代反对党的政策，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曾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在军中供职。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格里戈连科对勃列日涅夫作出了否定的评价：

服军役时，我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九个月期间，见到他脸上的表情如下：一种是阿谀奉承、奴颜婢膝的微笑，每当上级领导在场时它便会装扮在脸上，处于耳朵、鼻尖和下巴之间，仿佛粘贴在了这个区域；拉动那么一根细绳儿，它就会立即全盘显现，无需任何过渡；再拉动第二次，它便倏然消逝。另一种是严厉教训人的表情，在教导下级时出现，布满整个面庞，同样无需过渡，只消突然拽一拽那根细绳儿，一张脸就会突然拉长，变得严厉起来，但不知怎么不像真的，而是做作出来的，有如玩偶脸上的怪相。还有一种则是爽直之人的表情，有时也会出现，那是在与士兵和初级军官聊天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下，面部依然板结不动，只有偶尔眨眨眼、似笑非笑、狡猾地微微眯缝一只眼睛时，才会生动活泼起来。

面部表情和说话声音的虚假做作，使人们产生此人不够正派的印象。凡是熟悉他的人，无不将他视作一个不那么聪明的老憨。在军中，背地里都叫他廖尼亚、廖涅奇卡、我们的“政治司机”。我认为，战后的生活中人们对他依然抱着类似的态度。

目前很难判断，对勃列日涅夫的这种负面评价是不是前线战斗指挥员对政工人员通常都缺乏好感的结果。也可能，那已是后来对身为苏共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所产生的看法。

在军界，勃列日涅夫的自我感觉还不错。根据另一些看法，下属都很喜欢他，他富有幽默感，对自己的军官们颇为关心体贴。

第3章 将军荣归故里

第18集团军从德军手中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后便结束了自己的战斗历程，战后它被解散。不过勃列日涅夫已经获得晋升。昔日斯大林的助手之一、军事委员会委员梅赫利斯中将对他颇为赏识。

梅赫利斯是在乌克兰第四方面军迎来战争结束的。他在自己的部属中发现了少将勃列日涅夫，将其引为亲信，并且越过别的政工人员，于1945年6月任命其为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于是勃列日涅夫对梅赫利斯感激涕零。

微妙之处在于，战争业已结束，勃列日涅夫当上了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

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之后，希望在他的所有传记中都写明：他在卫国战争中经历的是一条从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道路。

战后，莫斯卡连科元帅撰写了回忆录《在西南战线上》。他没有放过在该书中加入勃列日涅夫照片的机会，附上的文字说明是："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该书的大样按规定报送总政治部签批。部里一位喜欢刨根问底的检查员删去了这句文字说明，改注为"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有着先见之明的莫斯卡连科，决定将大样连同修改的说明寄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不辞辛劳，细读了书稿。红场上五·一游行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把正与其他元帅一起站在观礼台上的莫斯卡连科叫到一旁，严厉地质问道：

"你怎么了，难道不知道我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吗？"

元帅开口辩解："这并不是我涂改的，是总政治部的人所为。"

勃列日涅夫责备他说："可你为什么要同意？"

书稿停印，照片下的说明文字重加修改。

1945年7月，大本营决定将乌克兰第四方面军解散。在司令部和部队的基础上组建成喀尔巴阡军区。

战争年代勃列日涅夫荣获两枚红旗勋章，一枚是红星勋章、一枚为解放乌克兰而颁发的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已经是战后了，他又被

授予几枚勋章："为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德国"，"为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勇劳动"，"为解放华沙"和"为解放布拉格"等等理由所颁发的奖章。然而这些奖章都是大量发放的。勃列日涅夫认为自己所获奖励太少，其他人的胸前更为丰富多彩。当上总书记之后，他便对这一缺憾加以弥补。

不过1945年6月勃列日涅夫曾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混成团政委的资格，参加了红场上的胜利阅兵式。在他担任党和国家首脑的那些年代里，新闻记录干部们对此反复地进行宣传。威武雄壮、喜气洋洋的将军看上去颇为招人喜爱……

据中央宣传部顾问小组领导人佩切涅夫说，1981年同样是在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也曾回忆过那些日子：

"战争接近尾声时，传说我们方面军可能被调入巴黎的联军部队。说实话，我当时难过极了。非常想回家，累了，对一切都厌倦了。还记得曾给妈妈写信说：我非常想念故乡，妈妈。可现在又要去巴黎，登艾菲尔铁塔，从塔上朝整个欧洲吐唾沫！"

勃列日涅夫并未被调往法国。他又当了一年喀尔巴阡军区政治部主任，1946年6月18日才被转入预备役，昔日的州委书记重又回归文职生活。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想起了他。也许这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倡议。赫鲁晓夫战后曾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共和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他让乌克兰干部回归该共和国。

勃列日涅夫佩戴着将军肩章从战场上归来，与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待在后方的其他领导人截然不同，这于他有利。他光荣地亲历了整个战争，虽说不是在战壕里。于是为这位前线战士提供了独当一面的工作。

1946年8月30日在第六届州委会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扎波罗热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则是战前即在扎波罗热工作的基里连科。基里连科是个高傲而冷酷的人，不过当然不是对待上级。他与勃列日涅夫结成了保持终生的友好关系。

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那里遭到冷遇。1947年初斯大林剥夺了他的共和国独一无二领导人的地位。赫鲁晓夫仍是共和国政府首脑，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则让久经考验的战友卡冈诺维奇担任。

勃列日涅夫着手扎波罗热的工作时发现，这个城市在战争中已遭彻底摧毁。全国最大的扎波罗热钢铁厂也遭了殃，大名鼎鼎的第聂伯河水

电站业已被炸毁。这些具有全苏意义的工程属于首先恢复的项目。

重建工作早在勃列日涅夫到来之前即已开始，但扎波罗热钢铁厂无论如何也无法投产。莫斯科关注这一状况。《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州委重建扎波罗热钢铁厂的进度太慢。

卡冈诺维奇亲自前往扎波罗热。

在前线与卡冈诺维奇结识对勃列日涅夫大有裨益。卡冈诺维奇为人专横，随便就可以将不喜欢的州委书记撤职。他对勃列日涅夫却很友善。

1990年6月，卡冈诺维奇曾对军事史家库马涅夫教授讲过：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相当富有战斗性的上校，表现积极，不是那种萎靡不振的人。我曾向斯大林写信谈起过他的情况……所以我是看重他的。如果他不当中央第一书记，而是做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那么他一定是个好工作人员。勃列日涅夫既可以担任中央书记，也可以出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个通情达理、聪明能干、性格稳重、坚定果敢的人，而且相当积极。当年我对他的看法很好……”

卡冈诺维奇要求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建设局长迪姆希茨（未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尽快结束工作。乌克兰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快扎波罗热钢铁厂重建》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严加督促，1947年秋工厂终于开工。不管后来对勃列日涅夫的议论如何，那些年他却没有逃避工作。

10月，各报发表了勃列日涅夫和迪姆希茨关于优先重建扎波罗热钢铁厂和开始生产冷轧钢板给斯大林的报告。12月2日勃列日涅夫由于在扎波罗热工厂重建中的成绩获得他的第一枚列宁勋章。同年，第聂伯河水电站也开始送电。

无论担子如何沉重，扎波罗热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始终是一段愉快的记忆。他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依然一直关注该州的情况。1966年，他让弗谢沃洛日斯基担任州委第一书记，此人在他主政该州时是共青团中央在扎波罗热建设局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后来则出任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过着独身生活，没有家人，全家当年疏散后一直未能归来。关于这一情况，州报《工业化扎波罗热》编辑克留年科曾向《真理报》记者斯莫利亚克谈起过。克留年科当年在第18集团军政治部服役时正是勃列日涅夫的部下。

“他来扎波罗热时正值40岁的盛年，”这位报纸编辑回忆说，“现在您可以想象：州委第一书记，骁勇的将军，美男子，而身边又有许多年轻的寡妇。也有可能，列昂尼德·伊里奇真的迷上了某个人。我们作为他前线上的战友，便开始问他：为什么不把家人接来？几乎整整一年他都回避着我们，总是推脱说，在毁坏殆尽的扎波罗热没有像样的住房。”

垂暮之年，勃列日涅夫曾回忆说，他刚一来到城里，便吩咐为他缝制一身新制服和新靴子。有一次，他身后跟来一辆勤务车，他却对司机说，他要步行。

“于是我就迈开了步子，”勃列日涅夫骄傲地说道，“同时用一只眼睛瞅着，看看身边会不会有哪怕一个女人经过的时候不朝我这边张望……”

他的孙女维多利亚向第一频道的摄制组讲过：

“爷爷有一个前线女战友叫塔马拉。战后爷爷来找奶奶说，他要离开她。不过这种事并没有发生。他也办不到。奶奶了解他的一切，也知道他爱上了别人。可是她没有向任何人抱怨。她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人，什么都藏在心里。”

勃列日涅夫家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勃列日涅夫来找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离婚的时候，她要求他亲自对孩子们说，他要离开这个家庭了。可是勃列日涅夫眼见得孩子们都扑过来搂着他的脖子，他再也找不到抛弃他们的力量了……

“前线女战友”塔马拉本人则是这样讲述自己与勃列日涅夫的罗曼史的。她在医院当护士，上级提出将她和一个女友调到集团军政治部。

“这种事谁还会长时间犹豫不决呀！看够了流血、肮脏之后，人家让你去暖暖和和的地方干一份干干净净的工作——这等于开给你党证和毕业证一样啊。上班的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就来和我们认识了。”

当勃列日涅夫上校得知塔马拉是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的人之后，十分高兴：原来是女同乡呀。

“他管我叫托马。他有一副柔美的男中音嗓音。说起话来和别的军官不同。他并不是常备基干军人。我从没听他说过骂娘的话和蛮横无理的话。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叫人没法不爱上他，又漂亮，又快活，还爱跳舞。他并没有高雅的风度，但邀请人的时候非常亲切，满脸和善的微笑，一口白牙，两个小酒窝——咳，根本没法拒绝他。于是我和他便在圆舞曲的伴奏下满大厅里旋转，我能感到他爱怜地引领着我，紧紧地依偎着我，那么强健有力。”

战后塔马拉复员到基辅，出嫁成婚。据她说，勃列日涅夫曾给她去信请求会面。如果她的说法可信，此后便发生了一场十足的浪漫故事。她上门的时候，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对她说："托马，我全知道了。我对任何人都不怪罪和责备，我只是请你离开这里。"

塔马拉当天就坐上了火车。勃列日涅夫带着通讯员在一个小站追上了她。勃列日涅夫恳求她留在他身边，但她履行了对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的承诺。而勃列日涅夫仍未放弃挽回她的希望。他与梅赫利斯一起来到基辅。他们找到她的住处，梅赫利斯似乎也劝她跟勃列日涅夫一起走。她再次拒绝……

不可能验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并确定勃列日涅夫是否真的打算为新女友抛弃家庭。当然，也不应该否认勃列日涅夫享有浪漫感情和大胆行为的权利。但是，考虑到主导着党政机关的清教徒式的风尚，很难认为勃列日涅夫会准备为了一个女人去冒毁掉前程的危险。他宁肯要一段不承担责任的短暂的私情。根本不可能想象，基本上是个禁欲主义者、无法容忍破坏党的准则的梅赫利斯竟会恳求"前线女人"抛弃丈夫，去与一个有妇之夫开始新的生活……

多亏了卡冈诺维奇，勃列日涅夫才不断获得晋升。1947年11月，卡冈诺维奇将他调往乌克兰最大的州之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担任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勃列日涅夫让家人也来到了那里。

在州委会议上，乌克兰中央书记梅尔科夫介绍了勃列日涅夫。

乌克兰西部各州正在进行与得到当地居民支持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流血战争，而在基辅，上级任命的干部们却在设备齐全的住宅里养尊处优。那里正以最高规格进行赫鲁晓夫的生活配套设施工程。

1945年2月，乌克兰中央政治局通过封面上注明"特别卷宗"字样的决议，其中包括向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出的指示：

1.建立直属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商业人民委员部特别基地（供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食物），为这个基地开设单独账户并划拨周转基金；

2.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6局局长的申请，通过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发放日用必需品类产品以及工业品的提货单；

3.特别基地内开办副业、成衣和靴鞋车间。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6局主管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的保卫工作。

个人卫队也负责供应赫鲁晓夫及其家人的食品，雇用鞋匠和裁缝，为他缝制靴鞋和服装……

州委第一书记们的日常生活由地方经济机关料理。根据当时的说法，所供应他们的食品和工业品是免费的。另外，州仓库里的东西并非应有尽有，但负责供应的人知道，只要是能搞到一切，都应当对一州之主保证供应。

战争时期实行的票证制度的废除，也影响到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生活状况。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于1948年1月14日通过了与莫斯科指示相应的决议：

1.自1月1日起废除现行的向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免费提供食品的规定，不再发放用于购买工业品的现金和食物定额补助。

2.停止花费改善社会生活福利基金的资金用于向别墅免费供应食品，停止以其他形式免费向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发放食品和工业品。

3.决定自1月1日起，向目前免费获取食物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于他们所领工资之外补充发放临时货币津贴，金额为每月职务工资的2—3倍。

但对党的领导人仍然继续按不公开的规定实行供应。仅仅需要为食品和服装付费。州委第一书记的固定工资本来就很高，而物价却很低。钱并不成其为问题，而是商店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买！1946年的粮食征购搞得乌克兰没有了面包。

“1946年的饥荒似乎在继续1933年饿殍遍地的惨剧，”卡普托回忆说，他后来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饿死的人不单是来不及从农舍里抬走。死者也陈尸于围墙边、空空如也的商店旁，甚至院子里。许多人极度消瘦，躯体似乎只够喂饱叮人的虱子，另一些人浮肿得令人无法辨认……”

根据共和国内务部机关的资料，1947年入夏之时超过100万人患有营养不良症，30多万有望获救的人入院治疗，46000名乌克兰居民活活饿死……

勃列日涅夫正赶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处于如此苦难的境地，扎波罗热也是这样——矿井被淹没，工厂被破坏，房屋被烧毁，城市中心区一片废墟。

“城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战后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学习的党内职务颇高的莫尔贡回忆说，“该城已失去生机，供水管道和交通

运输陷于瘫痪。”

城市重建方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感谢勃列日涅夫。1948年他“为南方黑色冶金企业重建”荣获奖章。他经管的不单是大型企业，而且还有农业。归州委第一书记使用的小汽车有三辆——一辆个人专车，一辆替换车（主要在修理时备用，实际上是他妻子乘坐）和一辆出行区县用车。

十余年后在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为对玉米估计不足无情地斥责了自己的战友们。他回想起艰难的1949年，瞧了瞧勃列日涅夫：

“当时因为玉米头一个受到警告的就是他。”

“什么也没受，”勃列日涅夫纠正赫鲁晓夫的话，“并没有警告。”

“我们当时向全乌克兰数落他的不是，”赫鲁晓夫不听战友的话，继续说道，“可是最好的玉米却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于是我们就公开取消了这一指责。但我们当时给他警告了，要是不给，也就不会收到效果……”

第4章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主宰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但像斯大林时代其他官员一样，他已经养成了对周围人的痛苦和不幸视而不见的积习。这里起作用的是自我保护的本能：真心诚意易动感情的人，在机关中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7月，勃列日涅夫奉召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已经在莫斯科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他受委托为摩尔达维亚物色新的第一书记。他将勃列日涅夫派往基什尼奥夫。

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宣读了联共（布）中央的推荐书："勃列日涅夫入党已超过20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目前堪称年富力强。他是土地规划师、冶金专家，熟悉工业和农业，多年期间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即可资证明。他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行事敏捷，经历了整个战争，具有将军军衔，意志坚定……"

1950年7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讨论苏共中央关于共和国党组织工作缺点的决议。前第一书记科瓦利战后即担任此职，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勃列日涅夫并未伤害自己的前任。科瓦利一直留在共和国，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多年。

1924年建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莫斯科认为，没有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的领土便不完整。

比萨拉比亚归属于土耳其达300年之久。自1812年起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1918年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吞并。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后，1940年夏红军进入比萨拉比亚境域，罗马尼亚军队未予抵抗，于是比萨拉比亚成为苏联的成员。

1940年8月2日，苏联的成员国中出现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由于战争的爆发，未能来得及将其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样式，这些区域重又落入与希特勒德国共同战斗的罗马尼亚的管辖之下。

战后在共和国中着手实行全面合作化，这本身对农业极为有害。1946年又发布命令，对粮食征购赋予了"阶级"的性质——剥夺"富农和殷实阶层"的粮食。实际上则是将所有有点粮食之人的粮食强行收走。被授予全权的县党委搜查农民的住宅，将不肯交出粮食的人关进地窖。农民不得不卖掉牲畜、家产，用来购买粮食上交国家，以几公斤玉米就能买到一匹马或一只羊。

1945年，尤其是1946年，共和国遭受半个世纪中前所未有的严重旱灾。这也导致普遍性的饥荒。胆怯地摩尔达维亚领导人不敢向莫斯科

求助。时至1946年底，粮食连供应票证所需都已不够。想出的办法是：削减领取票证的人数，降低发放面包的定额。

受赡养的人（即不工作的人）每天发给250克面包，儿童则发300克。面包中几乎一半都是燕麦、大麦和玉米粉。商业买卖的面包已不见踪影，这对市民是一个打击。商店前排起了长队，队伍中时不时发生殴斗。运来的面包太少，只有力气大的人才能抢到手。

人们吃草根、芦苇，往面粉里掺和油渣、山芥、磨碎的葡萄籽。这导致严重的胃肠疾病，小孩们死于极度虚弱。摩尔达维亚人想方设法逃往邻国罗马尼亚，但这是不被允许的，边防军人成百上千地抓捕逃荒者。

最后不得不为那些已濒临衰竭边沿的人设立成百上千的免费饮食站点。来自苏联政府的为数不多的援助被浪费和盗窃一空。

共和国的党政机关无力以他们所拥有的手段安排对饥民的医疗救护，只能为那些可以自己前来村苏维埃或医院的人进行治疗。病人径直放到地板上，病人身上的虱子乱爬，他们互相传染疥疮、肠胃病。大人孩子一起安置在同一个病房，大人便抢夺孩子的食物，而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吃不动烤焦了的面包。

根据官方的资料，共和国五分之一的居民——约40万人患有营养不良症，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判定，摩尔达维亚学者们的宣布的数字为20万人。有几个月，每天死亡多达三四百人。

按照党的原则和对政权忠诚程度选拔的官员，在遇到现实问题时完全束手无策。然而党政机关依旧在继续进行对敌斗争。1948年10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摩尔达维亚的决议，命令地方政权机关："提高政治警惕性，及时揭露、清除富农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敌对活动，开展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宣传……"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摩尔达维亚要像1930年代在全苏联那样，建立机器拖拉机站政治处，作为对凭空臆造的富农进行斗争的示范点。动员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妇女基层干部和政治处报纸的编辑。

于是开展了一场清除农村中"敌对分子"的运动。1949年6月5日至6日夜间，在摩尔达维亚采取了大规模行动：将60000余个"富农"家庭连同孩子共35000人迁出共和国，驱逐到苏联的偏远地区。他们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亦即明目张胆地劫掠一空。这对摩尔达维亚人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印象，他们可没有经历过战前的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

事到如今，他们便开始递交申请，要求加入农业劳动组合，因为已经向农民们宣布：集体农庄庄员不会被强制外迁。一个半月之内加入组合的农民超过以往三年半的总和。

共和国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1949年8月5日《关于调整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集体农庄的土地使用》的决议，成为了最新的由头。单干农户分布在集体农庄地面上的地块（花园、葡萄园、耕地），被掉换到别的地方——公有农田的范围之外。换而言之，就是强行夺走农民的花园、葡萄园和已经熟耕的好地。

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之前，强迫性的合作化实际上已经完成。农业依旧处于灾难性状况，却将此归罪于敌人的阴谋破坏。

“集体农庄制度存在着敌人，”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写成的《摩尔达维亚的春天》中说。“他们通常是暗中进行破坏：造谣诽谤，挑拨离间，有时还混入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将自己的人塞进去，想方设法破坏人们对集体农庄的信心。他们也动用枪械，虽然此类行为尚不具备普遍性质……”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但像斯大林时代的其他官员一样，他已经在自己身上养成了对周围的人的痛苦和不幸视而不见的积习。这里起作用的是自我保护的本能：真心诚意易动感情的人，在机关中是站不住脚的。

在摩尔达维亚，第一书记身边聚集了一批将要与他一道工作多年的人。

契尔年科领导宣传部，萧洛科夫任职于共和国部长会议，特拉别兹尼科夫主持高级党校，戈利科夫担任第一书记的助手，茨维贡先是摩尔达维亚国家安全部的局长，1951年10月起出任副部长。

共和国的安全部部长是莫尔多韦茨少将。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同乡，他也可望有远大前程。但莫尔多夫韦茨1955年却被从机关中调走，任命为摩尔达维亚公用事业部干部局局长，一年之后又奉命退休。不过勃列日涅夫的其他战友都逐步在莫斯科担任了领导职务。最为飞黄腾达者首推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摩尔达维亚的春天》中说：

共和国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对缔造新的摩尔达维亚具有重大意义。这里必须表现出说服民众、寻求正确的组织形式的才能，而最重要的则是自身要成为信念坚定的战士，成为对同志体贴入微、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干部。

因而我想指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

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便具备所有这些党性原则。他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共产党员，早在来共和国工作之前即已获得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总是将全部力量贡献给交付于他的工作。

后来康·乌·契尔年科担任一系列党和苏维埃的重要职务，处处都表现出他的这种才干和经验。如今康·乌·契尔年科已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契尔年科1911年出生在叶尼塞省（现今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县大捷西村。数月之后，1929年他奉派主管共青团的宣传科。

对叶赛宁的热爱使他与勃列日涅夫亲近起来。契尔年科甚至因为阅读这位“富农”诗人的作品而受到警告处分。

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当地，契尔年科领导边疆区的教育之家，后又担任边疆区党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书记。有趣的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偏偏踏上了意识形态的道路。临近战争爆发时，契尔年科正在舒申斯科耶镇筹建列宁博物馆。

1942年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约·维·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一书，出版资料中载明：责任编辑——康·乌·契尔年科。据说莫斯科不喜欢该书，于是印数大受影响。契尔年科被解除州委书记职务，派往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学习。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

随即又让他进入第二期，结果便学习了两年。获得毕业证书之后，带着马林科夫签发的派遣证前往奔萨，就任州党委书记。1948年被调到基什尼奥夫。缺乏教育并未妨碍契尔年科神话般地一路上升，个中原因不单是有幸结识了勃列日涅夫，而且也得意于他无可争议的天生的一套本领：首先是唯命是从，随时准备为上司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

早在战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勃列日涅夫即已与谢洛夫相识。战后谢洛夫在乌克兰工作。1951年他被派往邻近的摩尔达维亚担任该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谢洛夫颇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贫嘴薄舌之人硬说，勃列日涅夫喜欢谢洛夫的妻子。不过，有关勃列日涅夫风流韵事的闲话向来广为流传。他去世多年之后，《共青团真理报》女记者在基什尼奥夫找到他昔日的一位女秘书——阿拉·莫霍娃，直言不讳地问她：

“基什尼奥夫的人都说，您的女儿塔基扬娜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的女

儿，长得与他非常相像。”

“胡说八道，”莫霍娃回答道，“不是事实，并不相像。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而且我和他的夫人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交往密切。”

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食堂发现了阿拉，便吩咐将姑娘调到书记处他那里。按照她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常常工作到深夜，只有星期六辛劳一整天之后，才选定一些影片，带领自己的女秘书们去电影放映厅。

1974年总书记来到摩尔达维亚，找到阿拉，劝说她跟他一道飞往莫斯科。阿拉·莫霍娃并不是第一位讲过勃列日涅夫曾劝说其抛弃一切跟他走的女人。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勃列日涅夫与他在阿拉木图时的女秘书内莉之间。第一频道的摄制组找到了她。她也怀着赞叹之情回忆起勃列日涅夫：

“他总是处于人人注目的中心。他就有这种格外令人倾倒的气质。他既和我们一块儿合唱，也参加我们的体育活动。他很会恭维人和亲吻女人的小手。”

她同样被问及女儿，人们断言，这位女儿也酷似勃列日涅夫。

“我知道这些议论，”内莉回答说。“我为这一切感到非常痛苦！甚至不得不加以解释：列昂尼德·伊里奇1956年2月就离开了共和国，而我的女儿是1957年底出生的。可是闲话仍然传个不罢。我非常难受，简直可怕极了！”

克格勃前主席谢米恰斯内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回忆道：

“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克格勃第9局局长沃洛佳·切卡洛夫对我讲过，有一次农业合作社的两名女裁剪师被领来量西装尺寸。沃洛佳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上一眼，勃列日涅夫已经在这两个女孩子身上到处乱摸了。他对女性绝不会无动于衷。顺便说说，这也是影响干部选配的一个因素。比如，他与某个人的夫人关系亲密，或者他对她怀有好感——他便会开始提拔她的丈夫……”

第5章 老广场上的新人

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的工作颇获莫斯科的赞许。对此可资证明的例子是，他所撰写的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文章，能够发表在1952年9月份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勃列日涅夫取得这些成就并非易事。

1952年在摩尔达维亚，他发生心肌梗塞。清晨醒来时胸口剧烈疼痛，他被紧急送入医院治疗，在院中卧床一月之久。

政治局会议第88号记录中写道：

“给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一个半月假期用于治疗，自1952年6月20日算起。”

这一个半月，在康复之前，勃列日涅夫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巴尔维哈”疗养院度过的。不过此次所受到的冲击却并未彻底消失。

1952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他有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等待着他的还有更为令人欣喜的意外礼物。

摩尔达维亚领导人在十九大开幕后的第四天发言。他在基什尼奥夫的助手们所写成的发言稿，在中央得到加工、完善。斯大林关注着每一个发言的人，发现了外貌胜过其他党内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

195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宣布党的新领导成员。他从弗伦奇式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亲手写成的一张单子说：

“可以选入中央主席团的，比如说，有这样一些同志……”

令全场的人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让许多新的、相当年轻的党务干部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斯大林让他担任中央书记和新近建立的取代政治局的主席团的候补委员。这样，勃列日涅夫便侧身于最高联盟之中。他自己也对此次意外高升倍觉惊奇。他年仅45岁，却已经几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新的中央书记处人数众多。

其中有（斯大林除外）：阿里斯托夫（主管党、工会、共青团中央机关部）、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采购部长）、马林科夫（党的机

关的第二把手）、米哈伊洛夫（主管宣传鼓动部）、别哥夫（主管干部遴选和分配）、波诺马连科（负责农产品和农业原料收购的部长会议副主席）、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具备前线的经验，便决定由他“监督军事部总政治部和海军部总政治部的工作”，马林科夫宣布了方案并基本获得认可。

勃列日涅夫在老广场上是个新人。善于钻营的莫斯科官员们都不认识他，所以一开始并未将他列入中央主席团所属的国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决定所有的军事事项。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便被晾到了一边。不过斯大林纠正了官员们的错误，11月19日勃列日涅夫被列入国防委员会成员。

10月20日晚11点，几乎所有的中央书记和高级意识形态官员都被请进斯大林党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首次目睹大政治如何运作，领袖在其战友们的狭小圈子内如何说话以及都说些什么。斯大林主要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工作恶劣状况的不满：

“我们的宣传搞得很糟糕，就像拉屎似的，而不是宣传。大家对宣传的状况都感到不满。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对宣传部的工作感到满意。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青年人，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报纸上的宣传尤其糟糕，特别是《真理报》……”

斯大林办公室里的会议延续了将近一小时，其形式就像中央书记处确定书记之间责任分工的会议。这件事10月27日才最终确定下来。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有所扩大。领袖坚持赋予新任中央书记更高的权力——他急于让他们走上工作正轨，以便由年轻人接替老一代党的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不仅应当掌控陆军和海军的政工人员，而且要“监督军事部和海军部系统的干部遴选和分配工作”。这从理论上赋予了勃列日涅夫很大的权力——军事部门的一切重要任命都需要取得他的同意。

1949年以来，军事部部长一直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他仅仅是中央委员，因而按党内官阶而言地位低于勃列日涅夫。但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军龄与斯大林相近，斯大林对他一直优遇有加。这样，元帅便无需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必要时可以径直去找领袖。

勃列日涅夫还数次去过领袖的办公室。1952年11月17日，斯大林于晚间11点召集众书记，直至12点还在向他们说明应当如何工作。勃列日涅夫用心聆听并深入领会。

1952年12月1、3、4日，勃列日涅夫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决定着手追查臭名远扬的“医生案”并重新改组国防部。

12月11日，在斯大林办公室一举讨论了几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注意观察领袖如何做出决定。他成功地学完了“斯大林管理学校”的简短教程，尽管斯大林一次也不曾召他去进行个别谈话。年已老迈的领袖没有精力与每一个新人打交道。

1953年1月26日，斯大林最后一次在自己那里召集党的领导人开会。此后这些人再也未能相聚一堂。领袖的生命仅剩一个月有余。他自我感觉虚弱和疲乏，甚至停止了批阅呈送他的文件。2月17日斯大林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那是接见印度大使。2月27日他最后一次离开别墅，为的是去大剧院观看《天鹅湖》。

3月1日深夜，斯大林发生了中风。

从3月2日开始，国家领导人仅仅在小范围内会面。勃列日涅夫并未受到邀请。他跻身最高层的时间不长，四个多月不足以建立必不可少的联系，无论如何也表现不了自己。在开列新的领导人名单时，政治局的老委员们干脆将他一笔勾销。

紧随着斯大林之死，他的飞黄腾达一落千丈。

3月5日在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会议开始于晚间8点，其时斯大林还活着），勃列日涅夫被解除了中央书记职务，“因为已改任海军部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相当于副部长，亦即比他1952年10月以来所担任的职务低了许多级。

从奥林波斯山跌落极其痛苦。刚才他还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同桌开会……而现在却不得不服从自己不久之前的下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3年是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最为晦气的一个年份。

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是一个性情直率、不讲情面的人，一向维护海军军职的威望。他冷漠地迎接前中央书记的到来，认为一个从未航行过的政工人员在海军中毫无用场。

然而这还算不了什么：刚过10天，海军部与军事部合并为国防部，政治机关也进行了合并。勃列日涅夫落得全然没有工作，于是，1953年5月他给政府首脑马林科夫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信：

由于海军部政治部撤销，我特向您，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

奇，提出一个重大的请求……我将近30年的劳动活动都与国民经济工作密不可分。自1936年起便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我热爱这一工作，它就是我的第二生命……如今年近半百，健康被两种严重疾病（心肌梗塞和腿静脉内膜炎）损坏，我很难改变工作性质或者获得新的特长。

谨请您，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将我派往乌克兰党组织工作。如果我在工作中造成了某些缺点和错误，还请多多原谅。

马林科夫将此信转与赫鲁晓夫后，信中加了一个批注："赫鲁晓夫知悉"。无论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恳求都没有作出回应。

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5月21日国防部长第01680号一纸命令使他重新回到苏军干部队伍。为了对他的降职使用作出补偿，1953年8月4日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勃列日涅夫在总政治部郁郁寡欢，将他对马林科夫的怨恨埋在心底。这个职务他并不喜欢，他不爱下部队，对军队生活兴味索然。他也未能搞好与总政治部主任热尔托夫的关系。不过热尔托夫也没有决意要去触犯这位前中央书记。

第6章 赫鲁晓夫的提携

勃列日涅夫难受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一年多一点。赫鲁晓夫想起了他，请他到中央委员会谈话，正是这次交谈改变了他的生活。

“垦荒工作牢牢进入了我的生活，”以他的名义写成的回忆录中说，“而这一切都始于1954年1月底莫斯科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那天苏共中央召见了我。问题本身很熟悉，也并非当天才第一次听说垦荒之事；闻所未闻的是，他们想将大规模垦荒的事托付与我。”

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勃列日涅夫去哈萨克是担任共和国第二书记。他的《处女地》一书中闭口不提赫鲁晓夫的名字，然而垦荒之事却不折不扣是赫鲁晓夫的主意。

1954年1月，赫鲁晓夫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证实：国内的粮食问题尚未解决。必须“于最近数年中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西部的熟荒和生荒地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当时以第一书记沙亚赫梅托夫为首的哈萨克领导人表示反对：“开垦生荒和熟荒地必然导致土著哈萨克居民的利益受损，因为那会使他们失去放养牲畜的牧场。”

赫鲁晓夫决定，必须撤换该共和国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并非国家的唯一主宰，他还需要与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商议并考虑他们的意见。结果便委派前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去阿拉木图担任第一书记。

不过赫鲁晓夫还要任命一个他可算自己提拔的人到哈萨克斯坦担任第二书记。这还不仅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时已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赫鲁晓夫让勃列日涅夫重新回到党内的高位，重新向其打开了上升的通道。勃列日涅夫心怀感激，向赫鲁晓夫表达了自己的感恩戴德之情。在长达将近十年期间，他一直被当作赫鲁晓夫的人。

1954年1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撤换阿拉木图干部的决议。2月5日，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因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莫斯科迫使接受的说法），解除了第一书记沙亚赫梅托夫和第二书记阿福诺夫的职务。共和国中央委员们驯服地表达通过，任命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接替他们的职位。本地人卡里布扎诺夫当选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

2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解除勃列日涅夫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因为已被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但保留苏军干部身份”。

勃列日涅夫中将的人事档案保存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的保险柜里。他让特别信任的将军们看过勃列日涅夫的卷宗。在战争年代所填写的文件中，“民族”一栏勃列日涅夫填的是“乌克兰人”（1947年颁发给他的护照也这样填写）。调入莫斯科之后，他便开始填为“俄罗斯人”了……1927年入党时，履历表上“本族语”一栏他先写的是“乌克兰语”，然后又划掉改写为“俄语”。

1954年2月23日至3月2日举行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增加国内粮食生产和开垦生荒、熟荒地》的决议，那些地方有着“大量尚未开垦的土地，都是肥沃的黑土和栗钙土，在这些土地上，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即可获得很高的产量”。

刚刚被委派为共和国首脑的波诺马连科，在全会上指责哈萨克土壤专家的民族主义错误，他们一再论证并非所有的生荒地都可以翻耕。然而还是科学家们正确，开荒后爆发了沙尘暴，大面积的土壤可耕层毁于一旦……

共和国的新领导提出一项任务：1954—1955年开垦600余万公顷新土地。大批新的技术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共和国，头两年便涌来36000名机械师、建筑人员、农业技术人员。

1954年，哈萨克储备2.5亿普特粮食，比1951年增加2.5倍；而1951年按照往日的理解已堪称空前丰收。

在阿拉木图，勃列日涅夫与库纳耶夫很快亲密起来。勃列日涅夫总是支持库纳耶夫，而此人后来也成为他在政治局的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1955年3月，当时的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库纳耶夫来到莫斯科，为的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他在哈萨克斯坦政府驻苏联部长会议常设代表处的一间办公室瑞安顿下来写报告。

忽然他被叫到共和国常驻代表的办公室。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都在那里。波诺马连科问：

“正在忙什么呢？”

“准备报告。”

不知何故他们大笑起来。

“别受罪了，不用发言了，”波诺马连科说，“我们想给您提个建议。我们在中央政治局刚刚批准您为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您对此有何意见？”

“我愿意执行中央的指示。”库纳耶夫说。

“我们也这样想。”勃列日涅夫满意地点点头。

“现在我们就去中央委员会，把您介绍给赫鲁晓夫。您准备十分钟吧。”波诺马连科说。

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向第一书记汇报共和国的情况，解决了几个问题。赫鲁晓夫祝库纳耶夫取得成功。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

垦荒之事处于赫鲁晓夫经常性的监督之下。他频频前往哈萨克，与共和国的积极分子举行会议。他的右首坐着勃列日涅夫，左边则是波诺马连科。大家发现，波诺马连科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甚至眉头紧皱，不与赫鲁晓夫说话。而勃列日涅夫则相反，总是不住地朝赫鲁晓夫方向点头，情绪很好。这在日哈列夫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当年日哈列夫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农业部工作。

波诺马连科力争与哈萨克作家们建立友谊，常常阅读现代哈萨克文学作品。有一天，库纳耶夫来到波诺马连科那里，准备一道去著名作家奥埃佐夫家做客，突然高频电话机响起。

波诺马连科讲了几句话后对库纳耶夫说，是赫鲁晓夫打来的电话。他的心情被破坏了。这位哈萨克第一书记承认：“与赫鲁晓夫一道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而数日之后，同样是库纳耶夫在场时，从莫斯科打来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电话，波诺马连科结束通话后说：“您还记得我向您说过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吗？现在和莫洛托夫交谈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他们要强迫我转行搞外交工作，我即将去华沙。”

他叫来助手，吩咐准备飞机。数分钟之后助手报告说，飞机准备三个小时后起飞。波诺马连科召集政治局委员，宣布他奉召前往莫斯科，向他们道别。

到机场送别波诺马连科的只有库纳耶夫。政治局委员中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波诺马连科离开哈萨克后，日哈列夫和中央委员会农业部的同事去见勃列日涅夫，送交积极分子例会的材料。勃列日涅夫的会客室里坐着他信赖的助手戈利科夫。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农业部部长委婉地对勃列日涅夫说：

“把波诺马连科召到莫斯科，现在工作更加困难了。”

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可他在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更为轻松。”

勃列日涅夫很爱记仇。1965年，他下令让波诺马连科退休，尽管波诺马连科本来担任的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职务。退休金领取者波诺马连科比勃列日涅夫活得更长久……

波诺马连科离开后的1955年8月，勃列日涅夫当选为哈萨克第一书记，新西伯利亚州委的雅科夫列夫被派来担任第二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垦荒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往往在中央委员会坐到后半夜，经常去共和国各地巡视。

日哈列夫回忆说，有一天深夜勃列日涅夫被从塞米巴拉金斯克送往阿拉木图的医院。起初他感到很难受，头晕，结果失去知觉，跌倒在地。回来上班后他解释说，在出巡一个州时三天没睡觉。另一次，他在切利诺格勒身体不适，清醒过来时已躺在担架上。

在一定意义上，勃列日涅夫并不走运。1955年出奇地艰难，在垦区被称为“绝望年”：大旱，整个夏天滴雨未下，哈萨克的庄稼全部枯死，但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并未抱怨。相反，他更加同情自己所提拔之人。而勃列日涅夫也没有继续在哈萨克工作多久。

第7章 在最高领导集团里站稳脚跟

年轻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仪表堂堂的党的领导人。他们在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政治局委员中鹤立鸡群。招人喜欢的外貌有助于他们的升迁。斯大林（尤其是在垂暮之年）喜欢面貌英俊、形体健美的年轻将军。

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敏感的政治家。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总能准确无误地站到胜利者一方。而谢皮洛夫则认定怎样公平正直便怎样行事，实质上是个天真之人，尽管已经不止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

1956年2月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为哈萨克党组织的领导人发言。但会后他却没有返回阿拉木图。在2月27日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像1952年一样重新当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在莫斯科饭店419房间内，哈萨克代表团衷心地庆贺勃列日涅夫高升。

勃列日涅夫如今重新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集团。他当选为中央书记之际，主管强力机构的阿里斯托夫送来他的专案文件卷宗，他们一道将其付之一炬。

勃列日涅夫深感幸福美满。苏联领导人的首席翻译苏霍德列夫初次见到他时就是这幅神情：“比中等身材略高，结结实实，英姿勃勃，梳着浓密蓬松的背头，浑身放射着健康与活力。”

“苏维埃”饭店里举行招待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将勃列日涅夫介绍给一个随时准备帮助与外国人交往的译员小组。

“勃列日涅夫扫视了我们一眼，”苏霍德列夫回忆道，“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打招呼，然后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弯起胳膊伸向塔季扬娜——我们小组唯一的女翻译。

‘好极啦！我正好需要一名女翻译，’他以一口悦耳而低沉的声音说道。

塔季扬娜是我们当中机灵勇敢的一位女人，她当即挽住他的胳膊，于是勃列日涅夫迈着始终矫健的步伐，带领着她朝大厅走去。”

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表明，勃列日涅夫起初几乎从不发言，更多的是倾听。与诸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朱可夫、布尔加宁之类的重量级人物在一起，他感到缺乏自信。但赫鲁晓夫需要他这样的忠心耿耿之人。赫鲁晓夫时而让他参加这个委员会，时而参加另一个委员会——研

究国家计划或草拟匈牙利事务方面的文件。

勃列日涅夫作为中央书记，常常收到党中央机关各部门的报告，并需要他一一作出回应。

1956年7月6日，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向他呈送关于杰出钢琴家里希特出访民主德国的报告。东德领导人请求苏联文化部派遣里希特参加音乐家舒曼百年诞辰庆祝会。

但国家安全机关的人不愿意派里希特出国："里希特的父亲（以民族而论是德国人）在1941年被国家安全机关枪决。据现有资料母亲（俄罗斯人）已移居西德，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里希特本人实际上是单身，没有孩子，他与女歌唱家多尔利亚特的婚姻未经登记，周围的人并不特别赞成，他们过着封闭式的生活。"

报告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学批评家、未来的《外国文学》杂志主编留里科夫写的。斯大林在世时，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当年"因为包庇戏剧批评家反爱国主义集团"被解除职务。留里科夫提醒说，里希特曾多次受到外国邀请，但都被以种种借口不予放行：

"里希特认为国家机关不信任他，所以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音乐会上演出，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演奏越来越差，不久前甚至在音乐学院小礼堂的音乐会上中断演出。

由于上述原因，苏共中央文化部认为，可以同意苏联文化部关于派遣里希特前往民主德国的建议，不过附有一个条件：须派出苏联文化部对外关系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这是一个灵活的办法。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以文化部对外关系管理局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钢琴家便处于克格勃的监护之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应由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承担责任。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里希特甚至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1956年10月27日，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建议对《哲学问题》杂志所发表的论述戏剧创作艺术和戏剧的一篇文章组织批评性评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该文中发现"对国家和党务机关的干部不加区分地进行贬低和诋毁"。

报告送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的案头，他加上了"同意"的批示。但波

斯佩洛夫只是一位“普通”书记。公共部认为单有他的意见还不够，便将报告上报勃列日涅夫——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随后他的助手戈利科夫加了批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不反对。彼·尼·波斯佩洛夫同志同意即已足够（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于五十寿辰之前的12月18日，因为对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杰出功勋获得第二枚列宁勋章。

1957年1月2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坚决支持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更改对工业和地方建设的部门管理原则：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报告中所阐述的看法很正确。地方上一批优秀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

反对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撤销中央各部的，实际上只有莫洛托夫一人，他虽已不再担任外交部长，但仍是主席团委员和政府副主席。他常常与赫鲁晓夫发生争论。赫鲁晓夫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都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

1957年2月13—14日，中央全会肯定赫鲁晓夫的设想。5月10日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撤销10个全联盟部和15个联盟-共和国部。所有隶属于这些部的企业都移交给直接服从于政府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共建立105个国民经济委员会。

七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将此次改组归咎于赫鲁晓夫，并恢复解散了的各个部。

由于与赫鲁晓夫关系良好，勃列日涅夫在机关中的地位得到巩固。相对而言，他已经属于“资深”书记之列。

当1957年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决定推翻赫鲁晓夫之时，勃列日涅夫挺身而出，坚决保卫赫鲁晓夫。6月18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那些人数落了赫鲁晓夫一连串过错。

形势对赫鲁晓夫不利。主席团表决时，以7票对4票赞成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然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赫鲁晓夫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党的最高机关的决定。

会议之后，他与自己的拥护者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一起制定反攻计划。

赫鲁晓夫准确地预料到，中央委员们（州委书记们）在反对老革命战士的斗争中将会支持他，原谅第一书记这样违反纪律的行为。

在帮助摆脱困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是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朱可夫动用军事运输航空兵的飞机，从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们接到莫斯科，而谢罗夫则向他们指明行动的正确方向。

在中央主席团大吵大闹开会的第一天，勃列日涅夫突感身体不适，心脏疼痛，医生们将他接走，诊断为心肌疫源性改变。

他向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份声明：

严重的心脏病突发使我卧床不起，而且浑身无力，医生严禁起床。令我倍感痛心的是，参加前两次会议之后，我已无法继续出席本年7月19日和20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因此我认为，发表本声明是我自己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同志的发言表明，分歧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具有制造分裂的性质，触犯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这类问题已无法在中央主席团内解决，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我深信应当在我党中央全会上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

作为苏共中央委员，我坚决要求立即（1—2天内）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勃列日涅夫的声明散发给了党的领导成员。

临近全会之前，勃列日涅夫感觉身体稍好，便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据多数。其余的人看出了谁占上风，当即站到胜利者一方。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对马林科夫说：

“您对干部实行的是生物性选择。因为您在选配干部时奉行宗谱原则，根据爷爷、奶奶判定他们的能力。在这个方面，有多少人身受其害啊！”

赫鲁晓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在中央十月全会上对他们实行了审判。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被追究罪责不乏理由：参与大清洗，反对二十大决议，坚持对斯大林的崇拜。加罪于同样批评赫鲁晓夫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谢皮洛夫便无从谈起了。

会场里有人向谢皮洛夫大喊大叫，说有同志看见卡冈诺维奇的汽车追上他的汽车，他坐到了卡冈诺维奇的车里。这不就表明他们在商量反对赫鲁晓夫吗？

谢皮洛夫不胜惊讶地回答道：

“我们可是常常会面，一道散步，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而且我和卡冈诺维奇在别墅村本是邻居。”

这时勃列日涅夫开言了：

“17日白天我有公事，往办公室给你打电话。你的助手说，你早就去克里姆林宫了。我问：在谁那里？说是在卡冈诺维奇同志那里。你在他那里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会场上响起阵阵兴高采烈的说话声：

“去卡冈诺维奇那儿了吗？”

“没有，”谢皮洛夫试图加以澄清，“现在是将一个时间的事情转移到了另一个时间，并且以扭曲的形式加以想象。”

无论勃列日涅夫或谢皮洛夫，都是戴着将军肩章从战场上归来，有别于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待在后方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颇具优势。

年轻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仪表堂堂的党的领导人。他们在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政治局委员中鹤立鸡群。无论对于勃列日涅夫抑或谢皮洛夫而言，招人喜欢的外貌都曾有助于他们的升迁。斯大林（尤其是在垂暮之年）喜欢面貌英俊、形体健美的年轻将军。勃列日涅夫也好，谢皮洛夫也罢，都是斯大林和后来的赫鲁晓夫一手提拔并引为亲信的。

1957年，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已经是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再上一级台阶，再跨出一步，他们也就会成为核心人物。两人都并非清心寡欲之辈，而是热爱生活的人，在女人面前左右逢源。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仅此而已，各自的道路则迥然不同。

勃列日涅夫酷好多米诺牌戏和觥筹交错的酒宴，与一同消遣的党委书记同僚无分彼此。谢皮洛夫教授论专业是一位经济学家，谙熟音乐、戏剧、文学。一有合适的机会，便会抛开一切，匆匆赶往大剧院观看首演。

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敏感的政治家。在夺权斗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总能准确无误地站到胜利者一方。而谢皮洛夫则认定怎样公平正直便怎样行事，亦即实质上是个天真之人，尽管已经非止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

谢皮洛夫丢掉了所有的职位，住进了包特金医院，随后则被打发去

伏龙芝市担任吉尔吉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1957年6月29日将“反党集团”开除出最高领导层的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成为中央主席团拥有全权的委员。

“有一次在巴维哈，”外交部副部长谢苗诺夫回忆说，“葛罗米柯邀约我散步，第三人便是列·伊·勃列日涅夫。他当时还年轻、漂亮，在女人面前颇获成功（这是护士们对我说的）。我们走过了大约六公里，勃列日涅夫一路上都在讲述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的小集团斗争期间他的一些个人感受和工作。在他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中，隐隐透露出批评的意味，尽管他们当时还站在一起。这个热情、坚毅的人令我很感兴趣，不过当然我无法想象后来他摇身一变的情形。”

全会之后，赫鲁晓夫委托勃列日涅夫处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军事工业、火箭制造、宇宙航行。勃列日涅夫与宇宙火箭系统的总设计师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各有各的复杂性格。如若遇到与勃列日涅夫意见不合的情况，他们可以径直去找赫鲁晓夫。不过他们接纳了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主政时期将其视作自己的代表。

赫鲁晓夫愈来愈信赖自己所提拔的这个人。1957年7月他和政府首脑布尔加宁出访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不在期间即由勃列日涅夫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

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撤职之时，勃列日涅夫是最早表态反对朱可夫的人之一，他愤怒地指责朱可夫在军队中搞个人崇拜。顺便说说，他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也没有改变对朱可夫的否定态度。

1956年2月27日，中央全会决定建立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目的在于更加具体地领导共和国党组织、各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的工作，更加及时有效地解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俄罗斯局机关内设立六个部：党的机关部，工业和交通部，农业部，行政和财政贸易部，宣传鼓动部，科学、教育和文化部。

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局主席。1958年1月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被批派为联邦局副主席。他受命分管俄罗斯的党务干部和工业。

1958年3月25日，赫鲁晓夫最终决定甩掉仍是政府首脑的自己先前的战友布尔加宁。当即有人提出任命赫鲁晓夫担任这一职务的建议。

“不可能有别的建议，”勃列日涅夫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就任部长会

议主席职务必将难以估量地提高政府的威信。他一定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贡献出自己的天才。”

4月17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直属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分管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武器的军事科技委员会。任命赫鲁晓夫为主席，勃列日涅夫为副主席。苏联核武器的主要创始人——哈里顿和萨哈罗夫两位院士，曾向勃列日涅夫求助。他们担心政府正在酝酿一项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不正确的决定。

萨哈罗夫院士讲述道，“勃列日涅夫在他小小的新办公室接待我们，办公室就在我曾经见过贝利亚的那幢大楼里。”

当院士们出现之时，勃列日涅夫高声叫道：

“啊，扔炸弹的人来啦！”

勃列日涅夫笑呵呵地说，他的父亲把那些制造新式杀人武器的人看作坏蛋，还说应当把这些坏蛋带到大山上，让大家眼看着绞死。

“如今我自己也在干这种黑心事，不过和你们一样，都是怀着美好的目的。”勃列日涅夫说。

他仔细听取院士们的意见，在白纸簿上记了一些，最后总结道：

“我完全明白你们的意思，一定和同志们加以商量。你们会知道结论的。”

他接受了院士们的意见。部长会议的决定未能通过……

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曾经回忆过勃列日涅夫去古比雪夫“进步”工厂的情形。这是一间19世纪末建成的工厂，即当年的莫斯科“杜克斯”自行车厂，革命后更名为国营第一航空厂，战争期间疏散到古比雪夫。该厂生产飞机，最新的一架为图-16战略轰炸机。1957年末奉命生产首枚由科罗廖夫设计的洲际弹道导弹。

勃列日涅夫在车间里与工人们交谈，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身材匀称，面带微笑，喜欢交往，烟斗里吸着一成不变的小雪茄，勃列日涅夫很容易接近，不过也有一点儿装腔作势。他对工人们提出的尖锐问题全都耐心地一一作答。自己也对业务工作提了一些问题。

1959年12月14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他心目中的苏共新纲领是何种情形。15—20年内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现在还应该干什么呢？保障退休人员安度晚年，让孩子们上寄宿学校。还要确保官员定期更替，以免在高级职位上

待得太久。

“我完全同意这些建议，”勃列日涅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建议是列宁关于国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和党一定会欣然接受这个纲领。共产主义的明显特点是将会获得现实的感觉得到的内容——寄宿学校、免费教育、养老保障、食品日常消费进一步增加。应当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建议……”

作为哈萨克的前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直关注该共和国的状况。他不得不为发生在共和国的危机操劳。

1958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央全会。哈萨克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和库纳耶夫被召到主席团房间。赫鲁晓夫二话不说便明言，中央委员会要派别利亚耶夫去哈萨克，建议让他担任第一书记职务。

别利亚耶夫原在阿尔泰工作，1955年赫鲁晓夫亲自将其带到莫斯科，让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但赫鲁晓夫很快便对自己所提拔的人感到失望，决定将其从首都调往共和国。

“嗯，雅科夫列夫就当第二书记好了，”赫鲁晓夫最后说道。“全会对组织问题需要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进行解决。”

库纳耶夫答应一切照办，但雅科夫列夫不想出任那里的第二书记，因为刚才还是第一书记。他说希望离开共和国，于是被派往乌里扬诺夫斯克任第一书记。1961年他从乌里扬诺夫斯克调往鄂木斯克，职务大降——仅任市执委会主席。

同时，被派往哈萨克的别利亚耶夫也不走运。1959年哈萨克庄稼绝收，播种的作物被一场早雪严严覆盖。共和国承诺上交9亿普特粮食，仅仅交了7亿。而更不愉快的事情还在后头。1959年8月1日在铁米尔市，卡拉甘达联合企业的建设者因生活条件恶劣而拒绝出工。

莫斯科赋予这个项目以特殊意义，它为开发巨大的卡拉甘达煤田创造了机遇。大批年轻工人凭共青团的介绍信从全国各地涌向该市，却无法安置他们，况且也还没有工作可干。

年轻人们不知该做什么。15000人在军用帐篷中栖身，伙食又很糟糕。在哈萨克草原特别的酷热天气里，又缺少饮用水。烈日下的贮水槽中，冷水变成了开水。

8月1日晚上，一伙年轻人砸坏锁子，喝光了停在食堂附近的槽车中的克瓦斯。总的看来，工人们确实备受酷暑折磨，却没有地方可供消暑。从这个小插曲开始，随后演变成一场被定性为流氓行为的事件——

人群冲进食堂，有人打开了售货亭。不过后半夜民警到来之后，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一哄而散。

本来到此一切都可能结束，但民警扣留了两个小伙子（后来查明，他们根本与流氓行为无关）。数小时之后扣人事件激发起一场在“释放我同志！”的口号下实施的大洗劫。

市内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年轻人们以烧酒壮胆，抢劫和焚烧商店，占领内务部边疆区分局大楼，攻击应召前来维持秩序的民警和士兵。

勃列日涅夫赶赴该市。

“我很喜欢勃列日涅夫在那些天所表现的坚定决心，”库纳耶夫回忆说，“他毫无畏惧地出现在一群骚乱肇事者中间，镇定自若地对他们讲话。叫喊和喧哗声寂静下来，终于可以进行交谈了。”

实际上，恢复秩序的是军队的和民警。勃列日涅夫允许动用武器镇压骚乱。为此耗时三天，11人丧生，另有5人由于伤重后来在医院死去。42人被交付审判，百余名官兵负伤。

1959年9月25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分析研究卡拉甘达冶金联合企业工地的形势。

别利亚耶夫、库纳耶夫、卡拉甘达州委第一书记伊萨耶夫和哈萨克冶金建设公司经理维什涅夫斯基也应召前来。伊萨耶夫于1958年调入哈萨克升任此职——他原来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

会上苏斯洛夫语带威胁地说，“这起刑事对抗行动具有政治色彩”。大家指出了共和国领导人别利亚耶夫的错误。但他不承认自己有过错。于是最终的决定被推迟，直到10月2日采取组织措施了。

州委第一书记伊萨耶夫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一年，按照处分程序被任命为伊谢季河上游冶金联合公司热工车间领班。卡拉甘达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尼克被开除出党，撤销工作。哈萨克内务部部长卡贝尔巴耶夫被撤职。

索洛缅采夫被任命为卡拉甘达州委第一书记，他此前是车里亚宾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

苏共中央的决定中载明，哈萨克领导人“对事件未作出深刻的评判，未得出必要的结论，也未采取补救既有局面的措施”。这对共和国领导人别利亚耶夫是不祥之兆。他很迟了才意识到，不立即承认自己的过错是枉费心机。

1960年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报告了中央书记处分分析研究哈萨克局势的结果。也让别利亚耶夫发了言。他认错悔过：

“勃列日涅夫同志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看来我还不够富有远见的活动家的资格。请大家相信，我已经尽力而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过，显然未能让同志们团结一致……我同意组织的结论。”

应召参加会议的哈萨克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们，都将全部过错推卸到别利亚耶夫身上。随后便让他们离开了，而主席团委员们在小范围内开始讨论干部问题；谁顶替别利亚耶夫，谁可以派去阿拉木图加强共和国的领导。

赫鲁晓夫对别利亚耶夫说：“我们重新评价过了，你有点粗鲁，需要更加灵活的智慧。”

别利亚耶夫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该派谁去哈萨克斯坦呢？

勃列日涅夫再次成为候选者：他可是十分熟悉哈萨克的情况。同事们也乐得减少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赫鲁晓夫不想放走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利用这一机会，让库纳耶夫在阿拉木图掌握大权。他早就对库纳耶夫怀有好感。1957年11月库纳耶夫曾经飞赴莫斯科看望勃列日涅夫。一番交谈之后，勃列日涅夫友好地问道：

“明天想去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吗？中央委员会设宴招待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晤会议的人员。那里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精英。”

对库纳耶夫而言，克里姆林宫招待会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大事。当全体来宾齐集之时，赫鲁晓夫出现了。库纳耶夫夫妇被安排与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同坐一席。他们的席位后面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和谢胡。

1960年1月9日，勃列日涅夫飞赴阿拉木图参加全会，会上他严厉地批评别利亚耶夫，将库纳耶夫扶上了哈萨克第一书记的交椅，于是库纳耶夫便成为他的忠实战友。

库纳耶夫也未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将近两年后，赫鲁晓夫吩咐将哈萨克的几个区划归相邻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他表示反对。赫鲁晓夫便下令撤掉这位不肯听话的领导人。

12月24日科兹洛夫飞抵阿拉木图。无论在机场还是汽车上，他都绝口不谈公事。稍事休息后便驱车前往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大厦。他向政治局委员们说明：

“中央主席团认为，任命库纳耶夫同志为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是适宜的。我们推荐尤苏波夫担任第一书记，索洛缅采夫担任第二书记。请支持我们的建议。”

沃罗诺夫曾经讲过1960年勃列日涅夫召见他的情形：

“已经批准你为垦荒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哈萨克中央第三书记。”

“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谁都没有向我提起过，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沃罗诺夫不知所措。

“决定已经通过了，”勃列日涅夫坚定不移地说，“你这就坐车去福努科沃，乘飞机到哈萨克斯坦参加全会。”

沃罗诺夫出了门，在走廊里遇见一位中央书记伊格纳托夫，向其抱怨说，决定他的命运却连问也不问他一声。

伊格纳托夫困惑不解地瞧了瞧他：

“主席团会议上波利扬斯基和勃列日涅夫都说你同意呀。”

“谁也没和我说过。”

伊格纳托夫很喜欢给同事使绊子：

“到我办公室去，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沃罗诺夫向第一书记申述：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是奥伦堡州委副书记沃罗诺夫。我在奥伦堡的事情很多，还想在那里再工作两三年。”

“不是说你已经同意了吗？”赫鲁晓夫诧异。

“谁也没有和我说过。”

“告诉勃列日涅夫，让他另找一个候选人。”

沃罗诺夫回头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骂了一句，取消了决定，但从此便记恨沃罗诺夫。

勃列日涅夫颂扬起赫鲁晓夫来绝不比主席团的同事们逊色。而且他干这种事易如反掌。1960年2月1日讨论赫鲁晓夫即将出访法国的事。勃列日涅夫不失时机地建议：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访法的中期，在适当的情况下发表一次演说。”

“我认为这可以办到。”赫鲁晓夫当即响应。

“这会非常有意义，而且作用巨大，”勃列日涅夫兴奋地说，“这将会唤起法国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社会公众。”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支持他：

“列昂尼德·伊里奇说得很对，无论就内容、意义或形式而言，这都会是强有力的一着棋。”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涅夫元帅提出了另一个方案：

“我认为，从战术角度考虑，这类演讲最好在俄罗斯国土上发表，以使人感到背后的力量，觉得这是政府、中央委员会所发出的声明。这会提高您的威望，比面对法国或其他外国听众产生更加强烈的印象。”

但勃列日涅夫固执己见：

“难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联合国没有留下印象？你不记得我们乘车离开机场时，人们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纷纷伸出手来的情景吗？不能不考虑到这点。”

赫鲁晓夫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说得对。”

1960年5月4日，赫鲁晓夫对高层领导人进行大调整。比如说，让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元帅退休。

70岁高龄的伏罗希洛夫开会时常常入睡，对外国使节和来宾自作主张地随便说话，由此数次酿成国际风波。决定让伏罗希洛夫致函最高苏维埃，请求解除其职务。他的职位则由勃列日涅夫接替。

7月，伏罗希洛夫退出中央主席团，但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8章 国家的第二把手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新的任命乃是一次晋升，尽管职务本身并无实权。所有的决议均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最高苏维埃只不过使其发生法律效力而已。

然而主席的地位使勃列日涅夫成为举国闻名的人物，他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他喜欢颁发勋章，表示祝贺，举行招待会。勃列日涅夫感到骄傲的是，他曾为首位宇航员加加林颁发金星奖章。

可是，他最早为其颁发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人之中，却有暗杀托洛茨基的凶手西班牙人梅卡德尔，此人在墨西哥蹲过20年监狱。1960年5月31日签署了为其颁奖的密令，6月8日勃列日涅夫向被秘密接到苏联的梅卡德尔表示祝贺。

勃列日涅夫有了机会常常出国，在国外他受到礼仪周全的隆重接待。他开始获得外国奖章——几内亚共和国独立勋章、印度尼西亚一级星形勋章、南斯拉夫一级星形勋章。

勃列日涅夫出国时，为他驾驶飞机的是首批喷气式客机图-104的试飞员布加耶夫。将加加林从拜科努尔载回莫斯科的正是布加耶夫。勃列日涅夫喜欢讲述飞赴几内亚和加纳期间，一些不明国籍的歼击机曾围着他的飞机绕圈子，但布加耶夫巧妙地让飞机摆脱了这一危险局面。

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之后，不仅让布加耶夫担任民用航空部长，而且晋升他为空军元帅。布加耶夫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勃列日涅夫邀请老相识契尔年科加盟工作。契尔年科却不喜欢所推荐的这份差事。他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戈利科夫却说，是他将契尔年科拉来莫斯科的：

“契尔年科跑到我这里来恳求说：‘帮帮我。一些摩尔达维亚人来找我，说我已经占着位子八年不动了，帮我随便找个去处吧。’”

1956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鼓动处处长。9月8日他签订了一份《保证书》：

“我，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郑重保证：作为苏共中央机关的在职工作人员，抑或解职之后，都将对有关工作的资料和信息保守最严格的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宣扬和将其告知任何人。”

契尔年科在老广场上站稳了脚跟。然而勃列日涅夫突然来电话，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办公厅主任。按官阶表而言，这是降级使用，该职务也缺少前途，而且总的说来，干吗要离开中央委员会……

一名下属遇到契尔年科正在痛苦地思索："我的这位上司坐在那里，双手托头，愁眉不展，都快哭了。他突然对我说起勃列日涅夫向他推荐的工作。他一向只有在极端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坦露心迹。

'要是你能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干这个工作就好了！'他对我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加以拒绝——就意味着搞坏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那可能让我付出高昂的代价。'"

于是契尔年科去见勃列日涅夫。现实生活表明，这一举动开辟了他飞黄腾达的道路。

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事务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1961年12月勃列日涅夫出访印度三个星期，每天出头露面，发表21场演讲。所有的印度报纸都刊登他的肖像和演说内容。

勃列日涅夫从不放弃在大众传媒曝光的机会。他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赫鲁晓夫看了便拿他取笑（赫鲁晓夫自己也是一位演员）。赫鲁晓夫的闲话传到勃列日涅夫耳朵里，让勃列日涅夫颇感惶恐：他知道，赫鲁晓夫可以轻易地与昨天的宠幸之人分道扬镳。勃列日涅夫不大敢与赫鲁晓夫交谈，甚至涉及民众生活的时候也是如此。

曾一度发生这样的情形：

赫鲁晓夫过高估计了社会舆论对犯罪现象进行斗争的能力。法官们停止审理案件，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将被告交与劳动集体担保。结果犯罪率上升。于是赫鲁晓夫要求进行更加严厉的惩处。1960年代初对某些犯罪重新实行死刑。这真是罕见的怪事！——法律竟然获得了相反的作用力。

一些未成年人也被处死。这是按照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特别命令行事。有一个案例，一名未满15岁的少年因杀害父母被判死刑。

最高法院致信赫鲁晓夫称，这种命令是非法的。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最高苏维埃前秘书戈尔金将信件交给勃列日涅夫，请其转呈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读过信后很不情愿地去见赫鲁晓夫。

很快他就垂头丧气地回来，说：

“傻瓜，干吗我要听您的话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生气了，不肯收下这封信。”

勃列日涅夫还接到过更加不愉快的委托。

1960年10月24日，在哈萨克一个后来称为拜科努尔的主要试验场上，正准备进行P-16（8K64）弹道导弹的首次发射，该型导弹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扬格利的设计局建造。

科罗廖夫也即将结束自己的P-9型新导弹的工作。他打算证明他的导弹更好。两位设计师之间的关系极其尖锐。军人们意见分歧，有些人喜欢科罗廖夫的导弹，另一些人则支持扬格利。因此两个庞大集体的命运即将决定。

扬格利的新导弹预定于10月23日发射。但像常有的情况那样，最后一刻发现了故障，特别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人们试图当场加以排除。扬格利的第一助理布得尼克建议排放掉液体燃料，从从容容地加以修复。

领导国家委员会的是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炮兵元帅、苏联英雄涅杰林。

涅杰林希望新导弹无论如何要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前夕发射。他明白及时向莫斯科报告这一重大胜利是何等重要——赫鲁晓夫等着呢！

总司令心急如焚，只同意将发射延迟一天。他下令在不排放燃料的情况下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是第一个致命的错误。按照切尔托克院士的意见（他在科罗廖夫身边工作），另一个错误在于，为这枚导弹制作控制系统的不是富有经验的设计师梁赞斯基和皮伊金，而是鲍科罗普廖夫。科罗普廖夫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在加工自己的系统时未能做到高度精确。

涅杰林元帅坐在导弹旁边的椅子上，密切注视工作的进程。他的四周遍布随从人员。这是违反安全技术规范的——他们全都应该从现场撤离。

实验人员排除导弹故障后累得要命。他们取下了防护性的闭塞装置，那是用来阻止发动机开车的，可他们忘了这点。

而在控制站，人们正忙于修理程序配电器，这是启动时向发动机发送指令的仪表。不知是谁让程序配电器旋转到了起始状态，并没有检查线路。仪表让二级发动机车开了，而闭塞装置已经取掉……二级发动机从上往下喷出火焰，烧穿了氧化剂箱和一级的燃料箱。160吨燃料猛然

间喷发出熊熊烈焰。

导弹里面及其近旁所有的人都被活活烧死。还好，导弹的头部没有爆炸物。准备进行试验飞行，弹头填装的是无害的压载物。

那些站在离导弹稍远处的人试图跑开，但燃烧着的燃料赶上了人们，一共牺牲126人。

涅杰林元帅仅只残留下金星英雄勋章，没有什么可供收殓。扬格利的两位副手——柏林和孔采沃伊以及几名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年轻设计师也都葬身火海。

赫鲁晓夫事后板着脸问扬格利：

“你为什么没有烧死呢？”

是奇迹救了扬格利一命。他本来待在涅杰林身旁，但离开抽烟了。吸烟室位于起飞点150米开外的一个防护严密的地下掩体里。

灾祸发生之后，扬格利通过政府专用的高频线路装置以口授电话方式向莫斯科报告：

“当地时间18时45分，距离8K64型导弹发射30分钟之前，正在进行发射的最后操作之际，发生了招致贮存复合燃料的油箱毁损的火灾。事故结果，多达100多名抑或更多的人伤亡。其中数十人丧生。炮兵元帅涅杰林当时正在试验现场。目前还在搜寻他。我请求对于被火灾和硝酸烧伤的人进行紧急医疗救助。”

中央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马林当即向主席团委员们宣读了电话报告内容。

次日，为了调查事故原因并在11284部队采取措施，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他表现出慎重的态度。当委员会结束工作，事故原因已经查明的时候，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政府得出结论，你们已经对自己做了足够的惩罚，便不再处罚你们了。望安葬自己的同事，继续工作。国家需要洲际作战导弹。”

1960年10月26日的报纸报道，由于“航空事故的结果”，炮兵主帅兼导弹部队总司令涅杰林牺牲。他的骨灰盒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内。对事故和其他牺牲者则未置一词。遇难官兵葬入阵亡将士公墓。

半年过后，扬格利推出了自己的P-16导弹进行试验，它迅即用以装备部队。战友们证实，扬格利为这一悲剧不肯原谅自己。他知道他的过

错所在：他松懈了，放松了手中的缰绳，纵容试验场上所有的人也都松懈起来。这种对牺牲者所怀有的负罪感一直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终结。

勃列日涅夫并未改变对扬格利的态度，始终支持他。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时，一直坚持看望扬格利。扬格利妻子讲过，一次例会之后，扬格利与勃列日涅夫同席晚餐，其间勃列日涅夫问：

“听我说，米哈伊尔·库兹米奇，你有没有什么家务问题？我能帮助解决吗？”

扬格利对勃列日涅夫说：

“您公务繁忙，我不知道以私人的问题麻烦您是否合适。不过确有一个问题。我家的住房很好，但遗憾的是，窗户什么时候都照不到太阳。入住当时倒也很亮堂，而后来窗户的正对面耸立起了新楼的一堵墙。”

数日之后，已去基辅附近的疗养院休养的扬格利接到莫斯科打来的电话。来电人员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他想弄清楚，扬格利希望在哪个区域哪座大楼里得到新的住宅。一个月后，扬格利一家便迁入了牧首塘附近的一座大楼……

1961年6月17日，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奖励完成世界首例宇宙航行的人的问题。

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建议授予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赫鲁晓夫当即表示不应当这样做。但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不知何故不肯听从第一书记的话，表现出罕有的原则性和决心，一定要奖给赫鲁晓夫第三枚金星勋章。

于是赫鲁晓夫提议，同样授予科兹洛夫和勃列日涅夫英雄称号。谁也不曾反对。

6月19日，因领导建立和发展导弹工业、科学技术和实现苏联人进行世界首次太空航行的杰出功勋（乘“东方号”卫星飞船），授予赫鲁晓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部长会议副主席乌斯季诺夫和科学院院长克尔德什两次英雄称号；授予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科研工作委员会主席鲁得涅夫和国家无线电电子学委员会主席卡尔梅科夫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后，依然是一个性情直率而和蔼可亲的人。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和蔼可亲和对同志与人为善的态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年的国家计委主任拜巴科夫说，“格外健壮而矮小敦实的身躯，引人注目的脸庞，一对浓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在乌克兰，人们说他是‘出色的小伙子’。他身上的一切都仿佛固定不变、意味深长、心平气和。大家认为，他能深刻地了解人，不太注重虚名。”

“这是一个心平气和、沉着稳重、一丝不苟、尊重他人的人，”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索洛缅采夫回忆道。“很有人情味。从来不会像容易冲动、难以预料的赫鲁晓夫那样，粗暴地斥责人，蛮横无理，盛怒时大叫‘撤你的职！’。与勃列日涅夫一道工作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1963年5月27日，克格勃向中央主席团呈交编号1447-C的秘密报告。谢米恰斯内向国家领导人通报了朱可夫元帅思想倾向的情况，朱可夫竟敢公然议论国家领导人和不久之前的战友——武装力量的司令员们和安全机关人员。

赫鲁晓夫吩咐勃列日涅夫会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和谢尔久克，将朱可夫召至中央委员会加以警告。

“如果他还不明白，”赫鲁晓夫语带威胁地补上一句，“那就开除出党，加以逮捕。”

是否进行了谈话，无从知晓。档案中并无关于谈话的报告。不过，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勃列日涅夫执行了指示，并向赫鲁晓夫作了口头汇报。所幸的是，事情并未发展到逮捕元帅的地步。

而在筵席上，勃列日涅夫则是一名出色的主持人，爱讲俏皮话，能发表漂亮的祝酒词。他是个精力充沛、富有吸引力的人，十分爱好足球和冰球。

扎米亚京讲述过，1962年秋赫鲁晓夫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派往古巴所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正紧张之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仿佛眼看着美国就要对苏联的导弹阵地实施打击，战争即将爆发。

“我们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正起草致肯尼迪总统的紧急信件，”扎米亚京回忆道，“门突然打开，嘴上叼着香烟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出现在门口，他问：‘冰球打得怎么样了？比分如何？’苏联中央体育俱乐部队正在比赛。唉，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关心冰球。于是他去向卫队打听。就是说，正当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之际，他感兴趣的却是心爱球队的比赛情况……”

“块头很大，身体发福，正值盛年，”索尔仁尼琴1962年12月17日参加党和政府领导人与文艺界知识分子在列宁山（麻雀山）官邸举行的会

见，他所见到的勃列日涅夫就是如此。赫鲁晓夫忽然想向在场的人展示一幅他所喜爱的苏联画家的画作。

“这时出现了整个聚会最精彩的一副场景：赫鲁晓夫用指头戳了戳身旁高高胖胖的勃列日涅夫的肩膀：‘喂，你去取来’。于是勃列日涅夫（他当时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亦即苏联总统）根本不是庄重地起身离开，抑或派一个人去取，而是卑躬屈节地伏下身体（其姿势和动作仅只关于兵营的描写中才有），而且颤抖着肥大的身躯，双脚啪嗒啪嗒地跨着轻柔的碎步，以显示自己特别情愿和殷勤，似乎还笨拙地张开了双手。他很快返回，出现在大家面前，手中拿着画，仍然是踏着狗熊般笨拙的步子，将画递给赫鲁晓夫，猪崽似的脸上大汗淋漓。这个片段是如此鲜明，以致对那幅画作本身及其用意所在，我倒毫无记忆，未加记述。”

不难推测，关于这类有损自尊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在对赫鲁晓夫进行清算时同样难以忘怀。

1962年，普利谢茨卡娅在《天鹅湖》中翩翩起舞。那时老挝国王来访。演出后举行招待会。普利谢茨卡娅的丈夫、音乐家谢德林正在中国举办音乐会。普利谢茨卡娅是一个人来的。招待会上，勃列日涅夫来到她身边。

“一副放肆神态的勃列日涅夫，炫耀着脸颊上的小酒窝，不时挤一挤乌黑的眉毛，提出用车送我回家，”普利谢茨卡娅描述当时的情景。“领袖在调情，不得不上车，否则领袖会心怀怨恨。我和勃列日涅夫的确是同路：都到库图佐夫大街。勃列日涅夫如今已是苏维埃国家第二把手：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领袖按规定乘坐装甲轿车。黑色，宽敞，像是灵车。其后紧跟着另一辆车。常有卫队。

列昂尼德·伊里奇为了苏联-老挝友谊‘万古长青’喝了不少的酒。他声音洪亮地为我朗诵叶赛宁的诗句：

一切都会逝去，一如苹果树上的白色烟雾飘散……我已不再年轻……

他嘤嘤啜泣。我们的领袖多愁善感。还有一个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他回头向我同情地点着头说：瞧，我们国家出了一位多么富有文化修养的领袖……他匆匆地瞥了一眼我的手提包：里面会不会有炸药或者手榴弹。万一出事，国家便会失去一位富有文化修养的领袖。这些芭蕾舞女演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帮畜生……

朗诵完叶赛宁的诗句之后，勃列日涅夫又哼起了歌曲——领袖也是歌迷。歌声伴着口哨声有节奏地响起：‘宽阔的第聂伯河在喧嚣、呻

吟。’而他本人像熊似的，用一只手在我的膝头上蹭来蹭去。

我向角落里闪避，同时惊惶不安地叫喊起来：

‘列昂尼德·伊里奇，啊，这里不能转弯！司机！……’

‘迈娅·米哈伊洛夫娜，我是可以的，’这位诗歌爱好者洋洋自得地嘿嘿干笑。

交通中断。值勤的民警举手行军礼。

两辆黑色高级轿车迎着红灯疾驰过十字路口，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向左拐去……

领袖开始了文雅的谈话：

‘这个季度您将用什么新作品取悦自己的崇拜者们呢？’

‘我已经开始排练《斯巴达克》……’

‘我可是看过《斯巴达克》了……’

‘您看的是莫伊谢耶夫的本子，而这是雅各布布松……’

‘尤汉松？冰球运动员，对吗？’

‘是雅各布布松，列昂尼德·韦尼阿米诺维奇。一位出色的芭蕾舞剧导演。’

我已经到家门口了。我低着头急匆匆地朝自家的大门走去。还在行驶中的时候，我即已半侧着身子道过别：

‘谢谢。再见。请来观看新的《斯巴达克》……’”

勃列日涅夫完全有可能担任他极其喜爱的职务，然而命运却插了一手。实际上，中央第二书记是科兹洛夫。此人利用赫鲁晓夫的信任，手握党务机关的一切权柄，操控武装力量和克格勃。

1963年初科兹洛夫罹患重症——突然瘫痪。早在他担任古比雪夫州委第二书记之时，他的一只胳膊便有时不能动弹。这是一个危险的症状，但无论他或医生都未予重视。

他稍加治疗后，被转移至别墅。赫鲁晓夫去看望他。科兹洛夫口齿不清，举步维艰。赫鲁晓夫安排他继续身居高位，但必须有人接替他机关中的工作。

1963年6月7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重新进行干部调整。他决定让勃列日涅夫担任中央书记，并从基辅调来波德戈尔内与之配对，充当同样角色。赫鲁晓夫说："他在乌克兰干得很好。"

这样一来，似乎便出现了两位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对此心中不悦。赫鲁晓夫遵循让属下相互争斗的古老原则，故意让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成为竞争对手。不过这一次赫鲁晓夫失算了，因为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更怕他本人，而不是彼此心存戒备，所以很快便联合起来对付第一书记。后来勃列日涅夫据有老广场上的一号办公室之后，与波德戈尔内的竞争方才成为严重问题。

6月22日勃列日涅夫当选中央书记，他失去名义上的国家总统的职位，他不得不重新埋头于乏味的管理性事务。帕弗洛达尔州委书记莫尔贡去加拿大，看见那里与土壤侵蚀作斗争的情形，1963年8月便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勃列日涅夫听取莫尔贡介绍了两个小时，深入理解垦荒的问题，后来给柯西金去电话，请其研究莫尔贡所提出的问题。

1964年1月25日，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载了对赫鲁晓夫来乌的印象。当勃列日涅夫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时，他就在旁边，勃列日涅夫报告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反映的对面包质量低劣的抱怨。这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气恼地说：

"您干吗把所有的事全都向我报告？您自己也应当学会亲手做一点事情嘛！"

赫鲁晓夫挂好听筒后对谢列斯特说："您瞧，这都是些什么助手呀？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情来就缺乏本领和智慧了。"

谢列斯特自然无言以对，不过在与波德戈尔内交谈时却向其转告了当家的针对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波德戈尔内满意地说道："这对他是个教训：不要急于报告不愉快的事。这种事情我们本来就够多的了。"

勃列日涅夫请求谢列斯特申报对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厂授予列宁勋章的嘉奖。这个工厂业已届满70周年。谢列斯特3月初去皮聪达晋见正在那里修养的赫鲁晓夫，所提到的也有向该厂授奖的问题。

"这是勃列日涅夫求您同我商量的吧？"赫鲁晓夫狐疑地问道。

谢列斯特避免直接回答，却说是乌克兰领导人们自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发觉，勃列日涅夫曾一度在这个工厂工作过，所以现在才操心勋章的事情。赫鲁晓夫同意授予该厂勋章，但吩咐到年底再行申报。

勃列日涅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开口便问谢列斯特是否谈了为工厂授奖的事情，然后才开始打听赫鲁晓夫总体上都说了些什么。他很想知道：关于他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什么也没有说吗？

“我开始发现，”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么，勃列日涅夫对我每次会见赫鲁晓夫都抱着妒忌和不安的态度，他对赫鲁晓夫怕得‘要命’。”

1964年10月初，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书记勃列日涅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抵达东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5周年庆典。

一天晚上，苏联大使阿布拉西莫夫为这位高官举行欢迎宴会，女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也应邀出席。

这对大名鼎鼎的夫妇是首次亲眼目睹勃列日涅夫。

“整个晚上我都和他坐在一起，”维什涅夫斯卡娅回忆道，“他有如一位彬彬有礼的骑士，想方设法让我开心，而且总的说来他的兴致很高。

这是一个穿着考究、一头黑发的男人，年纪并不算老（当时他57岁），精力仍然充沛，非常善于交际，爱好人多热闹。他喜欢炫耀诗歌知识，特别是叶赛宁的诗句：

如今我已不再抱有多少希望，我的宝贝，或许你还梦见了我？

仿佛在一个回音响亮的春的清晨

我骑着玫瑰色的马儿疾驰而过……

整个晚上他将这首诗朗诵了好几遍——也许是太喜爱了。他酒喝得不多，爱讲笑话，甚至唱起了逗人开心的四句头，脚后跟踏得咔咔响，双手模拟演奏巴拉莱卡琴，不断地弹舌头，用维亚特卡发音唱歌，声音相当悦耳。这并非平淡无奇的自我表现，不，应当说演技娴熟，富有才气。来客中有人祝酒：

‘列昂尼德·伊里奇，为您干杯！’

‘不，何必为我干杯，我们为艺术家干杯吧。政治家算什么呀，今天有我们，明天我们可就没了。而艺术却是永恒的。让我们为艺术家干杯！’

随后他请求我随便唱点什么，我就唱了柳巴沙《沙皇未婚妻》中的一首歌。那时候我对他并未另眼相看，不曾推测他将会担任国家的何种职务。无论我还是斯拉瓦，那天晚上与他待在一起都感到很愉快……”

数日之后，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感到惊奇的不仅是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而且还有十分熟悉他的许多人。他似乎并不是国家头号人物的合适人选。按照赫鲁晓夫女儿拉达的说法，这是一个“招人喜欢、稍许有点儿多愁善感的人”。

第三卷 稳固局面 蚕食对手 重新洗牌

第1章 一朝天子一朝臣

国家首脑骤然成了三人：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政府主席，波德戈尔内——事实上身居中央第二书记的关键职位，一年后又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但即便是中央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也都感觉比赫鲁晓夫时代更为自信。他们已有可能无拘无碍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勃列日涅夫并不限制任何人发言，也不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他亲自确立了这样的规矩：所有的人都应当对每一个问题发表看法。他也总是考虑同事们的意见，不再单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阐述国家领导人的工作：

“必须显示集体的智慧，而不是颂扬个人，我们再也不能搞个人崇拜了。”

赫鲁晓夫下台一个月之后的1964年11月16日，举行了中央委员全会。波德戈尔内作报告。我们会发现：全会上委托作报告的并非第一书记，这是极为罕见的事。

波德戈尔内的报告题为《关于州、边疆区的工业、农业和苏维埃机关的党组织合并事宜》，从而抛弃了最重要的赫鲁晓夫思想之一——将州党委划分为农业党委和工业党委。

赫鲁晓夫退休之后，两个州党委重新合并为一个。每个州都建立主管党委合并事宜的组织局。需要决定两位第一书记中谁将成为一州之主，对另外一位又该怎么办。通常情况下，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的书记都总是争执不休。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改为区党委。新领导层恢复了久经考验的斯大林式的管理体制。

全会上还讨论了认为无须告知普通共产党员的另一个问题。

主席座位上换成波德戈尔内：“同志们，让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关于今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与某些兄弟党会谈和协商的总结，请勃列日涅夫同志讲话。”

勃列日涅夫简要地报告了与一些兄弟党同志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举行会谈的情况，了解赫鲁晓夫退职的意义何在的。

波德戈尔内为装门面问了一声：“同志们，我们还需要就报告展开辩论吗？”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包含了答案。整个会场配合一致地加以回应：

“不需要。”

“那么，同志们，这里有一个建议，如果可以接受，就通过下列决定，”波德戈尔内说，“让我们进行讨论。”

他宣读决定：“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与某些兄弟党举行会谈和协商的总结报告，决定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与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中的活动。”

“做得对，”整个会场严守纪律地齐声响应，甚而鼓起掌来。

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交换座位后，说：“我们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关于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中就不必提勃列日涅夫针对这个问题的发言了，这并无必要，这是第一点。你们同意这个意见吗？”

全会未加反对。

“第二点，”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鉴于问题的复杂和重要性，首先是从我们党的纪律和规章的原则出发，我们再次问大家，既问自己也问你们，发出这样的号召：同志们，让我们从今往后以最严格的方式坚持一点：这只能是归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掌握的情况。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很遗憾，还存在着一些不良事例。我们尚未来得及讨论一个外人不应当知道的重要问题，结果第二天路透社就对所发生之事作了报道。有时候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对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因此但愿我能相信，我们大家作为我们伟大的党的成员，都一定能够严守党的秘密，尤其是在中央委员会强调某个问题不宜张扬的重要性的时候……”

保密制度也扩大到针对中央委员会委员。表面上允许他们接触最高机密，中央委员能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机要通信员向他们分送红色的大书，有时一本，有时两本，有时一下三本。收到后要在专用的凭证上签字。

“可是实际上这些记录里并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曾任莫斯科市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的叶戈雷切夫对我讲，“比如，其中记录了发表某项声明的决定，随后该声明也就公布了；或者任命某人为大使，或者允许某个共和国实行某项措施……而是常见的则是这样记载：某号问题——见《特别卷宗》。国防军事工业综合体、外交等方面的所有问题——这些都是不允许中央委员们知道的……”

中央全会上，那些对推翻赫鲁晓夫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人——谢列斯

特和谢列平，都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擢升为委员。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同样获得晋升，当上了主席团候补委员。有几个人，比如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也从候补中央委员提升为中央委员。

对那些公认与赫鲁晓夫过于亲密的人则予以贬黜。

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波利亚科夫被解除职务。他曾就读于沃罗涅日农业技术中专，做过两年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技术员，后来被送到列宁格勒新闻学院学习，从此便在报界工作。1960年代初他获任《乡村生活报》总编辑。赫鲁晓夫喜欢做出一些突如其来的决定。1962年他让报纸总编辑波利亚科夫主管党中央农业部，并任命其为中央书记。除了赫鲁晓夫，这一任命谁都不喜欢。现在让波利亚科夫重返新闻界——就任《经济报》周刊副主编。

勃列日涅夫进行的所有任命，确乎着眼于与新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在他的关照下，他的朋友库纳耶夫已成为哈萨克的首脑。

1964年11月，几个中亚共和国举行活动——庆祝建国40周年。勃列日涅夫飞赴塔什干参加庆祝活动。他约见到表示祝贺的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尤苏波夫。尤苏波夫倍感伤心的是，他作为一个大共和国的领导人，却未能从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提升为委员。他询问这是何故。

勃列日涅夫回答道：“你与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未能找到共同语言。”

并解释说，苏共中央收到许多对共和国第一书记的投诉，谁也不支持他，在这种条件下，已不可能在如此高的职位上工作了。尤苏波夫一切都明白了，当即便写了离职申请。

“你不要生气，”勃列日涅夫安慰他，“我会亲自出席全会，让你体体面面地离职的。”

据说，尤苏波夫为人专横。有一次，他见到一个农业边疆区的第一书记便问：

“您这里今天有多少联合收割机下田工作？”

“我还没有看汇报材料。”书记回答。

“您不掌握情况，解除您的职务。”尤苏波夫马上作出决定。

不过，勃列日涅夫撤掉尤苏波夫却另有原因。

数日之后，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共和国政府各位副

主席都应邀来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接见他们，宣布尤苏波夫已递交离职申请，于是问道：

“我们推荐谁当第一书记呢？”

尤苏波夫建议派一位中央主席团委员去哈萨克，以提高共和国领导层的威望。但勃列日涅夫否定了尤苏波夫的想法：

“共和国党组织的首脑应当由一位当地的同志充当。”

于是有人提到了库纳耶夫的名字。

勃列日涅夫马上说，苏共中央不会反对这一建议。

尤苏波夫被任命为乌拉尔斯克州执委会主席。但即便是在这个很低的职位上，库纳耶夫也不让他久留，1966年又将其调任哈萨克葡萄国营农场联合组织经理。57岁便命令其退休……尤苏波夫活得比库纳耶夫长久。

库纳耶夫很快便甩掉了索洛缅采夫：他给勃列日涅夫去电话，声称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在社会舆论面前已丧失威信，一个名誉败坏的人不可能再继续工作”。播弄是非的人纷纷传说，似乎索洛缅采夫与一位太太发生风流韵事，被身为民警的丈夫当场捉住，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丑闻。

勃列日涅夫做了一件让朋友高兴的事，将索洛缅采夫调离哈萨克，并对库纳耶夫说：

“如果他只是对一个女人献殷勤未获成功，社会主义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我们把他调到另一个州去工作好了。”

索洛缅采夫前往罗斯托夫州任第一书记。过了两年，1966年12月勃列日涅夫又让他担任中央书记兼重工业部部长——接替早逝的鲁达科夫。赫鲁晓夫提拔的鲁达科夫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主管重工业部长达12年之久。

叶夫列莫夫暂时还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但已离开莫斯科。

叶夫列莫夫毕业于沃罗涅日农业机械化学院，整个战争期间都在沃罗涅日伏罗希洛夫第18航空厂工作，该厂产生伊尔-2型强击机。后来他奉命从事党务工作。早在斯大林当政时，叶夫列莫夫已被任命为库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是在库尔斯克州长大的，他没有忘记乡亲们，对库尔斯克人的生活十分关注，尽可能帮助故乡加利诺夫卡。自然，库尔斯克州委

第一书记对赫鲁晓夫出生的村庄的关心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赫鲁晓夫将叶夫列莫夫调至莫斯科，让其在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担任自己的第一副手，同时兼任中央局领导俄罗斯农业的主席。

1964年秋，赫鲁晓夫对他的特殊好感变成了对他不利的因素。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撤销赫鲁晓夫职务时，叶夫列莫夫作为其忠实拥护者也饱受非议。

苏联部长会议负责农业的副主席波利扬斯基提出，赫鲁晓夫出生的村加利诺夫卡的一切债务被非法免除，他说当时的库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在此事上负有责任。中央全会之后，叶夫列莫夫去找勃列日涅夫控诉波利扬斯基。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和蔼可亲：

“辩论时情况紧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时候根本无法讨论问题。现在已完全没有必要关注你的事情。我一直坐在电话机旁：必须给各社会主义国家打电话，解释为何决定撤换赫鲁晓夫。应当让大家都能理解，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在国内呢，主席团委员们也分头去各地的党组织，向人们解释这一切。”

叶夫列莫夫火了：“我想向中央主席团写个申请，请求讨论牵涉我的共产党员名誉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劝他不要激动：“何必呢？不是时候嘛。你去找波利扬斯基谈谈，弄清他用意何在。我眼下这些天都会很忙。”

全会数周之后，一天晚上9点勃列日涅夫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让其先别回家，一小时后去见他。十点钟时叶夫列莫夫来到第一书记那里。

“目前的情况是，必须换换你的工作，从中央调往其他部门。”勃列日涅夫的话有如晴天霹雳。

“为什么您要让我放弃中央的工作呢？”叶夫列莫夫委屈地问道。

“对你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勃列日涅夫含含糊糊地解释，“你是赫鲁晓夫在中央政治局俄罗斯分局的副手……当然，我们明白，你没有料到会这样解决赫鲁晓夫的问题。我们一点儿也不怪罪你。我们连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和州委、边疆区委的许多书记都说，你不应当留在中央机关。此外，不会再有中央政治局俄罗斯分局了，我们准备将其撤销。你要正确理解我的意思，你必须换一换环境。我们仍然要你从事党务工作。”

叶夫列莫夫请求去高尔基市，那是他开始自己仕途的地方。勃列日

涅夫却加以拒绝：“不行，我们不能派你去高尔基。现在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出缺，你就去那里吧。这个边疆区很好，工作很有意思，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说，这已是最后的决定。”

叶夫列莫夫抱屈地说：“也许，我应该退休吧？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在州里工作的阶段了。”

勃列日涅夫当即予以拒绝：“退休对你来说目前尚早。你还年轻，就去边疆区吧。先休息几天，然后我们再在那里召开边疆区委全会。”

去斯塔罗夫波尔介绍叶夫列莫夫的是谢列平，这是党内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叶夫列莫夫当选为这个农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联合党委组织局主席。

叶夫列莫夫名义上仍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但人家并不通知他去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也不给他寄送供党内的高层领导人阅读的任何文件。

斯塔罗夫波尔出现空缺是因为，边疆区原主政者库拉科夫已调往莫斯科。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让其担任党中央农业部长。勃列日涅夫急于作这一任命，因为他领导这个国家是从试图改造农业入手，他需要一些可靠的助手。

库拉科夫1918年出生在库尔斯克省费季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上的是雷利斯克农业中等技术学校。曾在唐波夫州一个国营农场管理处担任助理，后来则任农艺师。

他没有上过前线，后方需要他。1941年他被任命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随后又任边疆区土地局局长。再后来在奔萨州委担任一个部的部长。在那里，他结识了对他一生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契尔年科。契尔年科从1945年至1948年任奔萨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对库拉科夫的看法对于勃列日涅夫颇具分量……

1965年9月，勃列日涅夫让库拉科夫当上了中央书记，后来又成为政治局委员。总书记对库拉科夫显示好感，常常邀约他去扎维多沃一同打猎。

库拉科夫属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那个狭小圈子。这些人每逢节日都会前往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受到邀请的人并不多——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老朋友吉洪诺夫和基里连科。

在库拉科夫和负责工业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之间，常常因为农业与

工业间的资金分配发生冲突。基里连科认为，农村得到的投资太多，而在那里一切都是有去无回，缺乏效益。

库拉科夫强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领导人，在农业部之外再设立一个共和国国营农场部。建部后过了两年，什么也未改变。夏天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前往外地休假之时，基里连科给索洛缅采夫打电话：

“各边疆区委和州委的书记们常来见我。大家都批评我们设立俄罗斯国营农场部，要求将其撤销。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

由于在中央机关中基里连科的威望更高，所以他能够做到撤销库拉科夫所采取的决定。

勃列日涅夫连农业部长也要亲自挑选。他选定的是他战后结识的马茨凯维奇。在他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期间，与乌克兰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后来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工作时，他们也进行合作。

赫鲁晓夫也器重马茨凯维奇，1953年将其调往莫斯科，使之成为农业部长，1956年又任命为政府首脑副手。但后来他对马茨凯维奇的态度陡然改变，最终将其派去切利诺格勒州当执委会主席，而农业部长则让沃洛夫琴科接任。沃洛夫琴科是一位农学家兼良种繁育家。

勃列日涅夫成为第一书记之后，亲自给马茨凯维奇打电话，要他立即前来莫斯科。1965年2月，马茨凯维奇就任部长之职。

勃列日涅夫将整个农业管理局迁回莫斯科。这才有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决议《关于提高苏联农业部在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中的作用》。

1945年3月24日，讨论《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紧急措施》的中央全会开幕。

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引用各种数据，证明其历届前任的彻底失败：1913年俄罗斯帝国人均占有粮食540公斤，半个世纪之后则为573公斤。换而言之，半个世纪之中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并未增长，然而科学却已大大地向前迈进，发达国家竟不知道如何处置过剩的农产品。

“我们已面对一个事实，”勃列日涅夫说，“即我们提高农业生产的种种计划始终未能完成。如果说1959年农业曾出现一次明显的增长，那么最近一个时期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原地踏步……”

他严厉批评赫鲁晓夫领导农业的方法，声称必须赋予农业生产单位以自主权，而不是指挥它们。

勃列日涅夫许诺给农业大户分发补充拨款，制定硬性的粮食储备计划，提高主要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对小麦和黑麦的超计划收购实行50%的补贴。这多少缓和了农村的贫困状况。还免除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欠债，不再打击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经营活动——这可是那个时代的一件大事。不久之后，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开始为集体农庄庄员发放养老金。

三月全会宣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壤改良、化学化和机械化，通过了一项农业技术设备生产的庞大计划。但直至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终时刻，全国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依然不足，尽管所生产的机器比美国还多。这些技术设备常常损坏，由于缺少备件而无法使用。

当时并不明白，为了让农业部门现代化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们声称：

三月全会上，从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提拔了白俄罗斯领导人马祖罗夫，他被任命为柯西金的两位第一副手之一。

马祖罗夫曾在汽车与道路中等技术学校就读，战后担任白俄罗斯共青团领导人时，从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函授部毕业。他在白俄罗斯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工作二十余年。他与柯西金的关系无论如何也密切不起来，这让勃列日涅夫非常满意。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让乌斯季诺夫当上了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勃列日涅夫主管军事工业和航空时，他们的关系已十分亲密。如今他实质上是将乌斯季诺夫安排到自己先前的位置上，完全可以指望其对他的支持。

当乌斯季诺夫搬进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大楼时，勃列日涅夫前往查看他在新办公室安顿的情况，这成为一件不寻常的事。

第2章 中央主席团内的地域性斗争

勃列日涅夫急于巩固自己在中央主席团内的地位，他需要一批可以依靠的人。

波德戈尔内的所作所为令他不安，此人表现得极为自信，仿佛自己仍然与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波德戈尔内是一个性格刚强、言行粗鲁和天资不高的人，对勃列日涅夫抱着庇护的态度。

波德戈尔内出生于波尔塔瓦省卡尔罗夫卡镇，从在机械车间做钳工学徒开始劳动生涯。1921年他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书记。两年后进入基辅综合技术学院所属的工人预科。1926年他被基辅食品工业工艺学院录取。获得毕业证书之后，在制糖工业联合组织的一些工厂里担任工程师。

1939年，波德戈尔内被任命为乌克兰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翌年调至莫斯科的全苏人民委员部担任同样的职务。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并未待多久。1942年米高扬派他去沃罗涅日州加速撤退一间制糖厂，以免其落入步步进逼的德国人之手。波德戈尔内报告说，他亲自领导设备外运的工作。但事后查明，他根本不曾到过那里——害怕了。

由于弄虚作假，米高扬将波德戈尔内调出人民委员部，让他去当莫斯科食品工业工艺学院的院长。乌克兰解放后，当时需要富有经验的干部，波德戈尔内被调回共和国人民委员部。基辅期间他在赫鲁晓夫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官运节节亨通。

赫鲁晓夫让他担任乌克兰部长会议驻全苏政府的常务代表，随后又任命其为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去世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干部变动。波德戈尔内被批准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57年赫鲁晓夫清除了中央主席团中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将乌克兰的主宰者基里连科调往莫斯科，让波德戈尔内成为共和国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又将其调往莫斯科……

波德戈尔内是中央第二书记，他按照老习惯称第一书记为“廖尼亚”，从未显示出任何尊敬之意。波德戈尔内在党中央机关有着牢固的关系，他依靠的是乌克兰和乌克兰出身的人，这些人许多都身居莫斯科的关键性职位。

波德戈尔内刚犯一个错误，勃列日涅夫便喜不自胜地加以利用。1965年夏天，勃列日涅夫去南方休养的时候，中央主席团收到谢列斯特从基辅发来的一封信函，署名的日期为8月2日。他请求允许乌克兰在外贸市场上独立行动：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团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联合国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代表，曾不止一次地当面向我们的代表提出能否与苏维埃乌克兰直接开展贸易的问题。他们提出，由于一系列原因，他们无法与苏联进行直接贸易，因为他们的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他们不得不通过一些中立国进行对苏贸易，而这牵涉到很大的困境。但是通过联合国会员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贸易，都可以排除这些困难，对贸易的发展会产生良好影响……”

提出请求的理由并不太令人心服。但谢列斯特以为，他和波德戈尔内不会遭到拒绝。他认为，业已赋予乌克兰的国家属性应当在现实中加以体现，于是他便与全联盟各部门进行斗争，捍卫自己共和国的利益。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则认为，乌克兰的联合国成员地位与共和国外交部的存在一样，纯属国际政治游戏所需要的象征。在其余方面，乌克兰的权力并不比苏联别的任何一个地区更多。

临时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的波德戈尔内将谢列斯特的函件分发给不同部门，要求它们作出结论。秉性自信的他并未考虑到，如此重要的问题如若没有得到第一书记的预先同意，连提出来讨论都不可以。

谢列斯特的信对莫斯科任何部门和谢列平一伙而言，正是攻击波德戈尔内和领导人中“乌克兰帮”求之不得的借口。不同帮派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1965年9月2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勃列日涅夫说，应当对谢列斯特关于外贸部工作的报告进行讨论。

勃列日涅夫还补充说道，他不知道有信件的事情。这是一个信号：中央第一书记不会支持乌克兰人。大家都坚决反对赋予乌克兰独立自主与外国进行贸易的权利。米高扬声称，早在40年前，外贸垄断的问题即已解决，不可能重新进行审查。

谢列斯特的报告成为对乌克兰领导层进行整治指责的由头。主席团委员们说，谢列斯特不仅破坏外贸垄断的列宁主义原则，而且歪曲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乌克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开展得软弱无力，共和国领导层追求特殊地位，表现出地方主义，破坏国家的和计划的纪律。

谢列斯特受到的指责还有，商店招牌和街道名称都用乌克兰文书写。怎么能这样呢：塞瓦斯托波尔乃是俄罗斯的荣耀之城，而各种标牌却又都是乌克兰文！苏斯洛夫和柯西金全都就这个话题发表了意见。

谢列斯特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反映，便开口一再保证，如今他已认识到自己那封信的错误，准备将其收回。然而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都没

有给他逃避严厉批评的机会。

“谢列斯特同志，您的义务就是到基辅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说明整个情况，”米高扬说，“对您的提议所造成的政治错误进行真正的自我批评，并且得出必要的结论。”

主管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的书记杰米契夫谈到，在乌克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本身都盛行民族主义，基辅中央机关中俄罗斯人已所剩无几。

谢列平的发言更为严厉，他声称，应为谢列斯特的错误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其本人，而且还有波德戈尔内，正是波德戈尔内利用自己的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不允许任何人干预乌克兰的事务。“监护乌克兰”——这是一个可怕的表述。斯大林在世之时，正是由于“监护列宁格勒”而枪毙了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塞瓦斯托波尔向黑海舰队颁奖时，所有的发言竟然一律使用乌克兰语！”谢列平颇为气愤，“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占多数，但广播、电视都用乌克兰语播出。总之，是靠损害俄语来推广乌克兰语。所以民族主义路线不仅表现在外贸问题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

谢列平要求召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认真分析研究共和国所发生的事情。

谢列斯特否认所有的指责，恶狠狠地回答谢列平道：“至于组织结论，您倒用不着分析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您想要召开全会，那就召开吧，也请您听听那里的人们会对您说些什么！”

波德戈尔内同样尖锐地对指责作出回应。

米高扬在这场对乌克兰领导人的攻击中看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但这次交锋的背后，更多的是企图动摇勃列日涅夫早先依靠的势力强大的乌克兰帮的地位。

波德戈尔内承认他犯了错误：“我不应当散发这封信，而应当事先在主席团内加以讨论。”

勃列日涅夫将此事暂时压下。他有意和解地说，“他怀疑是否应当召开全会。也许，主席团委员们交换意见即已足够，而谢列斯特同志也会对各种意见加以考虑。”

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对谢列平一方攻击的猛烈程度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又对波德戈尔内地位的削弱颇觉满意，这一来就让他放开了手脚。他不希望看见波德戈尔内与自己平起平坐，扮演拥有全权的第二书记的角色，便为其安排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

1965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和谢列斯特进行电话交换，讨论了日常事务。勃列日涅夫谈到米高扬："他已经年老——70岁了，喜欢沉湎于往事。也许应当考虑一下接班人的事，让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活跃起来。"

1965年11月25日，米高扬届满70周岁，在国家别墅为他庆祝了生日。30余人齐集一堂。宴会主持人的角色由政府首脑柯西金担任。勃列日涅夫并未到场，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而米高扬的60寿诞，则是堂而皇之地在昔日高尔基住过的别墅歌尔克10号庆祝的。那时候米高扬还处于权力的顶峰，宾客盈门。勃列日涅夫寸步不离寿星。当奏响高加索民间舞曲时，勃列日涅夫便去跳舞，柯西金的另一个儿媳阿拉与他一起跳。阿拉是斯大林当政时被枪决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的女儿。

当时勃列日涅夫竭力想让米高扬注意到他，他希望讨好过生日的主人公，那可是中央主席团举足轻重的要员。如今，无论勃列日涅夫或其亲信却谁也不肯在他的寿辰露面，事情便变得很清楚：米高扬业已失宠。来宾们吃吃喝喝，但唯恐举杯为寿星祝酒，万一祝愿米高扬的话被看作对新领导人的挑衅怎么办？

米高扬服从纪律，递交了离职退休的申请。勃列日涅夫提议让波德戈尔内接替他的职位。

米高扬与勃列日涅夫的最后一次交谈是在二十三大期间。他们坐在一个房间里，那里是主席团委员们会间休息时饮茶、进餐和讨论各种关键性问题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单独与米高扬在一起，事后他说已与米高扬谈妥：今后不再将其选入党的最高机关。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米高扬。《星火》杂志在米高扬80寿诞时刊登他的照片，勃列日涅夫就对中央宣传部领导人进行了申斥。

波德戈尔内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任命，他喜欢人家称他为总统。在与外国人会谈时扮演苏联代表团团长的角色。官方招待会上他成为东道主，外国总统都向他祝酒和问候。

这激怒了勃列日涅夫，他自己也想与总统们打交道，但在时机未到之际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原则上，他与波德戈尔内有许多共同之

处：对生活无所牵挂的态度，不愿让自己吃苦受累，酷好狩猎和多米诺牌戏。

第3章 暗战——乌克兰二把手职位出缺

“乌克兰人”和“共青团员”对立，为勃列日涅夫施展手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善于让自己的战友们彼此冲突，从而削弱他们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黜退赫鲁晓夫提拔的人，重新起用被赫鲁晓夫贬斥的人。

波德戈尔内对新工作无须竭尽全力。他喜欢去乌克兰，基辅附近的一家猎场常为他举行狩猎活动。猎后燃起篝火，这时波德戈尔内便成为聚餐主持人。

扎米亚京曾任塔斯社总编，他讲述了有一次带着重要文件去见波德戈尔内的情形。值班秘书请他等一等：“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非常忙，请您稍候。”

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扎米亚京不习惯人家让他在会客室耽搁如此之长的时间，忍不住向一名警卫员打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究竟忙于什么要务。

那人压低嗓门坦白承认：“玩多米诺牌正来劲呢。”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例行的周年庆典。波德戈尔内始终不善于把握分寸和讲客套话，老是做出一些让保加利亚人不愉快的事情。

代表团预定由索菲亚飞往瓦尔纳。清晨众人一道用早餐——波德戈尔内则单独进餐。他出现时怒气冲冲，一脸凶相：“国家元首已经吃过早饭，你们却还在乘凉、品酒！”

大家忙站起身来。可是很快就弄清楚，他哪里也不打算去了。他叫来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的中央委员会联络部长别尔诺夫吩咐道：

“你转告保加利亚人，我不去瓦尔纳了。”

别尔诺夫设法解释，说保方已在瓦尔纳准备了丰富的节目，但波德戈尔内对他的话连听都不想听。中央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索洛缅采夫也是代表团成员。别尔诺夫试图请他从旁协助，但索洛缅采夫不肯去见波德戈尔内。

保加利亚政治局候补委员、瓦尔纳区委第一书记斯坦切夫，通过专

线给苏联客人下榻的宾馆打来电话。他告诉别尔诺夫：

“请转告波德戈尔内，瓦尔纳数万居民已经手持标语牌、旗帜和鲜花，挤满了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所有的街道，就为迎接他这位苏联贵宾。不应当如此蔑视保加利亚人民。”

别尔诺夫去见波德戈尔内。后者骂了一句，但明白已非去不可了。在飞机上，他的警卫员道明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心绪不佳的缘由。原来，夜里一只黄蜂蜇了波德戈尔内的秃顶。他叫来他的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大加训斥：

“你们算是什么鬼卫队，竟然让黄蜂能够蜇咬苏联国家元首!”

对于内部倾轧他有着精确的辨别能力。他来基辅对谢列斯特讲述莫斯科的情况，劝告说：

“应当多多注意谢列平和波利扬斯基，可能还有基里连科，不过他变化无常，疑心很重，也爱阿谀奉承。举止必须十分审慎、小心，对廖尼亚不能太坦诚。”

波德戈尔内刚刚离开基辅，勃列日涅夫就来电话打听：主席在哪里？听说波德戈尔内已飞赴克里米亚，便开始巨细无遗地仔细询问，波德戈尔内在基辅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与什么人会面，给谁打过电话。

谢列斯特详详细细汇报，说波德戈尔内外出打猎了，休息了，还美美睡了觉：

“据我所知，仅仅从我的办公室给您打过电话。”

勃列日涅夫稍稍放下心来。

1966年1月6日，勃列日涅夫来到顿涅茨克，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他觉得大家对他很冷淡，因而一再打听：

“喂，报告作得怎么样？留下印象如何？”

勃列日涅夫离开之后，波德戈尔内打来电话，探听勃列日涅夫逗留此间的情形：

“每次他俩相互打听谁做些什么事情、与谁人会面和谈话，”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我都觉得他们彼此离开对方就无法生活；更多的是，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缺乏相互信任。”

谢列斯特当然明白，事实确是如此。一旦时机成熟，勃列日涅夫便

会甩开波德戈尔内。而暂时勃列日涅夫想出的计谋是，将自己在乌克兰时的老朋友谢尔比茨基拉入中央主席团。

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卡扎涅茨被召到莫斯科，让他担任全苏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卡扎涅茨加以拒绝。于是人家向他暗示，他可能失去一切。卡扎涅茨只好同意，迁居首都，担任这一职务长达20年之久。

谢列斯特不得不遴选新的政府领导人，到莫斯科就共和国其他部长候选人征求意见。他按照惯例遍访各位中央书记，然后去见勃列日涅夫。而勃列日涅夫仅仅对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感兴趣。

谢列斯特建议由利亚什科出任共和国政府领导人一角，此人现任乌克兰中央书记，其主要副手是索博利（主管工业）和卡利琴科（主管农业）。

勃列日涅夫指出，利亚什科在国内鲜为人知。谢列斯特试图反驳：

“利亚什科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非止一年，并曾领导顿涅茨州委数年，他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仍然不肯同意。

“要是任命卡利琴科呢？”谢列斯特提出。

“卡利琴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了，”勃列日涅夫提醒。“人们会说，你们没有干部了。”

长利琴科自1954年至1961年曾任部长会议主席，接着调任副书记。谢列斯特列举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才弄明白，勃列日涅夫希望让谢尔比茨基重返乌克兰部长会议首脑这一职位。此人与卡利琴科一样，已经担任过这一职务，但勃列日涅夫却并不将这点放在心上。

谢尔比茨基在勃列日涅夫的故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开始自己的党内生涯，随后被调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接替基里连科的州委第一书记职务。从那时候开始，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谢尔比茨基三人便结成了友好关系。

1963年底赫鲁晓夫对谢尔比茨基大发雷霆，让他去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业州委第一书记。12月4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下令：“解除谢尔比茨基主席团候补委员职务，让谢列斯特接替他。”

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彼此都非常讨厌对方。

“将他解职是正确的，”谢列斯特写道，“这是一个没有党性修养的

人，缺乏文化，对待同事粗鲁、放肆，常常牢骚满腹。与利亚什科相比，谢尔比茨基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鲜为人知，缺少威信，在民间也不得人心。根本不合逻辑：既然卡利琴科重新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不合适，为什么谢尔比茨基却可以？”

波德戈尔内也反对谢尔比茨基复出。可是谢列平却说，应当纠正对待谢尔比茨基的不公正态度。“乌克兰人”和“共青团员”对立，为勃列日涅夫施展手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善于让自己的战友们彼此冲突，从而削弱他们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再三要求谢列斯特，一定要任命谢尔比茨基。谢列斯特试图以征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意见为借口，称他们决不会同意谢尔比茨基复出。但勃列日涅夫洞悉这套手法：

“你就表示同意吧，至于主席团委员们那里，我们共同努力是可以谈妥的。”

谢列斯特终于顶不住压力。勃列日涅夫当即用电话与波德戈尔内取得联系：

“彼得·叶菲莫维奇已经表示同意谢尔比茨基了。”

波德戈尔内毫无办法，只有取消自己的反对意见。过后他对谢列斯特说：

“彼得，你被人家说服了，可是你有很大的麻烦。只好怨你自己了。”

1965年12月6日的全会上，谢尔比茨基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不仅巩固了自己安插之人的地位，而且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增添了一个可靠的拥护者。

1965年9月29日的中央全会上，分管干部的书记季托夫被免职。他具有很长的党务工作年资，斯大林去世后他曾担任七年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看上了他，

1961年便让其主管党中央机关一个部，翌年又任命其为中央委员会直属的组织和党务问题委员会主席。

勃列日涅夫让季托夫担任哈萨克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黜退赫鲁晓夫所提拔之人，重新擢用被赫鲁晓夫贬斥的人。

1965年12月，取代季托夫的新任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卡皮托诺夫成为中央书记。这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一个关键性的部，主管党的干部。

如若事前不让卡皮诺夫知晓，就连其他各部也不能任命任何人。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二十余年。

卡皮托诺夫战前不久毕业于莫斯科公用事业建设学院，曾在梁赞州住房管理局任工程师。参军服完兵役后，在莫斯科党的系统谋得高升，开始担任红普利斯年机务段党组织书记，逐步成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来还兼任州党委书记。

1959年3月2日莫斯科州委全会解除卡皮诺夫第一书记职务。接替他的是赫鲁晓夫提拔的杰米契夫，其人此前担任部长会议事务总管。卡皮托诺夫被取消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委员资格，改任中央委员会视察员。不过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却又让他担任伊万诺夫州委第一书记。

对于国家的新领导人而言，赫鲁晓夫的冷遇就是最好的保举信。勃列日涅夫往伊万诺沃给卡皮托诺夫打电话：

“你干吗在那里闲待着？”

勃列日涅夫托付给卡皮托诺夫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干部，但也未进一步加以提拔，甚至未让其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不认为卡皮托诺夫还有能力干更大的事情。

当筹备党的二十五大、草拟总结报告之时，卡皮托诺夫的小组受命起草第三部分——关于党和思想体系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要求将文稿让他过目。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记述说，刚开始叫朗读，勃列日涅夫便站起身来，声称他不准备读这种胡言乱语了：简直像是照抄《真理报》社论！他要求：

“马上把卡皮托诺夫叫来！”

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通情达理地表示异议：

“不过，反正他本人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

“我知道他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的，”勃列日涅夫说，“但他是中央书记，要为这部分负责任。是在他的领导下，按照他的指示，别人才写出这种废话，谁应当负责呢？！连代表大会的报告需要讲些什么都不明白，我要这样的书记干吗？马上去叫来，就在这儿训他一顿，好让他猛醒。”

亚历山德罗夫建议将卡皮托诺夫在组织和党务部的第一副手彼得罗切夫也一并叫来。勃列日涅夫对此人的看法也不好（不久之后彼得罗切夫便被撤职）。于是找来了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和外交部

副部长科瓦廖夫。两位学识渊博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一天之内便重新口授完成了整个党和思想体系部分。

卡皮托诺夫来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当着整个团队的面，以带侮辱性的词句评价他的工作。卡皮托诺夫恭顺地听取了全部意见。他准备忍受一切，任随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做出组织结论就行。恰恰是这种唯命是从但又不太有文化和不会自作主张的官员，才切合勃列日涅夫的心意。在粗俗地谄媚方面，卡皮托诺夫可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好手。

总书记的一名秘书回忆说，卡皮托诺夫从不放过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的机会，曾激情洋溢地汇报一个州召开总结会议的情况。他一个劲地报告说："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的时候，代表们都站立起来，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第4章 削弱强势的共青团首领谢列平

勃列日涅夫对人的辨别能力特别强，他清楚地了解谁拥护他，谁反对他。

有时勃列日涅夫同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的交谈都归结到一个话题：谁人在干什么，谁同谁的关系如何……

谢列平（还有谢米恰斯内）的刚强和果敢不仅让勃列日涅夫感到担心，也使得稳坐自己交椅的许多高官惶惶不安。他们更为喜欢勃列日涅夫的基本原则：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

勃列日涅夫亲自抓领导干部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的一个长处就是对干部特别关注，”葛罗米柯写道，“有时他同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的交谈都归结到一个话题：谁人在干什么，谁同谁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在于从交谈中摸清，是否有谁在搞针对他个人的阴谋诡计……在干部问题上，他和赫鲁晓夫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赫鲁晓夫认为必须不停地将干部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常常在某些工作部门造成混乱局面。勃列日涅夫则相反，连那些就事业和国家利益而言必须撤职、由新人接替的干部，他也仍然让其官居原职。”

中央主席团的力量分布状况一开始并不明显。除去“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之外，处于强势地位的当数中央书记谢列平，许多人都想让他担当党的领导。

“我是1966年来到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的比克宁讲述道，“当时尚未最后确定究竟谁会成为领袖——勃列日涅夫抑或谢列平。这一点我很快便感觉到了：任何一个来见谢列平的州委第一书记，也必定去见勃列日涅夫。反之亦然。”

谢列平比勃列日涅夫小20岁，文化素养也高得多。他身为城里的孩子，在沃罗涅日中学毕业后，前往莫斯科考入大名鼎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文学和历史学学院，这是人文干部的熔炉。在这里，谢列平很快被选为团委书记。

谢列平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40年10月2日。恰巧这一天颁布了一项命令，高等教育将开始收费，助学金只发给优秀学生。谢列平曾作为志愿兵参加战争。回到学院时，自然有些科目考试未能通过，按照新法律便得不到助学金。

他坐在学院团委里，考虑该怎么办。这时候莫斯科团市委书记克拉萨夫琴科到来，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克拉夫琴科说：“舒里克，我那儿有你可干的工作，你愿意到我们市委去吗？”

谢列平先是当指导员，接着当科长，后来当分管军事工作的团市委书记。1942年他荣获红星勋章，翌年调往团中央：先后担任书记、第二书记。

斯大林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委任谢列平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领袖事前将谢列平叫到他的别墅，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斯大林让谢列平坐下，自己则在办公室里踱步，不断地发问。他不时走到谢列平面前，俯身瞧着他的眼睛，看得十分认真……

谢列平后来向自己的好朋友哈扎佐夫承认，他当时非常害怕……

谢列平属于这样一批党内领导人，他们1957年夏天不让老革命派（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撤职。谢列平比其他人更加积极、坚定、顽强地支持了赫鲁晓夫。

怒不可遏的伏罗希洛夫元帅高声斥责谢列平：

“你这个臭小子，我们倒该向你作出解释吗？你先学会穿长裤吧！”

不过赫鲁晓夫却对这位年轻的战友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半年之后的1958年4月，谢列平领导分管加盟共和国的苏共中央党的行政机关部，但在中央机关仅仅工作了数月，1958年12月25日他刚满40岁，便当上了克格勃主席。

1961年10月31日在二十二大的首次全会上，谢列平当选为中央书记。两星期后，他的朋友谢米恰斯内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填补他离任后的空缺。

过了一年，谢列平又获得两个职位。

1962年9月20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发表关于工农业管理结构的长篇讲话。突然间他改变话题：“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改革国家监察机关的工作。国家监察机关现在还存在，但很少发挥作用。必须让我们的监察机关成为党和国家的机构，因为如今离开党便很难实行监督。其领导人应当是中央委员，也许还要中央书记，目的在于对此表示重视。我想，那时候可能不会让所有的小偷丧失盗窃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总可以使得他们的盗窃生涯困难重重。”

1962年11月，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党和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于是建立了一个权力大到几乎不受限制的机构，它既有权监督党的机关、政府，也有权监督武装力量，甚至克格勃。

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一个与党中央机关平行的具有分支体系的机构。党和国家监察机构的州委会领导人，可自动入选州党委书记和执委会副主席。因而监察人员事实上已变得独立于地方机关之外。

该委员会有权开展侦查，对有过错的人进行处罚，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和法院。据说柯西金和米高扬试图对此进行阻止，因为他们明白，建立新的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削弱部长会议的权力。

赫鲁晓夫任命谢列平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并同时让其成为政府首脑的副手：

“他需要与各部部长、各国家机关打交道，所以应当让他拥有必不可少的权力。”

谢列平已成为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甚至得出结论，说国家的实权正逐步由赫鲁晓夫手中转移至谢列平之手。

对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组织安排了全民性的响应。一大批作家致信谢列平，支持建立“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被取消了的真正的全民监督”。

赫鲁晓夫对任何人都不曾像对谢列平这样信任，对任何人也不曾像对谢列平这样飞速提升。第一书记信任谢列平，高度评价他精明干练的品质，总是将至关重要的事情托付与他。

也许，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枉自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对他们而言，似乎倒不如让他留下来更好。事后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会不会为所做的这一切感到懊悔呢？

谢米恰斯内曾对我说过：

“不。赫鲁晓夫对我们很好，当人家告诉他，我和谢列平参与其事时，他甚至不肯相信。但问题不在这里。国内当时的局势已不容许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把勃列日涅夫都看错了，其实客观上他具备各种条件。作为党内的第二把手，他讨人喜欢，善于交际。”

起初勃列日涅夫被视为能力不足的临时性的领导人。而国家需要坚强的铁腕人物，于是大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必须让位给更强有力的领导人——谢列平。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失宠前和谢列平很要好，他对重新掌权并未失去希望，曾经神秘地说："很快一切都会改变。廖尼亚的位子坐不了多久，萨沙·谢列平就会上台。"

按照阿朱别伊的说法，"谢列平把勃列日涅夫看得一钱不值。而且勃列日涅夫的意志力也远不如在亲密的小圈子里被称为'钢铁般的舒里克'的谢列平……在即将展开的与勃列日涅夫的较量中，谢列平的胜算很大。他对此已有准备。不过他没有考虑到，能战胜实力的并不单纯是实力，而且还有计谋。在这方面他可远远不及勃列日涅夫。"

结集在谢列平周围的基本上是不久之前从共青团出来的人，这些人在国家安全机关和内务机关、中央委员会机关、意识形态部门身居要职。他们并不把勃列日涅夫放在眼里，认为国家理应由谢列平领导。

扎米亚京对我说过：

"谢列平将勃列日涅夫看作至多是州一级的领导干部，而不是大国的领导人。文化水平不高，把两种想法联系起来都办不到，没有任何理论知识，所有的讲话都要他人代笔。"

勃列日涅夫了解这类心态。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勾心斗角中，他是一个远比昨天的"共青团员们"富有经验的人。勃列日涅夫与谢列平之间存在着隔阂。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对"萨沙"的一举一动都持批评态度。

"开始时勃列日涅夫需要一个能掌控克格勃和支持他担当党和国家领袖的强势人物，"扎米亚京曾对我讲，"于是便形成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双人搭档。然而后来勃列日涅夫逐渐看清谢列平。于是出现了许多好心人，他们对谢列平的说法各不相同。"

表面上，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十分友好，意味深长地向谢列平抛出暗示，说在我休养和公出期间，你可以顶替我。而后来却让其他人代理政务，他不敢冒险将管理党和国家之事托付与谢列平。

有一次，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切马索夫去中央委员会看望共青团的老相识谢列平，想知道他现在都有些什么职责。大家以为谢列平是第二书记。谢列平两手一摊：

"我并没有经常性的职责，有的只是经常性的谈话。"

"谢列平被推上第二把手的地位仅数月，"谢米恰斯内说，"那时候勃列日涅夫将组织工作、干部、所有最重要的事都托付与他。谢列平就主管这些事情。后来勃列日涅夫把干部管理权转归新任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并将此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对谢列平，则委派其主管轻工业

和食品工业、财政。”

那些推翻赫鲁晓夫的年轻的党内领导人很快便明白，勃列日涅夫同样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

他们原本期待的是政治、经济、个人命运的重大改变，结果呢，他们推翻了赫鲁晓夫，却只是让勃列日涅夫得以享受掌权的乐趣。

“自从勃列日涅夫掌权那一刻起，我和谢列平便处于十足岌岌可危的境地，”谢米恰斯内说，“这使勃列日涅夫确信，我们正在急切寻求出路。针对赫鲁晓夫所采取的行动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这令他颇为惊惧。”

对于勃列日涅夫，人们通常只是温和地偷偷地骂上几句。不过，也许他并不那么坏吧？都认为他是个相当自由主义的随和之人，对谁也不曾干过坏事。也许，勃列日涅夫而非谢列平成为国家元首倒是好事？

勃列日涅夫的随和让他的战友们产生错觉，他们之中有人轻率地判定：对“廖尼亚”是可以发号施令的。

勃列日涅夫对一位部长言明：

“你不要当众反对我，我终归是党的首脑。这间办公室可是斯大林坐过的……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再来找我，讲你认为需要做些什么。”

见多识广的人都说，勃列日涅夫只是貌似温厚，实则口蜜腹剑。初次见面时勃列日涅夫便对自己的助手阿根托夫说：

“安德烈，你别看我这么温和。如果必要，我也会收拾人，不知道那个被我收拾的人怎样，我自己事后也要难受三天。”

据说，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活动上看见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帕夫洛夫（一个热衷于政治阴谋的人），便以他独特的方式警告说：

“你敢搞阴谋，我就把你研成粉末。”

帕夫洛夫被逐出政界，让他去领导体育运动，后来又被打发到蒙古当大使。

谢列平沉默寡言，意志坚定，严守纪律，不喜欢纪律涣散现象。不过他也未必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严厉和生硬。

曾与他共事的梅夏采夫对我说：

“‘钢铁般的’——我是说，必须自己控制一切，对吧？而他就秉性而言却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是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而且他不爱记仇。我们那儿的风气是：一个人遭遇不幸，别的人就会把他一股脑儿摁进地底下，可他却并不爱报复人。”

叶戈雷切夫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传说他很严厉，我认为这是进行煽动，企图破坏他的威信。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我知道只有两位国家领导人亲自去取电话听筒，就是柯西金和谢列平。要找其余的人，都必须通过助手和秘书。而且谢列平如果在开会，不能通话，他总是事后亲自回电……”

1960年代中期，谢列平门下弟子——共青团出身的人，实际上占据着国内最重要的各种职位。国家安全部门、外交部、电视、塔斯社——这些地方随处都有谢列平的朋友。

“当我们全都被撤职的时候，”梅夏采夫说，“人家常常对我们说，不可能你们没有组织上的亲密关系。然而确实没有，我们任何时候都仅仅是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

不过朋友们在自己的圈子里也会坦率地说，勃列日涅夫不适合做国家领导人，恰恰是谢列平才应当担任第一书记。“共青团人”总是骄傲地说：瞧，我们“钢铁般的舒里克”成长起来了，他准会接替勃列日涅夫。

然而，梅夏采夫对此却予以否认：

“我的别墅里常常有聚会。但并没有谈起过应当推翻勃列日涅夫、让谢列平上台这类的话。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或者可能是道听途说。我自己就在国家安全部门退休……不过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傻瓜，他们喝醉之后会跳上桌子高呼‘谢列平万岁！’”

梅夏采夫当时是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国家委员会主席。

“有一次，我读克格勃散发的小册子，”扎米亚京回忆道，“其中引用几个共青团工作人员在一家宾馆里谈话的记录。看来，他们大概是在澡堂里洗澡，随口议论现行政策，对各种事情发表看法……这份记录被人家认真看待并得出了结论。”

那么谢列平本人呢？他是否示意过想当第一书记？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喜欢面对面地单独谈话，”叶戈雷切夫说，“但我们没有说过他应当做一把手。谈话都集中到国家停止了发展，正在倒退。这才是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

难道团结在谢列平身边的这批年轻领导人，不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吗？

“不，我们根本没有成熟到足以为国家担当责任的程度，”谢米恰斯内说，“与米高扬、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相比，我们还是穿着短裤的共青团员。我们如若觊觎些什么，会显得很可笑……”

然而在莫斯科却议论纷纷，说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影子内阁，分派了职位。波利扬斯基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还胡闹似地问过梅夏采夫：

“喂，影子内阁成员，情况怎么样？”

有人认为，甚至未来的政治局委员和院士雅科夫列夫也属于谢列平团队。我曾经问过雅科夫列夫：如果谢列平掌握政权，真的准备任命你担任高官吗？

“这是十足的胡说八道，”雅科夫列夫回答道，“人们在分析这个青年群体的时候，似乎真的在他们那里找到一个什么名单，仿佛在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可是我与此有何相干？我对谢列平诸如反对特权之类的讲话印象颇为深刻。至于对谢列平怀有好感，我不能这样说；对他持否定态度，我也不能这样说。”

“那么是否有过一场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共青团阴谋？”

“我认为这是神话，”雅科夫列夫说，“他们因为喝醉了酒，可能在某个地方说过某些话。可是我们谁又不曾喝醉酒后成群结伙？一旦清醒过来，也就不成其为群体。”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并沿着功名利禄的阶梯向上攀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这需要对机关中的权谋具有特殊的禀赋并经历年深日久的磨炼。

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过多年的奈尔·比克宁写道：“我能准确无误地在中央机关中分辨出先前的共青团干部，根据是他们上下轿车的动作姿态。那种从容不迫和机械性的熟巧，只有在青年的时代才可能养成。”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新世界》的副手康德拉托维奇在日记中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特别是共青团官员们的习性：

看似青年人……但问题就在于，这根本不是青年人，而是特殊的一类人——官气十足的黄口小儿，机关领导层的接班人。这些人早已谋划着自己当上领导后的生活。年纪轻轻，在生活中尚一事无成，除了当过

几天小官也未能积累任何经验，结果便已经负有了领导别人、指点别人、教育别人的使命，这其中有些东西很不正常，不合情理。

在我国各种各样的活动家中，恰恰共青团的活动家门们最为保守，这绝非偶然。他们还很胆小，唯恐出错，但都谨守一条金科玉律：抓紧些，别松手！——他们都绝不放手。他们很容易受教唆，让他们去攻击谁都可以。他们年轻得浑身流露出充沛的精力，随时准备效犬马之劳。

他们处于仕途的起点，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整个心理。但他们也极易腐化堕落，因为实质上他们业已被腐蚀败坏。

根据在中央委员会度过了半辈子的布鲁坚茨的说法，斯大林时期培育出的几乎似乎对服从的无条件反射，对千篇一律的指示的绝对赞同，对上司奴颜婢膝，有奶便是娘。无怪乎有一则笑话广为流传：工作人员受到上司接见时都随身带着两套答案，内容截然相反，一旦摸清办公室主人的心态，便掏出所需要的那张纸条来。

谢列平究竟能否成为国家的头号人物呢？

他公认的弱点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他从共青团一下子便到了克格勃，随后又到了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领导过哪个地区，没有接触过国民经济问题。

一方面，谢列平对于一些州委书记而言不算自己人，据说他们都不会支持他。另一方面，州和边疆区的许多领导人又是共青团出身，他们对谢列平抱着尊敬的态度。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也可能是最聪明的。所以他也有机会成为一把手。

谢列平对斯大林的态度颇为复杂。担任克格勃主席时，他大力为被非法定罪的人恢复名誉，他无条件地谴责1937年的大屠杀。但在谢列平看来，因为其余的事情，特别是战胜德国，斯大林却值得深深崇敬。在这点上他与赫鲁晓夫迥然不同。

“谢列平是个特殊的斯大林主义者，”扎米亚京说，“结果，赫鲁晓夫在开展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时，依靠的却是一个反对自己的人。”

而雅科夫列夫则认为：

“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安德罗波夫之类的人物，也许还更加强硬。他常说：改革必须从党开始，要让党中央机关行得端做得正。我喜欢他关于特权是党和国家机关的一种病症的说法……”

哈扎佐夫说过：

“萨沙常常搬家。有一次让人修理东西，他问修理费是多少钱。人家给他拿来文件。他看了看文件，就把钱给了自己的助手，让其付款。他的同事们得知此事后说：这种事还真没见过！政治局委员们都很委屈：谢列平让他们落入何等境地！简直是怪事，如今连他们这些人无论什么都要掏钱呀？真不习惯！”

谢列平坚持在党的文件中突出阶级主场，要求对帝国主义进行反击，并与毛主义的中国求得相互理解。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党中央机关干部，都害怕他上台，认为那将会回到斯大林式的制度。

谢列平（还有谢米恰斯内）的刚强和果敢不仅让勃列日涅夫感到担心，也使得稳坐自己交椅的许多高官惶惶不安。他们更为喜欢勃列日涅夫的基本原则：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谢列平犯了一个战术性的错误：惹得中央主席团的其他委员都反对自己。

“谢列平担任主席团委员的时候，他不要卫队，”谢米恰斯内说，“勃列日涅夫问我：为什么谢列平出行没有卫队？我说：他不肯要卫队，如果他开口，明天我就给他配置哪怕一个排也行。这时谢列平站了起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干吗要人保卫？我认为，需要保卫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政府首脑。保卫我们有什么必要？防谁呢？’”

同样，谢列平也反对“偶像崇拜”。他说，游行期间，他站在主席台上而工人们举着他的肖像的时候，他感到羞耻。干吗要到处展示领袖人物的肖像呢？

中央主席团委员们默不作声。但这时候苏斯洛夫插嘴了：

“这是一种传统。由此表现了党的威信。如果　取消，人们不会理解我们的。”

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站了起来：

“哎，是这样，给谢列平配不配卫队呢？”

谢列平摆了摆手：

“算了吧……”

谢列平同样反对政治局委员们自己给自己授勋。咳，这下子他可是触及了同事们的痛处……

“他在政治局里主张重新审查为领导人制定的整个特权制度。”科切马托夫说，“事情既涉及工资、别墅，也涉及专门的饮食、汽车、卫队。他的话斩钉截铁，令人信服。现场鸦雀无声，谁也不肯发言。最后波德戈尔内说：‘咳，我们的萨沙是个民粹主义者，什么都想得出来……’政治局委员们轻松地笑了起来，而他所有的建议便自然地被束之高阁……”

勃列日涅夫什么地方胜过谢列平呢？勃列日涅夫有着令人羡慕的履历——在工厂干过活，打过仗，经历过垦荒，当过州委第一书记和摩尔达维亚、哈萨克的第一书记。他与军方和工业领导干部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都具有重要意义。

而谢列平的履历表上则是：共青团、克格勃、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些都不是那种能广交朋友的职务。人们对党的监督比对克格勃更为害怕。谢列平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要求十分严格，履行职责时雷厉风行。而他旁边就是满脸堆笑、讨人喜欢的勃列日涅夫。

梅夏采夫说：“年轻时的勃列日涅夫对人谦恭有礼，是个和善、聪慧、漂亮的小伙子。不仅女人们爱他时爱得死去活来，而且男人们也对他一往情深。”

然而一旦勃列日涅夫体味到权力为何物之时，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比权力更令人惬意的东西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

勃列日涅夫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是个久经锻炼的政治斗士，机关中勾心斗角的能手。人们对他估计不足。勃列日涅夫对人的辨别能力特别强。他清楚地了解谁拥护他，谁反对他。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领导中央宣传部的雅科夫列夫对此表述得更为简练：

“知识不足，不忘旧怨，毫无才能，但有一点除外：对自身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具有极为准确无误的辨别能力。”

叶戈雷切夫回忆道：

“我对他极为坦率。我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无话不谈。他对我的心思一清二楚。他一旦掌权时，已经知道谁不与他志同道合。他常常做出对我们很好的样子，内心里却准备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着手驱除谢列平及其伙伴。

“那些亲信的人里有的是玩弄幕后阴谋的高手，精通干部人事猫腻的

行家，”梅夏采夫说，“你走进办公室去看，桌子上空空如也，一份文件也没有，仿佛这个国家无事可做。他们却在电话上一一部署：这个人应撤职，那个人需要任用，第三个人必须赶往更遥远的地方。负责采取行动的是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都是心狠手辣的家伙。眼看着他们一步步将各种权力机构从谢列平手中剥夺……”

勃列日涅夫明白，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一职赋予谢列平以过大的权力。1965年12月16日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提出改革该委员会的问题：

“现在的监察机关叫做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名称，不能充分反映我国的监察乃是全民监察这一事实，因此改造这些机关并将其称为人民监察机关才对……”

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狡猾手段。谁敢对勃列日涅夫的说法提出异议呢？

“这会让中央委员们产生疑问吗？”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问。

大厅里齐声回答：

“全都明白。”

“谁想就这个问题发言？”

没有想发言的人。经表决，一致赞成对委员会进行改革。令勃列日涅夫惴惴不安的力量中心已不复存在。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我们认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地位不应当是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全场表示同意。

“因此，”勃列日涅夫冠冕堂皇地实现了自己的诡计，“不打算让谢列平同志继续担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同志将从事中央书记的工作。关于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的问题，将由明天开幕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这样对不对，同志们？”全场一致支持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失去了使其成为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的权力。

第5章 初试锋芒——任用萧洛科夫

继赫鲁晓夫时代令人印象深刻的历次代表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主导的首次代表大会显得异常枯燥和平庸。勃列日涅夫在位时的所有代表大会也将是如此，没有任何特色鲜明的举措。

在党的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以头号人物的角色亮相。

大会前夕，照例举行中央全会。1966年3月2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开全会，印象是平淡无奇，徒托空言，尽管说得漂亮，却并无振奋人心之处。"

继赫鲁晓夫时代令人印象深刻的历次代表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主导的首次代表大会显得异常枯燥和平庸。勃列日涅夫在位时的所有代表大会也将是如此，没有任何特色鲜明的举措。

报告持续将近五个小时，中间只有一次休息。那些年勃列日涅夫尚能轻松完成这项沉重的任务。

总结报告之后，立即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发言。他建议在党内恢复总书记职位和政治局（斯大林在世时的1952年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将政治局更名为主席团），这让勃列日涅夫颇为高兴。他很想被人称为总书记。而且总的说来，代表大会之后他成为党的合法领导人，感到更为自信。但他也并不急于确立自己为唯一的主宰。

1966年4月4日，谢米恰斯内关于文艺界知识分子对代表大会反应的报告放到勃列日涅夫案头。谢米恰斯内所强调的事情都极具特色，他明白，这会为总书记带来愉快：

"许多作家和艺术工作者都盛赞苏共中央的活动和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对总结报告反映良好，赞扬其务实的特征，并不耸人听闻，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解决采取现实的建设性的态度。对于文艺界知识分子的评价是肯定的。这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

勃列日涅夫起初对党内高层领导的其他成员保持平等态度，结果常常遭遇某些困难。人家并不总是同意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为了安插某些自己人，他不得不与政治局的同事进行斗争。最为困难的是将老同志萧洛科夫从摩尔达维亚调来莫斯科。

1957年赫鲁晓夫着手，解散了各领域的大部，其时萧洛科夫仅获摩尔达维亚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职位。勃列日涅夫领导国家之后，赫鲁晓夫的新措施被废除，萧洛科夫重新担任摩尔达维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之职。看来，他只能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未忘记自己的人。1966年3月，萧洛科夫获得15年以来首次真正重大的晋升——从经济工作回归党务工作：当选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仅仅数月，勃列日涅夫便决定任命他为全苏维护社会秩序部部长。

但政治局内一些人同样力图提拔自己的人。谢列平坚决反对任用萧洛科夫为部长。谢列平的朋友和战友、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力劝勃列日涅夫不要任命萧洛科夫当部长。

谢米恰斯内后来说，他和谢列平提醒勃列日涅夫：萧洛科夫是个很不体面的贪污腐败分子。不过1956年那件败坏萧洛科夫名声的事未必尽人皆知。

谢米恰斯内对报纸发表谈话时讲述："早在乌克兰时代我即已认识萧洛科夫。当时我是乌克兰共青团中央书记，他是党中央轻工业与地方工业部部长……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一个何等精明的生意人：早在战争期间他便在军需官中间大肆活动，从事后勤工作。后来抛弃家人，与一个护士鬼混，被解除职务，但马上就由勃列日涅夫收留，弄到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他那里……"

实际上，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反对萧洛科夫是因为，他们想让自己人季库诺夫保住部长职位。

谢米恰斯内劝说勃列日涅夫：

"季库诺夫是现成的部长，按一切评价标准都很合适，您何必要找另外一个人？"

勃列日涅夫看到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抗拒，便收回了政治局任用萧洛科夫的决定草案。他并不是放弃这个候选人，而是着手打好任用的基础——与政治局委员们长时间交谈，寻求他们的支持。

这是初试锋芒。

季库诺夫为内勤二级将军，毕业于阿拉木图法学院，是1917年以来内务部历届部长中唯一的法学家。他曾在共青团和各强力部门工作。谢列平1959年就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让季库诺夫充当自己的副手，而1961年离开克格勃时，又设法任命季库诺夫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长之职。

季库诺夫向当时克格勃第七局的局长阿利金抱怨说："实在不想去内

务部系统工作，可是谢列平坚持要我去，他说，谢罗夫可能会担任这个职务，而这个人根本不合我们的心意。”谢罗夫大将是赫鲁晓夫的人，同时还领导军事情报机关，看来谢列平担心赫鲁晓夫让其出任部长。

季库诺夫在同行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设法让政府许可民警工作人员免费乘用市内和郊区的公交。根据他的建议，开始在每年的11月10日庆祝“民警日”。首个节日赫鲁晓夫还发表了讲话。

季库诺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被授予列宁勋章。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他还将继续顺利高升。

1966年7月，勃列日涅夫提出重建全苏内务部的问题。俄罗斯政府首脑沃罗诺夫表示反对，他不想失去如此重要的一个部。柯西金支持他,问题被搁置。沃罗诺夫前去穆罗姆。勃列日涅夫往那里给他打电话：

“听我说，大家都已经投了赞成票,只剩下您一个人了。”

沃罗诺夫只得同意。

“我们任命谁当部长呢？”为了走过场，勃列日涅夫问了一句。

“季库诺夫，”沃罗诺夫想让自己的部长保住这个重要职务。

“通过。”勃列日涅夫说。他部分赢得了这次战斗。

季库诺夫已经在接受人们的祝贺。但政治局尚未作出自己的决定。

勃列日涅夫邀约沃罗诺夫去扎维多沃打猎。波利扬斯基、葛罗米柯、格列奇科也去了。他们举杯畅饮。

“嗯，你希望谁当内务部长呢？”勃列日涅夫再次询问沃罗诺夫。

沃罗诺夫顿时明白，季库诺夫的候选人资格落空了。

“你随便找个党务干部吧，”他建议,“即便什科利尼科夫也行。”什科利尼科夫当时是沃罗诺夫的第一副手。“让他穿上民警制服，会是一名出色的部长。”

勃列日涅夫摇了摇头：

“我希望有自己的部长。”

萧洛科夫的儿子伊戈尔就读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那是苏联精英的子女们首选的高校。他从基什尼奥夫赶来时已经迟到，学校图书

馆里《外国地理》的课本不够，没有他的了。他向母亲抱怨，母亲就替他出主意：

“你给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打个电话，求她帮帮忙吧。”

勃列日涅夫的妻子让伊戈尔放心：

“别着急，我告诉舒拉，他准能搞到课本。”

舒拉就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卫队队长利亚边科。于是一名机要通信员奉命给大学生伊戈尔送去了课本，而机要通信员本来是为国家级高官送文件的人……

1966年9月6日，勃列日涅夫邀请季库诺夫到中央委员会谈话。令总书记感到兴趣的是两个问题。民警机关有没有能力干预政治生活？民警机关与克格勃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行动？（国家安全工作那时候还由谢米恰斯内领导）

季库诺夫确定无疑地回答说，民警机关没有能力干冒险的事。即便有个别人准备怂恿它干这种事情，它也不会去干。而部里与克格勃配合行动的情况并不常见——仅限于采取大规模措施与倒卖外币者进行斗争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说，现在的意见是要任命一个新人担任部长，并且指名道姓，就是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萧洛科夫。勃列日涅夫高度评价了萧洛科夫一番，又建议季库诺夫留任全苏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季库诺夫不可能与总书记争论，便同意了。然而勃列日涅夫并不打算让一个谢列平的人留在内务部哪怕次要的职位上。

几个月过去了，季库诺夫却仍未收到委任书。他在部里无所事事，便一再给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去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家总是回答他：不要急，等一等，一切都会解决的。后来却突然提出要他担任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一职。这在如今已经是一个二级部门，季库诺夫拒绝了。他开始争取让总书记接见他。

勃列日涅夫最终接见了他，说再回内务部已经没有意思，建议他去苏共中央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部（出国干部部）工作。两年后季库诺夫奉派去罗马尼亚任公使衔参赞。职务虽然不高，但勃列日涅夫已重新接纳了这位前部长——给予了关注。勃列日涅夫总是按照一条原则行事：无论与谁都不作无谓的争吵。

季库诺夫非常明白是什么毁了他的前程，便在与总书记谈话时力图

辩白，说他与谢列平以及先前的共青团员们的关系并不带有政治的性质，他们只不过是朋友。他不能无缘无故与他们断绝关系。

勃列日涅夫什么也没有坚持。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后，季库诺夫被任命为大使——在上沃尔特，后来又在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实际上苏联对外政策对这些非洲小国并无兴趣，去那里工作无异于流放。而且这些国家气候恶劣。季库诺夫59岁即溘然而逝……

萧洛科夫担任部长长达16年——这对内务部而言乃是绝对纪录。

第6章 撤换克格勃主席

赫鲁晓夫退位后的全会上，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从苏共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人们祝贺他，羡慕他。然而实际上他已踏上了节节下降的阶梯。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谢米恰斯内共关照自己的下属——超过70名国家安全工作人员获得将军衔，数百名克格勃同仁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勃列日涅夫知道，与戴肩章的人必须处好关系，所以从不吝惜广为授勋。

于是包括克格勃主席本人，尽管从未在军队服役，也并不算预备役人员（因心脏病之故），也一律晋升为将军。

谢米恰斯内出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但从来不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派。

勃列日涅夫刚刚掌权即已开始考虑更换克格勃主席之事。谢米恰斯内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性，不想离开，尽管勃列日涅夫相当露骨地向他一再暗示，他必须腾出卢比扬卡的那把交椅。有一次勃列日涅夫给谢米恰斯内打电话说：

“沃洛佳。你是不是到了归入我们大队中的时候了？也许，你搬到中央委员会来？”

谢米恰斯内回答说：

“为时尚早。我在克格勃仅仅干了三年。我觉得，应当过一些时候再说。”

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重提这个建议，但已经让谢米恰斯内明白，问题即将成熟。

1967年，勃列日涅夫一举摆脱了三个他不喜欢的实力强大、独立不羁的人物。5月间他解除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职务，6月份他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免职，而9月里谢列平已不再担任中央书记。

大体上，谢列平的亲信们都接到过正在酝酿清洗行动的警告。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去找梅夏采夫，佯装领他外出游玩，到了大街上才关切地转告，昨晚他在与勃列日涅夫关系极为亲密的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的别墅里唱歌，偶然听到基里连科对一个人说：“我们要让这些年轻人统统滚蛋。”

尽管谢米恰斯内是克格勃主席，谢列平一帮人却遭到窃听。

“有人对我讲，除了听命于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那个窃听部门之外，还有一个对谢米恰斯内本人也进行窃听的特殊部门，”梅夏采夫对我说，“我将此事告诉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他不胜惊愕：‘这不可能！’而我则反复提醒他：完全可能……”

自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逐出政治领域，他们便处于国家安全机关的监视之中。两位克格勃前任主席知道，昔日的下属正在对他们进行窃听。

“我们只能出门来到大街上，在露天里交谈，”谢米恰斯内告诉我，“不想让旁人听见的谈话，我们尽量不在市内进行。我们明白，一切都已被监视并记录在案。为了刺探我们的思想，有时候他们还故意激怒我们……”

1967年3月7日，正当莫斯科准备隆重庆祝国际妇女节之际，身在印度的斯大林女儿思维特兰娜前往德里的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她当即被送往意大利，然后到瑞士，再从那里直接送到美国。

勃列日涅夫极为震怒，但细加思量之后，转念一想：有祸必有福。思维特兰娜的出逃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借口，足以用来摆脱他不愿意看到待在自己身边的那个人——克格勃主席。

勃列日涅夫有怀疑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忠诚的确实根据吗？

谢列斯特讲过，1966年12月5日他在捷尔诺波尔州。州国家安全局局长斯图帕克深夜到他那里求见。斯图帕克汇报了州里的形势，然后才转入他为之而来的主要话题。他告诉谢列斯特，克格勃中央机关的一大帮人来过州里。莫斯科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毫不避讳地谈论勃列日涅夫。按照这位州局局长的说法，“莫斯科人不喜欢勃列日涅夫，并不真正把他当作国务活动家。他们都说他是一个侥幸成功的人物，他掌握政权是宫廷政变的结果，因为支持他的都是一些容易轻信的人。无论聪明才智或组织才能他都并不出色，也不懂经济。他是个阴谋家和演员，但上不了大舞台，只能在外省的露天舞台上表演。有着如此个人品质的人竟然成为苏共中央首脑，只能让人感到惊奇……”

谢列斯特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不可能做出若无其事的模样。是什么阻碍那位斯图帕克直接去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谢列斯特企图隐瞒这一事件？自己为了此事去见勃列日涅夫同样危险：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可能会掉脑袋。

谢列斯特让州局局长将这一切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他自己则按习

惯找波德戈尔内商量。波德戈尔内回答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要注意——你可能被误解。”

尽管如此，谢列斯特还是判定，如果他将国家安全部门中央机关的倾向性汇报上去，无异于给新主人帮了大忙。波德戈尔内转告勃列日涅夫，说谢列斯特有话要两人单独交谈。

12月8日早晨，勃列日涅夫给谢列斯特来电话，要谢列斯特明天上午就到他那里去，而且说要派伊尔-18飞机去接谢列斯特，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彼得·叶菲莫维奇，你早点儿起飞，我们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之前见面并谈一谈，会议两点半开始。”勃列日涅夫说。

翌日12时30分谢列斯特来到老广场。一开始谢列斯特汇报共和国的情况，但勃列日涅夫听得漫不经心。

于是谢列斯特将话题转向最主要之点——转述与捷尔诺波尔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谈话，并转交了此人所写的报告。勃列日涅夫看完报告后神色慌张，双唇发紫。

他很关心还有谁知道此事。

谢列斯特回答说，除开波德戈尔内，谁都不知道，他向波德戈尔内也只是讲过事情的大概。

谢米恰斯内注定完蛋。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如果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们不知道部门领导人的倾向是这样，他们绝不会如此露骨地发表对总书记的意见。

1967年5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谢米恰斯内被撤销克格勃主席职务。谢列斯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描写了这个场面。

政治局会议之前，勃列日涅夫让谢列斯特去见他，说：

“你要注意，今天我们要解决关于解除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职务的问题。”

对谢列斯特而言，此乃出人意料之事：

“什么原因呢？”

勃列日涅夫想回避交谈：

“有很多理由，以后你都会知道的。我找你是想商量一下，把谢米恰斯内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好一些。我们不打算让他留在莫斯科。”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撤职呢，是什么原因？”谢列斯特又问了一遍。

勃列日涅夫几乎是恼怒地回答：

“我给你说过了，以后你会全都知道的。并不想让他太受委屈，也许，你能在乌克兰给找个什么职位？”

谢列斯特建议任命谢米恰斯内为州委第一书记，比如基洛夫格勒州。

勃列日涅夫略加思索：

“不，不想让他搞党务工作。还可能有些什么方案呢？”

于是谢列斯特提出给谢米恰斯内一个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位。

勃列日涅夫点点头：

“第一副主席。”

谢列斯特反对：

“已经有两名第一副主席了。”

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这不成其为障碍。你给中央委员会写个报告——我们让再补上一个第一副主席的职位就是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说：

“把谢米恰斯内叫来。”

谢米恰斯内并不了解因为什么问题叫他。他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宣布：

“现在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有关谢米恰斯内的问题了。”

“讨论什么问题呀？”谢米恰斯内问。

“有人建议解除您克格勃主席职务并调任其他工作，”勃列日涅夫回答。

“为什么呢？”谢米恰斯内感到吃惊，“谁也没有同我谈过这个话题，我连这样调动的原因都不清楚……”

勃列日涅夫以粗暴的喝斥应声作答：

“克格勃工作中的缺点很多，侦查和情报工作搞得很糟糕！……还有阿利卢耶娃是怎么回事？她为何能够跑到印度，又从哪里飞往美国？您就去乌克兰吧。”

“我在那里能干什么呢？”谢米恰斯内问。

谢列斯特回过头对他说：

“我们会在那里给您找到工作的。”

“彼得·叶菲莫维奇，怎么该由您给我找工作呢？”谢米恰斯内火了，“我登记在州的地方是莫斯科的党组织，并不是在您那里。为什么要您给我找工作？我是苏共中央委员，并不是乌克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不应当混淆这个界限。”

然而已经没有任何人听他的了，问题已经解决。当即便批准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为新任克格勃主席。

动身去乌克兰之前，谢米恰斯内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说他要走了。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争吵，关切地问道：

“您想到我这里来吗？您找我有什么问题？”

谢米恰斯内骄傲地回答：

“不，我没有什么问题要找您。”

勃列日涅夫受到了侮辱。

5月23日谢米恰斯内抵达基辅。据谢列斯特说，他大受震撼，心慌意乱。5月29日发布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任命谢米恰斯内为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命令。

谢米恰斯内的政治前途宣告结束，其时年仅43岁。其他人在这个年纪还站在奥林波斯山脚下，着迷地朝上张望呢。

当然，他并不相信一切都已终结、无可挽回，以为一切都将发生改变。然而通向莫斯科之路业已对他封闭，他已被无限期放逐。

谢米恰斯内在乌克兰政府中主管文化和体育。他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1973年毕业于基辅国立舍甫琴科大学夜校部历史系。

夏天，正与勃列日涅夫一道休养的政治局委员波德戈尔内从克里米亚给谢列斯特来电话，他想知道谢米恰斯内何时去何地休养。

“我明白了，”谢列斯特写道，“勃列日涅夫仍在密切注意谢米恰斯内。他担心谢米恰斯内与谢列平以及其他年轻干部交往。我并未发现谢米恰斯内有任何特别之处，他是个正直而坦诚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努力钻研他不太熟悉的业务。毫无疑问，他心情抑郁、恼怒，每当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时，他的身体便仿佛遭到高压电击，不难想象，如果能够办到，他会对勃列日涅夫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谢米恰斯内所有电话遭到窃听，乌克兰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一直跟踪他，将其一举一动向莫斯科报告。

在乌克兰共产党例行代表大会上，曾打算让这位前克格勃主席担任中央委员，按照职务他理所应当，莫斯科却表示不满。谢列斯特向勃列日涅夫解释说，谢米恰斯内应当入选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因为他毕竟是政府的第一副主席。

勃列日涅夫表示反对：“不错，他是第一副主席，但并不是所有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能当中央委员。”

时至深夜，已经在打印乌克兰共产党未来的中央委员名单了，最终还是删去了谢米恰斯内的名字。他是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唯一一位连代表都不让当的人，尽管按他的级别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谢米恰斯内认为在乌克兰的工作是个负担，请求为他物色一个合心的事情，然而却连连遭到拒绝，尽管勃列日涅夫对待他貌似充满善意。勃列日涅夫将谢米恰斯内撤销职务，清出政界，逐出莫斯科，但并未置之死地。

“勃列日涅夫来过乌克兰一两次，”谢米恰斯内回忆道，“有一次到来我记得很清楚。在机场上他忽然找到我，拥抱我，并且当众与我同行，他真是个演员。我们还彼此为对方讲笑话。整个基辅都谣传我要调回莫斯科了，然而这终归是谣传而已。”

谢米恰斯内发生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基辅的医院里卧床四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曾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三封信。契尔年科延揽了谢米恰斯

内，开始为他挑选工作。但他并未能重返政界。1981年谢米恰斯内被批准为全苏知识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第7章 莫斯科领导人换马

下一个被撤掉的人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这是党内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起初勃列日涅夫颇为赏识这位莫斯科书记，视其为可靠支柱。他在全会上作报告后，晚上打电话：

“喂，科利亚，我的讲话怎么样？”

叶戈雷切夫中规中矩地回答：

“报告精彩极了，分析得很透彻。”

“也许，你明天也发个言？”

“我准备发言。”

后来关系搞坏了。

叶戈雷切夫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莫斯科有些小道消息开始流传。中央主席团会议刚刚开过，满城就已经在谈论它的决议和所讨论的问题。有一天叶戈雷切夫去看望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抱怨说：

“尼古拉，我们怎么也不明白，是哪里走漏了消息。你交给手下的人去办吧，也许，他们能查出来。”

叶戈雷切夫找来莫斯科市兼莫斯科州的克格勃局长，转告了他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要求对方查一查。

大约一星期之后，那位局长垂头丧气地来见叶戈雷切夫：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真糟糕！”

“怎么了？”

“我们找到那个源头了。旅馆里的一名房间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闲着没事，就散布了一整套消息。”

“她从哪里知道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不分昼夜都能出入这个家庭。”

叶戈雷切夫去见勃列日涅夫，说：

“查到了！”

“是谁呀？”

“把那个女的从您家里赶走吧。”

勃列日涅夫满脸飞红，无言以对。叶戈雷切夫并不追问他们究系何种关系，只是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经下令把这些材料烧掉了。不过您还是将她赶走吧……”

1966年12月，正在筹备为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军20周年举行庆祝晚会。各英雄城市的代表应邀前来首都。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给叶戈雷切夫打电话。他有所不满：

“为什么新罗西斯克的人一个也没有邀请？”

“那并不是英雄城市。”叶戈雷切夫回答。

“可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在那里战斗过呀！”卡皮托诺夫意味深长地说。

“好吧！我们这就邀请。”叶戈雷切夫同意。

“还应当让他们发言。”卡皮托诺夫再坚持。

“不，这不行。”

“可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在那里战斗过呀！”卡皮托诺夫更加坚定不移地说。

“要是我们这样做，我们只会伤害列昂尼德·伊里奇。”

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朱可夫元帅出席，受到热烈鼓掌欢呼。

《真理报》当时是国内的主要报纸，本来打算广泛报道这一事件，为叶戈雷切夫的讲话预留了整整一个专栏，可是发表出来的却只是短短一段文字。原来，勃列日涅夫对叶戈雷切夫感到不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字在报告中仅仅提到了一次。

“正值莫斯科兴盛时期我却离职这件事，即便对于那些与我最为亲近的人也出乎意料，”叶戈雷切夫说，“不过我对此早有准备。我一直瞒着他们所有的人，所以他们以为我和勃列日涅夫私交很好。然而事情要复

杂得多。勃列日涅夫大概认为我在觊觎他的位子。这纯属子虚乌有。原来，我在莫斯科享有很高的威望。1966年的党代表会议上经过秘密投票，我以全体一致通过的结果当选。这样的情况可是前所未有，以往总有几票反对。”

撤掉叶戈雷切夫的借口是1967年6月找到的。中东六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色列数日之内彻底击败了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阿拉伯军队的失败令苏联领导人心情沉重，军事官员大为震惊。

1967年6月20日，中央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个问题——“关于针对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行动的苏联政策”，勃列日涅夫作了长篇报告。午餐后按照事先确定的名单开始发言。一切进行顺利，直到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讲话。

六日战争之前两个月，他曾率领党的代表团出访埃及。

“在埃及，当时有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激动，”叶戈雷切夫回忆说，“回国之后，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其中写到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分析研究埃及所发生的事件。我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答应会面，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想听取我的意见。”

叶戈雷切夫的一名助手读过他将要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原文之后，试图让他警醒：您值得作这样尖锐的发言吗？因为明明知道，何人会感到受辱并力图采取何种行动进行回击……叶戈雷切夫感到诧异。

“我反对赫鲁晓夫都不害怕，难道现在倒缺乏勇气了吗？！”

叶戈雷切夫属于1964年秋曾帮助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那批人。人们都预言他前程远大，认为他马上就会被选为中央书记，跻身政治局。然而叶戈雷切夫过于独立不羁，常常批评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坚持自己的观点，总之，不合时宜。勃列日涅夫有一次顺便去看望在老广场另一个大厅里面办公的叶戈雷切夫，发现其办公室内并未挂他的肖像。

当年也是党务工作者的叶戈雷切夫的妻子回忆道：

“全会前他让我看他准备在会上发表的讲话文本，以往他从来不曾这样做过，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因为作为发言，应当十分认真负责，切中要害。

他批评中央委员会很少关注莫斯科的防卫状况，此外，还提出了民族问题。在他的发言中，这个问题谈得非常全面和尖锐，他指出各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日益增长，也触及了犹太问题，说我国的犹太人正在被

消灭。”

妻子劝告叶戈雷切夫：

“应当让发言变得委婉一些，现在谁也不会这样讲话的。”

“我还是要按照所准备的那样讲。”他回答说。

首都市委书记在中央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我想表达一个愿望，希望我们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纳赛尔总统本人的关系中多一些严格要求。比如，纳赛尔总统曾不负责任地声称，阿拉伯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意以色列的存在，开罗广播电台在战争的头一天便宣称‘埃及人民终于要给以色列上死亡的一课了’，这些话所付出的是何等巨大的代价。”

叶戈雷切夫还谈到，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空军的明显优势，引发了一个莫斯科防空和防导弹能力的可靠程度的问题。我国首都对可能敌人的空军和导弹的防卫是否很充分？

“同样明显的是，”叶戈雷切夫提醒说，“国防部门所作的武断决策，对武装力量，尤其是对空军、海军，一定程度上也对摩托机械化部队，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同志们，请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谁也不想冒犯，也没有暗示任何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行为负有高度的个人责任……”

将军们一再保证，莫斯科的空防是可靠的。叶戈雷切夫认为，军方是在粉饰实际状况：

“已经到了在全会上听取国防状况报告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作为莫斯科防空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就很担心首都空防不够可靠。现存的系统日益无形老化，已经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应将其现代化，建立新的首都防空系统之事又拖延得太久。”

在叶戈雷切夫发言期间，大厅里鸦雀无声。讲完之后，全会成员们报以阵阵掌声。谁也不能想象，莫斯科书记会自己主动地作如此尖锐的发言。大家都深信，讲话已得到勃列日涅夫的首肯。全会第二天许多人都兴高采烈地说：

“多么精彩的发言啊！问题提得多么大胆！思想多么深刻！”

晚上人们纷纷往家中给叶戈雷切夫打电话，向他祝贺。第二天他来到会场上，却感到对他的态度业已改变。有人对中央委员们做了一整宿的开导工作。

“从我所说的关于武断决策给武装力量造成不小损失的这句话里，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明白这一批评是针对他们的，”叶戈雷切夫回忆说，“中央书记乌斯季诺夫认为，我所提到的赫鲁晓夫军备思想‘过度热心的执行者’是指他而言。我的发言中本来点了他的名字，但在最后一刻我又将其删去了。我想，即便这样，讲的是谁已经一清二楚。”

后来国防部门一位部长讲过，在我发言之后，乌斯季诺夫召集他们全体开会。这位部长说：“特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简直是气急败坏！他还大喊大叫：‘我们要让这个叶戈雷切夫粉身碎骨！’”

乌斯季诺夫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视作人身攻击。他是个爱发号施令、自尊心过强的人，不能容忍干预他自身的事务。长久以来无人敢于质疑他的所作所为，而现在不仅叶戈雷切夫，而且其他一些人也竟然斗胆发表关于国防工业状况的意见。

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也批评苏联的中东政策、国防部和苏联军事侦察部门的作为：

“我们给大批国家提供武器援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偿的。然而无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种援助都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吗？如果依据阿拉伯人使用我国武器的情况来判断，那么，简直可以说是十分糟糕。遗憾的是，我国军事院校为阿拉伯国家军队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官，结果他们却没有能力反击侵略和正确使用武器。令人遗憾的事当然还有，在阿拉伯国家待了多年的富有战斗经验的我国军官和将军，却未能做到影响事件的进程，也未及时向政治局报告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实际情况。看来，侦查总局的工作搞得很糟糕……”

干部人事后果迅即显现。托尔斯季科夫被发落到中国当大使，又从那里调往荷兰，然后退休。

恼羞成怒的乌斯季诺夫跑去找勃列日涅夫。他向勃列日涅夫进谗言，说叶戈雷切夫插手不属于自己的事务，完全是蓄意破坏身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的总书记的威信。也许，这个叶戈雷切夫自家希望当总书记？

莫斯科领导人的发言根本不是针对勃列日涅夫的，相反，他还指望得到总书记的支持。然而他建议在全会上讨论连对中央委员也保密的国防和外交事务，却被说成对勃列日涅夫的不信任，是企图要求他作出解释。外交和国防政策——这是总书记特有的权力，其他人都应该听命和执行。

“快速反应小组”中可信赖的书记们得到了反击叶戈雷切夫的指示。上午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获准发

言。他积极响应打压莫斯科书记的号召，以指责的口吻对叶戈雷切夫说：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首都的对空防御并不是在莫斯科才开始的，而是从塔什干就开始了。军队和防空的状况都处于高水平。诚然，我们并不是什么全都知道，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说明，党和政府已竭尽所能，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变得不可战胜。”

“我坐在那里心想，”叶戈雷切夫回忆道，“1941年敌人出现在莫斯科大门口的时候，防卫莫斯科的全部责任便落到了莫斯科人的肩上。当然，全国都支持我们，但终究是我和自己的同志们，而非拉希多夫，蹲在横跨运河的大桥旁的战壕里，紧握手榴弹和燃烧瓶，等待着德军的坦克。”

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重复拉希多夫的那一套说词：

“我多少了解一些国防的情况，其中包括莫斯科的空防工作状况……如果我什么都不了解，听到莫斯科的空防工作状况竟然如此，我会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尴尬……然而我知道，莫斯科的空防并不是从紧靠莫斯科城的地方开始，而是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直接从苏联边境开始实施的……”

仕途刚刚起步的年轻的高尔基州第一书记卡图舍夫，已经是在谴责叶戈雷切夫了：

“当叶戈雷切夫同志谈论莫斯科空防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他发言的口气。我认为他是完全错误的。我知道，布设在作为莫斯科近距离要冲的我们州和其他相邻各州的武器，全都十分精良，性能多样，并且掌握在可靠的富有经验的人手中，完全有能力击退任何进攻的尝试。”

卡图舍夫迅即获得高升——翌年他被调入莫斯科，成为最年轻的中央书记。

另外还有一个被动员起来与叶戈雷切夫作斗争的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佐洛图欣，他大致是说，中央委员无须过问如此严肃的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

“我觉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我国武装力量的状况根本就不合适，因为这是我国的最高利益，当然属于秘密。知道这些秘密的人越少，就对秘密本身越好。”

善于讨好领导——这是向上爬最为可靠的方法。佐洛图欣事后也获

得提升，被调往莫斯科担任粮食储备部长。

“不管叶戈雷切夫同志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败坏了国防的声誉，诋毁了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勃列日涅夫作了总结，“叶戈雷切夫说：‘应当以最审慎的方式反反复复进行估量，我们是否已做好随时击退侵略者突袭的准备’。这并不是可以辩论的话题。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击退任何敌人的任何一次袭击。看来，是脱离生活酿成了叶戈雷切夫同志的错误，这一错误导致他轻率地开口谈论国家的防务。同志们，我就不进一步阐述这一话题了。”

质疑苏联在中东的对外政策的尝试被打压了下去。为了对那些反美口号和对苏联领导人的甜言蜜语表示谢意，莫斯科向阿拉伯世界供应武器，提供贷款，派遣大批顾问和专家……

6月22日，叶戈雷切夫去见勃列日涅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认为，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已经无法领导莫斯科市的党组织。我只有在得到政治局和总书记完全信任和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领导。而根据我的理解，这种信任并不存在，所以我应当隐退……”

6月24日，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莫斯科市委举行了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会上叶戈雷切夫受到严厉批评。叶戈雷切夫提拔的一向对他大唱赞歌的鲍曼区委第一书记沃罗宁娜尤其卖力……

勃列日涅夫分别给政治局委员们打电话：

“莫斯科市党组织需要加强，叶戈雷切夫必须撤换……”

格里申成为莫斯科的新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苏共中央，”格里申回忆道，“总书记想了解工会的工作情况。我详细说明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从事的工作，工会组织负责解决些什么问题。

“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让我改做莫斯科市党委的工作。6月27日召开全会。市委第二书记帕夫洛夫讲话。人家已经向他说明他应该讲些什么。

“叶戈雷切夫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所发表的某些论点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毫无事实根据，而在全会上提出这些论点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会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失……许多同志发表意见认为，因此之故叶戈雷切夫同志已失去他们的尊敬和信任，丧失了担任首都党组织市委第

一书记职务的党的领导人必须具备的崇高威望……莫斯科市委注意到，他并没有在委员会上讨论过自己的发言，因此他所发表的不正确的政治论点并不反映市委的看法……莫斯科市委得出结论，叶戈雷切夫不能继续担任第一书记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全会的参加者却一直不知道，叶戈雷切夫究竟讲了些什么犯上作乱的话。他的讲话成了日后数十年间的秘密。苏斯洛夫前来参加全会，目的在于凭自己的威望“阐明”干部的变动。他没有用讲稿，说起话来有些笨嘴拙舌，首先是安慰莫斯科的领导人：

“莫斯科党组织一向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要支柱和基本支柱……因此我们决定为中央自身作出牺牲。当然我们所提出的候选人是我们和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所必不可少的。但考虑到莫斯科组织的重要作用，我们决定满足具体候选人方面的请求，建议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同志担任第一书记。”

对格里申没有提出问题，于是一致批准对他的任命。

格里申较叶戈雷切夫年长，更为老练，因而稳居这一职位长达十一年半。格里申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不以任何事情让总书记难过，为此他颇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格里申许诺，要将莫斯科变成共产主义的模范城市。在这个口号下，莫斯科党的机关被排除出批评的范围，甚至建议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要直接给莫斯科各区委打电话，因为它们归一位政治局委员领导。当市里得知有一家报纸正在准备涉及首都的批评材料时，尽管是极小的一个事由，格里申也给主编打了电话，于是文章胎死腹中……1977年2月，“俄罗斯”饭店爆发一场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当时和现在人们都说，那是有人纵火。不过很快即已查明，实乃无线电广播站值班员违规使用电烙铁所致。然而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不许报道这一情况。倒是关于纵火的说法很合他的心意。

勃列日涅夫带上格里申前往波兰出席波兰共产党人的代表大会。

“华沙之行我们往返均乘火车。列昂尼德·伊里奇邀我到他的车厢里共进早餐和午餐。他讲述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讲述母亲和父亲。他喜欢简单的饮食：早餐是撒上盐的炸土豆，用向日葵籽油煎过的豆沙包子，午餐则是乌克兰红甜菜汤，那是他小时候母亲敬客的菜肴。

有一次他对我说：‘维克多，你物色一个在市党委里代替自己的人吧，你改为去苏共中央工作。’

我说，我在市委工作的时间还很短，物色替代的人需要不少时间，

总之，我还是应该再干一干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工作。”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格里申这样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仍然让普罗梅斯洛夫一直担任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职务。格里申与普罗梅斯洛夫之间的关系很糟糕。格里申指责这位主要经济管理人的地方在于，此人很少干实事，太喜欢出国。而普罗梅斯洛夫对格里申则无可奈何。首都领导人中的两个一把手彼此难以容忍对方，这倒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

经常都有人找普罗梅斯洛夫，求他提供住宅、别墅或车库。由于到他办公室来的全是社会名流，普罗梅斯洛夫就尽量对谁也不加拒绝。不过他在那些申请书上的批语是用不同的钢笔写的，因而他的下属们便能准确了解这位上司的意愿究竟是什么：真正帮忙抑或客客气气地将问题踢成皮球。

权贵们都得到了他们所索取的东西，因此普罗梅斯洛夫有许多靠山。勃列日涅夫本人如果想慷慨施恩，比如赏赐给谁一套住宅，他宁肯直接找普罗梅斯洛夫，而不是通过格里申。

仿佛有意侮弄人似的，失宠的叶戈雷切夫被任命为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对许多人而言，丢掉高官无异于灾难。叶戈雷切夫则相反，他异常积极地投入工作，结果又很快被打发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丹麦当大使。临行前勃列日涅夫接见他。勃列日涅夫摆出温和宽厚的态度说道：你干上一两年，积累了经验，我们就会把你调到一个更大的首都……然而叶戈雷切夫却一直被搁置在丹麦。对某些人而言，待在一个舒适宜人的欧洲国家，过着安逸悠闲的生活，无异于命运赏赐的厚礼。而叶戈雷切夫却急于回国，可是他业已成为无法入境的大使。

莫斯科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纷纷被撤职。操办其事的是反间谍总局局长齐涅夫将军，此人乃是勃列日涅夫最亲密的心腹，特意安插在国家安全机关的人。齐涅夫对首都安全局副局长、到克格勃任职前做过叶戈雷切夫助手的科托夫上校大声呵斥：

“你们的叶戈雷切夫怎么了，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他的发言就是一个试探气球，是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攻击！你们想要干什么？想搞一场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政治阴谋吗？”

他们让科托夫上校选择：要么去马加丹任局长，要么出国。

“对您没有什么不满，”克格勃干部总局局长切勃里科夫解释说，“不过也应当换换人了。”

第8章 罢黜谢列平

勃列日涅夫为人狡诈、顽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他并不急于求成。他常常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悄无声息，不引人注目地清除掉他不喜欢或者认为危险的人。他为保住权力持续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日。

最后，勃列日涅夫将谢列平也逐出了党的机关。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联邦大型畜牧综合体的问题。谢列平谈到农村的困苦状况，要求让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下台。

次日，勃列日涅夫将谢列平叫到他那里：

“怎么理解你昨天的发言呢？你的话针对的是我！”

“为什么您会这样认为呀？”

“怎么，你不知道农业是我监管的吗？可见，你昨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和我作对。你有什么权利提出将马茨凯维奇撤职的建议？要知道，这是我亲自任命的干部！”

格里申调往市委后，工会领导人的职位一直空缺，于是出现了决定谢列平命运的方便机会。他出席政治局例会时，勃列日涅夫将他叫到自己那里。苏斯洛夫已经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总书记办公室内。勃列日涅夫觉得，和谢列平进行如此复杂的谈话，与其单独面对，不如依仗党的“主要思想家”的威望更好。

“你是知道的，我们必须加强工会，”勃列日涅夫说，“有人建议解除你的中央书记职务，调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担当主席的工作，你认为如何？”

谢列平回答说，他对工作从不挑三拣四，无论干什么都不曾推辞过。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和整个谈话期间一直坐着默不作声的苏斯洛夫，来到政治局委员们已经齐集的另一个房间。勃列日涅夫宣布，他和苏斯洛夫建议将谢列平调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其政治局委员身份予以保留，以便提高工会的威信。

1967年9月26日，苏共中央解除了谢列平这位光杆司令的中央书记的职务。

不过，即便担任工会首脑的角色，精力充沛、广受欢迎的谢列平仍

然让勃列日涅夫感到不舒服。

“谢列平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开始到处走访工厂，与工人们交往，”扎米亚京讲述道，“风气为之一变，人们可以随便去找他，他一定加以接待，倾听意见，提供帮助……然而谢列平已经很难工作。自他调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之后，一举一动都感到受人排挤。”

“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期间所提出的建议，或被束之高阁，或被避而不答，”谢米恰斯内讲述道，“谢列平面对自己的积极分子们，陷入了傻里傻气的境地：他干劲十足地采取行动，他的各种设想却连连落空。”

勃列日涅夫依然将谢列平视作对头。

与谢列平密切接触已成为危险的事。一度设想在工会的帮助下为塔斯社工作人员建设一座疗养院，塔斯社总经理扎米亚京与谢列平就这一想法进行了磋商。

扎米亚京突然被紧急召往巴尔维哈去见勃列日涅夫。警卫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在湖边散步。”

扎米亚京前去找他。勃列日涅夫正同一些人溜达，看见扎米亚京后，便将其领到旁边一个谁也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地方。

“要不是我两个月前才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我今天就会撤了你。”勃列日涅夫说。

“我有什么过错呀？”扎米亚京不胜惊讶。

“你到工会谢列平那儿去过？”

“是的，我希望加快疗养院的建设速度。”

“可是你还同他吃饭了？”

“是他请的我。”

“你们谈论政治了吗？说老实话。”

扎米亚京自己也明白，弄虚耍滑毫无意义：谢列平的办公室也好，他的休息室也好，他们吃饭的餐厅也好，肯定都遭到了窃听。

“一句也没谈，”扎米亚京发誓说，“只提到社会上的情况。”

总书记向扎米亚京直言相告："谢列平身边的思想家，我们已经统统打发到了国外或者其他地方。现在他正在寻找思想战线上的新人，组建新的团队，所以请你吃饭并非偶然。你发现了吗，他并不肯亮出自己的思想，我很不喜欢这点。我们要同这种情况一刀两断。也许是我不对，没有提醒你，但我也没能料到你这么快就去找谢列平……"

1975年，以谢列平为团长的工会代表团出访英国。他受到的迎接十分糟糕：尽是示威和抗议。人家还对他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聚众起哄。对英国人而言，他仍然是当年的克格勃主席，是他下令杀害苏维埃政权在国外的反对者。

而且事前即已知道，谢列平不宜前往伦敦，英国工会领导人建议苏联大使另行派人。然而不知何故，莫斯科却对这些警告不以为意。

英国工会大楼近旁聚集着抗议的人群。据《消息报》通讯社伦敦办事处原工作人员多勃金称，不得不将谢列平从后门接走。人群大概把走出轿车车厢的大使馆司机当作了谢列平，纷纷向他投掷鸡蛋和牛奶袋。

在记者招待会上，谢列平认为有必要发表礼仪性的讲话，不过不是针对英国记者，而是针对苏联记者：

"同志们，我衷心地感到幸福的是，我能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工作，他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争取世界和平的孜孜不懈的战士……"

然而这一切已经没有意义，他的命运业已注定。失败的伦敦之行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正好成为将谢列平革出政治局的求之不得的把柄。他们二人进行了一次生硬的谈话。

谢列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退位好了。"

"那你就退吧。"

谢列平当场写了申请。勃列日涅夫立即给政治局全体委员打电话，数小时后便通过了决议。让谢列平退休为时尚早，于是给他找了一个低得丢人的职务——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委员会分管的是为青年们开设的生产技术学校。

这项任务当然是一种侮弄人的做法。当苏斯洛夫请来谢列平并宣布为他提供这一职务时，谢列平回答说：

"我手里从来没有握过鎯头，更不必说干什么更为重要的活儿。让我怎么去培养未来的工人阶级呢？"

在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工作的，还有一个共青团出身的人——撒尤舍夫。他是第一副手，曾经对我讲过，当谢列平被调到该委员会时，苏斯洛夫召见主席布尔加科夫，向其清楚地交代：对谢列平必须彻底加以孤立，只可给他分配无关紧要的工作，并且要注意，不让他有任何对外联系。

布尔加科夫曾任哈尔科夫州第一书记，随后又当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他从苏斯洛夫那里回来之后，便召集各位副主席，向他们传达全部谈话的内容。他感到骄傲——他被委以对脱离人民的前政治局委员进行再教育的重任……

让谢列平分管生产技术学校课本的工作。最让他吃惊和愤怒的是如今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官员不遵守诺言的行为。他已经习惯了他的命令立即得到执行。而这里的官员们却对他的话公然进行抵制：既然谢列平已经失宠，干吗要急忙执行他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为人狡诈、顽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决不罢休。但他并不急于求成，他常常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悄无声息，不引人注目地清除掉他不喜欢或者认为危险的人。他为保住权力持续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日。

勃列日涅夫外表上始终善气迎人，却狡猾地瓦解了谢列平的团队。谢列平的三四十名亲信被发落到四面八方，大部分派往一些无足轻重的国家工作。

谢列平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被解散，因为其工作人员之中共青团员为数众多。

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梅夏采夫曾对人谈起过基里连科，说此公身边总是放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他闲得无聊时就自己和自己玩他所迷恋的一种游戏。立即有人将此话向基里连科告密。梅夏采夫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差回来，在机场上人家就告诉他：刚刚解除了您的职务。他被打发去澳大利亚当大使。

谢列平小学时的朋友哈拉佐夫是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所有的共青团员都被撤职，”他讲述道，“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了。人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行。’我从童年起就和他关系亲密，你们想要让我抛弃这种友情吗？’‘那样结果就会更糟。’我说：‘糟就让它糟好了，但我决不中断和谢列平的友谊’。……”

哈拉佐夫在党内的前程亦已完结，他被调往俄罗斯联邦人民监察委员会。

第9章 基辅大换血

勃列日涅夫将希望寄托于克格勃，视其为获取全面情报和巩固自己党内个人威望的工具……一切都有人监视，一切都有人汇报。

1972年春，勃列日涅夫巧妙地撤掉了谢列斯特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很可能，一切都是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乌克兰之行开始的。安德罗波夫是个典型的办公室干部，很少离开莫斯科。正式的说法，他是来参加共和国的克格勃会议的，实际上却是为了摸清共和国第一书记的底细。他与谢列斯特在城外会晤，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会谈。

“安德罗波夫来此显然带有摸清我在党代会之前思想和立场的任务。”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我坦率地讲出了我的想法，其中包括中央的领导方法的缺点。关于勃列日涅夫，我说必须尽可能支持他，但不应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漫无目的的空谈，像赶集似的吵吵嚷嚷。必须将已经着手的事情进行到底。也许，我说得太尖锐了，但却是事实。我觉得，同安德罗波夫的交谈对我而言绝不会毫无后果。”

谢列斯特没有猜错。安德罗波夫摸清了谢列斯特的弱点。看来，谢列斯特比其他的基辅政治家更为热爱乌克兰和乌克兰语。有一次他去一个州，注意到一条口号“提前一个月完成工程项目”，便不满地指出：“口号用俄语写，可这里干活的显然全是乌克兰人。”

共青团书记们，即便是在克里米亚，都奉命只能用乌克兰语发言。不过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许多身居高位的乌克兰人并未掌握本族语言。乌克兰共和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克利缅科是职业党务干部，他有一次来到罗韦尼基州，州里的积极分子被召集到一个剧院里，听取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话。

“从第一句话开始就显而易见，”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大概是平生头一遭用乌克兰语念东西。许多词语都乱读一气，让人很难听懂讲的是什么。会场里乱哄哄地吵成一片。”

1965年夏，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都接到指示，必须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改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莫斯科对此类举动心怀戒备，认为这就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表现。

卡普托在谢列斯特时期领导乌克兰共青团，到谢尔比茨基主政时则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据他的说法，有“两个谢列斯特”。一个是强硬手段的拥护者，与“资产阶级影响”针锋相对的斗士。另一个则是

鲜明表现出乌克兰自我意识的易动感情的人。他希望能拍摄一部描写塔拉斯·布尔巴的影片，在其中展现真正的乌克兰性格，显示乌克兰心灵的深度。他吩咐党中央机关安排邦达尔丘克迁居基辅，让他在多夫任科电影制片厂投拍这部影片。

谢列斯特依靠的是乌克兰知识界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常常怀着痛苦谈起本民族的遭遇，并将罪责归之于俄罗斯。

“斯大林式的巨大暴力使乌克兰趋于灭亡，”著名作家冈察尔在日记中写道，“就命运之悲惨程度而言，我们的民族是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民族天才——舍甫琴科、果戈理、斯思科沃罗达，全都终生终世无家可归……但斯大林式统治更以其种种惨祸、国家暴虐狂而超过一切。种族灭绝摧毁了整个民族最为活跃、最富才华的力量。我们犯下了什么罪孽，才落得如此悲惨的命运啊？”

1967年4月底，正在雅尔塔休养的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与谢列斯特通电话。这个城市及其领导人给波利扬斯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他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为什么乌克兰商业部下令克里米亚的全部商业网点都要将俄语名称改为乌克兰语？”

实际上，该市的招牌使用的是两种语言——既有俄语，也有乌克兰语，但乌克兰语招牌的存在令波利扬斯基感到惊奇。谢列斯特在日记中提到波利扬斯基的这番话时指出：这是沙文主义心态，除了危害，不会带来别的什么。

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另有一次，在政治局讨论安德罗波夫的报告时，提出了谢列斯特的路线问题。克格勃主席报告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情况，他们反对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要求独立。

勃列日涅夫责备说：“我几乎每天都和彼得·叶菲莫维奇在电话上进行交流，我们谈香肠、小麦，谈土壤改良……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文件，他和乌克兰共产党六年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但基辅的任何人连一次也没有和我谈起过此事，一直只字不提。对彼得·叶菲莫维奇而言，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1970年谢列斯特出版了一本书《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莫斯科注意到关于当年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摧毁的扎波罗日营地的民主性质的一段论述。这被解释为反俄罗斯的攻讦，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纵容。连波德戈尔内都表示困惑不解：“在这种形势下，不应当这样做。”

该书被译成俄文用作公务参考，分发给各位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向谢列斯特提出警告：“您的这些扎波罗日哥萨克，都是旧时代的残渣余

孽！”

谢列斯特不加思索便强硬地回答道：

“要是没有哥萨克，现在也就不会有你了——正是哥萨克用胸膛捍卫国家边境，击退了游牧部落，击退了土耳其人！沙皇们也都利用哥萨克来保卫祖国。我们在他们面前应当低头致敬，而您却在这儿说这样的话，真令人生气……”

谢列斯特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斯卡巴撤职，那是一个过于严厉的官员，改而任命奥夫恰连科担任该职。此人与杰米契夫一样，也是一位化学家，奥夫恰连科很早便走上了党务工作道路——担任共和国科学院党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科学与文化部部长。这有助于他成为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后来又成为院士。

奥夫恰连科任命批准之前，在莫斯科接见他的有中央主管干部的卡皮托诺夫、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杰米契夫，随后则是苏斯洛夫本人。苏斯洛夫不惜耗费时间，为的是摸清谢列斯特提拔之人的底细。苏斯洛夫特别感兴趣的是此人与乌克兰知识界的关系。作为临别赠言他着重强调，奥夫恰连科的主要任务是与民族主义作斗争。勃列日涅夫也谈到了这点，他同样与这位乌克兰中央新书记作了长时间交谈，同样提醒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危险……

然而基辅所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不要让乌克兰的权利受到限制。奥夫恰连科在工作日记中说明：

“苏联和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的关系不正常。有人力图贬低我们的人（将他们称为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克格勃间谍头子则将他们叫做班杰拉分子）……”

党的二十四大前夕的1971年3月，谢列斯特晋见勃列日涅夫，汇报干部情况。勃列日涅夫对顿涅茨克州委第一书记杰格加廖夫产生了兴趣。

“我们对他抱有一定的期望。”然后又仿佛玩笑似地说：“不，还是让他留在乌克兰吧，哪怕有一个第一书记是俄罗斯人也好。”

由于这次谈话的结果，杰格佳廖夫一直在顿涅茨克工作达30年之久。他1944年来到顿巴斯参加煤矿的恢复工作，曾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相当年轻就当上了州委书记。而在有人需要他的那把交椅之时，他便被“提拔”到共和国国家矿业技术监督局局长这一毫无分量的职位，然后悄无声息地奉命退休。

关于对待干部的态度问题，谢列斯特胸有成竹地予以回应和反击。

“乌克兰有70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因为民族关系而另眼看待，特别是对共产党员。至于俄罗斯人，则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占到40%，州委第一书记中业已六人。而共和国的行政领导人之中，俄罗斯人更达58%。民族问题常常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是腐朽的知识分子和过分‘思想先进’的活动家的问题，普通劳动人民并无这种感觉，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息事宁人地说：

“我只不过是说要注意民族问题罢了。”

有些人一直十分警惕地监视着乌克兰。1971年9月28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利沃夫州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围绕这个决议，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政治阴谋。

决议中对乌克兰的局势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批评党的机关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苏共中央决议十分严厉，以致不便将其公之于众。本来针对的是谢列斯特，他的利沃夫下属也跟着倒霉：

“州委和市委长期以来容忍各种错误倾向，对思想上有害的作品不组织进行公开批判，也不揭露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的真实面目，他们都是乌克兰人民不可调和的敌人，一贯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

利沃夫州第一书记库采沃尔丢掉自己的职位，他的空缺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多勃里克填补。多勃里克明白，人家希望他采取强硬的立场。在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多勃里克义愤填膺地声称：

“我们都看了影片《一只有黑斑的白鸟》。我不知道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作何感想，

但我们州的代表认为，这部影片除了危害，一无是处，特别是对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劳动者而言。”

导演伊利延科的影片《一只有黑斑的白鸟》于1971年上映。它描写的是喀尔巴阡农民在战争转折时期和战后年代的命运，当时一些人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另一些人则逃入深林，与莫斯科方面展开厮杀。斯图普卡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班杰拉分子兹沃纳里。

1972年3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直持续到很晚。安

德罗波夫发言，谈到敌人的宣传、阶级和思想斗争的激化、境外不良信息的渗透和非法出版物的传播等情况。

谢列斯特建议限制外国旅游者入境、国际电话自由通话和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苏斯洛夫意味深长地指出：

“原先都谈我国已经没有政治犯了，这麻痹了克格勃的警惕性。必须对我们的敌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

波德戈尔内对安德罗波夫缺乏好感，不希望扩大他的权力：

“我不支持关于增加人员尤其是加大克格勃获取政治情报的权力的建议。意识形态战线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管。”

勃列日涅夫顺势指出，谢列斯特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歌颂哥萨克，宣扬不合时宜的旧时代的东西。“据说，乌克兰西部的一些地方，班杰拉分子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扬眉吐气，人数已多达五万之众。”

索洛缅采夫反对一些城市设立城徽、开展名胜古迹旅游。他也发表了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共和国内的许多招牌和通告都使用乌克兰语，它比俄语好在什么地方？只会歪曲俄语。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马舍洛夫说：“恢复和歌颂旧事物，这不是我们的精神。”

乌克兰政府首脑谢尔比茨基以自我批评的口吻指出：“我们本身在共和国内对待干部提拔的态度就不够谨慎，通常都采取依靠乌克兰人的方针。”

柯西金一如既往地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当时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的艺术、戏剧、电影中，许多东西都严重背离我们的思想体系。在回忆录作品尤其是战争回忆录中，很少阐明党的作用和它的组织力量。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乌克兰的中小学里要学习乌克兰语？舍甫琴科的作品在一些地方被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

勃列日涅夫作了总结：“问题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安德罗波夫所提供的情报范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与敌对分子斗争的整个工作。苏共中央党的机关方面的情报工作很薄弱。谢列斯特同志向苏共提供消息不充分，这也是事实。他对一些具有政治性质的事件无动于衷，没有出于这方面的原因给我们打过电话。共和国领导层的政治责任感有些迟

钝，要有警惕性，更高的警惕性。”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撤换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1970年7月16日任命费奥多尔丘克将军为共和国克格勃的新主席，此人系军事间谍出身，得到齐涅夫将军的提拔。

谢米恰斯内曾经讲述过：“我认为，将他派到基辅，目的在于排挤掉谢列斯特。这是主要任务，为的是替谢尔比茨基腾出位子。我尊敬谢尔比茨基，他的文化教养高于谢列斯特，但对提拔他起了作用的却是因为他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乌克兰前任克格勃主席尼基琴科坚决拒绝离开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亲自劝说准备经由基辅前往欧洲某地的尼基琴科，”谢米恰斯内回忆说，“在基辅，与向来的规矩一样，乌克兰的政治局成员前往迎接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将所有人撇到一边，与尼基琴科一起在月台上漫步达20分钟之久——说服他迁居莫斯科。”

费奥多尔丘克现身基辅让谢列斯特很不高兴。

“我从这一人事变动中看不出什么好处，”他在日记中记道，“安德罗波夫给我来电话，他不知为何极不放心，所有这一切都绝非无缘无故，此次人事更替中一定隐藏着什么花招。”

与费奥多尔丘克的首次长谈，在他抵达基辅整整两个月之后方才进行。

“接见费奥多尔丘克，”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他开始从事对他而言非同寻常的工作：越权行事，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行使监督功能。早晨上班时他给部长们打电话，核查他们是否已上班，还检查部长们如何安排学习，所学的课题是什么……

“我开诚布公地向费奥多尔丘克讲明了一切，说他不值得插手一些事情，那都与他无关。应当工作，而不是对前人吹毛求疵。十分明显，他对这样的谈话感到不悦。我认为并且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自己的行动——他不是这样的‘英雄’。他显然接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获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和直接指示或批准，也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勃列日涅夫将希望寄托于克格勃，视其为获取全面情报和巩固自己党内个人‘威望’的工具……一切都有人监视，一切都有人汇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随处遍布间谍机构和监视网。这一切是何等令人厌恶！”

费奥多尔丘克对其前任的工作极为不满：“为什么没有开展反对民族

主义的真正斗争？”

谢列斯特得出结论：按照此人的看法，斗争似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人们投入监狱。

费奥多尔丘克宣称：“我们是为全苏联工作，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在我们的工作中根本没有什么乌克兰。”

他坚持不懈地在共和国内搜寻意识形态方面的犯上作乱活动，并要求将其斩草除根，如果不见采取措施，便会语带威胁地在政治局里声称：“我及时而敏锐地提供情报，却见不到应有的反应。”

谢列斯特自己也从不错过机会显示，他正与民族主义者进行战斗。在一次共和国意识形态工作者会议上，他提出要求：

“必须坚持撕下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凶险的面具，他们在自己的反苏斗争中与国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民族主义者相互勾结。”

1972年5月19日，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洛夫大厅开幕。第二场报告之后，宣布休息。谢列斯特发现，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前往三楼的办公室，却没有人叫他。他便去乌克兰常设代表处用餐。

午餐后开始讨论。第四个人发言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交代苏斯洛夫主持会议，自己走出大厅，并让谢列斯特与他一道来到主席团的房间。谢列斯特感到，等着他的将是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问工作情况如何，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谢列斯特开始汇报共和国的形势，但发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无兴趣。

勃列日涅夫小心翼翼地开始交谈：

“彼得·叶菲莫维奇，你已经当了十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也许，你也该换换环境了吧？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嗅觉就会迟钝，人们就会对你感到腻烦，你也会腻烦他们。”

不胜惊愕的谢列斯特问道：

“为什么这个问题来得如此突然？”

“你应该到莫斯科来工作。”

“可是，为什么呢？”谢列斯特追问。

“你的经验在莫斯科大有用场，而那里也需要使干部年轻化。必须准备好接班人，你就同意吧。一切都会很好的——这可是我向你亲口说的话。”

“要是您认为必须让干部年轻化，您就这么办吧。可是我在64岁上一切从头开始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对我没什么意见，就让我退休好了。看来，无论经济工作还是党务工作，我都干得够长的了。”

谢列斯特比勃列日涅夫年轻两岁，他暗示在这样的年纪应该退休的话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恼火：

“咳，你干吗提出退休的问题呀？”

“我请求让我休息。”谢列斯特又说了一遍。

“党的积极分子对这种理由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想，我退下去是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不佳。”

“可你健壮得像头牛，”勃列日涅夫不客气地说，“你还可以再干十年。”接着又温和地补充说：“你在莫斯科什么都会有的，还有我个人的友情。我们可以一道去打猎。你就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吧。”

谢列斯特默不作声。勃列日涅夫开始步步进逼：

“你还嫌小了？这可是一个大国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呀！你就主管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你本来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问题不在大或者小，不能这样考虑，我不理解的是这种想法的合理之处。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撤换我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共和国的情况不错。”

“工作方面对你并没有意见，可是整体的利益需要这样做。我们是不会让你退休的。你就同意了吧，政治局委员们会正确理解一切的。”

“那好吧，您就按您所希望的办吧。”

勃列日涅夫起身拥抱谢列斯特，亲了亲他，然后说：“谢谢。”

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乌克兰的几位书记注意到了自己的领导那张涨得通红的脸和忧郁的目光。当波德戈尔内走出大厅的时候，谢列斯特尾随其后，他急不可待地要与朋友和庇护者谈谈所发生的事情。

波德戈尔内点上烟吸了起来，同情地问道：

“怎么样，勃列日涅夫和你谈过了？你同意了吗？”

谢列斯特说，迫不得已只好同意。

“做得对，”波德戈尔内点了点头，“咱们就一块儿工作吧。”

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

“我们需要将一些富有经验的干部调到中央，”勃列日涅夫开言道，“因此，建议批准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本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希望他能有所帮助。我已和他就这一问题作过交谈，他表示同意。”

勃列日涅夫对谢列斯特说，不必在基辅耽搁，莫斯科的事情很多。

“基辅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研究。”谢尔比茨基说了一句。

“您自己研究吧，一切都会好的。”勃列日涅夫回答。

谢尔比茨基装模作样地嘟囔着说：“有什么好的？调走了第一书记，连说也不说一声。”可他自己却是喜形于色。他总算成了共和国的主席，摆脱了他难以容忍的谢列斯特。

柯西金来到谢列斯特面前表示祝贺：“咱们就一道工作吧。”

“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返回基辅时坐的是不同的飞机，”乌克兰院士、文艺学家扎通斯基回忆说，“而且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机场降落，‘胜利者’在体体面面的鲍里斯波尔机场，‘失败者’则在破破烂烂的茹利亚内机场，整个‘皇家队伍’十分自然地出现在鲍里斯波尔，却只有一个人前往茹利亚内，这就是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

谢列斯特后来回忆说，夜间他难以成眠，泪水潸然而下。在莫斯科时他就问过勃列日涅夫，谁来接他的班。勃列日涅夫避而不答：

“看看再说吧。”

谢列斯特提议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利亚什科作候选人。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在那里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嘛。”

换言之，所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替谢尔比茨基扫清道路（利亚什科顶替他担任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整整两天，谢列斯特无法与勃列日涅夫进行电话联系，他想明确何时召开共和国全会，推荐何人担任第一书记之职。5月23日是星期天，乌克兰中央第二书记卢塔克给他的别墅里去电话，转告说苏斯洛夫来电话，要求谢列斯特立即飞往莫斯科。

谢列斯特情不自禁地回答：

“我有电话，如果苏斯洛夫这么迫切地需要我，让他给我来电话好了。”

苏斯洛夫不怕劳神再打一次电话，吩咐谢列斯特立即前往莫斯科着手工作。谢列斯特回答说，他不可能立即离开，因为第一，感到身体不适；第二，应当在全会上同一道工作过的大伙儿告别。

而这并不是中央所希望的。

“全会延期了，”苏斯洛夫一口回绝，“您必须来莫斯科。否则……”

谢列斯特憋不住了：“苏斯洛夫同志，你别吓唬我，我什么也不怕，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比你对我所做的更坏和更可怕的事了。”

尽管如此，谢列斯特还是召集中央委员会机关人员，举行告别。次日与政治局委员们共进午餐后，便乘晚班火车前往莫斯科，还带上卫队和服务人员。他刚一离开，基辅便召开全会，选举谢尔比茨基为第一书记。

谢尔比茨基经常炫耀自己与总书记的亲密关系。基辅的中央全会期间请他去接电话，他离开会场数分钟，回来时骄傲地告诉战友们，勃列日涅夫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头两年谢尔比茨基便撤换了九名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夫诺州领导人莫兹戈沃伊回忆过乌克兰新主宰晚上很晚了给他打电话的情形：

“你已经休过假了吗？”

“没有。”

“休假去吧，等你回来后就开始在新的岗位上工作。”

莫兹戈沃伊成了更大的赫尔松州的领导人。他的前任科丘别伊被撤职是因为，州领导人违反现行制度，在第聂伯河畔修建了一批别墅。这本是很早以前的事，有些人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科丘别伊被视作谢列斯特的朋友。如今人们都说，州机关也遭到清洗。莫兹戈沃伊自己想要将州里原先的一个领导人留下，却受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警告，

说他犯了自由主义。

勃列日涅夫没有接见谢列斯特，推托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前夕他很忙。谢列斯特抱怨，没有让他在会议上与同志们告别。苏斯洛夫安慰他：

“彼得·叶菲莫维奇，也许您没有出席全会倒还好一些，少受些伤害。”

“几乎他所有的同事都吓坏了，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后来谢列斯特的儿子维塔利述说。“在莫斯科，人们对他的态度比在乌克兰要好得多。在乌克兰，人们都很害怕，因为人家已经明白，谢列斯特时代业已结束，继续与他接触只能让自己感到恐惧和冒险。”

5月30日晚，谢列斯特前往“狄那莫”体育场观看足球，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他们由衷地进行交谈，不过也都明白，这次会晤的情形必定会有人报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般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在非正式的场合会面。他深知，赫鲁晓夫退位的事正是这样开的头。

勃列日涅夫终于给谢列斯特打了电话。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将为我建立与他之间的直接通讯联系。除去又多一部监听机之外，还能有什么好处？”

在故乡基辅，不久前的帮闲们转而为新主子效劳，对先前的主人进行报复。

“我的人都被特供站除名，”谢列斯特感到伤心，“给基辅打电话，和利亚什科谈了谈。卑鄙的家伙们，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这种事既不能忘记，也无可饶恕。”

前第一书记的亲属们都被剥夺了从特供站获得食品的机会。基辅的制度是这样：共和国中央书记们的家人列出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从新鲜草莓到鱼子酱）的清单，就会有人将所订购的物品送货上门。谢列斯特在政府中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明白人家所期待于他的是什么，便自己主动退休了。于是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被切断，报纸不给送了，从食品商店除名，汽车被收走了……”

谢尔比茨基从莫斯科回来后召集政治局会议：

“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在增长，为此我们的领导人受到了根据充分的严肃的批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借口‘民主化’而与强制俄罗斯化进行斗争。

开始号召改变国家制度和为乌克兰的独立而斗争。须知北京也赞成乌克兰独立自主！……已经出现为过去翻案、赞美古代、试图为马泽帕恢复名誉等现象，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则被说成叛徒。我们的中央书记在哈尔科夫州市委书记会议上指示高等学校中只能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这已被公认在思想上是有害的。而普希金的著作竟然用乌克兰文出版，足球转播也要用乌克兰语！谢列斯特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政治上不明确的讲话之后，这一切便大肆泛滥。绝不可低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必须发动思想斗争，使之更为尖锐，更具进攻性和明确的目标。”

乌克兰共产党一名政治局委员要求采取坚决措施：

“必须将公开的敌人投入监狱，不关押他们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的过错。”

紧接谢列斯特之后，1972年9月奥夫恰连科也被撤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职务并逐出政治局。谢尔比茨基将其叫到自己那里说：

“您作为技术人员，很难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您有专业，因此改做科学工作对您不会成为问题。让我们考虑一下新书记的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央委员里我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您提提意见吧。”

在政治局会议上，谢尔比茨基宣布：

“由于健康的原因，奥夫恰连科同志已递交解除其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职务的申请，并请求将他调往科技部门工作。”

在中央全会上，谢尔比茨基已经讲得更为严厉了：

“奥夫恰连科同志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无法令人满意。”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党的领导人瓦琴科补充说：

“谢列斯特和奥夫恰连科对待民族主义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态度，应当按照党的规章制度审查他们的工作。”

10月31日谢尔比茨基向莫斯科报告：

“费·奥夫恰连科同志自1968年起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他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方面，采取了暧昧的立场……在许多情况下未能对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给予坚决的回击，在这方面奥夫恰连科同志应负相当大一部分罪责……在对文艺和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工作中，讨好甚至庇护某些在思想方面起着严重破坏作用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在党的积极分子中和知识界已经毫无威信。”

奥夫恰连科在改行从事党务工作之前是胶体化学和水化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便回到这个研究所，不过已经不再是所长。在中央全会上，马兰丘克当选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乌克兰中央书记。他被委以清除谢列斯特余毒的重任。

一篇抨击性的文章出现在共和国党刊的四月号上。谢列斯特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业已明白他必须下台。在四月后期他即被取消党的最高领导人资格。

第10章 甩掉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利扬斯基

几乎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甩掉了另一名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

波利扬斯基在推翻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凭着胜利者身份在政治局中拥有重要职位。看来，他并不明白，那些帮助新主子夺得政权的人并不可能与之共同统治这个国家。

1966年12月28日庆祝勃列日涅夫60寿辰之际，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波利扬斯基献给总书记一首赞美诗，将之与列宁相提并论。

他与勃列日涅夫以“你”相称，彼此直呼其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勃列日涅夫对此不再乐意：他希望得到来自老同事们的更多尊敬。

波利扬斯基错过了重要时机，此刻勃列日涅夫已不再有求于战友们，得出的结论是下属们更为有用。

波利扬斯基是个积极主动、精力充沛的人。当时的国家保健总医师布尔加索回忆说，他和营养研究所所长波克罗夫斯基院士曾被波利扬斯基召唤前去，波利扬斯基说：

“两位医生，你们在自己发表的所有文章中都警告民众说，多吃油脂是有害的。不能再这样说了，因为你们让人们抛弃了一种好食品——奶油。我恳求二位了，要是今天晚上你们能联名为《真理报》写一篇介绍奶油益处的文章，我马上就将它发表。”

布尔加索十分诧异：“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发生了什么事情？干吗需要这样一篇文章？”

波利扬斯基说，丹麦一些公司拒绝购进沃洛格达州的大批奶油，借口是吃奶油不好。奶油积压在冷柜里，大家都不肯买。

布尔加科夫提出一个较为明智的办法：“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也许降价更好些？”

波利扬斯基回答说，政府不会改变定价的,这点必须排除。

总保健师并没有向自己提出问题：丹麦人不吃的食品，可以让苏联人吃吗？布尔加索夫和波克罗夫斯基写好文章，马上就给发表了。

第二天布尔加索夫被他的上司卫生部长波克罗夫斯基叫去，部长不胜惊讶地问道：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啦，是无事可做吗？您一向写文章说，食用大量的油脂是有害的嘛。”

贝尔加索夫解释说，他是在完成波利扬斯基交付的任务。

波利扬斯基的积极性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当他对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兴趣的时候，那可是属于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直接负责的领域。政治局内有着自身的规矩，在别人的园子里拾掇打整是不行的。

扎米亚京讲过，波利扬斯基密切关注西方报刊对政治局委员首先是对总书记的报道，经常谈论此事：“你看见他们都敢于干些什么了吧？”并且高声引述人家的话，加以议论。而勃列日涅夫却根本不想听这一套，他感兴趣的事情，离了波利扬斯基也有人向他报告。

塔斯社的参考性通报中有一套《国外报刊概述》，仅限于在最高领导人中流传。其中刊登各种“反苏”报道，包括引用国外对苏联领导人的不留情面的评价。扎米亚京负责监管，不允许有关个人的任何不好的内容进入《国外报刊概述》。

此外，性情粗暴的波利扬斯基口无遮拦。1969年谢列斯特给波利扬斯基打电话，抱怨人家强迫他向国外出售葵花籽油粕换取外汇，而共和国畜牧业所需的蛋白质却不足。波利扬斯基同意谢列斯特的意见，不应当这样做，但又向他说明，他无法采取任何措施：

“勃列日涅夫无论外汇还是油粕，什么都不懂。”

这样的议论不可能不传到勃列日涅夫耳朵里。

据说，勃列日涅夫有一次与波利扬斯基谈话，像平日别人不同意他的意见那样，随口说了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工作，只好提出离职申请了！”

波利扬斯基听了，仿佛不假思索似地脱口而出：

“你干吗用离职吓唬我们？你一走，别的人马上就来。”

勃列日涅夫哑口无言，这个细节他牢记不忘。

1973年2月2日政治局开会，仪式日程已经完结，勃列日涅夫突然说：

“我这儿有马茨凯维奇递交的一份申请，希望解除他的农业部长职务。他请求派他去国外工作，我同意。同志们，你们的意见为何？”

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给勃列日涅夫写的是：

“我觉得，我看得出问题也懂得解决的办法，但是不能确信和证明这个办法、这样解决的正确性。我正在失去自信，失去希望，这样下去绝对不能容许。除此之外，身体状况亦已恶化，接受了一次手术，还要做另外两次，这同样无法令人振作起来。

从我的观点出发反复考虑一切之后，我作出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请求您解除我现有的职务。这是国家最重要的职务之一，要担当这个职务，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至少应该挑选一个拥有很大的顽强劲头之人。”

政治局委员们谁也没有开口。既然问题已经解决，还能再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吩咐将马茨凯维奇叫来。部长进门，面色苍白。勃列日涅夫告诉他，其请求已经得到满足，马茨凯维奇便出去了。不久他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担任大使。

勃列日涅夫在同一次会议上接着说道：“早已向库拉科夫和波利扬斯基下达了物色农业部长一职候选人的任务，可是这样的候选人至今仍然没有。这应当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在党和苏维埃圈子里都要有威信。我对这样的候选人考虑了很长时间，现在提议任命波利扬斯基同志为农业部部长。”

波利扬斯基大约是在暗自想心事，并没有听清在点他的名，便小声地向坐在身旁的谢列斯特打问：“彼得·叶菲莫维奇，这是在说谁呢？”

“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你怎么啦？”谢列斯特不胜惊奇，“你没听见吗？在选你呢。”

波利扬斯基困惑不解地说：“你别开玩笑了。”

谢列斯特重说了一遍：“勃列日涅夫点了你的名。”

“可是谁也没有和我谈起这事呀？”

这时勃列日涅夫回过头对波利扬斯基本人说：

“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您为什么默不作声？”

“我该说些什么呢？”

“可这是在谈您的事呀。”

“谁也没有和我谈过这个话题。”

“这不，现在我们就当着大家的面谈吧。您是管农业的，熟悉各种规程，对您来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新的东西。”

波利扬斯基全然不知所措：“列昂尼德·伊里奇，我请求不要这样做。对我来说，这太突然了，我甚至没有准备好为何对这个建议作出回答。此外，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我全力以赴投入这个巨大的领域。我并不是想让您为难。”

波利扬斯基的解释听起来像孩子们似的缺乏说服力，简直有点儿可怜巴巴。一个政府领导人，却企图推脱新的任务，好似没有学会功课的学生。勃列日涅夫不放过挖苦政治局同事的赏心乐事：

“怎么，部长会议第一副手的工作就不需要健康的身体？我认为波利扬斯基的说法站不住脚。我们大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病，但我们仍然在工作。”

波利扬斯基继续嘟囔：“可是在部长会议里我本来就在管农业嘛。”

“担任部长？——那可是另一回事。这时候你就要具体地、独立地解决问题了。”

晚上波利扬斯基总算有幸获得勃列日涅夫的接见。勃列日涅夫为未能事先打招呼表示歉意，但是并未改变自己的意见。任命的问题已经解决。波利扬斯基从部长会议搬到农业部，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

“我在一年之内，”他的助手向我讲述，“经手接到两三千份政治局文件和数千份克格勃文件。这都是些‘K’系列的材料，装在缝制的信封里，盖有五枚火漆印章。每一份都需要阅读并为首长作出标记，以便他能熟悉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意见。波利扬斯基善于精明地利用自己机关人的才智。”

有一次送来了政治局关于大使与政治情报机关（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情报总局）驻外机构相互关系的决议。波利扬斯基看过之后突然吩咐助手加以复印。绝密文件是禁止复制的。助手不能不执行首长的指示，但有责任报告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为此契尔年科曾警告过他）。助手违反规定，替波利扬斯基进行了复印，并且向谁也没有说一句。他心中琢磨，为什么首长对这样一项与农业毫不相干的决议会感到兴趣呢。经验丰富的波利扬斯基已经明白，他在部里是待不长久的。

不仅勃列日涅夫，而且还有柯西金，都力求避开他。有一天柯西金对俄罗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尼科夫说：

“真是个怪人，那么机灵。我不明白，他在克里米亚读完大学，作为

一个23岁的年轻人，怎么没有入伍，却跑到了西伯利亚？谁也搞不清楚！后来在赫鲁晓夫时代，他处处表现出挑衅，爱耍阴谋，现在却又灰心丧气。我不喜欢波利扬斯基。”

柯西金弄错了。战争开始时波利扬斯基并不在克里米亚。1940年他被录取为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旁听生，后来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州一个区的机器拖拉机站的政治部主任。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后方更需要党的领导人。

柯西金不喜欢波利扬斯基是因为，此人的行为举止不单是独立不羁，简直是与政府首脑平起平坐。这种情况一举告终：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将波利扬斯基请去，把一张单子往桌上一放：

“你挑选一个国家吧。”

波利扬斯基略加思索便说出了国名：日本。不过他对这个国家却毫无概念。

《文学报》第一副主编瑟罗科姆斯基给他打来电话，对新的任命表示祝贺。

波利扬斯基对其兴高采烈地说：

“你知道吗，这会儿我正在读列宁关于日本的论述，简直是惊人地有趣！”

专家们都知道，列宁关于日本从未写过只言片语。不管怎样，这也没什么，只要能对未来的大使有用就行。为了做准备，原助手介绍波利扬斯基阅读斯捷潘诺夫那部一度流行的描写日俄战争的长篇小说《旅顺口》……

继出使日本之后，波利扬斯基还在挪威担任过大使。

第11章 大局已定

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首脑后，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即便是他，也还须受党内领导成员们意见的束缚，特别是开初一段时间。

事实上，总书记若未得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同意，便不能签署重要的文件。

勃列日涅夫起初依靠的是中央书记处：那里都是他的人——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他可以指望得到那里的全力支持。马祖罗夫回忆说，重要问题都由书记处研究，然后勃列日涅夫来到政治局，气势威严地说：

“我们经过商议和斟酌，应当如此这般地采取行动。”

他的人便齐声附和：“说得对，列昂尼德·伊里奇。”

为了在政治局只留下他可以充分依靠的人，勃列日涅夫花了数年时间。

1973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战友们千方百计地颂扬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一马当先，会场里三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最重要的还是苏斯洛夫的发言，他对“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讲了一大堆阿谀奉承的话。结果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首次写上了：“……在我们列宁主义的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领导下”。

自此之后，从中央全会到党的普通会议，哪一次开会也少不了对勃列日涅夫进行颂扬。此前勃列日涅夫常常取笑苏斯洛夫，如今却对他怀着充分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委员们再也不便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决定了。

1973年12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在总结过去一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时说：

“比如说某些决议，尽管我并不同意，但还得签署。诚然，这样的决议非常之少。我这样做是因为，多数政治局委员在表决时已投了赞成票。同志们，我和你们工作得很协调，符合列宁遗训的精神……我们的党团结一致，没有任何反对派别，所以我和你们更易于解决各种问题……当然，我们往往很累，使自己负担过重，但是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人的幸福。有时候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还不

得不克服疲劳……”

政治局会议每逢星期四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政府大厦三楼召开。

总书记的办公室也位于这个楼层（而第二个工作室则在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总书记从接待室来到所谓“胡桃房间”，会前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围绕着圆桌齐集于此。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常常于开会之前即已在这里预先加以说明，因而会议开始的时间往往会拖延15—20分钟。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允许进入“胡桃房间”的。他们只能应召从他们聚集的接待室进入会议大厅与会，恭顺地静候着以总书记为首的真正的生活主宰者们露面。

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后，问政治局委员们对会议日程是否有意见，但很少有谁提出补充问题。按规矩一切都应该事先讨论和商定，以免让一些同志陷入难堪境地。事前未讨论过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常都会遭到失败。

1971年11月25日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之前，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团房间内说，波德戈尔内提出建议，为五年计划的成果褒奖政治局委员、各民族共和国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让大家讨论波德戈尔内的这个意见。但是该建议并非出自他本人，这使他感到不悦。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立即表示反对——他们都喜欢给同事使绊子。

民族共和国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们很乐意每逢周四飞往首都参加会议。只有因病或出国公干才可能缺席政治局的会议，而出国同样由政治局决定。

如果发生某种紧急的事，不能前往莫斯科，必须给总书记打电话，请求允许留在共和国内。为了琐事给总书记打电话则被视为有失体面。

假若有谁错过一次会议，马上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么说，他自己什么都懂，不经政治局的商议，也认为完全可以对付？这样的人在政治局肯定待不长久。不过谁也不愿意放过前往莫斯科这一令人羡慕的机会。

会上讨论的只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余的决议则以问询的方式加以通过：中央委员会总务部经由信使向全国各地的政治局委员递送文件必须在上面加注“赞成”或“不同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领导人第一时间内将这些文件报告自己的首脑。莫斯科往往会给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进行暗示：

“大家都已经通过，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经过这一番提醒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决意反对了。

政治局开会的会场内，人们按照级别和在党内连续拥有该职衔的时间长短在会议桌旁入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次。

会议期间，会有人送来茶、咖啡、夹肉面包。如果讨论拖延不决，还会进行中间休息，大家一起在二楼靠近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的一个房间进餐，用餐时交谈依然继续。

有时候也允许总书记的助手们列席。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或者他的第一副手负责写出讨论的进程摘要，并记录所通过的决议。特殊情况下，则须作更为详尽的速记记录。

赫鲁晓夫时期实际上所有的记录都是马林作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则是契尔年科。他要注明谁人出席，讨论了哪些话题，用一两句话表达每个发言的人所持观点的理由，记录下最后的决议。

政治局会议上磁带录音（即便在这种技术久已面世之时）始终被排斥，第一，是为了保密，第二，不管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则是打着表达自由的旗号。早在列宁时代政治局委员们便约定，不作速记记录，以便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不会担心日后有人读了记录，得知谁人持有何种主张。

部长、元帅、院士、经理以及其他领导人，也可应召参加政治局会议。让他们作完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并通过决议。按照传统，不知何故不邀请候任的大使与会。他们都坐在接待室里，直至作出派遣他们到某个国家的决定之时为止。

在接待室中候任的应邀与会之人，服务员也都给端茶送水。值班秘书按照议事日程宣布待讨论问题的顺序号。为这个问题应召前来的人便走进会议厅，讨论之后又立即退出，不允许滞留。

1971年4月，政治局讨论埃及的局势，奉召自开罗归来的苏联政治情报局副局长基尔皮琴科记得，当时勃列日涅夫是唯一未系领带的人：

显然，他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便只穿了一件与西装色调相匹配的深蓝色羊毛衬衫。他主持会议时四平八稳，让我感觉毫无兴味，无异于应付差事……

给中间的会议桌送上的是夹有名贵小鱼、红色和黑色鱼子酱的面包片，而给我们紧靠会议厅墙边的人端上的面包片，则仅只夹了香肠和奶

略。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

勃列日涅夫逐步摒除所有对他不够忠诚的人。他甩掉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沃罗诺夫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

沃罗诺夫业已退休之后曾经讲述过，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他们在“胡桃房间”饮茶的情形，所讨论的是关于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的建设问题。

沃罗诺夫认为，厂子应当建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阿巴坎。

勃列日涅夫突然说道：“可我觉得，这个厂应当建在卡马河畔切尔内。”

沃罗诺夫勃然大怒：“怎么能这样呢，列昂尼德·伊里奇，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嘛！”

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还从来没有谁像沃罗诺夫这样对我大喊大叫过。”

“我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您在使劲儿嚷嚷。我只不过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仔细研究过了。您要是拿出另外的材料，我们倒是可以加以分析。”

“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勃列日涅夫一口回绝，“我取消这个问题的讨论。”

勃列日涅夫自然是固执己见，那个工厂便建在了卡马河畔切尔内。不久之后他也就与性情执拗的沃罗诺夫分道扬镳。

总书记机关的人都不喜欢沃罗诺夫。《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潘金曾参与起草勃列日涅夫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勃列日涅夫阅读了讲话，很喜欢这篇文字，便下令将其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

讲话作者之一得意地说：“万事大吉，勃列日涅夫首肯之后谁也不会有意见了。”

“沃罗诺夫除外，”阿根托夫迅即指出，“这位老爷从不放过机会，总要写上十来页意见才退给你。简直像个作家……”

潘金第一次听到助手（哪怕是头号人物的助手）如此满不在乎地谈论一位政治局委员。事后他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些什么意见。总书记的

另一位助手楚卡诺夫回忆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

“这次沃罗诺夫怎么样？”

“像平日一样，翻上几页，就让放在那里不理不睬了。”楚卡诺夫怀着难以掩饰的满意心情告诉大家。

潘金本人却对沃罗诺夫怀着敬意。沃罗诺夫曾支持所谓生产小队包工运动。这是一种集体承包，将一部分土地、技术设备、肥料固定给一组农民，条件是：他们应当向国家上交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余的则可以出售或作为工资。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兴趣。

据说，沃罗诺夫丢掉自己的职位是因为，他未能搞好与州委第一书记们的关系。

据一位外地的州委书记说，沃罗诺夫在讲话时“爱显示自己的学识渊博，不胜其烦，令人生厌地教训人，使人觉得他像一位装腔作势的小地方的演说家，而不是俄罗斯量级的国务活动家。”

1971年，沃罗诺夫调任一个貌似重要的职务——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他开始了解新的工作，从书架上取下一卷《列宁文集》，其中载有那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应当如何改组工人检察院》。

沃罗诺夫很快便确信，勃列日涅夫将他这个部门看得一钱不值。

“我看不出人民监察有何好处，”勃列日涅夫多次说过，“比如，当年有个梅赫利斯，所有的人都怕他。”

沃罗诺夫乘飞机去皮聪达晋见正在那里休养的勃列日涅夫，带去了一份关于改进人民监察制度的报告。勃列日涅夫让这位来客去洗澡，然后他们又坐下来与助手们玩多米诺骨牌，还有人送上来了白兰地。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想过问报告中的事。

苏斯洛夫将沃罗诺夫邀约到他那里，告诉沃罗诺夫，监察委员会主席不应当是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不等人家甩掉他，1973年4月便自己提请退休。

中央书记兼重工业部部长索洛缅采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首脑。他公认是中央委员会主管工业的基里连科的人。索洛缅采夫素以唯命是从、任劳任怨、循规蹈矩著称。

索洛缅采夫曾对记者们讲述过，他出访蒙古时病倒了，发高烧不能出门。勃列日涅夫打来电话说：

“有急事。快回来。”

到了办公室之后，他又说：

“政治局讨论了，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候选人，决定让你担任。”

索洛缅采夫明白，这是一次重大的晋升，足以保障他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但他当即说道，俄罗斯联邦政府顶头的领导人太多，无论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全都可以发指示。

勃列日涅夫向他许诺：

“你只和我打交道，要是别的什么人插手，你就叫他滚远点。”

第12章 二号人物波德戈尔内离开主席团

库兹涅佐夫聪明而且学识渊博，却竭力装扮成平庸之人，这是唯一能保全自己的办法。

勃列日涅夫甩掉的最后一个人是波德戈尔内。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早就发现总书记谈到波德戈尔内时的不屑口气。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当着自己的助手们的面语含讥诮地议论波德戈尔内：

“他在我面前也配叫党的活动家！”

波德戈尔内没有察觉到时代在变化，仍然按照老习惯平起平坐地对待勃列日涅夫。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机关一名工作人员曾身处波德戈尔内与勃列日涅夫交谈的现场。勃列日涅夫来电话，要商讨某个问题。波德戈尔内发表完意见，随即又补上一句：

“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知道，反正你照样会按自己的意见办。好吧，你多保重，廖尼亚。”

最高苏维埃本身都是些不起作用的机关——无论苏联的还是各共和国的无不如此。代表证章只不过是奖章而已。作家贝科夫被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根据他的说法，共和国议会的工作是这样的：

最高苏维埃会议（一年两次）开得一本正经，风平浪静。报告徒具形式性质，讨论丝毫不动感情。代表们打瞌睡的打瞌睡，看报的看报……我通常在会场上只坐到第一次中间休息为止。再坐下去既没有精神，也缺乏力气……

波德戈尔内的威信和权势建立在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交往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们支持的基础上。恰佐夫院士甚至认为，波德戈尔内一直在拆勃列日涅夫的台。当勃列日涅夫患病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医院时，先前很少关心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波德戈尔内预先不加通报便乘车直奔那里。

恰佐夫断定，波德戈尔内想见病中的勃列日涅夫，为的是向政治局的同事们通报总书记的恶劣病情。恰佐夫表示异议：探视会对患者有害。

“你怎么啦，不认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勃然大怒，并且威胁说：“你别忘了，在我们国家没有不可替代的人。”

恰佐夫坚决不肯让步，他懂得，一号患者的利益比一切都重要：“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我必须为患者的利益、为他的康复竭尽全力。现在他需要安静。无论我还是您都知道他会怎样看待您的来访。这会对他有害的。如果政治局关心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我准备提供教授们会诊的相应结论。”

就这样，恰佐夫始终不放波德戈尔内进入病房，那人不得不乘车离去。很可能，事后恰佐夫向勃列日涅夫添油加醋地讲述了这一事件，勃列日涅夫听了自然表示感谢。

勃列日涅夫向扎米亚京埋怨波德戈尔内：“已经准备好去打猎了，这时候尼古拉却打来电话说：我必须和你谈谈。唉，这不，现在他就坐在旁边，唠叨不休，直到我忍受不了，只得说：‘好吧，科利亚，这事我一定办……’”

格里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在一位中央书记的寿诞庆祝会上，人们对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比对受庆祝的人说的话还多，就连寿星本人在祝酒时也大肆颂扬勃列日涅夫。突然间波德戈尔内发起火来：“廖尼亚，你怎么能容忍这样对你大肆赞美呢？为什么你不制止这样赞美？你知道我是怎样对待你的。我准备为你而挺身面对子弹，但我不能眼看着你鼓励人们吹捧自己。”

勃列日涅夫却不满地反驳他：“这种事根本就无可指责，同志们愿意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自己对我们之中任何人活动的评价，你怎么老是对一些事情不满意呢？”

波德戈尔内开始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起来。

1974年4月2日法国总统蓬皮杜逝世。他重病在身，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一天。去世之前两星期，他还前来苏联，与勃列日涅夫在皮聪达会晤。参加蓬皮杜葬礼的苏联代表团由波德戈尔内率领。同样来到巴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希望与波德戈尔内会晤。尼克松下榻美国大使官邸，邀请波德戈尔内前往他那里。

当公使衔参赞基济琴科（苏联大使馆第二把手）向波德戈尔内报告尼克松发出邀请之事时，波德戈尔内的反应充满敌意，持否定态度：

“我有什么事找他？如果他想会面，让他自己来大使馆见我好了。”

大使办公室对面有一个房间，安装了防窃听装置。晚餐后波德戈尔

内和他的国际事务助理科尔图诺夫、苏联驻法大使契尔沃年科以及基泽琴科在那里开会。

大使和公使衔参赞试图开导波德戈尔内，说关于会晤的建议不宜拒绝。波德戈尔内继续抗拒：

“我没有奉命与尼克松会晤，而且我去美国大使馆见他有损尊严。”

大家劝说波德戈尔内征询莫斯科的意见。拟好密码电报已时过午夜，凌晨收到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签署的回电：“尼古拉，你应当与尼克松会晤。”

经商定，尼克松邀请波德戈尔内共进午餐，但马上又澄清，中午美国总统必须乘飞机离开，于是约定早上七点共进早餐。波德戈尔内再次感到不满：

“太早了，哪怕推迟半个小时也好。”美国人表示同意。

尼克松仔细打量了一番已经摆好的宴席，佯装气愤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鱼子酱？”

又同情地对波德戈尔内说：

“他们这里不知道，在莫斯科人们习惯吃鱼子酱。”

“不，”波德戈尔内回答说，“早餐我们那儿不吃鱼子酱。”

“当然，普通老百姓无法吃到这个东西，可是您在克里姆林宫肯定会吃的。”

美国大使吩咐立即上鱼子酱。尼克松叮嘱跑步离开的侍者一句：

“可不能要伊朗的，只能是俄罗斯的！”

随即端上来一大高脚盘鱼子酱，不过谁也没有动它一动。除去尼克松和波德戈尔内之外，其余的人基本上什么也没能吃。译员根本就害怕往嘴里搁什么东西，其余的人则在记录两位总统所说的话，力求一个字也不遗漏。

之后公使衔参赞基济琴科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波德戈尔内希望避免与美国总统会晤？假如说是因为波德戈尔内未准备好与尼克松交谈，这似乎有些天真。更确切地说，恐怕是波德戈尔内感到不那么自信，不敢未经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便自作主张与苏联的主要政治敌人进行会

晤。

政治局里则议论纷纷：“……我们不需要两个总书记。”波德戈尔内退职的基础已经打好。

据扎米亚京说，波德戈尔内是个凶狠、傲慢而又酷爱面子的人，结果妄自尊大到极点，弄得根本没有拥护他的人。

勃列日涅夫撤换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在基辅安插不大喜欢波德戈尔内的自己人。新任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便受够了波德戈尔内盛气凌人的吹毛求疵。

勃列日涅夫假手乌克兰的书记们将波德戈尔内撤职，并且直接在中央全会上将其逐出政治局。这对于波德戈尔内犹如晴天霹雳。通常勃列日涅夫即便在临开会之前也会提醒一番眼下的牺牲者，波德戈尔内所受到的对待却丝毫不讲客气。

1977年5月24日，在为讨论新宪法草案而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顿涅茨州委第一书记卡丘拉建议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两个职位合而为一。

波德戈尔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政治局并未讨论过此事，他不胜惊愕，便问坐在身边的勃列日涅夫：

“廖尼亚，这是怎么回事？”

勃列日涅夫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也不明白，不过看样子，是人民希望如此。”

其实这是事先早已策划好的行动。谢尔比茨基选中卡丘拉的用意在于：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书记，代表着闻名全国的矿工州，而且也不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谢尔比茨基让自己的助手弗鲁布列夫斯基替卡丘拉写好发言稿。在专机飞赴莫斯科途中，乌克兰的书记们公开讨论了准备将波德戈尔内革职一事。

波德戈尔内试图说些什么，但主持会议的苏斯洛夫不让他发言：

“你坐着，等一等。”

其他中央委员也支持顿涅茨书记的想法。其中一人建议：

“那就解除波德戈尔内同志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

会场鼓掌，波德戈尔内习惯性地与大家一起鼓掌。目击者们后来说，看着他真让人同情。

苏斯洛夫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

“首先，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们的建议，认为宜于让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会场再次鼓掌。

“重新设立被废除的主席团第一副主席职位，”苏斯洛夫继续宣读，“与此同时，解除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波德戈尔内同志所担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苏斯洛夫望了望会场：“提议批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全场再次鼓掌。波德戈尔内收拾自己的文件，站起身来。但苏斯洛夫制止了他：

“你暂时还是坐在这里。”

苏斯洛夫向全场发问：

“有什么建议？整体表决吗？”

“整体表决。”全场回答。

“由中央委员们表决，”苏斯洛夫提醒，“谁赞成通过我所宣读的全会决议稿，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现在全会成员已经是站立着鼓掌了。波德戈尔内也站起身来，向苏斯洛夫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人用一只手向他指了指下面：现在你就和大家一起坐到会场里去吧。

波德戈尔内像个无端受辱的人，下台来到第二排。那里有个座位一直空着。显然，中央委员会组织和党务工作部事先已周密考虑好整个程序。数分钟之间，全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便变得一钱不值了。

苏斯洛夫宣布：“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讲话。”

勃列日涅夫发表了简短的、事先已写好的讲话：

“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所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同时担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我充分考虑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向你们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决不辜负你们的信任，做一个像我今天之前那样的我们党的忠诚战士。”

中央全会刚一结束，受到极大震动的波德戈尔内在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走进主席团房间，同谁也不打招呼，说了一句：

“这一切发生得多么突然！我一直老老实实地工作……”

他从全会上离去时，已是一个谁也不需要的领取退休金的人了。

次日，波德戈尔内亲手写了一封致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我引用的是书信作者手写原文）：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你应该能理解我今天的处境，因此一切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简直很难讲而且大概也无法讲清楚。

对于我来说，昨天的决定简直令人震惊。我完全彻底地同意：需要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合并起来。生活本身提示，在总书记所担负的角色的条件下，这是唯一正确的决定，是他在领导和引导我们社会和党的全部内外活动。

要是你还记得的话，早在两三年前我和你就谈过这个话题。当时你说，还不是时候。但是现在解决它的时机到来了。我无条件地同意这样做，因而也同意解除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决定。

至于所采取的并且已在报刊、广播和电视公布的措词的形式和实质——‘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未说明任何理由，我想，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我不应受到的对待。

现在每一个人都会想，都会产生一个念头：要么是政治罪犯或者小偷，要么他同中央政治局没有搞好关系，诸如此类。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在党内已经超过52年。我一直都在各方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没有任何要求。我和你是老朋友，至少在不久之前还是。而1964年使我们的关系如此亲密，好像还为此发过誓：我们的友谊永存。那些可能遇到

和面临的情况都不足以使事情改变，因为我们站在党的原则性立场上。恐吓和预言都不曾吓倒我们，我们并没有晕倒，也没有脸色发白。

我随时感觉到你的友谊、你的支持，这在我们共同的工作中支持和鼓舞着我，为此我真诚地感谢你。

当然，工作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在你我之间发生过。但你要相信我，列·伊，我永远祝愿你和你所代表的政治局以及全党万事顺利，获得巨大成就。所有那些美好的东西（那曾经很多）将会存留到我生命的尽头。祝你健康，为造福我们的党和祖国取得巨大成就。

尼·波附笔：我要离开一会儿，安静安静，我想尽量写得连贯一些，如果现在不是那样，请你原谅。

尼·波契尔年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了来信的内容。勃列日涅夫同意修改措词。

波德戈尔内又写了一封同样很不通顺的申请，并倒填日期：

“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不允许高效能地完成这些机关所面临的任务，我请求解除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从而就此退休。”

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告诉大家，波德戈尔内写了一份申请，出于健康状况的原因请求解除他所担任的职务，从而退休，因此建议对中央全会的决议作出相应的补充。同志们均未反对。

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勃列日涅夫将全部工作都交给库兹涅佐夫，专门为他设立了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一职。

冶金工程师出身的库兹涅佐夫在工业部门官运亨通，战争前夕已成为国家计委副主席，后来又担任工会领导人。自1955年起，文静、沉着的库兹涅佐夫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在外交部被称为“高明的您您先生”。库兹涅佐夫聪明而且学识渊博，却竭力装扮为平庸之人的模样。这是唯一能保全自己的办法。

第四卷 意识形态战线最重要

第1章 意识形态圣火的守护人

苏斯洛夫稳居苏共中央书记之职35年，创造了绝对纪录。

围绕苏斯洛夫流行着大量的传言、议论、神话和传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身上综合了种种神秘特点，思想感情绝对深藏不露。人们都说，斯大林逝世前意欲宣布的接班人正是他，不过未能来得及罢了……甚至历史学家都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苏斯洛夫没有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

1969年，伊林少尉向政府车队开枪，企图刺杀勃列日涅夫。伊林被捕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进行首次审问。伊林解释说，勃列日涅夫使国家陷入贫困境地，他希望由苏斯洛夫取代勃列日涅夫，担任国家领导人……

很可能这位少尉是唯一一个衷心希望如此的人。

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要求善于采取出人意料、非同寻常、独立判断的决定，而不是墨守成规。赫鲁晓夫能做到这点。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在他尚未患病时，也能做出某些决断。而苏斯洛夫则习惯于严格地照章办事。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都不允许偏离总的路线，一辈子已经养成习惯：往左一步或往右一步都无异于逃跑，押解队不加警告即可开枪。

苏斯洛夫是一个忠诚的赫鲁晓夫分子，在危急时刻总是支持赫鲁晓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反对第一书记：即赫鲁晓夫本人干下了某种不能容许的对党构成危险的事情时，比如他下令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者打算破坏党的机关的传统结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本人描写过，他在1962年12月17日偶然参加党的领导人与文学艺术活动家会晤的情形：

“一个面容相当聪慧的高个子来到我们面前，高高兴兴地用力摇晃我的手，说了一些他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感到极为快意之类的话，摇晃之热情，仿佛如今我再也不会有更为亲密的朋友了。其他所有的人都自报了姓名，这个人却没有。”

我问：“对不起，我这是和哪位……？”

特瓦尔多夫斯基以责备的语气低声说道：“是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呀！”

我又问："对不起，哪一位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特瓦尔多夫斯基变得极为不安："就是苏斯洛夫嘛！"

我们本应该在视网膜上和心底里经常铭刻着两打他们的肖像才对啊！——然而视觉记忆时时捉弄我，结果我就没能认出来。幸而苏斯洛夫似乎并未因为我认不出他而见怪，仍然继续和我握手……"

赫鲁晓夫被打发退休后，曾懊悔没有及时撤掉苏斯洛夫，说看错了他。当然，冷酷无情的教条主义者和书呆子苏斯洛夫不可能让富有激情的赫鲁晓夫喜欢。但是赫鲁晓夫却看重苏斯洛夫是党的教条的保卫者。

苏斯洛夫留心每一句话，监察党的事务中的任何一件琐事。对苏斯洛夫而言，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他认为，党的决议就是加固国家的一道道铁箍，企图改变某些东西的任何尝试都可能导致其瓦解。

他是神圣的意识形态圣火的守护人。他从来不会撤销党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决定，从来不会寻求这样的表述：让你弄不明白，究竟是撤销了决定，还是已经批准了。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1976年在苏斯洛夫那里讨论一篇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苏斯洛夫对待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方式：

"我将它与1970年刊登在历史百科全书上的文章进行了对比。同志们实际上是照搬原文，但删除了其中的某些部分。比如斯大林在合作化期间犯了错误，后来得到中央委员会的纠正。比如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件中，谈到斯大林的粗鲁以及其他一些对于担任这种职务的政治家不能容许的缺点……我认为，同志们去掉这些内容是不对的，应当予以恢复。否则人们就会加以对比并提出疑问。另一方面，不知为什么要删除诸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并被授予红旗勋章，等等。这些也应当加以复原……"

雅科夫列夫曾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莫斯科夫斯基来电话告诉雅科夫列夫，说他准备刊出一篇批评那些歌颂英雄和战功的诗人的文章，其中也涉及维索茨基。

莫斯科夫斯基将军早在战前即毕业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在军队报刊工作多年，战后担任《红星报》副总编辑。斯大林逝世之后，他调入中央委员会机关，主持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宣传鼓动部数年。1960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两年后，又奉派出任驻

朝鲜大使；1965年成为《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

雅科夫列夫要求让他看条样。看过之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篇胡闹的文章，于是给莫斯科夫斯基打电话："我劝你不要发表。"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见了报。

雅科夫列夫气坏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从我的意见？"

《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骄傲地回答说，该文已征得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处（指总书记的助手戈利科夫）和德米特留克的同意。而德米特留克是雅科夫列夫分管报刊的副手，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当时正在住院。

雅科夫列夫尽管知道多数书记都喜欢那篇文章，还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他摸透了苏斯洛夫的心理：此人从来不肯宽恕破坏纪律的行为。

他并未想错。苏斯洛夫看过报告，将问题提交书记处。

苏斯洛夫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就不必再听取雅科夫列夫同志的看法了，他已经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于是让《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发言。莫斯科夫斯基的发言肆无忌惮，坚信自己做得正确。非但如此，反倒责备起中央宣传部来，暗示"部里需要巩固其地位"——意思是说，雅科夫列夫不配做领导人。

苏斯洛夫听他说完后，加以落实：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雅科夫列夫是否劝您不要刊登那篇文章？"

"是的，他劝我不要登。"

苏斯洛夫让特米特留克从座位上站起来：

"德米特留克同志，在解决是否刊登这篇文章的问题时，您在什么地方？"

"在医院里。"

苏斯洛夫有时也试图说点俏皮话：

"据我所知，人们住医院是为了治病，对吗？"

对方哑口无言。

“德米特留克同志，您怎么啦，您决定在医院领导一个部？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位部长了。您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我看不出您继续在机关工作的可能性。”

苏斯洛夫回头面对莫斯科夫斯基，此人由于脑子不够用，竟然胡说他那篇文章已取得总书记机关的同意，这正是苏斯洛夫最不喜欢的一点。他主管所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无法容忍有人随便闯入他的领域。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您难道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职责分工吗？”

德米特留克作为克劳斯诺达尔人，得到政治局委员、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波利扬斯基的支持。但对苏斯洛夫而言，这毫无意义。结果德米特留克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机关，去当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委员兼电视广播总局局长。他的仕途便就此结束……《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受到苏斯洛夫一顿训斥。这位书记无法容忍破坏“既有工作规程、党的道德标准和纪律”。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夫斯基即奉命退休。

试图与苏斯洛夫争论，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

曾任驻民主德国和法国大使的阿布拉西莫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驻外干部和出国工作部部长。阿布拉西莫夫是一个自视甚高却天资有限的人，不过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联系，因而颇觉自信。这就让他陷入尴尬境地。

“1975年初的一天，苏斯洛夫给我来电话，”阿布拉西莫夫回忆说，“要我接见K某并建议任命其为部里的指导员。与K见面后才弄明白，他仅有中学肄业的教育程度，在民警部门工作多年，后来又进了克格勃机关，无论如何也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挨过两天之后，我给苏斯洛夫回电话说，恕我有违他的指示，无法支持K做候补人选。

第2章 套中人

苏斯洛夫被人们称为“套中人”，是个名符其实的干面包。他对所有的人都以姓氏称呼，当然，总书记除外。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楼的五楼即与勃列日涅夫同一层楼上，占用一套所谓的二号办公室。

即便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须持有盖了特别印章的公务证明，才能自由出入五楼。应邀前来商讨事务或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人，一律严格按照名单放行。查验证明文件之后，再发放去五楼的通行证，有人指引乘哪部电梯可以上楼。到了五楼，还要重新查验一次证件。

在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也建立了同样的制度。

苏斯洛夫从不迟到，总是在九点差五分准时上班。九点钟时他已经坐在写字台旁边了。中午一点整他去用午餐，饭后休息，两点又开始工作。下午六点，苏斯洛夫从办公桌跟前起身，乘车前往别墅。

别的政治局委员常常受到嘲弄，苏斯洛夫却不会让人找到这种把柄，唯有他对套鞋和老式西装的癖好可供一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曾经讲述过去伏努科沃二号机场迎接外宾的情形。政治局委员们走在前头，其余的人略略靠后。

叶戈雷切夫突然高声说道：“咱们政治局真穷啊！”

大家停下脚步，回头问道：“什么？”

“整个政治局只有一双套鞋！”

天气干干爽爽，苏斯洛夫却穿着雨衣和套鞋。

勃列日涅夫笑了，这种事让他开心。

苏斯洛夫坐汽车宁愿开得慢一些——时速勉强40公里。当最高领导人们的车队前往政府机场伏努科沃二场时，谁都不会试图超他的车。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说过：

“今天你超车，明天你超车，后天你就没有了可坐的车去超了。”

苏斯洛夫没有偏爱之人、知交好友、眷顾对象。他非常关注自己大公无私党员的声誉。一位退役将军上书中央委员会，说苏斯洛夫因出书

和发表文章收入大量稿费，而这不合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苏斯洛夫极为难过，因为他一向严格遵守职务方面的道德准则，清楚地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政治局委员应当将稿费转入中央委员会庶务局或者和平基金的账户。

苏斯洛夫找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让他看了将军的来信。雅科夫列夫从未见过苏斯洛夫为此六神无主！苏斯洛夫开始替自己辩白：

“可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啊！我可以提供把钱交给哪里了的清单，助手们手里各种证据都在。我求您将这位将军请来，向他解释清楚，我并没有干这种事。您和他谈一谈，不过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得罪他，作作解释就可以了。”

雅科夫列夫找来了将军。那人浑身发抖，自己先吓坏了，觉得去招惹这样的大人物真是斗胆。雅科夫列夫向他一一作了解释。

“我是一时冲动了！”将军开始表白，“有人对我那么一说，我也就写了信，请您多多原谅。”

雅科夫列夫向苏斯洛夫电话汇报，说他所交待的任务已经完成。

苏斯洛夫这才如释重负，甚而喜出望外：“您是否告诉了他，说对他并没有意见？”

“说了，当然说了，并且安慰了他，甚至还转达了您的问候。”

“做得对！”苏斯洛夫说。

一些乡下亲戚往莫斯科给苏斯洛夫写信，请求帮助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中央委员会用程序化的表格作出答复：请不要分散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对国家重大事务的注意力。

有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维克多·费奥多罗维奇·斯图卡林为外交部副部长。苏斯洛夫听到这个熟悉的姓氏，便举目四顾，看见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后，便厉声问道：

“这是您的亲属吗？”

结果，两个斯图卡林只不过是同姓而已。如若他俩是亲属，苏斯洛夫可能就不会批准这项任命了。

“苏斯洛夫个子很高，”常来莫斯科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回忆说。“生就颧骨高耸的一张瘦脸，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目光锐利的灰蓝

色的眼睛……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谨言慎行、异常腼腆的人。”

第3章 路高升的思想总警监

苏斯洛夫秉性保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懂得变革对现行制度不利。他不允许自己采取任何主动。那些年里他心爱的一句话是："这并未吩咐过我们。"

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向身边的人抱怨说："会场上可能大家都睡着了——实在枯燥乏味。你们都知道地基里打桩的情形吧，苏斯洛夫就是这样——没有一句生动的话，没有一点新鲜的想法——全是说过、写过了千百次的老一套。"

苏斯洛夫1902年11月出生在萨拉托夫省赫瓦伦县的沙霍夫村。他童年患过肺结核，生怕旧病复发，因而总是将衣服裹得严严实实，脚穿套鞋。在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中，他是唯一一个不爱打猎的人——担心感冒，况且这类娱乐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年轻的苏斯洛夫在县贫农委员会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涯，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他的父亲。不过他并不想一直待在农村里，1920年他徒步抵达塞兹兰，再从那里前往莫斯科。

苏斯洛夫考入工人预科，后来又被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录取。

在该院毕业后，他考入红色教授学院，这是培养社会科学教员的高等学校，同时也为中央机关培养干部，学院由中央宣传部领导。

结业后，苏斯洛夫担任中央委员会直属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视察员，也在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所属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工作过。

1937年苏斯洛夫奉派前往罗斯托夫主持州委，历经清洗之后那里出现许多空缺。大清洗为他开辟了向上的通道，结果他迅速成为州委书记，随后又担任第一书记。

未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罗斯托夫州管理局局长。他们二人都前程辉煌，但一生的归宿却迥然而异。阿巴库莫夫1954年作为叛国分子遭到枪决，而苏斯洛夫则于1982年在医院逝世，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

1939年，苏斯洛夫从罗斯托夫调任奥忠尼启则边疆区委（后来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贝利亚接到报告，说第一书记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管理局的工作感到不满，认为该局表现了"宽宏大量和漫不经心"。苏斯洛夫并不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人，但是非常明白，

在那个时期只有消灭别人才能保全性命和谋得高升。

多年之后，苏斯洛夫对年轻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戈尔巴乔夫讲过，他在新地方开始时处境颇为艰难。斯塔夫罗波尔一个区的党代表会议曾将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政治局宣布为人民公敌。

斯大林去世后，正是苏斯洛夫帮助赫鲁晓夫使党的机关摆脱克格勃的控制，禁止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对党的干部进行业务审查。不过每个工作人员调进机关之前，国家安全机构人员依然必须对其加以考察。调入中央委员会和派遣出国都要经过考察。但在党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中间不得安插国家安全机关的密探，机关工作人员的谈话禁止录音。

苏斯洛夫的出发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对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多少有些约束。苏斯洛夫还记得那些年代，当时连党委书记他们都害怕自己下属中的国家安全机构人员……

战争时代，苏斯洛夫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兼任了北高加索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年德军占领斯塔夫罗波尔，但苏斯洛夫并未因此受到处罚，虽说通常情况下方面军的指挥官都要为重大失败承担责任。1943年5月该城从德军手中获得解放之后，他奉命爆炸喀山大教堂70米高的钟楼。该教堂早在30年代即已遭到彻底破坏，而钟楼依然矗立。据说，苏斯洛夫认为钟楼可能成为德军轰炸机的地标，尽管此前该市已经不再遭受轰炸了。1943年秋，苏斯洛夫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卡拉恰耶夫人驱逐出境。

1944年，苏斯洛夫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立陶宛共和国分局主席。共和国有自己的政权机关，但人们并不很信任它们。立陶宛的所有行政管理系统全都掌握在苏斯洛夫手中。他被授权“就坚决制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苏分子的活动采取措施”。

苏斯洛夫应当为战后驱逐立陶宛人、为加深立陶宛人对俄罗斯厌恨情绪的镇压政策承担责任。正是在立陶宛，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最为猛烈。起初（1944—1946年）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人数多达500之众的大型游击队，它们与红军部队进行真枪实弹的战斗。

1944年下半年击毙了将近2000名立陶宛游击队员，5000余人被捕。

莫斯科意识到立陶宛地下组织的严重性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组建了反对强盗行径斗争总局，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则建立部队作战战役领导司令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第四步兵旅从北高加索调入立陶宛，最大的一些游击队被歼灭。全面清剿取得了效果：“绿林好汉”们消

失在森林之中，改用单纯的游击破坏战术——炸毁桥梁和铁路，最主要得消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人。他们所受的惩罚则是，遭到围剿和逮捕，数万立陶宛人身陷缧绁。

1945年5月24日，苏斯洛夫主持中央政治局立陶宛分局会议，议事日程为“关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匪帮的活跃和加强与之进行斗争的措施”。他认为，惩治机关的工作还不够积极：“未能对敌人显示我们的真实力量”。分局的决议中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未能根据敌人的新战术以应有的方式转变自己的工作”。

苏斯洛夫向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提出请求，要求增派一批业务工作人员，调入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新锐部队，从立陶宛每一个县驱逐50—60个匪首家庭和最凶恶的匪徒，对抓获的“绿林好汉”进行公开审判。

结果为立陶宛调来九个团的内务部队，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急于向地方党的机关推卸反苏游击运动蔓延的责任，抱怨“党和苏维埃机关没有在居民中进行必要的政治工作”。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向立陶宛派出一批视察员。他们报告说，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毫无根据地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匪帮猖獗”的过错推给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在莫斯科的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共和国严重的不足之处受到批评。

然而苏斯洛夫固执己见，认为镇压才是苏维埃政权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

1945年，立陶宛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军事法庭根据第58条（政治性法条）认定8500人有罪，其中将近500人被判处枪决。苏斯洛夫依然认为，法庭人员是在姑息养奸。

怒不可遏的苏斯洛夫对马林科夫说：“考虑到共和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根本不能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军事法庭的这种惩罚政策是强硬的，更确切地说，恰恰相反。”

苏斯洛夫的不妥协精神不再默默无闻。1944年春，经马林科夫申报，斯大林将苏斯洛夫调到莫斯科。他当选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并被任命为对外政策部部长。这个部的名称与其实际任命并不相符。苏斯洛夫的职责是监督外国共产党的行为，通过他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

后来他又领导中央委员会内关键性的宣传鼓动部，在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领导下工作，当时日丹诺夫被非正式地视作党的第二号人物。苏斯洛夫显示出他是一个模范的机关干部，决不允许自己采取任何主动。那些年里他心爱的一句话是：“这并未吩咐过我们。”

1946年，苏斯洛夫受命监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这显然让他很不高兴。他觉得，战争期间为与纳粹进行斗争而建立的这个委员会

非但不复有用，而且会让斯大林震怒。于是他向中央委员会写报告，提出自己的建议：

“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国外宣传的功能转归苏联情报局。《团结报》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纸名不符实，应予停办。”然而这一建议当时并未获得采纳。苏斯洛夫只不过加速了事件的进程。

苏斯洛夫在战后的意识形态运动中谋得高升，这些运动都与排犹活动牵连在一起。他给上级呈文，大谈各机关被犹太人“充斥”之事，向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报告说，许多文化和科学机构中，“在外国和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丧失警惕性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的现象业已根深蒂固。”

1947年5月17日，苏斯洛夫向日丹诺夫呈送报告，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机关中犹太人“充斥”，顺便他也揭露该协会工作中的“重大政治错误”。

苏斯洛夫向国家领导人报告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纪念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诞生100周年，基尔皮乔夫院士称爱迪生为“所有的人都不胜心向往之的典范”，而美国人则是“优秀的民族”。

苏联各部门都接到指示，每年须向中央委员会机关提交关于自身干部工作的报告并必须注明负责干部的民族。即便远离政治的人也迅即明白，中央委员会感兴趣的只不过是犹太人的数量，所谓好报告就是那种能证实已清除掉若干担任重要职务的犹太人干部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机关从那时候开始为领导人设计出专门的表格，它们显示出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多部门的领导干部中犹太人的数量急剧减少。临近1952年时，已经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担任州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或者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不久之后，整个党的机关便全部清除了犹太人。

宣传鼓动机关在苏斯洛夫领导下开始清除大众传媒中的犹太人，有条不紊地逐一清理各文艺协会、文化机构、教学和科研单位。

中央委员会编制了一份犹太人数量表，包括院士、通讯院士、博士和副博士，但物理学家得以幸免，因为原子能项目领导人库尔恰托夫教

授机智地向贝利亚解释说，没有这些人氢弹就造不出来。

1947年5月斯大林让苏斯洛夫担任中央书记兼中央党的机关检查局局长。人们都不敢违抗苏斯洛夫。

有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研究一个棘手的问题。党中央文学艺术部提供了高尔基去世后所出版的文章中大量删节之处的查对结果。例如，从广为人知的随笔《弗·伊·列宁》中便删除了这样一些话：“不可能有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暴君的领袖。列宁生前所杀掉的人，大概比托马斯·闵采尔生前所杀掉的人还要多。”托马斯·闵采尔是宗教改革运动世道激进的布道者，德国1524—1526年代农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领袖和思想家。

中央文艺部建议“再版文集的第17卷，往后不允许在作家生前已出版并经他同意的文章中进行任何删节”。

苏斯洛夫受委托进行分析研究。他是这样考虑的：出版删节本是不明智的，因为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会与高尔基生前的版本进行对比。不加删节地出版也不行，总不能破坏列宁的正面形象吧。于是苏斯洛夫向马林科夫报告，说他大体认为不宜再版第17卷。这就是人们尊重苏斯洛夫之处，他不肯放过任何有害的东西，也不允许自己或他人出任何偏差。

1949—1951年间苏斯洛夫出任《真理报》总编辑。在1952年召开的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斯洛夫成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但一如勃列日涅夫所遭遇的情形那样，领袖之死险些变作他政治前程的终点。马林科夫并不看重苏斯洛夫，莫洛托夫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专家。因此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们剥夺了苏斯洛夫的重大政策决策权。莫洛托夫谈起他时说过：

“苏斯洛夫是个乡巴佬，是个极其令人讨厌的家伙。”

不过，开始疏远老革命战士的赫鲁晓夫倒是需要苏斯洛夫为之效劳。无论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文化水平都不高，常常手握铅笔研读列宁著作的苏斯洛夫让他们觉得非常有学问。1955年夏，他重新被吸收为中央主席团委员。

1957年夏天召开的全会惩治“反党集团”的参与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作了主要的揭发性发言。

苏斯洛夫熟记各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如若发现什么新的因而也是靠不住的危险说法，便会立即将其删除。为此赫鲁晓夫很器重他，相信苏斯洛夫决不会放过各种谬论。苏斯洛夫病态地惧怕变革。他秉性

保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懂得变革对现行制度不利。赫鲁晓夫也警告说，不能进一步走民主化的道路，解冻可能变成一场席卷一切的洪水。就思维方式而言，苏斯洛夫当然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在1960年代他却反对为斯大林全面恢复名誉，因为那就需要撤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苏斯洛夫认为，党不应该让人看见它会犯错误。

已经去职的赫鲁晓夫曾经谈起过苏斯洛夫的“警察式的目光短浅”。据赫鲁晓夫说，正是苏斯洛夫策划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那是国外发表了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授予作者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事情。

“主管我国宣传鼓动工作的苏斯洛夫向我报告了有关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情况，”赫鲁晓夫回忆说，“没有苏斯洛夫，就无法处理这类问题。他说这部作品很坏，不符合苏维埃精神。总之，是一本不成体统的书，不值得出版，于是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估计，在事件的那一阶段，除苏斯洛夫之外，负责人中谁也没有读过那部小说。我怀疑苏斯洛夫也不曾读过。看样子，只是人家给他提供了短短两三页的作品内容概述的资料而已。

苏斯洛夫反对发表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蓝色笔记本》。卡扎凯维奇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拉兹利沃躲避追捕的故事。与列宁待在一起的是他的忠实助手季诺维也夫。

卡扎凯维奇本已将季诺维也夫描绘得不堪入目，但历史经过多年的斯大林式的篡改之后，苏斯洛夫根本不能容忍将一个已被枪决、在党史上遭到抨击之人的名字与领袖神圣的名字相提并论。

赫鲁晓夫讲述道：将该书发给了所有的主席团委员，关于它的问题则列入例会的议事日程。“谁有什么看法？为什么这部书不应当发表?”我问。

“唉，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伸长脖子，困惑不解地瞧着我，“怎么能发表这部书呢?作者让季诺维也夫把列宁称为列宁同志，而列宁也把季诺维也夫称为季诺维也夫同志。季诺维也夫可是人民公敌呀。”

他的话让我吃惊。难道可以歪曲事实，将历史说成与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的模样吗？

即便我们抛开季诺维也夫是不是人民的公敌这一点不论，事实本身也无可争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的确确曾经一起待在窝棚里。他们互相之间如何对待?为何讨论当时的问题，或者在窝棚里喝茶时为何聊天?看来，他们彼此确是以“同志”相称。我甚至认为，列宁对季诺维也夫是

直呼其名——格里戈里，因为他们当时是亲密的同志关系。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持相同的见解……

季诺维也夫在列宁生前是全国最富于威望的人之一。列宁让他担任共产国际主席、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和整个西北俄罗斯的主宰者。列宁终生都将季诺维也夫视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苏斯洛夫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另外一点：斯大林生前和死后大家都被灌输说，季诺维也夫是敌人。这就意味着，现在是否不得不承认，这么多年来有人一直在说谎，在欺骗民众？

“我们的‘总派出所长’苏斯洛夫从前履行了、现在依然在履行派出所长的职能，”退休后的赫鲁晓夫说，“当然，他本人是一个正直的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但是他的警察式的短浅目光却造成很大的危害。

可能有人会对我说：‘你与苏斯洛夫一道担任国家领导人，怎么能忍受得了？’

的确，我想错了。我简单地认为，如果苏斯洛夫在我们的集体中工作，那么我们就能影响他，他也会帮上大忙，因此我没有提出撤换他的问题，尽管当时就有许多人提醒我，说苏斯洛夫起了负面的作用，知识界对他的看法很不好。”

赫鲁晓夫耍了滑头。他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一样，之所以对苏斯洛夫感到中意，是因为此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资信赖。不过勃列日涅夫自己有时候也对苏斯洛夫的僵死教条颇觉苦恼。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提到，有一次苏斯洛夫讲话之后，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向身边的人抱怨说：

“会场上可能大家都睡着了——实在枯燥乏味。你们都知道地基里打桩的情形吧。苏斯洛夫就是这样——没有一句生动的话，没有一点新鲜的想法——全是说过、写过了千百次的老一套。”

按照中央书记之间的责任分工，苏斯洛夫也监管国际政策问题。他关于外部世界的概念，说轻点是远离现实，尽管他也不时出国，愿意的话，完全可以看见人家是如何生活的。

萨福诺夫1960年代初在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任参赞。他讲述过1960年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应工党之邀赴伦敦访问的情形。

会谈结束之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参赞萨福诺夫看见苏斯洛夫对英国人的生活发生兴趣，便决定让这位高贵的莫斯科来宾见识一番传统的酒吧。他问苏斯洛夫是否很久没有进过啤酒馆了。苏斯洛夫说，最近的

一次还是在战后的莫斯科——一位朋友领他去看苏联人民如何庆祝胜利。苏斯洛夫说，他不喜欢上啤酒馆：又吵又脏。波诺马廖夫训了使馆参赞一顿：

“看您脑子里想出了什么样的愚蠢主意，竟然请一位政治局委员进啤酒馆！”

然而苏斯洛夫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同意。他并未料到，酒吧的常客们得知前来的是俄国人后，纷纷端起啤酒杯伸向客人，于是展开了一场友善的交谈。回宾馆后苏斯洛夫满意地对波诺马廖夫说：

“怎么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结果非常好，可惜所说的那些话不能全部用到我们的文件和总结里，终归事情是发生在啤酒馆……”

返回莫斯科之后，苏斯洛夫仿佛忘记了所目睹的一切，重又坚信不疑地大谈西方工人阶级不堪忍受的苦难处境。

第4章 成为坐在总书记右首的人

熟悉内情的人都说，勃列日涅夫看不起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也许，苏斯洛夫是唯一一个他尊敬并且器重的人。

熟悉内情的人都说，勃列日涅夫看不起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也许，苏斯洛夫是唯一一个他尊敬并且器重的人。

1965年6月底，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方参加会谈的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据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布鲁坚茨说，勃列日涅夫建议忘掉过去，表示和解地对印度尼西亚人说：

“我是个新人，你们知道，我从来与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吵过架。”

基本上都是他在讲，苏斯洛夫对他表示支持并略加纠正。勃列日涅夫对苏斯洛夫表示感谢，但说得十分蹩脚：

“我感到满意的是，苏斯洛夫同志发了言，帮助我和我们整个代表团揭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深刻思想和内容，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关于某些国家发展道路的观点……”

叶戈雷切夫曾对我讲过，当他去找基里连科的时候，那人便会开始瞎扯一些对于打猎或其他什么事情的小故事。他总是快快活活，心满意足。他的桌子上放着胡桃——他非常喜欢吃胡桃。只有过了半小时之后才会想起来：

“哦，你有什么事？你是干什么的？”

听罢人家找他有什么事情之后，基里连科不满地说：

“你去找某某吧！你干吗拿一些蠢事来纠缠我？你自己去找总书记好了，他什么都给你办得到。”

苏斯洛夫与基里连科判然有别。他说话简短，只谈公事，绝对不会开玩笑、讲笑话、闲聊不相干的事情。用不着长时间地说服他、证明自己的正确。只消简短扼要地讲清楚问题，他便会马上表明自己的看法。连专业的机关工作人都对苏斯洛夫处理事情的有条不紊、精明干练赞叹不已。

在书记处，他不允许说话超过5—7分钟。如果发言的人超时，苏斯

洛夫便会以冷冰冰的语调说一声“谢谢”，那人也就不再吭声了。

苏斯洛夫从来不对任何人大喊大叫，他十分冷静。无论说来多么奇怪，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总是特立独行。

他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常常用蓝色铅笔改正下属起草的文件中的错误，加上标点符号。不过最让机关工作者们叹为观止的其实是他那种古板的教条主义的表现。苏斯洛夫不容许对总路线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他生性畏惧鲜活的话语，总是将那些试图突破既定条条框框的人一律撤职。

苏斯洛夫对党的事务中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都进行监督，永远对以往如何解决某个问题感到兴趣。要是出现“首次”这个词，苏斯洛夫便会仔细琢磨：首次？——于是推迟问题的解决。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有一次有人把政治局决议草稿送交苏斯洛夫，其中将勃列日涅夫刚刚结束的对联邦德国的出访称为“历史性的访问”。苏斯洛夫便把“历史性的访问”改为“政治上很重要的一次访问”。还解释说，总书记还即将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难道那也会是历史性的吗！……

在政治局会议上，苏斯洛夫总是坐在总书记的右首。勃列日涅夫并不担心苏斯洛夫：他知道此人永远不会暗算他。苏斯洛夫完全满足于二号人物的地位。勃列日涅夫发现：苏斯洛夫从不突出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说这是他做的，总是说“是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决定的”。

谢尔比茨基的助手弗鲁布列夫斯基写道：谢尔比茨基与苏斯洛夫关系不好，感觉他对乌克兰的领导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谢尔比茨基地位巩固之后，便苏斯洛夫不予理睬。也许，这位最大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应归入敢于如此行事的为数不多的人之列。

苏斯洛夫很少离开老广场，而一旦去什么地方讲话、与民众接触，便感到严重不安。他早已脱离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置身他们之中就很不自在。他的讲话令人异常腻烦。

曾在古比雪夫工作过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分配，苏斯洛夫被推举为陶里亚蒂选区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他来到古比雪夫与选民们见面。

“我原以为，”沃罗特尼科夫写道，“苏斯洛夫是个沉着、自信的人。然而当你与他待在一起，特别是他在大会上讲话之前神经质地翻动讲稿，与助手核查原文中的某些事实、评价、结论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

讲话开头几句便颠三倒四，女人般得尖细嗓音显得很不自信——于是我明白了，这个在我想象中意志坚定的人也会心慌意乱。”

苏斯洛夫很关心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之后如何控制社会，为何镇压觉醒了的自由思想。

第5章 平衡之道——书记处主持人的“二人转”

勃列日涅夫粉碎了波德戈尔内企图获得第二号的图谋，将貌似平等的权力赋予苏斯洛夫和自己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老朋友、中央书记基里连科。这二人轮流主持书记处会议，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上通过的。

苏共中央书记处每周星期二下午四点在五楼大厅举行会议。除了各位书记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委员会各部和某些意识形态机构的领导人、陆军和海军总政治部部长、党的中央报刊的总编。他们被赋予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坐在那里旁听，有时候根据会议的进程，要求他们提供咨询或发表意见。

应邀参与某个问题讨论的人在接待室中听候召唤。小绿灯开始闪亮时，便让他们进入会议厅。

书记处评判党委的工作，检查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政治局决议的执行情况，批准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职务。

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讨论结束之后，大厅里只留下中央书记，有时候也有某个部的领导人。审议的是最敏感的问题——高级官员们的滥用职权和各种过失，对其中的一些过失惩处相当严厉。比如，中央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醉酒，便立即被清除出机关。

勃列日涅夫担心出现一位第二书记，因为此人会主持书记处，掌握苏共中央二号淡紫色印章，无论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是地方的党委书记都受其支配：他任命和撤销他们的职务，派遣出国公干和学习，亦即是说，正是他将“县太爷们”分封到“采邑”，而那些人自然会千方百计地竞相向他表示忠诚。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争夺第二书记的角色。他们为获得权力而斗争，彼此之间自然不会和谐共处。一个人表示支持，第二个人则会拆台。高级领导层的处境便很作难：一个问题取得苏斯洛夫的同意之后，还须与基里连科一道解决，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但基里连科也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指示，那时候就不知道该执行谁的命令了。

佩切涅夫教授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又担任契尔年科的助手，他讲述道：

“在那段机关生涯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我们都知道，要是今天某个部里从素常由基里连科监督的乌拉尔来了一位指导员或处长，那

么明天那里也会出现一个从苏斯洛夫监督的斯塔夫罗波尔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很注意保持平衡……”

苏斯洛夫休假或生病的时候，基里连科便一直“当家做主”。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其口齿不清和不会归纳自己的想法，都会给与会者留下强烈的印象。有时候他还会撤销苏斯洛夫已经同意的决定。

1972年12月，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说服中央宣传部领导人格奥尔吉·斯米尔诺夫担任苏联科学院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斯米尔诺夫是科学博士，所长的职位可以开辟通向院士称号的道路。有关他调动的公文辗转于数量众多的党中央办公室。苏斯洛夫签上自己的名字，便于1973年1月休养去了，留下基里连科当家。基里连科将主管宣传部的杰米契夫叫去问道：

“为什么我们决定把斯米尔诺夫调出部里？你们不需要他是不是？”

杰米契夫一下便听出了基里连科的口气：“相反，在新岗位上我们也想密切他和部里的关系，我们非常需要他。”

“嗳，既然需要，就让他在部里工作好了。”于是基里连科取消了苏斯洛夫的决定。

苏斯洛夫回来上班后，装出一副他不在时什么事也不曾发生的样子。半数基里连科的决定却无声无息地胎死腹中。向他提醒说基里连科已有指示的人，在中央委员会肯定干不了多久。人们都非常怕他，书记处内谁也不敢同他争辩。对全机关而言，苏斯洛夫的意见就是法律。谁也不会试图弄清，这是他自作主张呢，还是他的观点已经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

“你往日在宣传部的同事格奥尔吉·斯米尔诺夫的调动是怎么一回事？”我提醒雅科夫列夫，“基里连科可是在苏斯洛夫不在时不声不响地撤销其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基里连科去找过勃列日涅夫，并已与之谈妥，”雅科夫列夫说，“没有取得总书记的同意，基里连科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往往都是这样：苏斯洛夫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不，我们不能采纳这个建议。”

于是中央某个部的领导人便会惊惶地从座椅上蹦起来，说：“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这个问题可是征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同意的！”

对此，苏斯洛夫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再和他谈谈。”

再也没有谁敢反对了。苏斯洛夫的话意味着问题已经结束。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是有名无实的人。如果他说，就这样，不能那样，那么苏斯洛夫从来不会冲撞他。不过，实际上苏斯洛夫在党内已是十足的主宰者，因为勃列日涅夫业已授予他全权。勃列日涅夫喜欢的是专权，而不是治理。勋章、荣誉、掌声——这些东西才合他的心意；他喜欢作报告和接见外国代表团，却不想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乐于将日常事务交付与苏斯洛夫。表面上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的签字意义相同。很快就表明，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明白，苏斯洛夫对他而言更为重要，更加可靠。

尽管如此，基里连科还是感到自信。很早以前便与勃列日涅夫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以“你”相称，这种情况决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除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之外，基里连科对所有的人的说话方式都很严厉、强硬。在党中央机关中，他被公认为是蛮横之人。

第6章 清算古拉格群岛的伊万·杰尼索维奇

在赫鲁晓夫解冻年代，以“党的冲锋枪手”自居的那些作家，经不住与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竞争。当局可以给自己的吹鼓手们赏赐官爵、勋章和别墅，却无法让他们变得才华出众和广受欢迎。

御用作家们得不到读者的好感，因而更加乐意参与在生产意识形态方面对他们无法容忍的天才人物进行扼杀。

1966年11月1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勃列日涅夫在当选为党的领导人后首次就意识形态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讲话阐明了他的观点。

勃列日涅夫首先谈到，十月全会之后（即赫鲁晓夫去职之后）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领域，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十月全会之前的十年期间，这个领域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更多。而这些错误我们纠正起来也不像其他某些错误那么简单……”

接着，勃列日涅夫又说，这正是令他感到不安的地方：

“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手段，诸如一些科学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还有报刊，可以坦率地说，在我们这里常常被用来丑化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日前别人就向我介绍了西蒙诺夫的新作，似乎叫做《战争百日》。在这部作品中，西蒙诺夫将我们带进了迷魂阵。”

勃列日涅夫指的是西蒙诺夫的战地日记，《新世界》杂志准备将其发表，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允许刊出，因为其中如实地描写了战争初期的悲剧。勃列日涅夫举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理由，但让人明白，不许发表西蒙诺夫的日记。

“我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最珍贵的东西，却在某些作品、杂志和我们的其他一些出版物上遭到批评。我们一些作家（偏有人发表他们的作品）硬要人相信，似乎并没有‘阿芙乐尔’的重炮齐发，还说，这只不过是空弹射击，并没有二十八位潘菲洛夫战士，他们的人数更少，这个事实大约是捏造的，也没有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及其呼喊声：‘我们背后就是莫斯科，我们已无路可退了’。”

可以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接到了关于《新世界》杂志上批评家卡尔丁那篇著名文章的报告，文章中说本国历史充斥着神话。

勃列日涅夫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总政治部部长叶皮谢夫将军，此人监管全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纯洁性。

“事情甚至发展到诽谤十月革命和我们党、苏联人民英雄历史上的其他历史阶段，”勃列日涅夫说，“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警觉首先是因为，并未对歪曲事实的行为给予应有的回击……同志们，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从党的立场出发就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书发表意见。”

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是作家。这是索尔仁尼琴第一部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公，小说经赫鲁晓夫批准后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

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杰米契夫第一个发言，因为按照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明白应当为自己的领域内的缺点负责，因而立即诉说自己辖区的复杂情况：

“我很注意谁在宣扬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些错误观点，是《新世界》杂志在宣扬。党的第二十大之后，我国知识界形成了三大集团。一个出现在《新世界》周围，

另一个则在《十月》杂志周围。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二十大、二十一大都是完全错误的。看来，我们的确犯了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建议将特瓦尔多夫斯基撤职。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解除他的职务，他反倒会成为英雄。”

经验丰富的杰米契夫立即着手寻找可以推卸责任的替罪羊，他没有放过搞掉他想摆脱的官员的机会。

“我们最薄弱的领域是电影。我认为，现在是解除罗曼诺夫这一职务的时候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素质很高的人，但也是一个大大的自由主义者。”

罗曼诺夫20年代就读于高级文学培训班，做了新闻记者。战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过十年，官至意识形态部第一副部长，甚至担任过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委员。将其叫做自由主义者毫无根据。然而杰米契夫深知，被指控犯了自由主义，对一个官员而言足以致命。不过杰米契夫撤换电影业领导人的企图未能得逞。罗曼诺夫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72年8月，此时他就任《苏联文化报》总编辑……

中央委员会直属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新任主席佩尔谢对杰米契夫的话表示不满：“我对杰米契夫同志的说法感到非常奇怪，他说我国现在有三个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围绕着《新世界》杂志，另一个围绕着《十月》杂志，第三个我却始终都没听到是围绕着谁形成的。同志们，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么我和你们又归到哪里？”

勃列日涅夫不想牵扯到个人，便在回应杰米契夫的话时指出：“正如

你们所看到的，我在个人方面并没有批评谁。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谁对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有着具体的过错。我知道，杰米契夫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谈的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得出的政治结论……”

接着是苏斯洛夫发言：“赫鲁晓夫担任领导人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祸及所有各方面，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让知识分子产生错觉，宠坏了他们……而关于伊万·杰尼索维奇，我们作过那么多的争论，发表过那么多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一直支持这类集中营文学！要纠正十月全会之前十年间所犯的所有这些错误，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换句话说，苏斯洛夫表明立场：所有的坏事都是赫鲁晓夫而非斯大林干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一大错误。

“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审查、监督工作非常薄弱，”苏斯洛夫继续说道，“至今那个讹诈分子斯涅戈夫还在四处招摇，而我们对此已经说过多少回了？”

斯涅戈夫在30年代是一位极具声望的党务活动家——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负责过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组织部，也曾任伊尔库茨克市委书记。1937年7月斯涅戈夫被捕，侦查久拖不决，使他躲过了最坏的结果。他的案件在大清洗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才交付审判。1939年1月，法庭认定他无罪，解除羁押。然而根据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个人指示，数日之后他重新被捕，一直被羁押至1954年。

赫鲁晓夫因在马里波尔区党委曾与之共事而记得斯涅戈夫。斯涅戈夫获释时，赫鲁晓夫与他进行谈话，对他所讲述的镇压机器的运转情况深感震惊。斯涅戈夫积极参与为无辜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工作，他在赫鲁晓夫去职后仍然从事这一工作。而此时上层统治集团的心境业已发生变化，谁也不愿再去回想斯大林的种种罪行，这种事应当忘记。

勃列日涅夫响应苏斯洛夫关于斯涅戈夫的那一番话：“据说，中央委员会各部、政府的一些部还在接待他，为什么这种事还不结束？”

苏斯洛夫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发表了看法：“我不明白，为什么诸如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将其解职，他就会成为英雄？这是什么观点？如果不能将他撤职，那就委派一个真正的党员同志去那里任副职嘛。”

《焦尔金》的作者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位举国爱戴的真正的人民诗人，对党的官员们而言，则是意识形态敌人，可惜一下子还甩不掉他。

安德罗波夫的发言同样严厉，尽管在有些人眼里他也是个大大的自由主义者。

“中央十月全会之前的那个时期，”安德罗波夫说，“给党和我国人民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没有统一的观点，我指的是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混乱。在我们的历史上，列宁时期与当代之间毫无道理地出现了一段空白。其实这个时期有党、有苏联人民，进行了那么多的创造性工作，可是我们对这个时期的阐述却极尽歪曲之能事……”

安德罗波夫并未点斯大林的名，只是号召正面描写斯大林时期，这一点很快也就成为现实。安德罗波夫当年是斯大林的一名上校，与党的大多数高层领导成员毫无二致。

这时候勃列日涅夫插话说：“在我们谈论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能发表以及如何对待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事。列宁了解到高尔基的一些错误观点之后，便禁止发表他的文章，高尔基后来还为此感谢列宁。”

勃列日涅夫是根据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学习我国历史的，根本不了解列宁与高尔基的相互关系。不过他领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禁止发表作品——这意味着在对艺术家本人施恩。

安德罗波夫接过这个话题：

“都在议论行政干预。可是第一，目前在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根本没有什么行政干预，谁也举不出这样的事实；第二，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共产党员，西蒙诺夫也是共产党员。我们有权像对待共产党员那样向他们追究责任吗？我认为，既然有党的组织，它们就应当过问那些活动家。在这方面却并未实施任何行政干预……”

谢列平与平日一样，谈到意识形态问题时总是那么生硬：“在我看来，情况最糟糕的是电影。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拍摄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无聊电影，而我们的民众正是在这些影片中受到教育。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完全缺乏监督。我们在银幕上不单是常常听到一些庸俗的话，而且不时会出现反苏宣传。我们没有政治上深刻的真正的戏剧，这也不能不令人感到不安。剧院里上演的都是一些畸形的剧目……关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我认为我们已经谈论得太多了，应当直截了当解除他的职务。这不需要中央委员会去做，作家协会就可以办到……”

基里连科同样谈到了《新世界》主编：“我们早就在谈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缺乏根据的事，特别是他的诗作《焦尔金在另一个世界》的危害。它们至今仍在剧院中上演，而那里也有党组织，院长是共产党

员，我们还有一个部，可是谁也没有对此加以过问。要是工厂里出了什么废品，为此马上就会责问区委、市委、部里、经理处，处分一些人；而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有人歪曲列宁主义，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却谁也不过问，我们还谈论什么行政干预……”

勃列日涅夫对会议的进程感到满意。他说，应当责成中央书记处制定一个“指明日期和负责人的具体计划”，然后又以略为缓和的口气作出结论：

“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要撤谁的职、调动谁的工作——既不是针对特瓦尔多夫斯基，也不是针对西蒙诺夫或其他人，问题不在这里。”

西蒙诺夫什么职务也未担任，不可能撤他的职。而撤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过程（考虑到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则延宕了数年之久。

勃列日涅夫明确了首先应当采取的措施：“我们必须在新的基础之上，根据党的二十三大所提出的思想，使我们祖国的历史、卫国战争的历史、首先是我们党的历史自成体系……”

在赫鲁晓夫解冻年代感到自己受压的人们觉察了“上面”倾向的变化。以“党的冲锋枪手”自居的那些作家，经不住与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竞争。当局可以给自己的吹鼓手们赏赐官爵、勋章和别墅，却无法让他们变得才华出众和广受欢迎。

令御用作家们深感憋屈的是，他们得不到读者的好感。因而更加乐意参与在生产意识形态方面对他们无法容忍的天才人物进行扼杀。

1967年9月24日特瓦尔多夫斯基记下了对于讨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的印象：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是为了保障他们安然无恙、顺风顺水，事事亨通，同时又能上升到“决议”、“文件”、“指示”（最新的）的高度，避免了他们自己思考、判断的必要性，也即是说，什么样得卑鄙下流之事他们都能做得出来。

当他们发现有人竟然胆敢纵论这种最高的必要性之时，便会使得他们怒不可遏：你是想显得比我们聪明、高尚，而我们却是臭狗屎；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等着瞧——你自己肯定会走投无路的。

第7章 逆向的寓言——不是把未来而是把过去说成最好

勃列日涅夫手下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自己的仕途。承认斯大林是罪魁祸首便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罪责——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赞成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也有斯大林之后开始仕途的年轻一代，他们无须对过去承担任何责任，但同样为领袖的无可指责辩护，这是出于对原则性的考虑：如果同意说是以前的当局犯了罪，那就意味着不得不承认现今的当局至少可能会犯错误。而必须让民众始终相信，当局永远是正确的，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任何批评！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勃列日涅夫领导集体的意识形态纲领：应当忘记对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时代好事多于坏事，应当谈论好事——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那些偏离党的路线的人必须受到惩处。

结果，随即便开始改写历史教科书，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赫尔岑早就写道：“俄罗斯政府像一则逆向的寓言：它不是把未来、而是把过去说成最好。”

勃列日涅夫手下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自己的仕途。承认斯大林是罪魁祸首便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罪责——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赞成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也有斯大林之后开始仕途的年轻一代，他们无须对过去承担任何责任，但同样为领袖的无可指责辩护，这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如果同意说以前的当局犯了罪，那就意味着不得不承认现今的当局至少可能会犯错误。而必须让民众始终相信，党、政治局、总书记、当局永远是正确的，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任何批评！

这就是当局之所以与那些主张客观评价国家历史的人进行斗争时不肯妥协的原因。

此前一年半的1965年2月，中央各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和戈利科夫，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开会。勃列日涅夫让他们帮助准备他将于5月8日到9日对德战争胜利20周年要作的报告。他说，他有一些想法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叫来一名女速记员，开始口述他认为在报告中应当提出的要点。

他口授了12页之多的内容，当即译释出来，分发给谈话的参与者。

报告中正面阐释斯大林的活动，对大清洗和个人崇拜只字未提。受到批判的只是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首次对所有的参战者、赢得胜利的将领给予应有的评价，这是当年斯大林所不愿意做的事，他忌妒自己的将军和元帅们。勃列日涅夫强调，一定要讲一讲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委员们：

“否则他们会说：勃列日涅夫自己就是政工人员，却忘了讲讲我们。”

据当时在场的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要轻易听从别人的意见……很可能，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宁肯将复杂的问题暂时搁置。他是一个明智之人，避免走极端。不管你如何嘲弄他，如果他对什么东西不太明白，如果他有疑问，他总是说：

“先搁一搁吧，我需要找人商量商量。”

他真的与他所信任的一些人商量，很关心政治局其他委员对新想法的反应。

在讨论报告草稿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大家的话听得很认真，有时还在拍纸簿上作记录。如果谁的话当即受到批评，他便会加以阻止：

“哎，让人家讲嘛，您干吗急着加以指责呀？”

“他善于向别人发问，”斯米尔诺夫说，“他了解他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并且牢记在心。然后便加以运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缺少系统教育和阅读习惯的不足。他不断地将他认为正确的东西贯彻到生活中去。他有一副坚强的性格。”

最终，勃列日涅夫在对德战争胜利20周年前夕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长时间以来首次在整体肯定的语境中提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名字。朱可夫元帅就坐在会场里，这是1957年之后第一次让他出席庆祝大会。

1965年5月11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向苏共中央提供情报：

勃列日涅夫同志5月8日在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各部队和舰队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进行了讨论。现役军人和部队、机关中的职员都赞同报告对苏共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活动所给予的评价并重提约·维·斯大林和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功勋……

这些军官还将报告中提到朱可夫的名字以及他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与他可能重返苏军队伍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有些现役军人对报告中提到约·维·斯大林和格·康·朱可夫的名字表示了不友善的态度。

比如，驻德苏军某集团军的军事论坛主席皮萨列夫上校在年长军官的圈子里声称：

“朱可夫和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在这样的报告中值得提出他们的名字吗？”

不过谁也不曾支持皮萨列夫，大家纷纷证明他的观点的错误……

类似的看法仅仅是个别的，在武装力量的人员中得不到支持。

提到朱可夫的名字激发了对他全面恢复名誉的希望。然而军队的政工人员却对元帅怀恨在心，他们试图阻止他的回忆录出版。

1968年3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出现了许多的回忆性的著作……它们不公正地阐述诸如卫国战争之类的事件，从某些地方弄来档案文献，对其加以曲解，张冠李戴……这些人是从哪里弄来的文献？为什么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变得如此放任呢？”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作出承诺：

“对档案资料我们要加以分析研究，归纳整理。关于朱可夫的回忆录，我们目前正在草拟我们的结论。那里面有许多不必要的、有害的东西。”

档案材料对研究人员已牢牢封锁起来。而朱可夫的回忆录只是在做了荒谬的增补之后才得以问世——仅仅为了博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前往康·尼·列谢利泽将军的第18集团军的时候，”仿佛出自朱可夫元帅手笔似的，“同我一道的有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员亚·亚·诺维科夫，以及总参谋部工作人员谢·马·什捷缅科将军……当时我们大家都为一个问题担心：苏联军人在小地能否经受住考验……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向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列·伊·勃列日涅夫征求意见，但他偏偏远在小地，那里正在进行激战。”

读者都会发笑：元帅朱可夫竟然需要去征求上校勃列日涅夫的意见……

朱可夫元帅被选为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但勃列日涅夫劝他不要前往代表大会宫。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对他的妻子加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就他的健康状况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一连四个小时要不断起立和坐下。”

“不过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很想出席代表大会，”加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试图加以解释，“对他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对党尽义务了。他把出席代表大会本身看作是为自己恢复名誉。”

“他当选代表大会代表，这也就是恢复名誉嘛。”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而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则被视作为斯大林的整个遗产恢复名誉的信号。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领导之一斯帕斯京教训报刊编辑们说：

“你们怎么啦，还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吗？还体会不到报告的精神？”

二十三大上的报告，由中央委员会各个部的二十余人在斯大林当年常住的沃伦斯科耶一号别墅为他起草。讨论报告提纲时，勃列日涅夫在他认为极端的观点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的路线。

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要求采取强硬路线，着重“阶级斗争”。报告的国际部分认为必须强调“针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抵制，但他们听到的回答却是关于“背离列宁路线”、“机会主义”等等议论。

戈利科夫和特拉佩兹尼科夫与勃列日涅夫关系亲密，便去向他告状。

不过，《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国际部第一副部长科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国家部第一副部长托尔库诺夫则认为，报告需要仔细斟酌。

苏斯洛夫召集工作小组开会讨论戈利科夫及其伙伴撰写的报告引言。

此后通过共同努力，终于写成了一篇平平淡淡的报告，激进的口号消失了。

不过，意识形态氛围的改变很快便感觉到了。首先是对待伟大卫国战争的态度。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开始谈论1941年夏季的灾难性失败、被俘的数百万苏联士兵的悲惨命运。为今倾向性正在起变化。

1966年7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允许《新世界》杂志刊发勃列日涅夫所提到的西蒙诺夫那部前线日记，作品题为《战争的一百个日夜》。

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向中央委员会呈送针对西蒙诺夫的详尽的告密材料，指责他说：他认为国家在临战前的政策是错误的，他大肆援引在军队中实行清洗的资料，并认为1939年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条约是不正确的。

苏联部长会议直属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请求，“责成苏共中央文化部审查杂志已批准好刊发的康·西蒙诺夫的前线札记及其注释是否适合发表的问题。”

西蒙诺夫的那些战地日记被扣留，因为书刊检查机关敏锐地察觉到业已变化了的倾向。各种意识形态会议上纷纷提出要求，“为个人崇拜年代辩护，停止诋毁过去，出版培养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书籍”。

楚科夫斯基在1965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平生第一次听广播，发现‘广播就是毒害民众的鸦片’。国内一边是糟糕到令人绝望的经济，绝对的奴役制度，一边又津津有味地沉溺于个别微不足道的光明景象，而且将世所罕见的东西冒充为普遍事实——我国之外的其他一切制度统统被叫做奴役制度。”

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斯卡巴说：

“对斯大林批判得太过火了。结果我们十年来在思想战线上都在为自己而工作，破坏了自信心，从而产生了青年们的虚无主义、不满和反对。”

当时的观点认为：应当以民族理想、甚至民族主义理想的精神教育青年。因为，青年向何处去呢？他们放荡不羁，心目中已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斯卡巴的仕途在哈尔科夫起步，担任过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编辑过报纸，后来成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州委书记。1959年波德戈尔内选中他充当乌克兰首席思想家的角色。他被公认为“真诚的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图鲁阿表达得更为坦率：

“批判斯大林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已不单单是代价，这是对我们的原则的破坏。在文学中，作家们千方百计地力图贬低斯大林活动中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将他描绘为凶手和怪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这方面应当说，今天《新世界》杂志的路线就是那些不满党的政策的人的路线。在该杂志的篇幅中可以看见敌人在张牙舞爪。”

“敌人在张牙舞爪”——这已经是斯大林时代的专用词汇了。斯图鲁阿的话传遍整个莫斯科。所用的词语被认为过于露骨，连在政治局内也不获好感，然而这种趋势却不难理解。

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开始在国家精神生活中发挥特别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对军队的爱护，已发展而为国防部和总政治部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成为勃列日涅夫在军队中的亲信。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自以为是总政治委员和道德的维护者。

叶皮谢夫经历战争，先后担任第40集团军和第38集团军的军委委员。战争末期他与勃列日涅夫同在一个方面军。1946年叶皮谢夫复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奥德萨州委第一书记。

1951年，在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捕之后，部里实行了大清洗。阿巴库莫夫的人纷纷被撤职和关进监牢。调入首都的叶皮谢夫担任了国家安全部主管干部的副部长这一关键性的职务。

斯大林逝世之后，叶皮谢夫奉派从事外交工作，国家安全部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因犯罪而受到惩处，叶皮谢夫避开了这些案子。他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五年，又出使南斯拉夫两年。

1962年6月，叶皮谢夫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三位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在位期间，他都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军队政工人员还从未在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表面上总政治部仅仅拥有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权力。事实上军队政工机关的作用更为巨大，叶皮谢夫在与中央委员会其他各部的争执中总是占据上风。

中央书记处每次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主持者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总政治部有何看法？”

于是认真听取叶皮谢夫的意见。

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是卡拉什尼科上将，勃列日涅夫在前线即已与其相识。勃列日涅夫当时在黑海部队集群政治部任职，而卡拉什尼科则担任归入该集群建制的第47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

卡拉什尼克将军与苏联文学中“歪曲历史真相”的现象进行斗争：

比如，在描写受惩罚军人的生活、枪毙临阵脱逃人员或者在前线表

现出缺乏勇气、惊慌失措、畏缩不前等现象之时，作者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的内幕，而不是那些决定性的特点上，同时还从事件的总链条中选取个别的事实，片面地加以表现，从而歪曲生活的真相，污蔑和贬低战争的英雄……

例如，众所周知，战争初期我们的一些失败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在面对这一时期时，有些作家单单选取最阴暗的色彩，同时却细细玩味退却、被俘的事实之类，将军队表现得对斗争毫无准备。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这些作者是否了解，战争前夕我军处于何种状况？党和政府为防备法西斯的进攻采取了何种重大的措施？……

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上书中央委员会，虽未点出《新世界》之名，但说的就是这份杂志，称其“嘲弄对于苏维埃人堪称神圣的一些概念”。《新世界》事实上在军队中已被禁止订阅，并从推荐出版物的目录中剔除——这是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信号。

叶皮谢夫将军签署了一份呈送中央委员会的针对西蒙诺夫的长篇控告信，该信以这样的话作结：

“康·西蒙诺夫的新书是十分错误的，与苏联作家极不相称。它可能对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造成严重的危害，歪曲了我国人民为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考虑到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札记《战争的一百个日夜》的严重缺陷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认为，将其出版是不适当的。”

叶皮谢夫的意见占据上风，西蒙诺夫的战争日记未能刊出。

叶皮谢夫和格列奇科看过根据西蒙诺夫和另一位军事作家沃罗比约夫为脚本拍摄的描写莫斯科近郊胜利的影片之后，提出了一大堆意见，结果影片被封杀，未获上映。

第8章 石化的意识形态部门

在最高权力集团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斗争，各个集团都竞相设法赢得他的好感。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要求清算赫鲁晓夫式的攻击。

1962年12月20日，赫鲁晓夫尚在主政时，三个部（分管各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学校和中小学部，文化部）合并而为统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勃列日涅夫当权后这个部重新一分为三。其中宣传部领导大众传媒，分管政治学习、口头宣传鼓动、图书馆、博物馆、业余文艺活动、体育运动，监督塔斯社、新闻通讯社、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部长长期空缺，领导该部的是第一副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是一位经验极为丰富的机关干部。他希望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但他与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他具有天生的睿智、农民的健全理智和前线战士的悲惨体验。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不善于拒绝。我总想帮助别人。我时常上当受骗，而我照样相信良心。"

在前线战斗过、直面过死亡的人，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寥寥可数。对雅科夫列夫而言，成人的生活开始于1941年，当时他刚刚中学毕业便奔赴前线，被录取为列宁格勒第二机枪射手学校学员。提前毕业，获中尉军衔，于是1942年初奉派前往沃尔霍夫前线指挥一个排。

"我还记得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雅科夫列夫回忆道，"当时需要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调来了炮兵——一个迫击炮营。凌晨时浓雾突然开始消散，我们对战役协调人一位少校说，必须马上发起进攻，否则完蛋。他却对我们破口大骂，说只能按照批准的方案行动。

"后来发起冲锋。大半的人都牺牲了。我受重伤，中了四颗子弹，三颗打在腿上，骨头粉碎，一颗打在胸口，与心脏擦边而过，两枚弹片至今仍然留在肺上和腿里。医生说，包在肉里了……

"还在野战医院的时候，我就签署了从髋关节处截除一条腿的协议，因为我得了坏疽，腿已经发黑。医生说别无办法，我则对一切都漠然置之，而且也很少有知觉。

"医疗委员会领导人挽救了我的腿，正当我已经躺在手术床的时候，他恰巧来医院探视。这位上级开始翻看病历，问我：'多少岁了？'——'19岁，'我回答说。他说：'还要跳舞呢'。我看见别人开始给他的手上浇水，还给我的鼻子蒙上了纱布……"

就为这最后一次战斗，上尉雅科夫列夫获得"战斗红旗"勋章，以拄着双拐的残疾之身回到故乡的村庄。同样受伤住院的父亲来信说：无论

如何困难，也要让儿子去上学。结果雅科夫列夫进入亚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学习，从那里他被录取用为州党委指导员。

1953年，雅科夫列夫从州委调到莫斯科，进入中央委员会，沿着职务的阶梯顺利晋升，先是在科学部，后来则在宣传部。斯捷潘科夫离开后，雅科夫列夫实际上在领导宣传部。总书记的助手楚卡诺夫给他来电话：

“嗨，现在我们怎样展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活动呢？”

雅科夫列夫谨慎地回答道：

“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办。”

“唉，原来是这样，算了吧。”

勃列日涅夫助手的声音里透露出失望。他本来指望宣传机关完成这一首要任务时能有更大的热情。

雅科夫列夫没有教条主义和死记硬背的习性。在领导宣传部时，清楚地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他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说：

“我国已经造成了产生种种不道德行为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存在着许多装潢门面的现象，必须从党着手（贿赂、酗酒、舞会）。正在孕育出犬儒主义，而这是党腐化的征兆。”

1972年2月15日，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报》上出现了雅科夫列夫一篇题为《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两栏文字抵消了他的前程。一开始，党的主要机关报《真理报》还是支持雅科夫列夫文章的。然而后来在政治局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交锋。

杰米契夫一锤定音：“我们将会大吃这篇文章的苦头。”

1973年4月，雅科夫列夫被免职，派往加拿大任大使，度过了十年愉快、舒适然而无异于流放的时光。1972年雅科夫列夫究竟写了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以致他至今仍然记得这篇文章？

60年代末期，党的机关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共产主义信仰即便在机关本身也仅仅剩下仪式性地誓言效忠的形式。执政的精英中出现了两大集团。特别有势力的是那些人：他们认为国家最好的年代是苏联成为大国的斯大林当政时期，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国家强力政权的拥护者，敢于对抗所有的外国势力，所以应当重新施行他的政策和手段——对国内绝不心慈手软，国际关系中绝不搞什么缓和。领袖的崇

拜者们为大清洗辩护，认为斯大林所消灭的是国家的敌人，尽管实际上大屠杀的主要牺牲者乃是农民阶层。

与斯大林主义者一道出现并壮大的还有另一个集团，他们在克格勃的文件中被叫做俄罗斯党或“俄罗斯主义者”。这些人认为苏联的情况是，为了迎合其他民族，却有意识地限制了俄罗斯人的权利。这个集团中都是一些为俄罗斯担忧的人、反对禁止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作家和艺术家。不过定调的还是那些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的党和共青团的干部。

时至1970年代初，俄罗斯党内分化出了一批彻底的反共分子，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都是世界犹太人策动的，目的是消灭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

对这些人而言，索尔仁尼琴乃是俄罗斯的敌人和中央情报局的奸细，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公开宣称，应当回到过去，国家需要君主制。这些言论都是在党的书记们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们在场的情况下发表的。

这似乎是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一些人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态度。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仇视西方，以高高在上的保护者自居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其他各民族。当然，还有排犹运动。

雅科夫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这些倾向。他表达了机关中思维健全的那部分人的意见，他们为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感到担心，认为在多民族的苏联助长类似的倾向很危险。

其他共和国都密切注视着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既然一些人可以宣扬各自民族、各自语言和各自文化的伟大，那么其他人也肯定不会甘居末后。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苏莱曼诺夫的一本名为《鄙人和我》的书。该书在俄罗斯被视为民族主义的反俄罗斯的著作，说作者歪曲历史事实，嘲弄《伊戈尔远征记》。

有些人要求没收该书，处罚作者。

苏斯洛夫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请到自己那里，进行了一场关于苏莱曼诺夫那部书的谈话。

永远眉头紧锁的苏斯洛夫说：

“季马什·艾哈迈多维奇，你们共和国出了一部带有明显反俄和民族

主义倾向的书。”

“我读过这本书，”库纳耶夫开言道，“并没有发现……”

但苏斯洛夫决不让他把话说完：

“您听我说下去。书中歪曲历史事实，作者嘲弄伟大的古代文献《伊戈尔远征记》。国防部已从所有的军队图书馆没收了这本书。我认为做得很对。请您查清该书和作者的情况，认真惩处肇事者！使其不敢再这样做。”

库纳耶夫表示异议，但苏斯洛夫根本就不想听。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各部的一些资料，”他出示了厚厚的一个卷宗，“都是学者们的信件，一些评论……”

库纳耶夫去见勃列日涅夫。一开始讨论别的一些公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说起来苏莱曼诺夫的书：

“有些人无端地批评这位天才的作家，其中有着一定的嫉妒心理，需要查明作家之间的关系。”

假如苏莱曼诺夫生活在莫斯科，对他肯定是另一种态度，然而书是在阿拉木图出版的，就不足以让勃列日涅夫感到不安。更为主要得多得是，不能得罪一个大共和国和一个亲密的朋友，何况库纳耶夫亲自承担了责任。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让他们自己去查明情况好了。”

总书记的话使苏斯洛夫再也不能采取什么措施，问题转由共和国党中央审查。库纳耶夫妥善地处理了一切。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一些人，警告了一些人，而对苏斯洛夫本人，库纳耶夫则说道：“我们期待着你写出新的诗作来。”半年过后，还故意示威性地将苏莱曼诺夫选作共和国党中央委员。

雅科夫列夫处境艰难，他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人。有传言称，雅科夫列夫属于自己的同名人谢列平的帮派。据说，如果谢列平掌权，雅科夫列夫准会出任高官。无论如何，勃列日涅夫对雅科夫列夫颇为冷淡。《文学报》上那篇著名的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雅科夫列夫的文章是符合正统的党性的。他指责“俄罗斯党”的代表人物丧失阶级主场，背离党的观点，将革命前的俄罗斯理想化。因此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对他表示支持。莫洛托夫在疗养院遇见他时说：

“文章是正确的，很有必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提醒我们防范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险。”

然而有些人无法原谅雅科夫列夫谈论大国沙文主义的那番话。

所有支持所谓俄罗斯党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反对雅科夫列夫，其中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机关的干部，还找到肖洛霍夫，要他致信中央委员会，仿佛雅科夫列夫冒犯了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雅科夫列夫的立场完全符合党的路线，但苏斯洛夫不喜欢他这位下属的独立不羁精神。谁吩咐过他写文章了？干吗他要掀起一场不必要的论战？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应是谨言慎行和学会根本不采取任何立场。

雅科夫列夫被打发去了加拿大。

主管国内民族问题的唯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了。

1981年10月23日，安德罗波夫呈送中央委员会一份情报——《关于共青团青年建筑队队员中的不良现象》，这是克格勃第五局（负责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性宣传活动进行斗争）根据从秋明州获得的材料撰写的。这份情报表明，苏联多么容易爆发民族方面的冲突。情报是由第五局局长博布科夫签署的，内中说：

“当前，在秋明州石油天然气工业最重要项目的工地上，六个共青团青年建筑队的人员超过7000名，由来自外高加索、中亚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人组成。

最近两年期间，这些工程队的队员中产生了若干不良现象。例如，1979年在来自格鲁吉亚的名为‘垦荒25周年’的建筑队队员与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当地建设者之间；在苏尔古特区洛科索沃镇，来自立陶宛的队员与当地居民之间；在普罗夫区的乌连戈伊镇，一群当地青年工人与来自阿塞拜疆的队员之间——都发生了群体性的斗殴。

1980年在下瓦尔夫斯克市，‘青年近卫军’建筑队队员之间发生群殴，共青团员别斯帕洛夫被打死。1981年在托博尔斯克市，来自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建筑队队员之间也发生群殴。通常情况下，上述事件都是出于流氓动机，由食用含酒精饮料和毒品所引发，但后来却具有民族的性质……

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期间，由于集体拒绝工作、破坏劳动纪律和酗酒而遭到解雇的结果，单是在托博尔斯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工地上，‘垦荒25周年’建筑队原有的583名队员便只剩下182人，而‘青年近卫军’建筑队的300人则仅余154人……”

这份报告没有任何结果，甚至谁都不想讨论这类话题。苏维埃政权自己相信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它却害怕公开的行动。它总想让民众永远拥护它的政策，因而极端病态地看待任何反对的表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允许将此类现象公之于众。后来在改革的年代，人们都感到惊奇：哪来的这么些民族问题？

1974年7月，苏共中央任命斯米尔诺夫为宣传部第一副部长，这是一个稳重、明智、谨慎的人。部长依旧空缺。

然而斯米尔诺夫不久便罹患重病。1976年5月，佳热利尼科夫被任命为副部长。

佳热利尼科夫1968年应召来到莫斯科，准备出访保加利亚，当时他已经是车里雅宾斯克州党委书记。除了在中央宣传部的礼节性谈话之外，他还被带去遍访所有的中央书记的办公室。据他说，作为一个外省的党务干部，他对受到如此青睐感到局促不安。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是“相亲”。最后，卡皮托诺夫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谈话持续了半小时。勃列日涅夫让人为其接通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罗季奥诺夫的电话，提前通知说：

“中央可能要把佳热利尼科夫派到一个中部的州去，或者考虑任命他在莫斯科担任要职。”

佳热利尼科夫始终未能出访保加利亚。他等待决定自己命运一直等了三个月。佳热利尼科夫回忆，6月初，他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似乎又要去保加利亚。这次他马上就被带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郑重其事地说：

“谢尔盖·帕夫洛夫已经当选为苏联体育协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共青团中央需要一位第一书记。我和我最亲密的战友们打算向书记处和政治局提名您为候选人……”

次日他在政治局获得批准，再过一天，苏斯洛夫向共青团领导人们介绍了新任第一书记。佳热利尼科夫就这样开始了在莫斯科的仕途。

不久，升官晋爵便随之而来。当勃列日涅夫通过一号政府专用线路打来电话时，共青团中央一位书记正在佳热利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总书记的话他自然听不见，但佳热利尼科夫的脸上却喜笑颜开。

“我视为一种荣幸，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回答说。

谈话的见证者跑遍团中央，到处扬言佳热利尼科夫要调出共青团了。就这样，他当上了宣传部长。

据佳热利尼科夫的副手梅德韦杰夫说，在新职位上，佳热利尼科夫同样因为查到勃列日涅夫光辉履历的一些文件、创作出歌颂总书记时代的种种标语口号而出人头地。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之前，佳热利尼科夫一直领导宣传部。安德罗波夫则将其派往罗马尼亚担任大使……

第9章 一个诗人的遭遇

1968年7月初，《新世界》杂志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作家协会理事会大楼，那里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日益冷淡令人愤怒。他坐上转椅，拨出自动电话二局用户簿上标明的勃列日涅夫的号码。

“勃列日涅夫同志办公室，”一个人的声音回应道。

“我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可以同列昂尼德·伊里奇通话吗？”

“他在代表大会上。”

“请问，我在同谁说话？”

值班秘书报出了自己的姓名。

“您能否转告列昂尼德·伊里奇，说我请求他接见？”

“可以，一定转告。”

翌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再次去作协给总书记挂电话。

另一个秘书拿起了听筒。

“我昨天不是同您通话吧？”特瓦尔多夫斯基先问清楚，以防万一。

“不是。”

训练有素的值班秘书们在接待室里日夜轮班。他们的重要任务是：按照恰当的顺序（根据紧急程度）归纳好为勃列日涅夫送来的文件和回答电话。

“可是我请求过向列昂尼德·伊里奇转告……”

“全都转告了，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那我就等着。”

“好的，我们会找您的。以备万一，您的住宅电话是多少？”

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最好打电话给编辑部的秘书——她会找到我的。

中午响起了来自总书记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特瓦尔多夫斯基甚至没

有明白这是人家接通了他和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便不太有把握地问了一声：

“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吗？”

“是的，是的，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一切都十分出人意料，”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那语气，少说也是客气的，甚而有点‘亲切’意味，仿佛我们昨天在一通轻松友好的闲聊之后刚刚分手。”

特瓦尔多夫斯基请求会面，对他而言，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赫鲁晓夫就曾不止一次接见过他。

勃列日涅夫抱怨太忙：

“命运赏赐我总书记的职位，真是操不完的心哪。”

“我能理解，”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不过，也许总归能抽个空吧。问题涉及我的文学命运，还涉及一件大得多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满口答应：

“等送走了纳赛尔（时任埃及总统），我们就见面，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赞扬勃列日涅夫的这副热心肠：很快就回了电话，不像杰米契夫——两个星期都不肯来电话。

“他总是累得要命，”勃列日涅夫居间调停似地回答，为自己的下属辩护。

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说起自己对付书刊检查机关的困难，他们不让当期的《新世界》出刊。可是勃列日涅夫却说，他完全不懂这方面的事情。两人的谈话以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来再打电话提醒会面的事作结……

《新世界》编辑部里一片欢腾。然而会面的事并未随之实现，而且人家再也不肯接通特瓦尔多夫斯基给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值班秘书们总是回答说：

“他还没有来……他今天不会来……”

而作家协会的领导们一直催逼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定要争取会面。1968年12月19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再也等不住了，便给勃列日涅夫写

了一封信：

最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自从您十分重视我关于接见的请求那天以来，我一直认为不可能再提到我自己了，我明白，您在紧张的政治事务之中根本顾不上与我谈文学。

现在我觉得，（很可能，我想错了）我可以再次请求您接见我，何况我希望向您反映的一切完全不曾失去其重要性，更可能恰恰相反。

特瓦尔多夫斯基给总书记接待室去电话，请允许将信送过去：

“您请来吧。”

人家给他开了通行证。接待室里有两名秘书。其中一人接下了信件。

“请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吧。”特瓦尔多夫斯基提出。

“为什么呢？”

“我想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提醒一下我的事情。”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明来此的目的。

“是呀，您知道，整个这段时间他没日没夜地忙，”秘书为自己的上司辩解。“要说休假——哪来的什么休假呀。”

勃列日涅夫根本就没有回复特瓦尔多夫斯基。

书刊检查部们越来越多地查禁重要作品，每期《新世界》出刊都异常艰难。特瓦尔多夫斯基无法找到管用的上级领导人谈话。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不再接见他，为的是让他明白，他应当下台了。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未料想到这一点，他曾多次反复地说：

“如果我不合高层领导人的心意，那就让一位中央书记把我找去，说：因为某些原因您应当放弃这份刊物。我也就会这样做了。不，他们一直不说，也不愿意会面。”

有那么一些政治局委员，每找到一个借口就会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不过镇压的规模和强度却要由总书记决定。勃列日涅夫并不想过于残酷无情。

西蒙诺夫曾上书勃列日涅夫（他当选第一书记之后不久），谈自己

对于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心。勃列日涅夫接见了他，说：

“只要我还活着，”随即又改口道，“只要我还在这个办公室里，就不会有流血的事发生。”

勃列日涅夫是个头脑健全的人，即便1969年1月22日谋杀他的事也影响不了他。那是欢迎完成“联盟4号”和“联盟5号”飞船航行任务的宇航员的日子。

当载着宇航员们和勃列日涅夫的车队前往克里姆林宫时，人群中响起了枪声。欢迎宇航员仪式的广播、电视直播中断。观众茫然失措地纷纷猜测：出了什么事情？

开火的是站在博罗维茨基大门旁的陆军少尉伊林。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地形测量中等技术学校，1968年春应征服兵役。伊林于欢迎宇航员的前夕来到莫斯科，在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偷了一套民警制服，乔装打扮，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身揣两把从保险库中窃得的马卡罗夫手枪，那个保险库存放他服役的部队司令部军官们登记在册的武器。

参加仪式的车队经过博罗茨基大门驶入克里姆林宫之时，伊林放过第一辆“海鸥”牌轿车，认为车里是宇航员，接着便两支手枪一齐向第二辆轿车开火，以为车里准是坐的勃列日涅夫。他射出了16发子弹。

防弹玻璃未能挡住子弹。而伊林选作目标的那辆车中并没有勃列日涅夫，乘坐的都是宇航员。

“车里司机右首坐着一名国家安全机构人员，中排的座位上是我，”宇航员列昂诺夫在《星火》杂志的访谈中讲述，“我的左边是别列戈沃伊，后排座位上则是捷列什科娃和尼古拉耶夫。

我们的车子出现时，他开始射击。第一发子弹打破玻璃，划伤了安全人员的眉弓。一开始我以为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则——因为那人终究身着民警制服。第二发子弹打进了司机的脖子。

这时格奥尔吉·别列戈沃伊隔着座椅靠背，探身向前猛扳手动刹车。汽车停了下来。

我紧紧盯着这个疯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和困惑，他明白了事情有些不对劲，但住手已经不可能了。

子弹命中司机之后，我猛地转过头来。如果不是这样，据事后弹道鉴定判断，下一颗子弹就会端端地打进我的太阳穴。第三颗子弹触及我胸前的军大衣，第四颗从肚子上擦边而过，第五颗和第六颗则顺着后背

飞走。要是连发的速度稍快一点儿，我便会头部、胸部中弹，稍慢一点儿则会射中胸口。

弹道鉴定之后，人家告诉我：‘您本来会牺牲的。’”

伊林使上士司机扎尔科夫受了致命的重伤，第二天即告不治。

国家安全机构人员抓获伊林时，他已经射击完毕。

列昂诺夫认为，特工机关是知道策划中的谋杀的，因而勃列日涅夫乘坐的汽车让载有宇航员的“海鸥”车先行：

“国家安全机构人员知道，有一个人带着两支手枪潜逃，人们四处寻找，却未能寻获。于是便改变了汽车顺序。不是由身着防弹背心的专家‘拼凑’成一辆车，而是干脆由我们顶替……”

民警的确知道，有一名从部队出逃的带有两把手枪的军官在城里流窜，然而谁都完全不曾料到，这名军官会谋划针对总书记的恐怖行动，因而谁也没有提醒勃列日涅夫，他应当距离车队的首车远一些。伊林少尉开始射击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卫队长说：

“真是岂有此理！竟然在克里姆林宫胡乱开枪。”

他的卫士们则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决定不将伊林交付审判。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虽然谁都不明白，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何以会成为部队里的军官。他被关入喀山一座精神病院17年，另有两年则是在列宁格勒羁押。经过20年的强制性治疗之后，1990年才放他出院。

此次事件过后，政治局委员们卫队的定员增加了。必须给予勃列日涅夫以应有的评价，他的行为方式并无改变。他既未被吓倒，也没有不必要地疑神疑鬼。在这点上他与安德罗波夫迥然不同。安德罗波夫1956年在布达佩斯目睹国家安全机构人员被绞死之后，终其一生都是提心吊胆。

第10章 “布拉格之春”的前后

到处都照抄列宁的论断，援引总书记的言论和仪式上用的党内套话。

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忍气吞声，只能按现存的条条框框行事，别无他法，各方面一律如此。

伊诺泽姆采夫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变成了苏共中央的智囊团。第二个这样的智囊团则是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其领导人为阿尔巴托夫，同样是一名上过前线的人，曾在安德罗波夫领导的中央那个部里工作。

伊诺泽姆采夫和阿尔巴托夫在智力上为国家领导人增强营养，促使最优秀的学者们的大脑为政治局工作。据说，这样做的收效并不大。总的看来，只有十分之一的科学成果得到利用，十分之九都徒劳无益。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径直将分析报告扔进了纸篓。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是没有院士和国际问题专家们提供的建议、预测和信息，领导人不知还会干出多少蠢事……

在研究所的著作中，同时还包含着相当准确和客观的分析。然而到处都照抄列宁的论断，援引总书记的言论和仪式上用的党内套话。自由知识分子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但被迫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忍气吞声，只能按现存的条条框框行事，别无他法，各方面一律如此。

据伊诺利泽采夫称，勃列日涅夫曾有意在党内认真开展改革活动，可是在“布拉格之春”过后便改弦易辙，因为他吓坏了。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1967年底勃列日涅夫曾去过布拉格，但迅即返回。他向自己的助手们述说：

“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一直抱怨主席团委员们；而那些人老想把我叫到一边，几乎都是夜里死气白赖地要求谈话，背过第一书记。每个人都把我往自己一方拉，劝诱我充当同盟者。这与我有何相干？我说：‘请准备好飞机，明天我们就乘机离开。’何必牵扯进他们内部的勾心斗角。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而九个月之后，勃列日涅夫却将军队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什么使得他这样改变自己的立场呢？

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来自布拉格的情报。这些情报给人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背叛社会主义……

1968年8月20日清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他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晤。会晤预定于华盛顿时间傍晚6—8点之间进行。

这是一个休假日，总统也在休息。但大使知道美国总统的私人电话号码。约翰逊拿起听筒，彬彬有礼地邀请大使于晚间8点就便去白宫看一看。

多勃雷宁受权向约翰逊总统通报说，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苏联军队已进入该国的领土，以便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向其提供援助。莫斯科希望美国理解，这一行动不会触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不应该对苏美关系造成损害。

所有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实际上，事情关系到欧洲中心的一次军事行动，关系到50万大军入侵一个主权国家。

总的看来，约翰逊当时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有多大的兴致听大使把话讲完，便谈起他认为更加主要的事情——他即将进行的对苏联的访问。他以上好的威士忌招待这位苏联外交官，讲了几则他的故乡德克萨斯州历史上的可笑事情，便将大使打发走了。

即便约翰逊总统知道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命运也丝毫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他认为天字第一号的任务是限制核军备竞赛，并希望与莫斯科结成伙伴关系。

当然，后来美国外交家们终于恍然大悟，西方强烈谴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然而美国人却无法理解，苏联为何要出兵它忠实可靠的同盟国捷克斯洛伐克。

什么帝国主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什么中央情报局的大规模行动等等神话，纯属无稽之谈。

出兵还是不出兵——这个问题讨论了将近三个月，莫斯科长时间犹豫不决。他们明白武装干涉将会给国家造成何种损害，所以一切都做得事先不让任何人有丝毫察觉。

不仅美国人，而且苏联政治家也是最后一刻方才得知入侵的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不久曾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讲述了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会晤的情况，但只字未提苏联可能出兵的事。

不过，这次军事行动又有什么令全世界感到出人意料之处呢？

那么，明明了解这一切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何以仍然以为他们自己能逃过一劫呢？

他们认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有损苏联利益的事情，只不过取消了书刊检查制度，讨论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的可能性。

国内的变革让捷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冲昏了头脑。捷克人不想一步步循序渐进，小心谨慎地慢慢走向民主，避免给莫斯科留下干涉的口实，反倒像是突然遭遇种种不愉快的事一样，急于脱身。他们为自由的空气所陶醉。

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和人民步调一致，有80%的民众支持新政策，这让莫斯科领导人茫然失措。

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成了人民领袖——这对于党的官员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事。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民众也感受到了这点。杜布切克从未打算与莫斯科决裂。他真诚地热爱苏联，认为勃列日涅夫能看得出他的一片赤诚。

捷克人以为，推翻赫鲁晓夫之后苏联也完全可能出现变化。

捷克人来到莫斯科时，听见人们都在说，勃列日涅夫的总书记当不长久。党内正发生派系斗争，很可能倚重专业人员的现代化拥护者会获胜。这样的希望与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谢列平和政府首脑柯西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当时出现了一首广为人知的四行诗：

我知道情况会有所改善，

因为我们的杜布切克举国喜欢，

苏联的杜布切克同样将要

很快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里面。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并不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但经历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领导人卡达尔，看着他却不胜惊奇。卡达尔在私下会晤时，试图向杜布切克说明，要么他自己以强硬手段恢复国内秩序，要么入侵不可避免。杜布切克不相信莫斯科会出兵。卡达尔以绝望的语气问道：

“您真的不了解您是在同谁打交道吗？”

捷克人当然不了解自己的苏联同志！他们认为，在争取革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会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

但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吗？苏联能不出兵？能让捷克斯洛伐克有机会过它想过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说过：“如果我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我就只好从总书记的位置上下台。”

“丢掉捷克斯洛伐克”会被视为这个国家不愿意全面效法苏联，是意识形态领域削弱的结果。克里姆林宫害怕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识形态传染症”会波及苏联。

克格勃的军官们在布拉格积极活动，这些人监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们的每一步行动，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招募情报员。克格勃的非法逗留人员将自己冒充为西方旅游者，在布拉格到处张贴教唆性的传单。苏联特工机关参与建立秘密的武器储藏点，这些地方被说成准备武装阴谋的证据。克格勃中有一个代号“A”的部门，亦即虚情报部门，它积极采取行动，炮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计划，仿佛那是中央情报局所制定似的。该计划由《真理报》加以发表。

苏联士兵被告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威胁说要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人民政权”。

不过莫斯科的领导人从未亲自进行过认真的宣传。如今政治局的文献已经公开，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圈子里并没有说过这是西方干的。

已经是出兵之后了，勃列日涅夫坦率地与杜布切克以及其他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话，也只字未提西方入侵或国内外的反动势力。

“在国内政策方面，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勃列日涅夫说，“并未考虑我们对此是否喜欢，这让我们很不满意。捷克斯洛伐克地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苏军战士所解放的那些区域的前沿，这些区域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边界。我们有权向你们国内派兵，以便让自己在我们共同的边界之内感到安全。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将来永远都是如此……”莫斯科关心的是保持对东欧的控制。

莫斯科清楚地知道，对社会主义进行任何改革都会导致其覆灭，他们是对的，莫斯科根据匈牙利的经验可知，取消书刊检查、实行自由选举，必将导致制度的改变。而下一步便会是退出华沙条约。

1968年，政治局曾提出派遣四五个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用于显示武力，这已经足够。但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坚持投入不少于20—25个师。苏联的军事行动显得格外有效，因为它是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展开的。

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抵抗——非武装的消极的抵抗。苏联领导人把赌注押在快速突袭的效果上，希望吓住捷克人，却打错了算盘。

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不知所措。捷克人并未开枪，但也没有屈服。政府、议会、党的代表大会，全都谴责武装干涉。苏联的军事机器拿它们毫无办法。

任何一个略为严肃的政治家都不愿与占领当局打交道。苏联政治局不得不释放本来已经准备以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罪名交付审判的杜布切克及其战友，并一再劝告他们妥协。

大学生帕拉赫公开自焚，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抗议。

国家领导人中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政府首脑切尔尼克，向他的母亲表示慰问，但根本无所作为。帕拉赫的行为只不过令他们吃惊而已。他们一心相信，国家所唯一需要的是秩序、安定、正常化。不久之后他们便丧失了自己的职位。

新闻检查日益强化，苏联军队舒舒服服地在这个国家安顿下来，这里有许多廉价的水晶玻璃、桶装啤酒和新鲜火腿。“正常化”将要持续20年之久……

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同）没有谁遭到枪杀。但成百上千的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成了锅炉工、垃圾工。50万人被开除出共产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遭到清洗的占到全国人口的10%。所有这些人整整20年间被从生活中一笔勾销。

被开除出党的人是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者，是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后一次尝试，已被坦克的履带轧得粉碎。再也没有任何人试图改革社会主义以使之得以存续。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已变得不复有演进能力，任何鲜活的思想都被统统扼杀。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葬送了社会主义，而且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抛弃了俄罗斯。当苏联士兵1969年8月手持武器闯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之际，杜布切克的一个战友惊骇地想到：这正是那些1945年

5月曾经兴高采烈地欢迎过的士兵呀！现在他们却用冲锋枪瞄准着

你。

他当即回忆起，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巡逻队常常搜索整个布拉格。于是从这一时刻开始，对他而言那些士兵与这些士兵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他们全都是占领者。

苏军入侵20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轰然崩溃。夺得政权的不是那些每天往苏联大使馆跑的人，而是当年给帕拉赫的坟墓献花的人。这时候才水落石出：在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寥寥无几。

第11章 对斯大林无休无止的争论

并非一切阿谀奉承之词都能博得当局的欢心。这种献媚般的话语必须讲得恰逢其时：如果说迟了，常常会招致愤怒；要是说早了，当局又无法容忍这种急性子的人……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拧紧意识形态领域的螺母，让斯大林的拥护者产生了为领袖恢复名誉的希望。

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部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向党的领导人建议，撰写一篇文章于1963年12月纪念斯大林诞辰90周年："为庆祝斯大林诞辰的整数纪念日，我们的报刊上缺乏相关的材料，根据劳动者的来信和提出的问题判断，这可能会造成不正确的理解，并成为各种错误议论的原由。"

12月13日，政治局责成中央书记处撰写这篇文章。12月1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开会的休息时间，政治局委员们对文章进行了讨论。

勃列日涅夫询问同志们："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应当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第一，我们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第二，商定其内容。"

苏斯洛夫发表赞成意见："我认为，全国都在盼望这样的文章，格鲁吉亚尤其如此。看来，我们不必广泛地纪念90周年，一般也不采取任何类似的措施，但那篇文章要发表。我觉得，现在不应该默不作声。人家会说，中央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人们会正确理解我们的，其中包括一些同志在这里提到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理解的只有索尔仁尼琴之类的人，知识分子阶层中健康的部分（这是多数）会正确理解的。"

波德戈尔内对他表示异议："我们大家，不管怎么样，至少是大部分人，都是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参加者。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发过言，谈论过、批评过斯大林的错误。苏斯洛夫同志也曾经谈过。"

波德戈尔内感到局促不安。这是因为，1961年10月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根据当时还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的建议，通过了将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的决定。1961年10月31日夜间，斯大林被改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波德戈尔内当时为这一决定提出的论据是，斯大林"滥用权力，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

"我不认为，"波德戈尔内继续说道，"应当以某种方式纪念斯大林的90诞辰。如果在报上发表文章，那么就应当写明在他的手下牺牲的是什

么人，牺牲了多少。现在大家都无动于衷，谁也不盼望我们发表文章，谁也不要求我们这样做。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理解我们。除了有害，这篇文章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谢列斯特一反常态，不肯同意自己庇护者的看法：“我的意见与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相反，而且简单明确，这篇文章很有必要。对我们而言，最宝贵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斯大林有错误——对此谁也没有争论。”

波德戈尔内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就应当写明，他杀害了多少人。”

谢列斯特表示反对：“问题不在于列举一些数据。应当说，他是有错误的。可是战争呢？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呢？这可是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事。”

马祖罗夫则不存在疑问：“文章是应当发表的。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花销，但显然这主要是针对外国活动家的，而不是针对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会正确理解一切的。如果不写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那又如何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呢？我觉得，应当考虑在斯大林的墓前竖立一尊像。”

基里连科反对：“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为斯大林洗刷或者改变先前所通过的决定，特别是那些已经在1956年写进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内容。这篇文章会被我们的敌人加以利用，它会向他们提供诬蔑我们的材料。欧洲没有哪个党会拍手欢迎诸如此类的文章。”

基里连科指的是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的著名决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其中首次谈到斯大林的罪行。

党的监督委员会主席佩尔谢同样产生怀疑：“的确，斯大林所造成的危害很多，而且其伤痛至今还能感觉到。这一代人都还健在。90年，这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许，并不需要一篇文章，刊登一则简讯也就足够了。”

格里申认为，应当纪念斯大林的90诞辰：“近年来写了许多回忆录，都不同于中央委员会早先通过的决议。如果能有一篇文章，它倒可以对此起到平衡作用。不过这篇文章应当写得符合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谢列平同样毫不迟疑：“发表文章可以显示我们的真诚和一贯性。比如，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勃列日涅夫同志在纪念胜利20周年的报告中提到斯大林时所受到的欢迎。这一次人民群众也会正确对待的。”

谢列平指的是1965年5月8日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勃列日涅夫提到了

斯大林一次："当时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防务委员会，以便组织领导还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全场曾报以阵阵掌声。

柯西金毫不掩饰自己对领袖的好感："应当寻求正确解决办法的不单是这个问题，而且还有斯大林在历史上总的地位。况且近年来关于斯大林我们这里的确陆续写了许多东西，朱可夫和其他一些人都写过。人们在读，而我们的官方报刊上却没有资料。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行各种各样的议论，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这篇文章则可以让一切都能恰如其分。应当表明，党谴责他的错误，但也指出他积极的方面。"

乌斯季诺夫更是赞成对斯大林的一切好评："在我看来，所分发的文章初稿很好。如果将该文发表，毫无疑问对我们会有好处。"

中央书记兼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发表了反对意见："你们还记得吧，二十大之后在这方面有许多议论，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担心。现在怎样做更好呢——是重新引起担心呢，还是让它就像现在这样，亦即心平气和？十月革命50周年时我们对斯大林可是什么也没说。而当时我们同样讨论过这个问题嘛。"

波诺马廖夫提到当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曾两次研究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大会上的报告文本。同样是那些人（苏斯洛夫和柯西金）发言反对提斯大林的名字，然而如今已时移世易……

波诺马廖夫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起步，领导苏联情报局，是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助手。波诺马廖夫独立精神不足，因此一直未能成为他所期望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里对他并无好感，但一直将他看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行家。

他坚持青年时代的某些理想，憎恨斯大林。

"在纪念粉碎希特勒德国20周年的报告中是一种说法，而现在又发表这样的文章，"波罗马廖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哥穆尔卡的同志们、卡达尔会怎样说呢？历史上的斯大林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对此需要谨慎从事。"

安德罗波夫坚决反对波诺马廖夫的说法："同志们，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自己解决，不必看国外的脸色。我可以说说国外的情况。比如，卡达尔同我会谈时就说过：为什么你们不把伏尔加格勒更名为斯大林格勒？这终归是历史上的名称。你们看，卡达尔就是这样的人。我认为应当发表这篇文章。"

沃罗诺夫指出，“如果我们不发表这篇文章，将是一大损失。”索洛缅采夫说，需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现在新的青年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除了崇拜之外，对斯大林一无所知”。

谢尔比茨基重复他的话：“你们拿课本来看看。学校里在这个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是怎么向我们的青年解释的？除了崇拜，毫无定论。”

库纳耶夫和拉希多夫的意思是，“正确的好文章是有益的。”库纳耶夫也赞成这篇文章。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谢罗夫的态度很坚决：“我十分明确地、毫不动摇地认为，应当根据同志们在这里所说的精神予以发表。人民会欣然接受的。”

卡皮托诺夫为了保险，只援引了他人的意见：“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中央的书记常来见我。我觉得，他们之中多数人都倾向于发表一些材料，以纪念斯大林90诞辰。”

总而言之，政治局委员们完全讲真心话而意见又很分歧，这是很罕见的事。大家都发表意见之后，勃列日涅夫对讨论作了很好的总结：

“我坦白地告诉你们，起初我采取的立场是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值得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吗？可是，经过与许多州党委书记交谈，又听取了你们的发言之后，我认为，我们如果发表这篇文章，的确好处终归还是要大一些，因为谁也不能反驳他的革命功勋。同时谁也不会怀疑他犯有严重错误。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列举牺牲的人的一些数字，而是要以心平气和的语气，用苏共中央理解这个问题的水平和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决定的精神，写出一篇文章来。如果我们发表这篇文章，那么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不怕讲出关于斯大林的真相，指出他在历史上占有何种地位，让人们不致认为某些元帅、将军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的阐释会改变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一路线现在将在这篇文章中进行宣示……”

文章进行了最后加工，压缩至五页，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9年12月21日的《真理报》上。

1970年，斯大林的坟墓上安放了一尊胸像。

同样在1970年的岁末，开始了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的起草工作。12月在勃列日涅夫那里讨论了讲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那一部分。参与的人是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和卡皮托诺夫、文化部长绍罗、科学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勃列日涅夫说，这一部分一片祥和的特点令他困惑不解，讲的都是成绩，仿佛没有困难、失误、缺点。应当让中央委员会率先讲一讲我们还未来得及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他称赞外国广播善于工作：“而关于同一件事情，我们的人过了三天才讲，而且没有一句

生动的话。”

参加讨论该报告的斯米尔诺夫感到惊奇：难道勃列日涅夫是在考虑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正变得一片死气沉沉吗？莫非他已发现大众传媒未能履行自己最首要的任务——提供信息？

“让我们考虑一下，”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都说意识形态是一个薄弱的领域，这是否有道理。须知可以受到窃窃私语的影响：每天都对你悄悄念叨——最后你也就相信了……我想知道：是这样呢，还是那些人在信口开河，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它的成绩，什么是它的缺点。”

“我说的就是，应当在代表大会上维护政治局，还有个人的威信。请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想对诽谤者给予回击，但也不掩盖缺点。应当说，中央委员会在报告所总结的期间之内作了很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整个创作知识界、科学界人士。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上报告了他担任党的首脑四年间的工作，任何批评都会意味着他有些事未能做到。

勃列日涅夫很伤心：“二十大彻底改变了整个意识形态战线。我们至今还不能让它恢复元气。那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倒谈得不多，更多的是指责党的整个制度……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怎么也无法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

勃列日涅夫已与赫鲁晓夫路线决裂。他在内心中仍然赞赏斯大林，认为斯大林的罪行并不是意外的灾祸，揭露这些罪行才是一场灾难。

据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希望“将那些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成就和胜利、秩序和纪律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忘掉大规模的清洗、集中营、贫困和对民主的践踏。尽管自己怀着偏袒与同情，他却明白不能让国家倒退，所以竭力让它避免向左、向右急转弯的危险……但也坚定不移地抗拒无论什么样的改革和让生活的面貌更新。”

第12章 难当的宣传鼓动部长

杰米契夫主管意识形态部门整整十年。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将属于赫鲁晓夫亲信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叫到他那里，直截了当地说：

“同志们提出一个问题，说您必须退职。您与先前领导人的联系过于紧密。”

伊利切夫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斯大林时期他曾任《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辑。领袖逝世后，他奉命去外交部领导报刊局。他是美好生活的爱好者，很欣赏自己引人注目的地位。由于生性活跃，他开始主持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种会当时还极为罕见）。他善于即兴发挥和易于沟通，引起了高层领导对他的注意。

1958年赫鲁晓夫委托伊利切夫主管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1961年又让他担任中央书记，1962年兼任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同年他当选为院士。

伊利切夫办事敏捷、手脚麻利，赫鲁晓夫对他比对其他行动迂缓的“思想家”更为喜欢。1963年受赫鲁晓夫委托在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上作主要报告的正是伊利切夫。那些疾言厉色的言论让人们记住了伊利切夫，他在讲话中猛烈抨击偏离总路线的作家和文化活动家。勃列日涅夫可不需要这种声名狼藉的人。

伊利切夫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而意识形态工作则托付给性格稳重、观点温和的杰米契夫，此前他曾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怀好意的人仍然叫他“化学家”，况且他确实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耶夫化学技术学校。

杰米契夫当过赫鲁晓夫的助手，但他的这一点得到了原谅，因为1964年秋他坚决反对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去世之后，谢列平提议任命杰米契夫为国防部长：杰米契夫富有军事经验，曾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但考虑到勃列日涅夫对谢列平的看法，这样的举荐只会对杰米契夫有害。

他被从国民经济化学部门调到意识形态战线，因为中央委员会认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杰米契夫在高级党校甚至还写过论述19世纪欧洲哲学的学位论文，但这部著作一直未能完成，因为一位中央书记不适合在直属下级机关进行答辩。

杰米契夫仪表优雅，头发长而蓬松，戴一副时髦的眼镜，正像那个时代人们常说的一句戏言：只有迫不得已才干坏事。他对人一视同仁，能不要稿子讲话，给人的印象近乎知识分子一类人物。

党内上层的很多人认为杰米契夫纵容、姑息知识分子，这样的职务应当由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担任。

1970年代初，莫斯科市委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亚戈德金引人注目。

作为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教师，他沿着党务路线努力攀升，终于获任莫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亚戈德金以其态度强硬、顽固落后的讲话而闻名。熟悉他的人都说，他的严厉和偏执乃是其身体虚弱的结果，经常生病加剧了他对周围世界的负面理解。

亚戈德金在市委工作的时候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庇护斯大林主义者，对他能怀疑到意在批判斯大林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感到气愤。他大骂阿布拉莫夫描写战后农村劳动生活的那些长篇小说，气愤地说：

“里面讲的全是些已经被生活抛弃了的东西。”

亚戈德金自己毁掉了自己。他常常向中央委员会标榜莫斯科市委的意识形态工作，这给自己树立了冤家对头。结果，似乎就他一个人是坚持原则的干部，中央委员会机关里全是修正主义者。

他坚持不懈地四处寻找敌人，这引起了高层领导的不满，这些领导人根本不希望有如此多的敌人。想做一个过分热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者，指责别的人都在搞修正主义，这同样是很危险的。

1975年12月在扎维多沃起草党的例会文件期间，在勃列日涅夫也在场的情况下谈到亚戈德金的问题。据切尔尼亚耶夫回忆，勃列日涅夫怀着忧伤的心情感叹同事们不理解他。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道：“如果让亚戈德金领导莫斯科的意识形态工作，您觉得怎么样？”“有人向我说起过他，”勃列日涅夫说，“可是，格里申以前不怎么喜欢他，现在都开始为他辩护。

“在座的人对亚戈德金的看法十分明确：黑帮分子、斯大林主义者、经济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混乱的制造者”。当时大家都说：“怎么能这样呢？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可是一直给党带来损害，害得大家苦不堪言。现在他又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社论——认真一读就会明白，那是反对二十四大在文化领域的路线的，还在其中肆意歪曲列宁的话。二十五大之后还要留着这种人简直不可思议……”

勃列日涅夫听着听着，一会儿瞧瞧这个人，一会儿瞧瞧另一个人，结果说道：“好吧，我回到莫斯科后，同格里申谈谈。”

这时候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到场。他带来了与意大利共产党一位领导人会谈的记录。此人似乎对扎格拉金说：“你们一直说你们这里没有反对派。可你们党内就是有反对派！您瞧瞧亚戈德金在《新世界》上发表的文章吧，难道它符合二十四大的路线？”

吃早饭时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悄悄对扎格拉金说：“瓦季姆，现在正是时候。您把记录放到列昂尼德·伊里奇面前去。”

扎格拉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说明他为何而来，并请勃列日涅夫看看记录。

勃列日涅夫认真地看了很久，然后将记录放进衣袋里，回头对扎格拉金说：

“我们已经在这里谈论过这个人了。我回莫斯科后一定同格里申谈谈。”

应当认为，谈话确实进行了。

1975年12月28日，切尔尼亚耶夫参与了自己的上司波诺马廖夫与格里申的谈话。

“不，不，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这并不是不信任的问题，”波诺马廖夫说服格里申。“可是，您知道，如果您同亚戈德金也进行这样的谈话那就坏了，他事后会在圆柱大厅泄漏党的重要政治举措的……您当然会责怪我们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担心，可是如果晚会由第二书记格列科夫宣布开始，那就会好一些。”

佩尔谢和波诺马廖夫应该在次日于联盟宫圆柱大厅纪念威廉·波克（德国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领袖，1949年后长期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诞辰100周年庆祝会上讲话。宣布晚会开始的人，起先委托的是亚戈德金。但勃列日涅夫与格里申谈话之后，就不让他干了。

苏斯洛夫迅即甩掉亚戈德金。亚戈德金被调出市委，任命为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主管干部的副部长。这位热心的思想家的政治前程就此告终。1977年，亚戈德金奉命退休，借口是身体衰弱。

而杰米契夫则被认为对意识形态工作太过软弱和宽容。福尔采娃（苏联原文化部长）去世之后，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秋让杰米契夫改任文化部长。他关系最亲密的下属从《时间》节目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感

到十分意外。

杰米契夫力图拒绝这一任命，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当着自己卫士的面接见了他，甚至没有让他坐下，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现在问题要由政治局解决。”

杰米契夫垂头丧气地离去。

不过勃列日涅夫个人并没有任何反对杰米契夫之举，因而保留了他在政治局内的候补资格。

新的意识形态书记让《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担任。

齐米亚宁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其实两者都不是，只不过生动的报纸工作不容许像搞意识形态那样冷酷无情罢了。这位《真理报》总编辑在那个时期更为出名的是他对国际象棋的迷恋。

齐米亚宁当过游击队员，战后在故乡白俄罗斯谋得高升，1946年成为戈梅利州委第二书记，后来又担任教育部长。1947年他被批准为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随即升任第二书记。

“齐米亚宁的记忆力非凡，过目不忘，”对他十分熟悉的国家安全部将军诺尔德曼回忆说，“多年来他眼前经见过的人成百上千，但过了一年，过了五年，甚至过了十年，他都能凭记忆回想起一个人履历表上的全部资料，如果这份履历表曾经在他的办公桌上放过的话。”

他五分钟内便能浏览完报纸一个整版，而且已经可以谈论其上所涉及的全部内容。

1953年齐米亚宁调往莫斯科任外交部部务委员，这时候贝利亚注意到了他。

斯大林逝世之后，贝利亚将希望寄托于各民族共和国——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他认为，应当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利，首先是在干部提拔方面。各共和国感到不满的是，总是从辽阔国土的另一端给他们派人来充当各种各样首长的角色，而这些人既不熟悉当地环境，又不懂得那里的语言（也不想懂），可是行为举止倒像主子似的。

贝利亚建议立即通过决定，提拔民族干部，规定主要的民族工作人员应当通晓民族语言，用其进行公文处理。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在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更换了内务部长及其副手。党的领导人则必须由中央主席团来更换，不过第一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则是贝利亚本人物色的：他想让他所喜欢的白俄罗斯人齐米亚宁替换俄罗斯人帕托利切夫。

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建议选举齐米亚宁为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第一书记被指责未能正确地遴选和配置干部，在国民经济的管理中犯有重大的错误。这次全会是在1953年6月25日召开的，正值贝利亚被捕前夕。当然，在明斯克无论帕托利切夫或全会的其他参加者对此都不曾意料到。

次日，全会继续进行。然而，正当明斯克大张旗鼓抨击第一书记之际，莫斯科却逮捕了贝利亚。帕托利切夫被召唤到电话机旁，电话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打来的。他们说，贝利亚业已被捕，要他暂时对此保密，但告知了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如果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向苏共中央提出请求，关于您免职的决定可以撤销。”

结果，同样是那些刚才还准备将自己的第一书记撤职的人，马上又投票赞成他留任。

而齐米亚宁则不得不再次离开共和国并讲清自己与贝利亚的关系。他重又被分配到外交部。1956年他被委派去越南担任大使，四年之后调往捷克斯洛伐克。1965年齐米亚宁获任外交部副部长。但马上《真理报》又需要一位总编辑。

斯图卡林回忆说，1966年《真理报》工作人员博尔津科写了一篇歌颂勃列日涅夫军事功勋的文章，但当时尚未有颂扬总书记的指令。

安德烈·普拉托诺夫（苏联俄罗斯作家）早年即曾说过，并非一切阿谀奉承之词都能博得当局的欢心。这种献媚般的话语必须讲得恰逢其时。如果说迟了，常常会招致愤怒；要是说早了，当局又无法容忍这种急性子的人……

斯图卡林对材料进行订正，删除了对勃列日涅夫功绩的描述，将修改稿送交齐米亚宁过目。齐米亚宁表示首肯。然而，据斯图卡林说，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却怒不可遏地给这位《真理报》总编辑打电话：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无法理解您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态度。你们的报纸执行了一条奇怪的路线，也许您是不喜欢总书记吧？”

不过斯图卡林可能夸大了齐米亚宁的勇气，要么就是此人已经迅速改变了态度。

他身上显现出一些很难讨人喜欢的品质，那可是在担任总编辑时从

未见过的。

有一次，当时领导宣传部的斯米尔诺夫与齐米亚宁谈到，持不同政见者、非法出版者不知何故已归克格勃第五局独家管辖。他们将持不同政见的人投入监牢，驱逐出境，关进精神病院。可是思想是只能用思想来加以战胜的，党组织却袖手旁观。

齐米亚宁对问题的提法大为恼怒：

“你怎么啦，想把党变成持不同政见者的俱乐部吗？”

齐米亚宁自共青团时代开始，即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保持着良好关系。雅科夫列夫有一次去见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谈话期间安德罗波夫打来电话，齐米亚宁打手势让来客不要出声。他对安德罗波夫的所有回答归结为一个字：“是！”

通话之后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你可别说谈话时你在场呀。”

雅科夫列夫企图详细询问，却未能谈成。客人起身告辞，齐米亚宁出门相送，来到走廊上才嘟哝着说：“请你原谅，墙内也有耳啊。”

看来，他是害怕雅科夫列夫谈及什么危险的话题。

齐米亚宁自己却爱干一些他不许别人干的事情。克格勃第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讲过他陪

一天晚上齐米亚宁提出：

“咱们看电影去吧。”

“有点儿晚了。”

“没关系。”

“好吧，我这就叫警卫人员。”

“不用了。”

这位九局工作人员事前已经摸清了齐米亚宁的兴趣爱好，对宾馆所在地区有些什么电影院早就了然于胸。

“这可是一部色情电影啊。”他提醒说。

中央意识形态书记笑了：“这也应当了解嘛。”

事先已经搞清楚几点散场的保卫人员在影片快完时提醒说：

“再有五分钟电影就完了，咱们走吧。”保卫人员说他不喜欢这部影片，齐米亚宁却见多识广地回答说：“算是这类作品中一部普普通通的片子吧。”

第五卷 缓和与紧张

第1章 国防部长换将

所有曾经帮助过勃列日涅夫夺得政权的人，都已迅速丧失了自己的职位。

勃列日涅夫仰赖军人，对他们有求必应。他自认为是行伍出身，以拥有军衔和勋章自豪，喜爱穿军服。

马约罗夫大将回忆过1968年他应召晋见总书记的情形。谈话的内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将军身着野战服，脚穿皮靴，腰系皮带，进门喊报告。办公室内除了勃列日涅夫，还坐着苏斯洛夫。

勃列日涅夫满意地说：

“瞧，我们武装力量的制服多么漂亮。其实是我们的各位元帅说服尼基塔（指赫鲁晓夫），规定裤腿不塞进靴筒里，脚穿矮帮皮鞋。这可是在污秽不堪的环境里呀！”

苏斯洛夫默默地听着。

“实际上是我们的将领们在办公室里养出了将军肚，”勃列日涅夫指了指肚子，“现在他们要蹬上大皮靴已经变得很吃力了。”

勃列日涅夫完全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

“我喜欢的还是老制服。咳，只要一系紧这个地方，”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就会觉得自己变年轻了。不由得会想，要能那样会追求姑娘们也不错呀……”

将军和元帅们对勃列日涅夫普遍持肯定态度，他与赫鲁晓夫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将他们看得无足轻重，从不肯以授奖授衔取悦于他们。

在勃列日涅夫1968年的工作笔记中常可见到一些说明：

“关于奖赏。授予格列奇科列宁勋章，授予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英雄称号，叶皮谢夫——列宁勋章，铁木辛哥、叶廖缅科、巴格拉米扬和莫斯卡连科——十月革命勋章。所有的元帅均配备一辆‘海鸥’牌公务小轿车。”

1960年代勃列日涅夫前往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军部队向军官们发表讲话的时候，外交部工作人员波戈莫洛夫曾见到过他。勃列日涅夫发表罢简短的祝酒词，便轻松地一口气干掉一玻璃杯伏特加。各种小吃应

有尽有，但他连尝也没有尝一口，就立即开会。据波戈莫洛夫说，这一来军人们对他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以自己的豪举令军官们惊叹不已。

国防部长一直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因为1964年秋他支持了勃列日涅夫。就观点而言，他更像保守派，按性格来说，则是一个冷静之人。他并不热衷于宴饮和狩猎，宁肯弈棋和垂钓，一向寡言少语，在家里也是一声不吭，反复演练国际象棋的各式棋局。

在西方，马利诺夫斯基被视作主张使用核武器的主要战略家。不过核导弹技术装备的建造者们都抱怨，别指望获得马利诺夫斯基的支持。他们常说，他的水平还赶不上多兵种合成部队一个师或集团军的指挥员。他容忍主管技术专家仅仅是因为，上级领导需要导弹。

切尔托克院士回忆说，马利诺夫斯基部长一向对建造火箭和进入宇宙的竞争鲜有兴趣，他只想少搞一些重新审查、重新配置，以便平静安闲地度过余生。马利诺夫斯基同样保守地对待其他的新式技术装备。例如，他对直升飞机就不肯认真看待，不相信这种旋翼飞机会成为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

较为年轻和雄心勃勃的军人们都聚集在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周围。可以预料，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长不会当多久了。旧日的功劳已无足轻重，所有曾经帮助过勃列日涅夫夺得政权的人，都已迅速丧失了自己的职位。马利诺夫斯基对此心中有数，自己也说："再过一年半载，我就要退休了。"然而他并没有活到退休。

1966年11月7日，他进行了平生最后一次阅兵，尽管一条腿疼得厉害。第二天便躺下了，再也不曾站起来。他被送进医院，没能从那里出来。1967年4月3日为他举行了葬礼。

勃列日涅夫让格列奇科元帅成为新部长。战争期间他们曾一道在第18集团军服役。

格列奇科在部队中广受尊敬。他拥护研究制造新式军事技术装备，在他的帮助下，武装直升机和一些新型坦克用于列装部队。元帅年轻时曾在轻骑兵中服役。他身材魁梧，神态端庄，喜欢队列训练，要求在部队中开展体育活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勃列日涅夫愈益频繁地回忆其战争年代，对他而言，这实际上是关于青春岁月令人愉快的记忆。

他喜欢过问军事，常常同将军们会面。所有拟任高级军职的候选人均须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党中央行政机关部主管军事干部。能进部机关

的基本上都是政工人员，他们并不与战斗指挥员接触。战斗部队人员常常抱怨，老广场的人同他们讲话时态度傲慢，爱教训人。

掌管行政机关部的是萨温金。

1968年，勃列日涅夫批准他为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长期稳坐部长的交椅，因为他善于搞好人际关系，避免发生冲突。部里任命的统计监督官员是主管政治部门的副师长。在中央委员会，与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进行谈话的是行政机关部的指导员。

师长以上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任命的干部，与他们谈话的是副部长和部长，但并不需要上书记处的会议，而是通过问询方式加以批准。

韦尔捷尔科上将讲述过，身为高级鉴定委员会主席的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想要从报请授予将军衔的名单中删除一个名字，可是随员却阻拦元帅说：

“名单已经在中央委员会签注过了，元帅同志。”

于是元帅手中的铅笔就僵住不动了。

阿梅利科海军上将被推荐担任国家海军反潜部队副总司令职务。这位身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员的海军上将却不愿调往莫斯科。于是中央行政部部长萨温金便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与外国潜艇作斗争的状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把这件事托付给你。”

“谢谢，”海军上将回答道，“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信任。”

“嗯，好好干吧。”勃列日涅夫握了握他的手。

海军上将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总书记又叫住了他说：

“可我得到报告，说你拒绝担任这个职务。”

“最高统帅同志，”海军上将回答道，“我可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拒绝，什么地方不应该拒绝。”

“这就对了。”勃列日涅夫满意地说。

1966年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年届花甲。有人出面向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收集了一笔钱，用来制作寿礼，还通过决议，再次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但勃列日涅夫告诉波德戈尔内，他只

想当苏联英雄。波德戈尔内指出，战争20年前即已结束，但勃列日涅夫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波德戈尔内向谢列斯特转述了这次谈话，他发现上过前线的人都不喜欢这件事情：

“我已经签署了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文件，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的。”波德戈尔内嘟哝着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勃列日涅夫是没完没了地纠缠我，我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但又不想搞坏和他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总算得到了那枚金星奖章。

“您想不到为什么他想当苏联英雄，而不当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呢？”恰佐夫院士问我。“当他的健康开始出现麻烦的时候，他回想起的只是战争。他变得多愁善感了，观看影片《军官》时热泪盈眶，顿时希望人家给他一把马刀，而不要别的什么东西。”

勃列日涅夫三番五次地对军人们说：

“既然我是最高统帅，那么军衔也应当与此相称，中将可不适合指挥武装力量。”

顺带说一句，赫鲁晓夫从战场归来时是中将，他便一直都是中将。帮闲的人们提出再给第一书记肩章上增加几颗星，赫鲁晓夫很明智地加以拒绝：

“我就这样也能对付得了你们。”

格列奇科为了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表示感谢，建议越过上将衔，授予勃列日涅夫大将军衔。勃列日涅夫颇为满意。有一次在扎维多沃，他身着肩章崭新的将军服赴晚宴，得意洋洋地望着周围的人：瞧我多么神气！

爱开玩笑的格列奇科与勃列日涅夫很要好，他是绝无仅有的敢在中央全会上以“你”称呼勃列日涅夫的人。

他在发言时指出，中国人的核导弹并不怎么多。

“而我们呢，”他略略沉默后面对主席团说：“列昂尼德，你估计我们有多少呢？”

勃列日涅夫制止了他：“不能说，别吓唬人！”

第2章 紧张的边境

1964年秋苏联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并未能降低对华关系的紧张程度。不过勃列日涅夫倒是试图利用赫鲁晓夫被革职之机，消除矛盾，使得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赫鲁晓夫下台数日之后，苏联驻北京大使契尔沃年科（原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码电报：

请去拜访周恩来同志，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转告他：莫斯科乐意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参加伟大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莫斯科同意中国代表团此行可供建立联系、交换意见。我们赞成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逐步改善苏中关系”的意见……

执行情况望电告。

赫鲁晓夫刚一被革职，中国便进行了首次核弹试验，北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信。

中国代表团前来莫斯科参加了节日活动，但持续四天的谈判却毫无成果。1964年11月1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以苏共的总路线迄未改变为由，中国同志拒绝接受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而且他们说，如果苏共仍然奉行二十大的方针，遵循自己的纲领，那么他们便看不出停止斗争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指责柯西金，说苏联政府首脑在11月7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走到美国大使面前并与之交谈。

“当柯西金同志以友好的姿态向美国大使走上去之时，我为之脸红。”康生声称，“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他显示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两种态度。”

勃列日涅夫对中央全会的与会者们说：“当时曾通情达理地告诉康生，这只不过是外交上惯常的做法，任何政府首脑都会遵循，包括周恩来同志本人在内。这一事件显然表明，为了与中国的同志们达到相互理解，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苏联代表团建议举行高层会晤。周恩来回答说，还需要为这种会晤创造合适的氛围：“如果你们什么时候认为举行这种会晤的条件已经成熟，你们可以提出某种具体的方案——讨论些什么，如何进行讨论。”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是具有国际性质的首场重要会谈。然而会谈结束后，他的情绪却很悲观：

“极有可能，中国同志将此次接触视作一种火力侦察，他们试图借此摸清我们捍卫苏共原则性路线的坚定程度……我们今后仍将十分坚决地捍卫我们党的原则立场。我们不可能走上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进行武装冒险的道路。我们不会放弃提高劳动人民福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无论与中共保持和睦与友好对于我们多么宝贵，也不能为之付出这样的代价……”

尽管如此，起初勃列日涅夫并未丧失取得某种接近的希望。他从北京召回了对中国领导人采取强硬态度的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契尔沃年科并无个人方面的不满，他被调往巴黎）。然而北京很快又恢复了对苏联领导人的批判，谴责他们蜕化变质，抛弃了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预料，他们会遭到来自苏联方面的进攻，所以在全国各地建造防空洞。莫斯科目睹中国在备战，便考虑如何战胜对手，开始将中国视作头号敌人。边境上也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只是在达曼斯基岛（此为当时苏联的称呼，即中国的珍宝岛——译者注）上发生投入火箭炮兵的战斗，才使双方有所克制。

对莫斯科而言，冲突事件有可能发展成为军事交锋。据其当年的助手回忆，安德罗波夫建议用边防军的部队制止冲突扩大，不允许集团军参与战斗行动。

也有人拥护另一种观点——利用该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强有力的打击。据布鲁坚茨回忆，空降兵司令员马格洛夫在与一批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谈话时抱怨说，不允许他给中国“上课”。他向中央委员会的人暗示，要是能将他的“空降兵小伙子们”空投到北京那该多好，他们能在那里对付一切……

然而事情很清楚，对华战斗行动中的任何成功都只具有暂时的性质。其后又该怎么办呢？与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吗？抑或使用核武器？

勃列日涅夫反对紧张升级，于是冲突逐渐停歇。柯西金领受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与中国人进行谈判。1969年3月末他给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去电话，拿起听筒的是外交官叶利扎维京。柯西金说：

我受政治局委托，要亲自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进行协商。我们试图用高频电话与他们联系，但北京电话站里值班的一个家伙，她的回答十分粗鲁，并拒绝接通我和他们之间的线路。大使馆有什么办法帮帮忙吗？

叶利扎维京解释说，现今如果没有事先与外交部商定，要同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几乎不可能。于是大使馆正式请求外交部安排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通话。一名中国官员回答说：“任何电话交谈都不可能。如果苏方有什么话要告诉中国领导人，那么此事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办理。”

对此叶利扎维京在电话上报告柯西金时用语很克制，因为中国人肯定在对高频电话的交谈进行窃听。

与中国人对话的首次适合的机会出现在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期间。柯西金和周恩来都飞抵河内。据葛罗米柯秘书处原工作人员齐布科夫回忆，苏联外交官向中国人建议安排一次会晤。

中国人迟迟没有反应，柯西金等不及，便起飞返回苏联。当他已经在塔什干作中间着陆的时候，北京才通知说，周恩来准备与他会晤。

政治局认为，柯西金返航有失身份。不过头脑机敏的葛罗米柯想出了一个办法。柯西金终归飞往北京，但在正式报道中则说，返国途中在中国首都作了停留。北京机场的会谈让两国之间的紧张程度得以降低。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相互敌对，导致了美中关系走上正轨。这本身又迫使苏联领导人增加与美国人的接触。

外交政策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认真关注。他起初多少有些怯于国际事务，感到自己不太有信心。勃列日涅夫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常常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举行会谈。但根据记录，与西方国家首脑——总统或总理会晤的，要么是政府首脑柯西金，要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

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每次他回莫斯科，必定要向勃列日涅夫讲述美国的形势。谈话结束时，照例要请其“对今后作指示”。勃列日涅夫总是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你还需要什么指示呀？你比我更懂得如何同美国人打交道，最主要的是维护和平。”

葛洛米柯坚定地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他一再表示，所有的重要会谈都应当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政府首脑来进行。

柯西金起初觊觎在外交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他很乐意出国和接见外宾。在这方面，葛罗米柯和柯西金之间的关系有欠融洽。

1966年1月，柯西金花了将近两星期时间，试图拉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与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立场。两国间无休无止地大动干戈，苏联希望充当调停人的角色。

柯西金自然是由葛罗米柯陪同。苏霍德列夫回忆道，本来该乘车去参加会谈了，葛罗米柯却猛然想起，他把公文夹忘在房间里了——大概是生平头一遭和最后一遭。部长请柯西金稍微等一等，便跑去取公文包。可是柯西金却若无其事地坐上汽车走了。葛罗米柯回来时发现，谁也没有等他。他不知所措……结果只好与译员们一起乘坐“伏尔加”。柯西金瞧了瞧随后赶到的葛罗米柯，以毫不掩饰的挖苦口气说：

“怎么样？把公文包忘了呀？大概秘密全都泄露了吧……”

葛罗米柯尚未当上政治局委员，不敢以牙还牙，但在外交政策中想方设法排斥政府首脑。他知道，勃列日涅夫也不喜欢柯西金在外交方面的积极性。

在沃伦斯科耶一号别墅，勃列日涅夫与齐米亚宁通电话时布鲁坚茨正好在场。勃列日涅夫不满地申斥《真理报》总编辑：

“为什么把有关塔什干的报道放在头条？”

可是柯西金领受的是一项重要使命——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和解，而且他已取得成功，签署了塔什干宣言。不过很不幸，当天夜间印度总理便去世了。

1967年6月，柯西金受命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晤——那是在以色列击溃阿拉伯军队的中东六日战争之后。

全世界都认定，应当与之打交道正是柯西金，因为在莫斯科他是老大。大使们都请求他接见，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函件寄给他，他被视作赫鲁晓夫的政府首脑一职的继承人。

埃及总统纳赛尔逝世时，柯西金赴开罗参加葬礼。他对未来的俄罗

斯外交部副部长、当时担任外交部礼宾司领导人的科洛科洛夫说：“今天就应当去看望总统的遗孀。”

埃及外交官答应对此作出安排：“会晤于明天上午11点左右举行。”

翌日清晨柯西金让译员给他读埃及报纸的标题。原来在前一天，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和苏丹领导人尼迈里已经去过死者纳赛尔的别墅了。

“可为什么我们昨天没能看望纳赛尔的家人呢？”柯西金问科洛科洛夫。

我国的一位外交官悄悄提示说：“报纸上写明，他们是作为兄弟看望家人的。”

科洛科洛夫照说了一遍。

“那我们是什么人？”柯西金火了，“我们难道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您明白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严重性吗？”

鸦雀无声。

“您明白您的行为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吗？”柯西金继续说道。

听了这番话，所有在场的人都选择了回避，留下的只有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和柯西金的助手巴察诺夫。

“我不能把如此重大的事情托付给您，”柯西金最后严厉地说，“您不应继续从事礼宾工作。”

科洛科洛夫连忙去找埃及人。结果，柯西金白白生了一场气。原来，接待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总统的是纳赛尔的儿子，他的遗孀前一天与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今天早晨她苏醒过来，便如约与柯西金会晤。柯西金并不认为需要为无端发怒表示歉意……

葛罗米柯是以全部身心效忠于当下执掌大权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将赌注押在勃列日涅夫身上，结果他并未失算。勃列日涅夫很看重葛罗米柯的耿耿忠心。他们很快便以“你”相互称呼，勃列日涅夫对外交部长言听计从。

柯西金不想交出外交事务，如果背过他讨论外交问题，他就会发脾气。勃列日涅夫很生气，曾对身边的人讲，柯西金一次去英国，从那里打来电话：

“你知道吗，廖尼亚，女王在一座古堡里亲自接见我，那座古堡已经封闭了数十年，现在专门为我打开……”

勃列日涅夫摇了摇头：“我对他说：‘阿列克谢，等你回来后再讲吧。’于是放下了听筒。就这么一个政治家！”

葛罗米柯坚定地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他一再表示，所有的重要会谈都应当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政府首脑来进行。至于外交礼仪，这种事是可以商定的。1971年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大使们开始向驻在国说明，所有发往莫斯科的外交函件不应当寄给柯西金，而应当寄给勃列日涅夫。

1973年10月，适值中东战争爆发当天，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葛洛米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和驻日本大使特罗杨诺夫斯基开会，讨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得到消息：埃及总统萨达特发起了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谈话转而集中到中东问题。大约一个小时过后，柯西金给勃列日涅夫打来电话。他对一件事表示不满：“不知道同谁，却不是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中东战争问题。

勃列日涅夫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他正准备召开政治局会议，让柯西金半小时后赶到。然后叹了一口气说：“要能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切，就得坚强点，不要激动。”又回头对一度做过柯西金助手的特罗杨诺夫斯基说：“你可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切尔尼亚耶夫曾经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听到过总书记与柯西金交谈。勃列日涅夫通话时用的是高音通信电话，无须取下听筒。

柯西金来电话的原因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前来莫斯科访问：“你瞧，尼克松多么蛮横无礼，对越南一直狂轰滥炸，简直是恶棍。我说，廖尼亚，要不，我们是不是推迟他的访问？”

“咳，你说什么？”

“什么!轰炸还会没完没了！”

“轰炸是轰炸，可它再也伤害不了更多的人。”

“是呀，也许吧，不过应当向他写信说说，还是怎么样啊？”

“对，我这儿好像有尼克松发来的那么一封信，我还没有回信呢，现在我可以加以利用。”

勃列日涅夫当即与葛罗米柯接通电话。

“你知道吗，柯西金建议推迟尼克松的访问。他说，轰炸还会继续。”

“他要干什么？”葛罗米柯惊呆了，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接着便一个人发表长篇大论，说“这个柯西金每天都有二十条意见”。

“好了，好了，”勃列日涅夫说，“有什么事我们都到政治局去说。”

身为外交问题专家的葛罗米柯的观点，比政府首脑的意见对勃列日涅夫更为重要。不过在勃列日涅夫健康尚可之时，他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有时根本不要外交部长也能对付。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关系最亲密的工作人员之一埃贡·巴尔曾着文说，1971年勃列日涅夫邀请勃兰特赴克里米亚，“此事做得相当漂亮，根本不让葛罗米柯参与会谈……部长对此不可能感到高兴。不过，他肯定常常也都只好承受打击，而且更为厉害。”

勃兰特写道：勃列日涅夫既不是改革家，也不是革命者，毋宁说是一个具有保守思想倾向的大国统治者。

“尽管体态臃肿，”勃兰特总理回忆说，“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风度优雅、活泼好动、精力充沛、乐观愉快的人。他的表情、手势都显示出他是南方人，尤其是当他在交谈期间感到无拘无束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看上去甚至像个坐不住的人。他很喜欢讲笑话。他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很感兴趣。他曾经问过勃兰特：

“您和尼克松很熟悉，他真的希望和平吗？”

据勃兰特称，勃列日涅夫有一套耍弄“毫无价值的小手腕”的本领，那都是特工机关精心安排的。他在克里米亚首次与联邦德国总理会谈即将结束之际，突然说了一句：

“我希望，您知道您在贵党的领导人中不单是有一些朋友吧？”

借助于情报机关，勃列日涅夫显示他很熟悉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状况，并决定帮总理的忙，指点出其亲信中的可靠之人。勃列日涅夫吃力地读出写在纸条上一位西德政治家的名字，他的意见是勃兰特可以依靠这个人。然而勃列日涅夫的努力枉费心机：总理向来不信任特工机关，无论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

葛罗米柯不喜欢大使们绕过他这个部长径直去找勃列日涅夫，甚至

一再禁止他们这样做。不过，权势赫赫的葛罗米柯并非总是能支配那些驻在大国的大使，他们都敢于自行其是。任命某些大使时并没有葛罗米柯参与。

日后领导塔斯社，随后又主持国家广播电视部门的拉宾，曾经讲述过1965年他应召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情形。谈论的话题是需要物色一位派驻中国的大使——当时正值与北京的关系急剧恶化之际。勃列日涅夫长时间列举大使所必备的种种品质，然后突然说道：

“我们认为，拉宾同志具备这样一些品质。”

于是当即通过这项决定。

对于总书记喜欢的外交官，葛罗米柯并不都很合意。

驻联邦德国大使法林在回忆录中描述过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中不平常的一幕。葛罗米柯和总书记顾问萨莫泰金当时在场。

法林对勃列日涅夫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不知道我汇报上周与德国总理谈话结果的电报您是否收到了。勃兰特约请我到他那里去，实质上就是为了提出抗议……”

“什么电报？几号发出的？”勃列日涅夫回头问葛洛米柯，“安德烈，为什么没人向我报告？”

葛罗米柯狠狠瞪了法林一眼，说道：“列昂尼德，我在电话上向你谈过了电报的内容呀。”

法林没有理睬部长，转述了自己与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谈话，勃兰特毫无根据地指责苏联外交缺乏诚信。

葛罗米柯打断大使的话：“在您看来，只有西德人讲实话……”

法林对总书记说：“列昂尼德·伊里奇，请允许我结束报告，接下来我准备回答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即葛罗米柯）的问题。”

这是公然的挑衅，葛罗米柯对此尚不习惯。据法林本人说，部长脸色发青，收拾好他面前的文件，来到总书记面前说：“列昂尼德，你是知道的，我有一场会晤。稍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这次谈话之后，总书记顾问萨莫泰金友好地对法林说：“给列昂尼德·伊里奇留下的印象是，你在葛罗米柯面前毫不胆怯。同时他也担心，这次不愉快的事件会不会让你付出什么代价。”

但是部长并没有因为尊严受损而报复大使，他善于避免感情用事。不但如此，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不满法林的作为，几乎要将其撤职，这时候葛罗米柯并没有借机火上浇油。

1970年8月1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勃兰特与柯西金签订了《莫斯科条约》。联邦德国和苏联承认战后边界不可破坏，商定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争论的问题。

战后欧洲面对苏联的坦克，生活在恐惧之中。勃兰特签订的《莫斯科条约》让西欧人放下心来。

与德国签订的条约一开始给苏联人留下了惊恐不安的印象。勃列日涅夫给法林打电话时开玩笑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州委书记们纷纷来电话。在斯摩棱斯克抢购食盐、肥皂和火柴，都是：‘和德国人签订了条约，这就意味着快要发生战争了。’”

党的许多官员也反对与西德人接近，不过又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文学报》上出现了一张照片：勃列日涅夫、勃兰特及其夫人手挽手地站着，面带微笑。究竟是谁，难道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和老熟人’，才在我们的报刊上大吹大擂？”

第4章 与尼克松的“蜜月”

勃列日涅夫与自己的许多战友不同，他认真看待同主要的大国搞好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巩固和平。不过他一些亲信后来却断言：“勃列日涅夫所有的和平倡议，都只是为恢复军事均势谋求一个间歇”。

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次真正的西方之行是在1971年——出访法国。他认真准备，否定了外交部所草拟的刻板的讲话稿，要求齐集在扎维多沃国家别墅的助手们挑选富有人情味的词语：

“我们还在前线时就梦想有那么一天，炮火的轰鸣归于沉寂，可以去巴黎，登上艾菲尔铁塔，从那里大声宣告，让普天之下都能听见：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现在就应当清清楚楚地写明这一点，而且不单是写一写，说一说，还应当这样去做……”

1972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飞抵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他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领导的机构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在机场欢迎基辛格的是外交部第一幅部长库兹涅佐夫和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安东诺夫将军。一行美国人被送往列宁山上供外国代表团下榻的官邸群。

刚刚去过北京的基辛格指出，莫斯科的建筑他很眼熟：在中国首都，他就住在这样的公馆里。区别在于，北京的宾馆位于有许多湖泊的一个大公园里，从一座楼可以望见另一座楼，不过楼与楼之间的通道都有哨兵警卫。在列宁山上，每座官邸则用高墙围住，大门一直紧闭。

有个房间里摆着一个巨大的保险柜，专供客人在其中存放秘密文件。但是美国人却信不过东道主，基辛格的助手们怀疑保险柜内部装有类似厨用升降机的活动装置，借助这一装置，夜间可以让文件下降，东道主就能够一览无余了……他们将所有的文件都存放在一个锌制的大箱子里，白天由机要部门的密探守卫，夜间则将箱子放在两个密探所睡的床与床之间。

美国人担心他们被窃听，便使用一种所谓“比勃乐”的装置——放录音带，上面录的是难以分辨的说话声，仿佛有数十人在同时闲聊。当基辛格想与助手们商量事情时，他们便打开“比勃乐”，压低嗓子说话。华盛顿的反间谍工作人员向基辛格保证，任何窃听技术装置都无法分辨磁带所录的嗓音背景下的嗓音。

不过美国人尽可能少用“比勃乐”——这种嘈杂之声简直足以令人发狂。因此他们基本上是相互写字条，要不就是走到外面街上去。即便在

那里也是小声交谈，因为西德总理勃兰特的警卫人员提醒美国人，窃听装置也可能安在树上。基辛格对葛罗米柯开玩笑说，公园里有一棵奇怪的树，他走到哪里，树枝都朝向他垂下来……

1972年5月，尼克松以美国总统的身份首次飞抵莫斯科，这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是一个重大事件，对美国说来也同样如此。此前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从危机走向危机。

1970年，白宫未来的国务卿黑格来到华盛顿16号大街上的苏联大使馆大楼面见多博雷宁。他们单独待在大使办公室，出于安全考虑，那里窗户上的护窗板常年紧闭。黑格以威胁的口气讲述了总统所托付之事的实质。

美国情报机关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南部海滨的西恩富戈斯建设核潜艇基地。在古巴岛上出现载有核武器的苏联潜艇，会破坏加勒比海危机之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所达成的协议。

黑格以尼克松总统名义提出最后通牒：建设施工必须停止。黑格提高嗓门说："要么你们自己清除西恩富戈斯的军事基地，要不我们为你们代劳。"

多勃雷宁的脸色气得发紫。这位大使用冷冰冰的口气宣称，他认为这种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不过莫斯科并不想制造新的导弹危机，因而一切得到妥善处理。过了若干时间，多勃雷宁对黑格说，葛罗米柯委托他通报如下事项：

"我们在古巴并没有核潜艇基地，我们也不会在那里建造海军设施。我们将严格遵循1962年的协议。"

苏联潜艇继续不时开赴古巴，但基地本身却并未建设……

政治局的许多委员，或则对世界事务纯然一窍不通，或则沉湎于某些臆想中的神话。苏联领导人对美国人怀着复杂的感情——既尊敬又蔑视，既妒忌又鄙薄。莫斯科一直对美国的总统选举感到头疼，不知道如何与新的人处好关系……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政治局会议上常常讨论礼宾问题。勃列日涅夫忧心忡忡地说：

"尼克松偕夫人在中国游览长城，而在我们这里夫人们到处都是单独出行，只有在《天鹅湖》中才能成双成对，这合适吗？不应当把尼克松的陪同人员安置在旅馆之内，在那利安德罗波夫无法监视他们。应当让他们全都住进列宁山上的公馆，同时也可以减少接触。机场的欢迎仪式

上，我们通常都是挥动小旗，高呼‘友好！友好！’现在这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应当培训五六个小伙子，让他们用英语对总统说话，比如祝愿会谈成功之类……”

波德戈尔内建议让奥西波夫民间乐器乐队和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给尼克松表演。

勃列日涅夫摆了摆手予以否定：

“这可不是我们可以卖弄的事情。”

苏斯洛夫提出带尼克松去看钻石储备库。

“不行！我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在伊朗见过这种储备库，我们的跟人家比，简直小得可怜。”

1972年5月22日，迎接尼克松的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按照礼仪规矩，勃列日涅夫没有去机场。贵宾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的豪华馆舍内下榻。可是机要部门提醒总统，所有的房间肯定都安有窃听装置。尼克松不肯使用“比勃乐”——那种噪音会使他失去自制。因此所有的机密问题都在美国的封闭式轿车车厢里进行讨论，轿车有人日夜警卫。

会谈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勃列日涅夫开了不少玩笑。他说，如果关系发展顺利，美方就得向苏联提供三四十亿美元的贷款，为期20年，年息2%。柯西金马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可以向美国提供正宗的俄罗斯伏特加酒，而不是侨民所酿造的那种。勃列日涅夫当即建议柯西金和基辛格开办一家俄国伏特加出口公司……

苏联领导人的三驾马车全都参加会谈。勃列日涅夫发表开场白，但美国人发现，他却极力做出需要与同僚保持一致的模样。波德戈尔内发言表达不清。柯西金谈论经济方面的话题，勃列日涅夫缺席时他便就座主持人的席位。

有时会谈在克里姆林宫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内举行。美国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写字台规格之大和电话选择器面板上的按键之多感到惊奇，看起来，只有经验丰富的管风琴家才能对这些按键操纵自如。

与尼克松的会谈并不简单。苏联领导人提起了越南战争的话题，而且谈话是提高嗓门进行的。波德戈尔内愤怒地说道：

“你们是杀人犯，你们的双手沾满了老弱妇孺的鲜血，你们究竟要什么时候才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呢？”

不过，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当即便改换了语调，若无其事地动身去

共进晚餐，大家一起开怀畅饮。

一天晚上，美国代表被请去大剧院观看《天鹅湖》。幕间休息时举行晚宴，勃列日涅夫没有到场。基辛格回忆说，第三幕开始前，大厅里的灯光缓缓熄灭。一个意大利记者的妻子朝着尼克松高呼："反对越南战争！"

东道主们怒不可遏：什么人如此斗胆？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竟敢干这种事！波德戈尔内下令重新打开大厅里的电灯。他和尼克松在政府包间中站立了起来，结果全场不得不为他们鼓掌。

交谈时勃列日涅夫当面告诉尼克松说，他希望与对方建立相互信任的个人关系。据勃列日涅夫称，这是布尔什维克老革命战士的一位代表人物教导他的。勃列日涅夫并未向尼克松说明他指的是谁，却对苏霍德列夫（勃列日涅夫的英语译员）讲："就是莫洛托夫……"美国总统邀请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

尼克松总统被带领到列宁格勒参观。基辛格则只能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葛罗米柯会谈。基辛格还数度前来苏联。每次的计划中都有列宁格勒之行，但由于会谈的任务繁重，每次又都不得不加以放弃。

有一次基辛格对葛罗米柯说："我看，谈论参观列宁格勒简直就是一个诱饵，好借此迫使我与你们合作。我根本不相信有一个列宁格勒。"

"那么我国的革命是在哪里发生的呢？"葛罗米柯迅即反驳。

"在圣彼得堡。"基辛格应对自如，其实他对俄国革命的详情并不了解，也未料想到1917年时北方首都名叫彼得格勒。

1973年5月基辛格飞抵莫斯科，筹备迎接总统的事宜。这一次美国人被请到禁猎区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顾问进行了五天会谈。

基辛格成功地与苏联领导人建立了工作关系。葛罗米柯有时候把基辛格叫作"魔鬼"，但对他却非常重视，并且相信他的承诺。

有时候会谈是在相当奇特的环境里进行的。苏霍德列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提议去猎取野猪。基辛格没有开枪，勃列日涅夫击毙了一头野猪，击伤了另一头，职业猎手前往追赶。剩下了三个人——勃列日涅夫、基辛格和苏霍德列夫。苏霍德列夫从包中取出准备的食品：一条白面包、半个黑面包、香肠、奶酪、黄瓜、西红柿和一瓶"首都"牌的白酒。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说：

“怎么样，亨利，咱们开始吗？别闲待着了，拿刀子切香肠吧。”

苏霍德列夫翻译了，于是基辛格拿起了刀子。

他们三人喝光了那瓶白酒，谈话则涉及一个重要的话题——关于对华关系。勃列日涅夫要求回答：美国人该不是想和中国结成反苏联盟吧？

基辛格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访美前夕，急切希望得到那些没完没了的保证：他在美国要受到客气有礼的接待，不能有敌视性的示威，他要有机会与“普通公民”会见。

勃列日涅夫刚刚访问过联邦德国。法林大使曾回忆勃列日涅夫被带领去联邦总理府的情形。大批民众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这位苏联贵宾。

“把我关在车里拉着来去，就像对待囚犯，”勃列日涅夫口出怨言，“握不上任何一个百姓的手，正眼瞧一瞧也办不到。”他对法林说：“停车，要不我就打开车门，在行驶中跳出去。”

大使试图开导他：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里的规矩和我们不同。”

勃列日涅夫变得闷闷不乐，开始尝试能否将车门打开。法林为了防备万一，请求与司机并排而坐的德国保卫人员让车门无法从里面打开。

勃列日涅夫狐疑地问：

“你这是用德语嘟囔些什么？”

“我想知道，能不能打开汽车顶盖。”

勃列日涅夫大喜过望：

“好样的，你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你让他们打开吧，我能这样和民众打交道也不错呀。”

勃列日涅夫站直了身子，向欢迎他的德国人绽放出了笑容。事后他满意地对法林说：

“嗯，谢谢你，总算有点没有安排得太死板的事情可供回忆了。要

不，急匆匆地一处处走过场，像上了发条似的。”

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九局局长安东诺夫向大使冲了过去：

“你都干什么去了？要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站在汽车上的时候，任何人都能一枪将他撂倒。”

“要不是打开车顶，”法林回答说，“我们的总书记就从车门跳出去了……”

勃列日涅夫曾向基辛格说，他很希望带上家人访问美国。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他谈起美国时，“怀着错综复杂的感情，既有虔诚敬仰的激动，又缺乏信心”。为顺利成行，勃列日涅夫准备克服党中央机关的阻力。

勃列日涅夫出访大洋彼岸的前一年，1972年8月3日，通过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项严重败坏苏联声誉的可耻命令——《关于出国定居的苏联公民补偿国家教育开支的规定》。作为该项法律的阐释，当天还发布了部长会议的一项命令和官员们应予遵循的若干指示。

一个月之后的1972年9月7日，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委员会两个部（国际部和宣传部）和克格勃的一份简短的报告——《关于针对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例行反苏运动的主要宣传和反宣传措施的计划》。报告由代行中央宣传部领导人职务的雅科夫列夫、国际部第一副部长库斯科夫和党务机关出身的克格勃副主席马雷金少将签署。

主持书记处会议的是苏斯洛夫。由于是普通会议，所以出席的只有另外两位中央书记——主管农业的库拉科夫和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杰米契夫。

话题涉及刚刚通过的向出国定居之人收取费用的决定——原因是他们在苏联接受了高等教育。这是针对犹太人的，因为被放行的苏联人实际上只能前往以色列。赎买移居外国权是前所未有的事——这种做法只有纳粹德国（在犹太人还允许离开的年代）才想得出来。德国犹太人必须交纳移居税——全部财产价值的20%。苏联政府宁愿规定硬性的费率。部长会议批准的指示中说，永久移居国外的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生必须支付12200卢布。就当时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国内的平均工资约为150卢布。

苏联领导人推测，世界上可能会掀起一场风波，因此党中央机关和克格勃下令准备开展宣传运动。报告的作者们建议在《消息报》上公布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关于出国定居的苏联公民补偿国家教育开支的规定》。苏斯洛夫则下令，不要在《消息报》、而是在公务性出版

物《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上发表该项命令，为的是不致于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

报告的作者们认为，有必要在《新闻》通讯社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一场高等和中专专业教育部部长叶柳京的新闻发布会。部长应当说明苏联教育的费用是何等昂贵。同时部长和《新闻》通讯社领导人还奉命“在两天内向中央委员会上报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计划”。

苏斯洛夫下令取消新闻发布会。他根本不想向苏联人提起有人希望离开社会主义祖国。

接着又责成外交部起草并向苏联大使们和国际组织中的苏联代表发出相应的指示，必要时，苏联大使们也应当向外国朋友提供消息。

所谓“朋友”，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指的是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一些人并不赞同苏联同志们的反犹太主义，因而需要对他们“进行解释工作”。

最后，苏斯洛夫、库拉科夫和杰米契夫同意苏共中央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上报的《针对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例行的反苏运动采取的宣传和反宣传措施的计划》。

根据宣传部意识形态协作司司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所签发的计划，主要任务由在国外开展工作的《新闻》通讯社承担。《新闻》通讯社奉命“加紧揭露具有仇视人类性质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政策，同时着重注意揭露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其他的苏联大众传播媒介也应当进行同样的工作，但规模较小。

克格勃被责成与敌人的攻讦和“国内的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第五局的一个处负责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安德罗波夫在局内设立了第八处，向其交付的任务便是“发现并遏止犹太复国主义破坏中心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克格勃第五局局长亲自掌管这个处。

世界舆论对该项命令的反应是极端负面的。针对苏联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征收出国税最为强烈的回应便是广为人知的《杰克逊-维尼克修正案》。

美国本已准备好向苏联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草案。尼克松总统也打算发展与莫斯科的关系。然而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对该项法律提出修正案：给予这种待遇须取决于是否取消这项税收并赋予苏联公民自由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在下议院，国会议员维尼克也提出同样的修正案）。

197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无法抑制自己的不满。他不想让那道命令破坏他的美国之行：

我反复考虑该怎么办。在上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已经商定，由安德罗波夫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当时说过，应当暂停征收这种税，尚未废止这项法律前即应允许那批为数五百名的犹太人离境，他们与保密工作或党的机关都毫无关系。于是我开始检查，我的内心感到不安。心想，向萧洛科夫同志打听打听吧。而他却回答说，他对制止收税之事一无所知。萧洛科夫并无过错——他没有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我给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安德罗波夫）打电话：怎么是这样呢？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我向萧洛科夫的副手谈过。这就是说，副手没有向他转告。我给葛罗米柯同志打电话，请他向各领事馆核对。原来，至今还在征收这笔费用……

“这是您作出指示之前的事。”安德罗波夫为自己辩解。

“我们从去年起就在谈论此事，”勃列日涅夫不予理睬，“指示并没有得到执行。这使我感到不安。我们并没有提出废止该项法律，难道我们要靠这种事情挣钱，或者针对美国实行上述政策？杰克逊已经提出了他的修正案，杰克逊赶到了我们前头。这样一来我就想，如果我们这样办事，那么我们的工作有什么价值？一钱不值！”

安德罗波夫请求发言：“对您在上次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出的指示，我应当承担责任。由于我的过错，我们拖延了六天才执行您的指示，这完全是我们的机关反应迟钝的结果。星期六您给我打的电话，当天我就与萧洛科夫同志进行了联系。”

“我在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一直足不出户，”勃列日涅夫打断了他的话，“还不得不操心这个问题。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原谅！基辛格去找多勃雷宁说，想办法帮帮忙吧，尼克松一直做参议员们的工作，但仍然无法通过关于向我们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法律。我们干吗需要这个玩意儿？”

克格勃主席们不想认输：“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请求您仔细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葛罗米柯同志在座，他是知道的，英国人当年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防止人才流失的建议。我们现在无论老头、孩子、成年人都一律放行。医生、工程师等等都走了，院士们也开始提出申请。我向您已经提供了一个名单。”

“根本没有什么院士，”勃列日涅夫回答道，“您就挑选五百人，让他们走好了。”

“我没有听说有哪些院士走了。”对安德罗波夫素无好感的柯西金

说。

勃列日涅夫继续发表议论：

“我扪心自问：难道我国的茨冈人（即吉卜赛人）要比犹太人还多吗？或者我国有一部迫害犹太人的法律？那为什么不肯给他们提供一座五百个座位的小剧院，表演经过我们审查的舞台文艺节目、上演接受我们监督的剧目？如果办一所学校，那又怎么样？我们的孩子甚至可以在英国学习呢。我这样考虑：在莫斯科开办一所学校，就叫犹太学校。教学大纲与其他的学校完全相同。但是在这所学校里用民族语言——犹太语授课。如果允许办一份犹太周报，怎么样？我这是随便说说，因为我还没有为我所说的事情举过手。我只不过是暂且发发议论……从原则上来讲的。同志们对此能够理解吗？”

所有的人都连连点头称是。

“让我们通过这些提议吧。”柯西金说。

“不需要发出书面指示，”勃列日涅夫提醒，“应当召集工作人员，讲给他们听。再说，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还会有人信口开河，说这只不过是战术性的步骤……”

在勃列日涅夫的压力下，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1973年4月通知美国人，说关于征收教育税的命令停止生效，然后又将其干脆撤销。不仅如此，还通过秘密渠道告知华盛顿，苏联将每年放行不少于35000名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眼见大势不妙，又将数量增加到45000人。

国务卿基辛格试图挽救有关在贸易方面对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法律，但他与参议员们的会谈迄未成功。对苏联政策的愤怒情绪如此强烈，终于导致关于贸易的法律草案附加了参议员杰克逊的修正案才于1974年夏天获得批准。1975年1月3日，接替尼克松入主白宫的福特总统签署了该项法律，使其发生效力。杰克逊-维尼克修正案至今有效……

访美前夕，勃列日涅夫像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为同样的一些想法而备感苦恼：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人家会平等地对待他吗？当本国人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他与帝国主义分子们为伍时，他们会怎么说呢？

1973年4月底，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苏共的对外政策》的报告，这是在赴美与尼克松会谈的前夕。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结果也得到了支持。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你在自己的艰巨而责任重大的工作中要记住，我们同你在一起，你可以依靠人民、我们党和苏联军队的大力支持！”

这番话消除了对是否忠于勃列日涅夫方针的怀疑。

6月16日勃列日涅夫飞抵华盛顿。苏联大使馆大楼里举行了盛大的午宴，食品和酒水都是用专机从莫斯科运来的。

6月22日在苏联大使馆参加午宴之后，勃列日涅夫被带领至圣克列门特——尼克松的城郊官邸。由于勃列日涅夫希望住得离美国总统近一些，便安顿他在尼克松女儿平日居住的一幢独家小楼下榻。

与尼克松共进晚餐期间别无他人，他们喝光了美国总统珍藏的一瓶冰镇“首都”牌伏特加酒。勃列日涅夫诉苦：他费了偌大力气去说服领导层中的同事，尤其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要他们同意有必要裁减军备并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些话可能是真情的流露，意在说明克里姆林宫内的形势，同时也是一种花招：我倒是举双手赞成，可是并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啊……

晚上尼克松在露天为好莱坞的来宾举行招待会。宴会期间，尼克松动情地发表祝酒词，谈及两位领导人对全世界儿童的幸福所承担的责任，说他和勃列日涅夫都热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这种责任。深受感动的勃列日涅夫走到尼克松身边，拥抱了他。

晚宴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滞留了下来，多勃雷宁大使充当翻译。勃列日涅夫全神贯注地品味威士忌，不肯喝苏打水，以免“让水糟蹋了”美酒。

据多勃雷宁说，总书记很快便显露出醉意。他再次开始诉说他是何等艰难，因为不得不聆听政治局委员们“各种各样的蠢话”，考虑他们的意见。他甚至说，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存心害他，他不得不加以提防。

尼克松感到心绪欠佳。最后尼克松和多勃雷宁将勃列日涅夫领进他的房间。次日勃列日涅夫问大使：

“阿纳托利，昨天我是不是说了许多多余的话？”

多勃雷宁大使圆滑地回答说，他根本就没有全部翻译。

“你做得对，”勃列日涅夫赞同地说，“威士忌让我鬼迷心窍，我对它还不习惯，没有估计好自己的酒量。”

访问的最后一天，勃列日涅夫白天睡了很长时间的觉，待到美国人去休息了，他倒进入了精神饱满状态。晚上10点，基辛格接到机要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勃列日涅夫坚决要求立即与尼克松会面。然而总统已经入睡。基辛格让转告苏方，他需要先去见总统，到时候才清楚能否

举行计划之外的会晤。

基辛格终归叫醒了尼克松。在微醺状态下就寝的总统立即清醒了过来，心生警觉：

“他们要干什么？”

“不知道，”基辛格回答说，“不过我担心，我们不去与会恐怕不行。”

尼克松吩咐仆人生起窗户朝向大西洋那个房间里的壁炉。基辛格与葛罗米柯取得联系。后者告知，勃列日涅夫希望讨论中东事务。基辛格冷冰冰地回答说，他待总统准备停当后另行通知。

当晚差一刻11点时他们会了面。

勃列日涅夫建议两国间签订一项关于调解中东冲突的秘密协议。然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出结论，协议只会对阿拉伯国家有利，便客气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勃列日涅夫也并未见怪。第二天告别之时他对尼克松说，他是怀着良好的感觉离去的。

1974年3月，基辛格再次飞抵莫斯科，他已被任命为国务卿。

会谈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举行。

“勃列日涅夫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基辛格回忆说，“他那里又增添了几件新玩具。”

他面前放着一个穹形的铜质物件。揭开顶盖后，里面露出六个形似子弹的铜质物体。我问，这是不是装有分弹头的苏联弹道导弹模型，我可不可以透露说每一枚这种苏联导弹装有六个弹头。勃列日涅夫被这话逗得极为开心，于是取下一枚子弹的小盖儿，让我看里面的六支香烟……

另外两件玩具是一块内部机件清晰可见的法国钟表和一块船形手表，据勃列日涅夫说，他能让此表敲击出极为精确的时刻。

一次美国人例行来访期间，基辛格的顾问索嫩菲尔德夸耀自己的那块瑞士手表，这很冒失。勃列日涅夫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表，提出与索嫩菲尔德交换。后者犹豫不决，但终于断定：总书记戴的准是非常名贵的手表。结果失算了，勃列日涅夫交给他的是一块苏联制造的普通钢壳手表。

苏联领导人不顾“水门事件”，一直对尼克松支持到底。

1972年夏天，尼克松及其手下的人决定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用以探知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中的对手们的战略。他们很不走运，这次行动的几名直接参与者被捕，侦查逐步涉及白宫。

尼克松被指控企图隐瞒自己的助手们的犯罪行为，滥用总统权力，表现出对议会和法官的不尊重。

葛罗米柯1974年去华盛顿时曾对尼克松说：

“苏联领导人高度赞许的是，尽管您遭遇了众所周知的困难，却依然信守您的外交方针，这我就不必细说了。对于您的为人，我们极表钦佩。”

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接见了美国大使斯特赛尔并表示惊讶，怎么在美国居然做出这种事情：因为没有交税就对总统提出赔偿请求。勃列日涅夫又补上一句：

“我尊敬你们的总统是因为，他能给对手以回击。”

6月27日，勃列日涅夫亲赴伏努科沃机场迎接尼克松，上次总统来访时可不曾这样对待。

第5章 谈判中愿意寻求妥协

与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后，得到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创造条件，让美苏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如今发现，自己是一个已经将缓和变为现实的人。或许，他也是明白自己负有保卫和平之责的唯一的苏联领导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竭尽一切可能，使热核战争不致爆发。他以自己的善意给西方政治家留下深刻印象，在谈判中也愿意寻求妥协。

勃列日涅夫感到高兴的是，西方报刊将他描写为和平创造者、一位大政治活动家。他也真的在政策上有所改变，比如，缩减了对越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

1973年的四月全会上，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成为政治局委员。这位部长感到更自信了，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已敢于和总书记争吵。

总书记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讲过，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场名符其实的歇斯底里，原因是总书记（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没有让格列奇科知情，便邀请来一位著名的军事设计师与他讨论防务问题。

与会的人对部长的行为都感到愤怒，估计会有一场大爆发。勃列日涅夫却默不作声，始终心平气和，即便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下他也能表现出克制，不挑起事端。不过总书记和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业已开始冷淡。

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与美国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格列奇科说，他作为为国家安全负责的人，不能对这个条约表示同意。

这种表态让勃列日涅夫不悦。他说，他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是他对国家的安全负责。第二天格列奇科去向勃列日涅夫道歉。

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迫使军界同意限制核武器。有一天，他将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召集到老广场上他那里，讨论已经拟好的与美国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草案。军人们拒绝向美国人让步，尽管对方已经采取了主动的步骤。军人们断言，条约草案仅仅对美国有利。争论持续了五个小时，外交家们赞成，军人们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

“那好吧，我们不做任何让步，协议也不签了，核武器竞赛继续进行。那么，你们能不能向我这个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保证，我们一定会超过美国，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变得比目前的状况对我们更为有利？”

在场的将军们谁也不敢作出这样的保证。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勃列日涅夫坚决地说，“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继续让我们的经济精疲力竭？”

勃列日涅夫是1975年于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会议的筹备工作持续了数年之久。对苏联而言，承认战后的边界至为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则是捍卫人权和自由当先。宣读完最终协议的草案后，政治局委员们纷纷声称，不能签订这样的东西，西方会开始向我们指手画脚的：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不过葛罗米柯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参加这个会议，便说对人权方面的问题可以不必在意：“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只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获得了前往赫尔辛基签署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的机会。葛罗米柯尽量只做和说让勃列日涅夫高兴的事情。

切尔尼亚耶夫讲过，二十五大前大家在扎维多沃为勃列日涅夫草拟总结报告，勃列日涅夫突然想起了加勒比海危机的事：

“我忘不了尼基塔（即赫鲁晓夫）是多么惶恐不安，他时而要给肯尼迪发电报，时而又加以阻止、收回。这都是为什么呢？尼基塔想蒙骗美国人。他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大声叫嚷：‘我们要有导弹打死华盛顿的苍蝇！’科兹洛夫这个傻瓜也鹦鹉学舌地说：‘我们拿手枪顶住美国人的太阳穴！’结果如何呢？丢人现眼！差点儿陷入一场热核战争。事后为了让人家相信我们真的要和平，不得不花费好大的力气。我衷心地希望和平，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一路线，并非人人都很赞成。”

总书记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表示：“您说什么呀，列昂尼德·伊里奇。全国两亿五千万人，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不赞成的，但值得因此而感到不安吗？”

勃列日涅夫摆了摆手：“你别兜圈子，安德留沙。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什么。不赞成的人并不是在两亿五千万人当中，而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他们也不是州委的某些宣传员，而是像我一样的人，只不过人家想法不一样！”

与此同时，他又感到高兴：苏联军队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一支令美国人畏惧的力量。当勃兰特总理与勃列日涅夫谈起海上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时，勃列日涅夫说：“美国人早就超过了我们，但我们已经将他们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每星期都能造出一艘潜艇。”说这话时，他做出像孩子

们玩弄圆柱形面包的手势。

1967年以以色列的完胜告终的六日战争之后，政治局决定断绝与这个犹太人国家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各国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它们开始获得加倍数量的苏联武器。苏联似乎在阿拉伯东方获得了永久性的朋友。

然而很快便清楚了，苏联不足以在中东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大家都必不可少的角色被赋予美国。结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赶走了苏联的军事顾问，转身面向美国，并在其帮助下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

莫斯科明白，是自己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法，1973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战争开始之前四天即曾通知苏联领导人：他要对以色列实施打击。

勃列日涅夫回答阿萨德总统说，他是在迈出非常冒险的一步，后果可能与叙利亚所希望的不是一回事。于是阿萨德撇开苏联军事专家，以免他们碍事。对叙利亚而言，十月战争再次以失利告终。是苏联的干预才挽救它免遭全面溃败。

同时，也不应当过高地估计勃列日涅夫本人分析苏联境外所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多勃雷宁曾回忆过，1976年秋美国竞选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他与勃列日涅夫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非常坦率。

勃列日涅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惊奇，为何福特不将“为和平而斗争”作为自己竞选的旗号，他本可以将“所有正直的美国人”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多勃雷宁试图向他说明美国人的心态，但未获成功。勃列日涅夫始终囿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而不能自拔。

勃列日涅夫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艳羡，但又一直坚信，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迟早将会获胜。

第6章 新任的国防部长是文职

在乌斯季诺夫的领导之下，制造出大量的新式技术装备。他简直是掰着勃列日涅夫的手为军事工业综合体要钱，贪婪地吞食掉国民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类人非常宝贵，但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国家也很危险，他们足以令国家崩溃。

对外政策的成就并不能取代勃列日涅夫只能在国内获得的那些赏心悦目的乐事。将军肩章对于勃列日涅夫已嫌不足，他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元帅。他好像顺便似地对政治局委员们说：

“军人们老是劝我同意接受元帅军衔。”

格列奇科却不愿意让勃列日涅夫当元帅。他是职业军人，深知肩章上每一颗星的价值，一个文职人员无缘无故成为苏联元帅让他感到不自在。

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库利科夫，对我讲过格列奇科召见他的情形：

“咱们来给他想一个什么特殊的办法吧——加一颗星，但小一点儿，不像元帅的那样，而且肩章也要特制的。你画下来，去和什卡多夫（干部总局局长）商量商量，但再也不要找任何人了。”

他们画一枚像大将戴的那样的肩章，格列奇科划掉了某些地方，然后拿尺子量了量自己肩章上的星徽，动手把画稿上的星形改小……

“勃列日涅夫会知道这件事吗？”我问库利科夫。

“当然知道了。”

不过，这场与国防部长的纷争却自然而然地解决了。1976年4月26日格列奇科猝然撒手人寰。

当时他独自待在别墅里。每周星期一是体育锻炼日，克格勃九局的保卫人员总是六点半来到他的别墅。元帅吃过早饭，七点半上汽车，前往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

当天保卫人员们等了他将近一个小时，他始终没有出来。他们便上二楼去找他，可他已经死了：大面积心肌梗塞。他坐在圈椅里，地板上乱扔着报纸，一只手伸在桌上。他没有够着按钮发出警报信号……

新的国防部长先由监管武装力量的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进行遴选。

据德鲁戈夫说，曾经考虑了两名候选人——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雅库博夫斯基元帅和总参谋长库利科夫大将。

雅库博夫斯基碰见德鲁戈夫时问：

“谁会当部长呢？”

“我哪里知道呀？”

“你干吗瞒着我？大家都在上班，唯独库利科夫不见了。我们都很清楚，库利科夫这会儿正和总书记见面。准是他将出任部长。”

库利科夫来了——同样问德鲁戈夫：

“谁会当部长呢？”

“我们认为，就是您呗，您不是刚刚同勃列日涅夫见面了吗？”

“我们是见面了，但谈的是别的问题，至于部长的事，他什么也没对我说。”

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召开了一个参加人数不多的会议：

“我们提提候选人吧，上面马上就要打电话问了。”

大家尚未谈完，勃列日涅夫就来了电话：

“提议谁当部长？”

“如果从现役军队长官中选派，那就提总参谋长库利科夫，他有发展前途，而且还年轻。”萨温金回答说，“另外就是华沙条约部队司令员雅库博夫斯基。”

“咱们提名乌斯季诺夫吧，你们同意吗？”总书记问。

萨温金是个经验十分老到的人，有意拖延不作正面回答……

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早在勃列日涅夫担任中央书记主管军事装备和航天的时候即已关系密切。乌斯季诺夫是个活泼好动、心胸开朗的人，特别乐观愉快，很难打乱他的生活常态。他常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家里和别墅。

新部长是在格列奇科去世的次日即1976年4月27日获得批准的。

“同志们，当然，我们都为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的逝世深感

难过，”勃列日涅夫以此作为政治局会议的开场白，“但是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的队伍中又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同志、政治局委员、杰出的军事活动家、苏联元帅、国防部长。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国防部长的空缺。看来，必须考虑任命一名新部长。”

“总的说来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苏斯洛夫若有所思地说，“只不过是什么时候——是今天呢还是稍迟一些？”

“应当解决，”波德戈尔内坚定地说，“因为必须有一个人马上把国防部领导起来。”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次开言道：

“同志们，我提议（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任命乌斯季诺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为国防部长。他熟悉国防工业部门，通晓军事。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政治局委员，熟悉国防部的工作和军队干部。这一切都有助于他更快地通晓业务，很好地履行所赋予他的职责。”

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立即赞同总书记的选择。

“当我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不得不学习许多东西，”为了以防万一，勃列日涅夫说道，“看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也需要学习一系列问题。有非军人中的人进入国防部，这很好。从缓和紧张局势的角度来看，这也会得到正确理解。”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肯定会发现这个事实，”安德罗波夫加以证实，“而且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在我们党内广为人知，所有的军人对他也都很熟悉。”

“应当今天就采取决定。”苏斯洛夫说。

“乌斯季诺夫同志熟悉军事技术装备，至于其他的工作细节，他也一定会加以掌握的。”格里申对未来的部长致祝福词。

“乌斯季诺夫同志也了解设计局和主要的设计师，了解国防工厂。”勃列日涅夫接上话茬，“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并无其他建议，一致批准乌斯季诺夫为国防部长。

“那么，也许应当这样行事，”勃列日涅夫发表看法，“召集国防部全体领导人员，在部务委员会上宣布我们的决定。”

“对，”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说，“列昂尼德·伊里奇，这事最好由您来做。”

“好吧，”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葬礼之后，我和乌斯季诺夫同志便召开部务委员会，宣布我们的决定。”

然而会议到此却并未结束。乌斯季诺夫急于投桃报李：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全都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巩固我国国防方面完成了何等浩大的工作。他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我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十分巨大，而列昂尼德·伊里奇出色地履行着这一崇高的职责。我认为，由于国防委员会和领导我国这一最高机关的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与日俱增的作用，国防委员会主席具备一切理由获得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衔。因此我提议，授予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苏联元帅称号。”政治局委员们仿佛正盼着这样的话。

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索洛缅采夫依次证明，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建议，他们一致表示支持：国防委员会主席当然应该是元帅。

政治局委员们竞先寻求赞成总书记晋升元帅的补充论据。

“列昂尼德·伊里奇经受过战争的巨大锻炼，”格里申说，“直接参加了战斗行动，和平时期又领导国防建设，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昂尼德·伊里奇身为总书记的同时，也对国防建设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苏斯洛夫补充道，“他将大量的劳动和精力投入这项事业。”

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格里申争先恐后地请求勃列日涅夫同意授予其苏联元帅军衔，仿佛唯恐勃列日涅夫会拒绝似的。勃列日涅夫也并未以拒绝来使政治委员们感到委屈。

“我衷心地感谢同志们通过授予我苏联元帅军衔对我所表示的信任。我将竭尽全力，决不辜负这一崇高称号和政治局给予我作为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信任。”

但他明白这一举动有着某种令人生疑的地方，便担心地询问道：

“我只是想问问同志们，从国际的观点会如何看待此事，会不会引发某些荒谬的议论呢？”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什么可担心的：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您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并且已拥有大将军衔。”

虽然如此，勃列日涅夫依旧心存疑虑。

“此事我们就不必在报刊上报道了，”他得出结论，“就像没有公开授予我大将称号的决定那样办。”

但这也仍然没有完事。勃列日涅夫获元帅星后，也想对乌斯季诺夫施恩还报。他再次发言：

“看来，我们应当解决授予乌斯季诺夫同志军衔的问题，因为他已被批准为国防部长了。”

然而政治局委员们对这位新部长却没有那么慷慨。

波德戈尔内感兴趣的是：“现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拥有的是什么军衔呀？”

“中将。”

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建议授予乌斯季诺夫如下军衔——大将。勃列日涅夫更愿意一举晋升老朋友为元帅，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已无争论。他只是补充了一句：

“过一段时间应当再次讨论关于授予乌斯季诺夫元帅军衔的问题。”

大家表示同意。

“什么时候宣布授予乌斯季诺夫同志大将军衔的事情呢？”勃列日涅夫按规矩征求同志们的意见，“看来，是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了？”

没有其他意见。

勃列日涅夫的梦想业已成真。在克里姆林宫的庆祝仪式上，乌斯季诺夫身着阅兵服，按照传统做法授予他元帅肩章，不过勃列日涅夫等不及这件礼品，前来时业已穿上元帅制服了。

授衔对于他已成为一桩最重要的事件。

1976年5月19日，勃列日涅夫接受契尔年科请求，在全苏公共部部长会议上对党的办公室工作者发表讲话。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讲稿，当时在场的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了他所说的话：

“科斯佳(契尔年科本名康士坦丁的昵称)硬要我来给你们讲话，可是讲什么好呢——不知道。好像我和你们在两年前会过面。”

契尔年科加以证实：

“两年零三十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

“瞧我这记性多糟糕，”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我当时给你们作出许诺了吗？许诺了，而且遵守了。那时你们是办事处处长，如今是部长了，而且工资不一样了，地位不一样了。我说的是事实吧？”

全体鼓掌。就在不久之前，公共事务处更名为特别部。

“嗯，你们都知道，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代表大会，”总书记说，“这是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我们就要执行。据说，意大利人、法国人对我们的民主议论纷纷，他们不喜欢它。随他们的便吧，我们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你们知道，前几天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家给我树立了一尊胸像。政治局通过决议，授予我这个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元帅的军衔，这很重要。”

总书记打趣着说：

“科斯佳还一再劝我穿元帅服到这儿来呢……”

契尔年科从主席团的条案后面站起身来：

“是呀，是呀，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大家都希望看见您穿元帅服。既然没有穿，那我就让所有在场的人看一看您穿阅兵元帅服的肖像吧。”

于是在掌声中他举起一帧总书记身着阅兵服的黑白照巨幅肖像，然后从肖像后伸出头张望，朝会场高声呼唤：

“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开始吧！”

塔斯社总社长扎米亚京从第二排站了起来，给主席团送上去另一幅勃列日涅夫肖像——彩色照。契尔年科懂得如何让勃列日涅夫挣足面子。

勃列日涅夫穿着元帅服前去参加同团战友聚会，骄傲地说：

“瞧……我又升了。”

两年过后，乌斯季诺夫又找到了一次取悦勃列日涅夫的机会。

1978年1月20日，国防部上书苏共中央，建议“授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元帅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胜利’勋章，以嘉奖他对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系

列极其重大的战役中成功地领导部队歼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增强我国防御能力工作中的杰出功勋，制订并持续贯彻足以有效保障我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的苏共二十四大所通过的和平纲领……”

胜利勋章——这是最高的军功章，仅仅授予过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以乌斯季诺夫为首的部务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在呈文上签了名。

2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同事们说：

“我想就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关于胜利勋章授予一事。你们全都表决赞成奖励我这一勋章的决定，我感谢同志们给予我的崇高奖赏。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一些同志就建议于2月22日将其颁发予我。”

全体一致赞成：“对，2月22日开会。”

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

“看来，对于领受胜利勋章而言，也许穿军服更为合适。”

大家再次支持总书记说：

“对，这样更合适。”

政治局委员们明白，勃列日涅夫急于再次身着元帅服炫耀一番。他还希望确认更频繁地佩戴着新勋章出头露面的可能性：

“不过与此同时，据我所知，按照条例胜利勋章也可以在便服上佩戴。”

苏斯洛夫安慰总书记：“条例中哪里也没有说，它只能在军服上佩戴。”

忠心耿耿的契尔年科加以证实：

“穿便服也同样可以佩戴这种勋章。”

第二天，2月1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道命令使对勃列日涅夫的奖励生效。命令的文本中删除了国防部所作的一处表述：“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战役中成功地领导部队歼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军人们写这段话，是为了替奖给勃列日涅夫这种只能授予指挥过大规模战役的统帅的勋章一事寻求论据。不过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其他亲信都明白，一个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战役中领导部队”……

而勃列日涅夫却一直坚信，他获得各种军衔和奖励都理所应当：

“我曾对同志们说过，胜利勋章只能因为在前线所取得的胜利而颁发。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和其他一些同志则说服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与前线的胜利价值相同。”

在改革时期的1989年，上述命令被撤销，那枚珍贵的胜利勋章也从勃列日涅夫家人手中强制收回。

勃列日涅夫对心腹之人也不吝惜奖赏。有一次，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对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应当减少授衔和颁发勋章，已经完全贬值了。”

勃列日涅夫不胜惊讶：

“科利亚，你怎么了，心疼钢铁吗？就让他们都领取好了。领到了，痛饮一场，心情就会好起来，就有把工作搞得更好的动力。干吗要剥夺他们的这个机会呢？”

乌斯季诺夫与格列奇科不同的是，他从不在公开场合以“你”称呼总书记，也不和他争论，相反，总是不断援引他所说的话。

“勃列日涅夫特别信任乌斯季诺夫，”德鲁戈夫曾对我讲，“如果军队发生什么事情，勃列日涅夫就会对萨温金或者我说：‘让乌斯季诺夫过问去吧，这是他的事情，他为此负责也因此而领薪水。就让他自己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好了，他有各种条例，还有军事法庭嘛……’也就是说，一切都托付给乌斯季诺夫去办。”

“换句话说，自从任命了乌斯季诺夫，对军队的监督便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是吗？”

“监督是有的，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乌斯季诺夫与最高统帅秘密地采取决定。”

有一次，沃罗特尼科夫耳闻目睹了这样一场电话交谈：一名值班秘书走进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说乌斯季诺夫来电话。

勃列日涅夫拿起听筒：

“你说吧。”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打断他的话：

“还叫‘亲爱的’呢，可连看比赛你都不肯去。”

总书记酷爱冰球，每逢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队在卢日尼基比赛，他总是一场也不肯错过。体育场内是禁止吸烟的，但勃列日涅夫偏在政府包厢里吞云吐雾。

乌斯季诺夫开始解释：“我不能去啊，我要接见奥地利国防部长呢。”

“连科斯佳（契尔年科）都去，可是你……嗯，那好吧，下次再说。”

勃列日涅夫放下话筒，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技术精湛的工业专家和部长，但首先是一个极好的人和朋友。”

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几乎总是由乌斯季诺夫这样开场：

“我刚刚同我们亲爱的、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通话，他让我向你们大家转致问候，祝大家取得巨大的成就……”

军队中对新任国防部长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高度评价他致力于造就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是一个文职人员——乌斯季诺夫在军队中一天也没有供过职这位部长似乎已开始证明，文职人员也有能力对武装力量做出比军人更大的贡献。在他身为中央书记之时，偶尔还和军队争论。一旦坐上部长的交椅，便让军事工业脱离了政治局的监管。所有这一切只能服从于他一人。

在他的领导之下，制造出大量的新式技术装备。大名鼎鼎的“白杨”导弹在他主事时即已开始研制。他实质上是在迫使全国为军队工作。这一类人非常宝贵，但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国家也很危险，他们足以令国家崩溃。他却简直是掰着勃列日涅夫的手为军事工业综合体要钱，贪婪地吞食掉国民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

据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说，乌斯季诺夫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仍然是国防工业综合体的代表。他迫使工业部门制造各种新式武器，在经济军事化方面取得巨大成果，驱使国家陷入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

为了使用所分得的资金，部队订购了大量无用的和老化的军事技术装备。部里谁也不曾考虑，经费应当花到士兵和军官的社会需要上，改善他们的物质和日常生活条件。

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争执以乌斯季诺夫撤掉奥加尔科夫的高级职务告终。

记述这一类事情并不怎么愉快，然而我们主要的导弹核武器设计师彼此之间一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纷争。这种竞争无论在我国的导弹制造史上还是在他们的个人遭遇之中，都产生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领导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们竭力煽动他们之间的竞争。高官们需要唯命是从的设计师。这类小型内战的结果，便是几乎所有的导弹建造者都短命而死。

例如，切洛梅和扬格利几乎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方案，每一位设计师都有一批拥护者。勃列日涅夫不知道应当选择谁。勃列日涅夫看中扬格利，但国防部却站在切洛梅一边。

勃列日涅夫决定将两种导弹都用作军备。这个决定对于经济是致命性的，但是使他避免了不得不与别人辩论和争吵。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期间，武器发明家们在任何方面都从未遭到拒绝。

这在斯大林时代即早已成为惯例。他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

“你们有权让任何一个部或政府机关的任何单位参与完成你们的工作任务，以保证这些工作根据需要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得物资储备和经费。”

向设计师们提供一切：既有林间小楼，也有专用食堂、专用医院，还有小汽车。需要庆祝试验场上的喜事吗？可以派飞机去中亚运来西瓜、甜瓜、葡萄。试验成功之后连总书记也会对总设计师说：

“派人到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去运各种食品、甜酒、白酒、啤酒、白兰地，满足所有的人的各种口味。以政府的名义举办一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盛宴。”

设计师经常被提醒：“已经向你们提供了你们所要求的一切。我想，如果你们想要大剧院里的马，也都会给你们的，现在你们就拿出成果来吧。”

一旦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就会为之划拨毫无限制的经费，想要沾光的人便像苍蝇见了蜜汁一样纷纷蜂拥而来，啃上一口公家的大馅饼。因而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足以令国家破产。

然而武器制造界的习惯根深蒂固。

设计师们不喜欢竞争对手，不喜欢与人分享“草料”——这是他们彼此之间对勋章和其他奖章的称呼。

反导系统总设计师基苏尼科回忆说，科罗廖夫（火箭制造和宇宙航行方面的科学家，科学院院士）曾将他叫到自己的汽车里，恶狠狠地问道：

“我们还要容忍这个强盗到什么时候呢？”

“强盗”是同样大名鼎鼎的一位设计师，当时正走红运，因为他精明地吸纳领袖之子参加了工作。

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子女都宁愿在军事工业联合体工作。

尼古拉·乌斯季诺夫（无线电物理学家，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之子）制造出履带式军用激光器，列沃利·苏斯洛夫少将（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之子）领导保密的中央无线电电子科学研究所。谢列斯特的儿子维塔利·彼得罗维奇在乌克兰当上了科学院通讯院士和专门为他建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不过，儿子们的前程通常都随着老子们的退职而告终。

基苏尼科回忆过一个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的反导弹防御方案。可是在中央委员会这个方案却受到赞许，准予实施。钱已经花掉之后才弄明白：一无所获，这个名为“远方”的方案彻底失败。然而一伙机灵的年轻人决定利用一批报废的试验导弹“对付虚拟的可能之敌”。这些导弹在检阅期间用车载着从红场通过，还配有播音员的解说词：“航空宇航目标高速截击导弹”。

“我认为，”基苏尼科写道，“这些假话未必能蒙骗外国的专家。不过五角大楼（指美国国防部）多半会利用这次虚张声势，为自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获取一笔补充拨款。在这个意义上，两国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倒是在尽可能地相互帮助……”

第7章 听军方的还是听外交部的

就限制和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军人们（无论苏联的还是美国的）反对任何限制措施，指责本国外交家们让对方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签署协议。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与美国签订协议这个主意本身就是犯罪。接着面对一位外交家补充说道：

“如果谢苗诺夫（外交部副部长）打算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那就让他自己决定准备在哪里蹲牢房——是在卢布扬卡（克格勃总部所在地）呢，还是莫斯科军区的禁闭室。”

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两位帅毫不怀疑，在华盛顿也会有人讲出诸如此类的话。

美国的军界怀着毫不掩饰的憎恨情绪评论基辛格，说他“完全听命于苏联政府”，他所达成的协议是一场“不利于美国的闹剧”，“基辛格失去了理智”。

基辛格的主要反对者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此人曾当过足球运动员、拳击手和飞行员。他反对与苏联签署任何协议，并相当成功地阻止过基辛格。2001年1月，拉姆斯菲尔德重又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职，正是他领导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由于所有的双边协议都牵涉到数额，争论也正是因为数额而产生。美国便每次都提出，将双方所拥有的各种武器的数据摆到桌面上，那时候便可以达成协议了。然而苏联代表团却回答说，他们没有义务帮助美国情报机关，于是断然拒绝提供有关武器的任何数据。而苏联外交家则说：我们并没有请求美国人向他们提供美国武器的数据，不过也没有这种必要——在美国，所有这一切都发表在公开的报刊上。

1970年代签订第二份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工作正在进行，美国人再次提出交换军事数据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谢苗诺夫生气地说：“谁需要交换数据呀？你们拥有本国的技术手段，因此你们对一切都清清楚楚。”

美国人的确知道不准接触国家最高机密的苏联公民所不知道的许多东西，所以当美国人举出不允许苏联外交人员知情的苏联武器数据时，苏联军方代表团极为紧张。苏联军方是不肯让外交人员知道自己的秘密的。相反，在美国却是外交家们对军方严加防范。

1977年春，国务卿万斯带着削减战略武器的新建议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军方成员请求允许他们了解这些建议。万斯准许自己的助手向军人们出示文件，但并不是全部。备用立场对他们始终保密。他知道，葛罗米柯十分固执，有时会迫使对方退而采取备用立场，必须装出一副根本没有备用立场的模样。

万斯的助手前往美国大使馆，住在所谓的保险柜里——那是一个可以防止电子窃听的专用房间。他依靠剪刀和糨糊，动手从指示全文中剪掉军人们不应当知道的地方。他干这事时被当场捉住。

就苏方而言，进行谈判的自然是外交人员，但一切都已由总参谋部内定。能对军方施加影响的只有勃列日涅夫，也正是他迫使他们同意与美国于1979年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二份条约。

而且美国的“鹰派”与苏联军方一样，对该条约也感到不满。美国总统卡特飞往预定举行条约签字仪式的维也纳前夕，经常批评苏联破坏人权的参议员杰克逊声称，卡特是在效法1938年与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杰克逊提醒人们，1930年代英国政府同样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裁军谈判并使自己蒙羞。

此事的结果是，卡特吩咐助手们不许打伞，尽管当时维也纳正下着倾盆大雨。

“我宁肯浑身湿透，也不会手擎雨伞。”卡特说。

这是因为，当年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谈及与希特勒签订协议之事时，恰恰是站在一柄大伞之下……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均已飞抵维也纳，而他们预定要签署的文件却尚未准备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团还在日内瓦就条约的文本反复推敲。

最后一轮谈判持续至凌晨三点，然后两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卡尔波夫和厄尔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再各自去睡觉。

技术人员留下将文本重新打印成四份，每种文字各两份。要是一份中首先提到苏联，那么另一份中便将美国置于首位。

美国代表团省事得多：他们已经拥有计算机，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在屏幕上予以更正，一下就打印出经过校正的文本。

苏联代表团的女打字员们却不得不在带有红色边框的条约专用纸上打印将近150页之多。如果一个打字员哪怕出了一处错误，这一页大家都得重新打印。两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所有四份条约的每一页都签上自

己姓名的首字母，然后文本被送往维也纳。

按照礼节，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本应在美国举行，因为美国总统已经两次到过苏联，而在外交界都严格遵守礼尚往来的原则。不过苏联外交人员毫不含糊地向美国人说明：政治局认为让勃列日涅夫飞越大洋是不适宜的。美国政治家们以理解的态度对待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便同意前往维也纳。

来到维也纳的第一天，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礼节性拜访了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交谈持续了数分钟，勃列日涅夫突然充满感情地对卡特说：

“如果我们遭到失败，上帝是不肯饶恕我们的。”

共产党的总书记言谈中援引了上帝，令所有的人都不胜惊诧。扎米亚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对总书记的理解有误：

“列昂尼德·伊里奇是想说，如果我们遭到失败，未来几代人都不会原谅我们的。”

大家都发现，勃列日涅夫身体衰弱，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演出时他数度入睡。

苏美条约的签约程序在霍夫堡宫的多面堡大厅进行，葛罗米柯悄声问乌斯季诺夫：

“你认为，他们会不会热烈亲吻？”

“不会，没什么必要亲吻。”乌斯季诺夫回答说。

“我可不敢确定。”经验丰富的葛洛罗米柯说。

签署完所有各份条约之后，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相互亲吻，他们此举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事后勃列日涅夫问苏霍德列夫：

“维佳，告诉我，我和卡特热烈亲吻没关系吧？不过这可是他带的头……”

苏霍德列夫保证说，所以这一切都完全正常。

晚上勃列日涅夫对身边的人说：

“卡特是个并不那么坏的男子汉。”

第8章 “胡桃三驾马车”的强硬立场

无论说来多么奇怪，三头政权比勃列日涅夫的一人统治更为糟糕。自信心十足的领袖善于作出明智的让步和妥协，而现在“三驾马车”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显示自己的坚定不移和百折不挠。

多余的、不必要的强硬表明对自己缺乏信心。国家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服从于国防部和军事工业联合体的部门利益。

当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之时，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由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确定。他们被称为“胡桃三驾马车”，因为他们常常在克里姆林宫内总书记办公室旁边的胡桃木房间开会，一切都在那里决定。

无论说来多么奇怪，三头政权比勃列日涅夫的一人统治更为糟糕。自信心十足的领袖善于作出明智的让步和妥协，而现在“三驾马车”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显示自己的坚定不移和百折不挠。

1980年代初，连拥护缓和的葛罗米柯也开始采取愈来愈强硬的立场。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观点，而是因为他看出来了：缓和已不再时兴，勃列日涅夫行将离去，必须努力出人头地，而和平条件下在党的机关中是很难赢得尊重的。

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徒有国家元首的名义。如果他健康尚可，很可能不会允许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将国家拖入阿富汗的那场冒险之中。法林所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背着总书记干的”。更准确地说，总书记已丧失了清醒地评判局势的能力，法林认为，勃列日涅夫“感受到自己心爱的外交产儿缓和的衰落，但已经无能为力，即便他想有所作为也无济于事”。

血腥的阿富汗战争9年期间，苏军伤亡将近14000人。

出兵的决定是1979年12月12日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通过的，从而形成了政治局№Л176/125号决议。

这份手写的文件内容如下：

关于阿国形势：

1.同意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等同志所陈述的看法和措施。

允许他们在贯彻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的修正。

需要中央解决的问题，应及时提交政治局。

委托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等同志实行所有这些措施。

2.责成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等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贯彻上述措施的进程。

该决议还附录了一份资料，那是在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了阿富汗政权已从阿明手中转归卡尔迈勒的情况之后，由契尔年科手书的：

1979年12月26日（在别墅，出席的有列·伊·勃列日涅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康·乌·契尔年科等同志）由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等同志报告贯彻执行苏共中央№Л176/125号的进程。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表达一系列愿望，同时同意同志们所制定的近期行动计划。大家认为，宜于由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按照所上报计划的人员组成和方向采取行动，并仔细考虑自己行动的每一个步骤……

惊诧莫名的多勃雷宁问外交部长：

“为什么要出兵阿富汗，我们是想和美国大吵大闹吗？”

葛罗米柯安慰他说：

“这只不过是个把月的事情，我们完成一切任务之后就很快撤离。”

出兵阿富汗的国际后果对苏联而言十分沉重。这是葛罗米柯主持外交部时期的一个最大的失败。

1980年6月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央全会。由葛罗米柯作《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勃列日涅夫作简短发言。全会的决议《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写道：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在反击武装进攻和外来干涉方面为阿富汗提供全面援助所采取的措施，这种进攻和干涉的目的是想扑灭阿富汗的革命，在苏联南部边境建立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桥头堡。”

新任美国总统里根于1981年1月就职，他采取了莫斯科已经生疏的极为强硬的立场。他任命已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洲部队司令职位上退休的黑格将军为国务卿。

莫斯科以强硬的浮夸的言词回应里根和黑格最初的一些举措。美国总统尚未来得及作出答辩。

1981年3月30日里根险些被一个名叫辛克利的人刺杀，刺客的目的是想让出演当时著名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女演员乔迪·福斯特注意到自己。辛克利朝里根开了一枪，当时总统正从他向工会领导人发表讲话的希尔顿饭店走出门来。总统身受重伤，子弹洞穿了他的左肺。然而里根还是自己跨进了医院的大门。他以为，警卫们开枪后猛力将他推进轿车时，他只不过被折断了一根肋骨。

在谋杀案发生之后，已经是4月份了，里根才签发了一封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件。这是对莫斯科尖刻来信的回复：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很抱歉，但始终无法理解您最近来函的尖刻语气。我们能允许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观点阻碍我们去解决你我所代表的民众的现实问题吗？

俄罗斯的中产家庭是否会由于其政府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它所喜欢的制度而变得更为幸福？

您在自己的信中暗示，由于美国的领土要求，这种行动是必要的，认为我们正在酝酿威胁您的国家安全的帝国主义计划。

这种指则毫无根据。美国并不追求在世界占据优势地位，即便在当年对自己毫无风险即可做到这点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是经济未遭受损失的唯一工业大国。美国的军事实力绝对占优势，只有我们拥有完美的武器——原子弹，可以将其投掷到全世界任何地点。如果我们想称霸世界，有谁能阻止我们？

然而美国选择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另一种决定。我们利用自己的力量，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别的国家的经济，其中包括曾是我们的敌人的那些国家。

总统先生，将近十年之前您和我曾在加利福尼亚相遇。当时我是州长，而您正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

我们相见时我曾询问，您是否明白这次会谈所采取的决定关系到全世界亿万民众的期望。

您握着我的手回答说，您明白这点，并且准备为使这些期望和理想成为现实而贡献出全部力量。

全世界的民众至今怀抱着这种期望。全世界的民众不管种族和民族

的区别如何，都拥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希望为他们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希望为自己选择工作并获得公平的报酬。他们希望为自己的家人赢得平安，也不给他人造成损害。政府应该为他们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总统先生，难道我们不应当尽力排除妨害我们两国人民实现这些简单的目标的种种障碍吗？

如若1981年春勃列日涅夫的身体不是已经那么糟糕，很可能他会与里根建立融洽的关系，然而当时任什么都已引不起总书记的兴趣了。

除去阿富汗问题之外，苏联新型中程导弹也是引发东西方关系严重危机的原因。

1981年，苏联列装了РСД-10“先锋”型车载二级中程成套弹道导弹，北约将这种新型导弹叫做SS-20。该型导弹拥有单独制导的携带三枚核弹的分弹头，飞行距离超过5000公里。

沿苏联西部边境布设“先锋”导弹，是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的。美国人判定，每星期都出现两枚新的导弹，总共装备了650枚。如此巨大数量的现代化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

军人们还想将“先锋”导弹布设在楚科奇（楚科奇半岛隔白令海峡与美国相对），让美国的国土处于打击之下。但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永久冻土地带，领导层并未同意这笔国家力所不及的开支。

瞄准欧洲的苏联中程导弹引发了愤怒和恐慌。阿尔巴托夫院士写道，在莫斯科爆发了一场狂欢：瞧我们多么强大和聪明，刺痛和吓住了美国和北约。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试图向苏联领导人说明，他们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你们的新导弹的目标可能只是我们国家，所以我有责任采取某种行动。这些导弹破坏了欧洲的力量平衡。如果你们继续布设导弹，我便会要求美国人采取措施。”

施密特途经莫斯科，在机场与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谈及此事。柯西金感到总理的态度很认真，便想继续深谈，但葛罗米柯对施密特难以容忍，草草结束了谈话。

事情的原因是，早在1975年与勃列日涅夫会晤时，施密特曾语带讥嘲地说过：“如果葛罗米柯能灵活一些，苏德关系的发展会更加富于成

果。”

勃列日涅夫当天感到特别疲倦，没有心思开玩笑，便干巴巴地回答说：

“葛罗米柯得到苏联领导层的完全信任，他表达的是我们的立场。”

参与会谈的外交部长记住了德国人的这一番话。“直至离开联邦德国政府首脑的职位，施密特也未能得到原谅，”法林写道，“葛罗米柯将其列入侮辱过自己的人的名单，抱着成见看待出自总理的言行。”

结果这导致了可悲的结果。

1979年12月北约通过决议，在西欧部署464枚陆基飞航式“战斧”导弹，并以刚刚研制出的“潘兴II型”现代化导弹取代108枚业已老化的“潘兴”式导弹。不过这些导弹尚未布设完成之际，北约国家便向莫斯科建议，为削减欧洲的核武器展开谈判。

苏联外交家们试图怂恿西欧的社会舆论反对美国。他们说，万一发生战争，苏联不得不遗憾地对人口密集的欧洲实施打击，因为它允许美国在那里布署新式导弹。

然而这类威胁只能激起反苏情绪的爆发。

施密特直至最后都希望说服莫斯科采取某些措施。驻联邦德国大使法林本人则试图让勃列日涅夫相信，必须采取行动。总书记总是回答说：

“瓦连京，你干吗老是逼我，你去劝劝葛罗米柯吧。”

法林在此话背后听出一种自白：难道你没有看见，“对他们而言”我已不再是权威了？

1981年秋，新任国务卿黑格在纽约与葛罗米柯会谈。

黑格后来说，葛罗米柯发现“带有冷嘲热讽意味”的某种幽默感。而苏联部长给国务卿留下的印象则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此人在半个世纪的外交活动期间不得不接触人类非理智行为的各色表现，而且知道今后仍将一如既往”。

葛罗米柯自下而上打量了一番参与会谈的以身材高大著称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特曼，乐呵呵地说：

“在国内他显得比在莫斯科还高，哈特曼一直在不停地长个子。”

对此，黑格指了指身材同样高大的多勃雷宁说，就大使而言，两国之间倒是足以达到势均力敌。

会谈之初美国人发现，葛罗米柯看上去精神矍铄，比自身的年龄年轻，但会谈接近尾声时则显得苍老和疲惫。终究他已是72岁的人了。他用一只手擦了擦额头，明显感到了疲倦。

里根总统提出一个“方向性的解决办法”：苏联撤除自己的“先锋”导弹，美国则不再布署“潘兴”和“战斧”。

苏联军方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向奉命负责导弹问题的外交官克维钦斯基说，“先锋”导弹的数量将会增加。此外，还计划装备数百枚射程较近的战役战术导弹。

克维钦斯基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呢？我刚刚按照政治局通过的指示宣布，导弹的数量不会增加，其数额应予冻结。”

“当时不能谈这方面的事，现在却可以讲了，”元帅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今天您可以说‘是’，明天也可以说‘不’。您在那儿宣布一番并没有关系，您又不是勃列日涅夫。”

也就说，勃列日涅夫公开声称布署新导弹之事已经冻结，整套的宣传机器便开动起来，证明苏联是热爱和平的，而军方却不断增加在欧洲的核潜力。

阿赫罗梅耶夫向克维钦斯基出示一幅北约在欧洲的应当予以核打击的目标图解；图上标出了900余处目标。为了保险起见，每个目标都用几枚核弹头瞄准。

不想同军方争执所导致的结果是，在西欧新出现了一批美国导弹。这让苏联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加深了易受伤害的感觉。换而言之，布署大量“先锋”导弹不仅未能增强国家的安全性，反而破坏了它。

在勃列日涅夫已经什么也不能参与的最后数年中，苏联的对外政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不可预测和欠深思熟虑。多余的、不必要的强硬表明对自己缺乏信心。国家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服从于国防部和军事工业联合体的部门利益。

第六卷 亲信们

第1章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在政权的中央机构、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机关中，莫斯科人非常少。能定调子的都是各种派系坚强有力的外省人。

勃列日涅夫年轻的班子被划分为不同的帮派——第聂伯罗彼得斯克帮、摩尔达维亚帮、哈萨克帮。某个官员之所以掌权，取决于他曾经有幸与勃列日涅夫共事。得到特别宠信的则是那些早在勃列日涅夫青年时代即已与之结识的人。

原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回忆说，他刚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便发现，在政权的中央机构中、政府中和中央委员会机关中，莫斯科人非常之少。能定调子的都是各种派系坚强有力的外省人。这并非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干部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不大喜欢首都的居民，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谢列斯特的拥护者。

对于勃列日涅夫年轻的班子，见多识广的人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帮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摩尔达维亚帮、哈萨克帮，某个官员之所以掌权，取决于他曾经有幸与勃列日涅夫共事。得到特别宠信的则是那些早在勃列日涅夫青年时代即已与之结识的人，其时他刚刚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开始自己的仕途。

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有未来的政府首脑吉洪诺夫、政府副首脑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庶务局长帕夫洛夫、内务部长萧洛科夫、克格勃第一副主席齐涅夫。这全都是一些忠于勃列日涅夫的人，他的同伙。

在莫斯科，人们苦笑着打趣说，俄罗斯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彼得罗夫斯克时期、彼得罗夫斯克时期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时期。勃列日涅夫从不放过任命自己的人担任重要职务的任何一次机会。勃列日涅夫不会忘记老相识，总是提携他们。他需要支持，尤其是最初几年他的地位尚未巩固的时候。

政府第一副首脑马祖罗夫回忆说，起初勃列日涅夫曾请求中央主席团委员们：

“领导需要威信，请大家给予帮助。”

波德戈尔内也曾讲过，勃列日涅夫常提醒政治局委员们，在他讲话期间要多多起立鼓掌，给全场做个榜样：

“也许，这样做不好，但需要这样……”

勃列日涅夫为了从政治局中清除势力强大、独立不羁的人物，耗费了数年时间。在此之前他常常遭遇党内同志的阴谋诡计。他可懂得将赫鲁晓夫撤职是如何轻易得手的。

1965年，勃列日涅夫战前时期的朋友格鲁舍沃伊当上了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获得上将军衔。他和格鲁舍沃伊当年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道工作，并一道奔赴前线。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想撤换自己的第一副手。

沃罗诺夫提了一个候选人，但勃列日涅夫却有自己的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执委会主席瓦西里耶夫。总书记的意见占了上风：瓦西里耶夫于1971年2月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第一副首脑。

当时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瓦琴科深受勃列日涅夫私下照护，因而市里出现了歌剧院和飞机场。

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载：“知识界对瓦琴科憎恨已极，给他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外号‘普利西别耶夫中士’。”谢列斯特自己并不是大知识分子，连他都说某个人粗野，肯定是前所未见的情形。瓦琴科抨击冈察尔的长篇小说《大教堂》，愤怒指责其思想谬误，并要求将载有该小说的全部杂志从各图书馆中没收，予以销毁。瓦琴科还向勃列日涅夫状告冈察尔。

勃列日涅夫不满地对乌克兰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说：

“您应当寻求对付知识界的方法，尤其是对付那些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作家。现在你们的冈察尔发表了长篇小说《大教堂》，其中对我们的现实的描写是不真实的……”

冈察尔曾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是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那部长篇小说中并无任何离经叛道的东西。在乌克兰，尽人皆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对该小说不满的原因。

“在《大教堂》中，”谢列斯特写道，“刻画了一个领导干部，此人自诩为思想极为先进的共产党员，可是为了甩掉包袱，却将自己的父亲，业已退休的冶金厂工人老干部，送进了养老院。各种事实完全相符——事情发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瓦琴科的亲生父亲正是在养老院。瓦琴科待人粗鲁，极不文明，性情凶狠，仿佛他仇恨一切有人性的事物。”

然而作为乌克兰领导人，谢列斯特从不表露对瓦琴科的看法，在公开场合还支持这位权势赫赫的州委第一书记。瓦琴科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于1976年当上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第2章 顾问·助手·笔杆子

勃列日涅夫为自己挑选了一大群助手。

与他一道共事时间最长的当数戈利科夫。此人从在中学当图书管理员开始劳动生涯，1935年毕业于罗斯托夫教育学院，教过历史课，随后成为新罗西斯克一个中学的校长。1940年被任命为共青团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后来调入雅库特州委从事党务工作，1945年又被派往摩尔达维亚。

戈利科夫曾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索罗基县委主管工业和宣传的书记，随后又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一个处（同时兼职编辑《文学与艺术》杂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中央委员会公认的主要笔杆子”。勃列日涅夫也在机关中注意到了戈利科夫，提出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

“他写讲话稿不怎么行，”戈利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讲过，“他需要一个笔杆子，也算是顾问吧。坦白地说，我并不想到他那里去。”

不过，戈利科夫自然还是同意了，这才使得他逐步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被分派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时候，戈利科夫正在撰写学位论文。1953年12月，他被录取为社会科学院直属学位论文答辩一年制学习班旁听生。勃列日涅夫前往垦荒区工作时，戈利科夫重又成为他的助手，自此之后他们从未分离。按照职责分工，戈利科夫主管农业和意识形态，但他主要还是总书记的私人助手，关注外界对勃列日涅夫都写了些什么、如何描写。机关中尽人皆知：勃列日涅夫对他怀有特殊的好感。

“列昂尼德·伊里奇从不大声训斥人，”戈利科夫回忆道，“他对我一直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常常邀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两家人还一块儿去吃烤羊肉串。他同我商量工作，态度十分和善。只有一次，有人背后向他说我的坏话，于是他不再吸收我参与工作。我认为，这是楚卡诺夫和契尔年科插手的结果。他们不能容忍我独立自主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的高级助手（非正式）是楚卡诺夫。他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自1937年起便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捷尔任斯基冶金工厂工作，直至成为总工程师。1958年勃列日涅夫就任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便调来楚卡诺夫充当自己的助手。楚卡诺夫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不喜欢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助手们。机关中的人对他都

很尊敬。渐渐地，勃列日涅夫对楚卡诺夫的态度趋于冷淡。

勃列日涅夫国际事务方面的主要助手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此人曾任职于驻瑞典大使馆，随后主持外交部斯堪的纳维亚司。年轻的安德罗波夫曾在他的手下实习——那是在安德罗波夫出国工作之前的事。

勃列日涅夫调往最高苏维埃的时候，亚历山大-阿根托夫成为他的助手。勃列日涅夫亲自给他打电话：

“是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吗？我是勃列日涅夫。我很想和您谈一个问题，您能到我这儿来一趟吗？”

“当然可以，”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只能这样回答，并为这位大人物非同寻常的客气感到惊讶。

“那您什么时候过来方便呢？”勃列日涅夫想弄清楚，“明天上午11点行吗？”

勃列日涅夫起身迎接客人，并立即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我这一辈子，小时候在农村干活儿，青年时代进了工厂，然后在党委工作，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军队里度过。我从来没有同外交政策这种东西打过交道，一点儿也搞不清楚，现在偏偏被选为总统，不得不张罗国外的事务。我需要一个人帮助我熟悉这种事情，搞清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有人建议我找您。要是调到我这里来工作，您的意下如何？”

勃列日涅夫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很关心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工资和住房条件。他抱歉地说，工资仍然照旧：

“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最高苏维埃有一个非常好的别墅住宅区，还有克里姆林宫食堂也很不错……”

多年期间勃列日涅夫都相信自己这名助手高度的职业技能、忠诚可靠的人品和罕见的工作能力。甚至已习惯当众征求他的意见。有时候在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提出某个建议之后，还会回头询问坐在旁边的这位助手：

“我说的对吗？”

勃列日涅夫信任他，甚至容许他同自己争论。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也总是大胆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亚历山德罗夫在我们那里的绰号叫‘破折号’（他的复姓为亚历山德

罗夫-阿根托夫）或者‘小麻雀’（因为他身材矮小，行为举止不够稳重，总是神经质地忙忙碌碌），”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布鲁坚茨回忆说，“这是一个忠于事业、勤恳正派的人，不耍阴谋诡计和玩弄小权术。”

他一贯待人客气，包括对待那些职务比他低的人。有一次在智利，当他听到苏联大使高声训斥其手下的一名外交人员时，他立即从桌旁起身说道：

“我无法容忍这样对下级说话。”

同时他又会把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叫做“修正主义者”——并非开玩笑，而是认真的。

他草拟文件无人可比，总是能很快抓住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进行表述。他容易冲动，手脚利落，脾气暴躁，动辄抱屈，在人际关系中不易相处。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1975年12月末在扎维多沃，正进行总书记一篇例行讲话的草拟工作之时，葛罗米柯来了。他与勃列日涅夫交谈了三个小时。大家都以为外交部长是来表示祝贺的——第二天是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届满69岁。

可是清晨吃早饭时勃列日涅夫却说：

“葛罗米柯是来要求不去日本。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他应该在1月初去那里。我同意了：他当然不愿意因为准备出访而过不好新年，出访很麻烦，而且也没有多大意义：人家想要那些岛屿，我们却不想给。所以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什么也不会改变——他去不去都一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简直气坏了：

“这样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还算个严肃认真的国家吗？我们应当遵守诺言呢还是满不在乎？我们许诺了四次，日本人已经在报纸上报道了访问的事，我们要不要考虑人家的威信？或者我们是想完全把他们推向中国人？瞧瞧看，葛罗米柯不想过不好新年。政治局的决定对他一钱不值！他居然跑来请假！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做得不对!”

勃列日涅夫曾料到会有这场发作，有气无力地辩解道：

“他提出请求，我也就同意了……”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仍然固执己见：

“您表示同意，这就不对。美国国务卿今年五次前往日本，同样似乎什么也没改变。而我们的葛罗米柯去比利时、意大利，去法国，还去了什么地方——去就去吧。可刚刚真要做点复杂的工作，他却‘不希望过不好新年’。应当同日本人对话。即便像您所说的那样，目前我们什么也不给他们也罢，但是应当进行谈判，显示我们的善意。这个国家希望同我们打交道，应该珍惜这一点，重视这一点。这就是外交的意义所在。您的做法是不对的。”

总书记的其他助手也都支持亚历山德罗夫。勃列日涅夫试图改变话题，但未能如愿。他阴沉着脸，扔掉了餐巾：

“您给我准备了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

勃列日涅夫抽身离去。一小时过后又回来，瞧了瞧亚历山德罗夫：

“你胜利了，安德留沙。我同葛罗米柯谈了整整一小时，告诉他，让他去日本。”

然而葛罗米柯最终仍然没有访问东京……

另一次，话题涉及的是：北约参加维也纳谈判的代表提出，如果苏联撤走一千辆坦克，他们可以从欧洲撤除一千枚导弹。

“从安全的观点看来，似乎没有障碍，”勃列日涅夫说，“无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在签订这个协议之后都不会进攻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问题在另外的地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们将会反对。要是这样，我也就不签这个协议了。”

午餐期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提起了北约的建议。

“我们不会接受，”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应当起草一份否定的答复。”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谈话并未结束。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心情愉快，玩笑着抱怨说，各种文件本来就很多了，安德烈还要不断给人塞来新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干嘛抱怨呀？”总书记这位助手说，“我们也可以不报告了，随您的便。”

“哎，你怎么又激动了！”勃列日涅夫和蔼可亲地说。

“是呀，我很激动。也没法不激动。现在拿北约的建议怎么办呢？说‘不’倒是很容易。可是，我们是想继续缓和呢还是仅仅在口头上说想

要而已？我们一再声明：‘政治的缓和需要辅之以军事缓和’。他们所提出的完全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拥有16000辆坦克。要是减为15000辆，情况会有什么改变吗？毫无改变。如果他们撤除1000枚过时的导弹，他们的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缓和却取得了胜利。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我们准备对话，并对军备竞赛有所作为。如果我们说‘不’，我们只会遭受损失……”

勃列日涅夫起身去了卫队的房间，那里设有通讯中心。40分钟之后他回来说：

“我让格列奇科准备维也纳谈判的建议。让他们考虑如何应对北约的这一招……”

可以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许多方面促成了勃列日涅夫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勃列日涅夫慷慨地奖励自己这位助手所付出的劳动——让他当上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授予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特命全权大使职衔；出席克里姆林宫招待会时，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总是身着大使礼服。

1972年，当勃列日涅夫已对外交政策感到兴趣时，他的身边又出现了两名国际关系方面的助手：鲁萨科夫和布拉托夫。还有过去同样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萨莫泰金，也获得了总书记参事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很器重自己的团队，对于小错误常加以原谅。书记们和助手们都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从不大喊大叫、严厉斥责。当他的指令执行得不好的时候，他便生气地改口称呼“您”。他的一名贴身工作人员讲过，自己曾犯了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心想，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就此告终。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吩咐准备一份回忆资料，勃列日涅夫讲话时引用了这份资料所列举的数字，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原来，数字的来源不对。

翌日清晨，勃列日涅夫召集众助手，像平日一样分别作出指示。仿佛他并未发现有什么过错似的。然后他让大家走了，却叫那个人留下。两人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才按捺不住地说：

“你是臭狗屎——只有我知道；而我是白痴——现在全国都知道了！你给我滚开！”

那人出了门，上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反复思量如今到哪里去

找工作。正当他沉湎于自己的满腹心思之际，一时未能察觉与总书记直接联系的电话正在嘟嘟作响。他绝望地拿起听筒。

勃列日涅夫问：

“妻子的情况怎样？”

他知道那人的妻子正在生病。

“谢谢，列昂尼德·伊里奇，”助手强打精神作答，“今天已经好些了。”

“请转达我的问候，祝她康复。”于是勃列日涅夫挂断了电话。

训斥过了，但马上又让人明白，生活还将继续，工作也是同样……

总书记助手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至交，这就是那些替勃列日涅夫撰写讲话稿的人。楚卡诺夫依靠的是伊诺泽姆采夫和阿尔巴托夫两位院士，他高度评价助手鲍文见解独到的杰出智慧。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心爱的写家则是受过多方面教育的扎格拉金，此人很快便在中央国际部飞黄腾达。帮助布拉托夫的是希什林，这个人主持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顾问小组。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自己的讲话。他渴望获得掌声，绝对不肯发表枯燥无味的演讲，因而总是要求使用鲜明生动的说法，富有真情实感。他也十分看重善于做到这点的那些人。

撰写总书记的讲话或文章既不能获取金钱报偿，也不会得到物质奖励，然而希望参与其事的人却不可胜数。

为勃列日涅夫代笔一篇例行公事的文章写好之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将作者之一、来自中央宣传部的佩切涅夫叫到一边，以发自内心的热情说道：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别忘了这次所做的事情比奖章或者勋章更有价值。这会获得全党赞扬呀！如今对于内行的人来说，您已不单是佩切涅夫，而是那个为总书记本人写过文章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中，扎米亚京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他领导外交部出版处时，曾两次应召晋见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接待这位客人时十分亲切，让其在自己对面落座，很信任地说：

“你知道，我要处理文件已经变得很困难了。电报成堆，我需要一些人对其加以分析研究，将需要我知道的内容提供给我。有人向我推荐了你。我了解过你，这无须隐瞒。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去塔斯社工作。”

当时这家通讯社的总社长是拉宾，此人阅历丰富，观念极为保守，长于幽默讽刺。他读完列宁格勒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套课程后，进入《文尼察真理报》工作。1942年调到中央出版部，此后便步步高升。斯大林逝世之后，拉宾调入外交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他出任驻中国大使，两年过后执掌塔斯社。

“那么把拉宾调到哪里去呢？”扎米亚京想要知道。

“他去管电视。”勃列日涅夫回答。

“塔斯社，”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就是给我们提供信息的部门。我希望你选择信息，好让我第一个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总书记希望关于国内外形势的主要信息来源掌握在忠于他的人手中。拉宾也是这样的人，但更需要他去电视部门取代谢列平的朋友梅夏采夫。

勃列日涅夫的选择做得很对。拉宾领导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长达15年之久，只是到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才让他退休。扎米亚京同样唯总书记的马首是瞻。

“咱们这就讲定，”勃列日涅夫说，“你明天就去塔斯社上班。”

“为什么是明天呢？”扎米亚京想知道。

“今天也可以，”勃列日涅夫莞尔而笑，便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扎米亚京正在我这里。他马上就到你那儿去，你和他约好，必须明天就在塔斯社将他介绍给大家。”

在摩尔达维亚时，勃列日涅夫还有一个助手——特拉佩兹尼科夫。

在机关工作数年之后，特拉佩兹尼科夫要求让他去从事科学工作。勃列日涅夫欣然同意。1960年1月，特拉佩兹尼科夫被任命为主管科学工作的高级党校副校长。1965年5月，勃列日涅夫恢复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的独立建制，并任命特拉佩兹尼科夫为部长。

在任命前夕，勃列日涅夫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交换意见：

“你知道吗，我想让特拉佩兹尼科夫去当科学部部长。你觉得怎么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后来承认：他不胜惊诧，因为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没文化的粗人。他对勃列日涅夫说：

“我的保险柜里有一份特拉佩兹尼科夫亲笔写成的文件，其中一页上就有18处最不该犯的拼写错误。这样的人可以领导我国科学的发展和院士们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皱起眉头，中断了谈话。有文化的人多的是，可真正忠诚可信的人何其稀少……

据同僚们说，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他甚至将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国际部领导人波诺马廖夫也视为修正主义者。

他经常写一些名符其实的告密信，检举他认为缺乏铁石心肠的人。例如，中央书记处就讨论过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一份报告，他在其中攻击前《真理报》总编辑、现任科学院副院长的鲁缅采夫：

“鲁缅采夫同志包庇一些有着明显错误的著作，要求开展公开的‘自由’辩论。试问，他所说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特拉佩兹尼科夫对赫鲁晓夫在位时的所作所为惊诧莫名，痛心疾首地叫嚷：

“在这十年之中，人们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事情——阶级斗争！”

雅科夫列夫回忆说，1970年代初他曾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同车出行。这位科学部长为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损失黯然神伤：

“我们死了之后，马克思主义将会怎样呢？”

勃列日涅夫非常赏识他。特拉佩兹尼科夫当上了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他还希望成为院士。但在这方面产生了一些困难。

1976年他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第3章 办公厅主任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并不追求让自己居于首要地位，反而避免出头露面。他不爱讲话，也不善于讲话，他的力量在另外的地方。

任何一份文件，包括最为机密、至关重要的文件，都不可能绕过公共部。哪些文件呈送至总书记案头，哪些人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哪些信息可以让总书记得知，这一切统统取决于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成为一国之主时，他想起了与自己在摩尔达维亚共事的所有朋友。契尔年科开始掌管苏共中央公共部（他的前任马林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院长），特拉佩兹尼科夫领导中央科学与院校部，茨维贡则成为大将和克格勃副主席。

在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中，契尔年科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最初数年，许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他，只将其视作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并未意识到他在权力体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契尔年科并不追求让自己居于首要地位，反而避免出头露面。他不爱讲话，也不善于讲话。大家都认为他理当默默无闻，他并不反对：默默无闻就默默无闻好了。他的力量在另外的地方。

契尔年科执掌中央公共部长长达17年。从前公共部名叫特别处，领导这个处的是斯大林那位始终连任的助手——声名远扬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不过即便在他手里这也只不过是党的一个办公室。契尔年科则将这个单位变成了权力机构和管理党中央机关的部门。

公共部的任务是："为党的最高机关服务。"意思是提供组织与技术方面的服务。然而实际上却是另外一回事。任何一份文件，包括最为机密、至关重要的文件，都不可能绕过公共部。哪些文件呈送至总书记案头，哪些人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哪些信息可以让总书记得知，这一切统统取决于契尔年科。

甚至连克格勃的材料也必须经过公共部部长之手。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才能亲自向总书记报告。不过安德罗波夫可以每星期一次径直去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而契尔年科则天天都去，而且不止一次。

据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回忆，契尔年科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送达呈报中央委员会的各种最重要的文件，并加上自己的说明和介绍。而且这种事情不致引起愤怒，总是将尖锐的棱角一一抹平，这一点尤其深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未经报告不可能去见总书记。大家都需要征得契尔年科允许，说明因为什么问题希望面见总书记。

1970年代初担任沃罗涅日州委书记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忆，他曾去见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想建议改组农业技术装备的供应系统。

库拉科夫认真听取了沃罗特尼科夫的意见，有些看法他很喜欢，有些则不同意。最后说：

“您给中央委员会写一份详尽的有说服力的报告吧，到时候我们再讨论您的意见。”

沃罗特尼科夫告辞，向门口走去。库拉科夫叫住了他：

“没有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吧？”

“没有。”沃罗特尼科夫回答。

库拉科夫责备地说：

“应当多多看望总书记。”

沃罗特尼科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接待室打电话，请求见面。人家吩咐他隔天再来电话，也许列昂尼德·伊里奇会接见他。他没有再打电话，一天过后便走进老广场上中央委员会大楼的第二个大门，登上总书记办公室所在的五楼。人家让他稍候——勃列日涅夫正在接见外宾。接待室里已经聚集了几位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将他们大家一起请进办公室。

“我们应当多多联系，”他说，“可许多书记很少打电话。当然，我也颇为了解各地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但中央机关和助手们提供的信息是一回事，与你们直接接触又是另一回事，别不好意思再次‘打扰’总书记。自然，谈话不可东拉西扯，报告应当简短、确切和客观。”

勃列日涅夫不停地抽烟，讲述国内的形势，出国访问见闻，各种计划。他也向书记们问话，但并未让他们多谈，而是自己回忆一些事情。

分手时他再次意味深长地说：

“在各种事情上都将希望和依靠寄托于你们了。你们随时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支持，别不好意思，要多讲讲你们的意见。我们需要常常接触、来往。国家的支柱是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而在地方上，就要靠州委了。”

沃罗特尼科夫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再次来到莫斯科。库拉科夫看

完全部八页报告，满心欢喜。

沃罗特尼科夫说：

“既然这样，费多尔·达维多维奇，那就请您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吧。”

库拉科夫略加思索，摇了摇头：

“那样，我们就什么也办不成了。”

他给契尔年科打电话，向他讲述建议的实质：

“需要让勃列日涅夫了解这个想法。如果列昂尼德·伊里奇能接见沃罗特尼科夫，那就更好。”

听罢契尔年科的回答，库拉科夫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去找契尔年科，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沃罗特尼科夫不胜惊奇，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竟然自己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给总书记打电话，倒要请示公共部部长。

沃罗特尼科夫当时尚不熟悉党中央机关的奥妙。后来他自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才弄明白了许多事情。契尔年科连报告看都未看一眼，便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留下吧，接见的事我们另行通知。”

契尔年科真的安排好一切。次日，勃列日涅夫便接见了沃罗特尼科夫。勃列日涅夫一开始谈的是跨生产单位的畜牧联合体、土壤改良、肥料等问题，然后才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报告，在阅读过程中发表一些赞许的评论。还提到了库拉科夫：

“我们有一位能干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地方上对他也很尊敬，是我的好帮手。”

勃列日涅夫十分信任契尔年科，常常问也不问一句便签署其所写的批示。要么就是，契尔年科只需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口头同意，便在文件上批注：“已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要求提出意见。”就这样，事情即已大功告成……

勃列日涅夫在处理干部问题时，首先要同契尔年科商量。契尔年科什么都知道：党中央书记们的情况，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高级干

部们的情况，包括他们生活中相当微妙的细节，无所不知。

各处室按编号称呼：第一处负责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第二处为书记处会议准备材料，第三处从事接收和分发文件，第四处收发密码电报，第五处的使命是监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第六处经管政治局档案，第七处经管书记处档案，第八处则管理“特殊卷宗”档案。

公共部干活的总共只有50人左右，还基本上都是一些技术人员。

为政治局服务的第一和第六两个处位于克里姆林宫内，因为政治局在那里开会，其余各处则在老广场。归入公共部的档案隐藏着国家的最高机密——从军事的到政治的都有。那里有斯大林的个人档案和对世界秘而不宣的具有爆炸性危险的材料：1939年与德国签署的关于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秘密记录原件，关于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军官的文件，以及其他许多材料。

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献。只有两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所有的文献——总书记（他自然不会到档案库来）和党的机密的保护者契尔年科。

在契尔年科主持公共部的时候，他有机会迅速提供勃列日涅夫所需要得文件，并压下所不需要的。一个决定可以紧急地通过，另一个则可能长期滞留在党的办公厅里。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由各个部草拟，在中央书记处进行讨论，而将其分发下传的正是公共部。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情况：文件业已回书记处批准，却得不到流传，因为公共部不予分发。自然，这种事是预先已与总书记讲定的，但尽管如此，也足以证明公共部领导人的权力之大了。

契尔年科建立了一个处理信息的电子系统：中央委员会的计算中心。计算机是国产的“明斯克”牌，这个中心的处理能力超过国家计委的计算中心。公共部里已形成一个干部问题方面的巨大的资料提供站——涉及中央所任命的全部官员。所有的文件、所有的决定全都输入了计算机。契尔年科以此自豪，任何文件都能在短短数分钟内找到。

勃列日涅夫坐镇的政治局举行会议的克里姆林宫与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建筑群之间，敷设有一套地下气压传送装置，能在一瞬间向总书记提供所需要的文件。契尔年科为此获得了国家奖金。

契尔年科让勃列日涅夫摆脱了粗浅的事务。他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他时刻随侍左右，准备执行任何提示。他们之间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信任关系，勃列日涅夫总是将性质最为敏感的事情交付契尔年科办理，而不会托付与其他人……

最后数年勃列日涅夫自觉病体沉重时，契尔年科之于他尤其不可或缺。别的助手带着紧急的问题来见勃列日涅夫时，他常常生气地说：

“你们总是搬来一大堆问题，瞧人家科斯佳（契尔年科本名康斯坦丁的昵称）多会报告事情……”

勃列日涅夫关心自己这个忠实的助手。

1976年举行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契尔年科包揽了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部负责进行地方上的选举，遴选大会代表。而契尔年科负责大会文件，并因此被授予国家最高奖。

当时还存在着严格的循序渐进授勋的规矩。党的高层领导人60寿诞之际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中间时期则颁发列宁勋章或十月革命勋章。契尔年科尽管未逢整十的周年诞辰，却在1976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嘉奖令的措词令许多人不胜惊奇：获奖理由竟然是筹备和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在三月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世的最后数年间，契尔年科的作用难以置信地增长。他仔细筛选向勃列日涅夫传输来的信息，为他制定详细具体的工作计划。总书记接待室里的秘书们都成了他的下属。

第4章 安德罗波夫和他的副手

在最高权力的三个层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根本不存在公务之外的关系，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也绝对不信任任何人。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背着他聚会，人们也一直唯恐激怒总书记。

对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选中安德罗波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堪称最为得当的任命之一。

这里我要插上一段题外的话。当我2007年夏天撰写本书时，曾有机会在新奥加廖沃总统官邸小住，并询问安德罗波夫当年的一名下级，他对上级的看法如何。我这里说的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于问及安德罗波夫，他说：

“安德罗波夫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使人们联想到某种善良的东西，联想到使我们的生活更趋美好，”总统对我说道，“似乎他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诚然，后来才明白，他所注重的更多的是浅表层次的变化，整顿秩序。您还记得吧，当时一再进行围捕。不过我对他的态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您谈的是他短暂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那个时期，大家所记得的正是这一时段。然而，您如何看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时的安德罗波夫呢？”

“您知道，我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恰恰与安德罗波夫的上台联系在一起。许多东西正是他就任委员会主席之后改变的。顺便说说，这种法制并不比别人的差……”

“是的，我很想知道您当时的个人印象。你们那时候在自己的圈子里是怎样评价他的呢？对你们来说什么事情最为主要？”

“嗯，我们当时并不怎么多谈这样的话题……”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1964年5月中央主席团委员奥托·库西宁去世，此人自他们当年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事以来就一直支持他。安德罗波夫作为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落得形单影只，不知命运将会如何。

他并不属于势力强大的谢列平集团。已成为主要思想家、地位举足轻重的苏斯洛夫对他缺乏好感。与政府新任主席柯西金的关系也十分糟

糕。

安德罗波夫紧张不安，唯恐那些人与他彻底决裂。他全力以赴讨好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一时尚未对这位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1967年“五一”节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他走出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时全然发了呆。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当时正在总书记接待室里，便问道：

“怎么样，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应该祝贺您呢，还是怎样？”

“不知道，”他回答说。“只知道历史的车轮再一次碾过了我。”

很可能，安德罗波夫是真心不愿意干这个差事。在那个年代，由中央书记调任克格勃主席被视为贬职。他并未料想到，这个职务会让他成为全国最为声势显赫的人物之一，逐步将他导至总书记的宝座。

当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时，安德罗波夫咕哝着说：

“也许，不应当这样做吧？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搞不清楚，很难掌握这项困难的工作。”

自然，他的话大家都当成了耳旁风。勃列日涅夫事前早已与政治局委员们商定，所以实际上谁也不曾反对：安德罗波夫不属于任何一个帮派。

勃列日涅夫对人的了解非常透彻，能准确地分辨谁对他忠心耿耿，谁则不然。

一个月过后，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为贝利亚和伊格纳季耶夫之后第一位被授予党内高级职位的国家安全领导人。这是勃列日涅夫赠送的礼品，作为安德罗波夫所不情愿的这次任命的补偿，同时也是对前程的预支。

安德罗波夫对一切都有着正确的理解：关心总书记乃是他第一位的工作。每逢勃列日涅夫出行，他便费尽心机。安全部门工作人员不仅应当保卫总书记，而且要保护他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同胞，这些人可能用各种各样的请求打扰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实战友，从来不会怀疑正是勃列日涅夫应当领导党和国家。在各种争论中安德罗波夫总是站在总书记一边，并且监督其他人也要忠于勃列日涅夫。

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回忆道：

“我估计，克格勃里一直在记录我们每个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和地方其他领导人的档案材料。可以认为，这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委员圈子里的一个说法有关：

“我手里有针对你们每个人的材料……”

不单是电话遭到窃听。借助于技术设备，克格勃知道党和政府领导成员在住宅和别墅里所说的一切。有一次安德罗波夫在私下谈话中说：

“我有一些年轻姑娘专门从事电话和普通交谈的监听工作。有时候她们很难听清人们讲话的内容和家中所发生的事情。监听是昼夜不停地进行的……”

党中央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像所有的苏联公民一样，对于讲涉嫌犯上作乱的话怕得要命。比克宁刚开始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与他的同事在电话上交谈，对一位中央书记表示非议。事后才想到，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所有电话都是被监听的，颇觉懊丧。于是他去找赫鲁晓夫当年的第一助手舒伊斯基商量。

那人思索良久，然后挥了挥手说：

“没关系，用不着担心，这种录音会交到我知道的那个人手里。而此人对该书记很不喜欢，还说我们需要能够敏锐地进行思考的人……”

只是绝不能随随便便议论勃列日涅夫，那会受到严厉惩处。

勃列日涅夫对为他撰写讲话稿的鲍文非常器重。鲍文在向别人展示勃列日涅夫的多卷本文集时喜欢说：“苏联人民一遍遍高呼的那些口号并不是他的，而是我的！”

然而有一次克格勃截获了鲍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说他“迫不得已”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领导下工作，徒劳无益。

安德罗波夫将与鲍文友好的阿尔巴托夫叫来，给他看了那封信。解释说：不得不让勃列日涅夫看信，而勃列日涅夫准会把这些话揽到自己头上。阿尔巴托夫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何必把信交给总书记呢？送进档案馆去得了……

“可我不敢确定，这封信的复印件是否已经转交给勃列日涅夫了，”安德罗波夫回答道。“要知道，克格勃是一个复杂的机关，连主席也要受到监视。准有那么一些人会去报告勃列日涅夫，说克格勃主席隐瞒了某些牵涉到总书记本人的事情。”

鲍文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机关，发配去了《消息报》。自然，数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变恼怒为体恤，鲍文重新被召回为总书记撰写讲稿。出于补偿，还将他选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信任安德罗波夫，尽管如此，还是让两名忠于他的将军——茨维贡和奇尼奥夫进入克格勃领导层，他们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勃列日涅夫……他们与总书记实际的亲密程度，可以根据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加以判断：当勃列日涅夫离开莫斯科或者返回首都的时候，迎送者的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之外，必定会列入“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谢·库·茨维贡和格·卡·奇尼奥夫”。他们三人一起前往伏努科沃政府机场——安德罗波夫作为政治局委员，茨维贡作为第一副主席，奇尼奥夫则作为与总书记特别亲密的人。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回忆说，茨维贡和奇尼奥夫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他们向来都深得勃列日涅夫的好感。”

同时，茨维贡和奇尼奥夫彼此不和，尤其是在茨维贡担任克格勃第一幅主席之后。这同样让勃列日涅夫感到称心如意。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热衷于文学创作。茨维贡的妻子写散文，他也希望成为作家。他物色一批甘愿代劳的人，于是很快便出版了几部以他的名义写成的关于搜寻帝国主义敌人的报告文学著作，后来还有几部题以笔名谢·第聂伯罗夫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

他的书都能迅即问世，而电影剧本也总是很快便拍成大型艺术影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描写游击运动，茨维贡本人则被视为英勇的游击队员，实际上他的经历全然两样。

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小11岁。他1937年毕业于奥德萨师范学院历史系，在奥德萨州科德马市担任中学教师、校长。

1939年11月，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奉派前往摩尔达维亚。战争爆发时他是南方方面军特务处的工作人员，1942年1月被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州管理处，半年之后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387步兵师特务处副处长。1943年3月，他被派往远离前线的地方——南乌拉尔军区除奸部反间谍局侦查处。1946年将他调往基什尼奥夫担任摩尔达维亚国家安全部第二处副处长。不久之后，勃列日涅夫也来到这个共和国……

在根据茨维贡的脚本拍摄的影片中，以他自己为原型的主角无不由维亚切拉夫·吉洪诺夫扮演。茨维贡的相貌根本不像这位著名的演员、当年的偶像人物，不过大约他在想象中所见到的自己正是这副模样……

茨维贡（使用假名“谢·库·米申上将”）曾在根据尤利安·谢苗诺夫的长篇小说改编、由塔基扬娜·利奥兹诺娃导演的影片《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担任首席军事顾问，并认真地帮助摄制组。

奇尼奥夫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走出校门后在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工厂工作过不长一段时间，便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改做党务工作。1939年，他被提拔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冶金工业部领导人，并几乎当即被选为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正是勃列日涅夫……

1941年他们两人都上了前线。奇尼奥夫被任命为炮兵团长，后来又成为加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不同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自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任职，1950年成为苏联方面的副最高特派员。

1951年，奇尼奥夫考入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时已是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了。内务部清洗贝利亚的干部时，奇尼奥夫作为富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前往柏林担任苏军部队集群特务部部长，在德国度过了五年时光。

有两年他领导克格勃军事研究所，而自1960年10月起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任职。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首领之后，他的官职节节高升。

奇尼奥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家中的常客，成了全家人的朋友。他操控克格勃第九局（政治局警卫队）。据说，他专门监察“政治上不可靠之人”——并非持不同政见者，而是那些被认为不够可靠和对勃列日涅夫不够忠诚的国家和党的官员。

奇尼奥夫逐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大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

在整个克格勃，只有奇尼奥夫一个人打电话时不自报姓名，而是要求下属根据嗓音辨别出他来。当第一副主席之后，他对克格勃的副主席们和普通将军们也常常大声喝斥。委员会内的许多人都憎恨奇尼奥夫。他不假思索便轻易断送别人的前程。

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成员尽心竭力地维护自己的庇护者的利益，他们都明白，没有他，他们自己的交椅连一天也坐不稳。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干部，亲自挑选派往那里的人员，抽出时间不仅与其领导人谈话，而且同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各局局长谈话。

自然，勃列日涅夫总是亲自确定负责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局长的人选。“九局”局长直接服从于总书记，从他那里领受命令，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报告克格勃主席。

前“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作为谢米恰斯内的人，在更换克格勃主席之后当即被免职，提拔他的副手安东诺夫少将继任，此人来自情报机关，与政界上层领导毫无瓜葛。

1967年夏天，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切布里科夫突然被召到莫斯科，事前未向其作任何解释。他判断，人家要将他派往别的州委。直至傍晚，他一直在老广场的走廊里踟蹰，等候决定自己的命运。到了晚上9点，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才接见了他，核实履历表上的内容是否完全正确，并吩咐他在接待室里等候。晚上11点，卡皮托诺夫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据其自己回忆，切尔布里科夫由于始料未及顿时“呆住了”。

勃列日涅夫看罢切布里科夫的履历表，对其颇为中意：上过前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从生产部门转而从事党务工作。勃列日涅夫提了几个关于州里情况的问题，便很信任地说：

“尤里（即安德罗波夫）我们已派去克格勃，需要几个人协助他，并加强各机关的力量。”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可从来没有在克格勃工作过呀。”切布里科夫表示异议。

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你能学会干这一行的。你有经验，又打过仗。”

切布里科夫——又一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被批准为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干部局局长。

克格勃原分管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局长阿利金将军回忆说，他那里曾经发生一个只有总书记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他在乌克兰工作的时候开始即已认识勃列日涅夫，便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请求接见。勃列日涅夫当即说道：

“你明天早上九点以前来吧……”

据阿利金回忆，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待了他，像同志式客客气气。总书记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热情拥抱客人。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殷勤、坦诚，不指名地谈论与某些并不支持他的

政治局委员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按照他的算法，力量的对比约为50%对50%。

“真令人痛心，”勃列日涅夫埋怨说，“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乌克兰就已经长期一道工作过了呀。”

阿利金明白所说的都是谁，便热烈支持增加政治局组成人员、向其中引进新生力量亦即忠于勃列日涅夫的人的设想。

他们也谈到谢列平的“青年帮”，此前谢列平已被解除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调往工会。勃列日涅夫对阿利金说，他了解这帮人的“不光彩的活动”，他们甚至蓄谋“将现今的领导人关进地洞”。不过这个帮派不大，其参与者在民众中鲜为人知，因而他们并不构成政治上的危险。

“我们已经通过组织途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说。

送别阿利金时，勃列日涅夫说道：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如果需要，你就打电话，来见我，我随时都会尽可能地帮助你……”

国家安全局机关建立50周年纪念日的上午，勃列日涅夫在他那里接见了克格勃全体领导人员。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要求下属们身着军装。勃列日涅夫与每个人握手寒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到阿利金跟前时，总书记故意引人注目地拥抱了他，并对安德罗波夫说：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是我在党内的老朋友……”

安德罗波夫明白勃列日涅夫的用意。阿利金便当上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获得了中将军衔和列宁勋章。

在最高权力的三个层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根本不存在公务之外的关系，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也绝对不信任任何人。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当年一样，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背着他聚会，人们也一直唯恐激怒总书记。

即便是心爱的打猎活动，也都只能是要么自己单独去，要么与总书记同行。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敢确信他们没有遭到窃听。更有把握地是恰恰相反。敏感的话题都得离开电话机远一点小声交谈，而且彼此间从不上门做客。

戈尔巴乔夫写道，他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在一座与安德罗波夫比邻的别墅安家。有一个星期天他邀请安德罗波夫及其夫人塔季扬娜·菲利

波夫娜到他家吃饭。安德罗波夫谢绝了，并解释说：

“如果我上你家去，明天马上便会议论纷纷：谁谁去了哪里，目的何在，都议论了些什么？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只要刚到你家，就已经有人跑去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

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回忆，他曾经去克麦罗沃州处理矿山的事情。回来后勃列日涅夫将他叫去问：

“你去克麦罗沃，怎么给我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你知道，这是不允许的，总归该问一问嘛……”

于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秩序。应当让政治局知道谁人要去哪里，要由政治局决定外出的事，并且知道他准备在那里干些什么。”

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提出疑问：

“值得这样详加规定吗？”

然而勃列日涅夫依旧固执己见。

勃列日涅夫不允许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国家安全部门安插自己人。诺尔曼少将对我讲述过，任命他为白俄罗斯克格勃副主席之事何以能落实。诺尔曼原籍戈梅利（乌克兰城市），战前在共青团平斯克区委工作，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打游击。战后成为一个区委的第一书记，后来被调入克格勃。自1965年起在莫斯科第二总局工作，1968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分局局长。

1970年冬，安德罗波夫与他进行谈话。安德罗波夫向他颁发将军肩章时预先告诉他：

“你要准备好重返白俄罗斯，我们打算推荐您为委员会主席。”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却突然任命了尼库尔金为白俄罗斯克格勃主席。他比诺尔曼年长9岁，自1940年起即在克格勃工作，已准备让他退休了。

诺尔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安德罗波夫要自食其言？

只是后来人家才向他作了解释：

“你知道你的任命出了什么问题吗？”

“不，不知道。”

“当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你的候选人资格时，那人说：‘您怎么啦，不明白这是波特罗（勃列日涅夫这样称呼马舍洛夫）往自己那里网罗游击队员吗？我们竟然对他在那里意欲何为一无所知！’”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舍洛夫在战争年代打过游击，当上了苏联英雄。心怀警惕的勃列日涅夫不希望马舍洛夫身边围绕着一群早年即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会更多地仰仗马舍洛夫，而不是听从莫斯科。

因而便将曾在蒙古担任过国家安全系统顾问的尼库尔金将军派到了明斯克。而马舍洛夫请求安德罗波夫让其重返故乡的诺尔曼，反而被调任乌兹别克共和国委员会主席。

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每一个忠实追随者全都给予关注。

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都分局局长阿利金一直记清勃列日涅夫与他进行交谈的日期，甚至钟点——1980年6月16日11时50分。总书记在扎维多沃打猎归来，派人给他送去一大块野猪肉，阿利金便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表示谢意。勃列日涅夫很高兴：

“我没有注意到，有多长时间不曾送给你‘大自然的馈赠’了，十分抱歉……野猪肉需要在假日里就着伏特加与家人分享。吃野猪肉一定得开怀畅饮。”

深感幸福的阿利金精神抖擞地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老近卫军都祝愿您身体健康。当我们在电视上看见您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感到十分高兴。我谨向您报告，莫斯科和莫斯科的作战形势非常好。”

第七卷 官场现形记

第1章 政治局委员的日常生活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长负责最高领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谢列平向勃列日涅夫推荐一个自己人——格里戈良担任这一职务。此人本是副局长，业已总揽了各种事务。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批准任命格里戈良，干嘛要让谢列平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呢？

他任命了另一个人——帕夫洛夫，此人一直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帕夫洛夫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这决定了他未来的生活，因为勃列日涅夫和他是同学。

1936年，帕夫洛夫当上了一家工厂附属的联合职业学校的副校长。1940年他奉调从事党务工作。战后担任过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和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两个市的党委第一书记，车里亚宾斯克和克斯特罗马两个州的州委第二书记，1957年就任马里州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时代末期帕夫洛夫被调往莫斯科，让其在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管一个部。在谢列平的委员会中工作被目为身价百倍，调任委员会各部部长职务的都是州委第一书记。

不过帕夫洛夫与谢列平共事的时间不长。勃列日涅夫想起了这位老相识。1965年帕夫洛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庶务局局长。

“帕夫洛夫从不粗野无礼，总是认真地倾听人们的请求，”原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讲述，“得罪人的事都让副手去干，他自己不肯与任何人争吵，以免搞坏关系。”

不过这种好心肠仅仅用在所需用的人身上。大的政治场所绝不会有善良之辈。

中央庶务局掌管着苏联的福利分配帝国。在这个帝国中，设有一批食品和工业品特供站、鞋帽服装服务部门、家具专门车间，甚至还有精炼工厂，首长的夫人们可以在那里定制金戒指和其他各种首饰。

给党的官员们都分配成套的、当时人们所说的“精心设计”的住房，甚至整座整座宅邸。

掏不了几文钱便会为他们在家具厂实验车间里制作家具。劳动组合以难以置信的低价为他们缝制服装。

庶务局还掌管设在列宁山上接待大楼里的运动保健综合馆。这是专门为党的高层领导们服务的，然而年迈的政治局委员们既不习惯在游泳

池中游泳，也没有学会打网球，在运动综合馆里进行体育活动的都是政治局委员们的儿孙们。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局长首先是为总书记服务的，由勃列日涅夫一家人对他的工作做出评价，而这位局长真可谓名副其实地忠心耿耿，唯命是听，毕恭毕敬，殷勤备至。

中央庶务局局长实际上就是总书记的高级仆人，总书记的日常生说均需由他亲手操持，不敢推给机关的人张罗。他负责勃列日涅夫家庭成员们的住房、汽车和旅游疗养证件的分配工作。总书记的住宅、别墅所需费用，均在党的经费中开销。

“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庶务局局长，比如，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别墅，”原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回忆说，“其他一些福利，给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则不行。为了给亲属搞到住房，必须去找他求情下话。而他也可能主动提出来：现在您的儿子或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应当帮助解决一下住房问题……

一个党的高级官员及其家人的生活，全都依赖庶务局长和他的机关。他负责为一个人治疗，也负责将其入葬：他要安排葬礼和分配高贵墓地中的位置。不过，顺序应该是这样：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各种要求，庶务局长只有在报告总书记并由其作出决定之后，才能加以办理。

地方上也都有同样的程序。

多年以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庶务局长都是戈洛博罗季科，据谢尔比茨基的一名助手说此人对每位上司都配备一把心理钥匙：‘他遵循日常生活准则：必须讨好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而做牛做马出苦力的家伙，那就自己凑合着过日子吧。’”

第一书记的这位助手给戈洛博罗季科打电话：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也该给党史研究所配备一台静电复印机了。他们在别人面前简直不好意思。”

“那么他们现在是怎么对付的？”戈洛博罗季科很想知道。

“像远古时代那样，用手抄写档案副本呗。”

“那就让他们像原来那样抄写吧，难道用复印机复印副本，会有什么变化吗？”

谢尔比茨基决定甩掉此人，让一名早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即与

自己一道工作的助手担任庶务局长。但长达五年期间，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却无法让莫斯科赞同他的决定！

戈洛博罗季科很善于为高级领导人效犬马之劳。当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休养的时候，这位庶务局长为总书记“搞到”一大筐堪称世所罕见的麝香草莓。深受感动的勃列日涅夫致电戈洛博罗季科。而此人又当即拨通谢尔比茨基的电话，向第一书记转告，说勃列日涅夫与他通话时多么热情。唉，怎么好打发勃列日涅夫本人都很看重的一个人退休呢？……

按规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配备卫队，“吉尔”牌轿车上装有无线电话，大别墅里安排有服务人员：两名厨师、四名服务员、两名园丁。别墅中设有电影放映厅、图书馆、绿树成荫的网球场、桑拿浴室、温室、花园。一度曾决定在政治局委员的别墅中建造发生战争时使用的防空洞，以保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但后来终于放弃了这个耗资高昂的主意。

所有这一切事务（卫队除外——那是克格勃九局的事）都由中央庶务局掌管。

党的高级领导成员觉得他们的生活很平常。

“我们生活得相当简朴，”先任中央书记、随后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索洛缅采夫答记者问时说，“我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时，每月收入800卢布，有一辆公务轿车、国家别墅。嗯，还有公费医疗、疗养院……还有什么呢？哎，对了，所谓的克里姆林宫商店。诚然，妻子在那里买过衬衣、床单。给我缝制西装：拿来样料，上门量尺寸。一套西装价值130—140卢布，我总共有15套……”

800卢布——所有的中央书记的工资都是如此，包括总书记在内。1974年给勃列日涅夫加薪50卢布，1978年再增加200卢布。不过这么些钱谁都不感兴趣，因为根本不需要另外去买任何东西，什么全都发给你，要么是免费的，要么只须交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

比如说，每位中央书记都有机会在特供站预定为数200卢布的食品（给政治局委员发放400卢布的食品费，给候补委员则发300卢布），但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特供站的价格想象不出有多低，简直无足挂齿。在特供站所领取到的经医生检验绝无公害的食品，足够一个大家庭之需，而且可供体体面面地接待宾朋。

可供预订的食品名单长达数百页。中央书记都在工作地点免费享用早、午、晚餐，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包带走一切。

“别墅群分布在首都西边莫斯科河沿岸的地区，”原中央公共部部长博尔金写道，“这照例都是一些现代的花园洋房建筑，一般坐落在面积多达50公顷的松林地带。区域内有玻璃温室、养禽场、蓄养其他动物的围栏，近年来又为花园洋房增建了游泳池和桑拿浴室……

“别墅有层楼，大量的房间、卧室、浴室、盥洗室。设有一些大餐厅、台球室和电影放映厅，可轻松地容纳四五十位来宾。毗邻主楼的常都是日用小建筑群、冷冻室、厨房。还有带暖气的车库，昼夜都可停放专用轿车……

“除去莫斯科市郊别墅之外，疗养地也有供领导成员们享用的花园洋房和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供夏日休憩的宫殿。实际上，每家人都拥有自己的疗养别墅，而且还在继续建设。”

中央书记休假或出差，不是乘坐班机，而是专机。无论住别墅还是在国家官邸休养，都无须支付任何费用。休假时政治局委员们都有医生陪护。如若需要某位专家，便会将其从莫斯科接来。原索契市长沃龙科夫讲述过克格勃九局工作人员去找他的情形：

“他们要求用一些技术高超的骨干人员加强泌尿方面的市政服务部门。他们在索契国家别墅中的保护对象，说得轻一点，都是年事已高之人，很需要这方面的服务。这些安全部门工作人员自己推荐了一位极负盛名的肾病和‘男人性事’方面的专家。说他可以调来索契，但需要一套住房。当然，我立即表示同意。”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政治局委员们都改乘手工装配、车身宽大的“吉尔-114”型轿车，中央书记们则配置车型略小的“吉尔-117”。为政府部长、党中央部长提供的均为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即已开始生产的“海鸥”牌轿车，还为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需要分配了“伏尔加”牌轿车。

克格勃九局的军官们不仅要关注被保卫对象的安全，而且要操心其本人和全家的一切日常生活问题。

在第一书记为政治局委员的各共和国，地方克格勃的第九局内都组建一个专门的分局。三名叫做“固定哨”的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不分昼夜轮流陪护保卫对象。分局局长同时负责照管政治局委员的家人，处理各种家庭事务。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配有私人厨师。每天在营养医师的监督下编制内容丰富的菜谱。剩下的仅仅是注明被侍候的高官今天想吃些什么。每道菜在上桌前都盛放在加有铅封的餐具里。

政治局委员配有家庭医生，负责一直监护患者，必要时可召来任何专家急救。

特别门诊部位于克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幢三层的古老大楼里，属于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

“还有一些特供商店、内部车间、凭票供应商店，”博尔金描述最高领导层的日常生活，“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在那些地方获得各种进口货，而且数量实际上毫无限制。”

赫鲁晓夫时期，国营百货商店中开设“200部”，专门为重要的外国共产党人来宾服务，他们来到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可以在那里购买到他们想要的物品，确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际上，这个部门变成了高层领导人们的购物点——他们在那里采购熟羊皮短皮袄和毛皮大衣、贵重的珠宝首饰、日常生活使用的技术设备，有些东西则不得不自己从国外购买。

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翻译苏霍德列夫讲过，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夫人莉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与丈夫一道来到美国后，便驱车外出为全家人购物，四处寻找较为廉价的商品。葛罗米柯常常为政治局中的首要人物带回各种礼品——帽子、衬衣、领带。当然他不会亲自去买，而是委托翻译代购。莉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总是责备苏霍德列夫，说他选购的东西太贵。

买帽子的事尤为复杂。政治局的人所戴的那类式样早已过时，在纽约根本没有。可是每年葛罗米柯都要打发苏霍德列夫去寻找那种灰色的礼帽。苏霍德列夫先买来一些样品，葛罗米柯便吹毛求疵地反复比较，有时候不得数次往返商店，然后才总算找到所需要的品种，还要去商店里加上每顶帽子未来所有者的姓名缩写——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波德戈尔内、契尔年科……

原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认为庶务局局长帕夫洛夫是勃列日涅夫影子内阁的关键性人物之一。梅德韦杰夫于1978年获任刚刚成立的党的中央教学机构和科学中心——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与庶务局发生过冲突。

梅德韦杰夫着手为自己的教授们开展正常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条件时，遭到中央庶务局局长的抵制，该局长的根据竟然是：教授们游手好闲，白拿工资。

为修建豪华的行政大楼、党中央机关享用的豪华的疗养院和宾馆，花钱毫无限制，而对学者们却尽可能地一毛不拔。后来梅德韦杰夫才明

白，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财政杠杆为养活那些人和他们控制下的大批机关打开方便之门。

梅德韦杰夫大发牢骚。但党中央机关领导人熟知制服执拗之人的多种手段。庶务局对社会科学院的财经活动进行了一次补充检查。检查结果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教授和教员们的工作量很小，却获得了太多的食品定额，而且院里在修缮过程中存在浪费壁纸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内对梅德韦杰夫进行公开的口诛笔伐，这其中帕夫洛夫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梅德韦杰夫的斥责长达半小时。后来诸如此类的吹毛求疵接连不断，直到权力更替，帕夫洛夫年迈退休为止……

每年给苏共中央庶务局的拨款将近30亿卢布，而那时的卢布还非常值钱。超过15亿卢布是党员所缴纳的党费，10亿卢布则来自出版方面的收入。庞大的党中央机关的费用全都从这笔款项中开支。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负责管理党的财务，掌握党的全部财产：办公楼、出版社、印刷厂、门诊部和医院、车库、住宅楼和疗养院。党拥有140家出版社，81家印刷厂，20余处疗养院和休养所。党的产业还包括近千个各式各样的机构——博物馆、政治教育之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及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分院、社会科学院、中央委员直属社会科学研究所（为外国人开办）、16所高级党校、常年办学的培训班网及其建筑。

庶务局内设有运输部、财政部预算处、党属出版社生产处、基建科。

各民族共和国的州委和中央委员会都要依赖庶务局，离开它就不能盖新的州委大楼、首长门诊部、机关幼儿园，党的汽车库就得不到新的汽车。将近30万官员在党内领取工资。

州党委领导着广阔的区域，却不敢超支上级批准的预算的一分钱，在财政问题上完全依赖庶务局。

比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请求中央庶务局拨款72000卢布，用于修复和安放列宁中央博物馆列宁格勒分馆大楼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装甲车，列宁曾于1917年4月站在该车上发表讲话；这笔款项也计划用于制作一幅“列宁在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的纪念地”的电动地图。罗曼诺夫这位政治局委员兼一个庞大党组织的领导人，竟然连这样的问题也无法自己决定！

鞑靼州委第一书记请求帕夫洛夫拨付30000卢布，用于实现若干措施的计划：“恢复纪念地并完善与喀山市列宁博物馆及列宁首次流放地毗

邻街道和地段的设施……”

如此巨大的产业使得局长成为权势赫赫的人物。各位中央书记也得敬他三分，他们有求于他，而不是他有求于他们。他像公共干部部长一样，必定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勃列日涅夫很操心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让谢列平的人担任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职务。

他当时尚未抱怨身体不好，但已认清了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乃是极其宝贵的信息。

勃列日涅夫要求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另行物色一个人。彼得罗夫斯基推荐年纪尚轻、精力充沛俄心脏病专家恰佐夫教授，此人在首次交谈中便深得勃列日涅夫好感，因为他并不热衷于高官厚禄。

谈话结束时勃列日涅夫说：

“要是您立即予以同意，我倒还要考虑考虑是否任命您为局长。现在既然您表示拒绝，那就说明，比您更好的人选再也找不到了。”于是回头对自己的卫队长里亚边科开玩笑说：“萨沙，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不肯到四局工作。你去大楼警卫里找一个军衔不低于上校的民警，派他押上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到局里去，马上开始工作吧。”

恰佐夫让克里姆林宫的医疗达到很高的水平，各部门都掌握了现代化的方法，使用最新的制剂。“天字第一号患者”之所以能在党和国家首脑的职位上坚持如此之长的时间，恰佐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2章 面面俱到的官员福利系统

在西方，警卫人员只负责保卫生命。克里姆林宫的传统则是：吃的和穿的，家具和别墅挑选，健康状况和休闲时间，微妙的差事和秘密约会——个人卫队统统都要包揽。

机关生涯的顶峰便是进党的中央机关工作。老广场上的楼群之中，笼罩着一种特殊的气氛。

中央委员会各部可分为全党的和部门的两类。第一类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公共部、党的组织工作部、宣传部……第二类监督相应的部门。

在第一类各部中工作的，都是经历过职业党务工作长期锻炼的地道的机关干部。也有具备实践经验的人，农业、工业方面的专家。

党的组织部和宣传部主要由外省人组成。

国际性各部在机关中不大招人喜欢：第一，国际问题专家有机会常常出国；第二，他们的工作较为单纯、愉快；第三，他们的文化素养高，不是来自党委机关，而是来自科学、新闻界（“不是自己人！”）。对这些人下意识地不肯信任，怀疑他们搞修正主义，尽管并非每一个机关工作人都能说清楚何谓修正主义。

在中央各部里，晋升的阶梯一目了然：视察员（在国际性各部则为参事）——工资300卢布；处长——400卢布；副部长——500卢布；部长有时也兼中央书记……有些部还设有顾问小组。顾问与处长平级，小组领导人则相当于副部长。副部长有权签署以部的名义发出的文件。

从担任处长开始，这些人员便允许享受“营养保健食堂”和卫生部直属第四总局的服务。视察员们在中央委员会食堂领取订购的食品，在部门的门诊部里看病，在中央庶务局的疗养院里休养。

从担任副部长开始，便给这些官员在中央委员会居住区分配半套可供常年使用的别墅，还有权叫车，但只能因公使用。上班则必须自行前往。

禁止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私建别墅。如果有谁加入别墅建设合作社，党的监察委员会便会过问其事。通常让其作出选择：或则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或则要别墅。但最高领导层却可以不动声色地规避这些禁令，以自己近亲的名义修建别墅。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任命某人担任某种职务的记录中，都要写上关键性的一句话："并将享用营养保健食堂和苏联卫生部直属第四总局门诊部的权利扩大到他"。

联合专科医院是米丘林大街上的一个具特权性质的医疗机构。

营养保健食堂在数十年的过程中为苏联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供应高质量的食品。

而党的高层领导人只须告诉服务人员，他们具体需要什么，便一切都会送货上门。这种事由克格勃九局经管……

克里姆林宫的传统就是如此。在西方，警卫人员只负责保卫生命。这里则一切都全然两样。吃的和穿的，家具和别墅挑选，健康状况和休闲时间，微妙的差事和秘密约会——个人卫队统统都要包揽。

卫队长势力的基础是其与国内第一号人物的亲密关系。受保护对象所度过的时间比他与妻子共处的时间还要多，与妻子不能谈论的事情却可以对卫队长讲，可以让卫队长知道家中的全部秘密。卫队长也照顾主人的孩子和孙子，让他们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帮助他们免于不幸。

离开了卫士，克里姆林宫的大人们便寸步难行。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过，他被迫退位之后，茫然失措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全家。早已惯熟的卫队长骤然消失，赫鲁晓夫一家简直不知道他们该如何生活。

卫士有义务操心，让保护对象的住宅和别墅不会比其他高层领导人的差。他还要挑选女服务员和厨师。要创造这样一种环境：让年轻英俊的卫士们不致让寂寞的女主人感到局促不安，而正值妙龄的女服务员也不致诱使尚不算老的男主人无心为国事思考。

这里存在着一种离奇现象：勃列日涅夫迫使自己的卫士们成为醉鬼和护士，但他的个人卫队却很爱他。戈尔巴乔夫从不对超出卫队职责范围的任何事提出要求，而卫士们偏偏恨他。大概问题全都在于，勃列日涅夫可以让卫士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与他们平等地交谈，以父辈的关切对待他们。而戈尔巴乔夫则与他们保持着距离。

勃列日涅夫对身边的人和普通工作人员都十分关切，而其他一些人则把这些人并不放在眼里。他知道全体人员的名字——卫士、厨师、服务员无不如此。当他带着随从在黑海上开着快艇游玩时，身为总书记的他自己掏钱买啤酒请客。瓦莉娅·格里梅尔随同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前来记录总书记的讲话，他向她赠送香水。

不过，轮流更替的克里姆林宫主人们有一个共同之点：不喜欢乌鸦。第一个厌恶乌鸦的人是斯大林。“他认为它们是过分聪明的一种鸟，也无法洞悉它们长寿的秘密。他将其比作身着黑衣的人。它们那声嘶力竭的啼叫声总是让他失去常态。”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多库恰耶夫将军回忆。

自此之后，卫队长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便展开了针对这个羽族的战争。狙击手射杀乌鸦，鸟类学家提供建议，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组织了利用鹰隼猎取乌鸦的活动。然而全都无济于事，克里姆林宫里对乌鸦的战争持续至今……

列入官阶表的人可以享用第四总局的门诊部、医院和疗养院。第一门诊部至今依然位于西夫采夫弗拉日卡，现在属于俄罗斯总统的庶务局，它和中央临床医院当年被公认为全苏联最好的医疗机构。

丘科夫斯基1965年春天曾在中央临床医院住院治疗，他在日记中记载：

这家医院很无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达官贵人为他们自己建造了天堂福地，而对平头百姓则不屑一顾。普通民众躺在简易病床上，吃着不足以裹腹的份饭，到处是垃圾，没有所需用的药品，任随粗暴的护理员和忙得晕头转向的护士支配；而为当官的和他们的老婆却提供超级的饮食、超级的医疗，对待他们极度谦恭有礼，各种条件无比舒适。

我的病房隔壁是建设部长妻子的病室，这是一个庸俗透顶的女人，将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来与她50岁的年龄作斗争，其实身体完全健康。

勃列日涅夫在位时，还在米丘林大街上另建了一座带门诊部的特殊医院，专门为高级官员服务。莫斯科郊外的巴尔维哈疗养院，是苏联卫生部下属四局系统最为舒适和权威的疗养院。尽管为高官们开设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很多——从里加海滨到索契，从库尔斯克州到瓦尔代到处都有，然而在苏联时期大家都更喜欢巴尔维哈。对任何疾患都很相宜的中间地带的温和气候，靠近莫斯科，良好的营养饮食，出色的医疗服务——这一切即便季节不合也都对休养之人具备吸引力。获得一张去巴尔维哈的疗养证乃是一种特别的荣耀。在这里休养的只能是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

疗养院里很少有彼此素未谋面的疗养者，但有许多身着白大褂的谦恭有礼之人。这里不会拒绝疗养者任何要求。对每个人都以本名加父称称呼，能记住疗养者姓名的不单是主治医生，而且还有护士、食堂售货员、护理员，以及那些为无法行走的病号送饭上门的人。

当局也关心机关的精神食粮。

有剧院售票处，专门向高级官员及其家人提供任何一场戏票；有专用的书书籍发送处，以保证首长们的书籍供应（中央委员会还有自己单独的发送处）；甚至还有专门的可以撕扯的票券簿，使拥有者五天一次获得两张任何影院的电影票，不过不得迟于开演前半小时到场……

官员福利系统一直扩大到区党委（规模自然要小一些）。州中心有专用门诊部及医院、食品基地和专用食堂。进门时凭贴有照片的通行证放行的专用食堂，虽说州党委和州执委会同在一座大楼里，但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去食堂用餐时常常分别在不同的餐厅——党委的人权力最大，用餐时甚至与苏维埃的人分开……还有一个仅供最高领导人使用的餐厅。州里和区里的头头们饱餐之后，再将为家人打包的食品放进黑色“伏尔加”牌轿车的后备箱。

第3章 总书记身边小圈子的日常运转

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不曾考虑过他究竟准备做些什么，他没有任何纲领。但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和肩负的重大责任不容许他采取冒险步骤，仓促行事。他承认有些事情他不懂，愿意向专家请教搞清楚。

勃列日涅夫常常爱向人讲述一件“劳斯莱斯”的趣事。那天他驾车从莫斯科前往扎维多沃，卫队前后相隔很远。中途在一个地方他看见两个提着网兜的妇女。她们招了招手。总书记便让她俩上车，送到了目的地，正好顺路。妇女们没有认出勃列日涅夫，给这位司机手里塞了一张三卢布的钞票。他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将那三卢布放进衣袋，继续开车前进……

勃列日涅夫成为第一书记的时候，机关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的种种荒谬念头业已告终，与勃列日涅夫应该可以共事。“早期的勃列日涅夫”与“晚期的赫鲁晓夫”相比，行为举止非常谦逊。他能倾听他人的意见，并不排斥他人的观点，也允许同自己争论。

他的国际事务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让勃列日涅夫看他所喜欢的一则引语：“朝自己的下属大喊大叫的人并非易于冲动之人——那不过是粗野的人。朝自己的上司大喊大叫的人才是易于冲动之人。”

勃列日涅夫哈哈大笑：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你老是对我大喊大叫。”

勃列日涅夫善于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善于讨人喜欢。他曾对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

“你知道吗，安德烈，魅力在政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喜欢留影，他知道自己很上相。因此塔斯社特意派来一个摄影记者——穆萨埃利扬，以供他支配。此人陪伴勃列日涅夫出行，为他在家人圈子里和疗养地拍照。

当年担任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副部长的德鲁戈夫将军讲述，白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之后，邀请勃列日涅夫进行总结。

德鲁戈夫迟到了一分半钟，进门时桌旁只剩下两把空椅子。他便在其中的一把上坐了下来。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勃列日涅夫和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舍洛夫。马舍洛夫坐上了主席的圈椅，勃列日涅

夫坐在德鲁戈夫旁边。后者连忙站了起来。

“德鲁戈夫，你哪儿去呀？”

“我坐的不是自己的位子，列昂尼德·伊里奇。”

“坐下吧。要不，如果他们再给我斟上一小杯，我就会聊上一个钟头。你可要制止我。”

在那些年中，勃列日涅夫尚不失幽默，也可以拿自己开玩笑：

“我喜欢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医疗主任恰佐夫院士回忆说，“这是一个身材匀称、衣着整洁、神态端庄、一副军人仪表的男人，面带欢快的笑容，交谈时坦诚的风度令人产生好感，幽默风趣，言语流畅（他那时候尚未出现发音不准的现象）。只要他愿意，他便能够博得交谈者对自己的好感。他讲起话来庄重得体，饱含善意，十分在行。”

善于交际的勃列日涅夫，喜欢呼朋引类到他那里聚会，讨厌孤身独处。

恰佐夫感到惊奇的是，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他打电话说：

“你明天晚上打算干什么？我想请你到别墅来，朋友们准备聚一聚，庆祝我的生日。”

恰佐夫简直不知所措，总书记的邀请是如此出人意料。扎列奇耶别墅里高朋满座：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齐涅夫、楚卡诺夫、民航部部长布加耶夫、克格勃第九局局长长安东诺夫……勃列日涅夫讲了许多笑话，他居然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他善于交际，容易相处，喜欢讲笑话，言谈俏皮、敏锐，而且很会开玩笑，特别是在节庆酒宴期间，”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写道，“他能突然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比如，他曾谈起过戴上莫诺马赫王褀是多么难受，说在这项大帽子之下，脑袋里即使在夜间也萦绕着白天所考虑的一切，而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简直多如牛毛！”

他是个多愁善感之人，老喜欢追忆青春时光。

“说来可能令人惊奇，”阿尔巴托夫院士回忆说，“比如，在心情舒畅的时候，尤其是在节庆酒宴期间（身体还好时，从不拒绝推杯换盏，但据我判断，他也知道自己的酒量，至少在垂暮之年是如此），他会突然开始朗诵诗歌。

“他能背诵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俄国颓废派文艺创始人之

一）的长诗《萨基亚·穆尼》和叶赛宁的许多抒情诗。青年时代勃列日涅夫（这是他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自己讲的）曾参加业余剧团‘蓝衣社’，梦想成为演员。他对表演有着明星的才能。我有时候发现，他在会晤外国人期间也都‘表演’（应该说演得不错）。”

兴致勃勃之际，勃列日涅夫有时甚至会朗诵自己所写的诗：

“记得有一首《政委之歌》，”斯米尔诺夫写道，“那是以拉普式的浪漫主义精神写成的，讲述一位政委死在整团哗变士兵面前的讲台上。”

他也曾打算施恩于人。例如，他出面保护过塔甘卡剧院总导演柳比莫夫——诚然，并非出自他的主动，而是他的顾问萨莫泰金上书的结果。勃列日涅夫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打电话，吩咐他取消关于将柳比莫夫撤职的决定。结果当柳比莫夫上演根据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的感人话剧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提起这出戏时，勃列日涅夫会热泪盈眶……

曾经给勃列日涅夫看过一部十分出色的影片《白俄罗斯车站》，该片同样遭到禁映，而勃列日涅夫看后深为感动，这才让观众得以一睹这部片子。

杰出的演员赖金力图在对他态度较好的莫斯科让自己的节目得到承认。列宁格勒的意识形态领导人比首都的领导人更为愚昧无知，只会对他进行迫害。

赖金早在战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即已与勃列日涅夫相识，仅有这一点就足以挽救这位杰出的演员。勃列日涅夫给了赖金在首都的第二套住房，而当他要求将他的剧院迁来莫斯科时，问题立即得到解决，给他划拨了位于玛利亚园林的“塔吉克斯坦”电影院的一座大楼。然而业已重病缠身的赖金在新大楼里仅仅演出了几个月。

勃列日涅夫很乐意帮助解决问题。有人向他要住房时，他并不生气，相反，他会当即发出提示，而且要求向他报告执行的情况。

“但不能说勃列日涅夫为人善良，”十分了解他的扎米亚金曾对我说，“他是一个狡诈阴险之人。虽然与他交谈时显得很随和，给人留下慈父般的印象，让人急于向他敞开心扉，但别人却警告我，不值得这样做。”

起初勃列日涅夫倒也能清醒地估计自己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能力。

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笔记表明他的精神世界十分贫乏。他记的都是去游过几次水，他的体重是多少，医生给他开了什么处方……

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不曾考虑过他究竟准备做些什么，他没有纲领。但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和肩负的重大责任改变了他。他不能容许自己采取冒险的步骤，不能仓促行事，要向专家们请教。他承认有些事情他不懂，愿意搞清楚。他是一个思维十分健全的人，但遗憾的是，教育程度不高，眼界有欠开阔。

根据鲍文的说法，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很简单：需要做到的就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他们免除战争的恐惧。他也成功地实现了某些目标，1960年代就是一个生活水平提高的时期。

勃列日涅夫容易受人影响。

1970年，持不同政见的生物化学家梅德韦杰夫被关进精神病院。鲍文对勃列日涅夫说，做了一件蠢事。

勃列日涅夫当即按下选择器控制台上的按键，接通了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电话：

“是你下的处理梅德韦杰夫的命令吗？”

安德罗波夫早已准备好了回答的话：

“不，这是局里热心过头了。我已经接到了科学院的电话，我会查明情况的。”

梅德韦杰夫被释放了。

勃列日涅夫一直避免涉及复杂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话题的争论。他请求不要将他描绘成理论家：

“反正谁也不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如此罕见的开诚布公赢得人们的好感。很少有谁会认为这番话，表明了国家领导人的局限，表明他缺乏进行战略规划和预见未来的能力。

有一次，那已经是晚些年代的事了，勃列日涅夫看完一篇为他代笔的文章，以怀疑的口气指出：

“文章的理论性是不是太强了？我可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

契尔年科马上安慰总书记：

“没关系，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即将看到，准会有百十位我国学者立即开始根据这篇文章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

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的讲话稿的撰写工作非常严肃认真，认为任何一篇讲话都很重要。数年期间形成了一个党员知识分子的小组，成年累月地为勃列日涅夫工作。有一天，其中有个人刻薄地说：

“讲话越来越好，国内的形势却越来越糟。”

在准备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过程中，有时会爆发争论。进行争论（包括与勃列日涅夫争论）的是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扎格拉金、鲍文、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并不参与严肃的争辩。勃列日涅夫的辨别能力非常好。有一次鲍文写的是与民主有关的部分，他进行朗读。勃列日涅夫毫不犹豫地说：

“有点儿资产阶级的意味。萨沙，你重写。”

鲍文连夜改写，早上朗读。勃列日涅夫满意地指出：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勃列日涅夫喜欢人们当着他的面争论。他有时候对助手们说：

“请设想你们就是政治局委员，争论吧，我听一听。”

勃列日涅夫听得很专心，面露一本正经的神情，也不明白他赞成还是不赞成人家对他所说的话。他这是在仔细考虑各种看法，权衡谁的论据更有分量。党的领导人参与讨论的时候，他的举止则全然不同。

“这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了，”扎格拉金回忆说，“他并不坚持他和助手们一起写成的每一句话，同时非常注意地倾听党的领导成员们的意见。还有第三个勃列日涅夫——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最后文本的时候，在这里他力求达到协商一致。”

一份文件在全体政治局委员尚未签字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敢贸然表示同意。而要获得他们的同意并不那么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会在报告草案上忧心忡忡地加上批语：“这个论点怎样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符呢？这如何才能与列宁关于……的论点相一致呢？我建议与列宁的提法更接近一些。”

勃列日涅夫不愿意与政治局的同事们争吵，他对自己的写作小组说：

“所有的意见都应当予以考虑。”

勃列日涅夫将讲话的起草工作放到扎维多沃进行，这是国防部的一个地域辽阔的军事狩猎部门。他总是星期五来到这里，一直待到星期

一。

扎维多沃位于列宁格勒公路101公里处，这已经是特尔州了（当时属加里宁州）。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认为，它是风光美妙无比的人间天堂。

那里建有一座三层的楼房。勃列日涅夫的豪华套房分布在最高层：办公室，政府通信枢纽，卧室，休息室，卫队、护士、按摩师用房。

二楼用于安置来客。除了卧室之外，还有一些不大的工作间，那是为给勃列日涅夫写讲话稿的人准备的。旁边住的是打字员和速记员。

一楼是办公厅、打字室、速记员室、电影放映厅、台球室、餐厅。

紧接大楼还添建了一个冬季养花木的花园，正中间安放一张大桌子，开会时便围桌而坐。

此外，还单独建有一个宴会厅，取名“窝棚”，因为其外观令人想到这种设施。也建造有直升飞机停机坪，挖了一个放养鳟鱼的池塘，开辟了一处公园和玫瑰花圃。

“有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乘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赠送的紫罗兰色‘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前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啊呀，好一辆紫罗兰色‘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总书记宁愿亲自驾驶。他开起车来剽悍无畏，风驰电掣——他喜欢冒险。”

有一件与这辆“罗尔斯-罗伊斯”相关联的趣事，勃列日涅夫常常自己爱向人讲述。那天他驾车从莫斯科前往扎维多沃，卫队前后相隔很远。中途在一个地方他看见两个提着网兜的妇女。她们招了招手。总书记便让她们俩上车，送到了目的地，正好顺路。妇女们没有认出勃列日涅夫，给这位司机手里塞了一张三卢布的钞票。他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将那三卢布放进衣袋，继续开车前进……

星期六讨论文稿。每个人宣读自己的那一部分。勃列日涅夫听了说：“这个很好，这个应当加工完善，而这个得重写。”

他看文稿的时候，会在左边的空白处用蓝铅笔作记号，却不加上意见和注释。

阿法纳西耶夫回忆：

“起初我们都猜测：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作了记号的段落有不够准确之处。这一来我们才相信，我们的总书记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愚钝。不错，他自己不会写文章，也当不了像样的编辑，但是

基本的辨别能力准确无误地暗示他，什么好什么不好。”

“有目共睹的粗俗举止，对女速记员和女打字员的态度过于随便，用早餐时经常让大家何止10分钟久候的习惯，这些都令人生厌，”布鲁坚茨讲述，“参与修订文稿时无精打采也无法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增光。他不能为这个过程增益，不能成为思想的源泉，仅仅让人明白，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事实表明，他对口头语言及其特性的感悟很好，比许多人都强得多，对不合语体的东西能准确地作出反应。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宣传员和政工人员，勃列日涅夫习惯于对人们、对群众讲话，能感悟到他究竟应当说些什么。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选择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了解材料——朗读。

“他默默地琢磨每一字眼，斟酌其含义和情感影响，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直觉。”

布鲁坚茨回忆，勃列日涅夫对所有的人都以“你”相称（波诺马廖夫除外，他对此人说话带父称和用“您”，但这绝非特别垂青的表现），只叫本名——极力表现大家似乎都是平等的，不过这对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并不适用。他们都害怕总书记。

那时候勃列日涅夫表面上气色还算不错。

“尽管如此，对健康的念念不忘和公然不愿视事，都已变得相当明显，”布鲁坚茨回忆道，“每天早上用早餐时，勃列日涅夫常常会谈起他如何游泳，这次治疗前后的血压如何，以不满的有时甚至是愤怒的口气回应试图向他谈公事的助手们；据我所知，他们另外能够见到老板的机会并不多。

“这方面受到另眼看待的主要是亚历山德罗夫。布拉托夫是一个文静得多的人，我甚至认为有些萎靡不振。楚卡诺夫当时不知何故失宠，总是保持沉默。”

每逢星期六傍晚，都要安排狩猎野猪的活动。人们从一个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开枪猎取。狩猎乃是一项令人迷恋的真正的嗜好，勃列日涅夫直至垂暮之年也不肯放弃。

当时的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匈牙利处处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1965年2月底曾陪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出访布达佩斯。

他们希望搞好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的关系，卡达尔非常同情赫鲁晓夫，在其退职后仍然给予关注，时而送酒，时而送水果。这在社会主

义阵营中是不合常规的：一个领导人既然被黜退了，那就意味着他已不复存在。勃列日涅夫认定，应当表示主动，与卡达尔建立友好关系。

会谈之后，因为卡达尔很了解苏联领导人的主要嗜好，便提出去猎取野鸡。他们乘坐火车前往该国南方。在车上卡达尔试图继续交谈，但未获成功。手边没有现成的材料，勃列日涅夫不知所措。卡达尔一看全都明白了，便不再坚持。于是波德戈尔内转换话题，讲述打猎的故事，津津有味地闲聊了四个钟头的趣事轶闻……

“职业猎手开始驱赶野鸡，”克留奇科夫描写射猎场面，“野鸡成百上千只地一窝蜂飞出茂密的灌木丛。其中许多当即被准确地射击毙命，像石头一般砰然坠地。

“卡达尔及其同事很少开枪，更多地是袖手旁观，彼此交换观感。勃列日涅夫则拼命地开枪！他身旁有一个随员，专门给他的枪重新装填子弹。

“勃列日涅夫一次次射击完毕后，总是看也不看便将还在冒烟的空枪递给随员，从其手中接过一支已经装好子弹的新枪。而那些此前数日业已喂熟了的可怜的野鸡们，仍然一群群持续不断地朝着猎手的方向飞来。

“这一场至今依然呈现在我眼前的大屠杀，直至夜幕降临之后方才停止。”

返回途中，卡达尔再次谈起严肃的话题。

“勃列日涅夫并不争论，”克留奇科夫发现，“不过也未作出具体的回答，指示以日后再行讨论这个问题敷衍过去。在我看来，他的思绪仍然萦绕在刚才的那场射猎的情景之中，他不想用任何严肃的谈话破坏所得到的愉快印象。”

在扎维多沃，每星期的同一时间都用土豆向野猪投食。它们已经习惯走近那个长达25—30米的木板平台。因此，不命中目标绝无可能。不过年长的职业猎手为防备万一，总是与勃列日涅夫同时开枪，结果从来都不会一无所获地空手而归。这种打猎的方式招来嘲笑，有人挖苦地说，这比到集体农庄的养猪场去射中两只猪还要简单。有时候打猎过程中也会发生危险：受伤的野猪朝猎人猛扑过来。不过职业猎手和总书记的卫队就在旁边，它们随身携带着自动步枪，以备在万不得已时击毙野猪。

有四名贴身卫士经管勃列日涅夫的猎枪。

勃列日涅夫在敞开心扉时曾对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

“安德烈，你知道吗，不管怎样，在评价所经历的道路时我得出结论，我所担任过的职务之中，最好的还是州党委书记。既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又能亲眼看见自己工作的现状和结果。你可以经常去工厂，到田间，同许多人打交道，感知他们的情绪。而这里，在克里姆林宫，你只能坐着通过放在你案头的文件看世界。”

他终究未能成为大政治家。他天生不宜从事国务活动，并不具备国家领导人必不可少的品质。他自己也明白只有州级领导人的水平。因此他极为小心谨慎，渴求别人给他出主意，并且经常犹豫不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取和保住权力。他倒是掌握了这门艺术。

第4章 掌握住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们

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良说，他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那些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那些人忠于总书记，哪怕他身体孱弱。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感到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便着手更换各地党的领导人。

于是轮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赫鲁晓夫很器重他，1963年甚至想将其调到莫斯科担任主管武装力量的苏共中央书记，但姆扎瓦纳泽请求将他留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

勃列日涅夫打算撤换格鲁吉亚第一书记的想法是逐步成熟的。

姆扎瓦纳泽出生在库塔伊西，22岁时离开了格鲁吉亚，参了军服兵役，直到30年之后才返回故乡。

姆扎瓦纳泽成了职业的军人政工人员，193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曾任不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战争结束时为中将军衔。

战后先后在哈尔科夫、基辅、喀尔巴阡等军区任职。在基辅，他结识了战后在乌克兰工作的赫鲁晓夫。当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开始为格鲁吉亚物色第一书记之时，赫鲁晓夫想起了他。

赫鲁晓夫不熟悉格鲁吉亚的干部，担心那里还遗留有贝利亚的人，他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其实姆扎瓦纳泽并不了解共和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经济工作的经验。但赫鲁晓夫对他作为候选人感到很满意——为人可靠，又是格鲁吉亚人。至于早已失去与共和国联系，地方精英对他感到陌生，这都只有好处——他便会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

多年之后，姆扎瓦纳泽感觉自己已是格鲁吉亚十足的主宰，这成了共和国机关中集体贪污受贿的肥沃土壤。

姆扎瓦纳泽忘记自己升官晋爵应当归功于赫鲁晓夫，他在1964年积极参加了推翻自己的恩人的准备活动。不仅自己热烈支持将赫鲁晓夫撤职的图谋，而且鼓动其他一些显要的党委书记反对赫鲁晓夫。

如今已是勃列日涅夫欠下姆扎瓦纳泽的债了，这使得他掌权的时间延长了多年。

1970年11月末，所有各民族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前往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庆祝苏维埃亚美尼亚成立50周年。勃列日涅夫同时莅临。傍晚大家齐集一堂共进晚餐，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阿利耶夫举杯致词，他说：

“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和睦相处，相互支持。我们德高望重的族长姆扎瓦纳泽指引着我们，一切问题我们都同他商量。”

关于“族长”的话，大家都当作玩笑——只有勃列日涅夫除外，他顿时警觉起来，便大谈宗派主义和民族孤立的话题。谢列斯特认为，正是那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姆扎瓦纳泽的个人档案里画上了一个粗大的负号。

不过问题似乎出在另外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尚未罹病，精力旺盛，还想有所作为，而姆扎瓦纳泽已年近古稀，该共和国需要一位新人。据说，是内务部长萧洛科夫让总书记注意到了已然显露头角的共和国部长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则认为，向勃列日涅夫推举他的正是那个阿利耶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此前的共和国克格勃主席。那些年莫斯科对阿利耶夫特别倚重。

莫斯科认为，阿利耶夫极为成功地领导着共和国，而谢瓦尔德纳泽也希望办到这一点。作出让这位内务部长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决定，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并非易事。不过乍一见谢瓦尔德纳泽便令人产生好感，他的旺盛精力给人以信心：他能胜任任何工作。

该共和国的领导人更替工作完全按照规则进行。1972年，格鲁吉亚的党组织遭遇严重危机。谢瓦尔德纳泽当选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其后姆扎瓦纳泽奉命退休，同年底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其时他年仅44岁。

谢瓦尔德纳泽是在刚刚开过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就任第一书记的，因此他要按规矩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不得不等待四年——直至1976年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才当选中央委员。

在他成功地防止了自己共和国内的骚动之后，威望大增。

一切都肇始于1977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修宪工作早在1961年即已启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成为工作小组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去职之后，伊利切夫调回外交部。对宪法草案的总结上报给勃列日涅夫。据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对方案之多感到不满。

20世纪60年代末期政治局得出结论，新宪法应当沿袭斯大林宪法，稍作修改即可。后来总算决定使其更加完善。工作小组由波诺马廖夫领导，这可是一个保守人物，对新思潮避之唯恐不及。

新宪法中提到要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首次加入了论述苏共作为“政治制度核心”的作用的宪法条文。

唯独在国语方面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新宪法中这样的概念付之阙如。但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宪法中却都有表述。

1977年12月23日，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契尔年科、卡皮托诺夫和齐米亚宁告知同事们：“不应该排除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特别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中，取消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即已存在有关国语的条文，这可能引起来自某一部分民众方面的也许还有国际舞台上的消极反应。各该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苏共中央的谈话也表述了对这个问题的警惕。”政治局并未认真对待这一警告。

各加盟共和国都奉命根据苏联新的基本法通过新的宪法。在现实生活中这什么也不能改变，对各共和国而言纯属形式主义之举——不过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例外。

莫斯科命令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与公共队形看齐。但不许载明作为独立自主典型特征的国语的企图，在青年中激起了群众性的愤怒。格鲁吉亚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尽管他们明白这可能以悲剧告终。

谢瓦尔德纳泽试图向勃列日涅夫加以澄清。勃列日涅夫很不情愿地回答说：“……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便把这位第一书记推给了身为党的主要思想家的苏斯洛夫。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什么话也不愿意听，硬说共和国的这一语言方面的反常现象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1978年4月14日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准备投票通过新宪法的日子，第比利斯政府大厦近旁聚集了数千名年轻人。而共和国领导层中有些人为了驱散不满分子，准备采取暴力手段，动用军队。

谢瓦尔德纳泽再次致电苏斯洛夫，提起1954年所发生的流血事件，请求报告勃列日涅夫，共和国内的局势极其严重，他作为第一书记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持安定。总的说来，多亏谢瓦尔德纳泽坚持不懈和善于说服，他总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格鲁吉亚语依然还是国语。

他出面会见聚集在政府大厦旁边的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说：“兄弟们，一切都会让你们如愿以偿！”

巨大的广场上爆发了狂欢。谢瓦尔德纳泽在共和国成为了英雄。

他成功地安抚了青年们，所作所为让全格鲁吉亚都感谢他。与此同时，他也并未与莫斯科发生争吵。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高度评价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治技巧，半年之后的1978年11月便让他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绝非各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能荣获党内这一高位。

勃列日涅夫在各共和国书记的群体中对谢瓦尔德纳泽明显地另眼相待，1981年奖赏他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他允许谢瓦尔德纳泽做一些其他的地方书记不被允许做的事情。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生活得较为心情愉快，共和国内容许更多的自由思想。尽管这里对持不同政见者与到处一样强硬，但当格鲁吉亚后来获得独立之时，人们还是会记起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当然是一位善于与上司搞好关系的能手，他从不忘记赞美勃列日涅夫。替他撰写讲话和文章的富有才气的年轻助手们，很少有谁比得上他的东方式的雄辩。在第比利斯纪念胜利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谢瓦尔德纳泽给听众奉献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大概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在1942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曾在第比利斯的军医院里治疗过。私下交谈之时他不止一次回忆起，他受到身边的医生们、医务人员们多么大的重视，多么令人感动的关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从这家医院回到前线，经历了整个战争，直至参加胜利阅兵式……”

1981年参加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到第比利斯，谢瓦尔德纳泽欢欣鼓舞地与共和国的积极分子们畅谈自己的印象：

“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报告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结论之中，在他的每一句话里，都表露出列宁主义的求实进取的精神，列宁主义的一往无前精神，列宁主义的客观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及分析当年现实时真正列宁主义的极为科学的态度。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站立在讲坛上，对每一个人都显得如此亲近，如此亲切。而每一个人也都看到、全身心地感觉到，他在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思考、如何创造……”

在改革年代，人们曾多次向谢瓦尔德纳泽提起这些冠冕堂皇的讲话，语带讥嘲地问他：什么时候您才是真诚的呢？是当年讴歌勃列日涅夫，还是如今号召进行激进的变革？

谢瓦尔德纳泽总是回答说，这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我们并不是想要得到莫斯科的赏识。我们只不过是想创造条件，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勃列日涅夫的一个优点是：善于关心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打电话从不吝啬时间。总书记接待室的值班秘书之一杰比洛夫讲过，勃列日涅夫常说：

“好像我很久没有和这个人通话了，你把电话接通。”

第一书记们是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因此，勃列日涅夫力争与他们和睦相处。第一书记们在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中央全会上会晤，在“莫斯科”饭店的房间里交流，分小组开会，讨论局势，相互帮助。

州委第一书记渴望得到党的领导层的特别关注。勃列日涅夫明白，有件事对州委第一书记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他回去后可以意味深长地说：“我和总书记谈话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对我说……”

“勃列日涅夫很在意接见‘我们的兄弟’，往往聊到很晚，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前托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回忆道，“有时还成批地接见，那时候我们便在他的办公室里随便找地方坐下，如果座位不够，就坐在窗台上。我很少参加集体接见，那种场合不能提出州里的问题，而再去一次总觉得不太好意思。”

托姆斯克为军工联合体提供50%的钚——核导弹的炸药。在州委书记之中，利加乔夫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总书记随时结识州和边疆区的新领导人。1964年，勃列日涅夫同时接见两名州委第一书记候选人——莫兹戈沃伊，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拟让其担任罗夫诺州委第一书记；波格列布尼亚克，拟任伊万诺-弗朗科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心情极为愉快，回忆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外喀尔巴阡所度过的那些日子。他与来客谈了一阵之后，将苏斯洛夫请来。

苏斯洛夫到后，他问：

“咳，怎么办呢，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有什么问题吗？”苏斯洛夫想弄清楚。

“是这样，莫兹戈沃伊和波格列布尼亚克来了，他们想要一个不低于州委书记的职位。”勃列日涅夫佯装气愤地说。

“那您担心的是什么呢，列昂尼德·伊里奇？”苏斯洛夫很感兴趣。

“他们还不满40岁，那可是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了。”

“这挺好的呀。”苏斯洛夫继续跟着表演。

勃列日涅夫握了握那二人的手，祝愿他们取得成就。

1967年，沃罗特尼科夫被领去让勃列日涅夫过目——准备批准其担任古比雪夫州执委会主席一职。沃罗特尼科夫发现，总书记发胖了，说话时声音嘶哑。手里拿着琥珀烟嘴。卫队一名工作人员每次为他送来一支香烟——次次都是勃列日涅夫给他按铃要的。他解释说：“我准备戒烟。医生要求。”

四年之后的1971年2月，沃罗特尼科夫被批准为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他被请到书记处。然后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又将他领去见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和蔼地问道：“喂，心情怎么样？”

他详细询问了古比雪夫州的情况——牲畜过冬的条件，饲料的储备，冬小麦状况。他让谈话无拘无束，充满兴味，力图留下良好印象。

勃列日涅夫向沃罗特尼科夫发问，显示出他对其先前经历的熟悉：

“很久没去沃罗涅日了吧？城里还有亲戚吗？”

“很久了，”沃罗特尼科夫回答道，“自从1963年以来就没去过。至于亲戚，特别是远亲，倒还有不少。”

“要注意，可别迁就，”勃列日涅夫笑着说，“否则他们会成为你的累赘的。”

他谈起刚开始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亲戚”们都纷纷给他来信和走后门。一个纠缠不休的女人苦苦要求接见，一进门就扑过来拥抱，直叫“廖尼亚叔叔！”

“可她这个‘侄女’我还是头一遭见。”

即便是休假期间，他每天也要在高频电话机旁度过两三个小时，与州委书记们聊天，详细询问他们有何需要和问题。

1974年5月9日白天，正当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沃罗特尼科夫坐下吃午饭的时候，房里的高频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电话接线员预告说：

“我这就接莫斯科。”

于是他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声音：

“您好，维塔斯·伊万诺维奇！衷心地祝贺胜利日，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请转达给同志们和家人。”

沃罗特尼科夫表示感谢。

勃列日涅夫问：“也许，我打断了您的节日宴饮吧？做得很对，这样的日子不加以庆祝太不应该了。”

听那说话的声音，似乎他自己也在庆祝：“我对您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去年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意义重大,必须巩固成绩。我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巨大而且重要。”

勃列日涅夫仔细询问农村的情况，想知道下雨没有，春播的进展如何，越冬作物损失了多少。建议多种一些大麦。随后又回想起了战争的往事：

“如今胜利日就是喜气洋洋、热泪盈眶，这很自然，也可以理解。维塔斯·伊万诺维奇，再一次表示祝贺。向您和全体同志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当天他给许多第一书记都打了电话。

据他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良说，他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这些人忠于总书记，希望他留在自己的职位,哪怕疾病缠身，身体孱弱。他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常常给他打电话，每次都关切地询问：

“你那里的情况如何？”

里亚博夫精神抖擞地报告道：

“一切正常，工业的情况良好，军工企业也不错。”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是一个工业帝国。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机器制造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在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工作的有五万人——他们生产铁路车辆和坦克。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国内最大的两个坦克城。加里宁工厂生产火炮，后来又生产导弹，现在则生产防空导弹综合体“C-300”。

里亚博夫被首先问及的是工业计划完成情况和国防订货的情况。但总书记的下一个问题必然是：

“农村的情况如何？”

1971年5月19日，里亚博夫突然听见高频电话里传来勃列日涅夫的声音：

“没有想到吧？”

总书记两天前刚刚来过电话，当时他们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里亚博夫一下便听了出来：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随时都很高兴接听总书记的电话……”

勃列日涅夫笑着说：

“政治局宣布一个决定，要我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让你也参加代表团。”

总书记没有放过亲自将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通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书记的机会。

1976年10月12日，里亚博夫同样意外地接到勃列日涅夫来电：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下雪了没有？”

“下了，个别地方甚至多达15厘米。”

“莫斯科也下了，见他的鬼，该收庄稼了，它偏来捣乱。”

“不过，列昂尼德·伊里奇，反正州里一定履行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所有承诺。”

“这就好，”勃列日涅夫说,“不过我想同你谈谈另一件事情，你们那里每天都有飞机飞往莫斯科吗？”里亚博夫予以确认。

“你就待在家里，”勃列日涅夫吩咐，“我午饭后再给你打电话，好让你明天来。我想和你谈谈。不过不必带任何材料。无论经济方面、工业方面、农村方面的材料都不要。”

过了一会儿，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值班秘书打来高频电话：

“怎么样，该祝贺你了吧？”

“暂时还不知道。”里亚博夫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你很感兴趣，”一名莫斯科官员秘密地透露，此人很喜欢向升官的人透露令人高兴的消息,“有关你的情况的材料就在他书案上放着呢。你还在休假的时候，这里就对你有许多议论。也许，要谈的是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事。”

但在机关中人们并不知道，总书记所作的决定究竟如何。他不急于让人知道。

傍晚勃列日涅夫再次打电话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要求第一书记次日去见他。但是提醒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10月3日一大早，里亚博夫飞抵莫斯科。他致电总书记接待室，报告他已经来到。值班秘书过了十分钟回电：“列昂尼德·伊里奇有请。”

勃列日涅夫热烈亲吻里亚博夫。两人交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勃列日涅夫决定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书记调到莫斯科，谈的就是将他作为中央书记候选人，准备取代乌斯季诺夫，领导整个军事工业联合体。

谈话后勃列日涅夫将自己的一张身穿元帅服的照片赠送给里亚博夫，要求他不忙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暂时不要向任何人谈及此事。他还需要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过了一天勃列日涅夫重又打电话说：

“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关于你的问题，大家都支持推举你为中央书记候选人。”

1976年10月末的中央全会上，议事日程已进行完毕之时勃列日涅夫说：

“你们知道，我们需要调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从事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因此政治局提议选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体照例鼓掌。

勃列日涅夫问：“需要介绍里亚博夫吗？”

全场高喊：“不需要，我们都了解。”

不过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有必要说上几句：“我说说他的一些情况。可以为他鼓掌的是他很年轻。他生于1928年，是工程师，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他那个州实力强大，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他工作积极努力，

卓有成效。”

进行表决之后，全会结束。里亚博夫被领进政治局委员齐集的大厅。这时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向他表示祝贺。

里亚博夫在中央委员会仅仅坚持了三年。他行事敏捷、性情倔犟，与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无法相互配合，而乌斯季诺夫可是勃列日涅夫言听计从之人……

不过当时里亚博夫还正得宠，所以勃列日涅夫问他：

“派谁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接替你呢？”

里亚博夫本想让科尔宾掌管该州，那是他在州委时的第二书记。可是1975年科尔宾已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

于是里亚博夫建议：

“我们把科尔宾从第比利斯调回来吧，他会胜任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对这个想法不中意。他认为，格鲁吉亚更需要科尔宾。民族共和国的第二书记是莫斯科的全权代理人，但与此同时，他的行为举止必须十分慎重，以免让民族干部感到委屈。所以勃列日涅夫不想将科尔宾调离。

于是里亚博夫推荐自己一手培养的叶利钦，当时叶利钦是州委主管建筑和工业的第二书记。

“叶利钦在莫斯科默默无闻，因此要推出他做候任人很难，”里亚博夫述说，“他甚至连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也不是。当我提出叶利钦的问题时，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他是什么人呀？我们并不认识他。为什么你要提拔这个第二书记呢？”

卡皮塔诺夫已经将州委第二书记科罗温的一般情况资料报送给勃列日涅夫。按履历表而言此人倒也合适。

苏共中央党的组织工作部里，存有官阶表上每一个职级的后备干部的资料。官阶表就是各种职务的一览表，任命或撤销职务都必须在党委的监督之下进行。从区党委一级开始都有官阶表。候选人未经区委同意，即使要改选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也不可以。

苏共中央官阶表划分为几类。最低一级为审查监督类，这时任命问题须征得中央委员会的部里同意，与职务候选人进行谈话的是视察员、科长或副处长。

中央书记处的官阶表是较高的一级。一些候任高级职务的人被直接约请至书记处，一天可批准对数十人的任命；另一些人则是通过中央书记们的信函表决方式予以任命。书记们会收到由各部门的部里准备的候任人的简短个人资料，同意时便署上自己的签名。中央书记们往往并不认识这些人，只是根据部里的意见签字了事。

还有一种政治局的官阶表：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军队高级指挥人员，大使和某些报刊的主编。不过中央书记处事先也要对这些候任者进行讨论。

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民族共和国的州委书记，那么按规定应由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批准，但须在决定中注明："报请苏共中央批准。"不经莫斯科同意，任命不能生效。在乌克兰，按传统设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共和国领导人，基辅同样也必须获得勃列日涅夫批准。

在中央委员会党的组织工作部里，对每个由上级任命的干部都建立个人档案。档案中保存有所谓个人简况证明，都是一些枯燥的官方资料外加几句走过场的空话：政治合格，思想坚定，品质可靠……官阶表上的高级别官员在任命之前，要由党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写出鉴定。此前还要询问几个了解候任者的人，他们的意见也记入档案。克格勃内部则不需要这类证明材料，那都是一些业已经过审查的人。

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档案保存在干部审查部门。允许接触这类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可以调阅这些材料。

当出现更换州党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时，干部组织工作部就会将几名候任者向总书记作介绍。如果他不喜欢他们，则重新着手物色合适的人选。

然而里亚博夫认为科罗温不能胜任第一书记之职，而且一再坚持。里亚博夫希望让自己的人留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对勃列日涅夫说：

"叶利钦这个人勇于负责，工作刻苦、自觉。他在我手下经过很好的锻炼，是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

勃列日涅夫认真听取了里亚博夫的意见，表示同意：

"你了解得更清楚。既然你有把握，我就支持。"

1978年8月，里亚博夫作为监管行政机关部的苏共中央书记，将内务部长萧洛科夫约请到他那里，进行了三个小时关于国内犯罪情况的谈话。里亚博夫感到惊奇的是，萧洛科夫对批评意见并无异议，答应改变

现状。道别时还对里亚博夫这次坚持原则的谈话和很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

“我当了十二年部长了，这是头一次有中央书记听取我的意见。”

里亚博夫感到满意。然而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随后告诉他说，萧洛科夫刚与里亚博夫见过面，马上就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这位部长气得失去常态：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像什么话？为什么里亚博夫把我叫去，训我，教导我应当如何工作！？”

总书记未必会喜欢里亚博夫对一个从来只向他本人汇报的部长追究责任。但最主要的是，里亚博夫不善于搞好与乌斯季诺夫的关系，所以最终丢掉了中央书记的职位……

而叶利钦的际遇则要顺利得多。当里亚博夫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举荐他的时候，他本人正在莫斯科——在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班。他突然被召到中央委员会。首先与他谈话的是主管干部的书记卡皮托诺夫，然后是主管工业的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基里连科，接下来还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苏斯洛夫。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向叶利钦谈过什么具体事情，只是对他端详了一番。

只有事实上已是党内二号人物的苏斯洛夫问了一点具体情况：他问起叶利钦是否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工作，是否熟悉州里的党组织。

叶利钦明白，他即将接替里亚博夫执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了。但要说这个话，那是总书记特有的权力。

稍早一些时候就任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讲述过：

对候任第一书记的最终决定权正是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他的团队，对他们进行仔细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精心研究有望获得职位者的专门卷宗。

我估计，他们会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初步意见，然后进行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的会晤，只有在他们之后才能让他同勃列日涅夫本人见面……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轮程序，所有的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在获得批准之前都必经历。

这些会见所带有的性质如果不说是荒谬的话，至少也是奇怪的。我们坐下来，彼此向对方微笑，进行不慌不忙的交谈。这时候，我清楚地

知道为什么要召见我，但对此谁都闭口不提，因为可以讲“我们推荐您”这种决定性的话的人，只能是勃列日涅夫。

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决定性的谈话，情形则截然不同。那一次和随后的历次会见都使我深信一点：勃列日涅夫很善于让交谈的人对自己产生好感，能制造出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

我很明白他并不复杂的意图：尽可能多听一听，通过倾听形成对交谈者的看法，了解其分析当地和社会的各种问题的能力……

勃列日涅夫说话时的态度显得对人特别信任，仿佛正是希望向我倾述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对待叶利钦也是如此。卡皮托诺夫和里亚博夫将他领进克里姆林宫。身材高大、言语不多、体态壮实的叶利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问题解决了，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就此声名鹊起。

叶利钦本人后来也讲述过自己的新境遇：

第一书记的意见就是法律，恐怕没有谁敢于不将他的要求或吩咐一一照办……是的，头号人物的权力实际上是无限的。掌权的感觉令人陶醉……

在那个时代，州委第一书记就是上帝、沙皇，一州之主。第一书记的意见实际上对任何问题而言都是不容更改的最终决定。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各民族共和国、边疆区委、州委的领导人已习惯于几乎完全独立自主。无论总书记还是他的助手，都不会深入干预各州的事务。而有些州的人口多达数百万之众……

第5章 苹果通心烂

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

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收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统统都变成了商品。

总书记的亲信之中，拉希多夫广受欢迎。他熟知莫斯科官员们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任何一位负责官员都不会从乌兹别克空手而归。他从不希求因刚刚为他人效劳就获取回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广交朋友，以便万一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人家能预先提醒他。

勃列日涅夫素来善于交际，平易近人，颇具魅力。他总是避免进行不愉快的交谈，撤人之职时从不说明原因，但也不会致人于死地。也可能大发雷霆，开口骂娘，然而很快便又恢复平静。

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急于惩处有过失的人。

他来到阿拉木图时，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了卡拉甘达州考温拉德区委书记。次日州委第一书记来见勃列日涅夫，说他要将犯错误的人撤职，而且已经物色到了接替的人。

勃列日涅夫反而感到惊讶。他向第一书记解释说，从批评中得出结论是应该的，但必须给予改正所犯错误的机会。如果这位领导人过而不改，这时候才需要采取极端措施。

曾当过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多年助手的莫基拉特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在位时，总的说来道德要求的水平降低了。酗酒现象大肆泛滥，人性中通常应有的诚实和正派的品德遭到冷落，而各种各样善于拍马钻营和一心假公济私之徒却如鱼得水。而充当这些人的庇护者的可耻角色的，往往正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帮凶波德戈尔内……”

勃列日涅夫对那些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力求个人致富的人礼遇有加，这方面的大量事例已广为人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贪污受贿现象具有极其广泛的规模，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取决于大批官员。今天看来，当时的受贿数额似乎引人发笑，但要知道，那时候的生活水平也全然不同。

据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说，文化部长福尔采娃就很喜欢接受演员们的礼品：

她更喜欢收受外汇，这我自己便可以作证：1969年大剧院在巴黎演出期间，我塞给她400美元——那是我40天演出的全部酬金，因为我像剧院的所有演员一样，每天仅能收入10美元。

我直接向她行贿，是为了按照我的合同允许我去国外演出（否则常常成了这样：合同是我的，而根据这个合同出国的却是另一个歌唱演员）。我忐忑不安，浑身冒汗，而她却泰然自若、习以为常地顺手收下，说了声："谢谢……"

情况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苏联的全体精英事实上都不顾工作，一心安排自家的生活。

"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呢？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位高层干部向我讲述，"不想去上班，你可以给书记处领导人打电话：我今天不能来了——那你就休息吧。勃列日涅夫从来不曾为此处罚过谁。"

上层官员们纷纷出国，将自家的孩子送去那里工作，尽情分享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莫斯科近郊兴建起一批批按当时的标准堪称豪华的别墅，莫斯科街道上出现了崭新的外国品牌的汽车。高官显贵们争先收藏时髦的彩色写生画和古董。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口角，对下属的小毛病总是采取迁就的态度。

当时的克格勃莫斯科管理局局长阿利金回忆说，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渔业部长伊什科夫犯下了最大的贪污受贿案之一。

阿利金报告安德罗波夫：侦查材料表明，这位部长受贿23000卢布。安德罗波夫想了想说："好吧，我一定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过我知道，这对他可是个坏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给阿利金打电话说，伊什科夫的材料已上报总书记：

"不过勃列日涅夫认为，既然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那么他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之前便无法解决，那会弄得很难为情。总之，列昂尼德·伊里奇劝我把他叫来谈谈算了。"

很快安德罗波夫重又与阿利金通话。伊什科夫部长承认的确收了钱，但认为那是赠款，请求将他的行为认定为错误，并声明准备将整笔

款项缴作国家收入，而且也这样做了。

“他上缴得太少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阿利金说。“经侦查查明，他还有一笔受贿款多达29000卢布。”

伊什科夫重又被叫到克格勃。他并无异议，将这笔款项也如数上缴。

伊什科夫1920年代在斯塔夫罗波尔做过不长一段时期的共青团工作，其后终生都从事渔业活动。早在1940年斯大林便让他担任人民委员。由于工业结构无休无止地变动，职务的名称也随之更改，但他活动的领域却一直未变。

勃列日涅夫于1965年为伊什科夫建立了渔业部，他也就在这个职位上干了14年。1979年2月他奉命退休，但仍然是中央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死后光荣地入葬新圣母公墓……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梅都诺夫，自1973年以来一直是该边疆区的主宰。当勃列日涅夫开始怀念战争岁月和自己的功勋之时，所有的人当中因此而受益最多的便是梅都诺夫。勃列日涅夫上校曾经战斗过的大名鼎鼎的“小地”，正好在梅都诺夫所管辖的区域之内。这位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所操心的是，要让勃列日涅夫的功勋名副其实地永垂不朽。勃列日涅夫莅临新罗西斯克时深为感动，不禁拥抱了梅都诺夫。

梅都诺夫在党代会上许诺收获一百万吨稻谷。倒是建成了一个人工水库，但淹没了许多村庄，百姓被迁移到外地。整个边疆区都为一百万吨而辛勤劳动，酷暑天在没膝的水中干活，好让梅都诺夫能够向上司表功。他终于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后来表明，他所许诺的一百万吨只不过是徒托空言，耕地却被破坏了。

当年遐迩闻名的“鱼案”是从索契“海洋”商店经理普鲁伊泽被捕开始的。接下来便势如破竹：

索契市党委书记亚历山大·梅尔兹雷伊和公共饮食管理局局长外号“沙赫王后”的瓦连京娜·梅尔兹拉娅（在海滨与一些德国女人搞团伙犯罪，盗窃边防军的武器，侵占公有汽车，无偿修建别墅，虚报成绩，收取商业职工的贿赂，被捕后伪装患有心理疾病，被判剥夺自由15年并处没收财产）；

区委书记塔拉达（主动向审判人员交出价值750000卢布的贵重物品，供认收受100人的贿赂，有三处密室——厨房里、板棚里、鸡舍里各一处，他保证协助侦查，因中风死于福尔托沃监狱）；

格连吉克市食堂和餐厅联营组织的经理贝拉·博罗得金娜（受贿一百万卢布，被枪决）；

格连吉克市党委第一书记波戈金（失踪）；

霍斯京区执委会主席洛贡采夫（作为证人接受讯问，回家后给儿子写了遗书，用电线缠身，接上电源自尽）……

在索契也大肆进行逮捕。市商业部门和公共饮食部门的领导人供出了他们的庇护者——边疆区党委书记塔拉达。他收受贿金是因为包庇边疆区内存在的隐蔽经济，主要是一些大肆生产非法牟利产品的地下车间。感恩戴德的车间老板给他送钱，他便与其余的人私分。据说，在审讯过程中塔拉达答应供出一些人，但当天夜里他便死在牢房之中。

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明白，侦查必须制止。梅都诺夫知道，他可以牢牢依靠总书记及其亲信。有一次，梅都诺夫已经在中央书记处遭到严厉申斥。他刚刚回到克拉斯诺达尔，勃列日涅夫便打来电话：

“你用不着担心，不必太在意所发生的事情。安心工作吧。”

当中央宣传部处长比克宁来到克拉斯诺达尔之时，梅都诺夫给他看一本大相册，其中有他和勃列日涅夫的合影。用意是，批评一个与总书记如此亲密之人至少是愚蠢的。

《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了边疆区的状况。党的领导层、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齐米亚宁都急忙为梅都诺夫辩护。

“为此，”该报当时的领导人涅纳舍夫回忆说，“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米亚宁将多少怒气发泄到总编辑头上，他认为，正如在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考虑不周，背离了苏共中央的立场。”

安德罗波夫当上第二书记之后，他忍无可忍，专门为梅都诺夫的事找勃列日涅夫诉说。谈话是在电话中进行的。总书记的卫士梅德韦杰夫当时正在他的办公室里。

听罢安德罗波夫的话后，勃列日涅夫问：

“怎么办呢？”

“提起刑事诉讼，”安德罗波夫建议，“逮捕并审判梅都诺夫。”

“尤拉，不能这样做，”勃列日涅夫说，“他是一个很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可现在却要将他送上法庭？那我们就给一个很好的边疆区抹了黑。”

勃列日涅夫所同意的唯一的一点是，将梅都诺夫调任不太引人注目的工作，党的办公厅就曾经有过这种委婉的做法。

梅都诺夫对此的陈述是这样：

“我被戈尔巴乔夫请去，他说：‘现在我们就去见安德罗波夫。谈话可能不太愉快。’安德罗波夫宣布：‘是将你召回由中央分配另外的工作的时候了。部长的空缺没有，您暂时只能任副职。’既没有指责，也没有解释。我内心里十分气愤。‘我要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现在不应当这样做。必须保护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拉斯诺达尔召开了全会，我进行告别……所有的人都得到警告，不让提问任何问题……”

早在1959年3月即已当选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的拉希多夫也是一位同样神奇的能人。当时谁都无法设想，他居然创造纪录，稳居这一职位长达24年之久。

拉希多夫将赌注押在棉花种植上，每年都增加供应量。国家非常需要棉花，特别是军事工业，因此拉希多夫获得两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十枚列宁勋章，甚至还有列宁奖金。党的领导人全都尽可能收罗多种勋章，已经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来让自己开心。

在拉希多夫为国家提供棉花的同时，莫斯科也允许他按照他的需要统治那个共和国。

他建立起了个人专权的牢固体系，将自己的所有亲属安插在最好的职位上。仅仅在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就有第一书记的14位亲属。

实质上，拉希多夫在共和国内恢复了一个氏族体系，让其控制所有的部门。举凡重要的职务，都只能任命自己人担任。

拉希多夫的力量来自他很善于和尽可能多的位高权重的莫斯科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凡是莅临共和国的人，他都悉心殷勤地接待，务必使其心满意足。

1970年代初期领导中央宣传部的雅科夫列夫讲述：

有一次，我去乌兹别克出差。人家让我入住党的宾馆，以好吃好喝招待。临别时我要求由我付款。他们坚决拒绝。大惊失色的宾馆经理连忙跑来说：“怎么能这样呢？这事我连报告上级也不敢。我们会被撤职的。”我坚持付了款。据我看来，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与拉希多夫的关系就不融洽了。

列昂尼德·伊里奇喜欢他，仅仅是因为他在棉花种植方面成绩卓著吗？抑或另有原故？

勃列日涅夫酷好奖章和礼品。倒并非他很贪婪。他是对受到关注这个事实本身感到愉悦。拉希多夫善于利用这一点。他去见所有的人都要带礼物——无论去中央农业部还是其他各部，无不如此。每次前往莫斯科，他都要在自己的公馆举行豪华宴会，宴请对他有用的人，这些人则对他不胜感激。

布鲁坚茨回忆说，拉希多夫曾率领代表团出访伊拉克，从那里为勃列日涅夫带回一尊黄金雕像。

所有的共和国都向一国之主及其亲信奉献礼品。但谁也无法将礼品做得比拉希多夫更好，他熟知莫斯科官员们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任何一位负责官员都不会从乌兹别克空手而归。对特别不可或缺之人，一年到头都要奉送礼品。

苏联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博布科夫将军著文说，拉希多夫曾为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制做了一款帝王般高贵的礼品——送给他的夫人和女儿用举世无双的卡拉库里羔皮特制的毛皮大衣。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丘尔巴诺夫飞抵塔什干时，拉希多夫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一直都站在飞行场地上恭候这位贵宾，并当即将其送至宾馆用早餐，然后再请到中央委员会他那里，向其汇报共和国的情况，既殷勤又亲切。

拉希多夫与勃列日涅夫并不十分亲近。勃列日涅夫从不将他邀请到自己家里。但在总书记的亲信之中，拉希多夫却广受欢迎。他从不希求因刚刚为他人效劳而获取回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广交朋友，以便万一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人家能预先提醒他。

中央宣传部收到一些来信，其中着重提出乌兹别克国内令人不满的事情——过分颂扬共和国领导人，有民族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在拉希多夫的亲戚、科学院院长穆米诺夫的许多讲话之中。

为此宣传部甚至撰写了一份报告。1972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塔什干市党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领导干部的经济教育问题。市委的工作受到尖锐批评。继此之后，紧接着就应得出组织结论。

看来，拉希多夫的艰难日子到了。然而部里的报告并未引起重视。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召见宣传部副部长梅德韦杰夫，要求停止发表反对乌兹别克和拉希多夫的讲话。杰米契夫说，拉希多夫对批评塔什干市委感到很难过，给杰米契夫打电话时差点儿哭了。

梅德韦杰夫想向杰米契夫弄清楚："这是劝告还是命令？"

杰米契夫回答说："您就把这当作指示吧。"

事情很清楚，停止批评乌兹别克的命令并非出自杰米契夫，而是来至勃列日涅夫本人。只有总书记才能宽恕共和国第一书记。

此后数年期间，苏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根本不去乌兹别克。这个共和国完全脱离了批评与监督的范围。梅德韦杰夫本人有时接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前往塔什干的邀请。梅德韦杰夫对他说：

"我倒是打算去，但已经得到拉希多夫同志的同意了吗？"谈话到此结束。

不过当梅德韦杰夫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到塔什干时，拉希多夫十分热情地会见了他。拉希多夫不惜花费时间，详细讲述乌兹别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共和国收获了七百万吨棉花，业已开始采金。

拉希多夫在谈话期间没有忘记提及他本人对勃列日涅夫的爱戴和友情。还将自己的书奉送与客人，题词是"赠给亲爱的朋友和兄弟……"。

拉希多夫十分狡诈，谁也不愿和他争吵。

政治局的每一个委员都极有权势，哪怕他并不是生活在莫斯科。搞坏与这个群体的关系是极不明智的。

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前主席梅夏采夫向我讲述：

"乌克兰拍了一部影片，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孙子在其中饰演了一个角色。影片很平庸。但有些人打电话来说：应当多播映一些乌克兰影片，现在就有一部新片，你就放映吧。我提出异议：'影片很差。中央电视台不能浪费金钱播放差劲的不符合需要的影片。'"

这番谈话自然传到了谢列斯特耳朵里。好像故意作对似的，过一些时候电视上播出谢列斯特的讲话，由于技术瑕疵，突然没有了声音。梅夏采夫致电谢列斯特道歉。那是一个星期日，找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他正在别墅里。

梅夏采夫解释说，原因出在技术故障，保证一切都将得到纠正，有过错的人会受到惩处。谢列斯特没有放过申斥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的机会：

"你那里的那些半裸的女孩子演出的时候，从来不出故障。而政治局

委员一露面，马上就有故障了。”

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谢列斯特详细述说了播出他的讲话时，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如何糟糕。在未来决定梅夏采夫命运的时候，这一事件自有其作用……

谁都不喜欢批评，而拉希多夫对任何批评乌兹别克的只言片语都恨之入骨。他将批评共和国视作对他个人的污辱。在东方，批评被当成解除职务的预兆。苏联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回忆说，在乌兹别克，你去区上或集体农庄时，不能对当地领导人说明此行的目的何在，尤其是编辑部让你写批评材料的时候——人家可能往扑劳或伏特加中偷偷撒上大麻末。这样一来，记者醒来时会身在警察分局，明白自己的前途业已终结……

“拉希多夫口蜜腹剑，”《真理报》原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着文说，“他具有东方人的机巧，对上层人物阿谀奉承，为此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尊敬和信任，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视察乌兹别克。拉希多夫无法容忍持有异议的人。”

《真理报》特派记者曾写过几篇描述乌兹别克现状的文章，说保健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呈现出一片可悲的图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一年中有两三个月被强迫去棉田劳动，而且都是繁重而有害的工作。

拉希多夫怒不可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将那位记者称为“乌兹别克人民的公敌”。

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助手博尔金当年是《真理报》农业部的编辑。他回忆了塔什干给他所留下的印象。

在机场迎接博尔金的是主管农业的乌兹别克中央书记。他被送到党的宾馆，然后又径直领去面见拉希多夫。谈话之后，第一书记招待吃饭。他们来到一个专用餐厅，党和共和国的高层领导人在这里整整吃喝了一个小时。

拉希多夫让博尔金和自己坐在一起，对他作了介绍。突然之间，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不怀好意地问道：“这就是那家给乌兹别克人民的事业抹黑、对他们大肆诽谤的报纸的代表吗？”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齐声指责博尔金。他被气得面色发紫，正准备起身离席之际，拉希多夫干预了，他责备那些人说：“同志们，我们的客人是来自列宁主义的《真理报》……”

瞬息间气氛为之一变，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大讲《真理报》是一

份多么出色的报纸。博尔金惊讶地瞧了瞧拉希多夫，看见的是他那慈父般的关切的目光。

《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不得不亲自前往乌兹别克，以修复与共和国的关系。“举行了一场场丰盛的酒宴，”他回忆道，“赠送了我几件长袍、几顶吉尔吉斯男帽，几条宽腰带。”这位总编辑并未拒绝这些礼品。他写了一篇赞扬性的文章《乌兹别克的金手》，终于与拉希多夫达成和解。共和国的情况一切依旧，但记者们再已不敢指出哪怕最小的缺点了。

在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的会议上，负责轻工业的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尔波娃批评乌兹别克：“大家都知道缝纫制品的质量是何等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的质量。棉花的供应主要来自乌兹别克。遗憾的是，棉花的质量低劣，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午餐休息时拉希多夫来到卡尔波娃身边：“您严重污蔑了乌兹别克。兄弟的乌兹别克人民受到了侮辱，他们决不会原谅您这一点的！”

卡尔波娃去见自己的上级。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是索洛缅采夫，他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在最近一次的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他和拉希多夫在主席团中并排而坐。

拉希多夫当即开始向他埋怨卡尔波娃。富有经验的索洛缅采夫取出颇有远见地事先预备好的发言稿，请拉希多夫指出究竟有哪些话使他觉得受到了侮辱。拉希多夫没有接过稿子，但一再说乌兹别克人民受到了欺侮。

下一次会议上，索洛缅采夫带来了有关所收到的乌兹别克棉花的统计资料让拉希多夫看：“色拉夫·拉希多维奇，党一直号召我们正确对待批评，消除缺点。可是您不知为什么对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发言作出很不正常的反应，不公正地欺负一位妇女。”

拉希多夫很不情愿地说：“我会搞清楚的……”

在乌兹别克，靠什么来常常举行豪华的招待会、赠送贵重的礼品呢？党的书记们吃喝玩乐并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大讲排场的开支对他们来说也是根本不能允许的——没有这样的开支项目。共和国共产党的预算中，对花一分钱都作了安排。

党的领导常常向生产部门领导人勒索礼品，既收取现金，也收受灵缇幼崽。敲诈勒索系统是自上而下的：从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直至农村区委。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收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

星奖章，统统都变成了商品。

最大的营私舞弊勾当是在棉纺织工业中揭露出来的。虚报籽棉生产成绩是“乌兹别克案”暴露的主要原因。各种文件中载明的巨大数字仿佛是籽棉的收获量，然而现实中却纯属子虚乌有。而既然棉花比共和国领导人每年所报告的要少，那就是说，受骗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国家本身。

后来查明，每年向国家虚报“出售”将近60万吨的棉花，如此一来，便从国库盗窃了数亿卢布。用这些钱，乌兹别克的上层人物们过着甜蜜惬意的生活，乐于与莫斯科的上司们分享所窃得的赃款。

1974年秋，诺尔曼少将被任命为乌兹别克克格勃主席。作为临别赠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实际行动让乌兹别克的同志们相信，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针对他们的。”

乌兹别克的领导人们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审查他们，但安德罗波夫根本不想让拉希多夫去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坏话。

有一次，诺尔曼在共和国中央全会上发言，讲述了一些行贿受贿的事例。拉希多夫对此感到不悦。安德罗波夫责备诺尔曼说：

“你跑上讲台上去干吗呀？我需要你在乌兹别克斯坦活下来。”

诺尔曼在塔什干仅仅工作了三年。1977年夏，克格勃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召见他说：

“你必须离开乌兹别克。”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最好别问。拉希多夫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塔什干，诺尔曼前去向共和国第一书记告别，说：

“大家都知道，您惩治了一些已经离开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

“您指的是谁呀？”

诺尔曼列举了几个人的姓名，并警告说：

“至于我，我可不容许任何人将我为祖国服务40年的功绩一笔勾销。我会进行斗争，维护我的名声。斗争就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不会怜悯任何人，其中也包括您。我像平生行事一样，就老老实实向您直

说了吧。”

诺尔曼将军回忆说，真应当让你们看看拉希多夫——他的脸色白了又红，直冒冷汗……他不习惯如此直言不讳的谈话。诺尔曼在苏联克格勃驻民主德国代表处机关又工作了五年。

第八卷 失败的柯西金改革

第1章 从合作社指导员到政府首脑

柯西金要求部长们了解各种细节。如若哪位部长带着副手来，他便会轻蔑地说：“离了拐杖他啥也不会。”

柯西金1904年2月8日出生在圣彼得堡。在已更名为合作社中等专业学校的全俄粮食学习班毕业之后，柯西金于1924年被派到西伯利亚公干。

他的职务是初级消费合作社指导员兼组织者。另有两年他在勒拿河畔的基连斯克市主持合作社的组织部。从青少年时代起，柯西金就擅长于精确地进行计算并牢记一切有用的数字。

合作社工作人员向农民收购农产品，供应工业品、工具、设备。工作很有油水，柯西金挣了许多钱，成为一个富有的未婚男人。1927年他在新西伯利亚入党，并与克拉芙季娅·克里沃舍因娜结婚。

她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女人。柯西金在工作中十分强硬，毫不让步，却深深受到她的影响。并非她念念不忘抽到了多么幸运的一张签——嫁给了一个领导苏联政府长达16年的男人，而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自己的幸福——这么好的一位女人嫁给了他！

1940年代末，柯西金一家迁居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他们去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鲁季诺夫家做客。柯西金的妻子给主人一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妇女能喝白兰地，”阿鲁季诺夫的侄女娜米回忆说，“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是个身体强壮、意志坚强的女人。她那张美丽的颧骨突出的脸上所流露出的，既有智慧，也有威严。

“现在我对她的出身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她的父亲要么是一家葡萄酒企业、要么是一家啤酒企业的经理，他们好像生活在西伯利亚。她的教育水平相当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雅的人。”

柯西金在西伯利亚工作了六年，直至消费合作社逐渐消失。集体农庄都直接与国家打交道，合作社的作用仅限于向农村居民供应煤油、食盐、火柴。合作社工作人员的职业本身已变得无足轻重，令人联想到骗人勾当和非法交易。

柯西金回到了列宁格勒。他读完预科后考入纺织学院。那个年代男人们都选择较为有声望的职业，但柯西金大概感到不太有信心。他获得

工艺工程师的毕业证书较晚，年已32岁。1935年他来到热里亚博夫纺织厂任工长，这也不是最让人羡慕的职位。

不过那是大清洗的年代，高级职务接二连三地出现空缺，而且纺织厂里的男共产党员不多。仅仅一年之后，柯西金便当上了该厂的厂长。

列宁格勒领导人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很喜欢这个年轻工程师，而且他和库兹涅佐夫还是亲戚。次年，柯西金得到提拔，主持列宁格勒市委工业交通部，两年半后又被任命为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不过即便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有待多久。当组建纺织工业人民委员部并需要一位人民委员的时候，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推荐了柯西金。1939年1月1日任命下达了。仅仅在三年前才大学毕业的柯西金已成为部长。36岁时他又当上了政府副首脑兼人民委员会直属日用品委员会主席……

1939年4月7日，他首次踏进斯大林的办公室。

战争爆发时，斯大林任命他为疏散委员会副主席。他从事将最大的一些工厂从苏联的欧洲部分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工作。他奉命组织修建横穿拉多加湖底的管道，通过这条管道向该市和守城部队输送燃油。当然，他不单是主持这一项工作。

1941年8月29日，正在列宁格勒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柯西金拍发密码电报与斯大林：

“兹报告，我们作出一项决定，拟从列宁格勒市郊立即强制迁移为数96000人的德国和芬兰居民。建议迁至哈萨克15000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24000人，新西伯利亚州24000人，阿尔泰边疆区12000人，鄂木斯克州21000人。迁移的组织工作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谨请批准这一建议。”

1943年，斯大林指派柯西金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首脑。归共和国政府管辖的部门为数不多，仅限于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地方工业。事事都需要请求全苏各部批准。

1946年，斯大林重新让柯西金充当自己在苏联政府中的副手。3月18日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当过短短数月的财政部长。

1948年9月4日，斯大林让柯西金成为政治局的全权委员，决定是以书面问询中央委员的方式做出的。

战后摩尔达维亚发生饥荒。斯大林派柯西金前往该共和国。柯西金回来报告说，百姓在挨饿，患上了营养不良症。斯大林对获得了胜利的

社会主义国家里闹饥荒的事听都不愿意听，后来遇见柯西金时还开玩笑说：

“这就是我的患了营养不良症的弟弟。”

柯西金当时很瘦。在人数很少的范围之内，大家都仿效斯大林，就这么叫他营养不良症兄弟。

1957年夏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曾回忆过那段艰难岁月：

“鉴于发生了流行病和饥荒，那个时期我不得不遍访一系列地区：巴什基尔、古比雪夫、摩尔达维亚……许多州都有大批的人饿死。”

坐在主席团里的赫鲁晓夫补充说：“乌克兰还发生了人食人的事情。”

“这种事其他地方也有，”柯西金加以证实，“扎沃龙科夫去过古比雪夫州，鲁利也到摩尔达维亚去了，那些地方饿死的人该有多少啊……”

柯西金飞黄腾达，他的地位似乎谁也无法动摇。然而在1949年肃反工作人员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炮制了“列宁格勒案”。一开始，市和州的领导人被指责为恣意妄为：一切都擅自决定，中央并未向他们下令，他们甚至欺瞒中央，而包庇他们的则是列宁格勒出身的人，诸如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随后则提出指控，说他们进行反苏活动，酝酿阴谋，甚至从事间谍活动。

这一案件的被告纷纷被捕，遭到枪决。

库兹涅佐夫的女儿阿拉当时正好与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成婚，米高扬并未加以反对，尽管这种亲属关系在那个年代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

而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库兹涅佐夫的另外一些亲戚——柯西金及其家人却销声匿迹了。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当库兹涅佐夫的遗孀济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被释放出狱时(已经是赫鲁晓夫时期了)，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给她送来一件毛皮大衣和一张便条：“济娜，你应当理解我，我是为阿廖沙的命运担心。”

显要的列宁格勒人士中硕果仅存的大概只有柯西金了。不过他座下的交椅也摇摇欲坠。

斯大林散发给政治局委员们的被捕的列宁格勒人的供词中，也偶尔出现柯西金的名字。他的别墅里安装有窃听设备。

1949年夏有人报告斯大林，说柯西金当财政部长时国库中有一批黄

金珠宝失窃。斯大林下令国家监察部长梅赫利斯进行核查。梅赫利斯手下的人并未发现任何违法破坏的事。梅赫利斯据实报告斯大林，这才让柯西金免遭打击。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于1949年10月向斯大林呈交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秘密信的草案《关于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季昂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这个文件中也提到了柯西金，不过是在不太分明的语言背景下附带涉及：

“必须指出阿·尼·柯西金不正确的行为，他作为政治局委员没有尽到自己的高度责任……他未能识破库兹涅佐夫集团反党的敌对的性质，没有表现出必要的政治警觉，也没有向联共（布）中央报告库兹涅佐夫等人不合乎党员称号的言论。”

将他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草案亦已拟好。

“没有把我叫到任何地方去，也不让我看任何文件，甚至试图向我取得口供，”后来柯西金诉说，“斯大林让人迷惑住了，他听信了诽谤者、阴谋家的话，结果我便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柯西金将战争中保留下来的手枪扔进了河里，以免遭到逮捕时还要加上一项企图暗杀斯大林的罪名。他讲述过，在决定性的时刻，米高扬派他去西伯利亚和阿尔泰边疆区长期出差，处理合作社的事务，以此拯救了他。

实际上，什么样的出差也无济于事，全国各地都在抓捕列宁格勒出身的人，不过领袖宽恕了柯西金。

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他时说：

“喂，科西加，你怎么样？没关系，没关系，还可以再工作嘛。”

这听上去像是原谅了所有的过错，有如安全的保证。未来的政府首脑根本没有去想领袖那老爷般的口气令人感到屈辱的事，领袖像对待仆人似的，用诨名来称呼他……

诚然，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柯西金当选的已不是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的全权委员，只是候补委员（与勃列日涅夫一样）。但是，像幸存下来的其他一些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即部长）一样，柯西金自然要为让他身居如此高位对领袖感恩戴德。他相信，将人枪毙投入监牢的是另外一些人，而斯大林只是受到了迷惑。柯西金终生赞美险些就杀掉了他的斯大林，却不喜欢在其治下他可以过正常日子的赫鲁晓夫。

有一种解释是：斯大林将他（像对勃列日涅夫一样）提拔至权力的顶峰，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却大大贬黜了他的（也像勃列日涅夫那样）职位。也有另外一种诠释——在政治问题上柯西金如果称不上反动的话，也是极端保守的。

例如，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命运问题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建议将其驱逐出境。柯西金却提出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并押送到外国记者去不了的上扬斯科服刑。柯西金说，不应当害怕对敌人采取“苏联司法中的严厉措施”，智利就处死了成百上千的人，也没有什么事，并未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勃列日涅夫终归不是那么嗜血成性，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

据说，柯西金和女儿看了一场罗辛的剧本《瓦连京与瓦连京娜》的演出。这位总理将优美动人的演出称为“色情戏”。剧院的总导演叶夫列莫夫也遭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斯大林去世之后，柯西金被排除出中央主席团，仅仅被任命为轻工业与食品工业部部长（这个新部由四个部合并而成——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肉类和奶制品部、渔业部）。

1955年5月撤销了国家计委。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两个国家委员会——国民经济远景规划委员会和国民经济日常规划委员会，柯西金获任后一个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之一（部长级）。半年过后恢复先前的国家计委。1957年夏柯西金留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

在他的仕途中，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试图推翻赫鲁晓夫一事发挥了重要作用。柯西金站在赫鲁晓夫一边，成了胜利者阵营中的一员，这些人不但赢得了荣誉，而且获取了更高的职位。

1957年6月29日，在以赫鲁晓夫战胜老革命家而告终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让柯西金再次成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这是对支持他表示谢意。

柯西金在6月26日晚间的会议上，突然向政府中自己不久之前的上司们大张挞伐，首先是拿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开刀：

如果布尔加宁不加入这个团伙，那么他们肯定不敢公然跳出来惹是生非。马林科夫在党和人民中并没有足以发表任何主张的威望。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已彻底脱离人民和党，威信全无……

他的另一位上司——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萨布罗夫也受到指责，柯西金曾同萨布罗夫一起去华沙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会议：

“我必须说，他参加经互会会议所干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情况介绍是由别的同志作的。只有在主持人宣布会间休息并请大家去休息室喝咖啡的时候，他才这样举手（演示）说道：‘我有一个问题——是热咖啡还是凉咖啡？’（全场哄笑）……我就不说他没有政治骨气的事了，他的确不成其为一个活动家……”

全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柯西金排除了宽大为怀的可能性：

“我认为，必须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逐出中央主席团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觉得，继续让布尔加宁同志名列赫鲁晓夫同志之后充当国家第二号人物是一个错误。他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会想办法公报私仇的。我认为，必须将其清除出中央主席团并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也应当落得同样的下场……”

政府中的一些职位出现空缺，于是6月间赫鲁晓夫使柯西金成为政府副首脑（与此同时，1959年3月—1960年5月他还领导国家计委）。1960年5月4日，赫鲁晓夫让他进入中央主席团（与波德戈尔内和波利扬斯基一起）并任命其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8年3月，赫鲁晓夫自任政府首脑。

柯西金不得不等一等：他只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1964年，方才当上了政府首脑。

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柯西金的职务变换比其他任何一个高层官员都要多。

他能轻松地适应新职务，很快便熟悉业务，能够回答上司的任何问题。这都是斯大林时代历练的结果：领袖考查下属是否在行时，常常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

柯西金也要求部长们了解各种细节。如若哪位部长带着副手来，他便会轻蔑地说：“离了拐杖他啥也不会。”

1958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初次访问苏联。他被带领去全国各地参观，陪同贵宾的是柯西金和中央书记毛希丁诺夫，此人来自乌兹别克，主管对发展中国家关系。

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基尔皮琴科回忆说，在高加索时，柯西金发现道

路两旁有一些枯萎的树，便问当地政府主席：

“这是什么树呀？”

“不知道，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那么通常你们都在路边栽些什么树，以此达到何种目的呢？”

同样回答说不知道。柯西金十分生气，便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地区应当栽些什么树。

另一次，柯西金看见一个水库，就开始打听库里有多少水，如何使用。听到的却是语无伦次、犹豫不决的回答。于是柯西金凭目测粗略估计水表的面积，再将得数乘以类似水库的平均水深，便给出了数据、事例和建议。

“一定遵照执行！”他听到回答却是这样……

当然，那些当了官却又没有能力回答一些尽人皆知的问题的人，是会倒霉的。不过，柯西金本人其实也在任命诸如此类的人当官。或者说，至少他很关心保留浅薄无知的人盘踞领导职位这种制度。此外，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便对微不足道的问题，也必须发布指示！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去见柯西金，请求准许将民警们的蓝色衬衣更换为银灰色衬衣，并改用斜纹布料。

“为什么你们想让衬衣改用斜纹布料而不用人造纤维呢？”这位政府首脑想要知道。

人造纤维在那个时代叫做化学纤维。柯西金当时对合成纤维充满极大的热情。季库诺夫回答说，合成纤维的价钱要贵上一倍。

“那么一件斜纹布料衬衣值多少钱呢？”

季库诺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柯西金火了：不作准备怎么可以来见政府首脑呢？纺织专家柯西金当即估计了一下衬衣的价值，得意地瞧了瞧部长。那位部长深受刺激地走了。应当说一句公道话，季库诺夫

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衬衣的价值交由经济学家们去计算，这种事对部长并无要求……

1964年10月14日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第一书记后向同志们表示了谢意，然后便转入下一个问题：“我们应当研究有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了。”

全场立即鼓掌。

大家按照事前协商的结果高喊柯西金的名字。

“这也符合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勃列日涅夫说，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表决，”勃列日涅夫提议，“无论中央候补委员或检查委员会委员，都一律参加。我来交付表决。谁赞成推举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同意推荐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

速记记录中注明：“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体起立。”

柯西金走到主席台前：

“同志们！我要为今天多给予我的巨大信任感谢你们。至于我，一定竭尽全部力量、知识、技能，决不辜负你们崇高的巨大信任，争取出色地满足这种信任。”

柯西金再次获得“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会也就此落幕。

第2章 柯西金的日常生活与家人

斯大林时代对柯西金的性格甚至面部的表情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那表情是“疲惫而懊丧的”。

不过，这位政府首脑的脸也并非总是保持一种约略为失望的表情。好友相聚，几杯烈酒下肚之后，平日压抑、紧张甚而忧郁的柯西金会发生惊人的变化。他最爱饮用摩尔达维亚白兰地。妻子不允许他常常醉得浑身瘫软，而且他自己也担心纵饮无度。

1970年8月末，柯西金曾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家做客。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载：

我邀请柯西金前来视察克里米亚的稻田、一些集体农庄和经济体。他一反常态，十分高兴地表示了同意，显然这是因为此时勃列日涅夫不在克里米亚。我们视察了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科去北克里米亚运河边上的稻田。稻子长势极为茂盛，都是一些连片的大农场。这让柯西金印象深刻，他好奇地详细打听一切。

接着又访问了一个联合经济体——“各民族友谊”集体农庄。在这里我们参观了葡萄园、果园、畜牧联合体、酿酒厂和罐头厂、城市型新村落。柯西金声称，他从未在任何地方看见过这样的经济体。

晚上在辛菲罗波尔参加了一个欢快的聚会。柯西金酒喝得相当多，深夜我才将他勉强送回别墅。他请求我不要向任何人谈起他的状况。既然我们在一起，何须这样做呢？这种事情不值得请求，应当谨守诚信。

根据谢列斯特的话判断，柯西金很快失去了控制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柯西金生活的意义全在于工作，”国家计委领导人拜巴科夫述说，“即便在基思洛沃茨克休假日子里散步之时、在全国各地出差期间抑或在国外，我们所进行的谈话通常都与工作有关。

“多年之中，无论是我还是住在沃罗比约夫公路旁同一座大楼里的他的其他副手，一次也不曾到过他的住宅里。只有两次，就是他的最后两个周年纪念日，我去过他的别墅。

“在节庆宴会席间，喝过一两杯白来地之后，他才稍许有些‘露相’。外表的严厉已荡然无存。他由衷地微笑着，一张脸由于出自内心的温情而容光焕发。于是他变成了一个仿佛刚刚从愉快的约会归来的人。”

许多人都发现，柯西金待人疏远，从来不肯吐露心曲。据他的女婿说，柯西金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深藏不露的习惯是从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政府副首脑巴塔林指出："他无比小心谨慎，从不讲语义双关的话，谈论的完全是公务。"

曾担任他的国际事务助手的特罗杨诺夫斯基著文说，柯西金绝不是乍看上去那样四平八稳的人。在他那一本正经甚而冷漠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相当富于感情的秉性。偶尔激情不由自主地外露之际，会令人想到火山的轻微喷发。

有一次，柯西金与米高扬同时在皮聪达休养，米高扬请柯西金吃饭。

赫鲁晓夫在位时，在皮聪达用水泥围墙圈出一大片残留着松林的地面，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修建了三幢两层的宅第、一个公用的50米游泳池以及体育馆。游泳池朝向森林和大海的三面墙是玻璃的，天气好时便通通打开。

米高扬通过卫队详细地了解柯西金喜欢什么时候去游泳，以便他们少碰些面。而且他们散步时也走不同的小路，免得彼此感到腻烦。不过，有一天米高扬的弟弟、著名飞机设计师阿尔乔姆·米高扬来了。他们便邀请柯西金去吃晚饭。

"找的借口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和柯西金之间在河边开玩笑所打的赌，以一瓶白兰地赌天气，"米高扬的儿媳娜米写道，"晚饭就喝白兰地。柯西金喝得并不多，但很快就变得兴奋起来，不愿离席。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吩咐再上一瓶。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柯西金夫人）对此很生气，便悻悻离去。柯西金留下，又喝了一些，我才出门将他送到他们的别墅。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一路上非常健谈，很容易相处。然而翌日却依旧像平素一样落落寡合。一个人踽踽独行，不言不语……"

柯西金常年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别墅里，喜欢沿着莫斯河划皮艇游逛。每天傍晚都散步，早晨做操，一向关注自己的健康。这种习惯从不改变。据他的外孙、物理学教授格维西阿尼说，柯西金每天早上都吃同样的东西：燕麦粥、奶渣，喝很酽的茶。

当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检查出业经耽误的癌症之时，柯西金感到极为苦恼。他怪罪医生们——诊断出这种致命的疾病太晚了。一位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为她施行手术，但这已无济于事。

有一天，柯西金的妻子将第四局局长恰佐夫请到家里来。他以为会受到医生理当遭受的责备，即便医学已无能为力。然而克拉芙季娅·安德

烈耶夫娜却对丈夫说：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你知道医生们有多难吗。他们缺乏很多东西。我想求你：要经常帮助医疗部门。”

她逝世于1967年5月1日，其时她的丈夫正站在列宁陵墓的观礼台上，向举着他画像的游行队伍致意。

她去世之后，柯西金坚持将来自义务劳动的资金用于在莫斯科先后建设肿瘤研究中心和心脏病研究中心。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妻子所建立的纪念碑。

柯西金是个爱情专一的男人。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去世之后，他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女人。尽管流传着一些谣言，似乎他与著名的女歌唱家柳德米娜·济金娜之间有过爱情关系。已经是后来的事了，有人问她，他们之间是否确有其事。

“没有，”女歌唱家回答说，“只不过是在一个官方的庆祝会上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向我祝过酒，讲了几句很热情的话。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过了一段时间，柯西金的妻子去世了，我去参加葬礼，送了鲜花。于是有人说我们有私密关系。其实从未有过诸如此类的关系。我对柯西金十分尊敬，但也仅此而已。”

柯西金一直独身，与女儿的关系非常亲密。柳德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常常随他出国，成了这位政府首脑家中的女主人。她与捷尔明·格维西阿尼结为夫妇，那是贝利亚的个人卫队队长米哈伊尔·格维西阿尼的儿子，一个富有魅力、爱好交际的年轻人。柯西金也很爱自己的家人。外孙女大学毕业时他送了一辆“伏尔加”轿车作为礼物。

柯西金的女婿捷尔明·格维西阿尼的仕途罕见地顺畅。他当上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对外关系局——一个可以常出国的美差。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基里林，可能是柯西金唯一的朋友。他为柯西金的女婿建立了一个系统分析研究所。1979年3月，格维西阿尼作为哲学家当选科学院正式院士。

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苏什科夫证实，西方公司的人接待柯西金的女婿时特别慷慨，吃喝玩乐花起钱来毫不吝惜。苏什科夫本人于1985年12月被捕。他因收受外国公司的贿赂被判处剥夺自由30年。他的妻子原来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关系管理局格维西阿尼的领导下工作，也被投入监狱。

大家对勃列日涅夫一家都议论纷纷，说他的儿子当上了外贸部第一

副部长，女婿丘尔巴诺夫则是内务部副部长。柯西金的女婿也安排得不错，而女儿柳德米拉则分配进了外交部历史外交管理局。

诚然，有别于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是，柯西金的女儿为人处世小心谨慎。她天生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柯西金的女儿柳德米拉·格维西阿尼，”加琳娜·叶罗菲耶娃回忆道，“和我一块儿在历史外交管理局工作。每当有人问她与勃列日涅夫的家人有没有交往时，便会噘起嘴唇扮个怪相。根本没有任何来往。”

柳德米拉从事苏美关系述评工作。“当她写完述评，想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答辩时，”叶罗菲耶娃写道，“有人张罗让专业人士对她的著作进行整理。于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来到我们的研究室，他对那部论著花了很大的力气，原作实在太差了。最终她的学位论文还是顺利通过答辩，而且以书籍的形式由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问世。

“此后，总理的女儿认为不能再在我们管理局工作了，人家很快便为她挑选了一个颇有气派的职位：她当上了外国文学图书馆的馆长。

“遗憾的是，她对外国文学根本不在行，而且由于她所采取的暴戾恣睢措施，她待在图书馆无论对工作人员还是读者都没有带来喜悦：许多老资格的图书分类学家被解职，而出现缺员的队伍则由退伍军人填补。据说，对工作人员解职和新人入选的主要标准，都是所谓的‘第五栏’。”

曾多年担任外国文学图书馆馆长的玛加丽塔·鲁多米诺，人们至今依然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念着她。1973年4月她明白了，有人希望占有她的职位，因为图书馆完全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称为科学机构的权利。

鲁多米诺多年来一直徒劳无功地争取这一决定，它可以提高图书馆的地位（同时还有加工资），吸引有名望的学者。然而她的请求却屡遭捷尔明·格维西阿尼主持工作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否决。如今国家科技委却突如其来地主动采取了这一决定。

“我当然明白，这肯定是觊觎我的职位之人授意而为。果然如此——柯西金的女儿柳·阿·格维西阿尼-柯西金娜需要这个职位，而且工资也是为她而提。5月，格维西阿尼-柯西金娜被任命为馆长……

文化部长召见我，提出要我退休。我拒绝自己递交申请。于是部里的干部管理局局长（福尔采娃部长的女友）开口威胁我：‘我们要按犯错误撤你的职！’”

鲁多米诺在向新馆长移交时，怀着激动的心情介绍她为之献出了一生的图书馆的情况。她掏出钥匙，准备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格维西阿尼-

柯西金娜让鲁多米诺将钥匙交给她。

“我交给了，并不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接下来的便是面部表情的倏然改变——从相当愉快变作骄傲而严厉。随即发话：

‘我要拿走保险柜的钥匙。保险柜和里面的物品并不归您私人所有，而是国家财产，您开它毫无必要。’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极为震惊，没有道别便走出办公室。我备感压抑。保险柜里还有一些我的私人物品，但无论她在职时还是她离开之后，我都再也没有去过那间办公室。”

在柳德米拉执掌图书馆的一年之中，有200名主要工作人员离馆而去。许多阅览厅关门大吉，其中包括反法西斯文学资料室。而最为令人惋惜的则是——丧失了文化修养和与人为善的精神。

第3章 试图让经济增速的局部改革

赫鲁晓夫时代，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获得了自主权，事实上已不再听命于州委。换言之，党的工作人员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党的机关对此感到不满。赫鲁晓夫去职后，地方上党的机关力求迅即废除国民经济委员会。

柯西金的改革，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人暗中抵制，唯恐扩大企业权利会削弱官员们的权力。

有别于勃列日涅夫的是，柯西金无论生前与死后在社会意识中所得到理解基本上是正面的。也许，在20世纪后半叶的苏联所有政治家中，他受到最大的尊敬。

“苏联领导人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像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即柯西金）给我留下如此强烈和深刻的印象，”一位著名的苏联情报人员写道，“首先，他并不竭力在自己周围散布神秘的迷雾，行为举止自然而质朴，既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也不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和与高层领导的关系密切。”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柯西金成为政府首脑，便着手进行变革时期之前最重大的经济改革的尝试。

赫鲁晓夫也试图建立一个严格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赋予生产单位以巨大的权力。他解散了许多个部，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上的企业，多余的官僚主义环节没有了。这在1950年代后半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全国的经济向前跨进了一步。当然，权力下放也有其消极方面。市场始终未能出现。经济的发展不是由社会的现实需求所决定，而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如果说，从前原料和产品归部里分配，那么，现在则由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自行协商。

赫鲁晓夫创举的主要反对派，由丧失了权力和影响的部一级的官僚阶层组成。党的机关也感到不满。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获得了自主权，事实上已不再听命于州委。换而言之，党的工作人员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

1962年，赫鲁晓夫扩大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如今在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区域内有几个州委，结果实际上党的工作人员已经隶属于生产单位。如果赫鲁晓夫的改革能继续进行，党的机关会落得根本无所事事……

赫鲁晓夫去职之后，地方上党的机关力求迅即废除国民经济委员

会。这一想法得到柯西金的支持，他将一切统统出自中央的斯大林式的管理体系视为理想。

各民族共和国并不怎么支持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恢复原有的部，不愿意回到中央集权制，当年每一件琐事它们都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但勃列日涅夫同意柯西金的看法，结果问题事前即已决定。如今各共和国只能想方设法争取拥有加盟共和国的部的权利，以便保住影响工业和经济的杠杆。

1965年8月，拜巴科夫应召去中央委员会晋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也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

“你还是回国家计委吧。”勃列日涅夫说。

拜巴科夫开始推辞，说他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了，并且以不能胜任为由被撤职。

“你就去干吧！”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一遍，并友好地补充了一句：“至于你的能力，那并不该由你来判断嘛。”

茶送上来了，勃列日涅夫开始大谈加强统一计划的重要，因为当时正在撤销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恢复各部门的大部，国家计委的作用日益增长。

“不单是我，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勃列日涅夫说，同时向柯西金点了点头，“都考虑过您的调动问题。至于当时将您调离，并不是因为不能胜任工作，只不过是您的观点与赫鲁晓夫有分歧罢了。”

早在1962年9月，《真理报》上便发表过教授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和奖金》。他第一个说出了勤于思考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的想法。无论整个工业或单独的企业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人，都根本对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漠不关心。与此同时，工业部门却年复一年地超额完成计划，不断生产那些质量低劣、谁也不需要的产品。利别尔曼建议授权厂长们自己去与合作者签订合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而部分利润则可扣除下来，作为工程师和工人们的奖金。

这是改变经济状况的第一个建议。全国都对这位教授的想法议论纷纷。《真理报》的文章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正好符合他主张将管理部门的权力交给企业经理的设想。赫鲁晓夫决定进行试验。正当草拟各种文件之际，他却被迫退休了。

柯西金担任政府首脑之后，下令修订试验的各项原则。然而这样的试验，也让官僚们胆颤心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远非所有的人都支

持柯西金。

波德戈尔内在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干吗要改革这个鬼名堂？难道我们还发展得不好吗？”

柯西金回答说：

“改革很有必要，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开始降低。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用过了，因此应当鼓励主动精神，提高全体职工对劳动成果的兴趣。”

但波德戈尔内仍然固执己见：

“如果要进行改革，那也需要仔细地做好准备。”

勃列日涅夫热烈支持经济改革的想法。有一天，他闷闷不乐地来到扎维多沃。《真理报》总编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解释说，“政治局会议上严肃处分了两名部长。但处分也无济于事：他们破坏计划是因为，其他的一些部长没有给他们提供原料、枢纽站、配套设施和燃料。而反过来，又有人未能及时向这一些部长提供别的东西。”

“都怪硬性的统一计划体系，”勃列日涅夫说，“中央不可能把一切都预见到。”

1965年9月27日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经济刺激》的报告。

他宣称，历史上形成的生产资料工业（A类）与消费品工业（B类）之间有利于第一类的相互关系是不正确的。

除开撤销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意之外，他的报告中有许多早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即已酝酿的大胆的建议。这位政府首脑提出增强企业的经济独立，减少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的数量，给予企业自行处置一部分所挣得的钱和制定人员编制的机会。柯西金希望从物质上激发整个企业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兴趣，使得他们更好地工作。

9月29日，勃列日涅夫也在全会上发表讲话：

“为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能力，应当加强经营管理中的经济手段。需要借助于经济刺激制度激发每个企业的工人、技师、技术员、工程师和职员的兴趣，让他们乐于运用新技术，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为每个企业扩大权利则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

勃列日涅夫在那个时期并不是改革的反对者，而是拥护者。他当时相信他能改善民众的生活。他做到了每周改为工作五天，将一个休息日变成两个休息日，星期六也可以休息了。这对全国都是一份厚礼。

1965年11月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就此柯西金的改革启动了，并成为一场相当激烈辩论的导火线。变革的拥护者支持改革；而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人却暗中抵制改革，唯恐扩大企业权利会削弱官员们的权力。

柯西金是领导层中唯一关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人，其余的人已习惯于只顾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他按老习惯关心纺织工业，从国外为其购置设备。

人们开始挣到更多的钱，但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有一个任务就是将居民手中所积攒的大量的钱回收以投入经济。柯西金与意大利签订合同，在陶里亚蒂（俄罗斯城市，因纪念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而得名）建设一座生产小轿车的工厂。这样，在俄罗斯的道路上便出现了“日古利”牌小轿车。

多亏了柯西金，苏联人才品尝到了百事可乐的滋味。

早在1959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即曾在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上请赫鲁晓夫喝过百事可乐。这张照片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百事可乐一时名扬天下，最重要的还是，它超过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可口可乐。

实际上这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又一轮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在生产领域和广告之中进行，而是早已上升到政治层面。

美国的总统向来不仅可分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而且也分别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崇拜者。艾森豪威尔威尔、肯尼迪、约翰逊都是可口可乐总统。尼克松则成了第一位百事可乐总统。1968年他当选之后，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被逐出了白宫，它们的地位由竞争者取而代之。总统的手下人开始只喝百事可乐。

美国总统们的美食爱好得到论功行赏的回报。百事可乐公司为尼克松的竞选运动提供资金。为了表示谢意，1970年尼克松派遣一个庞大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时，将百事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执行总经理唐纳德·肯德尔列为代表团成员。

柯西金接见了美国人。肯德尔提着一个公文包来到克里姆林宫（那时尚未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他被介绍给柯西金的时候，取出一个白铁皮可乐罐递给柯西金。苏联政府首脑惊讶地望了望这位美国人。而肯

德尔啪地一声扳掉拉手，原来罐子里面是一个已预先调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波段的收音机。

这个新技术产品给柯西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与肯德尔达成协议：百事可乐公司获得独家授权，在美国销售伏特加并在苏联建设自己的工厂。

当时堪称特例的这份协议，在百事可乐面前打开了巨大的苏联市场。百事可乐的第一家灌装厂于1974年开设在新罗西斯克。

新的思路推动了经济发展，无论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第八个五年计划被视为大获成功。然而革新的推动因素迅即消失，改革开始逐渐停息。认真改革经济局面的尝试未获成功。

何以如此？通常人们都说，是政治阻碍了柯西金的改革：勃列日涅夫产生了猜忌心理。寡言少语、冷静沉着的柯西金大得人心。勃列日涅夫嫉妒他的声望。

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他们是迥然不同的人，无论就智力水平或性格而言都是如此。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前往外地期间，傍晚，闲了下来。晚饭时勃列日涅夫无所适从地问：

“这样，我们又干什么呢？”

柯西金回答说：

“没什么，看看书吧。”

他离开后，勃列日涅夫嘲弄地学着说：

“你听，看看书吧。”

这样消磨时间，在他看来最没有意思。如果不是柯西金，而是波德戈尔内或基里连科在身边，他们准会玩多米诺骨牌。据总书记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良说，勃列日涅夫很喜欢玩多米诺骨牌，常说：

“这种牌戏极为有益，因为需要精确的算计，巧妙地施展各种招数，领会搭档的意图。甚至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装鱼’——强作镇静。”

柯西金却从来不玩多米诺。

第4章 越来越多的反对者

赫鲁晓夫退职之后，柯西金之所以被提拔为政府首脑，是因为他对其余的人并不构成危险，而这也决定了他所处地位的弱势——他在政治局内得不到支持。柯西金的大多数副手都不是由他任命，而是勃列日涅夫任命的。

勃列日涅夫热爱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无法理解一本正经、清心寡欲的柯西金。

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矛盾。然而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也会变成有失和睦的争吵。政府首脑不得不服从，但每次内心里都感到非常苦恼。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仍然一道工作了16年。勃列日涅夫明白，柯西金不会对他持反对立场。要是解除柯西金的职务，对勃列日涅夫将毫无益处。政治局中已别无他人能像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这样熟悉苏联经济的机制。

勃列日涅夫密切关注，防止柯西金拥护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虽说柯西金时政府首脑，但不经勃列日涅夫同意却不能任命部长。

赫鲁晓夫退职之后，希望升任头等角色的人比比皆是。柯西金之所以被提拔为政府首脑，是因为他并不热衷于充当政治角色，对其余的人并不构成危险。然而这也决定了他所处地位的弱势——他在政治局内得不到支持。柯西金的大多数副手都不是由他任命，而是勃列日涅夫任命的。

当勃列日涅夫觉得恰佐夫对于政府首脑过分关注的时候，克格勃第九局新局长安东诺夫将军便奉命再次向这位克里姆林宫医务领导人身边的人进行调查，看看他和柯西金全家人是否有私下联系。

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与柯西金一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勃列日涅夫便训斥说：

“维克多，你要遵循我的路线，而不是柯西金的路线。”

柯西金的交际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适合与人建立友好关系。

“柯西金这个人，”按照当时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索洛缅采夫的说法，“性格孤僻内向，不喜欢闲谈、说笑，有时候回答别人的话时还很粗暴。”

同样地，柯西金也不大喜欢索洛缅采夫。有一次他对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沃罗特尼科夫说到索洛缅采夫：“是一个优秀的冶金专家，但也是一个始终不改的总发牢骚的人，喜欢记仇，太关心自己的威信。”

柯西金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竞争对手。但他言语不多，沉着冷静，尤其是在政治局的同事中间，他的声望令勃列日涅夫颇受刺激。勃列日涅夫多少有些妒忌柯西金。当政府首脑受到批评时，勃列日涅夫并不加以反对。

勃列日涅夫在私下的谈话中常说，柯西金对农业一窍不通。他还向政治局委员们抱怨说，他感到国家计委在农业事务上和他作对：

“这都是受了柯西金的影响。他不懂农业，搞不清农业的事情。”

柯西金反对向农业投入大量资金，那不会产生效益。而勃列日涅夫常常强调，是他在为农村的状况负责。看来，这背后是虚荣心在作怪，他想露一手：无论斯大林或赫鲁晓夫都未能振兴农业，而他却可以办到。

开始几年，勃列日涅夫积极地操持农业。1972年2月末，中央委员会召开州委第一书记和州执委会主席会议，讨论发展畜牧业和扩大甜菜生产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了报告。他亲自领导会议的工作，让第一书记们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发言，要求他们汇报。他亲自作了会议总结，安排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写出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决议的草案。

库纳耶夫回忆说，1972年8月勃列日涅夫决定去库斯塔奈（哈萨克斯坦城市，州首府）。他要求召集产粮各州的领导人开会：

“我想听听州委书记们对庄稼收割的准备工作情况。”

勃列日涅夫于8月24日飞抵库斯塔奈，当时正下大雨，机场周边的田野一片葱绿。勃列日涅夫下飞机后问哈萨克中央第一书记：

“你把我弄到什么地方了呀？庄稼我没看见，只看到绿油油的一大片。”

“您就放心吧，”库纳耶夫说，“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一定会交粮的，而且还会交得相当多。”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上说，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都遭受旱灾。因此他要求竭尽可能地让成熟了的庄稼颗粒归仓，向国家上交尽可能多的粮食。

库纳耶夫回答说：“我们共和国一定完成粮食交售计划，但超额交售

多少粮食，还须同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计算计算。我请求宣布休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两小时过后，各州的领导人相继向总书记报告，他们都会完成和超额完成上交粮食的计划。

勃列日涅夫问库纳耶夫：

“大家都保证，粮食交售计划会超额完成。您说说具体数字吧，究竟数量是多少？”

“我们今年要为交售不少于十亿五千万普特粮食而奋斗，同时要留足饲料，保证所需要的种子，也不亏待农机手。”库纳耶夫回答道。

勃列日涅夫很满意。会后他立即往莫斯科给柯西金打电话：

“哈萨克人保证向国家交售十亿普特粮食……现在我要说：真是好样的！”

“在饯行宴上，”库纳耶夫回忆，“勃列日涅夫兴高采烈，不断说笑。”

多亏勃列日涅夫，60年代后半期农业收入了比前五年多出1/3。但70年代初情况又恶化了，国内对食品的消费下降。俄罗斯联邦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牛的头数急剧减少，冬季的严寒冻死了秋播作物。农业停滞不前。勃列日涅夫却坚信，问题全出在钱上。于是为集体农庄免除了欠债，提供了贷款和长期信贷。然而亏损单位的数量依旧一直在增加。

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并开始衰弱，而且也明白了，改善农业的状况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大家都劝他：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要再老是说您要亲自主管农业了。当然，总书记要负责一切。但值得他把如此复杂的一个部门的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吗？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也不提这方面的事情。这改变了主管农业的书记库拉科夫的处境。此前他处于有利地位：一切都由总书记负责，他只是从旁协助。如今他得亲自为农业负责了。勃列日涅夫唯他是问，经常批评，有时还很严厉。库拉科夫的日子很难过。他正所谓是在用脑袋担保粮食的供应问题。

赫尔松州委第一书记莫兹戈沃伊讲述，他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去莫斯科见库拉科夫。这位苏共中央书记让莫兹戈沃伊看一封信，信中说向赫尔松人征集了粮食，但不知何故却没有上交国家。莫兹戈沃

伊解释说，州里运输工具不足，因而决定先将粮食收齐，然后再上交。

库拉科夫认真听取了他的解释，同意他提出的理由，不过说话结束时又说：

“我和谢尔比茨基谈过了，他要您明天去见他。”

次日上午，乌克兰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莫兹戈沃伊的汇报。谢尔比茨基吩咐说：

“粮可要快些交。”

他回头面对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鲍里先科高兴地说：

“要是在三七年，莫兹戈沃伊在这种情况下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鲍里先科用手指比画栅栏的形状（指监狱）……

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回忆说，196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实际上批评了政府，尽管表面上说的是国家计委。阿尔泰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格奥尔吉耶夫仿佛是在群众大会上似的大喊大叫。格奥尔吉耶夫1961年3月被任命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稳居这个职位17年——直至1976年4月临终之前为止。

柯西金听了别人所说的那些话，心中焦急不安，但并未发言为政府辩护。他让拜巴科夫作出回答。拜巴科夫可是个久经锻炼的人。1944年他被任命为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时候，斯大林召见他。谈话结束之际斯大林突然问道：

“您这个人民委员这么年轻，您说说，苏联人民委员应当具备一些什么品质？”

“要懂得自己这一行，勤劳，认真负责，诚实，善于依靠集体，”拜巴科夫开始列举。

“这全都很对，拜巴科夫同志，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品质。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品质您却没有说。”

斯大林走到他面前。拜巴科夫想要站起来，斯大林制止了他，用烟杆碰了碰他的肩膀：“一个苏联人民委员，首先需要的是像牛一样的神经，再加上乐观主义精神。”

这在拜巴科夫身上倒是绰绰有余。柯西金也经历过斯大林式的锻炼，但他生性对抗攻击性的能力较弱。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正是利用了

这一点。

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柯西金的通常是基里连科，他在中央委员会里主管工业，而且以勃列日涅夫老朋友的资格追求特殊的地位。柯西金总是不客气地予以回应，有时火气还很大。

勃列日涅夫的另一个朋友乌斯季诺夫也非常不喜欢政府首脑。他去见勃列日涅夫时，总是直言不讳地说，他很怀疑柯西金。

1963年3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建立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领导工业和建设的主要国家机关，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工作。所有的工业和建设方面的国家委员会都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中包括国防技术、航空技术国家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建委……

乌斯季诺夫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首脑。他立即与柯西金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划分。早年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时，即曾委托乌斯季诺夫主持政府会议。这让柯西金感到气愤和委屈。

乌斯季诺夫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就任主管国防事务的中央书记后，他将国防工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民用工业的一些部也为国防服务，因而柯西金和乌斯季诺夫的利益常常发生冲突，而政府首脑总是被迫让步。

马尔丘克院士曾向柯西金打听，为何不建立一个专门的计算技术部。柯西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止一次提到政治局会议上，但乌斯季诺夫反对。乌斯季诺夫说，不可能将计算技术设备的生产从整个国防综合体中分离出来，也不需要这样做。

刚刚当选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很快与柯西金发生冲突，他知道这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诚然，柯西金对戈尔巴乔夫也缺乏好感。

1979年9月，在向宇航员颁奖的隆重仪式开始之前，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们齐集于叶卡捷琳娜大厅的门口。柯西金不满地说：

“现在给我们政治局委员分发了中央农业部的一份报告，是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他和他那个部听任地方主义倾向摆布，可是我们再也没有购买粮食的外汇了。不应当纵容姑息，要提出更加强硬的要求，完成粮食储备计划。”

作为回应，仅仅当了一年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居然当众对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起攻击。他生硬地回答说，如果部长会议主席认为中央农业部表现软弱，那就让自己的机关抖落出粮食来，将余粮征集制贯彻到

底。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当时鸦雀无声。这样责备上级的实属罕见。不过戈尔巴乔夫十分了解政治局内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本人便经常暗示，他对政府很不满意，政府不能胜任，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临时代替部长会议，这其实就是以隐晦的方式批评柯西金。

仪式之后勃列日涅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

“很苦恼吧？”他关切地问道。

“是的，”戈尔巴乔夫回答，“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不能赞成的是，他采取了一种不考虑国家利益的立场。”

“你做得很对，别苦恼了，”勃列日涅夫说，“就应当真正做到，让政府更多地管管农业。”

两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党内的职级得到晋升。苏斯洛夫给他打电话：

“我们刚刚谈了谈，就要开全会了，准备加强您的地位。我们要推荐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9年11月27日的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职位等级中再上一个台阶。

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大部和党的传统结构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负面结果：各级党委全面恢复了在赫鲁晓夫时代部分失去了的对工业和农业的控制。

勃列日涅夫年代，中央委员会机关实际上顶替了政府机构，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单独的部门主管。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领导人就是自己那个领域的主宰。他可以在老广场上自己的办公室召见的，不仅有各部部长，而且有部长会议副主席。

“开始对改革明目张胆地猛踩刹车是在60年代末期，”当时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的未来的苏联政府首脑雷日科夫回忆说，“在下面的生产部门，对此感到特别明显和痛心：刚刚喘了一口去，氧气马上又被关掉了……那些一眼便在经济变革中看出对政治稳定威胁的人，不过是在等待着寻找一个将这场改革窒息的借口。1968年春天，‘布拉格之春’着实将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台柱子和卫道士们吓破了胆。”

教条主义者们批判柯西金的改革，认为以利润、商品货币关系为目标是有害和危险的。这会打破经济的计划性质，导致纪律涣散、物价上

涨和通货膨胀。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忠实战友和继承人克留奇科夫写道：

“柯西金坚持自己的想法，表现了罕见的顽固姿态，容不得反对意见，对于针对他所作规划和决定的实质的任何批评，都采取近乎病态的态度。他将经济完全视作自己的世袭领地，竭力不让其他任何人接近它。柯西金因此而招致最高领导层的许多成员的反对。”

“安德罗波夫不喜欢柯西金，柯西金也不喜欢安德罗波夫，”近距离观察过两个人的恰若夫证实。“也许，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的是国家安全系统。有一次，他透露了一句：‘瞧，他们连我也窃听。’大概他因此而不喜欢安德罗波夫。”

人们发现，他们的个性有些不相投合。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发生争吵，并且进行非难的总是安德罗波夫。不过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情：安德罗波夫对助手们说，柯西金所提出的经济改革速度，不单是可能导致危险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摧毁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安德罗波夫惧怕柯西金的改革。

不仅在克格勃和党中央机关之内，而且在政府本身，拥护改革的人都为数不多。据说，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人们将改革称为“柯西金改革”，因而总书记将其一举断送。柯西金本人也暗示过改革发生转折的政治原因。

作家雷巴科夫与柯西金同时在卡罗维发利疗养，他们便认识了。政府首脑给作家留下了抑郁不乐的印象，看上去像个已丧失希望的人……

“我们都在谈论改革，可是改革在哪里呢？”雷巴科夫说。

柯西金默然良久，眉头紧皱，后来才说：

“什么改革呀？‘应当工作得好一些，这就是全部的改革！’”

他显然是在引用什么人的话。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认为吗？”雷巴科夫细问。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柯西金回避正面回答。

很可能，柯西金引用的是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的话。1978年夏天基里连科曾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任何经济改革都不需要，”他对来宾们说，“这都是空谈。应当工

作。我是中央书记，现在代替正在休假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你们知道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忙什么吗？操心交通运输，寻找车皮，因为铁路停工了。这种时候还有什么经济改革可言？”

布鲁坚茨写道：意大利来宾大为震惊。其中一个人从基里连科的办公室出来时说：

“第二超级大国执政党的第二书记竟然在操心不肯工作了的运输部门……”

当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文化水平不高和知识欠缺起到了决定命运的作用。在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争论中，国家的领导人们忽略了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发展新世纪。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一度对科技进步的思想也产生过兴趣。他下令准备召开中央全会，大队人马前往昆采沃斯大林当年的别墅。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来过两次。他看过报告草案，表示赞许。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被吸收参加关于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所长伊诺泽姆采夫也相信科技进步，相信它一定会对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全会的准备工作，”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回忆说，吸收了我国所有的大学者、科学中心、高等学校、各个部。草拟了一系列经过仔细研究的决议。大家去向勃列日涅夫汇报全会问题时，每次他都回答说：

“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全会一直未能举行……而且一次全会又能改变什么呢？

第5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投入农业的资金毫无效果，巨大的建设工程旷日持久，军费开支已变得难以承受，经济全靠石油产品的出口支撑，发达社会主义的招数业已使尽，不平等现象日益显著，失望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十月革命的推动力枯竭了。”

即便最聪明和最有学识的精英人物，也拿不出摆脱不景气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所有的想法都围绕着局部改良转圈子。制度似乎是绝对无法动摇、坚不可摧的。然而它只有在还是一个整体时才是如此，只消去掉其中一个部分，一切都会开始崩溃……

1965年开始的改革失败了，因为它带有局部性质，无法改变经济的形势。谁也不希望放弃强制性计划，放弃荒谬的价格制定制度。

1971年12月，柯西金访问挪威。傍晚他表示希望在奥斯陆城里逛一逛。

“柯西金注意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商店的橱窗前伫足停留，留意商品的种类和价格，”苏联情报机关驻挪威负责人格鲁什科描述，“满腔爱国主义激情的我国贸易代表指出，挪威的物价非常高，而且经常涨价。柯西金猛地朝贸易代表回过头来，冷淡地说，供需平衡恰恰是健康经济的标志，这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如果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设法让某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赢利的水平，那就好了，’柯西金说，‘价格制定应当用作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抵偿费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我国物价在最近30年间一直不变，甚至还在降低。按这样的价格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你们瞧瞧挪威商品的质量……’”

物价升高本身在市场经济中什么也不能改变。利润如果既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得，也可以单纯依靠提高价格来获得，企业的经理们自然要走第二条路。以卢布计算的产品销售额就成为主要的指标。要是能径直宣布自己的货物更值钱，利润当然就会增加。在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顾客别无选择。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依旧，只是价格上涨了。

已获得自主权的企业的生产并没有变得更有效率，它们只是重新挑选较贵的产品品种，从金额上看来生产实现了增长。第九个五年计划内来自商品流转的资金，有一半都是依靠降低质量和暗中提高价格获得的。

柯西金在自己的改革倾向方面过于小心谨慎。莫斯科"红十月"糖果点心厂厂长请求柯西金说："国家给我们400万卢布用于发工资。我再也不向您要一分钱了，但是请给予我们单位对于这笔钱的支配权。"

"我对您倒还可以相信，"柯西金回答说。"可是你想想，如果把这项权利赋予一个偏远的共和国呢？我们事后在那里准会什么结果也看不到。"

他终归还是那种一切都由中央严格管理的制度的信徒。他不可能提供一种由生产者自己理智地确定开支和费用的经济制度。他的全副精力都花费在细节、琐事上，这当然对下级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按照与他一道工作的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的说法，"柯西金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聪明而严厉的人，他作为领导者，我得说还是过去的那种类型。"

他是一个经济问题根本不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制度所培育出来的人。如果采取了一个决定，就必须千方百计加以执行。有益还是无益——这个问题根本不予考虑。结果他始终是一个节俭、勤劳、从不推托的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

"无论柯西金多么充分理解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风烛残年的葛罗米柯着文说，"但在实践中所走的依然是那条停滞的道路。他没有表述过任何深刻而有益的思想，用以消除我国经济中种种危害极大的现象。"

有时候也邀请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院士参加政府会议——指望部长们能倾听科学界代表人物们的意见。

当院士提醒通货膨胀的危险时，柯西金十分生气："您说的什么通货膨胀呀？通货膨胀是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发生，而我们的物价很稳定。我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

伊诺泽姆采夫试图向政府首脑说明起码的真相："居民手里有钱的时候，商店里却没有商品，因为总是被飞快地抢购一空，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征兆。钱比商品多。"

柯西金不满地打断院士的话："我们听够了您的这套资产阶级玩意儿！"

当开始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石油美元滚滚流入国家腰包之际，对经济进行改革的需求消失了。从1970年至1980年十年之间，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量增长9倍，而天然气的开采量则增长14倍。为了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全国都感谢柯西金。在他的领导下，国家集中

力量开采和输送动力资源。

石油美元的出现，正好与勃列日涅夫对解决严重经济问题的兴趣消失相吻合。国家计委主席拜巴科夫报告勃列日涅夫说，应当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数据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提出去扎维多沃讨论，除了拜巴科夫外，还叫上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

拜巴科夫详细讲述了两天，一大堆数字让总书记备感腻烦。

“他坐在那里，满脸百无聊赖的模样，”拜巴科夫回忆说，“两只胳膊沉重地下垂在膝头上，那副模样像是在说：这些琐碎的东西白白浪费他的时间。

他让我停下，说：

‘尼古拉，见你的鬼去吧！你塞了我们一脑袋数目字。我已经啥也搞不清楚了。咱们休息休息，都去打猎吧……’

午饭后我们改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谈工作。玩高兴了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听着我讲那些用数字表示的计算结果，有时还同意地频频点头。”

数日之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宣称：

“我听拜巴科夫讲了整整两天，现在连觉都睡不着。”

拜巴科夫提醒政治局说，总的看来，第九个五年计划将会遭到失败。

“列昂尼德·伊里奇看上去情绪低落，”拜巴科夫回忆说，“他不喜欢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浓眉紧锁，不满地朝着我这边瞧：为什么我要格外加重局势的紧张程度？为什么我尽讲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五年计划行将结束之时，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困难，尤其又遭受前后三年——1972、1974和1975年的旱灾的影响。国家计委向政治局打报告：国家已入不敷出，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正在增加，其中包括战略性材料的进口。

在1975年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不满地说：

“同志们，国家计委向我们提交了一个材料。其中包含有对局势非常悲观的看法。而我和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可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

大家兴高采烈地应声说道：“的确，他们太过分了！用不着在意！五

年计划照样进行！”

国家计委关于改善经济形势的建议，是由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列别杰夫签署的。拜巴科夫正在休假。

正当列别杰夫在部长会议内部会上评估国内的经济形势之时，据拜巴科夫说，柯西金开始紧张不安起来。

“为什么我们应该听列别杰夫讲这事？”柯西金不客气地说：“拜巴科夫并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拜巴科夫说，他不仅见过，而且还多次讨论过。

“但不是你签署的吧？”柯西金说，语气中多少抱有一些希望。

“我当时在休假，但同意报告的内容。”

“我们根本不知道报告是谁写的。”柯西金说。

“报告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司长沃罗比约夫写的，他就在这里参加会议。”列别杰夫回答说。

柯西金的一位副手火了：“沃罗比约夫仅仅是个司长，不可能什么全都了解。”

其他几位副主席也说，他们让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都更熟悉和理解目前的形势：

“五年计划还有一半时间，我们还得及纠正一切……国家计委的看法是片面的、悲观的……不应当做‘临渡换船’的事情。”

当时政府领导人的心境是：什么也不应当改变！根本不愿意别人提起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柯西金翻看了报告的文本，不让列别杰夫继续往下讲。列别杰夫脸色发白，离开了讲台。每一份报告都被没收和销毁。

“最近我国的经济让人想到‘拆东墙补西墙’，”拜巴科夫评论形势说，“为了缝补一个地方的破洞，还得在另一个地方剪下一块布来。始终不可触动的唯有庞大的国防开支。”

柯西金在生命的末期已变得动辄发怒、毫不容人。总书记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柯西金不满意拜巴科夫的报告，便歇斯底里地对这位国家计委主席大声斥责：

“您干吗像老娘们儿一样在这儿喋喋不休呀！”

柯西金在政府首脑任上的活动结束得很不顺利。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在国外采购了大量设备，却连安装也没有安装，一直闲置在仓库里，直到老化。

葛罗米柯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当着他的面问柯西金：

“我们在国外所购置的工业设备，至今没有在企业中安装，仍然储存在仓库里的有多少呀？”

柯西金像平日一样知道答案：“价值160—170亿外汇卢布吧。”

换算成美元，这个数字还更大。

柯西金锱铢必较，而成亿的钱却白白耗费了——用来建设一些大型工业项目，要么工期极为漫长，要么毫无效益。军备竞赛使经济沦于破产，他再节俭又有什么用？

70年代后半期，粮食的状况恶化。国内暗中的愤怒情绪在增长，首先是由于食品和最必需的商品缺乏，生活的质量下降。许多州里发生了真正的罢工，这些情况只有在党的内部文中才能提及。

几乎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一切都成了脱销商品，一切都不得不通过熟人或出高价才能搞到手。

紧缺的商品都流入了黑市，货币本身已失去意义。经济正在向中世纪的商品和劳务直接交换倒退，地下经济欣欣向荣。大机关中有些东西通过所谓定购的体系进行分配。有些食品已彻底消失，各个城市里都排起了买肉和奶油的长龙。民众纷纷奔向莫斯科抢购食品，许多人至今对所谓“香肠列车”记忆犹新。

“鱼的售价是30—40戈比一公斤，每个人都买得起。鸡蛋的生产超过所需的额度，党中央很担心其储存问题。”当时的摩尔达维亚部长会主席帕斯卡尔以怀念的心情追忆勃列日涅夫时代。

帕斯卡尔想必忘记了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食品店的柜台看上去是何种景象，要不就是他根本没有看见过。因为高级官员们连内部凭票供应商店也用不着去——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开车从特殊供应基地送到家里或别墅里。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却是另一番景象。

文学批评家捷德科夫住在克斯特罗马，他在州里的《北方真理报》工作。他的日记写道：

1977年10月25日：商店里没有香皂，没有糖果。不言而喻，没有肉（在市场上排队——4卢布一公斤）、香肠、动物油等等。

11月13日：城里没有了电灯泡。当我前些时去寻找100烛光的灯泡时，40瓦的灯泡尚有出售，而现在40瓦的也不见了踪影。我家的吊灯里，三个灯泡烧坏了两个。我们就这样用开着的台灯照明，寂然枯坐……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短缺。

而新年前的记载则是这样：

给领取养老金的人发放了可以在住房管理所买肉的票券（每个养老金领取者一公斤）。不过，不叫票券，而叫“请柬”。你领到“请柬”，方可进入那家商店。今天《北方真理报》派了几个代表去商店领肉（每个工作人员一公斤）。给劳动集体就是这样“发”肉的。

商店里则说，你们去搬一片来自己割吧。编辑部的几位女士十分气愤，拂袖而去。经过与上级进行电话交涉，许诺明天给肉：既经过了切割，又是最高的等级。今天非法院职员卡马扎科夫的妻子整天都在切肉。给他们这个“集体”所发的肉仍是整片的……

投入农业的资金毫无效果。巨大的建设工程旷日持久，而且造价比预计的昂贵得多。军费开支已变得难以承受。经济全靠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支撑，这要扩大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才成其为可能。勃列日涅夫很走运。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开始飙升。赫鲁晓夫在位时每桶15美元，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已上升至每桶80美元。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油价下跌，从国外换取的富足安乐已烟消云散。

20世纪初期，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短15年。19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当政时平均寿命大幅提高，与美国的差距几乎完全消失。可是60年代时男人的寿命开始缩短，差距重又逐步增大。

经济的任何现代化都不曾发生过，国家持续不断地落后于西方，陷入了经济萧条……

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苏联经验显然亦已失望，它们倒还能保障自己的公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苏联经验对各国共产党不复具有吸引力。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贝林格这样表达：“十月革命的推动力枯竭了。”

发达社会主义的招数业已使尽，失望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显著，尤其是食品供应变得时断时续的时候，没有怨气的唯有高官显贵、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因为内部供应商店出色地履行着职责。出国旅行首先具有经济意义——可以购买那些在苏联领土上不存在

的东西。

“时至80年代初期，也许还要稍早一些，”布鲁坚茨写道，对于一部分勤于思考的政治上层人物而言，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性甚至迫切性已变得显而易见。

最希望变革的是“工业船长”——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大企业的经理。然而变革并未发生，后果则是地下经济开始发展，特别是在南方各共和国。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意识形态部原部长阿加耶夫和政治学家阿利扎德写道：

“正是在那个年代——侵吞公款和贪污受贿泛滥的时期，相当大一部分‘新阿塞拜疆人’的固定资本开始形成。但恰恰在地下资本的聚集过程中，隐藏着并酝酿成熟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工业经营管理官僚们视党的官僚的庇护和必须与他们瓜分利润为累赘……改组被当作摆脱党务官僚监护的机会。”

颇为典型的是，即便最聪明和最有学识的苏联精英中的代表人物，也拿不出摆脱不景气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所有的想法都围绕着局部改良转圈子。制度似乎是绝对无法动摇、坚不可摧的。然而它只有在还是一个整体之时才是如此。只消去掉其中一个部分，一切都会开始崩溃……不过我们的话已说得太超前了。

第6章 坐困愁城

柯西金已经不复是一位斗士了。饭后常常需要在自己的休息室里打盹一小时。影响他的既有年岁、病恙，也有因丧偶而产生的无尽无休的悲痛。

1976年8月1日柯西金坐上皮艇，但在划行期间失去了知觉，和小艇一起倾覆，落入水中。幸亏两腿在艇里系得很牢，他才没有沉入水底。卫队军官是个十分强壮的人，将柯西金连人带艇从水中拽了出来。他在昏迷中被送入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军队医院。

“他发生了溢血，”恰佐夫院士讲述道，“但未进入脑内，却流进了脑与颅之间的空隙。因而我们将他救治了过来。”

9月2日，批准吉洪诺夫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让他顶替柯西金。

“柯西金刚一清醒过来，就给我打电话，”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斯米尔丘科夫对《商人政权》杂志发表谈话称，“他说，您给政治局写个报告，说在我患病期间由吉洪诺夫代理我的职务，送过来由我签署。随后又打过两次电话，说报告由他自己亲笔写。”

医生们告诉柯西金，他需要长期住院。他明白，为了争夺他的职位即将展开一场斗争，所以他希望一个可靠的人顶替他。结果他是对的。我们将报告呈交总书记之后两个小时，我就接到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的电话：

“喂，你们部长会议主席团里有什么人吗？”

一听他的口气便明白，他心里想的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也没有，能够领导政府的唯有他基里连科本人……

基里连科要求，所有的建设和工业问题都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而柯西金也有另一个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而且还是政治局委员。以往柯西金休假期间都是由他主持政府会议。但突然之间却传说，马祖罗夫有病，人家似乎要保护他的身体。1978年11月，他“由于健康状况的原因并经过本人申请”被批准退出政治局并奉命退休，可是马祖罗夫比吉洪诺夫几乎年轻十岁。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要与马祖罗夫分手呢？

“我们大家都获得一些用于公务的内部信息，”马祖罗夫在改组年代

对《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谈话说，“有一天我在一条消息中读到，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在法国表现很糟糕，从事某些投机倒把活动，而本来对这种事情就有不少闲话。我去见勃列日涅夫，想以同志式的态度劝说他，应该整顿一下家中的秩序了。他严厉地申斥我：你别管不是自家的闲事……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摩擦也不少。最终有一天我们彼此都说，我们不想再一道工作了。我便写了申请。”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不满意马祖罗夫的原因则另有说法，认为马祖罗夫是一个软弱无力、很不灵巧的领导人。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下了他的原话：

“我收到一封秋明石油工作者的来信。他们抱怨没有皮帽和手套，无法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工作。我想起我还是摩尔达维亚书记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毛皮工厂，就给基什尼奥夫打电话。那里的人说，仓库里已经堆满了毛皮，正不知道再往哪里塞呢。我给马祖罗夫去电话，问他知不知道秋明和摩尔达维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我了解一下。’你们瞧，这也算一个全苏活动家！”

免除不需要的政治局委员的规程早已制定出来。在例行的中央全会前夕，勃列日涅夫与马祖罗夫单独会面，要他递交退职申请。很可能全部问题都在于，与吉洪诺夫不同的是，马祖罗夫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人。

勃列日涅夫开始掌权时，吉洪诺夫是国家计委副主席。1965年勃列日涅夫让他担任柯西金的副手。

1978年11月的中央全会上，吉洪诺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显而易见，准备让他做柯西金的接班人。全会刚一宣布中间休息，吉洪诺夫便向勃列日涅夫的卫士利亚边科和梅德韦杰夫走上前去，详细打听他可以享受哪些优待，会配什么样的卫队，有几名厨师，做什么样的汽车……

正好一年过后，吉洪诺夫又被擢升为政治局委员。

医生们将柯西金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但他却完全变了,变得有时候爱讲一些抽象的话题，大约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有一天他问拜巴科夫：

“告诉我，你去过阴间吗？”

拜巴科夫感到有些可怕，便回答说，没有去过，而且也不想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我去过，”柯西金以郁郁不乐的语气回应道，同时冷漠地望着

面前的地方，补充了一句：“那里很不舒服……”

“上午柯西金将乘飞机到来，”定居于科斯特罗马的杰德科夫1978年6月在日记中记载，

“柯西金莅临之日，举行了隆重的会议，事前给他化了妆——电视要向科斯特罗马全州转播这次会议。看来，化妆任务系由电视台承担。可是还在开会之前，柯西金前往参观一个实验示范单位，在街上转了一圈。

化妆很明显，柯西金看上去（脸色）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好，但在皮肤的光滑和红润方面的人工痕迹，总令人感觉肉麻。端庄的仪表下面，显露出一个人行将下葬时的某种意味。”

政府首脑在领导层中的地位已经削弱。

1978年，发生了一件以往对柯西金而言不可思议的事。他视察秋林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返程中决定顺便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看看。陪同他的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多库恰耶夫将军，按规定与莫斯科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领导人商定路线。

从诺里尔斯克起飞前夕，多库恰耶夫再次致电克格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分局。第一副局长不胜惊讶地问道：

“怎么？你们明天要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您连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听着，”这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我俩的谈话你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提，就当我没有对你说起过这事。明天下午两点，勃列日涅夫将从莫斯科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从这里他还要继续向前飞行，然后乘火车去海参崴。他们两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碰面意味着什么，你自己明白，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多库恰耶夫将军不胜惊愕，柯西金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首脑，竟然不让他知悉勃列日涅夫的行踪。显然，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斯维尔德洛夫不期而遇，必将引发大量的谣传和议论。首先勃列日涅夫自己就不会满意——政府首脑与他一道露面，会分散人们对总书记的关注。

多库恰耶夫将军向柯西金报告。柯西金气得脸色发白：

“为什么这个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多库恰耶夫回答说，消息是准确的——是从克格勃第九局获得的。

“您对此有何看法？”政府首脑问。

“我觉得，我们必须火速飞回莫斯科，在勃列日涅夫起飞前还能赶到那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还来得及。”

柯西金下令起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国家安全局局长致电多库恰耶夫，详细了解计划。将军回答说，柯西金要飞走，但不是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而是去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国家安全人员这才舒了一口气：

“我们本来决定，柯西金飞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便迎接勃列日涅夫，然后一道继续前行，去海参崴。可是很奇怪，中央委员会不肯向州委透露消息。现在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这就报告第一书记……”

早上柯西金已经回到莫斯科，并且按规矩在预定时间去政府机场“伏努科沃二场”送别勃列日涅夫。

柯西金的紧张工作，以发生大面积的心肌梗塞而告终。1979年10月，柯西金被送入米丘林大街上的专用医院，整整10天都没有清醒过来。

事实上他已经无法工作。但不想承认这一点，也不愿退休。他感到委屈：勃列日涅夫做事太不讲规矩，基里连科的大脑严重损伤，还在工作，为什么唯独他就该退休？

柯西金住院期间，他唯一的朋友基里林也被逐出政府。来自西伯利亚的马尔丘克院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科学技术国家委员会主席，以取代基里林。柯西金出院时非常懊恼。都是背着他决定的。

勃列日涅夫让医生们劝说柯西金退休。柯西金的家人为此对医生们很生气。

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曾向乌克兰领导人谢尔比茨基提出要他主持政府工作，勃列日涅夫心情苦闷，一直在考虑让谁当部长会议主席。有一天他对谢尔比茨基说：

“沃洛佳，你应当接替柯西金，再也没有人了。”

谢尔比茨基推辞了。不管怎样，后来他是这样说的：

“这辆老牛破车早就拉不动了，”谢尔比茨基向自己的一个助手解释说，而且我也不愿意去玩莫斯科的那套危险把戏。

1980年10月，柯西金不得不退休。他向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到更新干部、提拔年轻人的必要性。这是正中要害的回击。柯西金是在提醒自己的同龄战友们，他们也应该退休了。勃列日涅夫看了这封信后，吩咐契尔年科抄写了一份。

1980年10月21日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被排除出了政治局，措词一仍如旧："由于健康状况的原因，同时经过他的申请。"

10月23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宣读了柯西金的申请，现在其内容只有感谢勃列日涅夫所给予他的高度信任之类的话了。

"政治局研究了柯西金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按照纸条宣读，"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苏共中央委员会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满足柯西金同志关于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关于任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甚至认为，并没有必要对这位领导了政府将近16年的战友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吉洪诺夫仅仅比柯西金小一岁，已经年满75岁，当然不可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然而在患有脑血管静脉硬化的情况下，他却活到了93岁。吉洪诺夫是由戈尔巴乔夫下令退休的，逝世于1997年6月1日。

11月5日，从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的部长会议别墅运走了柯西金的私人物品，他对此感到极为痛苦——这提醒不久之前的政府首脑：在苏联的官场中，从今往后他已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名谁也不需要的退休金领取者。他的"吉尔"轿车和政府电话都被取消，这让柯西金很生气，不过，他任部长会议主席时，自己也曾取消过奉命退休的不久之前的政治局同事的种种待遇。

柯西金已病入膏肓，仅仅又活了两个月。他重新被送入米丘林大街上的医院，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柯西金的心脏于1980年12月18日突然停止了跳动。

次日，勃列日涅夫庆祝自己的诞辰。为了不致干扰其喜庆活动，柯西金的死讯被推迟报告。

12月23日，他被安葬在红场上。

最后数年，柯西金开始回忆自己当年的合作社生涯。他从医院里向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发出指示，要其准备关于发展消费合作社的建议。与此同时，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还不断引用列宁论述合作社的著

作。难道他真的认为，半个世纪之前的列宁的文章竟然能补救现代经济？

柯西金常向熟人们兴高采烈地讲述新经济政策年代消费合作社所取得的成绩：

你们能想象西伯利亚的一条条大道建设得多么好吗？旅馆里又干净又舒适。路边小酒馆里能吃饱吃好。每个人每天都能在廉价咖啡馆里喝上啤酒和茶……新经济政策之后我们就没有手艺人了——裁缝、鞋匠都没有了。今天到哪儿去缝好西装呀？我倒是可以由克里姆林宫里的缝纫厂给缝，可是别的人呢？从前莫斯科城里每一步都有一个鞋匠坐在小亭子里。小修、擦鞋只花几个戈比就行了。热气腾腾的包子每处街拐角都有卖的……

看来，这位苏联政府首脑在生命终结之时得出了一个无法令人宽慰的结论——他所做的一切已化为乌有——从前倒要好一些。

第九卷 病夫治国

第1章 在阿富汗的混乱局面

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内勤中将帕普京于1979年12月28日自杀身亡。

中央委员会在考虑该怎么办：报导还是不报导死亡的真实情况？以什么样的规格安葬一个自杀之人？新年节日即将来临，最后决定还是不要败坏苏联人民的兴致，而且报纸在节日期间也不出刊。因此悼念文章直到一星期之后才发表，这时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其中说，“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岗位上，维·谢·帕普京都表现出一个党员的原则性和严格要求，并与对人民群众体贴入微、深切关怀的态度密切结合在一起。”

关于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年纪不大的人（53岁）猝然去世的报道，立即引发了关注。

对死因丝毫未加说明，然而关于帕普京系自杀身亡的小道消息很快便传遍了莫斯科。可是原因何在呢？他临终连个字条也没有留下。

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神秘死亡，成了各种极为离奇的推测的由头。

侨居美国的侦探小说作家涅兹南斯基和托波利，1980年代初甚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政治性畅销书《红场》。该书用英文出版，传到了莫斯科，这里的人们几乎将其当作纪实的调查报告来阅读。

作者环环紧扣发生在帕普京身边的一整套阴谋。小说中，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完成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亲自所交付的任务时，建立了一个神秘的内务部内部情报部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斗争。而帕普京开枪自杀是因为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遭遇失败。

小说中克格勃领导人拒绝占领阿富汗，于是苏斯洛夫将此事交由内务部实施。帕普京也乐于为此尽力。他建议在喀布尔总统府空降伞兵，生擒阿富汗领导人阿明，迫使他签字请求苏军出兵他的国家。帕普京亲自率领空降兵，但顽固的阿明不肯活着投降，于是有个苏联空降兵用一梭子自动步枪子弹打死了这位阿富汗领导人，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任务归于失败。小说的作者写道，为此苏斯洛夫要把帕普京送进铀矿井，这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明白等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命运，便在从阿富汗返国途中的飞机上朝自己的额头开了一枪……

有几个因阿富汗事件而与帕普京相识的人满有把握地告诉我说，帕普京的死因源于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但并不是因为他参与了

推翻阿明之事。

有两个人向我讲述了帕普京的情况：中央候补委员、派赴阿富汗的党的顾问小组第一组领导人哈拉佐夫和曾任阿富汗军队总政治部部长顾问的扎普拉京将军。

扎普拉京将军于1978年5月底来到阿富汗，哈拉佐夫则于6月初抵达。也就是说，他们两人都是在1978年四月革命刚刚发生之后便来到那里，当时人民民主党已夺得政权。

革命后，阿富汗领导人塔拉基最得力的助手阿明当即请求苏联的同志们，派遣一位富有经验的政工人员来帮助在军队中建立总政治部。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政工机关，像苏联军队中那样开展工作。”阿明劝说苏联同志。

扎普拉京将军此时正在驻德国苏军集群出差。他突然接到命令（并未说明原因），要他火速返回莫斯科。他乘机抵达后，没有回家便径直去见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

谈话很简短。叶皮谢夫说：

“你知道阿富汗发生了革命吗？如果派你去阿富汗尚待建立的总政治部当顾问，你的意见如何？”

第二天，扎普拉京已经到了喀布尔。他当即被介绍给总统塔拉基，当然还有从党的系统上监督国防部的阿明。

塔拉基向这位苏联政工将军解释：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力地依靠军队呢？因为你们的革命是由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完成的，而我们全是靠军队。我们要通过军队重新教育全体人民，军队要成为替国家造就干部的熔炉。”

阿明让扎普拉京觉得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说：“就像你们一样，我们也需要政工干部。什么也不应当改变，一切都和你们一样。”

阿明并不像东方普遍盛行的那样徒托空言。据扎普拉京说，与他配合行动很容易。

同样是1978年，帕普京也首次出访阿富汗，从内务部系统与新政府建立联系。喀布尔出现了苏联内务部代表处，其领导人拥有自己的密码通讯系统，有权不通过大使直接向莫斯科拍发密码电报。军事人员和克格勃代表处也有同样的权力。其余的人都应当去找大使，由他签字批准

拍发密码电报。

在帕普京和苏联代表处的帮助下，阿富汗组建了内卫部队——民警队，民警队配备的是苏式武器装备。这支队伍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阿富汗战士由内务部的教官进行训练。

阿富汗新领导人准备按照苏联模式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然而首批抵达喀布尔的苏联顾问所看见的，却是一幅复杂而混乱的阿富汗生活图景，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也有着颇为近似的看法。

执政党已分裂为两派——“人民”派和“旗帜”派。两派领导人相互仇视，不可能共同执政。这种敌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位领袖——塔拉基（“人民”派）和卡尔迈勒（“旗帜”派）之间的个人竞争。塔拉基希望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而卡尔迈勒却不甘心充当次要人物的角色。而且塔拉基所提拔的阿明，事实上已经成为第二号人物。

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无法建立最起码的合作关系。这种状况，以卡尔迈勒出使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终。

苏联驻阿富汗代表之间也不团结。党务和军事顾问们认为，应当与事实上掌权的“人民”派合作。克格勃代表则将赌注押在乐于交往的“旗帜”派身上。

卡尔迈勒出国之后，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又逐渐滋生了新的冲突。塔拉基被奉为神明，他对此也欣然接受。他称阿明为“亲爱和杰出的同志”，心甘情愿地将所有政务都拱手相让，自己乐得逍遥自在。阿明大权在握，并逐步排斥塔拉基对国家、军队和党的领导。许多苏联驻喀布尔代表都觉得，国家政权落入阿明之手已是势所必然。

对新制度的不满很快便表露无遗，全国都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回应，对新政权的反对者和潜在的反对者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许多人常常无缘无故便被抓了起来。抓人通常都是晚间，连夜进行审问，清晨即行枪决。领导这场镇压运动的是阿明。

反抗很快就变成武装性质的了。1979年3月，在大城市赫拉特爆发了反政府暴乱。赫拉特的卫戍部队也加入了暴动分子的行列，苏联的一名军事顾问被打死。

塔拉基惊惶失措。较为果敢的阿明提出，下令战机起飞，夷平该城。空军总司令给苏联军官们打电话：怎么办？苏联的顾问去见阿明，劝说他收回成命。

正是在赫拉特起义之后，吓破了胆的塔拉基恳求苏联收留他。阿明

目睹所发生之事，开始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他认为塔拉基无力保住政权。

1979年秋，塔拉基飞赴古巴，返回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勃列日涅夫与他进行会谈，对阿明的评价很不好，说应当摒弃这个人。塔拉基同意，但是怎么做呢？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让塔拉基放心：

“当您飞回喀布尔的时候，阿明就已经没有了……”然而此言并未应验。

企图杀死阿明的尝试总共有五次，只有最后一次获得成功。有两次打算将其击毙，两次试图加以毒杀。

9月14日，苏联大使普扎诺夫去拜会塔拉基，也邀请阿明前往。阿明本不愿意去。他的怀疑也是对的，但终究不好回绝苏联大使，便去了。在塔拉基的总统府里，阿明遭到枪击，但他活着逃跑了。

当天整个傍晚和夜间，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在喀布尔展开了一场小型战争。塔拉基命令军队干掉阿明。但是喀布尔的整个卫戍部队仍然支持阿明。苏联顾问们也不想让部队离开营房。两架米-24型直升飞机起飞，要用导弹袭击阿明藏身的国防部大楼，但苏联的顾问成功地让它们降落，因为大楼里有许多苏联军官。

次日，塔拉基陷于孤立。9月16日，在国防部大楼里举行了革命委员会会议，接着又召开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塔拉基失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两个职位都由阿明接任。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消灭自己的对手——枪决了数千人。

塔拉基被除掉之后，阿明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勃列日涅夫将此视为对他个人的侮辱：他曾对塔拉基的安全给予保证，而塔拉基却被杀害了。

“别的国家会怎么说呢？”勃列日涅夫担心，“既然勃列日涅夫关于支持和保护的保证已成为空话，难道还能相信他吗？”

勃列日涅夫批准在喀布尔采取特别行动。

克格勃当即虚构了一个说法，仿佛阿明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安德罗波夫下令将阿明的敌人卡尔迈勒弄到莫斯科。于是开始向阿富汗派遣特别小分队。

1979年11月22日，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帕普京最后一次飞赴喀

布尔，他并不曾意料到克格勃正准备暗杀阿明。关于特别行动之事，既未让军事顾问与闻，甚而也没有让大使知情。

吉尔皮琴科将军以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国外侦察）局长的身份，会同委员会高级代表伊万诺夫将军，领导在喀布尔的那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了，他回忆说：

“快到XX日的时候，维克多·谢苗诺维奇·帕普京意识到了一些什么，就来找我和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有一次他说：

‘伙计们，我看出来了，你们想要在这里干点什么事情……让我留在喀布尔吧，我和我的支队会对你们有用的。我不想回莫斯科，那里的内务部上层人物，正在干一些丑恶的勾当。’

他当然已经知道。内务部长萧洛科夫准备让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取代他，因此希望将这次对他带有侮辱性的解职加以推延。解职之事的确很快便成为事实。帕普京忍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便正好在喀布尔政变的翌日朝自己的额头开了一枪。”

《入侵·不宣而战的一场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的作者加伊和斯涅吉廖夫根据苏联大使塔别耶夫的口述写道：

“帕普京贪杯嗜饮，在阿富汗时经常酩酊大醉。此外还患有迫害狂症：他觉得所有的房间里都装有窃听器，经常有人跟踪他……看来，有人将他酗酒的事报告了莫斯科。波诺马廖夫从中央委员会给我来电话说：‘我们有一些关于帕普京的信息。’‘我核查一下，’我谨慎地回答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什么也不必做。他出差的期限即将结束，让他回来再说吧。’……”

帕普京似乎并未料想到他即将灾难临头。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最后那次从阿富汗回国时心情还很愉快。

负责与阿富汗进行合作的人们都很关心，希望这种合作能不断扩大范围。阿富汗人也善于表达感激之情——又是馈赠礼品，又是颁发勋章，接待时像对国王般伺候唯谨。大家都乐意去喀布尔——住一住别墅，疗养疗养；离开之时也不会空手而归。阿明总统送给帕普京一支手枪。这个礼物将发挥决定命运的作用。

哈拉佐夫曾对我讲述过，帕普京飞抵莫斯科后便给他打电话，向他畅谈观感，转达共同的熟人们的问候：“应当做的各种事情，我们全都做到了，还有礼品。”

总而言之，对此次出行完全满意。而在新年将近之际哈拉佐夫接到

帕普京寄来的贺卡时，帕普京本人却已经死了。他从阿富汗归来的这些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哈拉佐夫述说：

“流传着一些谣言，都说他自杀身亡是因为他知道：人家要将他撤职，以便给丘尔巴诺夫腾出位子。我认为，他自杀是出于阿富汗的原因。他属于认为应当与阿明合作的那一批人。当我们的人杀害了阿明的时候，这对他成为一种打击……”

也有另外一些说法。

熟悉帕普京的人都说，他身上没有傲气，待人十分友好，并不像他那种级别的某些官员，自以为口含天宪，不可一世。帕普京喜欢人多热闹，他身边老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围着他转，其中也包括一些不那么值得尊敬的人。

作家赫鲁茨基向我讲述过，帕普京从阿富汗归来那天，他也在机场，还同交通民警局局长聊了聊。局长是来迎接第一副部长的。帕普京刚刚露面，便有人给他把电话直接打到了汽车里。他放下听筒，惊诧地说：“克格勃的一个上校想要见我，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些人断言，克格勃对帕普京有所不满。当年在克格勃担任局长的一位民警将军曾证实，帕普京的公务保险柜里储藏有一批贵重的珠宝首饰。当这位第一副部长从阿富汗归来之时，却发现他不在期间保险柜业经撬开，珠宝首饰已被掳掠一空。

也有一些人认为，帕普京卷入了某些不明不白的事件。位高权重的党内官员所受到的诱惑实在太多了。

一位昔日的高级干部坦率地对我说：

“他们在内务部非常堕落，常常私分从被告没收来的各种财物。也许，帕普京在什么问题上被抓住了把柄吧？在那个年代，民警将军们常常只花几个小钱便能收购大量业经判决的罪犯被没收的财产。我在一些将军家里就看见收藏有本来应该存放在博物馆里的名画。我想，一定有什么个人原因、个人的不幸事件导致帕普京自杀。也许总有一些针对他的有损他声誉的凭证吧？”

那么，在1979年新年前夕的数日中，帕普京究竟出了些什么事情呢？阿富汗所发生的变故他是知道的，但这个国家在他的生活中未必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需要为喀布尔的政变而开枪自杀。

帕普京的亲密朋友们坚决批驳关于他牵涉腐败的说法。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一位当时的领导人，就职务而言理应了解所属各部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他却很有把握地告诉我，帕普京的保险柜里并没有贵重的金银珠宝，也没有启动针对他的案件。

帕普京的朋友们都说，最近几星期他大肆酗酒，常常醉醺醺地来到朋友家里，要求再喝。他把身边所有的酒都喝个精光。不知何故，手头却一文不名。

他同妻子的关系搞得很不好。她骂他酗酒——一般说来这是对的，不过显然她并不很了解他遭遇到了什么事情。帕普京有某些类似抑郁症的症状。他感到他会失去职位（原因下节有述——译者注），心中觉得十分难过。他在烈酒中寻求慰藉，然而众所周知，这种猛药在类似情况下不仅无济于事，而且相反，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来，他需要认真进行治疗，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点。

帕普京数日来忙于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事情，那是部里的贵宾。结果参观访问变成了一场场酒会。据接近他的一些人说，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星期六他回家，与妻子发生了一场争吵。他要求妻子：

“给我倒150毫升的白兰地。”

她当时在厨房里，便开始骂他：

“酒鬼！我什么也不会给你倒！应该去别墅了。”

他又说了一遍：“给我倒150毫升，我们明天再到别墅去。”她不给倒酒。

他走进房间，喝了一玻璃杯酒，用手枪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那支手枪正是阿富汗总统阿明送给他的。

第2章 飞黄腾达的总书记家人

科诺托普毕业于哈尔科夫机械制造学院，战后在莫斯科近郊生活和工作。他在那里担任机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又从这里将他调任专职的党务工作——科洛姆纳区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时代他领导莫斯科州执委会。1963年就任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他是赫鲁晓夫任命的，但科诺托普及时投靠勃列日涅夫，博得了新主子的欢心，因而得以保住自己的职位。

科诺托普是一个严厉而专横、喜欢发号施令的人，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和争论。他妒忌精明能干的干部，逐步排挤走了机关中足以对他构成竞争的人。

科诺托普倚仗的是什么呢？倚仗的是善于为上司效犬马之劳，供其驱使利用。起先是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举凡他们所吩咐的一切，他都百依百顺地遵命而行。赫鲁晓夫甚至不得不对科诺托普的过分逢迎加以约束。

那些有自己的主见并敢于表达的人，都逐步被科诺托普排挤走了。他精心策划，有步骤、有计划地采取行动，做得让你无懈可击。就这样，他将帕普京也摈之于外。他等到了一个分手的合适借口，便立即加以利用。

内务部机关不时补充党务干部，有一次科诺托普劝说中央委员会干部部的人，让这位前程远大的州委书记去加强内务部的领导。

1974年，帕普京从州委调入苏联内务部担任第一副部长。这并不是降职，他在工资上反而得到了好处。在州委时，帕普京挣450卢布，休假前发补贴，当最高苏维埃代表也加薪100卢布。而到部里后获得了将军衔，开始按军衔发工资，再加工龄补贴，收入增加了一倍。

然而，调往内务部实际上使得帕普京的升迁再也无望。他是候补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有可能从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的职位上调任其他州的第一书记。而从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职位上却没有地方可供特别提升了。

而在内务部本身，要想从第一副部长的职位登上部长的宝座实际上毫无可能。第一，部长是总书记的密友萧洛科夫，他并不打算退位；第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部里的官职正在飞速提升，大家都明白，他肯定是下一任部长。

当丘尔巴诺夫1971年4月17日与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他只不

过是一个中校和苏联内务部羁押地政治处副处长。

婚后三年，丘尔巴诺夫当上了政治部主任，获得了将军肩章和红星勋章。又过了一年，他晋升为内务部副部长和中将。

职位高升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党内头衔。

正在扎维多沃为总书记撰写一次例行讲话的布鲁坚茨，偶然成为总书记和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交谈的见证者。阿谀奉承但小心谨慎的卡皮托诺夫问，可不可以推举总书记的家庭成员成为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

勃列日涅夫多少有些不快，便以问作答：

“怎么，难道我的家庭成员是被褫夺公民权者吗？”

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丘尔巴诺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而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则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同样按此行事，他让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担任自己的第一副手，结果获得了两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

小勃列日涅夫毕业于对外贸易学院，跑遍了整个部，替自己物色合口味的职位。全苏工业机械进口联合公司经理苏什科夫回忆说：

我的办公室里进来一个年轻人，非常像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相像的程度十分惊人，只不过来人的身材矮一点，脸型也小一些。这个人名叫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勃列日涅夫。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所从事的业务，竭力劝阻他不要干我们这个机构的工作。他的父亲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这种人的孩子一般都很调皮、娇惯，不无危险。

两星期过后他又来了，说他所喜欢的正是我那个联合公司。我让他去电气设备办事处担任主任工程师，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职务。不过，谢天谢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尤拉干得很出色，为人谦逊，工作中与同事们配合默契……

时间一久，我对小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信任。他绝不骄傲自大，一直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这点很像他的父亲。

在老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际，尤里前往瑞士担任副贸易代表，随后则是贸易代表。回国后沿着职务的阶梯快速上升，当上了第一副部长。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大大地变了，”苏什科夫讲述，“他是个乐于助人的人，于是许多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大家都邀请他去做客，大家都成了‘朋友’。他们总是尽量让他开怀畅饮。尤拉醉后通常变得心肠很软，于是那些人便趁机提出各种请求。

“我认为，正是这些‘朋友’促使尤拉开始酗酒。他找了一个漂亮女人当助手，常带她一道出国。开始出入夜间娱乐场所，常常喝得醉醉醺醺。我们有一次在东京贸易代表处相遇。还是大白天，尤拉已经有点醉意了。我由衷地感到遗憾，是环境害得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变坏了。”

当电视播映老勃列日涅夫为小勃列日涅夫颁发勋章的情景时，全国都认识了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儿子。总书记甚为动情，他为自己的儿子如此出色感到高兴，而举国上下则为勃列日涅夫一家的作风不胜惊讶。

勃列日涅夫宫廷风气，迅速在全社会蔓延开来。

勃列日涅夫有两个孩子——加琳娜和尤里，后来又有了孙辈——加琳娜的女儿维多利亚、尤里的儿子列昂尼德和安德烈。此外，无论列昂尼德·伊里奇还是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许多亲戚，勃列日涅夫夫妇也常常加以关心照顾。

比如说，为了讨勃列日涅夫的连襟别利亚克的欢心并让他当上部长，1973年秋组建了一个新的部——畜牧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

勃列日涅夫的妹妹薇拉是个可爱的漂亮女人，一直留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当地一家学院的化学教研室当实验员。他的弟弟雅科夫·勃列日涅夫则继承家族的传统，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冶金厂里当轧钢车间主任。后来哥哥才将他调到莫斯科。

当时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回忆说，总书记的弟弟曾给他用高频电话机打过电话，并用姓名的全称自报家门：

“和您通话的是雅科夫·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他是替一个被捕的人求情——其时格鲁吉亚正在开展反腐败斗争。

罗季奥诺夫按照类似情况下应当做的那样回答说：

“请原谅，我没有任何权利进行干涉和向侦查机关施加压力。”

勃列日涅夫的弟弟仍然坚持：

“您什么都做得到，您手握大权嘛。”

雅科夫一点儿也不像面貌英俊、身材匀称的哥哥，他个子矮小，脸色棕红，嗜酒贪杯，酷好女色。滥饮烈性酒的结果，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女儿柳博芙著有《总书记的侄女》一书，现定居于美国。

实际上，加琳娜的性格和脾气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青少年时代，她本来是一个美丽而杰出的女孩子，很像父亲。那时她希望过一个充满奇遇的美好生活。

总书记的助手戈利科夫曾向博尔金讲述：

“列昂尼德·伊里奇有个21岁的女儿（他刚刚来到摩尔达维亚）从家中出走，嫁给了一个已经一大把年纪的马戏演员，基什尼奥夫大学二年级也不读了。她独立自主地过着日子，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日后的岁月留下了创伤。加琳娜的行为举止简直坏透了。那么儿子呢？似乎倒是个善良的男人，然而却爱上了杯中之物。唉，他还算个什么副部长呀？”

加琳娜的首任丈夫是一个体操好手、杂技演员和马戏小丑，名叫米拉耶夫，他以自己的力量和灵巧给年轻的女大学生加琳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俩一同生活八年，生了个女儿维多利亚（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对外婆表示敬意）。他们心平气和地离了婚。后来米拉耶夫成为苏联人民演员和维尔纳茨基大街上的苏联杂技团的团长。

米拉耶夫是个沉着稳重、通情达理的人。而加琳娜却希望天天过节。

年纪轻轻的魔术演员伊戈尔·基奥，以其神话般的艺术让加琳娜感到说不出的惊奇。他年仅18岁，而她已经三十有二了，所以勃列日涅夫一家对这场罗曼史很不满意。他们试图让伊戈尔参军，但波多尔斯克军医院的医生们确认，这位祖传魔术师不适合服兵役。

加琳娜和伊戈尔前往南方登记结婚，但他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九天。勃列日涅夫找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帮忙，于是有人向基奥言明，他必须从勃列日涅夫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他们拿走基奥的公民证，归还时上面已经没有了与加琳娜结婚时所盖的印章。

“我当时还很年轻，过分多情，”加琳娜伤感地说，“基奥胆怯了。他只要吆喝一声也就行了，可他吓坏了。其实我是最爱他的。”

她离开米拉耶夫这一坚强有力的靠山，便开始酗起酒来。后来她被安排到外交部工作。

“为了加琳娜·勃列日涅夫，”叶罗菲耶娃回忆说，“特意设立了一个

此前并不存在的职位——历史外交管理局出版处的副处长。该处出版外交文献集（照会、条约专题介绍、会谈等等），主要是收集苏联报刊的资料：工作全靠剪刀加浆糊。

然而爱好开心乐事的加琳娜，对‘领导’此类‘责任重大’的工作很快便感到兴味索然，她越来越频繁地开来病假条。管理局局长决定减轻她的负担，告诉她说，她用不着劳神去开什么假条，只需给处里打个电话，说自己不太舒服就行了……

她那‘责任重大’的工作很快便得到高度评价，受到表彰：上班一年多一点，年近半百之时，她便荣获了劳动红旗勋章。

她在局里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她出席亮相时周身缀满闪闪发光的钻石。三两杯酒下肚已然微醺之际，她向来宾们解释说，她准备在父亲去世之后就靠这些钻石生活。”

她对贵重的珠宝首饰的迷恋和怪诞不经的行为，催生了一些极其难以置信的谣传。她奇异的爱情经历和与某些不太正派之人的亲密交往，在当时的莫斯科广受人们热议。她的确与某些进入司法机关视野的人相识。比如，她与文化部部务委员、苏联国家杂技团全国联合公司总经理科列瓦托夫的女儿便很要好。科列瓦托夫于1982年2月被捕。

1982年3月1日，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向中央委员会呈交了一份报告：

“经侦查发现，科列瓦托夫长期滥用职权，收受全苏国家杂技团联合会演职员贿赂，种类有：贵重的珠宝首饰、穿戴物品、收音机和电视机，其中包括外国产品，以及其他各种物品。行贿的目的在于希望他帮助出国，批准演出的节目，上报授予荣誉称号……搜查科列瓦托夫住宅的过程中，没收了初步统计价值约为二百万卢布的贵重物品。”

加琳娜所迷恋的，不但是钻石，而且还有英俊的男人。他们在她的生活中不停地轮番更替，直至将自身的命运与她联系在一起的丘尔巴诺夫出现。

据说，丘尔巴诺夫的存在成为内务部长萧洛科夫的一大累赘，因为此人并非科班出身，而且游手好闲。了解内情的人却证明说，丘尔巴诺夫实际上也工作，尤其是他当主管干部的副部长的时候。借助于丘尔巴诺夫，部里得以经过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比如提高补贴额。在民警系统，为晋升职衔所花的钱比军队里要少一半，只及克格勃的四分之一。萧洛科夫还做到了让民警的军官和军队的军官平起平坐。

内卫部队的军官们也常常想到丘尔巴诺夫的好处——不仅做到了给

他们加薪，而且让政府决定启用新制服：内务部队不再戴那种令人气愤的蓝色制帽了。

丘尔巴诺夫本人就十分关注自己的外表：经常进理发馆，办公室里总是放着一条熨得平平展展的制服裤。已经是后来的事了，人们开始议论，说丘尔巴诺夫大大地变了，他身上已显露出狂妄和傲慢。

我前面援引过其说法的哈拉佐夫，在那个年代是立陶宛的中央第二书记。他讲述了丘尔巴诺夫作为苏联内政部主管干部的前部长前来维尔纽斯（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的情形。

共和国内务部长向哈拉佐夫报告：

“我们用车去接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时配有警卫人员，国家汽车检查所的汽车一辆在前，一辆在后。”

次日，应该陪丘尔巴诺夫去视察劳动教养院。哈拉佐夫用自己的轿车将这位莫斯科来客送到那里，自然没有民警护卫。途中出现了一次不太严重的拥堵，汽车停了下来。已经被宠坏了的丘尔巴诺夫怒气冲冲地说：

“你们的内务部长是怎么回事呀？连警卫车都不派一辆。”

哈拉佐夫回头面对他不动声色地说：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可是和我同行，而我出行从来都不带警卫人员。”

丘尔巴诺夫默不作声了：他不能与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争吵。不过刚一抵达目的地，他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看，便对劳动教养院院长大发雷霆：

“你们这里是怎么搞的？杂乱无章！散散漫漫！我大笔一挥就能撤您的职！……”

无论在中央委员会或内务部都尽人皆知，丘尔巴诺夫沉湎于酗酒、狩猎、女人。1982年奉派率领代表团访问也门，他一路上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该国总统甚至无法接见他……

丘尔巴诺夫一向收受礼品，不过常常弄不清人家都送给他的是什么。有一个曾经同他一道乘飞机去阿塞拜疆出差的人告诉我，当时的该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将此行变成了地道的节日，成天到晚都在喝酒。返回时，飞机上塞满了纪念品和礼物。丘尔巴诺夫自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送给他了些什么。诚然，对礼品他是来者不拒，不过

据熟悉他的人说，实际上这位第一副部长感兴趣的只有三大爱好——高质量的猎枪、酒和女人。

勃列日涅夫十分关心女婿的前程，无论中央委员会还是部里，人们都知道副部长一职之于丘尔巴诺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台阶。一开始他便需要坐上第一副部长的交椅。帕普京是个障碍，待到此人自杀，这把交椅便腾出来了。

丘尔巴诺夫在一本名叫《往事琐谈》的书里写到自己的前任：

帕普京在内务部机关中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多年担任苏共波多利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党组织），后来又担任莫斯科党委第二书记，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萧洛科夫有一次对我讲过，任命帕普京为第一副部长对于他，亦即对于萧洛科夫而言，可谓极端出人意料。我得知这一任命同样纯属偶然。

我和加利娅（加琳娜的昵称）与列昂尼德·伊里奇一起在克里米亚疗养，突然别墅里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工作室中响起了高频电话的铃声。来电的是主管党组织和干部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我从他们通话的片言只语中了解到，谈的是一个新人。记得列昂尼德·伊里奇问道：

“这个问题已经征得了大家的同意吗？”

根据各种现象判断，卡皮托诺夫回答的是：

“是的。”

“好吧，”列昂尼德·伊里奇说，“既然都同意，那就认命好了。”

就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不在场，而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时，认命了帕普京。这对谁有利，是哪些“发条”在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也许，人家对萧洛科夫说，这个问题已征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同意；而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则说，已征得萧洛科夫的同意。实际上究竟是谁站在这场机关“游戏”的幕后，我不好说。不过并不是安德罗波夫，这一点我很清楚。

很快便弄明白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犯了一个干部问题方面的大错误，帕普京到内务部，简直是突然陷入困境。不过分配给他的是次要的工作（他主管物资和技术装备的供应），帕普京的工作总算让人抱有一切顺利的希望。

1979年冬发生了悲剧性的事件：帕普京突然自杀身亡。记得当时我正在家里，这时部里值班员打来电话，说帕普京在自己的住宅内开枪自杀了。部长、苏联检察院工作人都赶到那里，当即进行了初步侦查。

自杀是在他的工作室中实施的，不知何故他还穿着冬季用的外套，但没有戴帽子，子弹洞穿了头部。而最重要的则是，帕普京处于严重的酗酒状态。我认为，自杀的原因应当是阿富汗、他常常酗酒、日益加重的肝脏疾病；可能还有某些生活上的挫折……

帕普京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他享受到军人的一切荣耀，不过据我所知，在追悼会上讲话的只有萧洛科夫，连州党委都没有来一个人。

我想，大家所“根据”的只有悼词，那就是一个样本。那些为他送葬的人清楚地知道，他嗜酒成性，从阿富汗归来时已经身体不好，随后又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几乎被怀疑患上了包特金症（一种肠道疾病）。不过当时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议论，说他的酒里被投放了某种毒药或非常强烈的麻醉剂，因为阿富汗领导人当时已经背着苏联与美国人日益亲近……

晚上勃列日涅夫将女婿叫到自己的工作室。他没有穿上西装上衣，身着衬衫坐在写字台后面，问道：

“帕普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丘尔巴诺夫细说了一番。

勃列日涅夫又问：

“帕普京酗酒？”

“机关工作人员们对这事都很了解。”

“怎么，连在喀布尔他也喝酒？”

勃列日涅夫与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通电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帕普京是什么原因去世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心肌梗死。”

据丘尔巴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听到这个回答，严厉地批评了萨温金。丘尔巴诺夫认为，萨温金根本不敢讲真话：无论是谁将帕普京推荐去内务部，主管强力机关的行政机关部领导人都对这次任命负有责任。

勃列日涅夫问：

“行政机关部准备推荐谁担任这个职务呢？”

“我们打算为那里选配一位州委书记。”

勃列日涅夫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们那个内务部里的州委书记是不是太多了？”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知道，我们想挑选一个优秀的。”

“嗯，您瞧，”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现在那里的政治部主任是丘尔巴诺夫，他干得怎么样？”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现在已经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主管干部的副部长了。”

“见鬼，”勃列日涅夫说，“全给忘了。那么他干得怎么样？”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知道的，他干得很好，人们都去找他。”

这时勃列日涅夫突然说道：

“你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如果行政机关部提议任命丘尔巴诺夫为第一副部长，我倒并不反对。”

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根据停顿判断，萨温金肯定发了慌。这位部长料想不到，丘尔巴诺夫此刻正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室里，听到了整个谈话。

萨温金似乎试图提出异议：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还那么年轻……他太早了……还不熟练……缺乏经验。”

“总之，您看着办吧，”勃列日涅夫结束了交谈，“我是不会反对的。”

数日之后，部长萧洛科夫向丘尔巴诺夫祝贺其晋升。丘尔巴诺夫在帕普京自杀一个月之后坐上了他留下的交椅。

对加琳娜而言，父亲的去世成了一场灾难。

“我的朋友们仿佛蟑螂般顷刻四散，”她埋怨说，“都害怕给我打电话。当我给其中某些人去电话时，他们就装成外人的声音回答说：老住户已经搬走了，他们的电话我们不知道。可我对嗓音的记性非常好……”

加琳娜适应不了离开父亲和丈夫的生活。她没有本事工作，而遗产很快便挥霍一空。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故事。最后数年她是在莫斯科州多莫杰多沃区第二精神病院度过的。《绝密》月刊评论员基思林斯卡娅记述，将加琳娜送进精神病院的是她与前夫米拉耶夫所生的女儿、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办理了对母亲的监护手续，卖掉了母亲在休谢夫大街上的住房（这些钱也未能给她带来幸福）。

1998年6月30日，加琳娜·勃列日涅娃死在了精神病院里。

第3章 要命的药片

当勃列日涅夫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地位稳固之后，他全然不想干什么事情了。何必呢？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

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病人，但要说服他减少催眠和镇静药剂的用量却办不到。他对这些药物已经产生了依赖，这也是一种戕害身体的毒物瘾。

勃列日涅夫从担任总书记的最初数年开始，便显得十分繁忙，老是抱怨过度疲劳，常常语含责怪意味地对战友和助手们说：

“总是不得不亲自解决所有的问题。”

实际上，他并不习惯于大量工作和巨大负担，而且也不喜欢劳神费力——与一些人，比如说柯西金和乌斯季诺夫完全不同；对这些人而言，工作就是生活的首要内容。当勃列日涅夫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地位稳固之后，他更是全然不想干什么事情了。何必呢？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

勃列日涅夫掌权之后不足两年，1966年7月28日，政治局便通过了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成员工作制度的内部决定。勃列日涅夫还正值盛年，但作息制度却定得很宽松。工作日从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中间必须休息，用于吃午饭。休假为每年两个半月。

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醒说：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说说。有些同志违反我们自己所通过的决定。本来已有决议禁止中央委员会机关将上班时间拖延至下午六点。可是有些同志，包括中央书记，却对决议置之不理。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这是不守秩序。请大家都遵守已经通过的决议。”

赫鲁晓夫自己工作得很多，也强迫其他的人这样做。勃列日涅夫则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优哉游哉的作息制度。可是他还认为他干得太多了。

1970年7月，准备让著名律师捷列比洛夫担任司法部长，他被召至中央委员会并领去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很亲切。捷列比洛夫照例对任命表示推辞，说还有更加训练有素的人可以担任部长之职，他可能不足以担任。

“你以为总书记的日子过得很轻松，工作也很轻松，是吗？”勃列日涅夫责备地说，“你们彼此之间大概会这样议论：瞧勃列日涅夫过的日

子，他手握一切大权，吃呀喝呀——想要什么都有，乘车出游——随便去哪里都行……不，完全不是这样。你往办公桌后面一坐，深思熟虑好多个钟头，就会想到：采煤计划落空了呀，庄稼歉收了呀，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叫人头都发昏。你左考虑，右考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找到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各种办法，不仅找到了，而且以最好的方式将其解决了……就在这个时刻……你醒悟了过来——原来，你老了，坐在办公桌后面打开了瞌睡，而生活中的一切，和过去一样依然如故。你会说，你还会更困难的！嗯，那好吧。现在我来告诉你下面的事情。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决定任命你为司法部长。最近几天之内我们会邀请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你我谈话的内容暂时要保密。”

勃列日涅夫一直都相信，是他一个人在拉这辆大车，而战友们却游手好闲。他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去疗养，仿佛他不得不顶替他们干工作似的。

1968年11月25日，乌克兰领导人谢列斯特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汇报工作，并且请求允许他去基思洛沃茨克休假。同时他也想知道，勃列日涅夫准备什么时候去疗养。

“我要到共产主义实现了才能去疗养，”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以此表示一切都得靠他一个人撑持。

而苏霍德列夫则刻画了这样一幅场景。

成功访问美国数月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召见他。这位党首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心事重重地翻阅着美国人赠送给他的汽车所附的配件目录。

他亲切地对自己的翻译说：

“维佳，你还记得美国人送了我们一辆小汽车的事吗？现在我想了解一下那些配件。这不，目录给我拿来了，需要订购一些……”

苏霍德列夫感到为难：怎么知道数年之后会需要什么零件呢？那辆车的质量好极了。短时期内根本不需要修理。但勃列日涅夫可能有不同的考虑：现在他可以订购任何配件，可谁知道过几年后是什么情形呢？

苏霍德列夫只好坐下来翻看目录。这时候基里连科给勃列日涅夫来电话。总书记为了不取听筒，用高音通讯设备说话。

基里连科请求准许他去休假。

“为什么呢？”寂寞无聊的勃列日涅夫想问一问。

看样子，他只不过是希望聊一聊。基里连科开始语无伦次地解释，说他需要恢复健康。

“好吧，你去吧，”勃列日涅夫宽宏大量地予以允准。“对了，顺便说说，柯西金建议举行一次讨论酗酒问题的中央全会。我不太了解，不过觉得现在讨论此事不合时宜。”

基里连科立即表示同意：“咱们的人过去喝酒，现在喝酒，将来还会喝酒。”

勃列日涅夫同基里连科聊了一阵，摇摇头，不知怎么语气冷漠地说了一句：

“是呀，我的这些战友也真是的：有的人去休假，还有的人不知跑哪儿去了……可你呢，廖尼亚叔叔，一个人坐在这儿，你就穷折腾去吧……”

基里连科第一个失去了健康，他的脑力活动遭到破坏。在1981年3月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受委托宣读苏共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连人的名字都读不对。会场上笼罩着一片难堪的寂静：连党委书记们都一直不知道基里连科的情况如此糟糕。

可是勃列日涅夫却不肯动一动基里连科。也许，他甚至喜欢看见身边有一个身体状况比自己还坏得多的人。

同样是1981年夏天，西德社会民主党党首、前总理勃兰特时隔六年重访莫斯科。按照旧例，安排了他和勃列日涅夫会晤。勃兰特当时并没有表露出他对总书记健康状况之差感到吃惊，但在回忆录却写道：

“我见到的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十分可怜。无论在会谈期间或宴会席上，他照本宣读讲话稿都十分吃力，进餐时他只是用叉子不住地翻动一种小吃。”

举国上下目睹病病歪歪的勃列日涅夫，都私下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他这样早便失去了健康？他究竟患了什么病？

当年就任国家元首之时，他在政治局内显得最为健康。诚然，1952年他曾犯心肌梗塞，1957年也有过一次心脏病严重发作，但心脏病专家们对他的治疗十分成功，从此再也没有埋怨过心脏不好。

1968年8月，正当在莫斯科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紧张会谈之际，响起了第一次警钟。

勃列日涅夫正在讲话，突然之间犯了什么病。

“他语无伦次，口齿不清，”随后柯西金向急匆匆赶到的恰佐夫院士说明，“他托住头的手臂慢慢往下耷拉。”

人们将勃列日涅夫送进休息室，让他躺了下来。他发生思维障碍，也就是医生们所说的语言乖戾，说话犹如梦呓，挣扎着想要起来。

与恰佐夫一道赶来的富有经验的神经病医生特卡乔夫作出了后来证明十分准确的诊断：“要不是紧张谈判的这种环境，我得说这是一个疲惫的、神经系统虚弱的人对服用安眠药物的不正常反应。”

保健医生罗季奥诺夫证实：“每当出现麻烦问题时，他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睡不着觉，开始发脾气，服用安眠药后慢慢平静下来，终于入睡。也许，昨天夜里他所服用的安眠药的剂量比平日要大些。”

柯西金担心地对医生们说：“应当把他送进医院去，千万别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医生们作出诊断之后，安慰政府首脑：问题只不过是过度疲劳。勃列日涅夫睡了三个小时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谈判桌上。这一事故仿佛已被置诸脑后。勃列日涅夫感到，就自己的年岁而言他还十分健康，并且厌恶别人暗示他年事已高的话。

1971年12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别墅庆祝65岁寿辰。政治局委员们偕同夫人前来祝贺。乌克兰领导人给寿星敬献了一幅名为《金色的秋天》的油画、一只水晶玻璃角杯和整整一箱名酒。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给勃列日涅夫拍发了祝寿的电报，其中说：

“您的年岁正值金色的早秋，必将为我国人民带来累累硕果！”

勃列日涅夫颇为不满：

“谈得到什么秋天呀？”

他仍然认为自己很年轻。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看上去气色不错，诚然，也多少有些发胖。他开始为减轻体重而斗争。他从来不是贪吃之人，吃饭又快又少，如今更是完全按照规定食谱进食，并且经常量体重。有时候他仅仅吃点奶渣和蔬菜就感到饱足了。他最先出问题的是牙齿，准确点说是假牙。说话变得不太清楚，这让他十分痛苦，因为他一向以出色的演说家自

诩，相信自己有能力为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法林与勃列日涅夫的特殊关系，早在这位驻联邦德国大使参与总书记的治疗事宜时便建立起来了，首先是治疗口腔疾病。他在联邦共和国物色了一些医生，他们运用新的技术和材料，尽力为勃列日涅夫效劳。

这位患者的问题颇为麻烦：他很快便发生了颌骨软硬组织变化，假牙也很不稳固。勃列日涅夫讲话的时候，必须用舌头顶住一颗假牙。因而他口齿不清，出现一些含糊混乱的发音，让听众发笑。现在的任务是制造一种能结结实实固定的假牙，那样勃列日涅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讲话了。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观察，自1972年春天以来，“开始周期性地出现神经系统功能衰弱，并伴有失眠症状”。

当时勃列日涅夫已开始服用镇静和催眠制剂——安定、埃乌诺克京、阿继万……他白天也瞒着医生服用这些药片。然而这类作用力很强的制剂却引发了抑郁和萎靡。起初医生们很容易做到让他摆脱这种状况，恢复他的工作能力。逐渐地，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开始加速发展，外在的表现就是丧失自我批评能力，多愁善感。

记忆力减退了，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常常忘记刚才所说的话。他变得极不情愿干事情。别人要求他作出决定的时候，他就会大发雷霆。

“与列昂尼德·伊里奇一道工作了18年之久的一位秘书说过，”布鲁坚茨写道，“他不满意的时候，总是扔掉一沓沓呈送他过目的密码电报，结果这些电报被电风扇吹得满屋都是。”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回忆说，“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问波恩时，他的状况很不好，给人留下了一个精疲力竭、漫不经心的印象，让人觉得，他很不舒服。”

恰佐夫院士鼓起勇气，开诚布公地向勃列日涅夫面对面地谈了一次。他试图吓唬自己最重要的患者，说关于他的疾患（虚弱无力、脑血管硬化）的情况，无论广大群众还是对他不怀好意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勃列日涅夫忍着听完了他的话，但并不相信：

“你对一切都夸大其词。同志们对我很好，我深信，他们当中谁也不会对我持反对态度，连想都不会想。他们需要我。柯西金即便耍滑头，他在政治局里也得不到多大支持。波德戈尔内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坦诚相待，我相信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善意的。至于作息制度，我一定尽量遵守。如果需要，每天我都去游泳池游水。在镇静剂方面，你要和教授们

一起考虑考虑，为了我不致出现失眠的现象，究竟应当怎么办……”

然而，离开业已习惯的制剂，他就无法生存。总书记不仅希望能睡觉，他也需要消除令他无法承受的紧张状态。

药物影响他机体内的生物化学过程，决定他的情绪和工作能力的强弱。

1974年7月，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沃罗特尼科夫赴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他顺便去看望主管农村事务的库拉科夫。谈话结束时库拉科夫像往常一样说：

“您应当将情况也向总书记作一汇报。”

下午沃罗特尼科夫来到老广场，登上五楼。接待室里已经聚集了将近30位第一书记。傍晚7点，大家被请进总书记办公室。

勃列日涅夫谈起了农业、粮食作物的收割过程、交通运输，接着又提到制糖用的甜菜、土壤改良，还说应当利用北方的河流，因为中亚严重缺水，棉花的收成受到威胁。后来总书记仿佛对谈话失去了兴趣。

“看得出来，总书记累了，不知怎么一下就无精打采起来，”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开始时那种活跃、利落的举止已经毫无踪影。当时我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工作过于繁重所致。他自己也常常强调这一点。不过以后与列昂尼德

· 伊里奇的历次会面、他的外貌和言谈举止，都清楚地说明他的病情正在加重。”

12月间沃罗特尼科夫再次见到库拉科夫，才得知他关于改进农业管理工作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机关被搁置了。离开库拉科夫后，登上五楼去见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当时已精神不振，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慢吞吞，似乎是假牙妨碍了他。他也不问沃罗特尼科夫为何而来，便开始东拉西扯。沃罗特尼科夫仅仅讲了两句话，说州里一切都好，就开始道别。勃列日涅夫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将他送到门口。

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这次会晤所留下的印象是不愉快的。勃列日涅夫的行为有点不当，说起话来杂乱无章，完全没有一个中心，时而兴奋活跃，时而萎靡不振、沉默不语。

1974年7月，勃列日涅夫赴华沙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30周年庆典。

临行前夕，勃列日涅夫在别墅里嗓子突然发哑。保健医生确认其身体状况虚弱，费了很大的劲才让他恢复正常，送往华沙。他需要在庆祝会上讲话。医生们请求勃列日涅夫遵守作息制度。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不许放他们进入官邸。医生们也确实无法见到他。

夜里他服用了大剂量的镇静药，早上经过治疗才使他勉强可以动步。在华沙的庆祝会上，他已完全失去自制能力，当全场高唱《国际歌》时，他硬要进行指挥。

1974年11月与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会谈，成为勃列日涅夫病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片段。

会谈的话题十分复杂——讨论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议。而且勃列日涅夫与福特是初次会面，不知能否做到协调一致。

所有与限制战略性武器相关的文件事先均已商定，但福特突然要求作一些更改。苏联专家们认为，这种改变于美国有利，但完全可以接受——寄望于对方作出相应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拒绝签署如此重要的文件。

但勃列日涅夫不愿意承担一个人作出决定的责任，便根据党的传统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何况对于和福特会晤之事，莫斯科原先就曾发生激烈的争论。

军界一再证明，如果条约中闭口不提美国前沿基地的设施——苏联周边基地上的导弹和飞机，就不应当签订。考虑到这些基地距离苏联领土近在咫尺，那都是实施首轮打击的手段。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威胁说，如果签订诸如此类的条约，那么军方就可以免除自身担负的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

勃列日涅夫大为震怒：格列奇科怎么胆敢指责总书记忽视祖国的利益？格列奇科后来打电话道歉。勃列日涅夫恶狠狠地回答说：

“这不行。你当众把人说成叛徒，却在暗地里收回所说的话了事。”

初步的较量勃列日涅夫获胜。但如今当他已经身处海参崴的时候，却出现了新的困难。留在莫斯科充当老大的是波德戈尔内。他两个小时过后重新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说，军方认为美国的建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波德戈尔内提出将会谈推迟到明年，在此期间可以对华盛顿施加压力。

总书记犹豫不决。他不想取消与福特的会晤，但也认为不能反对留

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他找葛罗米柯商量。外交部长表示坚决反对推迟会晤，认为这会给苏美关系造成损害，而且阻碍关于战略武器的谈判。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次坐到电话机旁，与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商谈，然后又一次给波德戈尔内去电话。可是波德戈尔内固执己见，并且还将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到电话机旁，此人根本就不愿意与美国人达成协议。

这时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他对波德戈尔内说：

“好吧，既然你们都坚持，我现在就向福特宣布会晤取消，我自己也返回莫斯科。咱们召开政治局会议，我和格列奇科一起在会上发言，我就说，因为你们的原因，一次极其重要的谈判告吹了，就让人们对我们作出评判吧。”

格列奇科元帅开始打退堂鼓。波德戈尔内也吓坏了，说：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位置上，更清楚应当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政治局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他的决定。勃列日涅夫再次赢得自己的主张，但这场争论让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过于激动，结果在会谈期间他的脑血管发生了痉挛。

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使尽最后的力气，硬挺了下来。卫队长里亚边科提醒恰佐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他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您要防备着他再次发病。”

会谈后为福特安排了游览市容，勃列日涅夫还在汽车上的时候就说他累了。与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次交谈预定在勃列日涅夫的专用列车上举行。苏霍德列夫经过勃列日涅夫的车厢时，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勃列日涅夫闭着双眼躺在那里，旁边坐着恰佐夫，交谈只得取消。不过勃列日涅夫总算能到飞机场去送别福特。美国总统在英姿勃勃地快步登上舷梯之前，脱下自己那件用狼、银鼠和海狸的毛皮缝制的豪华短外套，将其送给了勃列日涅夫。

按照预定计划，勃列日涅夫乘坐飞机从海参崴前往蒙古。据说，途中他脑部的血液循环发生严重故障。恰佐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陷入了“因过量服用他业已成瘾的强力镇静剂而引发的丧失自制力的虚弱状态”。

在乌兰巴托，勃列日涅夫圆满完成他的预定活动项目——进行会谈，出席招待会和冗长的音乐会。

在不久之前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主持会议，但没有发言。据一些出席全会的人回忆，他反应迟钝，老将发言人的姓名搞混，怎么也

叫不出立陶宛中央第一书记皮亚特拉斯·皮亚特洛维奇·格里什基亚维丘斯的姓名，试了好几次，还是乱了套。他摆了摆手，伤心地说：

“唉，反正你们大家都认识他——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飞抵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在飞机上他便感到不舒服，想躺一躺。他的助手们请求法方将会谈的开始时间延后，德斯坦总统不明就里，回答说他时间很紧，应当现在就谈。这位法国总统素以身体强健着称，他连私人医生也没有……勃列日涅夫便来到爱丽舍宫。

“勃列日涅夫向我迎面走来，”德斯坦退休后描写过这个场面，“他的步伐迟疑不决、极不坚定，仿佛每一步都需要判断前进的方向似的……

“肌肉下垂的肥胖的面部遮掩了脖颈，一双深陷的灵活的眼睛被挤成了歪斜的细缝。根据上下颌的动作可以看出，他的发音动作受到阻碍……

“我目睹他吐字十分吃力。他的双唇张合之间，我仿佛听见变软了的骨头的碰击声，他的上下颌似乎沉浸在液体之中……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站起身来（此后我还多次见到他的这一动作），当即向门口走去。他对翻译说着一些什么，大约是要求开门……勃列日涅夫刚一开始迈步，他就不复觉察到其他的人的存在了，最重要是掌控前进的方向。

‘我需要休息休息。’他与我分别时说。”

1974年12月30日，勃列日涅夫同时接见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这是一次“相亲”。安德罗波夫建议任命克留奇科夫为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关）局长兼克格勃副主席。

“谈话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提醒我说，如果总书记让我觉得身体不行，我可不要太吃惊，”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说，最重要的是，说话声音要高一些，如果听不明白他的话，别再重问。因此我去克里姆林宫时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我的所见所闻还是超出了我的全部预料。

办公桌近旁坐着的完全是一个病人，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站起身来和我打招呼，然后径直扑通一声跌坐到圈椅里，好长时间都喘不过气来。

安德罗波夫高声大嗓地介绍了克留奇科夫。勃列日涅夫勉强挤出一句话：“好吧，就这样定了。”

克留奇科夫讲了几句在这种情况下理应说的话。告辞时，勃列日涅夫拥抱了这位情报机关的新头子，不知何故眼泪夺眶而出……

总书记的私人医生罗季奥诺夫死于肺癌，接替他的是科萨列夫，此人从1971年起便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专用医院工作。他发现他的这位患者的情况很不妙。不过科萨列夫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并不是政治局中最为严重的。他受到了镇静剂的戕害。要是他能及时退休，不再勉为其难地工作，肯定还会多活一段时间。

“他总是想睡觉，”科萨列夫讲述，“出国期间我们一直密切注意，不让他滥用镇静药。可他却在记事簿上给值班卫士留言：‘如果恰佐夫和科萨列夫来叫醒我，就运用药片这种武器。’

勃列日涅夫由于服用安眠药，总是醒得很迟，早晨很长时间都清醒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同他谈话是毫无意义的。”

1975年8月，勃列日涅夫需要前往赫尔辛基与欧洲多国领导人一同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议定书。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摆脱了肌无力和抑郁症状态。医生们担心，突然失去控制能力的情况会在赫尔辛基当着全世界的面发生。

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都很紧张。齐尼奥夫将军给拥有驻赫尔辛基情报机构内部直接通信频道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斯堪的纳维亚）处处长格鲁什科打电话。他问：

“列昂尼德·伊里奇此刻在哪里？”

“他现在正乘车前往芬兰宫，那里即将举行会晤。”格鲁什科报告说。

“他需要步行很远吗？”齐尼奥夫不放心。

“不远，其他国家元首的汽车停得稍微远一些，我们总书记的车则直接开到大门口。”

“好极了。”齐尼奥夫说，他对自己的部下熟悉情况感到满意。

这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毫不怀疑，格鲁什科正开着电视机，向他说明电视所播映的情景。

在赫尔辛基，一切都进展顺利。

诚然，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不肯去参加芬兰总统吉科宁为各国代表团团长所举行的庆祝宴会。但最终他总算被说服了，同意去参加——

否则便会发生一场风波。

有时候，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便想方设法加以掩饰。

1975年末，勃列日涅夫忙于例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勃列日涅夫同我们讨论，是否委托苏斯洛夫宣布大会开幕就行了，”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其实他自己很想做这件事情——他是总书记嘛。

‘可是，那样我就得用半小时之久向外国来宾致欢迎词，念那些读来拗口的名字。结果呢——报告开始之前就把人累坏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担心，原因是颌骨病使他无法一连数小时口齿清晰地说话。他讲上25～30分钟就会感到疲劳，发音也会含混不清起来。

他抽‘新新’牌香烟，一种专门为他生产的长过滤嘴的烟卷。1975年勃列日涅夫戒了烟。口腔科专家开导他说，假牙安装得不成功是因为，吸烟刺激口腔黏膜。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吸烟。”

恰佐夫劝他每天游泳。在别墅里，勃列日涅夫每天早晨都先下游泳池。休假时则长时间地在黑海里游泳。其实，休假时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他不喜欢散步和看书。游游水，然后坐在栈桥的天篷下玩多米诺牌。经常的玩伴就是陪他休假的助手、医生、卫士。

常常都是由两名卫士陪着他在海里一道游泳，不远处跟着一只载有另外两名卫士的舢板，一艘载有几名冲浪运动员和复苏医生的汽艇。

“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衰老，他的血管硬化也愈益加重，”恰佐夫写道，“他那两个萦绕于心的念头也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无论如何，他也要下海游泳和打猎。显然，他是企图以此向周围的人、也可能首先是向他自己表明：他还保持着活力和他一向引以为自豪的体态。”

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在描述勃列日涅夫的病史时，说总书记正处于一种特殊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病人总是夸大自己体力上的良好状态，不肯说自己有病。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病人，但要说服他减少催眠和镇静药剂的用量却办不到。他对这些药物已经产生了依赖，这也是一种戕害身体的毒物瘾。

勃列日涅夫经历过战争，也赢得了这么多回合政坛上的较量，却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够坚强的人。暮年的他像女中学生一样，可能随时昏倒。这位国家元首的心理经受不住持续的紧张状态，每逢发生不愉快的情况时，他就昏昏欲睡。

勃列日涅夫下意识地寻求消除紧张情绪的方法，哪怕能有数小时让自己摆脱力不从心的重压也好。一个男人在类似情况下通常都怎么做呢？借酒浇愁。

勃列日涅夫还相对健康的时候，他可以就着好下酒菜举止得体地开怀畅饮，而不致产生可悲的后果。1973年他访问美国，在尼克松的别墅里进晚餐。

“服务员来了，”苏霍德列夫回忆说，“颇为得意的尼克松说：我特意为您储存了一瓶‘首都’牌伏特加。服务员给每个杯子都斟好酒后，带走了瓶子。”

接下来的情形是，主人和客人都该喝葡萄酒——按照古老的规矩：吃鱼——喝白的，吃肉——喝红的。仆人开始斟白葡萄酒。这时勃列日涅夫不满地说：

“哎，干吗这样呢，就让他再斟一杯伏特加吧。”

苏霍德列夫翻译了出来，可仆人已经离开了。尼克松说：

“请按按钮。”

仆人来了，听罢尼克松的吩咐，给大家各斟了一杯伏特加，又打算离开。不过这次勃列日涅夫及时加以过问：

“他把酒拿走干吗呀，让他放在席上好了，我们自己能斟嘛。”

葡萄酒被取消了，结果晚餐期间喝掉了整整三瓶伏特加。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勃列日涅夫开始认真地节制自己饮酒。据恰佐夫说，在家庭不和睦期间，勃列日涅夫常喝白兰地，但持续的时间不长。在招待会和庆祝宴会上，从贴着“首都”牌商标的酒瓶里给他所斟的其实是水。

在最后数年中，勃列日涅夫为自己发现了一些能让他长时间进入睡眠状态的催眠制剂。他服用安眠药是因为，他认为离开这些药片他就无法入睡。当然，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酣睡，但医生们认为，他也并未患失眠症。他已经睡得足够了，却硬要自己相信，他还需要睡得更多。

现在已经有了无严重副作用的非烈性制剂，而当时的安眠药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却很强烈，会逐渐导致身体衰弱。

身边的人都不明白总书记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处于如此奇怪的状

态。

“越往后，他越频繁地处于一种奇特状况，仿佛没有睡醒的样子，”苏霍德列夫回忆说，“后来才知道，他对安眠药已经上瘾，因此便引起肌肉器官萎缩，从而讲话也变得含混不清起来。”

1974年勃列日涅夫飞赴哈萨克，参加垦荒20周年纪念活动。晚上他让戈利科夫去见他。戈利科夫在总书记那里遇到其私人医生罗季奥诺夫。医生给勃列日涅夫发了四五片安眠药，而勃列日涅夫却恳求着说：

“科里亚，再给一片吧。”

“不行，列昂尼德·伊里奇，足够了。”

戈利科夫和罗季奥诺夫一同出来。戈利科夫生气地说：

“科利亚，你是舍不得一片药还是怎么的？”

“维克多，你不了解全面情况，这可是麻醉剂。”

勃列日涅夫漫无节制地服用安眠药，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如果他不吞服这么多的药片，他不会衰颓得如此之快。

“这是毒物瘾，”恰佐夫院士对诊断毫不怀疑，“一个人习惯于服用一种制剂，就离不了它，这会导致身体衰弱。要不是这个，他还能坚持下去。”

家人们痛苦地发现，勃列日涅夫愈来愈频繁地陷入冥想，沉浸在一些不愉快的思绪之中，结果他什么事都不愿干，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

“他每天夜里都服用四五片安眠药，”戈利科夫回忆说，“他俨然成了一个吸毒者……我发现，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站立不稳，耳朵变聋，说话含糊不清。仔细斟酌一番之后，我决定与勃列日涅夫面对面地谈一谈，便前往他的办公室，但加利亚·多罗西娜正在他那里。

最近勃列日涅夫只能和她勉强相处，让她送文件给他。一切事情都得通过她。我一向认为她是个聪明、正派的女人。我招呼她说：

‘加利亚，我需要和列昂尼德·伊里奇谈一谈。他是个聪明人，怎么不明白吃安眠药损害自己的身体呢。他很快便疲倦了，吃过午饭就必定要睡觉。’

多罗西娜对我说：

‘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不要这样做。只要您同他一谈起这个话题，他就会厌恨您，不再和您来往。’

勃列日涅夫的这位女速记员成了他与其余世界之间几乎惟一的联系环节。她给勃列日涅夫送来最重要的文件，那都是必须让他知悉的。”

第4章 仍然是主宰者

勃列日涅夫回避了各种日常事务，不想也无力去经管，但他依然是主宰者，照样谁也不敢违拗他。勃列日涅夫及时清除了可能的对手和心怀不轨的人。如今在政治局工作的，或则是老迈之人，或则是那些明白自己任什么都无可觊觎之辈。党的领导人中已不存在任何一个对他下台感兴趣的人。相反，政治局委员们确实希望勃列日涅夫尽可能长久地拥有他的职位。

当勃列日涅夫的状况恶化，需要以某种方式说服这位总书记，让他遵守生活制度并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时，恰佐夫便求助于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不敢冒风险亲自向勃列日涅夫提及此事，便去找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对于将这样的问题推给他非常不满，无精打采地说，有机会的时候他可以同勃列日涅夫谈谈，但是明显地看得出他并不想这样做。

那么，最高权力集团中是否还有谁可以冒险干预总书记的私人事务呢？

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都管理局局长阿利金回忆说，有一天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叫他去商量一个微妙的问题。

保加利亚大使刚刚面见格里申，说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勃列日涅夫，常常带着他的女秘书去保加利亚。据大使说，总书记的儿子的行为很不体面，结果全保加利亚都流传着对勃列日涅夫和他一家人不好的议论。

格里申对阿利金说，必须将小勃列日涅夫的行为告知总书记本人，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决定商量商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位将军经验丰富，毫不犹豫地劝告格里申绝不可这样做：

“列昂尼德·伊里奇会将这类谈话看作干涉他的私生活。保加利亚大使本来可以自己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告诉其儿子的事情，可他耍滑头，把这个问题推给了您……”

勃列日涅夫实际上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可是谁敢建议总书记与心理疗法医师谈谈呢？

“我们什么都试过了，”恰佐夫说，“还从蒙古请来一位巫医，他实施针刺，运用各种各样的藏医疗法和烟熏疗法，但丝毫也无助于事。”

1981年春，国家计委主席拜巴科夫正为自己妻子的健康操心，听说第比利斯有个名叫朱娜的，会用无接触按摩法对病人进行治疗，拜巴科夫便将她请到莫斯科来。

后来有人通过勃列日涅夫的一名也在此人那里进行治疗的助手，将一封介绍朱娜的信转交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便给拜巴科夫打电话：

“尼古拉，这个朱娜是什么样的老太婆？你是不是也在她那里治疗过？她准备干些什么？”

拜巴科夫介绍了她的疗效。

“为了她能正常行医，需要什么手续？”勃列日涅夫问。

拜巴科夫说明：“第一，要在莫斯科登记户口。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拒绝这样做，因为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反对。第二，应该让医学科学院考察无接触按摩疗法并做出结论。”

过了一天，朱娜便获准登记户口。又过了两天，新任卫生部长布连科夫和医学科学院院长布洛欣去见拜巴科夫。

然而朱娜却未能对勃列日涅夫有所帮助。

1977年1月初，总书记的讲话写作班子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了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

“今天醒来，做体操……我就想，我昨天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着？……一下子记不起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20号卡特即将就职，干吗不在此之前向他说上几句话呢，就当是善意的表示吧。而且借口也很好——图拉可是在不久之前刚刚获奖，被授予英雄城市称号。图拉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不过却曾经数十次路过那里，图拉人甚至还替我修理过猎枪。现在我即将去祝贺他们，回忆战争期间人们是如何拼死守卫它的，可以说，是他们拯救了莫斯科。同时我也要对卡特讲一讲需要讲的话。”

他开始在办公室内一边踱步，一边口授讲话的概要，接着重又说起图拉人：

“必须提一提那些参加过战斗并且至今仍然健在的人，我也是打过仗而又仍然活着的人。”

他潸然泪下，走到写字台边，从抽屉里取出手帕：

“我决心尽力讲讲这一切。我要做好准备……总的说来我认为，我应

当不时当众讲话……这会唤起民众，激发他们的热情。”

1977年1月17日，新任美国总统吉米 ·卡特举行就职典礼之前三天，勃列日涅夫乘火车抵达图拉。人家请他参观亚斯纳亚 ·

波利亚纳、图拉万尼科夫机器制造厂，然后安排与该市的积极分子会面。他完成了既定任务，还给图拉的市旗别上金星奖章，让颇为骄矜自负的第一书记尤纳克高兴高兴，那可是一个自己人（战后尤纳克曾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执委会主席）。可是勃列日涅夫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体力。他按照以往的习惯，开始宣读他难以胜任的篇幅浩繁的报告。结果他老是将不同的词语混读一气，话句让人根本无法理解。有时还停了下来，自己问自己：“我读得对吧？”

在场的人听到他的喃喃低语，全都惊呆了。在电视上的综合报导中，这一切自然都删节无遗，留下的仅仅是像样的一些片段。然而即便是对这样的内容，民众听了也都哈哈大笑。

发音糟糕的原因是肌肉衰颓无力——服用催眠制剂的又一个后果。

苏霍德列夫回忆说，越往后，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的能力越差。他只顾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稿本，不怎么注意外国伙伴的回应。而正式会谈他则转托给葛罗米柯，总是以明显轻松的语气说：

“喂，安德烈，开始吧！”

于是葛罗米柯便主持对话。

勃列日涅夫因为说话出了问题而感到烦恼。会谈后他不安地对葛罗米柯说：

“安德烈，我看，我今天讲得不好……”

葛罗米柯早有防备：

“不，不，列昂尼德，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完全恰到好处……”

斯图皮申大使回忆说，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完全照本宣科，不时询问柯西金和葛罗米柯：

“怎么样，阿列克谢，我读得还好吧？”

“好，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怎么样，安德烈，我读得还好吧？”

“好，非常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只有一次，勃列日涅夫突然抬起头，出人意料地对法国总统说：

“咱们何必在这儿干些无谓的事情呀？大家一直讲裁军，其实全都是些空话，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想裁军。”

德斯坦一时不知所措，不过很快便应付自如起来，会谈重又回到原有的从容不迫的轨道。

勃列日涅夫毋宁是按照惯性行事。他还记得他负有某些责任。

勃列日涅夫明显地衰弱了。法林记述说，他的眼神变得冷峻了，充满了狐疑，人也不再幽默风趣了。他对外部世界和人们对他的态度已不再感兴趣。1977年之前勃列日涅夫一直禁止因为他而中断街道上的交通。迨到他有病之时，看见汽车拥堵，便不满地对卫士梅德韦杰夫说：

“他们略微等一等，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总书记也应该等着吗？”

布鲁坚茨回忆说，有一次，勃列日涅夫来到伏努科沃二号机场欢迎一位外宾，他围绕着排成一列的官员们走了一圈，看见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这才略为高兴了点儿，问道：“为什么很少转播冰球了？”

如果这是在夏天，那么他就会提一个有关足球的类似问题，然后坐在沙发椅上等待飞机到来，将那张浮肿的、呆滞的脸转向旁边，目光凝视着一个地点，似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在何处……

勃列日涅夫前往基辅为卫国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揭幕的时候，乌克兰的领导人们都为他的变化感到吃惊。在群众大会上，他吃力地慢吞吞地宣读为他写好的讲稿，眼睛一秒钟也不曾脱离开稿纸。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的宴会上，也完全与此同样地读了两页讲话稿，便万事大吉。此外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不管说来是多么奇怪，勃列日涅夫仍然照旧在写日记，有些片段已在改革年代公开发表。下面就是1977年所记的一些内容（拼音错误原样保留）：

“看‘时代节目’。晚饭——睡觉……做操。然后同契尔年科通话……给托利洗头。体重86700……裁缝——交给灰西装——取回休闲时穿的皮质短上衣……哪儿也没去——给谁都没打电话，也没人给我打——上午理发、修面和洗头……同波德戈尔内聊足球和冰球，也谈论了几句宪

法的事……和梅杜诺夫聊农村的情况——很好……”

国家元首与最亲近的人交谈的内容同样庞杂。他的孙子安德烈讲述：

“来了客人，开始喝茶和交谈的时候，我们都尽快避开，因为听那些话简直无法忍受：怎么烤饼干更好呀，怎么开罐头呀，要么就是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猎的事情。这一来，我们对他打猎的各种小故事全都耳熟能详。”

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活了。

他睡10～12个小时，在游泳池里游泳，去看冰球比赛，前往扎维多沃打猎。去克里姆林宫只有不多的几个钟头，而且并不是每天都去。接见接见外国代表团，开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就逃之夭夭了。

他从老广场搬到克里姆林宫，为的就是远离中央委员会机关，远离中央书记们和各部部长，这些人总是企图找他。现在能见到他的只有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则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去见他。需要说的一切，他都记在纸条上，要是随口讲，有时就会失去谈话的思路。

主要的决定都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做出的，权力的通常机制已经不再起作用。

苏斯洛夫有一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仅仅花了11分钟。没什么可讨论的，也没有必要进行讨论。基里连科主持会议的时间则稍长，因为他喜欢讲一讲加强纪律的必要性。

党的其余领导人也都松懈了起来。

总书记的卫队长记录了勃列日涅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一次典型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抱怨睡眠不好。契尔年科机械地嘟哝着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一遍：

“夜里怎么也睡不着！”

契尔年科依旧不住地点头（他自己也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这时勃列日涅夫忍耐不住了：

“这有什么好的？我睡不着觉，可你还说‘一切都好’！”

直到此时，契尔年科似乎才如梦初醒：“哦，这不好。”

然而他们两人都根本不认为自己已经应该退休了。

“即便是完全老态龙钟、病入膏肓的领导人，也都不肯退休，”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写道，“他们哪里顾得上改革。手握大权，养尊处优，安享天年该有多好。知道吗，医生们甚至有一个专门术语叫‘老年自私症’，此话可谓流行一时。”

总书记的工作日已缩短至最小程度。

勃列日涅夫按照别人事先代写好的发言稿主持政治局会议，经常错误百出，各种问题混为一谈。那副景象看了令人沮丧。

“他逝世之前的最后两三年，事实上处于无法工作的状态，”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露面几个小时，但已不能处理各种迫切的问题，只是给某些同志打打电话而已……

他的状况糟糕到了这种地步：即便是正式的政治局会议，要认真研究议事日程中所列出的问题对他来说已经备感困难，甚或完全力不从心。”

政治局开会时，坐在总书记右首的是：苏斯洛夫、基里连科、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契夫，左首则是：柯西金、格里申、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

如果勃列日涅夫开始与苏斯洛夫商量事情，那么，会议桌另一端的人便一个字也听不见。

契尔年科走到勃列日涅夫身边，给他放下几页纸，悄悄提示说：

“这个需要念一念……这个已经作出决定了。”

会议变得越来越简短，讨论业已取消。契尔年科事先即与大家商定，不能让总书记累着了。勃列日涅夫念一条意见，与会的人便齐声说道：

“全都明白了。我们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看法……”于是决议通过。

勃列日涅夫将契尔年科留在身边并非偶然，此人绝对可以信任。勃列日涅夫已搞不清楚哪些东西应当签署。正是契尔年科密切注意，保障这位上司不致闹出错误或干下蠢事。勃列日涅夫只签署契尔年科报送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越是感到身体不好，越不想做事情，契尔年科的作用便越发变得举足轻重。对勃列日涅夫而言，他已几乎成了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渠道。

契尔年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拟订并向勃列日涅夫报送政治局需要通过的各种决议的草案，其中包括干部的任免。起初契尔年科只敢提提意见，最后数年中则事实上常常代替勃列日涅夫采取决定。那时候契尔年科已成为享有全权的政治局委员，仅只他有机会一日数次与总书记见面。

多罗西娜从契尔年科那里拿来文件，向勃列日涅夫指点，他应当在何处签字。

“有一次在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曾夫子自道：‘我就是沙皇’，”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但那那时候无论在民众中间甚或党内，都已经不再微笑着称他为沙皇了。亲信们力图制造个人崇拜，挖空心思地大肆阿谀奉承。在忠君思想方面，南方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的党内领导人，更是无与伦比……

可我仍然觉得，并不存在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那只不过是类似于崇拜罢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党内，人们对待他的态度都带着并无恶意的讪笑，颇为宽容，也有同情和怜悯。大家清楚地知道，他身染重病，什么人、什么事又驾驭不了。在莫斯科，指挥各路人马的是握有全权的三人组合——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

久违之后才于1978年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法林，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病况的恶化惹人注目。他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陪伴他的人，包括葛罗米柯在内，想方设法不在他眼前露面。一个与年龄不相称的老人，屈指可数的大国领袖，却听命于警卫和服务人员一帮人。

在医疗方面违拗他的意见是不允许的，所有的事情都背着总书记办理妥当，剩下的只是找个时机取得他形式上的“允许”。需要走走过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便鼓起最后一点意志力，宣读亚历山德罗夫-布拉托夫写好的文件……

法林厌倦了大使工作。勃列日涅夫满足他的愿望，将其调回莫斯科，安排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对外政策宣传部：

我们部经常向勃列日涅夫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总书记左看右看文件，却什么问题都已经无法解决了。给他呈送的文件越多，他越难弄明白这都是一些什么文件……

为了避免误会，我要再说一遍：勃列日涅夫直至寿终正寝都并未陷入痴呆，记忆力也没有丧失，有时候甚至还会约束那些拍马屁的人。1978年他在巴库参观第18集团军纪念馆（该军当年坚守新罗西斯克近郊的小地）的时候，曾生气地对我嘟哝着说：

“如果按照这个陈列来判断，那就变成第18集团军决定战争的命运了。”

宣传部的佩切涅夫见证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1月，吃晚饭时所有为总书记撰写一次例行报告的人同他一起观看“时代”节目。勃列日涅夫正在收听新闻，突然嘟哝了一句：

“又全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难道不嫌烦吗？”

勃列日涅夫确实回避了各种日常事务，不想也无力去经管，但他依然是主宰者，照样谁也不敢违拗他。最重要的控制手段——干部手段，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中。在这方面，离开了他或背着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1978年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接替去世的库拉科夫）的时候，契尔年科信任地对他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是站在他一边的，对他很忠诚，他很看重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第二天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对交谈漠不关心，只说了一句话：

“库拉科夫可惜了，是个好人……”

“有着先见之明的勃列日涅夫，”恰佐夫写道，“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即已安排好了各级干部，这就使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未来高枕无忧，即便他丧失了亲自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之时也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古稀之年远比勃列日涅夫结实、健康。尽管如此，战友们觉得领袖软弱可欺，便推翻了他，但绝对没有任何人起来反对勃列日涅夫。

自1972年起，安德罗波夫即已了解勃列日涅夫不幸的健康状况。

1975年以后，苏斯洛夫也知道了。自1978年开始，第四总局关于总书记身体状况的结论便转达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隐瞒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已不可能。如若不是他在发病之前及时清除了政治上层空间可能的对手和心怀不轨之人，罹病后肯定会丧失权柄。

然而勃列日涅夫牢靠地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他除掉了所有的足以与他进行竞争的人。如今在政治局工作的，或则是十分老迈之人，或则是那些明白自己任什么都无可觊觎之辈。党的领导人中已不存在任何一个对他下台感兴趣的人。相反，政治局委员们确实希望勃列日涅夫尽可能长久地拥有他的职位。

亲信们竭尽全力希望他延长掌权的时间。比所有的人都更为卖力的是安德罗波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契尔年科及其党中央机关。

索洛缅采夫回忆说，当他1978年届满65岁之际，他去见基里连科：他是否应当递交退休申请了？基里连科未置一词。他便去见苏斯洛夫。这是经过巧妙算计的一着棋——看看有何反应。

苏斯洛夫听罢，客客气气地说：“您熟悉俄罗斯经济的全面情况，您现在应当一直工作下去，我劝您不必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问索洛缅采夫：

“你怎么啦，打算退休？”

索洛缅采夫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年龄似乎……

勃列日涅夫年长7岁，便问道：

“那么你认为，我还不到退休的时候吗？”

索洛缅采夫尽可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说：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还应该为了祖国的幸福一直工作下去。我可是反对您退职的。”

不过，有时候勃列日涅夫也会提起退休的事。1979年4月他突然对自己的卫队长里亚边科说：

“我想休息了。”

里亚边科以为，总书记打算去休假。弄明白后才知道，勃列日涅夫谈的是退休的事。契尔年科召开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说，看来该退

休了。大家都发言反对。

“您怎么啦，廖尼亚！我们需要你这面旗帜。跟随你前进的是全国人民，你应当留任。”政治局委员们反复开导他，一再说要为总书记创造工作环境，让他更多地休息。

勃列日涅夫宽宏大量地同意留任自己的职务。这毋宁说是施放试探气球，他想看一看谁会支持退休的想法。但政治局里的人全都老成练达，饱经世故，谁也不会疏于算计。

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病势沉重的勃列日涅夫突然失控，信口开河。会后安德罗波夫对已经调来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说：

“你知道，米哈伊尔，必须竭尽全力，让大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牵涉到党和国家稳定的问题，甚至是国际稳定的问题。”

葛罗米柯曾对儿子讲过，总书记身体不适时，他和安德罗波夫前去看望。突然间勃列日涅夫对他们说：

“我是不是应该退休了？越来越感到身体不行了。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安德罗波夫的反应快：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只管过日子吧，什么也不必担心，只管过日子好了。您的战友们都很强健，我们决不会让您为难的。”

勃列日涅夫深为感动，热泪盈眶地说：

“如果你们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就再干一干吧。”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并不打算退休。而且像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也没有考虑很快就会死的问题。因此他关于继承人的谈话并不能当真。

1976年，勃列日涅夫再次被授予金星英雄奖章，由基里连科颁发。

第5章 残灯摇曳

疾病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让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和一个人都走向衰退。他不再约束自己，已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扬。特别是在患病之后：多疑，轻信流言，喜欢炫耀，追求不切实际的虚荣。

勃列日涅夫尽管看起来仿佛是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其实很不了解国家的情况。他看《真理报》，相信写的是什么样，事情也真的就是那样。

对勃列日涅夫的70寿辰进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济吉娜（苏联女歌唱家）发表了辞藻华丽的祝酒词，干了一杯伏特加并将杯子在地板上摔碎。还将第18集团军的老战士们邀请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

1981年，勃列日涅夫的75岁寿辰庆祝活动更加豪华。他获得了第四枚苏联英雄奖章。寿宴在大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耶夫大厅举行。担任宴会主席，更确切地说，充当主持人的是苏斯洛夫。他甚至认为可以开开玩笑：

“咳，还得一个新的演说家来饶舌，这样你们可就顾不上吃喝了……”

各共和国的代表、军事将领、科学和文化活动家，全都向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伟大”、“英明”之类的赞美词不绝于耳。讲话完毕，继之以音乐会的各种节目。

宴会之后，勃列日涅夫服用了安眠药，五点左右便在休息室里躺下小睡片刻。醒来后问值班秘书：

“有什么新闻？”

只要他一开始焦躁不安，便自己服用镇静药物。如果当天有冰球或足球比赛，必定给拉宾打电话：

“谢廖沙，冰球我可没看成。”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转播了一场比赛呀。”

“那你再播一遍吧，”勃列日涅夫说，“今天你办不到，你就明天回放吧。”

于是就回放了，理由是“应电视观众们的请求”。

勃列日涅夫还喜欢轻音乐广播、节日“星火”节目，尤其喜欢轻歌剧和茨冈合唱团，因此音乐会必定要斯利琴科（苏联演员）参加演出。

外国的外交人员目睹勃列日涅夫已丧失工作能力。他们提示本国领导人说，他最多能坚持会谈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用于宣读现成的讲稿，所以讨论问题的机会极为有限。

1977年8月，安哥拉总统内图飞抵莫斯科。他突然提出一个有关不久前罗安达（安哥拉首都）发生军事叛乱的直率问题：

“我来是为了亲自从你们这里了解，莫斯科是否参与了反对我的那场阴谋？我得到消息，说你们的许多人都卷入了。”

大家都望着勃列日涅夫，等待着他回答。勃列日涅夫仿佛没有听见问题似的，开始宣读替他准备好的材料：

“我们的形势很好，丰收在望……”

勃列日涅夫既然不肯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话题，便证实了安哥拉人最坏的设想：这就意味着，苏联特工机关和军人确实试图推翻内图。但勃列日涅夫确实没有听见那个问题，所以像自动机器一样，遵循既定的仪式行事。读完讲稿，他自己给自己鼓气：“读得很好。”

只是在事后苏联外交人员才得以与安哥拉人交谈，消除了他们的怀疑。

1979年12月，被任命为驻古巴大使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国休假，他决定向勃列日涅夫作一汇报。会见定于12月17日傍晚7时。沃罗特尼科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接待室里空无一人。

半小时后，卫队工作人员、提着小药箱的医生、理发师陆续进入勃列日涅夫室内。接待室的值班秘书请求沃罗特尼科夫说话高声一些，并提醒说，勃列日涅夫只有10～15分钟时间。

勃列日涅夫病病歪歪、老态龙钟的模样，让这位大使极为震惊。勃列日涅夫心情很好，亲切和善，他说：

“你开局不错。反映很好。”

他吩咐向菲德尔·卡斯特罗转致问候，邀请他访问苏联。

“也向劳尔（即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亲切致

意。每年的新年前夕，我都给劳尔寄去燕麦片、荞麦米、红鱼、整套葡萄酒。

勃列日涅夫经常饮用加牛奶的咖啡，看来他口中发干。说话时仿佛嘴里噙着粥。

1978年在大剧院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生150周年。阿根廷共产党员作家瓦列拉也在晚会上发表讲话，在作家协会外国委员会工作的西尼扬斯卡娅为他翻译。她回忆说，会议结束时‘党的全体领导人都顺着通向舞台侧幕的甬道从我们面前经过，他们与瓦列拉握手时说：谢谢您’，随后又对我说：也谢谢您。勃列日涅夫没有说出话来，只是嗓子里发出一阵响声，但伸出了一只萎缩的仿佛没有骨头的手。他整个人就像一个巨大的充气玩具。”

1979年4月，法国总统德斯坦访问莫斯科。他知道勃列日涅夫的爱好，便为其带来了两辆吉普车作为礼物。

进城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总统说：

“我没听医生的意见，到机场来迎接您，他不让我这样做。”

勃列日涅夫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去。

“应当承认，我病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以冷漠而平静的语气说道。

“我屏住了呼吸，”后来德斯坦写道，“当即便想象，如果广播电台将他的话传遍全世界，这一自白可能产生何种效果。他是否知道，西方报刊每天都在谈论他的健康问题，估计他还能活几个月？”

“您大概还记得，我曾经遭过颌骨的罪，”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这让人生气，不过这一切如今已成往事了。”

“实际上，似乎发音已经正常了，脸颊也不那么肿大了，”法国总统思忖着，“不过，他有何必要将这一切告诉我呢？他是否明白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吗？他是否意识到，讲述这种事情抑或仅仅走漏消息对他都是有害的？”

“现在各方面都严重多了，”总书记与法国来宾交流，“但医生却硬说还有希望。他们还指望将我治愈，或者至少稳定病情。我对您讲这些，是希望您能更好地了解情况。但我一定能康复，您会看见的，我可是个棒小伙子！”

看来，勃列日涅夫是坚信这一点的。然而最近几次出国访问和与外国代表团会谈却很丢人现眼，唯一不明白这点的人就是勃列日涅夫自

己。他离开讲稿已经一句话也不会说了。而且照本宣科也念不好，常常出一些不可思议的错误。他步履维艰，需要人帮扶。但亲信们却一再坚持：“您需要向人民群众露面。”

于是勃列日涅夫频频出现在屏幕上。

“他力求尽快结束会谈，”苏霍德列夫回忆说，“抽身走进休息室，结果连助手们也都无法给他送去重要的文件。”

官方宴会期间他备受折磨——什么也吃不下。他对自己的翻译苏霍德列夫信任地说：

“现在我就回家，在那里再吃点东西：我要吃一个煮鸡蛋，两个小香肠——这就是我的一顿晚饭……”

有时候，他在宴会中途挣扎着起身离席，这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丑闻。富有魅力的苏霍德列夫便用谈话吸引他。

由于勃列日涅夫容易疲倦，各种官方活动已成为他的负担，于是多棱宫（在克里姆林宫内）中的宴会都加快速度进行。服务员们不停地换菜，不让外宾有进食的机会。

卫士梅德韦杰夫回忆说，1982年夏天在多棱宫举行的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下意识地高声大嗓说话，在贵宾致词期间他竟然对政府首脑吉洪诺夫说：

“尼古拉，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

胡萨克不再作声。而勃列日涅夫仍然继续说话，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这个我不能吃。你吃吧，尼古拉……你就吃鲑鱼也好哇。”

有一次散步期间，亚历山德罗夫对布鲁坚茨说：

“同列昂尼德·伊里奇相处已经变得很困难了。他一生诸事顺遂，永远走运，这一点留下了痕迹。他从来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而现在的情况呢，年纪大了，身患重病，血管硬化……他变得非常任性，行为举止像贵族老爷，对工作毫无好感，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

勃列日涅夫的住宅位于库图佐夫大街。服务人员有：一名厨师，一名女服务员，一名女清洁工。卫队住一楼。这个大院里也有安德罗波夫和萧洛科夫的住宅，还住着另外几户高官。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局长帕夫洛夫在兹韦尼哥罗德大街上为最高领导人们建造了住宅楼。那是一个极好的地方，邻近莫斯科河。每层楼上只有两套住宅，楼下是卫队的房间。原计划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葛罗米柯都在那安家。但波德戈尔内被解除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波利扬斯基调任部长，随后又任大使。勃列日涅夫也不肯要新住宅。

怎么处理这座大楼呢？柯西金将其分配给院士们。

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末期了，帕夫洛夫又在休谢夫大街上盖了一幢新楼：有壁炉，宽敞的大厅，每家两个厨房。

四楼是按照特殊要求设计的，天花板和窗户都更高。这一层预定由勃列日涅夫居住，但在最后时刻他却拒绝搬迁。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劝他去看看都办不到。他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搬到新地方。任何变化都让他生气。勃列日涅夫从来不在城里过夜，他喜欢住在别墅里。

恰佐夫回忆说，有一次他休假归来去看望总书记，“在简朴木楼的地方我看见一座巨大的大理石别墅，有着冬季和夏季使用的游泳池，宽敞的餐厅，精美的内部装修。”

三楼上是图书馆和配置着长沙发的工作室。紧挨着写字台的地方有一个托架，上面安放着直拨电话的控制台，可以与全国的高官们通话。图书室里有一些旧书、相册、记述第18集团军和小地战斗历程的出版物。总之，这些书籍并不是用来阅读的，仅仅用于上架陈列。勃列日涅夫从来就不阅读任何书籍，但节假日饭后偏偏要在图书室内休息，那里谁都无权擅自进入。

二楼上有勃列日涅夫夫妇的卧室，也有孩子们的房间，全都带有单另的卫生间和浴室。

一楼则是带厨房的食堂、大厅、设有台球室的电影放映厅。他非常喜欢打台球，也爱看电影，尤其是讲述大自然和动物的风光片。

晚间11点左右勃列日涅夫就寝，9点起床。

大楼里有游泳池，勃列日涅夫每天上午都游水，还在医生们的照料下做体操。

大楼附近有个网球场，但谁也不会打网球。勃列日涅夫还养了一窝鸽子，由卫队的一名准尉照顾。傍晚从城里回来后，勃列日涅夫喜欢在占地面广阔的别墅里散散步。

维多利亚·

彼得罗夫娜患有糖尿病，常去卡罗维发利疗养。她逐渐出现了心机能不全。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但她比丈夫的寿命还长，直至1995年才去世。为她送葬的人并不多……

据熟悉她的人评价，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是一个懂得分寸的明智的女人，心地善良，慷慨好客。也许她心肠太软了，两个孩子——加琳娜和尤里可能因此才经不住地位的考验，养成了酗酒的恶习。

勃列日涅夫也为外孙女维多利亚的家事非常伤心，他对维多利亚似乎比对所有的人都更为喜爱。

尤里的儿子安德烈对表姐维多利亚作过记述："还在上中学时她就与母亲分手，不接受她的生活方式，离开了她，拒绝和她相见。她住在外祖母家里，其实，外祖母也没有教育好她。"

维多利亚嫁给菲利波夫，但这场婚姻以失败告终。1977年，正在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戏剧学系上学的维多利亚与大学生瓦拉库塔谈情说爱。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这个未来的新郎。克格勃莫斯科分局领导人阿利金将军指派第五处的一名工作人员监督瓦拉库塔。这个年轻人受到外部监视处侦查员的跟踪，他的电话被窃听。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克格勃第一副主席齐尼奥夫将军研究了所有的材料。

瓦拉库塔被送到列宁格勒，希望距离能将他和总书记的外孙女分开。然而爱情关系仍在继续。莫斯科的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四处考察这个未婚夫的表现。

瓦拉库塔和维多利亚终究还是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加琳娜，以纪念其祖母。维多利亚搬到了列宁格勒丈夫那里。勃列日涅夫与外孙女离别时泣不成声。后来这段婚姻亦已瓦解……

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几乎从未随同丈夫出访过任何地方，是她自己不愿意，宁肯做家务。这倒正合勃列日涅夫的意。

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波斯托瓦洛夫参加已经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之后，回来向人讲述：

"新的第一书记令人震惊。他今天说：'嘿，你们都让我干的什么活呀，连跑去找找姑娘都没个地方！'"

据莫基拉特说，"很快总书记便不需要跑了。就在中央委员会内部，

总书记的情人已一个接着一个，分外引人注目。”

关于勃列日涅夫寻欢作乐的故事不一而足。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加以历数——时而是女演员，时而是女歌星。后来的情况大大简化：哪些人顺手、哪些人处于从属地位，就是哪

些人，对这些人不必花费时间去追求，比如女服务员、空姐、护士之类。

1971年9月勃列日涅夫往克里米亚给谢列斯特打电话，邀约谢列斯特到扎维多沃取野鸭。

“参加打猎的有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格列奇科、马谢罗夫，波利扬斯基和杰米契夫随后也赶了来，”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述，“什么事情都大谈特谈，工作却讲得最少。大肆饮酒作乐。这次狩猎是格列奇科为上司安排的，——这里正是他管辖的地方。头一天打猎归来已是晚上，席间喝了相当多的酒，勃列日涅夫带来一个不明身份的姑娘入席，一直同她亲嘴，简直是垂涎欲滴的模样，后来便带着她通宵不见踪影。第二天打猎时，勃列日涅夫又将那个陪他过夜的女伴带上小艇。

这类‘尝鲜’他历次打猎时都一再重演，绝无例外。每当目睹这种丝毫不加隐讳的淫荡，无不令人厌恶。可是你能说什么呢？谁又能讲这种事情呢？我们只好在彼此之间议论议论了事。”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的时候很开心，举止自信而随意。因为他没有带妻子随行，所以陪他度过两天时间的是专机上的一名空姐。勃列日涅夫甚至还将她介绍给尼克松，尼克松丝毫不觉惊讶，只是礼貌地莞尔一笑。告别时，还对她说：“要爱护总书记。”

扎米亚京讲述过：

“对他身边工作的妇女，他并没有表现出兴趣。可是每次乘飞机去一个地方，机组人员中都包括一名特殊的空姐。”

“这么说，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亲信之中，有人为属于他隐私的事情操心？”

“民航局长。”扎米亚京回答说。

总书记的侄女、他弟弟的女儿柳博芙回忆说，勃列日涅夫迷上了一个女护士，最后数年她一直在他身边：

“伯父在家庭中从来没有感到幸福，他从未爱过自己的妻子。他们在各方面都迥然不同。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是一个内向的缺乏魅力、不爱

交际的人。而他则截然相反，特别看重友情，性情直爽，喜欢女人。因此他的调情行径和对女人的迷恋，都似乎有了某些可资辩解的理由。”

根据党内精英不成文的规定，与总书记家庭生活有关的所有问题，都由克格勃主席与他面对面进行磋商——就这样，还需要这位主席下定决心才行。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怯生生地向勃列日涅夫提到，一个照料总书记的女护士的丈夫闲话太多，也许有必要撤换这名护士吧？这里所说的是，勃列日涅夫与那个护士之间发生了超出职务范围的暧昧关系。

勃列日涅夫生硬地回答安德罗波夫说：

“你知道，尤里，这是我的事情，请你任何时候都再也不要提它了。”

这次谈话为人所知是因为，安德罗波夫将其转告了恰佐夫院士，解释他为什么永远再也不敢与总书记进行这类谈话。安德罗波夫害怕失掉自己的职位。

总书记的私人护士科罗维亚科娃，从照片上看是个容貌姣好、招人喜爱的女人。到处都哄传，说她是总书记的最后一个情人。

多年之后，科罗维亚科娃曾对报界发表谈话，坚决拒绝谈论自己与总书记的特殊关系：

“临终之前他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有病之人。每个人都可能发生这类事情，又何必一直对此大肆渲染。他患过中风，你们能想象一个中风之后的人的情形吗？”

克里姆林宫内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旁边，设有一个医疗室，里面有三名女护士轮流值班。勃列日涅夫对科罗维亚科娃情有独钟。

据恰佐夫说，科罗维亚科娃在苏共中央庶务局大楼里得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她的丈夫也迅速晋升——从少校变成了将军。1982年他死于一场车祸。

波利扬斯基愤怒地警告恰佐夫院士，说一个女护士竟然坐到了正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政治局委员们的会议桌旁。波利扬斯基要求恰佐夫采取措施，让这个女护士放明白一点。

大费周折才将这位女护士从总书记身边的人中弄走。此事由恰佐夫本人办理，他认定这名女护士擅自给勃列日涅夫发放镇静药剂。

“老实说，我很吃惊，”接替罗季奥诺夫的主治医生科萨列夫回忆说，“在第四总局如此严格的制度下，一个女护士竟然可以畅行无阻地获

得麻醉制剂，而且自作主张地随时分发药品。”

很可能问题在于，她已经拥有对总书记过大的影响力，而这让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首先是恰佐夫，颇为不满。

“叶尼亚（恰佐夫本名叶夫根尼的昵称），”勃列日涅夫说，“请你别让我出院。我不想回家，那又会开始同妻子一起……”

恰佐夫许诺不让他出院，虽说别墅的新鲜空气对他大有裨益。

据了解，勃列日涅夫和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从来不吵架。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非常牵挂女儿和儿子。但是家中没有和他交谈的人，没有谁可供交换意见。他向往扎维多沃，从而可以挣脱家庭羁绊，并且两耳也听不见任何令人挠头的问题。这里一些人相聚一堂，在他们中间他感到心情舒畅。禁猎区（指扎维多沃）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每星期五白天来到那里，星期日晚间返回别墅。

布鲁坚茨记述，在扎维多沃大家曾经谈起过莫斯科奥运会的事：“有人发表议论，坚持说这‘不合时宜’，因为国内问题成堆，却偏要一掷40亿卢布，如此这般。”

这些议论让勃列日涅夫深受影响。他去给什么人打电话，然而回来时却说：

“晚了。我们已经做出了承诺，伊格纳季跑遍40多个国家了。”

伊格纳季·诺维科夫当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与勃列日涅夫是同学。他是柯西金的副手和国家建委主任，自1975年起又担任莫斯科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 沃基本上还是休息。别切涅夫回忆说，晚上勃列日涅夫常看电影。一开始放的是勃列日涅夫特别喜欢的《电影旅游选集》，然后再放一部正片。旁边坐的是性情稳重、待人友善的速记员多罗西娜。如果勃列日涅夫有些东西弄不明白，她就给以解说。另一边则坐的是中央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顾问小组领导人尼古拉·希什林。

“尼古拉，”勃列日涅夫叫他，“坐在跟前来，抽烟吧！”

希什林整场电影期间都在吸烟，勃列日涅夫很乐意吸进烟草的烟雾。

最后数年中，希什林和布拉托夫经常陪同勃列日涅夫前往他的夏季疗养地克里米亚，草拟一些非常通情达理的报告，以总书记的名义送交政治局。

1981年1月上旬，别切涅夫在扎维多沃参与草拟第二十六次党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

一张长桌旁围坐着通常的写作班子。勃列日涅夫自己穿一身近乎运动服的毛料西装，坐在边上。报告草案进行朗读。他面前放着原文的副本，是以大号字打印在专用的铜版纸上的。

报告草案中提到卫生保健部门的贪污受贿情况。勃列日涅夫问：

“难道这是真的？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吗？”

助手们纷纷证实，情况的确如此，亚历山德罗夫还补充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知道吗，甚至在中心教研医院都有硬性规定的价格——做什么样的手术给多少‘小费’。”

勃列日涅夫惊讶地摇了摇头，朗读继续进行。在报告的定稿中并没有这一段话——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删掉了。

勃列日涅夫尽管看起来仿佛是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其实很不了解国家的情况。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苏联正在走向共产主义。他看《真理报》，相信写的是什么样，事情也真的就是这样。

勃列日涅夫的听力不好。速记员多罗西娜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公共部顾问，如果勃列日涅夫有什么听不清楚的话，她就耐心地向他一再重复。

勃列日涅夫正前方放着一台专用电话交换机。他不时拿起话筒，要求给他接通政治局委员中的某一个人，要不就是与妻子通话：

“喂！请叫一叫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

专用交换机的电话接线员立即为他找到所需要的人。勃列日涅夫对生活中的许多乐趣已经失去了兴趣。他自己不喝酒，所以别人也就不给他斟。有一次，对他言听计从的希什林总算说服他让在吃饭时上了酒水。服务员送来“莫斯科”牌伏特加，给勃列日涅夫斟的则是捷克啤酒。

就连生日，勃列日涅夫有时候也不在别墅里与家人团聚，而是在扎维多沃的熟人中度过。

布鲁坚茨回忆说，1975年12月9日（勃列日涅夫的69岁诞辰）勃列日涅夫就宁肯待在扎维多沃，还说“季马（即乌斯季诺夫）病了，安德烈（葛罗米柯）也外出了”。只是白天顺路回家（乘直升飞机）待了一小会儿，晚上7点到12点的寿筵上，陪同勃列日涅夫入座的是中央委员会国

际部的六个工作人员、一名职业猎手、两名卫士。大家都举杯祝寿星身体健康。

契尔年科送来了向勃列日涅夫祝寿的人的名单和劳动人民的贺信。据在场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勃列日涅夫很高兴地宣读那些信件：有一个人提议让勃列日涅夫担任终生总书记，另一个人则要求授予他大元帅称号……

多年就近观察他的鲍文写道，疾病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让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和一个人都走向衰退。他不再约束自己，已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扬。在患病之后，还出现了一些令人生厌的性格特征：多疑，轻信流言，喜欢炫耀，追求不切实际的虚荣。

他开始享受先前对他从未显得如此重要的一种乐趣——收受礼品，尤其酷爱汽车。人家赠送他汽车，他也拿汽车让亲属们高兴。他给女婿丘尔巴诺夫就送了一辆“雷诺-16”。

1976年12月勃列日涅夫70寿辰前夕，开始生产新型“海鸥”（嘎斯-14）。首辆车专门为勃列日涅夫漆成深红色。

他喜欢以疯狂的速度飙车。或许，刺激性的感觉有助于他振作精神，摆脱镇静剂导致的半睡眠状态。在当时主要的新闻节目《时代》工作的比留科夫回忆说，1970年岁末勃列日涅夫来演播厅所在地萨博洛夫卡视察时，便是他自己开着一辆“梅赛德斯”（即奔驰

轿车）疾驰在前，卫队乘坐的“海鸥”随后追赶。

出访美国前夕，勃列日涅夫要求美国人给他赠送汽车。人家就向他奉上一辆价值昂贵的前后座用玻璃隔开的封闭式大马力“大陆”牌高级轿车。美国政府没有钱购买如此名贵的汽车，白宫便请求几位大实业家捐资，以增进与俄国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十分满意，想马上试用这件礼品。他坐上尼克松和为他们当翻译的多布雷宁的汽车，启动后向前猛冲，驶出100米后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急刹车。毫无思想准备的尼克松的头险些碰到前面的玻璃上。

不过总统并未露出受惊的表情。行车结束时还恭维说：

“总书记先生，您的车开得真好。”

勃列日涅夫对此信以为真。

“惹人注目的是，他不知怎么总是像孩子似的对一些东西感到开

心，”布鲁坚茨记述道，“他明显地喜好漂亮衣服，比如，特别欣赏自己的那件河狸皮大衣，还骄傲地向人展示专门为他制作的当时才刚刚流行的电子表……”

大国领导人向他赠送汽车或者名贵的猎枪。他所收集的猎枪相当可观，已珍藏了数十支之多。战友和下属还奉送金表、花瓶、贵重的珠宝首饰。所有这一切，后来都被从家人中强行收回。

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颁发勋章，都知道他喜欢这一套。他成为三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两次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三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英雄、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古巴英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英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

为了存放这些奖品，为他制作一个大匣子。他常常取出勋章，像小孩子似地逐一摩挲赏玩。他很乐意接受奖金、称号，甚至纪念章。

下属们也欣然为此作出努力。1973年他“由于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被授予国际列宁奖金。1975年获约里奥—居里金质和平奖章。1977年获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这是苏联科学院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最高奖赏。

每年他的生日，在发布千篇一律的授奖命令之际扎米亚京就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最好还是给你制作一件精美的礼品。”

“礼品归礼品，”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勋章还得让他们颁发。”

更换党证的时候，他被登记为第2号（他亲自将列宁登记为第1号）。

有人发明了一种“加入苏共50年”纪念章，并将其颁发给勃列日涅夫。

“有一次，”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苏什科夫记述，“列昂尼德·伊里奇接见一家美国公司的人，他出言机智、生动，交谈很顺当。美国人临走时给他留下了礼物。他检视了一番，待来客走远后，对帕托利切夫说：

‘尼古拉，你瞧，美国人很有钱，可送礼老是很小气！’

说完大笑，叫来一名助手，吩咐将这些礼物交给女儿和儿子。”

当年的政府庶务局局长斯米尔丘科夫对一家刊物发表谈话说，勃列日涅夫75岁寿辰前夕，政府送了他一个镶嵌花饰的小匣子。斯米尔丘科夫去向政府首脑吉洪诺夫报告，说礼品业已送达。这时勃列日涅夫打来

了电话：

“听着，刚才斯米尔丘科夫送来那么一个小匣子。这是谁送的——是部长会议还是你送的呀？”

吉洪诺夫明白了，礼品不合心意，当即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这是部长会议庶务局送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径直打听起来：

“那么你送什么呀？”

“我买了一块金怀表，可是不知如何送给您，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勃列日涅夫感到惊讶，“你让人快点儿送来吧，要不我就走了。”

他产生了虚荣心，总想炫耀。

有一天恰佐夫看见他手上戴着一枚刻有小图章的笨重的金戒指。勃列日涅夫问：

“这戒指真的很漂亮，很适合我戴吗？”

喜欢贵重的珠宝首饰——这又是一种新爱好。院士略略表示怀疑：苏共中央总书记竟然对金戒指感兴趣，周围的人不会惊奇吗？国家广播会电视委员主席拉宾连电视从业人员戴了结婚戒指都不许出现在镜头里。

“他以近乎怜悯的目光瞧了瞧我，仿佛觉得，我太不开窍了，”恰佐夫写道，“列昂尼德 · 伊里奇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懂，他的全体同事、周围所有的人都说，这戒指看上去非常漂亮，他应该戴。”

南斯拉夫领袖铁托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只镶嵌宝石的戒指，有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一直很得意地戴在手上。据说，阿塞拜疆领导人阿利耶夫也送给了总书记一枚镶嵌了宝石的戒指。不过，丘尔巴诺夫说，那枚戒指是尤里送给父亲以祝贺其70寿辰的。勃列日涅夫感到很高兴，不仅由于它是一件漂亮的玩意儿，而且这是儿子的礼物。

第6章 为总书记代笔的回忆录

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不止一次说过，他很想写一本书《履历与生活》，讲他生平经历中的方方面面。而且他又喜欢读叶赛宁和阿普赫金（19世纪俄国诗人）的诗。

写书设想很快便成为现实。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罗季奥诺夫应召去见齐米亚宁。

齐米亚宁吩咐说：“有一个任务，就是及时撰写和出版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简明传记。完成期限为六个月。”

出版总书记的官方传记只是一个开端。勃列日涅夫希望描写他充满英雄业绩的一生的历史。

据阿尔巴托夫说，“勃列日涅夫的记忆力很好，他也喜欢讲述往事，有时还颇为风趣，能准确地选取细节，构成各式各样饶有兴味的故事。他回忆青年时代、前线岁月、扎波罗热的书记经历，在哈萨克和摩尔达维亚的工作。这种追忆经常重复，但谁也没有表现出早已知悉的样子，只是笑着表示赞许。”

勃列日涅夫本人则开始埋怨起来：

“唉，什么时候才能出书呢？我说了又说，可是谁也不肯帮忙。我可不是作家。”

最终决定是在勃列日涅夫前往图拉为该城授奖的火车上作出的。

扎米亚京被请到列车上的休息室，契尔年科对他说：

“列昂尼德，我们刚才谈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书的事情。应当把它写出来。”

扎米亚京点头称是。

“应当物色几个作家，将此事托付他们。”契尔年科提出。

“何必呢？”勃列日涅夫反对，“我们就让扎米亚京去写好了。”扎米亚京自己就出任过大型政治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的作者，该片被授予列宁奖金。

扎米亚京还组织撰写勃列日涅夫回忆录。该书从“小地”开始，描写勃列日涅夫的军事功勋。

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仅没有参与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的工作，而且甚至对那些执笔的人也什么都不曾讲述过。有人为他们在档案库中搜集文献和寻找勃列日涅夫当年的同事。

扎米亚京问勃列日涅夫，他是否同意为最初阶段口授一些内容。总书记却加以回绝。

“我在第18集团军政治部时有一个叫帕霍莫夫的人，他当年的确常记日记、搜集文献，”勃列日涅夫说，“他的腿有病，不能走路，但是会交出日记的，也可以讲述。”

退役上校帕霍莫夫曾经在第18集团军担任过勃列日涅夫的副手，战后在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他并没有交出日记，但作了大量讲述。

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来执笔呢？鲍文推辞了。他解释说，他完全不懂这一套，写文章、讲话可以，但纪实不是他熟悉的体裁。

扎米亚京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允许之后，将自己的打算告知他年轻的副手伊格纳坚科，这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记者，《共青团真理报》出身。伊格纳坚科当即提名阿格拉诺夫斯基，那是《消息报》最出色的笔杆子。

《小地》的文稿写成之后，由扎米亚京和契尔年科审阅。中央委员会打字室几名允许接触机密材料的女打字员将手稿打印了四份，呈送勃列日涅夫过目，当时他正在医院里卧床不起。多罗西娜为他朗读了书稿。他稍作修正便加以首肯。

甚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也不知晓写书的事，只好向扎米亚京要了一份。他连夜通读之后往医院里给“作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不胜惊喜之情。

代勃列日涅夫捉刀的是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与阿格拉诺夫斯基联手写作的其他几个人是：作家萨赫宁、《真理报》工作人员穆尔津（负责撰写《垦荒》）和古巴廖夫（他则写航天部分）。

他们匿名写作，只有那些邀功讨好的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稿费也没有支付给真正的作者，他们并不指望挣钱。有个人需要一套住房，另一个人请求将他纳入可以在卫生部第四总局门诊部看病的人的名单。结果代替住房的是颁给了一枚勋章，纳入门诊部名单同样落空——不合规

定。

当时主持国家出版委员会的斯图卡林回忆说，《小地》出版之后阿格拉诺夫斯基来见他说："告诉您一件绝密的事，最近半年我一直在写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几乎没有给报社写稿。"

他要求对他的那些作品给予补偿。斯图卡林许诺出版阿格拉诺夫斯基的随笔集，也向萨赫宁许诺出版这样的文集。后来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的作者们已经不那么为自己的著作感到自豪了，不过他们的结局并不太坏。

然而，远非每一个记者都愿意干这样差事。《消息报》总编辑托尔库诺夫将最优秀的作者之一波利亚诺夫斯基约请到他那里，说："新罗西斯克被授予英雄城称号。列昂尼

德 · 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亲自去颁发金星奖章。现在想委托您写他的贺词，原始材料您可以找助手去要。"

"我感到，"波利亚诺夫斯基回忆说，"我就要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勃列日涅夫当时还相当年轻、强壮，没有疾病的任何征兆，距离奴才般的献媚的《小地》出版也还很早。但是——这并不是我想干的事情。"

"请原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波利亚诺夫斯基回答说，"我需要紧急出差，车票已经在我口袋里了。"

托尔库诺夫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消息报》庶务处长后来对波利亚诺夫斯基说："你疯了！这可是终生难逢的大好机会呀。参与其事的人都能得到住房和别墅……"

波利亚诺夫斯基企盼住房长达20年，直至勃列日涅夫去了另一个世界方才到手，但他丝毫不后悔。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以巨大的印数出版。它在学校和部队中被列入必读书目。勃列日涅夫心爱的演员吉洪诺夫则在舞台上朗诵《小地》。帕赫马托娃根据朵卜陇拉沃夫的诗谱写了歌曲《小地》。

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科研会议，某些年高望重的文艺学家丝毫不觉难为情，竟然将祖国文学从普希金到勃列日涅夫直接贯穿起来。

给勃列日涅夫支付的稿费高达数十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1981年，勃列日涅夫从12万卢布中按比例交纳党费。所有的收入都应交费，但中央委员会条例中作了特别说明的除外。例如，1980年授

予他的文学领域列宁奖金就不必交费。

苏联文学、艺术、建筑领域的列宁和国家奖金评奖委员会主席、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对《小地》、《复兴》和《垦荒》三部曲赞不绝口：“这些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丰富了苏维埃社会的精神生活，树立了党性思维的最高典范，激励一代代艺术家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当今时代，更加有意义地进行艺术概括……”

勃列日涅夫获奖后宣读事先早已写成的答谢词：

“如果能赢得时间，如果我办得到，那么，我还将继续写我的札记。可以说，我将今天所获得的奖励视作对未来的祝福。”

扎米亚京也接到描述勃列日涅夫家庭的指示。契尔年科挑选了一些素材，已经完篇了，但勃列日涅夫感到身体极度不适，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不过撰写他的回忆录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读过这些稿子的只有契尔年科一个人，他说：“先放着吧。”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1983年1月号《新世界》杂志上刊出了以他的名义撰写的《回忆录》一书的最后三章——《摩尔达维亚的春天》、《宇宙航行的十月》、《论共产党员》。然而谁都已经不对它们感兴趣了。

扎米亚京曾对我讲过，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他向安德罗波夫报告：

“回忆录还有几章已经写好了，但列昂尼德·伊里奇连看也没来得及看。”

总共写好了八篇文章：《工厂汽笛声中的生活》、《故乡情》、《小地》、《复兴》、《垦荒》、《摩尔达维亚的春天》、《宇宙航行的十月》、《论共产党员》。回忆录的全文在“红色无产者”印刷厂印制了20册。附有许多照片和一则题记：“为苏联人民的利益、列宁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过去是并且至今仍然是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所在。”

第7章 倒计时

这个政权在70年代末业已老朽和僵化，它不复听取自己的出谋划策之人的意见。

最后数年，勃列日涅夫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得不依靠最亲密的战友们——首先是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看了一个材料后，总是说：“应当问问米沙”。于是材料就被送给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的话就是最后定论。

“恰好这个时期我参与草拟一个报告，三个星期中一直观察已经是病人的勃列日涅夫，”佩切涅夫教授回忆说，“他患有进行性血管硬化，因而他会出现某种间歇性的状况。有一天他能够听我们替他所写的文章，甚至间接参与讨论，而另一天却‘断了电’。他唯苏斯洛夫的意见是听，常常问：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对此有何看法？”

勃列日涅夫依靠苏斯洛夫有如依靠一堵石头砌成的墙，他常在自己人圈子里说：

“如果我需要外出，只要有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莫斯科，我就感到放心。”

不过苏斯洛夫本身也是一个病人。他患有糖尿病和多种其他疾病。在招待会和宴会上，给他的酒杯里斟的都是矿泉水，上的菜则是炖鱼和禽鸟白肉。在家时他宁肯喝粥吃乳渣。

苏斯洛夫不喜欢医生，不相信他们建议，这和他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妻子一模一样。夫妇二人常常拒绝医生们的救护，也不肯服用他们所开的药剂。他向主治医生诉说，即便是短暂的散步之后左胳膊和胸骨后面都疼。富有经验的医生当即便断定这是心脏性质的疼痛——他的心绞痛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拍摄了心电图，进行了其他一些检查，确定为心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但苏斯洛夫坚决不接受这一诊断：

“你们完全是凭空捏造。我并没有病，是你们想把我说成有病。我很健康，我只不过是关节疼罢了。”

也许，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有病，是为了不让人家打发他退休；也有可能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是真心相信自己不会生病。

根据恰佐夫的申请，在美国定购了一种含有心脏病药的软膏，却对苏斯洛夫说这可以治关节痛。苏斯洛夫用力在疼痛的胳膊上揉擦软膏，

药力果然像预料的那样起了作用，心绞痛减轻了。苏斯洛夫很满意，以教训人的口气对医生们说：

“我说过了嘛，是胳膊疼，擦擦软膏，就啥事都没有了。可你们偏要对我一再地说：心脏，心脏……”

1982年1月，苏斯洛夫卧床接受诊查。起初医生们没有查出任何可怕的症候。后来直接在医院里发生了中风，他失去知觉，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脑出血的面积太大，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苏斯洛夫差点儿活到80岁。他能长期保持工作能力，得益于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和极其沉着冷静的个性。恰佐夫院士常说，如果旁边有炸弹爆炸，苏斯洛夫也不会眨一眨眼。同时他的日子也比勃列日涅夫轻松。他没有打过仗，没有开过荒，也没有在斯大林去世后被逐出中央委员会……

医学结论中称：苏斯洛夫死于“动脉粥样硬化，更重要的是在糖尿病基础上形成的心脏和颅脑血管疾患”以及“脑干血管血液循环的急性损害”。

党的重要活动家去世之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都要来取走其全部档案资料，送交中央委员会总务部，由契尔年科支配。所有的人的档案资料全都遭到同样的命运，无论赫鲁晓夫、米高扬抑或其他许多人无不如此。惟独没有拿到苏斯洛夫的档案资料，其原因只不过是他根本没有任何档案资料。

1982年1月30日为他下葬。告别仪式在联盟院圆柱大厅举行，但市中心却实行一套特别的规定。我当时在位于那里的《新时代》杂志工作的热闹的普希金广场，被民警和国家安全局密集的警戒线封锁；要想前往地处“俄罗斯”电影院背后的编辑部，必须出示工作证。民众需要经过广场者，一律不予放行。

警戒线附近排满了一行行长队。民众默不作声地愤愤不平，一个站在我旁边的男子相当愤恨地说了一句：“他们是在进行彩排！”

他说得对。从苏斯洛夫去世开始，兴起了后来被称为“豪华葬礼五年计划”的风气。

政治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被委派为治丧委员会主席。《新时代》杂志社我所在的那个部的编辑、已故的切尔诺乌索夫是一个颇富嬉笑怒骂才智的人，他冷笑着称赞中央委员会的选择：“那有什么关系呀，阿尔维德·亚诺维奇（即佩尔谢）可是个成熟的共产党员。”

佩尔谢瘦骨嶙峋，生着一张干瘪多皱的黄脸，比苏斯洛夫的年纪更大。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与政治局委员们一起，被请到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一场戏剧演出，演的是当时遐迩闻名的剧作家沙特罗夫的剧本《我们必胜》。据剧院文学部主任斯梅利亚斯基回忆，为了以防万一，将一台电视机抬到了政府包厢里，因为当天第比利斯“狄纳芙”足球队参赛，可供勃列日涅夫想知道比分时使用。

克格勃的技术人员安装了功率强大的扩音器和灵敏的双耳机——勃列日涅夫听力不好。政治局候补委员们被安置在观众大厅另一面的经理包厢里。

在一片寂静中，全大厅都听见勃列日涅夫在高声地评论演出，他已经很难分清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了。像所有耳聋的人一样，他并未意识到他说话的声音太高。当扮演列宁的卡利亚金出场时，勃列日涅夫问道：

“这是列宁吗？是不是应当向他打个招呼？”

坐在旁边不动声色的契尔年科安抚总书记：“不必了。”

当卡利亚金与一位工人交谈时，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饰演工人的布尔科夫背对观众站着，勃列日涅夫听不见演员说话。他回头对葛罗米柯说：

“你能听见说的什么吗？我什么也听不清。”

勃列日涅夫离开剧场，20分钟之后才又回来。同事中有人向他介绍他错过的列宁与美国实业家哈默谈话的那场戏：“刚才那个就是哈默。”

“哈默本人？”勃列日涅夫感到吃惊。

这时全场观众再也忍不住了，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莫斯科全城都哄传勃列日涅夫去莫斯艺术剧院看戏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勃列日涅夫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最亲密的助手们焦急不安。接近他的人有限，要影响他变得更困难了，而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总书记那些一向受到纵容的心腹日子不好过。

伊诺泽姆采夫极为失望。哪怕试图多少做点儿改变都办不到。起初他相信，局部的改革也会有所裨益。他常说，必须更换领导人。他希望更为年轻和精力充沛的人能将情况扭转到需要的方向。临终之时他才明白：毫无希望，局部的改变挽救不了国家。

伊诺泽姆采夫对妻子说：“你明白吗，党是没有前途的了。它是在绝密的条件下建立的，这对沙皇制度下的环境而言很合乎逻辑。但是当它已经成为执政党之后，却仍然完全保持着那种结构。这样的党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伊诺泽姆采夫院士是与勃列日涅夫关系亲密的人。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又成为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所有这一切都是得到勃列日涅夫赏识的标志，巩固了他的高级地位。在总书记身边的人之中，他几乎是被勃列日涅夫以本名和父名相称的唯一一个人。但与总书记的这种亲密关系什么也未能保障。

伊诺泽姆采夫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天真的任务——让上司睁眼正视所发生的事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向掌握着政权的人们提出忠告。然而这个政权在70年代末业已老朽和僵化，它不复听取为自己出谋划策人的意见。

伊诺泽姆采夫60寿辰前夕，科学院向中央委员会呈文，请求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然而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扎米亚京加以反对。对于洞悉机关阴谋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信号：伊诺泽姆采夫已经不复受宠了。

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有些人急于对伊诺泽姆采夫进行报复。所有的指责都被视作政治原则的问题。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普里马科夫各位院士被列入所谓的修正主义团伙。伊诺泽姆采夫在老广场被冠以“可口可乐”的绰号，暗示他有亲美国的感情。

这场迫害对他是致命性的。1982年8月12日他死于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年仅61岁。然而莫斯科市委并未就此止步，还希望最终捣毁修正主义的巢穴。伊诺泽姆采夫院士只是头号目标，随后排上号的依次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这些人由于与勃列日涅夫友好，这些年来实际上一直未受迫害。中央委员会机关那些人眼见勃列日涅夫即将离去，顿时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鲍文和阿尔巴托夫在总书记助手楚卡诺夫的协助下，终于得以见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虽已病入膏肓，但对伊诺泽姆采夫仍然留有良好的记忆。

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描写了这个场面。他和鲍文陈述说，莫斯科市委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准备彻底摧毁研究所，企图诋毁伊诺泽姆采夫的名声。

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提出额外的问题，只是问了一句：“该给谁打电话呢？”

“格里申！”

总书记跟前的一个靠放式小桌上放着一台专门用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们联系的电话机。他按下按钮，立即便能接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被呼叫的人取下没有拨号盘的浅黄色电话机听筒，应声回答：

“听候您指示，列昂尼德·伊里奇。”

而且勃列日涅夫可以不取下听筒进行通话。他按下标有“格里申”的按键。格里申当即回应：

“您好，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听候您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说，他听说似乎围绕伊诺泽姆采夫的研究所搞了个什么案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进行整顿。

“那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书记想要知道。

格里申的回答谁也没有意料到：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完全是第一次听说那个似乎在伊诺泽姆采夫的研究所里进行侦查的委员会。”

勃列日涅夫将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惟恐按捺不住的阿尔巴托夫和鲍文说话，然后嘟哝着说：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你把这一切都查清楚。要是有谁指示找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麻烦，你就将指示撤销，然后向我报告。”

阿尔巴托夫愤怒地说：

“我从来也没想到，政治局委员竟然可以公然对总书记撒谎。”

勃列日涅夫只是微微冷笑。应当理解为，他的经验却是另有不同。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最后一次去塔什干是极为不幸的。对此，勃列日涅夫的卫士梅德韦杰夫将军曾作过详尽的叙述。

1982年3月23日勃列日涅夫正在乌兹别克。这天本来计划去一家建造“暴风雪”号宇宙飞船的工厂。可是上午又决定，勃列日涅夫不去那里了，派往该厂的卫队便撤了回来。

突然间勃列日涅夫对共和国领导人拉希多夫说：

“午饭前还有时间。我们答应过参观这个工厂，人们准备好会面，集

合起来等着我们。这不好……会出问题的……人们会议论的……我们还是去吧。”

拉希多夫只有高兴的份：“当然去啦，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的卫队长里亚边科加以干预：“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能去厂里了，卫队已经撤了，让他们回去可需要时间。”

勃列日涅夫严厉地回应说：

“给你15分钟，让卫队回去。”

但刚过10分钟，他就已经动身了：

“还是出发吧，你们的准备时间足够了。”

克格勃第九局的莫斯科小队及时赶到，乌兹别克的安全人员却耽延了。厂里的内部无线电转播台宣布，总书记即将莅临。大家全都放下工作，前往迎接勃列日涅夫。

在装配车间，工人们为了看清勃列日涅夫，纷纷爬上正在建造的一架飞机周围的脚手架。卫队费了很大力气制止人群。突然之间，一块巨大的木板平台经不住人们的重压轰然垮塌，朝勃列日涅夫和拉希多夫劈头盖脸砸了下来。来自第九局的个人卫队的四名军官使出难以置信的力气举起那块木板台子，用力撑住，直到当地卫队冲过来帮忙。要是军官们举不动，苏共中央总书记和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肯定要被压死。

谁也没有牺牲，但无论勃列日涅夫、拉希多夫还是卫队队员，全都吃了苦头。勃列日涅夫被一个圆锥形金属的角擦伤了耳朵。他被人扶起后，医生不安地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觉得身体怎么样？您能走路吗？”

勃列日涅夫信心十足地站稳了脚跟，但说他锁骨疼。与工人们的会见取消了，勃列日涅夫被人带领着穿过人群朝出口走去。卫队长里亚边科举着手枪挤了出去。

勃列日涅夫不肯去医院，便将他送到官邸，让他躺下，进行X光检查，发现他右边的锁骨折断了。

为卧床的勃列日涅夫接通了安德罗波夫的电话。他说：

“尤拉，我在这儿的工厂里出了一件倒霉的事故。不过我求你，你在

那边对任何人也不要说出事情。也不要处分谁，是我自己不对。尽管大家劝阻过我，我还是事先没打招呼就去了。”

医生们劝说勃列日涅夫立即返回莫斯科。

但第二天他需要在塔什干的庆祝大会上讲话。他留了下来，也发表了讲话。这对一个年迈而且身患重病的人而言，堪称勇敢行为。

坐在会场的塔什干人和收看乌兹别克首都转播的大批电视观众，大概会觉得勃列日涅夫头天晚上喝醉了，因为他的反应有些迟钝。只有陪同他的人知道，他的右胳膊哪怕稍微动一动，对他来说都极其痛苦，因此他不得不服用止痛药。

勃列日涅夫还在塔什干耽延了一天，为的是与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会面，向拉希多夫颁发十月革命勋章，直到这以后才离开。

在莫斯科，他被送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医院。他的锁骨一直未能愈合。整个说来，从塔什干回来之后，勃列日涅夫真的开始彻底衰弱了。他已不能独自从讲台上下来，不能判断台阶的高低，只好求人帮扶。克里姆林宫里用于召开中央全会的大厅，安装了专门的扶栏，以便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年事已高的政治局委员能够登上讲台。设计师们接到指示，制造一种自动梯子，使其能够将勃列日涅夫送上列宁陵墓和飞机。

勃列日涅夫来到克里姆林宫，待上几个小时，便急忙离开办公室。秘书们谁的电话也不肯转接，全回答说，总书记正在主持会议。如果有人请求接见，勃列日涅夫便会不满地嘟哝说：

“干吗要见我？难道中央委员会里就我一个人工作还是怎么的？”

勃列日涅夫变成了经常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的人，已很少愿意与谁交往。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孙子安德烈回忆说，“他变得越来越爱生气，特别是有了后辈之后，总是嫌吵闹。我们这些孩子每天晚上都静悄悄地坐着，不敢喧哗。在我的记忆里，他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曾特别关注，也许，仅仅最初曾经同我的表姐维卡一起消磨过一些时间。我是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勃列日涅夫家中的第二个孩子，在我出世之前，列昂尼德·伊里奇对孙辈的爱意已经枯竭了。”

1982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去巴库向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电视直播了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他说话口齿不清，但观众们听出来了，他把“阿塞拜疆”说成了“阿富汗”。终于他自己也意识到有点不

对头，便不再作声。后来才沮丧地高声说道：

“这可不是我的错……只好从头读起了。”

原来，所给他的讲稿完全是为另一次会晤准备的。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只好让勃列日涅夫停了下来，将另一篇讲话稿放到他面前。电视摄像机展现了全场疯狂鼓掌的镜头……

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部长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回忆说，1982年10月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请勃列日涅夫莅临苏联陆海军最高指挥人员年会。勃列日涅夫的一只胳膊由乌斯季诺夫搀扶，另一只则由端着茶杯的服务员扶着。勃列日涅夫讲了15～20分钟。他用一根手指头在讲稿上指来指去，发音含糊不清，无法明白他所说的意思。

第8章 谁第一个到来，谁就是继承人

勃列日涅夫被禁止吸烟，他所能做的就是：有时候站在那些吸烟的人旁边闻一闻烟味。

勃列日涅夫是在睡梦中去到另一个世界的，平平静静，毫无痛苦。这样逝世从来都被视作幸福。

1982年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向自己宠爱的人之一——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颁发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现场目击者们讲述，奖章从衰弱不堪的勃列日涅夫手中掉到了地上。

这是一个征兆……

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列宁陵墓的观礼台上坚持站立着看完阅兵式，检阅了游行队伍。傍晚又去参加招待会，发表预定的讲话。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当天晚上是最后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他们都去克里姆林宫参加节日招待会。电梯很小，索洛缅采夫决定让勃列日涅夫先上。但后者提出：

“没什么，米沙，咱们一块儿上好不好？”

“您先上吧，列昂尼德·伊里奇，我随后再上。”

“不，一块儿走吧。”

第三个走进电梯的是一名卫士。据索洛缅采夫称，勃列日涅夫看上去精神抖擞，高高兴兴。

他甚至给主治医生放假过节，吩咐其好好休息。晚上他去了扎维多沃。他自己并没有开枪射击，但很开心地看着其他人打猎。

勃列日涅夫的值班秘书扎哈罗夫11月9日8时在总书记接待室开始值班。梅德韦杰夫上校来电话通知说，勃列日涅夫中午要来克里姆林宫，让他请安德罗波夫于总书记到来之前赶到接待室。值班秘书立即将梅德韦杰夫的话转告安德罗波夫，后者当时正在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

勃列日涅夫于预定时间抵达克里姆林宫，心情很好，将安德罗波夫请进了办公室。谈话之后勃列日涅夫用午餐，休息。晚上7点后准备出发前往别墅。

“他在接待室里耽搁了一会儿，让我抽他心爱的‘新新’牌香烟，”扎哈

罗夫讲述道，“他被禁止吸烟，他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站在那些吸烟的人旁边闻一闻烟味。当天我也有几分钟充当了这种角色。”

并没有他会溘然长逝的任何征兆。

1982年11月10日上午8时，恰佐夫院士接到勃列日涅夫的卫士索巴琴科夫的电话：“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列昂尼德·伊里奇需要复苏急救！”

颇为奇怪的是，一个重病患者家里竟然没有安排固定的医疗值班人员，结果不得不用相当长的时间等待医生到来。勃列日涅夫是在睡梦中逝去的。然而，如果他是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那么有医生在场（或者准确些说没有医生在场）会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恰佐夫急急忙忙赶来（比急救汽车要早）的时候，发现勃列日涅夫数小时之前即已逝世。

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早上8点起床，她当时要注射胰岛素。勃列日涅夫侧身躺着，她以为他还在睡。当索巴琴科夫来叫醒他时，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了。于是索巴琴科夫按照平日所受的训练，开始为他做心脏按摩，然而已经无济于事。勃列日涅夫是在睡梦中去到另一个世界的，平平静静，毫无痛苦。这样逝世从来都被视作幸福。

恰佐夫院士考虑的不是医疗的问题。他面临一个复杂的任务：第一，如何向勃列日涅夫的遗孀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说明他的死因。第二，谁是这个国家权贵中的头号人物，以好向他报告总书记已经不在了？

“我不排除，”恰佐夫回忆说，“他们接完电话之后，过几分钟我所说的一切便会成为或则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或则内务部长萧洛科夫的一笔财富。我清楚地懂得，关于所发生之事首先必须报告安德罗波夫。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应当掌握事件下一步的进程。”

恰佐夫的决定具有政治意义。谁第一个到来，谁就是继承人。

安德罗波夫在这样早的时候尚未抵达中央委员会。恰佐夫要他的接待室值班的人火速接通他与勃列日涅夫别墅的电话。当安德罗波夫回电话时，恰佐夫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请他立即过来。安德罗波夫并未提出任何问题，但马上便明白了什么事情。

他到来后，行为举止极度缺乏自信。

“不知何故他手忙脚乱，”恰佐夫回忆道，“突然让我们把契尔年科请

来。勃列日涅夫的夫人说得颇有道理：契尔年科不能让她的丈夫死而复生，他到别墅来无事可做。我知道，她认为契尔年科是那些为勃列日涅夫提供安眠药的朋友之一，本来医生们是禁止勃列日涅夫服用安眠药的……”

安德罗波夫在恰佐夫陪同下进入卧室，向业已辞世的总书记告别。

“安德罗波夫看见失去的勃列日涅夫时，打了一个冷颤，面色发白，”恰佐夫院士写道，“我很难猜测，此时此刻他在想些什么——大约是在想，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所处的地位多么的高（何况他身患重病）都是要死的，抑或是在想，他日夜梦想的成为党和国家首脑的那一刻已经近在眼前。他突然着忙起来，向维多利亚许诺一定会支持她，关心她，然后急匆匆地道别，驱车而去。”

有位记者援引与勃列日涅夫一家关系亲密的人们的话，在文章中写道：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本人曾说，安德罗波夫取走了勃列日涅夫一直保存在卧室里的一个小手提箱。箱子里究竟是什么呢？

人们询问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她却不知道。仅仅记得，有一天勃列日涅夫笑着说，里面装的是“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黑材料”。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证实了这点。据他说，安德罗波夫还拿走了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加有密码锁的公文包，那个包平时都由总书记的卫士携带……

勃列日涅夫确有可能掌握着某些有损他的心腹们名誉的材料。据格里申证实，总书记甚至向政治局委员们暗示过，他了解他们的一切。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这个皮包中是他需要携带到别墅去的紧急文件，以便晚上翻阅。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都收到同样的材料，但不允许带出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范围。

安德罗波夫取走这些文件，并不是希望得到总书记的档案资料，而是出于15年克格勃工作所培养出来的本能：秘密文件应当放在保险柜里……

伴随已故总书记遗体进入太平间的只有梅德韦杰夫上校一个人，因为勃列日涅夫死在他当班期间。

医学结论确认，勃列日涅夫逝世的原因是急性心功能衰竭：

“列·伊·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患有主动脉粥样硬化，并发展而为腹部动脉瘤，冠状动脉狭窄性粥样硬化，局部缺血性心脏病兼心律不齐，出现心肌梗死后的心肌斑痕改变。1982年11月10日8时与9时之间发生心脏骤停……”

勃列日涅夫的死讯首先通知了克格勃各管理局的局长，他们再报告自己的党内上司。

例如，首都的国家安全局局长阿利金得知总书记去世的消息要早于格里申，尽管格里申是政治局委员。市委正在开会，阿利金接到一个便条：“费多尔丘克同志请你在市党委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去电话。”阿利金迫不及待，当即走出会场给克格勃主席挂电话。费多尔丘克对他说：“勃列日涅夫去世了。”阿利金告知了格里申。

一大早应召去见中央书记齐米亚宁的有：宣传部长佳热利尼科夫、对外宣传部长扎米亚京、《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共产党人》主编科索拉波夫、“新闻”通讯社管理委员会主席托尔库诺夫、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斯图卡林、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切尔尼亚耶夫。

齐米亚宁向他们说明，需要草拟两份文件——悼词、告党和人民书。在场的人被分为两个小组。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分别带到不同的办公室，”齐米亚宁说，“没有将文件提交政治局批准之前，不能放你们出来。茶和夹肉面包保证供应。”

齐米亚宁给内务部长萧洛科夫打电话：

“你取消庆祝民警日的音乐会吧。”

他又接通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的电话：

“你要取消一切娱乐性节目的播出。”

他对切尔尼亚耶夫则是这样说的：

“你注意看看，苏斯洛夫去世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写的……关于党的作用，关于政治局，以便……”

涉及勃列日涅夫噩耗的消息尚未向全国报道，但经验丰富的人已经猜测到了。所有的广播频道都在播送哀伤的古典音乐，电视取消了纪念民警日的节日音乐会的转播。

11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宣布全会开幕:

“党和国家遭受了沉重的损失。最大的政治活动家，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一个忠于事业、具有伟大精神的人，与世长辞了……”

接下来由契尔年科发言。他以政治局的名义建议选举安德罗波夫为

总书记。尽管正在致哀期间，中央委员们还是起立鼓掌，向国家的新主宰致敬。12时30分，全会的全体参加者来到联盟院圆柱大厅向勃列日涅夫告别，从他的灵柩旁缓缓走过。

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露面了几分钟，向亲属们略致慰问，便抽身离去了。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和尤里哀哀哭泣。

1982年11月15日举行了葬礼。追悼大会由安德罗波夫主持。勃列日涅夫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被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边。

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乘飞机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后来讲述道：

“我位于来宾观礼台上，有着良好的视界，我看见死者不胜悲伤的遗孀走到勃列日涅夫灵柩近旁，作最后的告别。她瞧了瞧他，俯身在灵柩上，接着（完全确定无疑）对丈夫的遗体画了一个十字。我不胜惊愕。”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永远纪念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决定。

卡马河畔切尔内市更名为勃列日涅夫市。莫斯科的稠李区则改称勃列日涅夫区。在首都和其他四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广场。在广场的名称中不仅提到一位党的活动家的姓，而且加上本名的父称，这大概还是第一次。决定在勃列日涅夫生前居住的库图佐夫大街26号大楼上悬挂纪念牌匾。

牌子很快便出现了，为此莫斯科市委组织了盛大的群众大会，首都的主宰格里申发表讲话。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报纸对这一事件仅仅发表了简短的报道，格里申的讲话则未予刊登。

1982年11月13日，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通过内部决定《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家人的物质保障》。

1．确定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娃享受全苏级别的退休金，额度为每月700卢布，另加补贴100卢布。

2．维·彼·勃列日涅娃可保留目前所免费居住的国家别墅，连同为数最多5人的服务人员和一名别墅管理员，警卫方式不变。

上述国家别墅列入会计开支，服务人员则列入苏联克格勃第九局编制。

3．从苏联克格勃第九局系统为维·彼·勃列日涅娃提供“海鸥”牌轿车一辆和两名司机。

4．确定莫斯科市库图佐夫大街26号大楼内的90号住房归维·彼·勃列日涅娃所有，决定多余居住面积的开支按单人额度计算。

5．为维·彼·勃列日涅娃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家人保留苏联卫生部第四局系统特色门诊部和特色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以及疗养保障。

6．为维·彼·勃列日涅娃保留下述权利（付费）：订购饮食，使用苏联克格勃第9局的日常生活机构（缝纫车间及其他各种车间），同时在现有条件下使用医疗饮食食堂。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尤·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主席

尼·吉洪诺夫

在改革年代，所有这些决定均被撤销。礼品被没收——中央公共部的工作人员带着清单来到勃列日涅夫遗孀家中，四处搜寻贵重物品：“那把马刀和一套茶具在哪里？”随即让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搬出别墅。已故总书记的女婿丘尔巴诺夫被投入监狱。城市街道不再冠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纪念牌匾从库图佐夫大街那幢大楼上消失不见。经查明，原来是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斯坦凯维奇将其赠送给了柏林极权主义历史博物馆。勃列日涅夫一度拥有一套住宅的库图佐夫大街26号的大楼墙面暂时空空如也。

第9章 结尾的话

勃列日涅夫在一片赞许的掌声中成为国家第一号人物，而他离去时却伴随着公然的嘲笑。他似乎已经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趣谈。在那些年里，任何一群人中都会有一个人，在一片哄笑声中惟妙惟肖地模仿他说话的方式。然而岁月流逝，当年人们如何生活、思考和感受已经迅速被遗忘。对待勃列日涅夫的态度亦已开始改变。据说，“停滞”并没有那么坏，勃列日涅夫在国家的历史上也曾发挥过正面的作用。

人们将勃列日涅夫视作镇静、可靠、稳定的象征，而这些正是近年来我国人民所严重缺乏的。不单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和养老金领取者们带着怀旧情绪追忆勃列日涅夫，将他的时代称为黄金世纪：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于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开始生活得更好——能得到住房，购置家具和服装，去海边休养。人们还谈论当时犯罪率很低，对明天充满信心，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竭尽所能地利用了计划制度下可以利用的长处，建立了足够使用20年的后备力量。是的，香肠还不够多，但建成了国家至今依靠它生活的国民经济。这些人提醒说，时至今日国家仍然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过日子，而这些资源的出口正是肇始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他铺设了通向欧洲的管道，从而带来滚滚财源。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多年之后，我们对他的了解依然太少，不清楚他推进了什么，他希望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什么。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领导人，他将国家引向了灾难；另一些人则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都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他却是一个并不暴虐、不爱记仇的人，信奉一条原则：你活，也要让他人活。第三类人坚信，他比他那些葬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继承者要好得多。

问题当然不仅仅也不完全在于他的性格和气质，虽说在一种僵化制度的条件下，社会高度取决于国家头号人物的个性。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数年，苏联开始崩溃。究竟是勃列日涅夫的遗产成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呢，抑或相反，是继承者们滥用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至今并无统一的见解。

我国的历史一直呈螺旋式发展。一旦掌握政权，统治精英们便牢牢抓住不放，连最必不可少的变革也不容许。到了一定时刻，变革终究会开始，于是迅即转化而为涤荡一切的不可控制的自发势力。貌似牢固的上上下下的政权，所拥有的可依靠力量是如此微弱，在强大浪潮的冲击下根本无法坚持。

一个新的政权上台，重又试图禁锢一切。沙皇时代是如此——最后以血腥的国内战争告终，苏维埃政权时代也是如此——最后以国家的瓦解和流血的冲突告终。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所有的人全都期待着变革，因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示欢迎。改革成为摆脱大家早已腻烦、深恶痛绝的政权的节日。那些谁也没有选举过、自己任命自己身居高位的官员们发现，人们憎恨和鄙视他们。然而苏联的混乱、瓦解和消亡，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绝对全然出乎意料。谁也未能预想到，国家会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

改革的种种口号被看做早已酝酿成熟和完全必要的。不过，接着随之而来的却是……于是便有许多人将勃列日涅夫年代作为幸福美好的时光加以追忆。然而，难道有过错的倒是提供自由并试图纠正往昔错误的统治者，而不是那个意识不到自己的义务、将国家紧紧禁锢、阻碍其发展的人？不满的情绪在沸腾，于是让制度变得温和、打破一道道铁箍的第一次尝试，便导致装满弹药的桶子发生了爆炸。

如果当局不对各种社会需求充耳不闻，国家本来不致崩溃。如果它不去试图禁锢社会，而是允许它正常发展，绝不至于如此。不过勃列日涅夫和业已僵化的那个制度根本不可能施行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变革……

而所有的一切在开始之初都很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4年10月的那个日子，当时我伸手翻开一份刚刚出版的报纸，一眼便瞧见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大幅照片，他还相当年轻，招人好感，面容和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

第10章 勃列日涅夫大事年表

1906.12.6（新历19日）——诞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卡缅斯科耶村。

1923—1927——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和土壤改良中等技术学校学生。

1927—1930——任库尔斯克省格赖沃龙县土地规划师，随后在乌拉尔比谢尔季区任区土地局局长，区执委会副主席，乌拉尔州土地管理局副局长。

1928——与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杰尼索娃结婚。

1929——女儿加琳娜出生。

1930——1935——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学生。

1931——入党。

1933——儿子尤里出生。

1935—1936——服兵役。

1936——冶金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1937.5——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执委会副主席。

1938.5——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局长。

1939.2——当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

1941.6——被任命为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1942.10——被任命为黑海军队集群政治部副主任。

1943.4——被任命为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1945.5——被任命为乌拉尔第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45.7——被任命为喀尔巴阡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6.8——当选扎波罗热州党委和市党委第一书记。

1947.11——当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和市党委第一书记。

1950.7——当选摩尔达维尔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1952.10——当选苏共中央书记。

1953.3——被任命为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54.2——当选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

1955.8——当选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1956.2——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兼苏共中央书记。

1957.6——当选苏共中央主席团（后称政治局）委员。

1960.5——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963.6——当选苏共中央书记。

1964.10——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6.4——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1977.6——将这一职位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之职合而为一。

1982.11.10——逝世于莫斯科。葬于红场。